[匈牙利] 雅诺什·科尔奈 著
安 佳 张 涵 译

JÁNOS KORNAI

BY FORCE OF THOUGHT: IRREGULAR MEMOIRS OF AN INTELLECTUAL JOURNEY

思想的力量

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1928— ） 现任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终身荣誉研究员，哈佛大学埃利·S.弗里德荣誉经济学教授，中欧大学特聘教授。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1956）、《反均衡论》（1971）、《短缺经济学》（1980）、《通向自由经济之路》（1990），以及集毕生研究的总结之作《社会主义体制》（1992）。

思想的力量

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

[匈牙利] 雅诺什·科尔奈 著
安 佳 张 涵 译

JÁNOS KORNAI

BY FORCE OF THOUGHT:
IRREGULAR MEMOIRS
OF AN INTELLECTUAL JOURNEY

思想的力量

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是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的思想传记。在这本思想传记中，科尔奈教授结合自己在匈牙利的亲身经历和社会生活，叙述了他的经济思想发展历程，为他的经济思想发展提供了社会政治背景。

科尔奈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变体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他透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弊端，提出了软预算约束问题，剖析了长期短缺经济的现象、起因和影响；他系统地研究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经济、社会关系等，涵盖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领域，实证地讨论了这一体制运转时具备的充分和必要条件。这些研究对中国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为中国的专家学者更好地研究转型发展提供了一个观察和思考的参照系。需要指出的是，囿于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发展背景，科尔奈经历了由对马克思主义盲目而狂热的信仰，到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和反省，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演变过程。他在一些方面错误地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活力也缺乏正确的认识。科尔奈不少观点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于，正如他自己所强调的，其研究“都是以匈牙利为案例进行的”，是“基于匈牙利的经验”的研究结果。相信读者能用正确的观点解读本书。

2013 年 5 月

《思想的力量》序

对中国改革来说，若要问哪一位外国经济学家最值得铭记，那无疑非雅诺什·科尔奈莫属了。就在中国刚刚从“文革”的大灾难中脱身出来，已经认识到必须改革，却对改革什么和如何改革还茫无头绪，只好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去探路的时候，科尔奈在1980年出版了奠定他经济学学术地位的力作《短缺经济学》。《短缺经济学》对集中计划经济及其变体“市场社会主义”[1]所做的深刻分析，引起了世界经济学界的震动。1986年《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一问世，就在中国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中掀起了“科尔奈热”。他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短缺经济”、“扩张冲动”、“父爱主义”、“投资饥渴”、“软预算约束”等概念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儿。这本书也成为在中国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即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主要的参考文献。

继《短缺经济学》中文版在1986年正式出版以后，他的其他重要著作的中文版也陆续出版。[2]此外，中国读者还可以从报刊上读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3]科尔奈本人在应邀参加“巴山轮会议”以后，还多次访问中国。在1999年、2005年的访问中，他不仅介绍了改革经济学的最新进展，还对中国改革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科尔奈的所有这些著作和言论都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改革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养分。

但是，还有一件事堪称美中不足。这就是在我看来科尔奈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即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思想的力量》中文版还没有能够与内地的广大读者见面。

中国读者最熟悉的科尔奈著作是《短缺经济学》。如同我们知道的，科尔奈对这本书并不完全满意，原因是囿于当时匈牙利的社会政治环境，只好进行“自

我审查”，避开那些涉及苏东关系的苏联基本制度的若干“敏感问题”。

苏东剧变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在新的形势下，科尔奈用《社会主义体制》一书对苏联式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透彻分析，弥补了《短缺经济学》的不足。

然而，《社会主义体制》虽然向读者全面呈现了科尔奈分析社会主义体制时取得的学术成果，但是它并未回答这样卓越的学术成果从何而来：是什么力量推动科尔奈付出艰辛的努力，不畏艰险地攀登学术的高峰？所以，这本被科尔奈称为“另类自传”的书，不但讲述了他在何时发表哪些著述和言论，而且从主观的角度“解释在某时我为何有某种想法，哪些因素影响我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以及后来我的想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在这种求索后面的推动力量，则是一位社会科学家对于真知的追求。或如科尔奈在这本自传中所说：“我这一生中，从来不曾为名利奔波，穷尽一生努力追求的，唯有深刻的思想。”诚如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教授为《思想的力量》繁体字版写的推荐语指出的，这本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探讨科学创造的道德标准和心理过程的专著”。它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科学家应当怎样为真理、为人民的福祉而奋斗。

我和科尔奈教授相识相知始于1981年。那年夏天，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IEA）在雅典举行“相对价格的圆桌会议”，我被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主席于光远教授派去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科尔奈和苏联代表团团长、苏联经济学会主席哈恰图罗夫（V. R. Khatachurov）院士在短缺的制度根源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哈恰图罗夫认为，从长期来看，计划体制下并不存在系统性的短缺。而我认同科尔奈的观点，并以中国为例，说明了集中计划的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着系统性的短缺。会后我们促膝长谈，结成了延续三十多年的友谊。我在与科尔奈教授的交往中受益良多。我想和他接触的人都会与我有共同的感受。通过《思想的力量》的出版发行，更广大的读者，不论是同意科尔奈观点的人还是不同意的人，有望和我们一样，能够分享科尔奈的思想成果。它将是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思想界的一大幸事。

吴敬琏

2013年2月7日于北京

注 释

[1]“市场社会主义”是源于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的一种社会思潮，按照它的一位倡导者 W. 布鲁斯的解释，市场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经济体制的理想模式，即生产资料属于国家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规则。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生活中，市场社会主义意味着用“有调节的市场”取代行政指令来配置稀缺资源。在中国改革的早期阶段，“市场社会主义”具有广泛影响。

[2]《短缺经济学》(1980)，张晓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增长、短缺与效率》(1982)，崔之元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科尔奈经济改革理论》，何家成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反均衡论》(1971)，刘吉瑞、邱树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转型中的福利、选择和一致性——东欧国家卫生部门改革》(2001，和翁笙和合著)，裘宗燕译，中信出版社 2003 年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1992)，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版；《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肖梦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3]如《所有制形式与调节机制之间的亲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共同经验》，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 年第 6 期；《〈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出版十年之后：作者的自我评价》，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 年第 5 期；《解读软预算约束》(与 Eric Maskin、Gerard Roland 合著)，载《比较》2002 年第 4 辑；《诚实与信任：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的视角》，载《比较》2003 年第 9 辑；《大转型》，载《比较》2005 年第 17 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于短缺和过剩的市场理论研究》，载《比较》2011 年第 57 辑；《创新与活力：制度与技术进步的相互影响》，载《领导者》杂志总第 35—36 期，2010 年 9—10 月，等等。

中文版序言

我的这部传记能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对我而言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在作者看来，每一位读者无一例外都非常重要，但是，中国读者在我心中（我还要加一句：在我的感情世界里），占有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这一特殊位置最初是因为我的个人经历而慢慢形成的。1985 年，我非常荣幸地应邀参加了在长江巴山轮上举行的国际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中国的经济学同行邀请了七位国外经济学家谈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看法。这让我有机会可以就中国的改革前途发表自己的观点。打那以后，经济学家们谈到改革问题时，仍然常常会提到那次“巴山轮会议”。

不久，我的《短缺经济学》在中国出版了。在改革之前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通常长期存在食品和消费品以及生产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极度短缺。沿着该书的思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短缺并不是计划制定者错误决策的结果，而是体制本身带来的问题。这一体制不断再现着短缺经济。我的中国朋友对我说，他们可以用我在该书中提出的逻辑，批评官僚集权体制，批评僵化的计划指令体制，并倡导市场化改革。当时，我的所有著作只有这一本拥有众多的中国读者。

此后，我的著作在匈牙利文版或者英文版之后，很少再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后来我又数次访问中国，所到之处尽是赞赏和欢迎之声。对我来说，所有这些旅行都是伟大的智识体验（更别提那些文化、艺术和旅游胜地以及美食了，我真的感谢东道主让我享受到了这一切）。在我访问中国各地的时候，无论身处大学校园还是政府办公室，也无论与学生和教师一起还是与政府官员一道，他们

总是一次次对我说:“我是你的学生。”对此我总是从心底里感到自豪。一个以写作和教书为生的人听到这些话,能不深感荣耀和喜悦吗?正如读者将在本书中所看到的,友谊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我知道自己在中国有着可以信赖的真正的朋友,他们关心我的命运,在意我的言论,他们知道我是他们真正的朋友;我也关心他们的命运,在意他们的言论。

我非常希望我的这部传记能在中国找到知音。我希望多数读者都能感觉到:他们与作者之间存在一种思想和情感的联系。

事实上,中国和匈牙利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中国有13亿人口,匈牙利的人口却只有1 000万,只抵得上中国一些大城市的人口。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匈牙利的历史则比较短。两国有着不同的传统、习俗乃至不同的文字,种种不同还可以不断续写下去。当然,两国之间也存在重要的联系。

中国和匈牙利都熟知社会主义体制的运行规律,我在书中将这种体制称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匈牙利是最早对这一体制实施改革的国家。那时候,渴望进行体制改革的中国经济学家,非常希望看到为匈牙利改革奠定基础的那些理论和实践。1989—1990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匈牙利与其他几个东欧国家一样,加快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这与中国的转型过程颇为相似。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国读者即将读到的这部传记的背景,我生命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从许多方面看,这是中国读者同样熟悉的历史背景,是他们曾经的生活,也是他们未来的生活。

但是,我们不仅是在个人生活之外部环境的发展中,而且是在历史经验中找到了这种相似性。传记是一种极为个人化的文体。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但我还是非常肯定,我生命中的这些经历也是中国众多知识分子熟悉的经历,他们会从我的经验、我的处境以及我的选择中,看到他们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处境和自己的选择。

在我踏上艰难而又激动人心的思想探索之旅时,我还很年轻。此刻,在撰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已是84岁的高龄了,但我依然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从事研究,发表文章,出版专著,指导学生。中国有尊老的古老传统(在我的祖国匈牙利,也普遍遵守这一传统),因此对读者来说,花一点时间关注一个老人涵盖四分之三个世纪的经历,或许还是值得的。

我这一生都在历险。有段时期我身处危险之中,命悬一线,当然我也有和平与宁静的日子;有段时期我饱受迫害和威胁,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忧伤;有段时期

我又获得了人们的褒奖和认可；前段时间我还拥有天真的信仰和毫无来由的热情，之后又继以怀疑和失望。当然，在我不那么天真、思维更加缜密后，我又形成了新的信念。通过重新学习和不断积累，新的、更可靠的知识取代了不成熟的知识和错误的思想意识。

我的生命之舟一会儿荡漾在宁静的水面上，一会儿又跌宕在暴风骤雨中，好几次，船儿几乎就要搁浅，而海上风暴又起。比如说，自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成立那天起，我就在这家重要的国际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直到它关门的最后一天，整整工作了20年。后来，布达佩斯科维努斯大学为我提供了一份教职，使我得以继续我的研究和教学。再度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并非易事，但我愿意尝试。

由于我已经有了定向的指南针，所以尽管在暴风雨中趔趄而行，我仍然可以看清道路。

我不能说自那时以来，我的政治观点一成不变。读者从我的传记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从1953—1957年，我的政治信念经历了一次彻底的重大改变。但我仍然坚持我一贯的**基本价值观和道德原则**，这一基本价值观和道德原则，深植于时行的政治立场之下，并界定了我的思想范围。当我惊讶地认识到，我盲目信任的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已经无情地违背了我的基本道德原则的时候，我改变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过去我竭力持守并希望将来仍然坚持的是哪些基本价值观呢？

如果有可能进行排序的话，我要把**自由**的理念和对人权的保护放在首位。在我的第一部专著《经济管理的过度集中》中，我关注的是自主抉择的问题：为什么独断的中央政府要事无巨细地干预一切呢？为什么不给生产企业留下一点必要的独立性呢？如我提及的那样，在我撰写《短缺经济学》的时候，我把这当作狭隘的经济问题而未予考虑。短缺限制了个人抉择的可能性，它迫使人们永远不可能有主观能动性。自那时以来，我总在我的书中强调这样一个意愿：尽可能放宽个人抉择的范围吧。这样，人们就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在不同的产品和服务之间，在不同的学科和专业之间，在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雇主之间，在不同的朋友圈子、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信仰之间自由进行选择。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休戚与共**这个概念一直伴我前行。很多事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解释。我很幸运，我出生在一个家境小康的书香门第，不过，我非常同情那些生于社会底层、在艰苦环境中长大的人。虽然除了战争期间以外，我自己从未尝过饥饿的滋味，也从未手头拮据，但我至少认真考虑过饥饿和拮据对穷人

意味着什么。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我虽然对人们从困境中崛起需要做什么的看法有了改变，但我仍然认为，我有责任为此做点工作。

我一贯重视为祖国效力。在我这本传记的匈牙利文版面世的时候，当代伟大的匈牙利文学家彼得·纳达什说我是“匈牙利爱国者”。我认为这种说法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肯定。我是一名犹太后裔，我的父兄都在大迫害期间身亡，我的生命也遭遇了危险。许多有同样痛苦经历的人离开了祖国。再后来，移民潮一波接一波，1956 年革命失败之后，仅仅几个星期内就有 2.5%的匈牙利人离开了祖国。几十年后，当柏林墙出现了裂缝，尤其是这堵墙倒塌之后，很多人跑到富裕国家寻求更富足的生活。发达国家为穷国的才智之士提供的大好机会，触发了“人才外流”的大潮。我非常理解那些出国寻求发展的人，但我自己选择的是另外的道路。虽然我在国外生活了很长时间，在美国的一流学府哈佛大学执教 18 年，但这期间我无数次回到匈牙利。我一直保留着匈牙利公民的身份。居住地和法律关系固然非常重要，但个人的认同感至少同样重要。我是匈牙利人，在我为祖国而骄傲的时候，我从来不认为自己超然于一国国民之上。但我已经摆脱了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摆脱了对不同面貌和肤色的人的偏见。我强烈谴责有害的民族主义。我认为自己是一名“世界公民”，同时又是一名欧洲人、匈牙利人以及犹太人。这是我在生命的播迁中始终坚持的道德原则之一。

尽管经济学领域依然一成不变，但我的经济学思想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希望是朝着正确的方向演变）。自从对正统意识形态深感失望以来，我已经养成了一种健康的怀疑心态。我不会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任何人说出任何话，不管他多么位高权重，我总要问自己，他说的是真话吗？也许他说的是真话，但他说错了吗？如果我在理论上产生了哪怕一点点怀疑，我都会用实践来对照理论，用日常经验而不仅仅是用统计数据来对照理论（这种对照其实也很重要）。这是防范教条式思维的一种最重要的方法。

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我的生活环境和对日常问题的看法已经以一种显著的方式改变了多次，但是——我希望别人也同样看到——我的行为方式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我一直努力坚持我为自己设定的行为规则。最重要的一个律令就是：一个人的言论和文字必须求真。人不能说谎。如果出于什么原因，我无法说出全部事实，那么，虽然我说的是真话，但因为还有部分事实没有说出来，我依然会为此而感到苦恼。读者将会在我的传记中看到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中国和匈牙利惨痛的历史经验曾经亵渎了“自我批评”这一概念。在我们这

两个国度，人们会迫于侮辱甚至严酷的身体暴力而违心地进行自我谴责。但不论自我批评怎样被败坏了声誉，我们还是需要进行自我反省。这不是出于外部的影响，而是出于良心或冷静思考的命令，这样的反省我进行了多次。我努力审视我早年生活中的行为以及指导我行为的思想意识。如果我认为有必要，我就会与这些行为和思想意识决裂。这时候，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人们自怜或谨小慎微，这样就有可能保留过去的许多错误观点。如果你照镜子时不把昏暗的灯光拨亮，就只能看到镜中模糊的面影。就像一首美国歌曲唱的那样，当美国青年开始从恶习的噩梦中觉醒，开始摆脱误导人的传统，那么，“让阳光照进来”。

我要感谢所有帮助我、使本书得以摆在中国读者面前的人。我要感谢出版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的上海人民出版社，我还要感谢安佳教授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所做的努力。我非常激动地期待着来自中国的思想回应。

2011 年 10 月 21 日于布达佩斯

目 录

1 出版说明

1 《思想的力量》序

1 中文版序言

1 前言

1 1. 我的家庭和青年时代：1928—1944 年

1 我的父亲

4 我的家庭

8 德意志帝国学校

9 求知之路

12 1944 年：父亲的命运

14 1944 年：我的逃亡

23 2. 我如何成为共产党员：1945—1947 年

23 入党的各个阶段

25 对 1944 年创伤的反应

29 思想转变和对共产党政治思想的接受

34 魅力超凡的人物

36 对组织的归属感

37 机遇和我的个人能力

41 3. 在党报工作：1947—1955 年
41 一帆风顺
44 各种激励
47 报社的生活
49 对经济问题的理解
53 思想的空洞
54 道德清算

57 4. 觉醒：1953—1955 年
57 “新方针”
59 与昔日囚犯的一次会面
61 澄清思路的讨论和阅读
63 我的第一次“犯上”
64 对伊姆雷·纳吉著作的评论
66 《自由人民报》的反叛
67 《自由人民报》时期的结束

73 5. 研究生涯的开端：1955—1956 年 10 月 23 日
《过度集中》
73 背景
75 思想的砥砺
80 开始研究工作
84 博士论文的主要观点
90 对博士论文的初步认可
92 政治背景

99 6. 革命及其后：1956 年 10 月 23 日—1959 年
99 伊姆雷·纳吉的新政府计划
103 《匈牙利自由报》——一份新报纸
106 动乱的日子，动乱的岁月
107 《过度集中》的后续影响

110　被经济研究所开除
114　尚未被捕，但面临被捕威胁
120　友谊和团结

125　7. **我的大学：1957—1959 年**
125　自学
127　兰格—哈耶克论战
129　继续从事轻工业研究
130　划清界限
132　一条死胡同
134　人生抉择

137　8. **数学方法的经济学应用：1957—1968 年**
《两级计划》
137　结识陶马什·利普塔克
139　利润分成制的数理研究
142　纺织行业的规划
144　两级计划
146　中央计划的理想模型
149　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些首要原则
152　计算
154　这样做值得吗？
159　与数学家的合作

161　9. **西方之行：1963 年后**
161　出国之前的事情
162　英国剑桥
164　在伦敦经济学院
166　间谍和线人对我的相同看法
172　对我海外访学和海外作品的看法
175　一次失策的“诽谤”

181 10. 反主流经济学思想：1967—1970 年
《反均衡论》
181 《反均衡论》的出版过程
183 促使我撰写《反均衡论》的原因
185 某些引人深思的相似性
186 一般理论的作用范围
189 理性决策者
192 非价格信号
192 均衡与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
194 一般均衡理论的政治解释
195 科学的改革还是科学的革命
196 对《反均衡论》最初的认可及长期影响
199 《反均衡论》值得写吗？
201 一些主观评价

203 11. 研究所、大学和科学院：1967 年后
203 经济所掌门人
204 若无其事
206 信任与宽容
210 夭折的经济所改革
213 羁绊下的教学
215 我怎样成为院士
218 院士的特权

221 12. 探索与准备：1971—1976 年
《突进增长与和谐增长》
《非价格管制》
221 经济增长：强制增长还是和谐增长
223 剑桥大学的邀请
224 腰部以上打了石膏——凯恩斯和赫希曼
226 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

228　继续在斯坦福大学和华盛顿大学访学
231　自主管制
235　勉力运行的适应性机制
237　建造新居
238　印度毛泽东主义者眼中的市场导向改革

241　13. 思想的成型：1971—1980 年
《短缺经济学》
241　启发灵感的环境
244　《短缺经济学》的主旨
246　自我审查
248　出版社的审稿人
250　第一印象
251　与“非均衡”学派的争论
253　与正统的苏联经济学家的争论
254　有助于削弱体制
257　再谈出版的政治和伦理困境

261　14. 一个突破：1979 年后
《软预算约束》
261　概念的涵义和重要性
263　背景
267　实证检验
267　对软预算约束现象建立数学模型
269　第一篇总论性文章背后的故事
271　几点教训

279　15. 温和而客观的批评：1968—1989 年
《匈牙利改革过程：愿景、希望和现实》
279　或明或暗的希望
281　从幼稚的改革者到严谨的分析家

285 “不要指手画脚发指示……”
288 效率与社会主义道德
290 产权的重要性
292 兰格模式和匈牙利改革现实
293 题外话:匈牙利的另一种现实
295 用今天的眼光回顾过去

299 16. **哈佛大学:1984—2002 年**
299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302 哈佛大学如何聘任教授
307 迁居坎布里奇
310 教学的快乐和烦恼
312 多元化与宽容
314 道德操守

317 17. **在匈牙利和世界各地的家:1985 年后**
317 是什么让我心系匈牙利
320 坎布里奇和布达佩斯的生活比较
323 世界文化的中心
324 朋友们
328 悠游于欧洲和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中间
330 中国之行
333 客居如家

337 18. **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综合研究:1988—1993 年**
《社会主义体制》
337 撰写该书之种种
340 进行综合的意图
343 实证分析和价值
344 一般性模型
346 太早还是太晚?

348　东西方的认可
349　左派和右派的异议
350　一件奇怪的事情

353　19．转折点：1989—1992 年
《通向自由经济之路》
353　预言的局限
355　哈佛商学院校园和布达佩斯盖勒特山上的解决方案
357　《通向自由经济之路》的写作
359　最初的反应
361　模仿时代的结束
363　为了私有部门的健康发展
366　公共资金的责任
368　维稳手术
370　论平衡

375　20．在科学与政治之间：1990 年后
《公路与小路》
《奋斗与希望》
《转轨过程的福利、选择和一致性》
376　对匈牙利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
380　医疗体制改革
383　他们征询你的意见吗？他们留意你的意见吗？
388　实际效果
390　制定货币政策
392　对其他国家经济转型的评论

395　21．继续向前：1990 年后
《制度转变的是与非》
《诚实与信任》
395　对制度变革的解释

397 希望与失望，乐观与悲观
403 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
405 一段美好的时光：我的 70 岁生日
407 哈佛大学：教学与告别
411 返乡
413 “您现在做什么？”

415 **缩略语**
417 **年表**
423 **术语表**
433 **参考文献**
451 **索引**

献给我的母亲——蒙约

前 言

即使在我完成这部传记的绝大部分之后，我仍然不能确定我撰写这本传记的理由是什么。是什么促使我回顾过去？我又想把这些事情说给谁听？

我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也很少提及自己的生活。在匈牙利从一党制向民主制转型那段激动人心的日子里，一位杂志记者非要采访我，他说："以后不会有人对这些事情有兴趣的。"所以，我最终接受了这次长时间的传记式采访。这已经是15年前的事情了，我希望我现在完成这本传记还不至于太晚。

多年来，我妻子总是敦促我写写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但我总是一拖再拖。直到2003年年中，我才开始着手这项工作。随后的两年中，这本传记占据了我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并影响了我的其他研究计划。

我妻子的执著是我撰写这本传记的动力。如果有人问我，这本传记为谁而作，想满足谁的心愿，获得谁的认可，这个人肯定就是茹饶(Zsuzsa)。

我希望我的传记也会让其他人感兴趣，比如我的儿孙们和其他家庭成员，我过去和现在的同事、学生以及读过我的专著和文章的读者们，这些人可不在少数。那些和我有过私交的人，或者以前读过我的文章的人，实际上已经对我有了一定的了解。我希望你们能把对我的认识与我在传记中描绘的形象结合起来。你们还可以拿评论我作品的几百篇书评文章与我在传记中的自我评价做个比较。在这本传记中，我谈到了我在撰写每部作品时的看法，以及现在我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我很少公开回应对我文章的诸多评论，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与跟我观点不同的人士不期而遇，我才会跟他们进行一番舌战。在我这本传记中，我想按照年代顺序，对我自己的工作进行全面的"评论"。

虽然我的这本传记大致按照年代顺序发展，但本书绝不是一本日记。本书

的每一章节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比如某个事件、某部著作，或者我曾经居住过的某个地方。因此，每章的标题都标注了涵盖的时间段。根据主题的需要，章节与章节的时间顺序连成一体，但可能也有重叠。

有些读者或许没有读过我的早期作品，可能只是对我生活过的时代感兴趣。本书并不负有历史学家的任务，所以不会客观而全面地描述和解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实际上，对那些想对匈牙利或其他前共产党国家的社会主义时期和后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研究的人来说，相关文献已经汗牛充栋。我个人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参与者，并非重要人物。我所谈的都是我亲身参与并影响我生活的社会和历史事件。

对那些对东欧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我的这本传记或许可以作为辅助材料，为他们研究东欧、研究共产主义制度、研究东欧知识分子当时的两难处境提供一些细节。很多亲身经历了那个时期的人，也撰写了各种报告、日记和自传，这些材料也是日后的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希望我的传记也能有助于这类研究，成为这种资料。事实上，我还希望我的早期学术著作也能成为这段历史时期的证明，我已经尽可能保持了这些作品的客观性。这本传记也大大丰富了我的学术著作的内容。现在，我努力将一些因为涉及私人生活太多，或因为某些原因不能让我详尽阐述自己的观点，因而没能在《短缺经济学》(*Economics of Shortage*)和《社会主义体制》(*The Socialist System*)中得到充分阐述的材料，搜罗在本传记中。本传记的体裁也允许我就若干伦理、政治和科学问题，阐明我自己的观点。当年因为学术著作的主题受到严格限制，不可能把我的一些观点和个人看法塞进文章中。

我花了很多时间考虑这本传记的书名。最初，因为我自己打算理解自己，所以我倾向给传记命名为《理解……》(*Understanding ...*)。我非常想在这本传记中解释一下我在何时因何产生了什么思想，什么因素对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影响，以及后来我的思想发生的变化。我也非常愿意理解那些与我的思想一致或不一致的人的想法，我也愿意理解那些支持我或者对我不屑一顾的人的想法。

“理解”意味着道德认同或至少是道德默认，这不是我心中想要的那种理解。与我之前撰写学术论文一样，我决没有要在这本传记中为自己开脱的意思，也不想评价他人的观点。我只希望对我所经历的事情做些理解。有时候，我们很难发现隐藏在事件背后的动机和争论中的漏洞，很难发现激励人们的内在力量以及各种冲突中公开或隐蔽的原因。评点自己的过去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分析他

人的过去显然更为困难。

最终，我选择了别样的书名：《思想的力量》（*By Force of Thought*）。我觉得，这几个字极为有效地概括了这本传记的主题。我毕生为思想而奋斗，从不追求权力与富贵。某些时候，我也能对某些事件的过程产生一些影响，但这绝不是因为我高高在上向他人发号施令的结果，也不是我出大钱买通他人与我合作的结果。如果我曾经对任何人或任何事件产生过影响，那也是在我的谈话或写作中表达出来的思想的结果。

一位读者在读过本书手稿后谈了他的意见："你太天真了，居然相信辩论、信念或者思想具有影响力。历史事件的真正推动力是利益。"作为一名具有专业素养的社会变革的观察者和分析家，我不会沉溺于幻想，我会针对所观察的结果，尝试探讨各种形成原因，并根据事件的意义对其进行分析。但是，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人才是实施行为的人，这些人有能力在不同选择之间做出抉择。能够对这些人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价值、原则和观念肯定属于最为重要的因素。此外，千千万万无钱无势的普通百姓的思想和信念，也会对事件的过程产生确定无疑的影响。如果我不相信思想具有力量，那我整个一生的工作就没有任何意义。

当然，思想的力量也有其局限性。实际上，这也是这本传记的题中之义：我的思想在何时因何出现了波折，从而引发我对思想的重新思考？他人的思想如何对我产生了影响？我的思路、分析和建议是如何与他人的思路、分析和建议发生碰撞的？思想要持续经受强度测试。无论这种测试能否使我的思想过关，我在每一章都会阐述这个问题。

在本书的副标题中，我称这本传记"irregular"（非常规），使用这个词是因为这本传记在两个方面与大多数传记不同。首先，我在阐述生活事件时，常常会停下来，表达一下我对其中具体情况的看法。我的这种做法不重在讲故事，而是要分析具体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环境。我所做的评论，与社会学、政治哲学、伦理学、研究与创造的过程以及科学社会学或其他各门学科都有关联，因此可以视为独立的微型短论。由于这本传记穿插了一系列本质上与传记关联不多的这类微型短论，所以才称为"非常规自传"。

其次，多数传记都要表现传主的私人生活。尽管我在本书中也叙述了一些私人的和个人的东西，但本书基本上是一部思想自传。从宽泛的意义来理解，这一术语就可以将我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以及与我的职业活动和公共服务相

关联的友谊及其他人际关系，统统包括在内。

在本传记中，我也数次提及我的家人和家事，但这个给我带来无尽快乐和烦恼的私人生活并没有占据很多篇幅，传记中的描述也远远没有现实生活中那么精彩。不过，本书附带的照片或许能够将这个没能用文字表现的私人生活展现一二。我之所以称本传记为“非常规”，从严格意义来说，也是因为我很少提及我的私人生活。

现在请允许我稍为谈一下本传记的体裁和风格。在过去 50 年中，我撰写的都是分析性文章，分析性文章需要清晰易懂地将自己所理解的内容充分阐述出来。我不太可能突然就成了文人。所以，读者不要期望我能精彩地描绘各种场景，记录谈话；也不要指望我能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朋友的风貌，或者妙笔生辉地让某些紧张场合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文学作家都会留下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和未经分析的想法。但科学研究者不能这么干。虽然我在撰写传记，但我仍然是一名学者，所以我力图避免在风格和结构以及表达方式上出现歧义。

过去我写书，通常都清楚地知道我在对谁说话，很大程度上这个受众群体决定了我需要阐释什么以及我认定读者已经了解什么。这次撰写这本自传，情况有所不同。我确信这本传记的读者包括经济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以及生活在东方和西方的人们，其中有上了年纪的，也有年轻人；有匈牙利人，也有外国人。我会尽我所能，让所有的人很轻松地就能明白我在书中讲述的内容。撰写这本传记时，有好几个地方都让我左右为难。我是否应该最大程度地保证内容的准确性？如果应该，就需要给出详细的定义和限制条件，并且对理论的原初假设条件进行充分阐述。这种写作方法会给那些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带来阅读困难。那么，我是否应该选择一种有过分简化之风险的简单表达方式呢？由于我不是在撰写学术论文，所以我宁可冒后者之风险。对于那些没有阅读过我的学术著作的读者来说，这本传记能让他们对我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有一些了解。对于那些读过我的学术著作的读者来说，这本传记也可能唤起他们的记忆。在这里，我预先向那些嫌我在书中某些地方过于啰嗦的读者表示歉意。

毫无疑问，我自己的回忆是这本传记最为重要的资料来源。但是，我并没有将写作过程当成记忆的检验：我在写作中并不只是依赖自己的思考和感觉，我还尽可能仔细地核对了其他出版物中记载的相关事实。

我手上掌握有很多材料。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我对我的著作尤其是我认

为最重要的著作都进行了回顾。* 正常情况下，这些作品一旦公开出版，我就不会再读了。但是现在，我不得不一本接一本地重新阅读，而且还得阅读当时和之后对这些著作的诸多评论。

我从来不写日记，但因为我本来就是一名研究人员，所以我保留了很多笔记，并建立了各种档案。档案的每个编目下都有数百份文件，很容易查阅。此外，别人给我的信以及我写给别人信件的复印件，大部分我都保留了下来。在我撰写这本传记的过程中，我一直埋首于如此丰富的资料中。

各类公共档案馆的研究资料，也补充了我已有的资料，我和我的同事在那里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信息。研究匈牙利前秘密机关的文件让我们非常激动。近来，匈牙利政府的法律允许公民查找与自己相关的各种资料。读到告密者的报告，看到警察为政治审判所作的调查记录以及国家安全情报机关官员的笔记，我不仅感到压抑，而且惊骇不已。在这本传记中，我引用了很多政治警察和秘密机关调查我的材料。

我觉得我应该先向读者说明，这本传记的撰写不仅仅是基于作者的记忆，而且还基于对其他文件的研究。说明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不想让更多的读者失望。本传记并不是枯燥地记录档案研究的结果，而是重在对个人回忆的记述。书中记述的是作者漫长而大胆的思想探索旅程，其中穿插着或明朗或阴郁的插曲，让人兴致勃勃或者心生痛苦的经历。我希望读者读完本书后，能对我的生活和研究以及我生活的那个年代，有更深刻的理解。

2005 年 4 月，奥西里斯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传记的匈牙利文版，现在这个版本是根据匈牙利文版译成英文的，并做了少量修改。

我对这本传记首次付梓后发现的一些小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作了修正，对一些读者指出的某些意义含混的段落，也在措辞上做了调整。我还在英文版中增加了一个索引和年表，希望能为非匈牙利语的读者提供一点方便。

从匈牙利文手稿的完成到英文版的定稿，中间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当然，生活并没有止步，不过，除了一些特殊事情外，这段时间中发生的事件基本上没有包括在这本英文版中。

---

* 从目录上你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我选择的这些著作。如果我要在某一章中就我的一两部著作进行详细的讨论，我会在章节的副标题中列出著作的题目。

为方便读者阅读，我觉得还有必要给读者提出一些实用的忠告。这本传记后面所附的参考文献，仅限于本传记中提到的书目，因此不能视为涵盖所讨论领域的完整而全面的文献。对于有多个版本的著作，我尽我所知列出了最新版本，并且在括号中注明了初版的年份。

这本传记采用了两种注释方式：脚注和尾注。采用这种与众不同的方法主要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的这本传记既不是小说，也不是学术著作，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类型，采用这种方法比较合适。

鉴于这本传记的体裁和风格，脚注中包含的信息其实可以插进正文中，之所以放在脚注中，是因为这些内容多少有些偏离了正文的主线。但放在脚注中的这些题外话也包括一些例证、数据和小故事，有时候是逸事或笑话。我期望读者在阅读正文的时候，也要读一下脚注。

尾注主要包括研究者所谓供评论研究的资料。正如我在前面解释过的那样，这本传记使用的材料非常之多。如果某一信息来源使用的是档案材料，我会在尾注中按学术惯例给出引文。本书还频繁引用了已经出版的著作，如果我只是在正文中简单提及这些文献，读者可以在参考文献中找到完整的书目资料。不过，如果正文中只是间接提及某种文献，或者如果直接引用了原文，我会用尾注对此进行说明。*

我觉得大多数读者都不愿意严格查证各种信息的来源，所以我把这些信息来源放在尾注中，方便读者查证。但即使读者不去查阅尾注，也不耽误对本书重点的把握。不过对那些希望跟踪研究某个问题的读者来说（包括那些正在从事书中相关课题研究的人），可以在尾注中找到必要的信息。

致谢

我要感谢在我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所有人。我的全职助理卡特琳·绍博尽心尽力地承担了与本书相关的资料组织和文件整理工作，并非常认真地负责随之而来的各种版本的出版工作。此外，我还很幸运地得到了四位年轻研究助理高效而且耐心的帮助，他们是：历史学家雅诺什·莫尔纳、经济学家加博尔·伊万、诺埃米·彼得和拉斯洛·托特。他们尽职尽责地帮助我收集资料、整理

* 因为不能对注释本身再做注，所以脚注的参考文献就直接标注在脚注中了。

文件、确认资料来源、核实信息、编撰术语表和索引以及对手稿进行校对。

我还要对所有参与本书出版准备工作的人员所给予的帮助表达我的谢意，他们就全部或部分手稿提出了意见，为我收集档案资料，查询相关书籍和文章，澄清了一些专业问题，并以各种方式为我提供了支持。在这里，还请允许我列出给予我特殊帮助的人的姓名：弗朗西斯·巴托尔、陶马什·鲍尔、卡陶·琼科夫斯基、卡伦·埃格尔斯顿、海蒂·埃尔德什、伊曹·福泽考什、卢卡·加博尔、杰里·格林、雅诺什·科瓦奇、马顿·考林蒂、彼得·肯德、雅诺什·凯奈迪、埃尼科·克尔涅伊、埃娃·Sz. 科瓦奇、玛丽亚·科瓦奇、兹德涅克·库德尔纳、米哈伊·洛基、赫尔加·莱纳特-程、帕尔·勒切伊、洛纳·卢卡奇、拉斯洛·毛伊泰尼、彼得·米哈伊、安德洛什·纳吉、朱迪特·内杰希、加博尔·帕伊科西、朱丽安娜·帕尔蒂、理查德·匡特、M. 雅诺什·赖纳、山多尔·雷韦斯、帕尔·雷兹、热拉尔·罗兰、亨利·罗索夫斯基、埃娃·绍尔尼奥伊、阿格尼斯·舍恩纳、安德洛什·希蒙诺维奇、罗伯特·M. 索洛、苏珊·苏雷曼、雅诺什·塞格、迈赫达德·瓦哈比、拉斯洛·沃尔高和索菲亚·韦布尔。我还要感谢那些我在这里没有提及姓名，但是为我解答疑惑、澄清资料的人。

匈牙利国家科学研究基金(OTKA T 046976)为我的研究提供了资助，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协助我管理这笔资金。与过去 15 年一样，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一直为我提供工作场所，在我撰写本书的过程中，该所为我提供了激发灵感的环境和实际帮助。

布赖恩·麦克莱恩承担了本书的翻译工作。我非常感谢他对工作的耐心和专注，与之前的合作一样，他非常乐意地投入译文的反复修订工作。

我还要向杰弗里·E. 爱泼斯坦表达诚挚的谢意，是他的慷慨捐款，提供了英文版的翻译费用和其他研究所需费用。

我还要感谢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承担了本传记的出版工作。感谢组稿编辑伊丽莎白·默里对我的鼓励，感谢她满足了我的各种要求；感谢制作编辑马修·阿巴特给予我的灵活且有效的支持。幸运的是，本传记由艾丽丝·福尔克担任文字编辑，因为在她身上体现了精益求精、准确和共鸣等最佳编辑素养。

2006 年 5 月于布达佩斯

1. 我的家庭和青年时代：1928—1944 年

我不是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也不是彼得·艾什泰哈奇(Péter Esterházy)，所以我不会像他们那样用优美的文字向读者描述我的童年或我的家庭环境。我与其他人一样，至今仍然记得家中蛋糕的香味，记得父母的音容笑貌，但我没有文学天赋，可以将这些记忆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那么，我仍然采用我自己熟悉的体裁来描述和分析我的世界，我还打算给自己增加一个任务，即在 77 岁的今天试着对自己进行理解和剖析。我怎样以及为何成为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因此，谈论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以及我的家庭，我将主要谈谈那些有助于我完成上述双重任务，即与理解自己以及自己所处时代相关的内容。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帕尔·科恩豪泽博士(Dr. Pál Kornhauser)，生于 1880 年。我出生之后一直跟父亲姓，1945 年我自作主张，改姓科尔奈。

我的祖父名叫卡罗伊·科恩豪泽(Károly Kornhauser)，是个锁匠。我们全家居住在特伦钦(Trencsén)，那里曾经是匈牙利的领土，但现在属于斯洛伐克。我父亲过去引以为荣的特伦钦桥，部分就是在我祖父的工场里打造的。我后来与别人谈及这些事情时，很多人都非常惊讶，他们惊讶一个居住在 19 世纪省城里的犹太人，会以锁匠生意为业，而不是开间小酒馆或者小商铺。

我父亲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去世了。是他哥哥资助他上了学，但他基本上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天主教会创办的皮亚斯特教会学校完成了中

学学业，然后进入大学学习法律，并成为了一名律师。在我通过刻苦奋斗走向成功的过程中，我确实受到了我父亲的影响。与居住于高地的许多人一样，我父亲也以三种语言为母语，即匈牙利语、德语和斯洛伐克语。父亲一定是个天才，而且非常勤奋，因为他年纪轻轻就有了一个辉煌的职业生涯。父亲的德语知识和对法律的兴趣，使很多在匈牙利经营的德国公司都倾向于让他打理自己的法律事务。德国公司请他担任法律顾问的次数越来越多，最后，他终于正式成为德国驻布达佩斯使馆的法律顾问。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荣誉头衔，因为他并不是由德国正式雇用的雇员，这个头衔只是意味着，使馆会把他推荐给在匈牙利发生了合同或民事纠纷的德国公司。父亲从不接手任何离婚案、刑事案以及与匈牙利公司法有关的案子，他专门处理驻匈牙利的德国公司的商业纠纷。

我家的公寓和我父亲的办公室都位于布达佩斯的科学院街上。这条街在布达佩斯很有名，街的这头是匈牙利科学院总部，街的那头是议会所在地。这幢公寓房子现在已经成了首相办公室。不久前我到过那里，在我进入我父亲过去的书房时，看见我的一位经济学家朋友正在那里工作，当时的那种感觉非常奇怪。我父亲的办公室里满是匈牙利文和德文的法律书籍。父母亲从不收集其他书籍。我姐姐是把文学书籍带进这个家的第一人，我是第二个。我无法像其他知识分子的孩子那样，对外宣称自己最初爱上和关注文学是因为父母的缘故。

我母亲和姐姐告诉我，父亲年轻时读过很多书，还经常去听歌剧，他最喜欢的音乐家是瓦格纳(Wagner)。但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一点都看不出他有这些爱好。父亲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事业上。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谈德国使馆的事情。父亲去世很多年后，我母亲提起，我父亲是在米克洛什·卡尔多(Dr. Miklós Káldor)之后被任命为使馆法律顾问的。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耳熟，后来我发现，英国财政大臣尼古拉·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爵士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就是这位匈牙利律师的儿子。有一次，我到剑桥大学卡尔多家中做客，谈话中我们谈到了彼此的父亲。这个话题让卡尔多重新想起了过去的家族怨恨和妒忌，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位古稀老人了。五十多年前，卡尔多家族的成员一定不止一次地诅咒过年轻的科恩豪泽，因为他接替了卡尔多的职位。

我哥哥班迪(Bandi)和我姐姐莉莉(Lilly)幼年时，都得到了父亲的关爱。莉莉常常回忆起她和父亲一起散步、一起玩游戏、一起谈话的情景，那些回忆让她感动不已。哥哥托米(Tomi)和我出生后，父亲已经没有精力或耐心陪伴自己的孩子了。我甚至一点都想不起来有没有和父亲亲密地在一起待上过一小时，或

者有过一次有意义的谈话。我在回忆中不止一次想到这样的事实，即事实上我没有导师，这也是我在这本传记中第一次审视自己后得出的结论。我与所有的男孩和年轻人一样，在许多方面都将自己的父亲视为楷模，现在我仍然这样看。但从知识意义上，父亲不是我的老师或导师。虽然父亲聪明睿智，知识渊博，但他从来没有与我交流过他的看法、知识或者经验。

1928 年 1 月 21 日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 47 岁了。年岁渐长确实是父亲对我和我哥哥不太关注的一个原因。但使他态度发生转变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他的职业和政治环境的改变。希特勒(Hitler)掌权时，我还不到五岁。希特勒上台虽然使许多领域发生了突变，但德国使馆与匈牙利地方之间的联系变化并不太大。几年后，纳粹政权已经慢慢演变为极权统治，并渗透进了社会体系中的每个细胞。我并不清楚我父亲在什么时候失去了使用“德国使馆法律顾问”这一名衔的权利。一开始，这一变化带来的唯一后果是，使馆不再为父亲推荐德国公司的业务了，那些与他存在业务往来的德国公司，虽然并没有马上断绝与他的业务，但也渐渐离他而去。不过，也有一些在匈牙利的德国商人，依然忠诚地与父亲保持联系，直到他逝世。

客户数量不断减少，因此家庭收入也不断下降。虽然我父亲从来没有跟我们谈及金钱的事情，但后来我坚信，我们一直是依靠父亲的积蓄生活，而不是依靠他的日常收入。我们这些年幼的孩子，当然不会对这些财务问题有什么感觉。我们依然幸福地生活在城市中心宽敞而昂贵的公寓里，每逢盛夏，就到布达佩斯山谷中的布达市玫瑰山区的舒适别墅度假。我们小时候，家里请了一位德国管家，还有一名园丁和几名仆人。父亲为了弥补在法律事务方面的收入损失，兑现了部分人寿保单，还变卖了家里的珠宝和艺术品。*

---

* 不久前，我得到了父亲的笔记，其中有一份详细的人寿保险清单。显然，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为我母亲准备生活费用。不过，虽然他每次都很谨慎，但他的计划都终成泡影。由于“一战”后严重的通货膨胀，父亲在战前购买的保险基本上一钱不值。以此为教训，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我父亲又在一家德国保险公司购买了新的高额保险，这家保险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保单的保额随通货膨胀浮动，并且与“金美元的价值”挂钩。这一次，他认为他的保险有了百分之百的安全保障。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20 世纪 40 年代，匈牙利的共产党政权对这家拥有匈牙利专营权的柏林公司实施了国有化。让人好笑的是，政权将每一金美元的价值定为 1 弗林，这样根据保值原则，母亲岂不是只能拿到一小笔年金吗？从这份记录中我很震惊地看到历史对我父亲的谨慎和爱心的打击。

父亲非常仔细地为他的遗产继承人安排保险的使用方式。我觉得我自己也有这种谨小慎微的特性：正常情况下，我也使用同样谨小慎微的方式将我的看法灌输给我的同事和家人。有的人会乐于接受我的指示，有的人则一笑置之，还有些人会感到不耐烦，甚至拒绝我的说法。我与父亲的这种相似从何而来？我从小就表现出这种习惯(我一点也记不起来)并且承续了这种行为方式？或者说，这种行为方式是遗传基因的一部分？

父亲发现自己被慢慢排挤出了他的专业领域，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他仍然充满智能，富有专业经验，所以律师这个职业对他非常重要。更为严重的是历史趋势正毁灭性地改变他的职业地位和经济状况所引发的焦虑和不安。当时，希特勒政权已经日渐显现出残酷无情的一面。我们也不断听到有犹太人受迫害的消息。在德国占领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且吞并了奥地利之后（我的一位叔叔就住在维也纳），匈牙利通过了第一部反犹太人法，战争也随之爆发。

父亲一直恪守一个原则，他不参加任何政党，也不参加任何政治运动。1919年，匈牙利公社——这个昙花一现的共产党政权给他留下了可怕的记忆。然而，我父亲并不是当时的所谓保守派，我也从来没有听他直接批评过左翼人士。他订阅了一份自由派的晨报，他购买的其他所有报纸也都是自由派报纸。从他零零星星的谈话中，我判断他的思想比较开放自由（在欧洲人对该词所理解的意义上）。然而，尽管他希望远离政治，但历史开始介入他的家庭生活：起初还只是远远的隐隐雷声，但后来却成了直接的电闪雷劈。

我父亲从不否认自己的犹太血统，同样，他也没有炫耀过这种身份。在他的社交圈子中，确实有一些犹太人，但也有很多非犹太人朋友。他虽然信奉上帝，但不是很虔诚，他也不参加任何犹太人的集会或是犹太宗教仪式。但他的慈善捐款，都是捐给犹太教会开办的孤儿院。或许，他还记得自己曾经是个孤儿。他没有打算为自己皈依基督教盖上一个同化的印记。

我父亲以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傲。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陆军上尉，还赢得过高级勋章。他毫不犹豫地称自己是匈牙利人。哥哥班迪服完兵役，并以下士军衔退伍后，父亲给他们两人各订了一套新军服。他们穿着这身军装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父亲身着上尉军装，儿子身着下士军装，目光坚定地直视前方。大概一两年后，匈牙利宪兵将父亲押上了开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火车，我哥哥则身着便装，在匈牙利军队控制下在顿河湾（Don Bend）服劳役，最终因为饥寒交迫冻病而亡。

我的家庭

父亲对我们很慷慨，即使在我们的家庭收入不断减少的艰难时期也是这样。我在十多岁时狂热地迷上了摄影，他立即为我买回了当时所能买到的最好的照

相机。我需要冲洗胶卷和放大底片的设备，他也同样马上给我买了回来。后来我爱上了读书，他又不断给我钱买书。不过，家庭中心人物和温暖的源泉，却不是父亲，而是我的母亲蒙约（Munyó），我们都这么称呼她（她的婚前姓氏是阿兰卡·莎茨）。

我小的时候，家里请过一些亲切和蔼的家庭女教师来照顾我们。在我的记忆中，她们对我们都很怜爱，但让我最迷恋的是最后一任家庭教师，窈窕美丽的莉斯尔（Liesl）。尽管照顾我们的日常工作都由德国家庭女教师担当，但母亲仍然无处不表现出她对我们的爱。母亲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天生聪慧。她有着精致的脸庞和优美的身材，举手投足都带有一种浑然天成的自然和优雅气质。我记得弗洛伊德好像说过，成年人的自信和志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年幼时从母亲那里得到的爱。我就从我母亲那里得到了很多爱。母亲常常念叨，在她的四个孩子中，我是她怀孕过程中让她最遭罪的一个。她怀孕期间，不断受到疼痛和恶心的折磨，医生一再向她保证："亲爱的女士，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会给你带来最多的欢乐。"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不断给我讲这个故事。她从来不否认我是四个孩子中她最疼爱的一个。只要我取得哪怕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成功，她都会无比欣喜地给我褒奖和鼓励。我清楚地记得她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也从不检查我的家庭作业。在我上小学时，每当我因为挫折而抱怨，或者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她都是给我鼓励，而且从来不给我提出具体建议。母亲总是说："你一定能做好的。我不会担心，我相信你能处理好这件事情。"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母亲的鼓励和无条件的信任更有力地激励人们前进的动力。

我们家从来没有体罚。大我 3 岁的哥哥托米十几岁时，有一次与我们家的年轻女佣打斗。他的行为显然不属于现在所谓的性骚扰，但是却超出了我父母所能接受的范围。那天夜里，父亲来到我们房间，对着床帮踢了一脚，他没有踢托米。这一脚和寥寥数语的责备已经充分表达了他心中的愤怒。这是我在整个孩童时期见过的最严厉的"惩罚"了。1944 年，当我亲身面对人类的残酷时，我才真正体验到蓄意对人体制造的痛苦，并亲耳听到人们愤怒的叫声以及某些人侮辱他人时不堪入耳的言语。大嗓门或者喊叫就够让人厌恶的了，更不用说侮辱他人身体、打骂或者折磨他人的行径，这一切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了。

我大哥班迪生于 1914 年，一开始，他的生活一直都很舒畅而且安定。在他

大学快毕业时，他的一个朋友准备移民去英国。班迪想和他一同移民去英国，但父亲不同意。我不知道父亲反对的确切理由是什么，但后来听我姐姐说，父亲认为我们是匈牙利人，匈牙利人就该生活在匈牙利。很显然，他还认为长子应该和家人生活在一起。我哥哥不是那种具有叛逆性的孩子，因此遂了父亲的愿望。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他在俄国前线终结了自己短暂的生命。我和他年龄相差很大，交往不多，但在我的记忆里，他对我很好，而且非常幽默。每当我想到他年纪轻轻就客死异国他乡时，心里总像针扎一样痛。

姐姐莉莉长我 9 岁，生于 1919 年，我与姐姐感情深厚，我们之间的思想交流也比较多。我们在一起诵读诗篇。姐姐还指导我阅读了 20 世纪匈牙利最受人喜爱的作家弗里吉斯·考林蒂(Frigyes Karinthy)的小说，考林蒂主要以讽刺性作品而闻名。姐姐还是第一个为我演奏德彪西(Debussy)和舒曼(Schumann)钢琴曲的人。像我这样一个骨瘦如柴且性格内向的孩子，有这样一位美丽聪明的姐姐，而且这位姐姐真心喜爱我，无论到哪里都带着我，还常常跟我讨论人生的重大问题，这使我拥有了极大的自信。在我姐姐生前，我们一直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基于我们之间的亲情，而且也基于我们共同拥有的思想价值。虽然莉莉后来长期卧床，饱受病痛折磨，但我们仍然经常热烈地讨论政治问题，或者讨论我们都读过的文学作品。*

我的另一位哥哥托米出生于 1925 年，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与我和姐姐的关系截然不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在同一所学校读书，由同一位家庭女教师照料。我们常常在一起玩耍，而且，我们和所有的兄弟一样，有时候也会打架，这些打架当然有些是玩闹，有些则是动真格的。自从托米对女孩子产生兴趣后，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就中断了。我们再也没有一同外出过，也不再拥有共同的朋友，甚至都没有了认真的谈话。我们长大成人后，这种兄弟关系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我们见面时，只限于开开玩笑，或者聊聊闲天。我认为这种情况证明了，尽管大脑细胞里的遗传物质相同，家庭和教育背景也完全相同，但还是无法将兄弟俩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我和托米对事情的不同看法以及各自不同的处世方式，不仅对我们的兄弟关系有很大影响，而且也使我们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性格，走上

---

* 莉莉(安多尔·加尔多尼夫人)是一名会计，退休前担任公司的审计主管。莉莉生性坚强果断，生活作风严谨。她很少谈及自己，但在他人碰到问题时，她总是表现出自己的同情心。只要看到这位卧床不起的老太太与我女儿朱迪特以及极其崇拜老太太的我的瑞典孙辈索菲和安娜之间的亲密关系，我总是非常感动。莉莉于 2002 年辞世。

了不同的生活道路。*

虽然我们一家很少有机会一起共享时光，甚或不能每天碰面，但科恩豪泽家的父母亲和他们的四个孩子都相互深爱着。这个家庭的父母亲相亲相爱，形影不离，但孩子们与父母亲不同，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而且彼此间也各有不同。

父亲把办公室搬进这幢公寓楼后，母亲就时不时地在某个晚上打扮一新，然后进入接待室，与客户们坐在一起。这是母亲给父亲发出信号的一种方式，这表示，她认为一天的工作应该结束了，不能再挑灯开夜工了。接下来，父亲只好放下手上的工作，与母亲一起外出。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外出共进晚餐，从来不会带上我们这些孩子。我们一家人从来不知道家庭聚餐这个说法。任何人只要觉得自己饿了，或者正好有时间吃饭，就独自一个人吃午餐或晚餐。我们全家很少围坐在一起聚餐，如果偶尔全家团聚，很多情况下也是在夏天度假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全家才会在度假花园里一起吃饭。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我的情况。父母亲以及哥哥和姐姐从来不干涉我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我想学习什么东西，学习多长时间，我跟什么人一起度过自己的闲暇时光，读什么书或者打算去看什么戏，他们都不闻不问。有时候，特别是在夏季，我们全家会一起去看场露天演出，或者在每年 8 月 20 日国庆日这天，欣赏为纪念匈牙利建国者斯蒂芬国王而举办的焰火晚会。但是，这种全家出游的活动少之又少。

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我自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定期欣赏音乐会。后来，我又有了学钢琴的想法。这一次，父亲帮我找了一位钢琴老师，这可不是一位普通的钢琴教师，而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弗里杰什·山多尔。不过在当时，山多尔还是一位失业的指挥家，后来他才成为杰出的音乐老师，并且建立了一个管弦乐团。我一直师从山多尔学习钢琴，1944 年，德国占领匈牙利之后，我的钢琴课才被迫中止。中学上到一半时，我自己又做了一个决定，即利用课外时间学习英文。虽然都是父母亲帮我出钱成全了我的决定，但我并没有遵从他们的建议或者按照他们的劝告选择课程，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想法，也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

我很难估计或者评价这种家庭教育方式对我产生的影响。一方面，由于父母亲听任我自行其是，所以我总有一种孤独感和被抛弃的感觉；另一方面，我从

---

* 哥哥托米（陶马什·科尔奈）毕业于实用艺术学院。他最初想当一名平面设计师。但是，在他服完强制劳役后不久，他就转行进入广告界。他是匈牙利唯一一家国有广告公司的经理，后来又去了国家储蓄银行（OTP）工作。他最为自豪的事情是，他的创意为匈牙利彩票业的首批广告打下了基础。他创作的广告语很快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流行语。托米于 1996 年辞世。

此意识到，或者说我从此感觉到，我以后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独立规划自己的人生。此后，无论大事小事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同时，由于我们家每个人在与人相处时，都很为他人着想，都不愿意打扰他人或者给他人增添麻烦，所以我没有被培养成自私自利的人。我们会在需要而且有能力的时候，竭尽全力互相提供帮助，但我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家庭“共同体”。今天，作为一个自觉的个人主义者，我深信，尊重个人主权是道德律令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我也深信，我对自己的生活以及事业的成败都负有主要并且首要的责任。我觉得我有帮助他人的社会责任，但我并不属于哪个“共同体”。相反，我拒绝一切将我归属于某一群体的企图。确切地说，今天我之所以能说出这样的话，是我走了很多弯路、阅读哲学著作和毕生观察生活之所得，但是，我在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以及我的家庭生活的方式，早就已经将这种认识深深地植入了我的灵魂。

德意志帝国学校

我是在布达佩斯的德意志帝国学校上的学。非常幸运，我父母和照顾我的家庭女教师都说流利的德语，所以我实际上是在双语环境中长大的。在学校里，除了匈牙利语言、文学和历史之外，所有其他使用德语教授的课程对我而言都不困难。1933 年，我还没有达到通常的入学年龄，校方就同意我入学了，所以，我进入德意志帝国学校是在纳粹掌权的同一年。

人们有时会问我，像我父母这样的犹太人为什么要把我送入德国学校。事实上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父亲与德国人的关系极为密切，确切地说，他也是受德国文化熏陶长大的，他在研究匈牙利法律的同时，也学习了德国法律。他的客户都是德国人，德语就是他在工作中的主要语言。

我父亲当时肯定知道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都是死硬的反犹太分子，但他与德国和世界各地的许多人一样，认为这个政权不会维持很长时间。日耳曼作为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它的人民怎么能容忍这种政权的存在？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德国人的这条仇恨之路的终端就是毒气室。

父母送我入读德意志帝国学校不仅仅是想拓展我的语言知识，也想让我从该校优秀的学术教育中获益。这所学校不仅受到德国外交人员和商人的青睐，也受到生活在匈牙利的其他外国人的欢迎。在我的同学中，就有奥地利人、德国

人、美国人和土耳其人，当然也有匈牙利人。学校也培养出了一些著名人物，诸如 1956 年牺牲的记者兼政治家米克洛什·吉迈什(Miklós Gimes)，著名演员伊万·道尔沃什(Iván Darvas)，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游泳冠军埃娃·塞凯伊(Éva Székely)，小说家费伦茨·考林蒂(Ferenc Karinthy)，以及受人尊敬的研究德国的匈牙利学者埃勒德·豪拉斯(Elöd Halász)。

这所学校的教师都循循善诱，而且经验丰富、知识广博。我在那里学习了 8 年，从未听到过一句反犹太人的言论，我也没有听到过任何赞美希特勒、赞美希特勒政权的言词。在柏林传来命令让犹太人离开学校时，学校犹太宗教老师婉转地告知学生家长，从 1941 年秋季开始，他们的孩子必须到其他学校上学。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学校仍然允许那些差一年就完成 12 年学业的孩子以读私立学校的名义再读一年，并参加毕业考试，以完成他的学业。似乎当时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德国教师都在逃避德国国内让人无法忍受的生活，都愿意到国外寻找工作，比如在匈牙利教书，我们的学校就像漂浮在纳粹主义和日渐受到希特勒思想浸染的匈牙利学校体系之中的一座和平岛屿。

每当想起这所德国学校的老师，我总是满怀感激与尊敬。他们全面培养我的学习方法和正确的思维方式，并传授给我大量的知识。今天，我仍然得益于他们教给我的东西。但我的老师中并没有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伟大人物，我没能受教于任何具有超凡个人魅力，且可以凭借其人格和学说为学生提供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和道德范式的大师。

我在德意志帝国学校的最大收获，是伴随我终身的友谊。我从一年级开始就认识的一位同学彼得·肯德(Péter Rende)，后来成为了一名记者、学者和政治科学工作者，他也是 1956 年流亡社区(émigré community)的一名思想领袖。我跟他同学 8 年，后来又一起参加青年运动，并一起在新闻界工作。我们还一起参加了许多斗争。后来彼得移居巴黎，三十多年来我们远隔千山万水，但我们的友谊依旧，而且历久弥坚。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世间很少有人像我们这样拥有 70 年之久的友谊。

求知之路

离开这所某种程度上相当国际化(学生来自不同国家，而且实行男女同校

制，这在当时十分罕见）的德国学校之后，我又进入了一个全新而保守的环境——一家位于布达区的男子高级中学。学校的同学大部分都来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

当时，战争形势非常紧张，德国学校的老师严禁我们谈论政治和战争。但这所学校的校长却高声赞扬德国人的战争行为，常常预测说，德国人会打赢1942—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校长开设了三门主课：拉丁文、匈牙利文学和历史。他在我的同学面前宣称，没有任何犹太人会在他的这三门课中拿到高分，他说话算话。我们班里有两名犹太同学，他俩门门功课都表现出色，但黑格多斯先生只让他们在他的两门课中拿了高分，第三门课的分数就给得很低。这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对犹太人的公开歧视。

我第二次感受到对犹太人的公开歧视不是因为个别教师的个人偏见，而是因为国家颁布了适用于所有犹太人的法令。匈牙利参战的一个公开信号，就是所有高中学生都必须作为骑士活动的成员，接受初步的军事训练。我在德国学校读书的时候，所有男孩都参加了骑士的训练。我刚进匈牙利学校，又来了一道命令，让把军事训练分成非犹太人学生和犹太人学生两种。我不能说这个国家对待我们犹太人的方式特别粗暴，让我感到屈辱的是这种区分“犹太骑士”的简单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代表的排斥和种族隔离。

在我进入这家匈牙利学校的时候，学校的大多数同学都一起相处了4年之久，但男孩们还是友好地接纳了我。我常常和一些同学一起听音乐会，观赏戏剧，和另一些同学讨论书本知识。但我没有与任何人建立紧密的关系，而是依然与在德国学校结交的朋友黏在一起。这所学校的情况与德国学校相同，我在这里仍然没有遇到过具有超凡个人魅力的老师，虽然我还记得有的老师的俏皮话，记得有的老师的个人风格，但没有一位老师在知识上对我产生过持续的影响。

除了传授了一些事实性的知识外，我在学校里学到的历史、哲学和人文精神，都没有对我产生影响。我开始自学，开始培养自己的品味和想法。因为渴望知识，所以我读书很快，我不断地买书，不久就有了可观的藏书。*

我在附近的图书馆办了借书证，从那里借书回家阅读。我发现挑选书籍是

---

* 在我们受迫害的岁月里，我家的朋友们为我精心保管了这些书籍。我们从地下室出来之后，我马上把这些书搬回家，再次让它们不离左右。我的这些书躲过了1944年圣诞节到1945年2月中旬苏军对布达佩斯的围攻、空袭与劫掠。但几周之后，即1945年初，苏军士兵突然命令我们搬离住所，所有的书全部丢失，唯一留下来的是我最喜爱的书——托马斯·曼的《托尼奥尔·克勒格尔》（*Tonio Kröger*）。

件很困难的事情。安托尔·塞尔布(Antal Szerb)的论匈牙利史和世界文学的著作对我帮助较大。尽管我们校长说这些书是“垃圾”，而且(因为塞尔布是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禁止我们读这些书，但我还是觉得这些书的指引非常珍贵。我还读了米哈伊·鲍比契(Mihály Babits)撰写的欧洲文学史，作为对塞尔布的辅助阅读。我还将书中提到的伟大著作都找来看过了。现在回头细想，几乎无法相信当时我在阅读上花费了这么多时间。通常情况下，我黎明即起，然后用一两个小时完成所有的学校功课。放学后的整个下午和晚上，我不是与朋友见面聊天，就是在读书。我常常这周还在读《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下周就开始读《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我读过巴尔扎克(Balzac)和福楼拜(Flaubert)，匈牙利古典作家卡尔曼·米克萨特(Kálmán Mikszáth)和日格蒙德·莫里茨(Zsigmond Móricz)，杰出诗人雅诺什·奥洛尼(János Arany)和阿蒂拉·约瑟夫(Attila József)，以及译自不同语言的阿帕德·托特(Árpád Tóth)和德热·科斯托拉尼(Dezsö Kosztolányi)的作品，我还可以开出一个很长的书单，写出所有我喜欢的书籍。

我也阅读报纸周末副刊上有关学术和艺术的文章，这也是我挑选书籍的一个途径。这些文章确实让我了解到了当时的学术动态，让我注意到了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约翰·赫伊津哈(Huizinga)以及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作品。我还非常高兴地发现了许多全面介绍智性生活和思想的书，例如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的哲学史。在我 14—16 岁的时候，我还无法更多地理解所读书籍的内容，有时连一半的内容都理解不了。当时，也没有人培养我的世界观，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我们学校的宗教课老师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全面接受所有的新思想，对这个世界的挑战的各种回答让我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某一天，我可能受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影响，认为自己必须皈依基督教，但第二天我可能又会匆匆翻阅安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作品，着迷于他对世界的冷嘲热讽，伏尔泰的《老实人》(Voltaire's *Candide*)则强化了我对这种冷嘲热讽的认识。

在那段岁月中，我仍然不确定自己长大后做什么工作。我侄儿帕尔·哲尔菲(Pál Győrfi)还在幼儿园时就想长大后当一名救护车护理人员，后来他也确实做了这一工作。我没有从事某种职业的想法，或许这个时候我已经培养出了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某种特质。我喜欢将自己的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我有较强的愿望要很好地完成手头的每一项工作。我迷上摄影时，就集中精力搞摄

影，而我热衷于收藏书籍时，就想让自己的书屋尽揽天下名著。收集邮票的时候，我的邮册就必须尽可能全。在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就非常讨厌混乱和无序以及做事半途而废。

但我的这些性格特征和努力，与我的思想旨趣的方向毫无关联。如果按照三岁看老的说法，从我14—16岁的作为推断我之后的学术发展，我就是一副书生气十足、专门撰写文学评论或探索美学问题的空头理论家形象。当时还没有迹象表明12年或15年后，这个人会转而面对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成为一名经济学家。

那时候我一直认为，汲取的知识越多，对自己内心世界的领悟也越深刻。借用电脑打个比方，我在今天领悟的一种看法明天又被另一种看法所覆盖。事实上，我一直放开思维，用开放的心态等待一种真正强大的知识动力。1945年，这股知识冲动终于来了——但我们不要这么早就跳到这一段。现在我们还只是在谈我高中的最后几年生活，1944年的痛苦经历尚未到来呢。

1944年：父亲的命运

1944年3月19日，这一天与其他的星期日没什么两样。当时，我正打算与一个朋友一起去听早场音乐会。但德军占领了匈牙利，音乐会取消了。

大概一两周后，我父亲收到了征兵文件，文件内容与强征犹太人服劳役的文件内容相同。收到征兵文件的人必须在48小时后，带上毛毯、饭盒和两天的干粮等露营装备，赶到指定的地点。父亲已经63岁了，超过了普通劳工60岁的上限，所以没有被编入普通劳工的行列。

父母都有不祥的预感，所以非常痛苦。他们从电话询问中了解到，有些著名的犹太知识分子和商人，也像父亲一样被征召服劳役。我们这些孩子没有参与父母那些让人焦虑的讨论，后来从我母亲的话中，我推断出了他们反复权衡的某些对策。

我母亲想出的主意是两个人一起自杀，但这个提议被父亲否决了，他认为他们不能在这一危险的时刻丢下家中的其他成员。母亲问父亲为什么不打算藏起来。父亲的一些朋友甚至包括一些德国人在内，都愿意做出一点牺牲为他提供避难所。但我父亲否定了这一提议，他有两个理由：一是他认为这样做风险太

大，担心万一被发现，他本人和庇护他的家庭都会遭到残酷的报复。二是他接到的征召通知是国家签发的命令，根本不容违抗。父亲的这种反应让我认识到，在他的世界观里有一个基本原则，他是一名律师，但不是一名普通的律师，而是一名一贯尊重和热爱法律的人。我父亲确实也遇见并阅读过一些道德与法律相冲突的案例。我敢肯定，他一定也反复思考过专制统治者强制实施的法律是什么法律的问题，思考过伪议会通过的践踏基本人权的法律是什么法律的问题。然而，当他发现自己面对着与其生活有关的这一悖论时，这位一丝不苟、诚实廉洁并具有道德人格的人，采用了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国家的命令就是国家的命令，是必须服从的命令。

原来，在德国人占领匈牙利的最初几个星期，德国人就把居住在布达佩斯的一两百名著名的犹太精英关了起来。一开始，德国人把这些犹太精英暂时关押在硬石街的犹太教神学院，由匈牙利警察看管，生活条件相对而言还可以忍受。[1]几个星期之后，这些人的家人获准探视他们。我和我母亲及姐姐一起探望了我父亲，当时，我的两个哥哥已被征召服劳役，大哥班迪在苏联前线，二哥托米在南斯拉夫的博尔。所以他们没有和我们一起去。我们和父亲在神学院的院子里见了面，父亲的表情和言谈都很冷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几乎称得上和颜悦色。我们都没有说什么动感情的话。由于我们家的开支和大事一直都由父亲做主，母亲只操心如何接待亲友，如何照顾几个孩子，所以父亲给母亲提了一些很实际的建议。现在，家里的大事小事实际上一下子落到了母亲肩上，父亲力图让母亲明白如何打理各种事务。后来，父亲还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了如何处理我们所住的公寓，并告诉她把自己的法律文件存放在什么地方。* 除了家人常说的温情的话，在我们跟父亲的会面以及后来的通信中，父亲从来没有说过跟我们永别的话。

此后，我们再也没有收到过父亲的只言片语，再也没有见过他。

父亲被关在神学院的时候，他也为解救自己做过种种努力。他的一些忠诚的客户自发组成了一个小型代表团，拜访了当时德国驻匈牙利大使埃德蒙·费森迈尔(Edmund Veesenmayer)，费森迈尔在德军占领匈牙利期间是声名狼藉的暴君。代表团请求德国当局给匈牙利政府打个招呼，释放我父亲回家。他们证

---

* 我是不是遗传了我父亲这种总是有条不紊地保存文件和笔记的劲头？或者，我只是沿用了他的习惯？

明说，帕尔·科恩豪泽博士作为一名律师，几十年来一直代表了在匈牙利的德国企业的利益，在德国企业中信誉卓著。后来，代表团的一名成员跟我母亲说了之后发生的事情：费森迈尔听后勃然大怒，威胁这些请愿者说，如果他们不马上从他的办公室出去，就把他们与科恩豪泽关在一起。

再后来，父亲还经历了什么遭遇，我们就不太清楚了。确切的是，这批遭扣押的犹太人都被转移到了霍尔蒂—利盖特园（即今天的锡盖特圣米克洛什）集中营。那儿的条件比之前更加艰苦，但他们还是在那里继续生活了一段时间。[2] 后来，一列火车将各地的囚犯都拉到了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他们的生命突然终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中 600 万名牺牲者的死亡是一场悲剧，其中每一名牺牲者在被屠杀之前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然而，父亲的命运与他们格外不同。举个例子说，父亲死于德国恐怖政权与匈牙利当局的积极合作。尽管父亲从小就深受德国文化的熏陶，他本人也一直致力于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推动德国工商业的繁荣发展，诚实而守法地为德国与匈牙利两国的关系努力工作，但他仍死于两国的合作。当然，父亲从未支持过希特勒，也从未与纳粹当局有什么合作，他的死不是因为他消极旁观，而是因为他是犹太人。

造成我父亲悲惨命运的另一方面我在前文已经述及，父亲是法律（legality）的忠实仆人，因此他不愿意反抗一国权力当局。他就像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待宰羔羊，成了一国政权无耻而残忍地滥用正义、法律以及国家权力的牺牲品。

1944 年：我的逃亡

如果父亲仍然在家，他肯定会指点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不清楚是父亲的意志更强硬还是我的意志更坚定，正如我之前说过的，我父亲已经在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成功地阻止了哥哥班迪移民国外，而我已经惯于自己独立决定生活中的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

自父亲去世后，母亲无法、也不愿意影响我的决定，所以我从 16 岁开始就自己做主了，既然如此，当下的决定比决定阅读哪本书或者决定学习何种语言都更为重要一些。1944 年是我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的一年。

当时，驱逐犹太人出境的消息已经满天飞，我们那时并不知道被驱逐者将被

送入毒气室，我们以为会被送往类似班迪和托米服役的地方强制劳动。那时我们还能收到班迪和托米的消息，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不仅饥寒交迫，而且有时还受到非人的待遇，但我们一直没有失去他们挨过这场战争的希望。

我们还听说，在兵工厂工作的犹太人不会被驱逐出境（后来证明这个谣言是错的）。因此，我和两位朋友自告奋勇到贝奇路附近的纳吉巴托尼-乌伊洛克（Nagybatony-ujlak）砖厂当劳工。* 我从一名从未做过任何体力劳动而在体育锻炼方面笨拙低能的中学生，突然变成了一名劳工，一名实实在在承担繁重体力劳动的劳工。那些有经验的熟练工人将浸着水的沉重砖坯从不停运转的压砖机上提起来，放入沿轨道运行的小货车里，我们这些新手则把小货车推进砖房，再把砖坯码放整齐。

有一段时间，我们早上去工厂干活，晚上才能回家，来回都要在身上佩戴强迫我们佩戴的黄色星形符号。后来，政府实施的宵禁令限制了我们的活动。由于下班时间太晚，我们无法回家。这种情况下除了睡在砖房里我们别无选择。**

这种从未体验过的生活方式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痛苦的记忆。相反，我还觉得这种生活有些像 20 世纪 40 年代末年轻人参加的与农业或建筑有关的夏令营活动。我们虽然是因为恐惧才去工作的，但我们是“自愿”去工作的。所以，我们兴致勃勃地将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工作，努力适应那里的条件。后来我们发现，那些已经成为我们同事的熟练工人从来没有对我们恶语相加，我们真的松了一口气。他们从不对我们衣服上显眼的黄星标志指手画脚，也从不对犹太人妄加评论。如果我们笨手笨脚做不好事，他们会教我们怎么才能做好，或者像对待其他那些弄出了“废品”（搞坏了）的新手那样，数落我们几句了事。有一位老工人还请我们去他家吃饭，我们还一起喝了酒。我因此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狭小的公寓干净整洁，但对我来说，与一直过着安逸生活的我及我的朋友相比，他们穷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在家里，我与仆人的关系一直很好，经常和他

---

* 我出于本能，或迫于环境的压力开始认识到，一个人面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必须做出选择，尽管我当时并不能意识这一原则。我逐渐养成了不愿意消极地服从命运的生活态度，我总是力图将自己的前进方向掌握在自己手中。后来，我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这种行为方式作为自己的基本生活原则。当然，坚定地作出一个决定并不能保证这一决定总是正确的。比如说，我决定进入制砖厂工作，很快就被证明是多此一举。

** 我住在砖厂的时候，母亲和姐姐被迫离开了我们在科学院大街的公寓。犹太人必须住在带有大卫之星的“星形”标记的房子里。母亲和姐姐被我父亲的老朋友收留了，住进了波若尼大街的“犹太人之家”。

们聊天，到他们家里玩，和他们的家人会面。但这只是雇员与雇主家人之间建立的家族式关系，与我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是我与“工人阶级”第一次真正的接触。我突然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离开了原来富裕而舒适的封闭生活，进入了一个技术落后的工厂，干着惩罚性的体力劳动，过着贫困的生活。我发现已经生活在一个新的群体中了，他们的生活如此贫困，但他们善良的天性使我从心底里尊敬他们。

纳吉巴托尼-乌伊洛克砖厂成了大规模驱逐犹太人的一个中转站。很多被驱逐的犹太人战后又回来了，他们的叙述中都提到了这家砖厂，有些人还说，他们得到过砖厂工人的帮助。以担任驱逐任务的官员、宪兵和警察为一方，以砖厂的工人为另一方，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很显然，有些工人因为自愿帮助被驱逐者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不幸的是，我没有找到能证明这种说法的可靠证据。

1944 年夏天，布达佩斯犹太人身上的压力相对而言轻了一些。有传言说，各省的犹太人都已经驱逐干净了，布达佩斯的犹太人不会再面临被驱逐的命运了。同时，我碰到了一位好心的大夫伊什特万·绍博(István Szabó)，他冒着极大的风险给我开了一张假证明，证明我不适合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样，我获准离开了砖厂。

秋天日渐临近，新学期也开始了。我应该再读一个学年才能参加毕业考试。我当时决定取下身上佩戴的黄星标志，再去学校上学。值得一提的是，我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从我的同学那里听到过一句反犹太人言论，但我也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半点同情的表示，而我从其他学校的非犹太人朋友和熟人那里，反倒是得到过一些同情，这让我很不好受。我的同学从不来我家里，也不给我打电话。战后，我碰到过几位中学同学，我因为他们当年的冷漠而说了他们几句，但他们却用很不理解的眼光看着我，他们根本不明白当年他们忽略了什么。他们也曾满怀善意地考虑过我的处境，也愿意了解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但我们的学校和养育我们的家庭就没有教导我们如何表示理解、同情和团结。

整个夏天和初秋，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当时，姐姐与一位成了我家房客的宪兵中尉达成了一项古怪的协议，所以我们从“大卫之星”的房子里搬了出来，住进了姐姐的公寓。姐姐跟中尉的协议是，如果我们在战争中丧命，而他与他的家人幸存了下来，那么出租的房子和房子里的东西，都归他们所有。但如果我们有幸躲过了这场浩劫，那么我们搬回原来的房子，他们则另寻住处。结果是后一种情况。但是在 1944 年的夏天，我们根本无法预测命运将把我们带到何处。只要

我母亲在厨房里忙碌，其余三个人，我和姐姐莉莉以及温柔善良且身怀六甲的中尉妻子，就会谈论一些让一个 16 岁少年喜欢的笑话，我们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那样，开怀大笑起来。

10 月 15 日，匈牙利政府摄政霍尔蒂（Horthy）发布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告，称将与苏联军队达成停火协议。公告发布之后不久，成群结队的匈牙利纳粹，即箭十字党成员就出现在了大街上。恐怖局势在佩斯一侧持续了十周左右，一开始还只是零星地杀人，后来就升级成大规模杀戮。一个月后，布达一侧的德国人和匈牙利箭十字党成员才被消除干净。

箭十字党夺权之后几天就颁布了一个动员令，征召所有的犹太人服劳役，甚至征召包括原来免服军役的 18 岁以下和 60 岁以上的年轻人和老人。我当然也在征召之列，并与一名与我年纪相当的年轻人和一名老头编在一队。新征的劳工集中起来之后被分到了各队，然后出发前往目的地。第一天晚上，我们驻扎在费里海吉机场一座没有完工的新候机楼里，我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背包做枕头。黎明来临之际，我发现离我不远的一位老人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这种混乱和长途行军已经超过了他的承受能力。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死亡。

在我们到达距布达佩斯 20 千米之遥的小镇韦切什（Vecsés）之后，我们住进了马棚，一百多人紧挨着躺在麦草上。住在这种地方全然没有之前在砖厂过夜时那种快乐的露营气氛。那些年纪大的人最遭罪了，他们晚上起夜时，常常会因为在黑暗中踩到其他人身上而摔倒。每天早上，这些早已习惯了温暖的洗漱间的人，只能用冰冷刺骨的冷水勉强洗漱一番。发给我们的食物也非常少，所以我们在田野里挖战壕时，就会挖胡萝卜充饥。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短暂，相互之间根本不认识，所以我们无法建立同志或朋友般的亲密关系。无人分担我的心事，也无人与我共同解决问题。

但是，我在这里碰到过很温暖的人性关怀。有一天，看管我们的卫兵命令我们去一家花园里挖战壕，我们不得不把花园挖得乱七八糟。花园的主人并没有因为我们的这一番破坏活动而拿我们撒气。相反，一位手提豆汤的漂亮金发小姑娘突然出现在我们这群饥渴的劳工面前。小姑娘名叫玛尔塔（Márta），许多年后，我又意外与她重逢。当时，她是我所在的报社办公室的打字员。在我们谈到共同经历的战争岁月时，我们发现，她父母就是那家花园的守护天使，我就是他们曾经无私帮助过的劳工中的一员。这件事确实只是一件小事，只是一桶豆汤而已。然而，一旦有人片面而笼统地说，在犹太人受迫害时，所有的匈牙利人都

无动于衷地袖手旁观，我一定会以这件事情为例，对他们进行反驳。

1944 年 11 月 2 日，苏联军队的炮声已经越来越近。我们又接到一个命令，命令我们撤离韦切什，直接前往布达佩斯。劳工大队撤离那天正是万灵节，匈牙利人则将这一天叫做亡灵日。我们劳工队有十几名年轻人和 100—150 名老年人，由几名看守押着，赶到了布达佩斯附近。在路途中，这些看守像在韦切什一样，一直严格执行纪律，但他们在赶路的时候并没有折磨我们，也没有弄出一些残忍的花样来取乐，搞出这些花样就可能导致劳工崩溃或死亡。他们规定的行军速度虽然很快，但我们尚能承受。

进入布达佩斯之后，我们经过乌洛伊街的军事建筑。手戴臂章、身穿绿色衬衣的箭十字党武装人员，从劳工看守那里接管了我们。不一会儿，他们就发出了第一道命令："跑步前进！"我们这几个年轻人虽然经过从韦切什到布达佩斯几十英里的长途行军，倒还能勉强支撑跑步前进，但有些老年人却跟不上队伍了。只要有人停下来，箭十字党的年轻人就抡起步枪枪托狠砸他们。从乌洛伊街一直到米克洛什·霍尔蒂桥（现在的裴多菲桥），他们不停地驱赶并狠砸那些掉队的人。我亲眼所见至少有 5 名以上的老人被打中头部。我们到达大桥的时候，有两人冲出队伍跳进了多瑙河，箭十字党向他们开了枪，但我不清楚他们是被打中了还是逃走了。

我们到达当晚的宿营地奥尔贝特福尔沃时，都已精疲力竭，精神已快崩溃了。那天成了实实在在的亡灵日。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从韦切什到奥尔贝特福尔沃的 20 千米的路程也够可以的了。第二天一大早，我想我得设法逃跑。

幸运的是，出现了一个绝好的逃跑机会。当时，英雄的瑞典外交官拉乌尔·瓦伦贝格（Raoul Wallenberg）正在利用各种手段，在整个布达佩斯地区开展营救犹太人的行动。有些犹太人拿到了瑞典护照，但这些护照与真正的瑞典公民持有的护照还有区别。瑞典公民拿的护照上面用德文注有 *schutzpass*（保护护照）字样，这种字眼证明护照持有人为瑞典公民。犹太人持有的护照，上面写有 *schutzbrief*，意思是"安全通行证"，这种护照的法律效力要小一些，它只是表明，护照持有人受瑞典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保护。即使是箭十字党政府，也比较尊重保护护照的持有人，但根据国际法，后一种护照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也没有什么效力。

我口袋里就装着一本这样的护照：看上去不错，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本护照是我家的一位朋友，也就是我姐姐莉莉的一位仰慕者艾尔诺·瓦尔曼帮我

弄的。有天早上，一个箭十字党指挥官下达了一个命令，让那些持有瑞典护照的人排成一排，我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决定，如果我跟瑞典人站到了一排，又被他们发现我拿的不是真正的瑞典护照，我一定会被当场击毙。然而，我还是决定冒这个险，就当自己是瑞典人。

幸运的是，那个检查证件的年轻人并没有注意到 *schutzpass* 和 *schutzbrief* 之间的微妙区别，让我进了瑞典人的队伍。我们被装上一辆卡车送往佩斯，其他人则留在原来的队伍里。当时有传言说，他们还会西行。很多年后，我偶然碰到了一位幸存者，才知道了他们的事情。当时他们一直西行到达了奥地利边境，但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大部分人则因为毒打、饥饿和强行军而死去。

奥尔贝特福尔沃的这个瑞典人小组和其他几个瑞典小组一起，都被送往了佩斯的工会总部，那里地方很宽敞。尽管我们仍睡在地上，但因为不再有人虐待我们，所以我们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看守我们的是一些刚刚应征入伍的年轻士兵，态度比较友善。从匈牙利犹太人中挑选出的“瑞典”军官负责维持秩序，这些军官早年都服过预备兵役。然而，尽管生活有了改观，我还是不相信箭十字党会让我们这样舒舒服服活下去。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我是对的，这组瑞典人在经过短暂停留后，也被驱赶着西行。

要想从瑞典人的看守下逃走并不是很难。看守我们的军官里有一位曾经是我家的朋友，所以我溜出房门时，他设法引开了门卫的视线。

我再次获得了自由，我可以在没有人看管的情况下在佩斯的大街上行走。但我的自由到底如何呢？虽然我身上没有佩戴黄色星形标志，但我手上也没有伪造的证件。如果任何一个箭十字党员，或警察或士兵，或是与他们有瓜葛的平民对我产生了怀疑，我就有可能被抓入监狱，就有可能受到残酷的审讯。我必须躲藏起来。

一开始，我躲在亲爱的卢伊佐（Lujza）那里，她曾经为我们家打扫过卫生。她丈夫是一幢公寓大楼的看门人，我就藏在那幢公寓大楼的一个房间里。他们白天出去工作时，不想把我一个人留在公寓里，所以他们会请求这家或那家住户收留我。有时候，我今天躲在一位电车司机家里，明天又藏到一位妓女那里。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冒着巨大的风险，因为外面到处都贴有布告，告示窝藏犹太人或逃兵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惩罚。但他们还是将我藏了起来，他们的行为进一步证明，仅仅因为箭十字党的残暴行为就对全体匈牙利人妄加评论的说法，是多么错误和不公正。那些出于人道而无私和自愿地帮助了我们的匈牙利人，自

己也冒着巨大的危险。

每天都像这样要找一个新的地方躲来藏去终归不是长久之计。这时，幸运再次降临到我身上。之前帮我获得瓦伦贝格安全通行证的那位家庭朋友，又一次利用了他与耶稣会的关系。耶稣会神父同意藏匿一批包括我姐夫和我在内的犹太人。这位朋友还利用他与教会的可靠关系，为我母亲和姐姐在圣心女修道院找到了藏身之处。我在前往新的藏身处之前，特意探望了她们一次，因为谁也不知道我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她们。我既没有佩戴黄色星形标志，也没有任何证明文件，手捧一束鲜花就急忙赶往女修道院。我母亲和姐姐见到我非常开心，然后我们郑重道别。

耶稣会修道院友好地表示欢迎我们(这家修道院是劳伊克学院的前身，现在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习和住宿的地方)。修道院院长[3]雅各布·赖勒神父*在这里庇护了很多难民。我是其中唯一的年轻人，所以我没有真正能与我交谈的人。我和姐夫一直保持着应有的亲戚关系，但我们从来没有亲密到能对感情或思想话题进行讨论的地步。我再一次觉得我自己是孤独地生活在一个团体之中。

一位神父数次邀请我跟他一起讨论关于宗教信仰、上帝、基督教和犹太教以及哲学问题，这位神父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在他人眼中，我们一定呈现出奇妙的景象：一位耶稣会神父和一名身材瘦长衣衫褴褛的少年，一边在花园里走来走去，一边热烈地讨论，远处则传来隆隆炮声。

当时，苏联军队已经包围了布达佩斯，城郊地区已经开始了巷战。我们一直相信，耶稣会的特权能威慑箭十字党成员，但一天清晨，神父告诉我们，箭十字党已经开始搜查修道院。我冲到楼梯口，一眼就看到两个全副武装的人正在那里叫喊，我不清楚这两人是士兵还是箭十字党民兵。我和姐夫跑到了屋顶上，躺在打扫烟囱的工人用来通烟囱的木条上。当时，我根本分不清是箭十字党对教会的突然搜查更为恐怖，还是苏军对城市的轰炸更为恐怖。炸弹落下的呼啸声和附近炮火的爆炸声，让人非常害怕。此外，我还担心可能会从窄木板上摔下去。更让人疯狂的是，从屋顶借着枪炮的火光看过去，这个城市的天际线呈现出地狱

---

* 雅各布·赖勒(Jakab Raile)是1944年匈牙利教区的耶稣会大主教。目前没有可靠的数据表明当时到底有多少人躲藏在教堂里。有人估计大约有一百人，有人估计是一百五十人。1992年，以色列的“二战”大屠杀纪念馆授予赖勒神父“各国义人”称号。这一称号授予那些在大屠杀中，尽全力拯救过遭迫害的犹太人的人。

般的美丽。更为怪诞的是，一名年轻的犹太人银行职员和一名书呆子学生，紧紧贴在横放于耶稣会教堂屋顶的木板上。

我们躲过了这次搜查，但耶稣会的神父想让我们搬到地下室去。如果我记忆无误的话，我们在地下室住了两个星期。地下室很拥挤，但生活条件相对而言文明一些。由于是修道院供给我们食物，所以我们确实比当时布达佩斯的大多数人吃得好一些。在苏军围攻开始之前，很多家庭都在各自的地下防空洞里找个地方开了一道门，与别家的地下室连接起来。一天早上，隔壁地下室的门突然开了，进来了一队德国士兵。他们想做什么呢？想搜查吗？还是想把我们赶出去？不，都不是。那时候，他们已经一点都不关心这些事了，他们想要逃跑。这些士兵身心疲惫、焦头烂额，拖着沉重的腿从一个地下室挪到另一个地下室。

溃败的德国士兵从我们这里经过之后一两天，苏联人进来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所看到的一切。我们藏身于一个有一道楼梯的地下室里，当时我们正焦虑不安地住在那里，突然，楼梯顶端出现了三个人。三个人中年纪较大的一位是身穿耶稣会教袍的赖勒神父。他旁边站着一位身穿哥萨克制服、身材瘦削的苏联军官。从前，我只是在歌剧影片中见过这种制服，他的子弹带交叉挂在胸前。跟他们在一起的第三个人是和我们一起避难的犹太人，他原来是喀尔巴阡山省(Subcarpathia)* 一座犹太教堂唱诗班的领唱，会说俄语和乌克兰语，现在充当了神父与苏联军官的翻译。苏联军官讲了几句友善的问候语，纳粹对我们的迫害、东躲西藏的日子以及苏军对布达佩斯的围攻就此结束了。

接下来的一幕有些奇怪。一队苏军士兵一边喊着“把手表拿来”，一边从楼梯下来，他们走到我们这些曾经深受迫害并躲藏在耶稣会教堂数月之久且刚刚获得自由的人身边，拿走了我们所有人的手表。我不是很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拿走手表，或者拿走手表有些什么含意，但我毫不犹豫地把我的手表递了过去。

我们又在修道院待了一两天，所有在这里避难的人对修道院表达了衷心的谢意之后，才四散回家。

我沿着一条林荫道向前走去，不一会儿就到了烟草街的犹太人教堂前。那里的景象让我非常震惊，赤裸僵硬的尸体就堆在道路两旁。这些曾经生活在这座犹太教堂附近犹太人居住区的犹太人的尸体，堆得像屋子一样高。

我匆忙向我姐姐在波若尼街的公寓跑去，我推门进去，迎面看见了母亲和姐

---

* 1944 年这一地区属于匈牙利，现在属于乌克兰。

姐。我们三人经历了苏军对布达佩斯的围攻后，终于活了下来。

我生命中的一章结束了，这时，离我 17 岁的生日只有短短几天的时间了。虽然从法律意义上，我还没有成年，但 1944 年的经历意味着未成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不再觉得自己是孩子，或是无需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未成年人了。

注 释

[1] 有关关在勒克西拉德街犹太神学院的犹太人质的情况，参见 Braham，1981，1：482—483；Brámer 1997(1972)。

[2] Fóthy，1945. 虽然福蒂的书并没有提我父亲的名字，但该书讨论了被关在勒克西拉德街的律师被转移到霍尔蒂—利盖特后很快被送往死亡集中营。

[3] Braham，1981，2：325；Thassy，1996，pp. 372—376，394—396，418—419.

2. 我如何成为共产党员：1945—1947年

1975年我正在瑞典工作。那次我必须去纽约出席一个会议，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到美国驻斯德哥尔摩领事馆申请签证。当时的美国法律硬性规定，申请人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参加过共产党组织。接手我表格的使馆官员见我的回答是“参加过”，就好心地想帮我一下，于是说：“他们一定是强迫你参加的……”我回答说：“根本不是，我是自愿加入共产党的，我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当时那就是我的信仰。”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的共产主义信仰也从萌芽发展到动摇，直到破灭。然而，在我记录并评价我的生活时，探讨我怎样以及为什么加入共产党，仍然有刻不容缓的意义。

入党的各个阶段

我对美国大使馆官员的回答有些简单，入党的时候必须递交正式的书面申请。虽然递交申请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必经的行为，但这仅仅标志着从党外人士到被党完全接纳的皈依过程的一个阶段。这一过程通常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个人的性格和条件也会影响这一过程的时间长短。此外，这一过程在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与共产党正在夺权的国家，无论是共产党作为合法组织还是非法组织，也有不同。我在这里讲的，只是共产党掌权国家的情况。* 当年，匈牙利在箭十

---

* 匈牙利共产党几次更改党的名称。1944—1948年称匈牙利共产党，1948—1956年称匈牙利工人党，1956—1989年又更名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本书用“共产党”统一代表所有这些不同的名称。

字党政权垮台后，马上建立了包括匈牙利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共产党也掌握政府中的重要职位。（后来，在本章涉及的这个时期之后，共产党建立了一党专政的政权。）

我们有必要将加入共产党的五个阶段区分清楚，这五个阶段也是标准的入党过程。

第一个阶段是要成为党外同情者。这类人不仅受到共产党思想意识的吸引，还打算支持共产党的具体运动，他们在选举中也会投共产党的票。不过，这类人只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他们不会像共产党员那样，承诺一些口号（或者是不接受这种承诺）。

第二个阶段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显然无法在“党员”这一名词前加什么描述语词。这些人或许非常热情，或许沉默寡言，也很难在党组织中发现他们的身影。他们可能已从真诚地同情共产党转向接受党员必须履行的责任并遵守党的纪律。但对于那些想通过加入共产党来获取某种利益的人来说，共产主义思想与他们的思想肯定存在冲突。

第三个阶段是成为一名积极而忠诚的共产党员。这一类党员定期参加党支部会议，并积极从事党的工作。他们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第四个阶段是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就意味着要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这一点本身还不够。只要想想人们经常引用的斯大林在列宁葬礼上所说的那句话：“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1]实际上，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与非共产党人的区别不仅仅在思想上，还在于他们的行为和特征。他们的行为必须像个党员。所有的个人利益、家庭利益、朋友利益或国家利益，都必须让位于党的利益。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严格服从党的命令，哪怕他们个人对此命令有不同意见。他们还必须时刻准备按照党的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第三个阶段和第四个阶段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那些有较强信念的人都愿意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这就是他们面前的人类理想，一种极端“辩证的”理想。真正的共产党人常常因为内心的疑虑而产生纠结，他们纠结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素养是否充分，他们的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是否足够。他们的自我批评意识越强，他们的同志就认为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更为可信、可靠，并且真实。

第五阶段是成为一名党的战士，即职业的党务工作者。这一范畴包括那些全职从事党务工作的人，而不仅只包括那些利用业余时间为党工作的党员。这类人

可能是党的书记，也可能是共产党机关的工作人员，甚或是一家工厂的经理或国家安全局的官员。关键在于，他或她获得这一职位是因为党的委派，也可能随时被党撤职。无论他们从事何种工作，都是奉党的命令，而且他们只以党的利益为重。

当然，这五个阶段只是一个人成为一名共产党人的抽象模式，他们并不总是严格遵循这一先后次序，几个阶段也许会全部或部分同时出现。

有些人只完成了第一阶段，有些人经历了前几个阶段，我经历了所有这几个阶段。这是我个人的经历，但我敢肯定，其他人的经历与我相同或相仿，我的经历颇具代表性。

1945 年春，我仍然在基什孔豪洛什镇的归正宗教会学校读书，准备参加毕业考试。一个朋友邀请我到他那里住几个月。理由是那里容易找到吃的东西。1945 年夏天考试结束后，我回到了布达佩斯，开始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MSDISZ)第五支部的活动。1945 年的前 6 个月或 8 个月，我从远离共产党转变为共产党的同情者(第一阶段)。

那年夏天，我加入了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而且越来越积极。我对共产党的同情日趋强烈，开始萌生了入党的想法。

那年秋末，我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并在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总部任职。因此，我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是完全重合的：在我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我已经是共产党领导的运动的积极分子。这种情况预示着，我肯定会进入第五阶段，成为职业的共产党战士。

正是在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布达佩斯总部的工作，让我萌发了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念头。后来我得到升职，并调到匈牙利青年同盟的全国总部工作。升职标志着我的青年运动生涯的顶峰时期。按我当时的情况，我认为自己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了，我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也都这样认为。我心里明白，我已经达到了第四阶段或第五阶段。

有几个因素推动我朝这个方向发展：为了更好地分辨这五个阶段，并有助于分析的顺利进行，我将按照皈依共产党的过程，而不是按照年代顺序来进行叙述。

对 1944 年创伤的反应

我认为，将犹太人与共产党领袖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大错特错。所谓“犹太人

血液里就流淌着共产主义”的说法，实在是一种蒙昧、愚蠢和无知。尽管马克思是犹太人，但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不是犹太人。1919年的匈牙利共产党领袖贝洛·库恩(Béla Kun)和1945年后的马加什·拉科西(Mátyás Rákosi)是犹太人，但德国的瓦尔特·乌尔布里希(Walter Ulbricht)、波兰的博莱斯瓦夫·贝鲁特(Boleslaw Bierut)，还有中国的毛泽东，都不是犹太人。我们还可以罗列出没有参加共产主义事业的犹太政治家的名单，来反驳这种种族论，这些人中有社会民主党领袖，有自由党或保守党领袖，还有政治运动的领导人。

同时，1944年战争的创伤，促使许多匈牙利青年或老年的犹太知识分子倒向了共产党。

对匈牙利犹太人的迫害不是从1944年开始的。1920—1944年的霍尔蒂政权颁布的法令，直接表现出对犹太人的歧视，这一反犹太人法律将反犹主义确定为官方政策。霍尔蒂政权还与希特勒结盟，并在希特勒的帮助下，重新修订了匈牙利边界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霍尔蒂政权还加入了希特勒阵营。这就导致许多犹太人认为自己必须支持共产党，因为只有共产党最反对霍尔蒂政权，而且在霍尔蒂执政期间，共产党一直被认为是非法组织而受到迫害。

匈牙利解放数周乃至数月之后，出现了很多关于匈牙利抵抗运动的说法。共产党人宣称，他们是这次斗争中最积极并最富有牺牲精神的人。真实情况是，匈牙利的武装抵抗组织非常弱小，规模也很有限，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至于有限的武装抵抗组织中，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的准确比例到底是多少，我没有做过研究。但我在向共产党靠拢的过程中，确实见到过拿起武器反对法西斯的共产党人。我非常尊敬这些人，也非常崇拜他们，我很惭愧自己只是苟且偷生，从未尝试去战斗，我也不能以年轻人不懂事为由替自己开脱。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第五支部里还有比我更年轻的人，比如有众所周知的抵抗运动英雄费伦茨·瓦尔瑙伊(Ferenc Várnai)和加比·帕普(Gabi Papp)。

在犹太青年看来，共产党人值得尊敬和同情，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抵抗霍尔蒂政权，宣扬武装抵抗，还有一股推动他们接受共产党的外部动力，这就是他们对未来的忧心。过去的悲剧是否会重演？在这里我并不想思考这一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也不想讨论匈牙利民主的命运或匈牙利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说的是，当时在我17岁的脑袋里，以及与我一样经历过战争创伤的年轻人脑袋里，都在想些什么。就算我们不考虑共产党承诺的未来的社会经济制度如何，也不考虑苏联经济制度的特征，单凭共产党的政治势力，在政府中的地位和权

力，就足以保证能够防止法西斯东山再起，这也是我们支持共产党的充分理由。

正是这种思路而不是遗传层面的亲缘关系，强化了共产党对犹太人的吸引力。

当时（后来也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将个人对共产党的判断与人们对苏联的看法区别开来。那些热衷苏联的人，同情匈牙利共产党；那些反感或者仇视苏联的人，很厌恶匈牙利共产党。

1945 年 1 月到 2 月，苏联军队赶走了德军及其帮凶匈牙利箭十字党，所以，我从心底里认为我们已经获得了解放。我把苏联士兵视为拯救了我生命的救星，我对他们在解救我们时所付出的沉痛代价充满感激之情。这种感激之情使我不愿承认许多红军战士的流氓行为，而他们的长官居然也容忍了这种行为。我在前一章说到了奇怪的强盗行为，即在解放的那一刻，红军抢走了我们的手表，当时我认为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然而，在我看到我们家数次被劫掠之后，我再也笑不出来了。一群俄罗斯士兵挥舞着冲锋枪破门而入，把我们赶进防空洞，然后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打包劫走了。抢劫我家的士兵中，有一个成了“常客”，数次抢劫了我家。（我们都称呼他为 *Bunker Idi*，俄语，意思是“到地下室去”。因为他每次挥舞着枪把我们赶到地下室去的时候，都会这样大叫大嚷。）

我的一位好朋友绝望地告诉我，苏联红军还强奸了他的母亲。

有几次我也被带去 *malinki robot*（做些简单活儿），有时候是在布达佩斯挖机枪掩体，有时候是在布达佩斯之外被派去遛马。幸运的是，我总是能找到回家的路。那时候，我们已经听说很多平民被带走干些简单工作，但随后又与战犯一起被带回了苏联。

心理学将发生在我身上的现象称为认知失调还原。多年来我把这些可怕的经历尘封在我的潜意识里，这些经历一旦浮现出来，就会削弱我对苏联的信心。或者说，我努力在为这些不可饶恕和无法接受的行为寻找某种解释，为之开脱。同时，我对苏联的信任已经逐渐强化到无条件的盲信地步。

在我转而讨论促使我发生这些变化的其他诸因素之前，容我讲讲我的犹太人身份。从我向共产党靠拢开始，我对犹太人的认同感几乎消失殆尽，至少在我的意识层面是如此。有一次我的一位老同学告诉我，他准备移民以色列。这种前景一点都没有让我心动。* 我从来没有因为犹太人遭受的苦难而产生过任何

---

* 当然，我可以移民到其他国家，不仅仅是选择移民以色列。在我的一生中，当时或以后，我多次面临留在匈牙利还是移民国外的选择。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复仇的想法。共产党领袖中有多少是犹太人，对我而言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为，尽管他们有犹太人身份，但并没有让我跟他们有亲近感。另一方面，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这种犹太人身份会使他们在长期受反犹太人思想影响的匈牙利社会受到排斥。

我自然而然想到了我的姓氏科恩豪泽(Kornhauser)听起来像德国人，也表明了我的犹太背景，所以我想换一个姓氏，比如听起来更像匈牙利人的科尔奈之类。实际上，并没有人建议我这样做，我是自己决定改姓的，这也是我为抵消受歧视的痛苦经历，“融入”匈牙利社会所做的努力。

当然，由于匈牙利法律和公共生活的变化，我很容易就削弱了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认同。你不再需要在正式表格上注明自己的宗教信仰，也没有人再用排斥的口吻谈论“基督教课程”。在法律制度中粗暴而公开地表明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已经消失了，犹太人区的隔离和禁闭也没有了。私下或非正式的歧视也日渐消失或遭到禁止。* 在那两年里，匈牙利社会在这一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匈牙利社会正朝自由主义社会前进。

当公开的反犹主义再次出现在人们眼前，人们已经可以从广播和报纸上听到或读到的时候，我又开始担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了。我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这一时期时，会做详细叙述。

之前我曾经谈过，作为一名犹太人，我所经历的创伤也是把我推向共产党的一个缘由。我还说过，随着我向共产党的靠拢，我的犹太人身份也在我心中消失殆尽(或者说进入了冬眠期)。** 我认为这里不存在矛盾，这两个过程在心理上是连在一起的。我周围的共产主义气氛越浓厚，我就越感到有一个犹太人身份的意义并不大。

遭受羞辱、污蔑和歧视的记忆，促使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犹太人参加了这个不从种族和宗教划分各色人等，并对我们一视同仁的共产党团体。从一开始，共产

---

* 那些搬进犹太人公寓并占有了他们财物的人，不太愿意看到犹太幸存者回来。而且，那些在1945年就反犹太人的死硬分子，1945年之后仍然仇视犹太人。最初几年他们甚至还有反犹太人计划，但这些事情一般都很隐秘，至少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类似的事情。

** 我的情况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数十年后，我碰到一些父母是犹太人的“干部子弟”，他们的父母与我同时加入了共产党。干部子弟们告诉我说，虽然纳粹的法令让他们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他们现在认可自己的匈牙利共产党员身份，而不认可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在有人提及他们的犹太背景时，他们会觉得有些尴尬，这种尴尬不是因为他们对犹太人身份感到耻辱，而是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身份与他们无关。

党的哲学就给我们灌输了各种偏见，但其中不包括种族主义。我周围的共产党人从来没有问过我的宗教信仰，也没有问过我父母或祖父母的宗教信仰。但他们接受我成为了他们的一员。在经历了可怕的种族歧视所带来的心灵创伤之后，这种被人接受的感觉让人非常舒服，也非常具有吸引力。

思想转变和对共产党政治思想的接受

我在前文力图重现的，与其说是严密的思想发展的逻辑顺序，不如说是一种情感上的因果关系，与之平行的则是思想发展的顺序。对我思想转变的分析揭示出，这一心理过程与作为犹太人或者 1944 年的心灵创伤并没有什么关联。这是一个新思想与旧思想产生冲突，旧思想最终完全被新思想取而代之的例子。我在描述自己思想的转变过程时，极力避免让读者产生一种印象，即接受共产党思想是促使我的思想发生转变的主要动力。我的思想转变过程并不适用于那种简单的模式，即一名举棋不定的知识分子受共产党小册子和演说的蛊惑，认定了共产党就是他的归宿。

在谈到我 1944 年之前的生活时，我说过，我对世界的看法是开放的、灵活的。我狼吞虎咽地阅读了大量书籍，而且很容易就受到我所碰到的任何一种强有力的思想的影响，直到又碰到一种新思想，前一种思想才会从头脑中被驱逐出去。

1945 年初，我读书的时间大大减少，因为我不得不在几个星期内完成一年的学校课程。但我仍然坚持读报，了解事态的发展。战争局势和苏联军队的出现，让我的注意力转向了苏联。当时，我对后来花费了几十年时间进行研究的主题——即共产党体系的运行机制——一无所知。但是我意识到了苏联军队的能量，我也亲眼见到苏联军队将令人生畏的德国军队从我的祖国赶了出去。很显然，苏联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一个与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新世界。我开始相信，这个新世界会战胜旧世界。同时，我也发现（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一些苏联士兵（就是让我获得解放的同一批人）对待匈牙利平民非常粗暴，而且常常犯下一些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努力在头脑中对这两种因素——我对未来的信念和我眼下的经历——进行调和。大约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写作的需求，这样我就撰写

了一篇很长的论文(我今天则称之为随笔),题目是《雪下的种子》。很遗憾,这篇论文的手稿已经找不到了,不过我仍然可以非常准确地复述文章的内容。我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文化周期"历史理论来解释我面对的这个世界。在斯宾格勒眼中,人类并没有向前发展,而是不断经历周期性变化。文化经历产生、繁荣、衰落和消亡几个阶段。正如这位德国历史学家影响深远的著作《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的书名所表明的那样,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正好证明了这一范式。有时候,一种文化产生,充满了活力以及生猛而原始的力量,然后,这一文化在转化成一种文明的过程中,会由于内在力量的不断减弱而走向衰落。他宣称,西方文化周期已经走到了这后一阶段。

我的论文探讨了这样的观点,即苏联正处于一种新的文化周期的开始阶段,仍然处于粗犷而有活力且尚未转向文明的阶段。不幸的是,虽然野蛮会引发痛苦,但这种痛苦恰好标志着这一文化的年轻和鲜活。

我的论文的第二部分是对安德烈·奥蒂(Endre Ady, 1877—1919)诗的呼应:我全文引用了这首优美的诗,并以这首诗的题目作为我论文的题目。在经历过1944年的大灾难之后,这首诗中的某些诗句深深打动了我:"拷打并撕裂我吧……我在鲜血、呻吟和火焰中重新站起……"这首诗的另一句呼应了斯宾格勒的观点:"让我抬起头来,迎接新人类的新世界。"[2]

这篇论文中有几个地方的观点有些牵强附会,我对奥蒂诗的认同也有点装腔作势。1915年的奥蒂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与他的同道可以为新的世界挽救旧的价值。这也是诗题"雪下的种子"的部分涵义所在。但是,像我这样一个不成熟的年轻人能够从始于蛮横的势不可挡的新秩序中挽救什么旧的价值呢?

这篇论文是我人生中的第一篇论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一直是我唯一一篇带有原创思想的文章。这里还应提醒读者,这篇文章中也包括了一名少年知识分子多多少少的装腔作势。文章的逻辑也不太清晰,论点也缺少事实根据,但它确实具有某种原创性。当我开始检讨共产主义信仰为何长期窒息我的独立思考时,我仍然感到非常惊骇。

1946年初,我已经在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的布达佩斯总部工作了,我将自己在几个月前撰写的文章拿给布达佩斯总部的副总书记卡罗伊·琴代什(Károly Csendes)看。多年后,琴代什成了匈牙利的副总检察长,而且名声很臭。但当时他一点儿也不可怕。相反,他看起来非常安静,而且善解人意。他看过我的文章后,还把文章拿给哲尔菲学院的几个朋友传阅,哲尔菲学院是年轻左翼知识分子

聚集的中心，琴代什认为，他们比他更博学。我从他的评论中了解到，我的文章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甚至还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哪部作品像我的文章那样，有如此宏大的抱负。此外，尽管我的观点有些奇怪，但他很高兴我在文章中宣称自己赞同新秩序。然而，他最后的结论却说我的思想非常混乱。他给我的建议是："你应该更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

在他给我这一建议之前，我已经怀着钢铁般的意志开始研究这些人的著作了。或许我阅读的第一本苏联作者的著作，就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很久之后我才了解到，这本书最初出版时，是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党史通用教材中的一章。我意识到，甚至那些自我标榜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也认为斯大林是用一种夸张的方式，简化、浓缩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但我不想在本传记中对马克思哲学进行全面评价，也不想对斯大林的著作进行分析。我希望记录的是，我第一次阅读这本封面印有斯大林身穿元帅服肖像的白皮小册子时，这本书对我产生的影响。

当时的情况是，斯大林既是一个大国的领袖，又是一场世界大战中战胜国的统帅，同时还是一位哲学家，所以我对他非常敬仰。我的脑袋里满是各种哲学断想、世界观和各种思想流派，非常混乱。但这本小册子却具有军事的精确性，每个论断似乎都很正确。事实上，书中的所有内容似乎都一目了然。这一特征也适用于分析许多著名哲学家试图用曲折论证(我当时这么认为)来予以解决或弄得更为混乱的重大问题。斯大林用简单的句子对这些问题一锤定音。我就是被这种连老练的批评家也找不出错的简单性所吸引，我觉得他的这种写作方法非常简单易懂，而且条理清楚，叙述连贯。

说来遗憾，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师从来没有在哲学讨论会上讨论过这本书，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告诉那些容易上当的学生，这本书的浅薄之处，作者自相矛盾的地方以及站不住脚的论证思路和分类方法。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讨论过这本书，也没有机会思考他人对该书的质疑。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试图自己挑选自己的必读书籍(安托尔·塞尔布和米哈伊尔·鲍比契给了我专业上的帮助)，鉴别哪些是好书，哪些是最重要的书。现在我采用同样的方法选择政治读物。我确信，最好和最有影响的书籍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这几个人的著作是我必须首先完整了解的。由于这几位的著作可以放满一家图书馆，所以我必须从中挑选出最重要的那几部。各种"选集"显然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因此我从这里入手，迅速消化书的内容。一两年后，我认为我自己已经精通了马克思主义，因为我已经阅读了经典作家的所有重要著作，并对哪本书探讨了哪些问题了如指掌。

最重要和最艰难的任务就是理解和消化马克思的《资本论》(*Capital*)。那时候，我与友人彼得·肯德一起工作，他是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报纸《匈牙利青年报》(*Magyar Ifjúság*)的编辑，他在这个组织的布达佩斯总部工作。我和他同一办公室，我负责与教育和学校相关的事务。我们在下班后也常常见面。一开始，我们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决定，两个人一起创作一本关于民主军团的小说。我们想按照P. 霍华德(P. Howard)的风格来写这本小说(霍华德是匈牙利畅销小说作家耶诺·赖特的笔名，他借一位匈牙利人在法国外籍军团服役的经历，创作了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想用本地人反抗邪恶的殖民者的故事来宣扬民主。我们试着写了几页，一边写一边大笑不已。后来，我们认为应该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更有意义一些，因此我们不再写军团小说，转而一起阅读《资本论》。

我们读的是德文版《资本论》，并认真记了笔记。虽然我们各自都做了读书摘要，但我们基本上通过逐行比对我们对马克思原文的理解来阅读这本书。这本书的语言对我们没有难度，但是书的内容很难懂。我们之前都没有学习过经济学，如果我们这时已经熟悉李嘉图或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就很容易理解哪些理论是马克思借之于李嘉图和斯密的，哪些理论是他不同于李嘉图和斯密的。完全没有这些前期准备使阅读这本书更为吃力。

我现在还保留了当时的手写笔记。我和彼得花费了好几个星期才读完了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我自己学的)。我们坚定而孜孜矻矻地一页一页往下读，在笔记中斟酌每一句话。我和彼得就像教徒阅读《圣经》一样，怀着崇敬与谦恭之心全身心地阅读这本书，认认真真地对待书中的每一个字。

我在前文中并没有对斯大林的著作给出批评性分析，这里我也不会对马克思的著作做出批评。这个任务已经由其他学者完成了。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会对马克思主义做一些评论，但在这里，我只想谈谈当时《资本论》对我的影响。

《资本论》很让我着迷。它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虽然这本书的思想很抽象，而且采用的是德国人常用的写作风格，但马克思的论证很清晰，逻辑性很强。如果你能够接受马克思的前提条件、概念框架和论证方法，那么书中所有的论述就顺理成章了。当他运用剪刀一样锋利的逻辑从基本观念中推导出最初的结论时，这些结论马上就成了进一步推论的起点。用卡罗伊·琴代什的话来说，马克思的思

维似乎从来都不会混乱，而且非常清晰。像我这类曾经疯狂地在上百种书中寻找启蒙之光的 14—16 岁的年轻人，从这本几千页的书中，发现了灿烂的阳光。

《资本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逻辑和明晰，但我尊崇和热爱《资本论》的另一个原因，是作者在书中倾注的热情，而不是沉郁和冷漠。书中在谈到资本家对童工的虐待和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时，字里行间都充满愤怒。

但马克思并没有让逻辑分析屈从于他的感情。数十年后在我开始从事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批评时，我力图向人们表明，类似于短缺或强制性增长这类失调，是如何源于制度本身，而不是源于人们所犯的错误。我在阅读《资本论》时学到了这种分析方法，直到今天它还实实在在影响着我的思维。

我在阅读《资本论》时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成为一名经济学家，这一念头之前从来没有在我脑子里出现过。以前，我关注的多是文学、历史和哲学。在我和彼得的共同学习快要结束时，我对今后的专业方向已没有了任何疑虑，当时我唯一不确定的，是我如何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

马克思的著作充满了知识的傲慢。他尊重李嘉图和亚当·斯密，如果他的看法与这两人有区别，他说话还比较客气。但如果他的观点与他的同时代人和学术对手有分歧，他就不客气。“他甚至不知道……”或“他显然注意不到……”，等等。在其他书中，马克思也同样充满了知识的傲慢和骄傲。而在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里，对思想对手也有同样的傲慢和褊狭。我非常羞愧地承认，当时我确实被这种傲慢深深打动了，我没有产生反感。这就是他们对待对手的方式！

另一个极大影响了我思想的人是捷尔吉·卢卡奇（György Lukács），虽然他的影响不如马克思那么强。就在我阅读《资本论》的那段时间里，我看到了他的文化研究著作。[3] 卢卡奇关于“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的理念，为我提供了将我 1944 年前的文学经验与我新近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调和起来的有益桥梁。如果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仰基督教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沙皇的狂热支持者，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巴尔扎克是个反动派，或者托马斯·曼（Thomas Mann）是个彻头彻尾的布尔乔亚，情况又如何呢？没问题，捷尔吉·卢卡奇已经令人放心地谈到了。你不需要关注这些学者的哲学观点或政治立场，关键在于，这些人都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是描绘现实的作家。卢卡奇给我打了预防针，不让我受到这些作家的哲学观或政治思想的负面影响，但又让我保留了从儿童时代起就对他们的著作怀有的敬仰。

我认为卢卡奇是个绝对权威，托马斯·曼对他表达的敬意也证明了这一点。[4]托马斯·曼的著作是另一座连接我的新旧思想框架的桥梁。阅读托马斯·曼不仅让我眼界大开，而且让我陶醉于文学体验。如果曼认为某人伟大，那么那个人一定伟大。* 由此我无法原谅卢卡奇，因为他从来没有表达过对苏联的异议。他曾经去过苏联，他也亲眼看见过苏联体制的真实状况。他知道苏联的公审秀，迫害无辜的受害者，对他们采取恐怖行为。但他回到匈牙利之后，他怎能不对这个或许并非事事正确的体制有所暗示？我当然也能理解他心中的恐惧，但他或许可以选择沉默，而不是用他的声望来掩饰某些罪行。很多像我一样年轻幼稚、容易上当且缺少经验的青年知识分子，盲目相信苏联美好生活的神话，原因之一就是连卢卡奇也没有表示过任何怀疑。

随着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一步了解，我日渐确信，我已掌握了理解这个世界的钥匙。不管出现什么问题，我都拥有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知识。生活中出现的所有现象，我都可以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坐标体系中，或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反驳。这种信念还使人滋生出一种比傲慢的论战风格更为危险的思想傲慢。但对于我这种追寻秩序和明晰的年轻人来说，这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有吸引力的一面。

在我青少年时期，一些研究匈牙利农村的学者描述了匈牙利农村的贫困，其他作者的文学作品也激发了我对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同情。1944 年我在生活中的直接体验，进一步加深了我从书本间接产生的这种感情。虽然只有几个星期，但我亲眼目睹过砖厂工人的生活状况。我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后，这种自发的同情便有了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了工人和农民受剥削的原因。但我新近学到的这一知识，并不鼓励我与那些我开始了解和热爱的穷人建立一种密切的联系。它只是鼓励我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全身心投入社会改造之中，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最终能永久地消除贫困。

魅力超凡的人物

除了马克思的著作之外，另一个吸引我向共产党靠拢的因素，是某些共产党

---

* 我第一次阅读卢卡奇的著作时，就听说托马斯·曼如何满怀敬意地谈起卢卡奇，但在很久之后我才读到了曼对他的评论。

领袖的口才和人格魅力。

后来，我认识了约瑟夫·雷沃伊（József Révai）本人，在此之前，我只是在会议上听过他的讲话，或是在某些场合听过他的演讲。他的著作和他在党报头版上发表的文章，与他的演讲一样吸引人。对于我来说，他本人代表了共产党知识分子的最高水平。

雷沃伊可能是个极富煽动性的演讲人。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演讲和文章的清晰的逻辑性。我觉得，他不仅立论明确，还可以用清晰的结构将自己所要表达的观点组织起来，使之令人信服。雷沃伊还是一名出色的辩士，他常常在论辩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对手驳得体无完肤。他的表达总是无懈可击，措辞考究，旁征博引。现在我听到一些政治家语无伦次、单调乏味，甚至语法错误，虽然很同情他们的主张，但私下还是希望雷沃伊的修辞天赋能传给他们一些才好。

现在我知道，约瑟夫·雷沃伊在很多基本问题上都欺骗了我们，用有害且应受到谴责的思想，毒害了我们的心灵。但他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和学者，他用严谨的逻辑在演讲和文章中推广他所狂热追捧的信仰和信念，成功地影响了很多年轻人。

另一个具有超凡魅力并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是欧文·霍洛什（Ervin Hollós）。当然，他的才华和公众影响力无法与雷沃伊相比，我在这里提到他，是因为这一阶段我和他在一起工作。我在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布达佩斯总部担任高级职员时，他是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的总书记。我在运动中的工作受他直接指挥，我也参加过他主持的党内研讨会。1956 年以后，具有中校军衔的霍洛什，负责警察局报复性审判（reprisal trials）的前期准备工作。他可能早就和国家安全局有联系，事实上，他也确实与他们有联系。1956 年后，他就成了残酷镇压行动的主要组织者。不过，我们还是不要过早涉及这段历史。我现在所讲的是年轻的欧文·霍洛什，我还在罗兹萨街的民主青年联盟总部工作时，就已经多次听到和见过他了。

他不像雷沃伊受过那么多的教育，似乎也没打算接受教育。他向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传递了他内心的信念之火。他拙于言辞，谈话的语气和表达也常常有违语言习惯，但他的言语中总是闪烁着火花。他非常确信他所信奉的真理，他无法设想还有人与他的看法不同。在卡达尔执政时期（1956—1988），共产党官员非常缺乏这种信念。我还要多说一句，在议会民主制度条件下，当今许多最杰出的政治家，也缺少这种信念。

欧文·霍洛什将许多思想灌输进我们的头脑，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斯大林所说的真正共产党人的特征）。我第一次听他说，区分共产党人与伪共产党人或其他人，只能有一个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就是无条件地将自己奉献给苏联。我重复一遍，是无条件奉献给苏联，而不是奉献给马克思主义，或奉献给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奉献给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名共产党人就是一名无条件忠诚于苏联的人。这种想法促使欧文·霍洛什直接投身于对反苏联统治的反叛行动的报复性审判。

正是欧文·霍洛什将“职业革命家”这一称谓深深地印在了我心里。我们这些在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工作的全职人员（类似于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官员），不是某个活动的工作人员，也不是某一组织的雇员，而是一名职业革命家。虽然当时也有其他职业政治家，但我们跟他们不是一路，因为我们而且只有我们才是革命者。我们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与反纳粹共产党运动中的英雄、与苏联军队中的政治委员以及殖民地独立斗争的领导者身份相同，我们都是共产党人。“职业革命家”这一称谓赋予组织群众运动这一平凡的工作以尊严。这一称谓在我们心中激起的不仅仅是骄傲，还有一种优越感和自我满足感。与那些非职业革命家或普通党员的工作相比，我们的工作更有价值，也更让人兴奋。如果将党视为先锋，那么我们就是先锋中的先锋。

对组织的归属感

现在回过头来讲讲我的早年岁月。1945 年春，我正在基什孔豪洛什镇读书，但好几次回布达佩斯探亲。1945 年的 5 月 1 日，我又返回布达佩斯，漫无目的地行经安德拉希街时，突然惊讶地发现一支“五一”劳动节的游行队伍从我身边走过。除了在新闻片中看到过纳粹游行场面外，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游行队伍。游行队伍中热情洋溢的人们打着红旗、匈牙利三色旗和各色旗帜，我内心涌上一种愿望，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加入他们的队伍。

我在前面简要列举生平事实时提到过，我在 1945 年参加过青年运动。现在，为了阐明我归属共产党的必然性，必须返回来谈谈这件事情。那是 1945 年的夏天，我的一位年轻朋友提议去圣伊什特万大道 12 号看看。圣伊什特万大道 12 号的这幢房子曾经属于箭十字党，现在是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的办公室，而

且经常组织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因此我就过去了。到那里时，有一个人正在发表演讲，人们都很友好。我后来又去过几次，在那儿，人们热情询问的氛围让我感到快乐。几个星期之后，我参加了这一组织的工作，这是我生命中参加共产党活动的开端。

我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组织的集体远足，参加了午后的舞会以及青年人聚会，活动越来越频繁。秋天，我们还出去为第一次议会选举张贴宣传海报。事实上，在此之前或之后，我从来都没有像在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第五支部时那样，有一种强烈的小团体归属感。

后来，成为共产党这个大团体的一员比成为民主青年联盟这个小团体的一员更吸引我。到了这时候，已经属于第四个阶段的问题了，在这一阶段，就不仅是要成为积极而忠诚的党员，还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

经验老到的共产党人在这一发展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模仿他们的行为。我周围有很多资深共产党人。举一个例子，我在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的全国总部工作时的顶头上司，是安德拉什·海盖迪什（András Hegedűs）。安德拉什的一生爬得很高。他先担任艾尔诺·格罗（ErnőGerő，党内第二号人物）的秘书，后来又出任农业部部长，最后成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在他担任总理期间，他签署了 1955 年的《华沙条约》，后来又在 1956 年匈牙利革命爆发后，签署了请求苏联出兵的信件。再往后，他与斯大林主义决裂，成了具有相当思想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和学术领袖，获得了地位，受到了尊重。不过，在我最初认识他时，他一点都没有显示出后来的这种发展趋势。他不像欧文·霍洛什那样，是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但我仍从许多方面看出，他是一名典型的共产党人，这并不仅仅因为（在当时的很多事情上）他的倾向与我相似。安德拉什从不像霍洛什那样，心中燃烧着信仰之火。他更为客观，讲求实际，不过他也显示出一名布尔什维克的无情和一贯正确。他还是一名极为勤勉、永不懈怠的工作狂。霍洛什用他的言辞和教诲影响了我，而安德拉什则用他的行动为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觉得他就是我应该效仿的典范。

机遇和我的个人能力

很久以后，我开始为自己制定长期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计划或

策略。但在我现在谈论的这一时期中，我脑子里还没有半点这种计划的影子。在本章的开头部分，我勾勒了成为共产党人的五个阶段，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通过所有这些阶段。在我从一名远离共产党的普通人转变为共产党的同情者时，我甚至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以我当时的年龄而论，我读了很多书，不缺乏推理的技巧，但与我的思考能力相匹配的，却是我的天真、肤浅以及缺乏责任感。这就好像我在闭着眼睛攀登陡峭的梯子。在我撰写本传记的这些日子里，每当我在畅销的匈牙利商业周刊《世界经济周刊》(*HVG*)的最后一页，读到简短的访谈，看到受访人玩世不恭地承认，他们加入共产党只是为了推动自己的职业生涯时，我总是感到愤慨。虽然我过去的一些思想和决定让我良心不安，但我可以坚定地说，我的举动并不是出于玩世不恭的投机动机。

有时候，机遇会改变人的生活。如果我的那位朋友没有跟我提到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第五支部，如果他向我推荐的是当地的社会民主青年俱乐部，而我又恰好发现那里的人们非常和善，我在那里过得很开心，那么，谁知道我会不会加入社会民主青年俱乐部呢？

我在第五支部办公室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清理会员的记录。这些资料乱七八糟地摆放在那里。我多次说过，我天生擅长保管记录和整理文件，擅长对信息进行分类和管理。现在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施展我的才能。出色完成清理文件的工作引起了人事干部的注意(当代商业术语称为人力资源部经理)，他们马上交给我更大的宣传任务，这就意味着我要组织各种教育活动和会议。这些事情我也干得很出色。

接下来机遇再次降临。后来成为哲学家和匈牙利科学院院士的约瑟夫·卢卡奇，当时还在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的布达佩斯总部工作，工作性质与我相同。他想放下这份工作，将全部精力投入大学的教学工作。他正在寻找接任人的时候，有人向他提到了我，这样我们见了面。我记得我们在大街上漫步了几个小时，卢卡奇一口气向我介绍了所有的工作情况。我的脑袋一下子塞满了所有我必须接触的人的名字，塞满了我必须到处传播的知识，所有这些名字和任务我在之前都不熟悉，弄得我脑袋乱哄哄的。面对这些情况，我虽然有些担心，但还是接受了这项工作。与卢卡奇谈话之前，我甚至从未想过我将会在一场大型的群众运动中成为领取工资的全职工作人员。当机遇来临时，由于这项工作似乎很有意思，所以我接受了。从上级机关的角度来看，我是从“干部工作”中挑选出来的。很显然，卢卡奇也考虑了支部的干部，也听取过支部书记或人事干部的意

见，最后选择了我。但从下级的角度，从我的视角看，这是一种机遇。根据一些经济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行为不是遵循某种策略的结果，而是抓住机遇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前进的结果。这个模式适合我当时的人生阶段。

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1945 年秋天，我在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布达佩斯总部得到了一份全职工作。“全职”意味着我的工作档案要存放在那里，而且我从早到晚都要从事青年运动工作。我在那里虽然有份工资，但因为通货膨胀，所以工资不断贬值。虽然我的工资不多，但至少可以让我不再从母亲那里拿钱了，这时我仍然与母亲和姐姐住在一起。她们或许对我全身心投入的工作有自己的看法，但她们从来没有跟我提及。她们完全同意，我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只是在她们不叫我的名字，而是叫我“MADISZ”时，她们才流露出对我的一丝揶揄。*

我投身共产党的运动之后，很快就一路高升。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属于共产党极需却又十分缺乏的干部人才。

一方面，过去的布尔乔亚生活使我有一种良好的素质，我读书较多，行为举止得体，语言知识丰富。另外，我的组织能力和交际能力不久也显现出来。另一方面，共产党或许相信我的绝对忠诚，我明显没有什么不可信任的地方。作为一个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新成员，我比那些久经沙场的老成员更加渴望融入这个组织，得到组织的承认，遵循共产党人的行为规范。在共产党还是非法组织的年代，它的所有老成员都会时不时地与组织有些冲突，但像我和我的同龄人这种渴望入党的新成员就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似乎更为可靠，也更加容易改造。

尽管在当时的报告里，没有花费这么多口舌提及我的这些素质，但主管人事的官员还是凭直觉认识到了我的这些素质，所以我得以在事业发展的阶梯上步步高升。

---

* 那些年，蒙约常常靠变卖家里的珠宝勉强维持生计。她也做了几次生意，但最终都没有成功。她曾经听从女婿的建议，买下了布达佩斯最好的咖啡店，价格非常低。这家咖啡店的店名叫做“纽约咖啡店”，一直以来都是作家和艺术家雅聚的场所。她努力想搞活生意，但没有成功。不久，她被迫卖掉了咖啡店，损失惨重。她经营这家咖啡店期间，喜欢请我进去喝一杯漂浮着奶油泡沫的热巧克力，还给我配上一块蛋糕。在那间装饰着匈牙利伟大画家卡罗伊·洛茨(Károly Lotz)的壁画，有着著名的螺旋圆柱的大厅里，蒙约默默地坐在我身边，看着我这个饥饿的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成员将这杯热饮一饮而尽。

注 释

[1] Stalin, 1953(1940), 6:47.

[2] Ady, 2004, p. 724.

[3] Lukács, 1973(1945), 1978(1950).

[4] 了解托马斯·曼在20世纪20年代初对此发表的评论,参见 Réz, 1961。

3. 在党报工作：1947—1955 年

1947 年夏天刚刚来临，我收到了共产党的中央日报《自由人民报》(*Free People*)编辑的口信，说他们想请我去报社工作。那时候，彼得·肯德已经在那儿工作一段时间了，他把我的情况跟报社编辑委员会资深委员米克洛什·瓦沙尔海伊(Miklós Vásárhelyi)说了。对此邀请，我感到荣幸和兴奋，所以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

1947 年 6 月，我进入《自由人民报》工作，8 年之后，1955 年夏天，我受到纪律处分，被报社开除。在报社工作的最初 6 年中，我信念坚定，无条件地献身于自己的工作。1953—1954 年，我的世界观基石开始出现第一道裂缝。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阐述我的醒悟过程，本章则主要讲述在报社工作前 6 年的情况。

一帆风顺

进入报社后，报社安排我到国内政策部工作，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米克洛什·吉迈什。谁会想到这么一位寡言少语，且对共产主义满怀信心的人，会成为 1956 年匈牙利革命的英雄，并牺牲在绞刑架上？我进报社几天后，我所在的部门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要对一位因某种原因出了差错的同事进行批评，但吉迈什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位同事进行严厉谴责，所以他想让米克洛什·瓦沙尔海伊用轻松的口吻说说他，但如果有必要，也可以尖锐一点。

几天后，我得到了第一个任务，报社新买了一辆车，需要磨合一下，但让车到外面空跑也不合适。报社的一位编辑奥斯卡·贝特伦(Oszkár Betlen)对我说，

圣彼得和圣保罗节快到了，又恰逢大丰收年，可以写一篇舞动镰刀庆丰收的报道，就由我来执笔。以前我从未写过新闻报道，也从未亲眼见识过收获粮食的场景，但不管怎样，我们开车出发了。我们开着车沿途边看边走，后来我就写出了我的新闻处女作。第二天，我的这篇报道登在了《自由人民报》上。

此后，我的作品就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其中有报道，有访谈，也有简讯。大约在 6 个月之后，我撰写了平生第一篇社论，社论刊登在 1947 年 12 月的报纸上，我的姓名的首写字母也出现在报纸上。这篇社论对前几个月的投资情况进行了分析。

虽然我并没有接受过经济学训练，但我还是要承认，我对经济问题很感兴趣，我也希望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报社有一些人专门负责经济问题报道，所有这些人都在国内政策部。

大约两年之后，我又升了职，这次是升任为报社经济部的负责人。同时，彼得·肯德也升任为对外政策部的负责人。当时，我们都是 21 岁，都有了三四年的党龄。报社的编辑们，即马顿·霍瓦特、奥斯卡·贝特伦、米克洛什·瓦沙尔海伊以及盖佐·洛松茨基向总编约瑟夫·雷沃伊提出要提升我们时，总编明显有些不悦。他回答说："你们到底在琢磨什么？想把报社变成托儿所吗？"但最终他还是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雷沃伊并不赞成对我的任命，但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匈牙利文版出版后，他发现我是读过德文原版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就把写书评的任务交给了我。

1949 年，报社送我去党校学习，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要在党校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集中培训。由于我是报社的常任代表，所以我经常参加共产党的最高经济机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会议。经济委员会的主席是艾尔诺·格罗，书记是伊什特万·弗里斯(István Friss)。经济委员会商讨所有重要的经济决策，然后再用提案的形式交到政治局投票决定。有机会参加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荣誉，这表明我的工作也得到了认可，我因此两次获得政府奖。

1952 年，《自由人民报》让我全程报道党和政府代表团对民主德国的官方访问。我被选上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可以毫无困难地将报社要发表的材料从德文译成匈牙利文。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考虑可能是对我非常信任。任何一个与马加什·拉科西(Mátyás Rákosi)和艾尔诺·格罗同乘一趟政府专列的人，必须绝对可靠。

这就给我带来一个重要问题：我在那个时期升职如此迅速的原因是什么？

当时，我从来没有与我的任何一位上司谈过这个问题，但我还是愿意找到一种解释。我在这里不想寻找自身原因，这个问题留待稍后的章节讨论。我只想谈一下我的上司的用人标准，用我今天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来解释我的这种情况。

在共产党体制下，政府人员的任命、升职和免职有两个主要的标准。一个是对共产党的忠诚，另一个则是个人能力。当然，也会有很多其他的衡量因素，但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最大。在考虑任命之前，人事部门会根据职位的要求，考量候选人是否具有最低程度的忠诚，如果候选人的能力有所欠缺，那就需要有对党的更大的忠诚来弥补才干的不足。反过来也一样：出类拔萃的才干也可以用来弥补政治热情的欠缺。当然，如果一名候选人在这两个方面都很强，那么他获得提拔的机会也越多。

一名经济学家阅读本书，可能会觉得绘制一条无差异曲线，取忠诚和能力为两个变量，就可以清楚地揭示决策者所面对的两个标准了。平行的无差异曲线的位置越高，任命的职位也会越高。因此，部级干部的无差异曲线肯定高于部里各部门负责人的无差异曲线，而总编的无差异曲线，肯定也高于一名实习记者的无差异曲线，依此类推。国家之间的无差异曲线会有不同，时间不同，无差异曲线也会不同。在先前闹革命的时候，最看重忠诚，到后来对技术要求比较高的时期，能力的重要性则相对强了一些。不同领域中的无差异曲线也有区别，而且差异非常大。比如，大学的学术领域的无差异曲线与政治领域中的无差异曲线，就有很大区别。但所有领域的共同特征，就是选择标准的双重性。

在雷沃伊发表“托儿所”的高论期间或之后，用这两个标准对我作出的评价确实都很高。就能力而言，我非常幸运地把资产阶级的博学，包括在家中学到的语言知识，与积极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结合到了一起，我能够迅速地用精确的匈牙利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很快，我也显示出良好的交际能力。我能引导受访者与我交谈，也能邀请到高层人士接受访谈。在我负责报社国内政策部时，我的领导能力也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具备这些素质之外，我对党也非常忠诚。那些了解我的上级认识到，尽管我具有上层资产阶级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但我完全认同共产党的思想。在报社考虑任命我为栏目编辑时，还有一位同事即后来的《文学新闻》(*Literary News*)编辑捷尔吉·内梅什(György Nemes)也在考虑之列。他比我大 15 岁，富有记者工作的经验，写得一手好文章，还有经济学学位。为什么选择我而没选择他呢？这里不说私下传递的小道消息，仅从当时的形势而言，我相信，主要原因

是上级更信任我。在上级领导的眼中，年轻和经验不足绝不是缺点，而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我年轻而且缺乏生活经验，所以更容易被引导。我只会毫不犹豫且坚定不移地为共产党献身，不会对党有任何怀疑。

各种激励

在谈完了上级对我的看法后，我还想就我这个时期的经历，写一份关于“内心感受”的报告，我会尽可能避免将我现在的思想掺和进去。我在这里只考虑我当时的想法和感受。

我的言行和思想，主要源自我的信念和信仰。我全心全意地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我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每句话都是真理。我对共产党充满信心，我接受这样的理念，即党就是真理、纯粹的道德和为人类服务的信念。我从未想过，我对斯大林或拉科西的崇拜和尊敬会被说成是“个人崇拜”。而且，因为我认为他们著作和演讲中的逻辑和观点，都非常让人信服，这也增强了我对他们的信任。

将统治共产党体制的官僚机构约束起来的一种力量，就是恐惧。可以说，我在那些年里生活没有一时一刻感受过这种恐惧。我确信，那些被捕和受审的人，肯定是有罪的。后来，在我认识到真相并与朋友一起讨论拉科西时代的恐怖状况时，很多朋友根本不相信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当时的恐怖气氛。虽然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但当时就是这样。我不是为我的冷漠或置身事外而感到需要自责，而是为自己的盲目和自绝于严酷的现实而感到自责。

只有一次，我造访过位于安德罗什街 60 号的国家安全局总部。与国家安全局联系并不是我的工作，但那一次，我不得不向安全局官员了解即将到来的一桩与生产有关的罪案的审判。我进入那幢办公楼，与安全局官员谈话，然后离开了，整个过程平静得像我去运输部或分区党部一样。我根本不知道那里会有刑讯逼供，也不知道无辜的人会被逼做虚假陈述。我丝毫也没有想到，我也会有被抓到这里的一天。

我在党校学习时，听说当时的外交部长拉兹洛·劳伊克(László Rajk)以及他的同党都被捕入狱的事情。我们只知道，政府主要指控他们阴谋颠覆匈牙利政府。我对这控告没有任何异议，或者说，我从未怀疑过这一指控的真实性。我

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一种如雷轰顶的感觉。当时和随后的几年中，我认识的一些人陆续被捕，有的则受到诬告。我相信自己的清白，确信自己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只是运气好受到保护而已。当时，完全不用什么明显的理由就可以逮捕我，就像当年许多被捕之人的遭遇一样。最近我查到秘密警察的文件，* 才知道《自由人民报》确实有一名告密者，用一些捏造的罪名告发过我。[1]

后来我了解了当时实际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情后，又回顾了那段岁月，我常常觉得自己就像个梦游者一样，我满怀信心地踏上了离地几层楼高的窗台，却没有摔下去的恐惧感。**

共产党的许多干部都有权力欲。读者可以感受到我在撰写这本回忆录时，有一种强烈的自责感。我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我敢说，我从未有过丝毫的获取权力的念头。这种权力欲与我的性格不符，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我从来没有拍过上司的马屁，也没有因为想要获得提升而拼命讨好他们。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我和报社的同事都因为自己《自由人民报》的身份而有某种傲慢情绪。我们认为我们是“党的声音”，我们的语言比其他报纸更有价值，也更为重要。我与同事、熟人或陌生人谈话时，态度和语调还是比较谦和的，不露傲慢的情绪。但是深层的思想决定了外在的行为。我们之所以傲慢，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不会犯错，其根源在于，我们认为自己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养，还有在《自由人民报》的地位。***

我并没有感受到我们享有的特权对我真有激励作用，然而，我们确实拥有较普通公民要好得多的物质待遇。

我 21 岁从家里搬了出来，住进了报社分配给我的“公寓”。当时，我这个年龄离家算是很年轻的了。由于我是单身，所以分给我的那套房子很小，家具也是

---

* 不幸的是，据说国家安全局 1956 年以前的多数档案都已经销毁了。至少，我没办法拿到更多的资料了。就我所知，应该还有其他指控我有罪的报告。

** 我原来以为，用梦游者这个词来比喻这种奇怪的盲目和闭塞的状况是我的发明，后来我发现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的学者艾尔诺·盖尔也在自传中使用过同样的意象（Ernő Gáll, 2003, pp. 96—97）。他说：“放弃每个人的独立思考，坚持一种完全不加批判的立场……当时，我的思想和行为可以比作‘意识形态的梦游’。”

*** 从那时候起，我经常碰到这种“神童现象”，即一种自认的学术傲慢。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匈牙利政界的青年人杰以及体制巨变后到东欧来的西方年轻顾问们。他们就有这种自认的学术傲慢。我并不倚老卖老，但在回顾并评价自己的青年时代时发现，这种“神童现象”主要是因为缺乏生活经验的年轻人很容易过分自信，因而易于受到极端思想推动的影响。

从政府遗弃资产委员会的仓库中挑出的很没品位的几件。1952 年我结婚了，妻子叫泰雷兹·洛基(Teréz Laky)，也是《自由人民报》的记者。由于第一个孩子快出世了，所以报社又分给了我们一套稍微大一点的福利房。这是一套位于环境优美的玫瑰山区的三居室公寓，我们用储蓄装修了一下房子，购买的家具都很便宜，是批量生产的产品，质量低劣，而且非常笨重。

《自由人民报》记者的工资虽说比其他报社记者的工资高，但也高不了太多。我在报社升职后，才获得了去度假胜地度假的资格，进入党的总部工作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资格。我在报社工作的九年中，一共出国四次，每次出国都只有几天的时间，而且多数都花在工作上了。四次出国，有三次去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一次去的是维也纳。那时，我进入报社时间还不长。去维也纳出差是一次特别难忘的旅行，我几乎没有游览任何景点。我从出差补贴中省下了一笔钱，为母亲买了几双漂亮的丝袜，心里则非常内疚。我现在还记得，我是在帕尔默商店买的丝袜，一位身穿绿色职业装、非常和气的年轻女士热情接待了我。我不停地责备自己，作为一名党报记者，是不应该到这种地方来花钱的。即使这样，我还是节省了一笔差旅补贴，回来后全部交回了办公室。毫无疑问，在卡达尔执政后期，那些毫无顾忌地用海外津贴中饱私囊的人，肯定会嘲笑我这种幼稚的清教徒做法。

报社、出版社和印刷厂的职工有一家集体食堂，食堂供应的食品并不丰富，但在当时，其他人都面临着食品短缺的问题，所以我们食堂的供应还算正常和充足。我们拥有的另一种特权，是可以到泉峪医院看病。这几个特权合在一起，成了人们玩笑中的 3K：到蓝山(Kékestető)度假，到泉峪(Kútvölgyi)医院看病，长眠在由党组织支付了费用的凯莱派希街(Kerepesi út)公墓。

当时，人们一般都接受政策制定者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教师提出的“按劳分配”原则，所以我觉得我有资格享用这些物质福利，我从未觉得我们得到的是额外的特权。我的童年生活很优越，与我的童年生活相比(或与西方记者的生活相比)，我在《自由人民报》的生活差强人意。这些福利之所以会被看成特权，只是因为在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里，这种生活高出了社会的平均水平。

我过的其实是苦行僧式的生活，而不是特权阶层的生活。偶尔，我们也会去欣赏歌剧、听音乐会、看戏，或者访友，但是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工作，奉献给了工作。

实际上，在报社的工作之外，我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生活。1952 年，我们的第

一个孩子加博尔(Gábor)降生那天，我还在值夜班。我当时认为，孩子的出生并不是我可以取消夜班的充分理由，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不停地给医院打电话，直到第二天清晨，我才去了医院，看到加博尔。我在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工作时期，以及后来在《自由人民报》当记者的时候，我的同龄朋友和同事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即我们是否应该放弃这种“职业党务工作者”的工作，开始一种普通大学生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全面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我早就义无反顾地准备好了自己的答案。任何事情都没有党分配给我的任务重要。很多党务工作者都没有大学学历，但他们也很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数十年后，我在美国的大学当教授，一想到自己的过去，我就会羡慕地看着我的学生。我们在那七年疲于奔命的工作中失去了青春，他们却可以无忧无虑地学习，为未来做准备，享受生活的快乐。

对我的心理状况和动机的这一描述，涉及我在《社会主义体制》(*The Socialist System*)中描述权力的凝聚力和干部动机时所提到的同样的因素。信念和信仰、权力欲、恐惧，还有特权，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效用。就我而言，主要的动机是第一个，即信念和信仰。我不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我就是一个平常人，但如果认为我在这一方面很独特或者与众不同，同样也不对。报社还有几个人，都和我的动机相同。

报社的生活

在本章涵盖的这段时间里，匈牙利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在我进入报社工作时，这个国家还由联合政府掌权，但其他党派也有自己的报纸。然而，共产党击败了所有与之竞争的政治力量，在当时的苏联占领军的鼓动和积极帮助下，完全垄断了国家权力，并建立了一个集权统治体制。渐渐地，《自由人民报》已经没有了真正的竞争对手。从政治上讲，《自由人民报》已经成为唯一的“官方”报纸，成了共产党宣传机构的主要喉舌和工具。匈牙利国内的所有政党组织和机关，都要订阅这份报纸，《自由人民报》还是每个党员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必读报纸。

正如我在前面所强调的，本书不想勾勒匈牙利的政治和社会历史，本书只是个人的生活史。所以，我甚至不想分析《自由人民报》在匈牙利扮演的角色。

后面几节的内容不会很多，范围也较窄，我只是想把报社的生活压缩成一幅静止的图画，谈谈报社生活的某些特征和事件，尤其是与我本人的生活有关的事件。

说《自由人民报》传达了党的声音，并不是空洞的老生常谈。总编办公桌上的电话经常在早上就响了起来，电话那头是马加什·拉科西，他不是在电话里批评昨天报纸上的某篇文章，就是发布一些指示。同样，有时打电话来的可能是格罗或雷沃伊。有时候，贝特伦参加完党的会议后，会召集栏目编辑们开会，向大家解释党的领袖分派给报社的任务。我就定期收到共产党中央经济政策部负责人伊什特万·弗里斯(István Friss)的指示。在某种意义上，我有两位上级，一位是报社的总编，一位是党的经济政策部门负责人。报社的其他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也同样受到双重领导。

对我们的控制虽然严格，但还没有到事无巨细的地步。从总编到各部门负责人都拥有充分的自主权。我这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当时就可以充分自由地决定我这个部门该写什么，以及该刊登我的下属撰写的哪篇文章。现在想想，我都觉得非常惊奇。

《自由人民报》的工作人员并不固定坐班，每天上下班的时间都取决于任务的完成情况。如果有需要，我们整个周末都要工作。没有人会强迫别人怎么样，工作纪律和牺牲精神是大家从心底里认可的事情。我不记得有什么人因为懒惰而受到批评，或许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确实不记得同事之间有什么互相攻击或互相诽谤的事情。我们就像战争时期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那样，是一个战斗的团队。

我在报社与一些朋友结下了终身的友谊。我与彼得·肯德的友谊因为我们在《自由人民报》的同事关系而进一步加深。有一段时间，我与帕尔·勒切伊(Pál Lőcsei)共用一间办公室，他后来成为了 1956 年革命的领袖人物。我们不久就成了关系较铁的朋友。他在我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将在下一章专门讲述这些事情。我们还和杜琪太太，也就是盖佐·福尼(Géza Fónyi)，娘家姓奥古斯塔·毛伊拉特(Auguszta Majláth)，建立了深厚的终身友谊。尽管每个人都称她为杜琪(就是胖大妈的意思)，但事实上她非常清秀苗条。杜琪太太负责管理《自由人民报》成千上万的档案资料，她也是档案室的创始人。她那套狭小的公寓塞满了各种书籍，是一个真正值得朝圣的地方。在《自由人民报》工作的那几年，我们这些人常到她家坐坐，聊一会儿

天。1956 年之后我们依然这样。*

现在回想那个时期，我发现自己愿意与下属建立一种比“上下级”关系更为亲密的关系，愿意与他们建立一种相互友好的关系。

在那种工作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然取决于个性。我们从奥斯卡·贝特伦身上，感受到了党的战士冷酷无情的严厉。他聪明能干，但也目中无人，而且对人冷漠，喜欢挖苦人。与此相对，瓦沙尔海伊则透着智慧、平和、幽默，喜欢善意的嘲讽。米克洛什·吉迈什善于明辨是非，加之学养深厚，分析能力很强，与他谈话会让人有一种智力上的愉悦。

对经济问题的理解

我从未专门学过经济学，也没有从经济学教师那里了解到社会主义经济表面上是怎样运作的。我对社会主义制度运行的初步了解，来自我在《自由人民报》工作时的切身体验。

我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亲身体验，在我后来的文章《经典社会主义制度》中有过描述。当时，我参加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会议，对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的涵义有过近距离的观察。比如，在市场经济中，第二年的生产计划取决于无名氏们的行为过程，即成百万个独立市场行为人的意愿。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则取决于艾尔诺·格罗，共产党赋予了艾尔诺·格罗管理经济运行的绝对控制权。党中央和政府机构会为他的决策提供建议，有时候，还会为他提供多种建议以供他选择。但是，他的决定就是会议的最终决定。我觉得他为人冷静、精于算计、聪明过人，但不善于表达感情。没有证据表明他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经济学家，但他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记忆力。在对经济政策进行争论时，他能够准确地征引所有的相关资料和信息，以及人们早就提出的各种观点。他的这种能力给这

---

* 革命之后，杜琪的书架上出现了两张照片，一张是米克洛什·吉迈什的，另一张是捷尔吉·萨科齐的。当时，在“城市派”和来自匈牙利农村并自认是“人民”代表的两派团体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分歧或裂痕。杜琪是两派之间的一座桥梁。她在《自由人民报》有很多朋友，后来，她又结识了伊姆雷·纳吉圈子里的人，也就是那些与城市知识分子有联系的人。在《回答》(*Válasz*)杂志社，也就是“人民作家”集中的地方，很多工作人员和编辑是她的朋友。长期以来，她就和杂志社的创办人捷尔吉·萨科齐是好朋友，捷尔吉的妻子玛尔塔不仅是她的朋友，后来还成了《回答》杂志的编辑、赞助人以及核心人物。杜琪已于 1988 年辞世。

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也强化了人们对这位首席经济学权威的尊敬。就我当时的经济学知识而言，我无法确定艾尔诺·格罗的经济决策中含有多少专业知识，但他的个性以及从他的言辞中散发出来的自信和认真的态度，都深深打动了我。

我经常有机会见到部长、副部长以及政府高级官员，与他们交谈。这些坦诚而专业的讨论可以揭示出经济的运行状况。我还经常下工厂采访，向经理、党委书记以及工长和工人了解情况。我的同事也会经常将自己的现场采访写成详细的新闻报道，这些报告也补充了我自己的直接观察。尽管我也怀疑某些受访者谈话内容的真实性，但通过大量的观察，我还是注意到了很多值得关注的事情。

准备撰写这本传记时，我重读了当年我写的那些文章，让我想起当时困扰我最多的问题。我在下面用括号标出了当年我就相关主题撰写的文章之标题或节选，以为对比阐述之用。这些标出的段落或标题表明，那时我已经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但是我的诊断是错的，提出的解决方法也完全不着边际。

比如说，我已经认识到，只有在严格实施纪律的条件下，集中制才能运行。但人们显然忽视了计划的纪律、工作纪律以及工资纪律。我就这一问题写过很多文章，但我一直是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寻找解决方法。当时我根本没有理解绩效与激励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向人民充分解释了纪律的重要意义，督促人民遵从上级的领导，对不守纪律的人实施惩罚，就可以起到示范作用。

在我发现工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计件工资的生产数字，或者发现工人们虚报工资盘的时候，我颇为困惑地发现厂长差不多默许了这种行为。我在文章里斥责了这些违反工资纪律的行为，并对那些纵容这种行为的企业经理和党务工作者进行了抨击。（“我们需要注重如何巩固社会主义的工资纪律和工作纪律”，我还写道：“只有劳动竞赛才能有助于完成工作计划……如果能够抵制工资的不合理增长，抵制不必要的加班。”）[2]我没有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国有体制无法回避的问题。国家的行政官员不是通过所有者（即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冲突协商机制来确定工资水平，而是通过实施工资定额来约束工人增长工资的努力。

有证据表明，工厂里存在各种浪费和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我有一篇专栏文章，题目就是《经济效益——劳动竞赛的关键任务》。）[3]为了寻求一种解决方法，我在很多文章里都谈到了经济效率的重要性，我力图让企业经理们相信，不

能只是提高产量，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也需要提高产品质量。然而，经济上和道德上的激励，都只是在鼓励他们提高产量。

我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毛病，根源就是企业经理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他们的生产组织能力很差，工作责任心不强，也不听取工人就这些问题给他们的警告。这些批评有时也延伸到政府部委和地区党组织的中层经济管理者。我还批评某些干部只会迎合群众，不敢拿出强硬的手段，用当时的流行术语来说，就是“随大流”。（“容忍纪律的缺失只会有利于敌人。坚决而持久地为巩固工作纪律而奋斗，充分利用工作时间，难道是一个不受人欢迎的任务吗？只有落后的工人才不欢迎这种富有战斗精神的领导。”）[4] 由于找不到别的解释，我只能对怠工等其他缺点表示蔑视。这些解释不仅不当，而且有害，因为它借助于经济学修辞，支持了对所谓“怠工者”的冷酷无情的压制。

我从来没有想过，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源于制度本身的体制问题。相反，在认识到社会制度中这么多问题和错误时，我仍然相信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任何问题都是暂时的。我很赞成艾尔诺·格罗引用的斯大林的观点，这些困难都是发展阶段的阵痛，我们肯定会解决这些问题！国有制的生产力肯定高于私有制的生产力。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必然比市场无政府状态更为有效。在规范分析方法与实证分析方法之间，在社会主义体制的需要和社会主义现实之间，我的思想彻底混乱了。

我特别看重这样一个预期，即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人会勤勤恳恳地工作，因为“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而资本主义工厂的工人由于受到剥削，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这种新型关系会促使工人积极开展劳动竞赛，自愿要求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像斯达汉诺夫*那样努力使自己的生产成果高出平均水平。这也是对社会主义体制优越性的主要解释，当时，我对此深信不疑。因此我还迷上了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我在一篇社评中写道：“社会主义的胜利要求我们超越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力，所以，我们必须大量引进新技术和新机器，力争通过更富活力的劳动竞赛和斯达汉诺夫运动，来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5]

由于我的工作节奏太快，所以我基本上从早到晚都在报社工作。我不再与他人分享日常生活的乐趣，也不再为别人每天关心的事情而烦恼，甚至很少与跟

---

* 斯达汉诺夫（Stakhanovite），苏联时期的一位矿工，由于在增产运动中的勤劳表现而受到表彰。——译者注

我的工作无关的人见面了。我像一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专事生产，而不事消费。尽管我在自己的生活中很少意识到消费的存在，但我还是领悟到供给出现了问题，人们很不满意。但是供给出现问题的信号受到控制，我没有听到那些微弱而遥远的抱怨声。当时，我身边的人确实感受到了严重的短缺状况，但他们都出自真心地向我隐瞒了这种情况。

我常去探望母亲蒙约和姐姐莉莉，也常常听到一些暗示，说供给短缺的问题，但我基本没有听进去过。后来，我一直追问莉莉，为什么她们没有更公开、更真诚地谈及这些事情。莉莉告诉我，她们不敢谈论这种事情。之所以不敢，倒不是她们认为我会反对她们，而是她们不想用这种事情来打扰我，因为我看上去满脑子都是别的事情。而且，我根本不会相信她们的话，为什么要来烦我呢？尽管我们都深爱对方，但我们之间，已经慢慢出现了一道无形的高墙。

总之，我积累了很多观察资料，也有大量的亲身体验，我与所有人一样，整理这些资料的方法以及根据因果关系对这些资料的组织，都是基于公理。这些公理并不单纯由智力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公理产生于超理性因素（*meta-rational-factors*）：比如信仰、偏见、志愿、欲望以及道德判断。超理性因素就像一个门卫，它决定应该对哪一种思想或印象开门，对哪一种思想或印象关门。当时，我心中的这扇门，开合并不正常。我排斥所有可能会动摇我信仰的经验与思想。认知失调理论中所阐述的防卫机制，已经开始发生作用。与我内心深处的信仰相悖的信息，都被我排斥在外。这样，我就能说服自己，我原先的世界观正确无误，从而维护自己内心的安宁。

如果说，部分是由于超理性因素的影响，公理产生了变化，那么，过去积累的相同的经验，突然会按不同的方法组织起来，新的因果链也会随之出现，这种新的因果链及其效果，又会支配过去的经验。我曾经也经历过这样一种重组过程，下一章中，我会对这一过程做更全面的解释。这一过程就像把铁屑撒在下面放着一块磁铁的纸上，铁屑本身可以形成各种图案，但如果移动磁铁，图案就会发生变化。

我们还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比喻。荷兰艺术家 M. C. 埃舍尔（M. C. Escher）画过一幅名画，画中黑天鹅正从左向右在天空中飞行。但如果从不同角度观察这幅画，画中会突然出现白天鹅，而不是黑天鹅，从右往左，而不是从左往右飞。

多年过去后，我才能用新的眼光看待我在《自由人民报》积累的经验。

思想的空洞

那些年里，我在青少年时期阅读过的大量书籍几乎完全没有用。我的文章有时会引用一两位匈牙利历史人物的名言，或者广为传诵的古典诗人的诗句，除此之外，我读过的书就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了。或许，饱览诗书给我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报社将几位作家分到了我负责的部门。在那些定期给报社撰稿的人中，有伊什特万·厄尔凯尼(István Örkény)和费伦茨·考林蒂(Ference Karinthy)。我跟他们相处融洽，他们并不把我当成上级或党务工作者，而是视我为燕谭之友。他们偶尔也会表示出对现实状况的不满。与考林蒂相比，厄尔凯尼叫得更厉害些。但我要说，以他们作家的眼光看待问题，未必比我这个经济问题记者更快，更清晰。他们当时的看法也因为我的政治盲目性而受到忽视。

我放在手头阅读的书，多半是当代匈牙利作家或苏联作家的作品。除了报社忙乱的工作，我很少有时间读书。另一方面，我比以前更全面、更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献。我的记忆力奇佳，能在文章中引用别人根本想不起来的著作，来支持自己的看法。

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惊讶地发现我缺乏经济学功底。我在撰写《资本论》的书评时，对当时的“资产阶级”理论提出了异议。但我的观点全部基于二手资料，我根本没有读过我正在批判的作品。其他人也是如此。没有人跟我说过学术诚实的基本要求，即在你批判一个思想之前，你必须根据第一手资料对其进行研究。尽管我可以自己得出这个结论，但我没有这样做。有一件事情可以用来说明我当时的学术水平之低。我对《资本论》的评论和我在党校的出色表现，引起了经济学家陶马什·纳吉的注意，当时他正受命组建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他邀请我去政治经济学系任教。我谢绝了这份邀请。之所以谢绝邀请，并不是因为我觉得知识储备不足，而是因为我希望全身心地投入《自由人民报》的工作。

半个世纪之后再重读当年的文章，我不仅对文章中的谬误感到吃惊，如果撇开文章的内容不谈，我还痛感文章的思想之平庸。

文章的文笔倒还流畅，很难看到许多报刊文章中常见的表述不当的毛病。但文章中很多内容是对一些社会成果和成就做简单赞美，读来令人不快。在那个年代，无论碰到什么问题，我的解决办法就是用祈使语气去激励人们克服困难。

我的所有文章，从开篇到结尾，结构都很清晰。这似乎仍然是我思考的特色。不过，文章的论证过程却相当枯燥。即使结论是完全错误的，不妨采用一种巧妙而不落俗套的方法来讨论问题，但在我的文章中，我很少发现这样的情况。

这些文章无论是社评还是时事报道，常常会引用数据，有的文章似乎通篇都是数据。我敢肯定，我从未为了适应某个目的或目标而修改过原始数据。但我也还记得，我并不总是核实数据来源，也不总是将自己要使用的数据与别人的数据进行比较。那时候，文章中的数据常常是任意提取的，或者用无法满足基本的可比性要求的方式，将匈牙利的统计数据比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数据，用总体数据与局部数据进行比较，用动态数据与静态变量进行比较。我不能为自己辩解，说没有人教过我应该怎么做，或者说没有人警告过，如果数据处理不当会有什么后果。如果我不是因为沉迷于不惜一切代价地支持官方宣传，我本来是可以自己认识到这些规则的。

我写作下笔快，数量多，文章不免流于肤浅。我并不需要 50 年时间才认识到自己的失败。几年后，我离开新闻界，转而从事学术研究，在我用数星期或几个月时间对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后，我已经不忍回顾我自己之前的写作方式了。我开始讨厌新闻界，因为它常常用一种草率而匆忙的方式，拼凑出一些信息，然后将这个信息散布出去。现在我也认识到，如果绝对地一概而论，我的这种说法也会导致错误的结论。有些记者工作也很严谨，他们会仔细核实自己要公布的数据，学术水平也非常高。但我却日渐厌恶这一行业，我甚至不愿意承认，我本人就在这一行当了多年的记者。

我按照年代顺序阅读自己的文章，几乎看不到自己有什么进步。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章却越来越枯燥、越来越单调。1953 年我已经 25 岁了，这应该是一个出彩的年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在这个年龄完成了他们的大学学业，写出了具有开拓性的文章。我却只是在写些简单枯燥的社评，弄出些内容空洞的作品，或者替无法表述想法的同事、部委官员或企业负责人捉刀。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比我写下《雪下的种子》的 17 岁那年，还要阴郁。

道德清算

我并未打算在这本书中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我的目的只是说一下我生活中

发生的事情，说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读者如果愿意，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自行判断。我自己也会做出判断，而且是根据自己的良心，在我心里进行判断。我向那些因我的文章而受到伤害的人道歉。但是，行动始终比真诚的道歉语言更为重要。

很多人将道德清算看成是一个加法运算：有的事情可以标上正号，有些事情可以标上负号。两者相加之后的余额如果为正，就会使人感到宽慰。

实际上，这种加法计算是基于补偿和赎罪。有些人认为："我虽然已经犯了罪，但我可以通过做好事来抵消我的过错。"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朋友米克洛什·吉迈什就是这样想的。在匈牙利革命失败后，米克洛什仍然在秘密进行战斗，直到最后被捕。如果有必要，他会选择死亡，但他却想为他自己在早期政治活动中犯下的罪过做点补偿。*

我尊敬那些用行动而不是只在口头上做出补偿和忏悔的人，但我自己并不很赞同这种做法。我并不相信，一个人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就可以用另一阶段的功绩进行抵消。罪过根本无法弥补。你在做出这些表面上的补偿时，你所伤害的牺牲者或许已经离开了人世，已不能从你所做的好事中获益了。即使他们还活着，即使他们本人或他们的后代从你的善行中获益，你以前犯下的错也不能以这种方式变成正确的事。

我不仅认识到我在成年后的第一个阶段就走上了歧途，我还坚定地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我肯定在我过去的几十年中，我获得了许多成就，这些成就也有益于我的伙伴们。但我并不认为我的这些行为就是"赎罪"。我一直是把罪过和赎罪分开计算的。我在《自由人民报》的行为，则在另一本账上记录在案。

注 释

[1] ÁBTL V-145-288-a, pp. 514—515. 日期：1950 年 6 月 14 日。

[2] Kornai, 1951d, p. 5.

[3] Kornai, 1951c.

[4] Kornai, 1951b, p. 1.

[5] Kornai, 1951a, p. 1.

---

* 当然，吉迈什是否真的打算赎罪和补偿，还存在争议。

4. 觉醒：1953—1955 年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逝世。他的逝世结束了共产党国家的一个历史阶段，开启了另一个历史时期。我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也开始发生巨变，从而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思想以及行为方式。

“新方针”

几个月之后，匈牙利才察觉到了苏联政治环境的变化和领导层更迭的影响。1953 年 6 月，一个匈牙利党政代表团被召到莫斯科。匈牙利灾难性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受到了苏联的严厉批评。那位最喜欢听人称其为“斯大林同志最优秀的匈牙利学生”、想成为东欧共产党领袖中执行斯大林指示最力的马加什·拉科西，现在却因为他的这种热情受到了莫斯科新领导人的斥责。虽然苏联剥夺了他的独断权力，但还是保留了他的党总书记职位和权力。伊姆雷·纳吉被任命为总理。纳吉曾经担任过 1945 年临时政府的首任农业部部长，领导过土地改革，得到了那些在重新分配土地过程中获得土地的农民的欢迎。另一方面，他也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曾与拉科西与格罗一起流亡莫斯科，在那里，他在一些问题上与拉科西领导的党的多数派产生了分歧。纳吉虽然避免了像拉兹洛·劳伊克被处死或雅诺什·卡达尔被囚禁的命运，但他从未进入拉科西的小圈子，也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他与党的其他领导人不同，外表出众，措辞严谨，而且贴近人民，同情人民。

匈牙利共产党接受了莫斯科的指示，在 6 月召开的中央领导会议上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接着，伊姆雷·纳吉政府成立，纳吉以总理身份对议会发表了例

行讲话。“六月决议”、“纳吉讲话”、“政府工作计划”以及“新方针”，这些时代的表述都成了后斯大林时代匈牙利共产党发展计划的代名词。我尽量采用当时的语言简要概括一下这一计划。

- 截至1953年，党的政策存在严重错误。之所以有错误，不是党的思想出了问题，而是实施政策的方法和手段出了问题。这些错误必须纠正，但社会主义体制的基础应该保持不变。
- 党的经济政策也出现了严重错误。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关注太少。
- 五年计划的增长目标不切合实际。增长目标过分强调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党对财产关系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国家所有制依然占主导地位。
- 农业政策出现了扭曲。引入集体农庄的目标仍然是正确的，但广大农民必须根据自由意志加入集体农庄（即遵行“自愿原则”）。
- “社会主义法制”受到了严重侵犯。今后不能再容忍这种侵犯。
- 共产党已经脱离群众。必须形成一个广受欢迎的阵线，使全体匈牙利人民团结在党的领导周围。

“新方针”计划已含有后来被称为*改革共产主义*（*reform communism*）的思想要素。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一计划进一步扩大，但在改革共产主义中尤为重要的两个要素尚未出现。一个是*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即部分或全部去除官僚主义的中央计划，代之以市场协调（这一点在本书下文还将详细阐述）。另一个要素是“*民主制*”（*democratism*），我有意给这个术语加了引号。这一时期这个涵义被扭曲的术语表达了一种前后矛盾的想法。一方面，老百姓想在公共事务上有更多的发言权，所以应该有“工厂民主”和“党内民主”。另一方面，共产党还将继续垄断权力。民主制吸收了后来在共产党思想发展史上得到强调的很多重要因素，例如1968年布拉格之春（the Prague Spring）中流行的“人性的社会主义”的思想。

现在，我来重新梳理一下我在1953—1954年的思想。

像其他许多共产党人一样，我对斯大林的逝世也深感迷茫。当时，我并没有料到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我想，斯大林的继承者会继承斯大林的路线，因为他们在葬礼致辞中已经郑重做出了承诺。

当我看到匈牙利党中央领导通过的六月决议和伊姆雷·纳吉的讲话时，我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匈牙利共产党正在引发剧变。我觉得六月计划正合其时，但要说六月计划让我松了一口气或者充满热情，那也言过其实。我不属于在六月

决议前受过苦的人，我也并不觉得让人松一口气的时候到了。共产党做出了决定，我应该用冷静而恪守纪律的方式关注这一决定。我并不奇怪党的路线发生了根本变化，比如，苏联共产党历史上也有几个“新的”、截然不同的时期。在那种情况下，我就想到这么多。我并不在意拉科西的一人统治让位于现在的两人统治有什么特殊意义。这一切都进一步证明，那时候我在政治上很幼稚，很不成熟。

我在新方针时期撰写的第一篇文章与我以前的文章相比，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或许是少了一些激情，多了一些克制和客观。

与昔日囚犯的一次会面

我从空想中觉醒过来，是因为一些恼人的经历。

1954 年夏末，我正在巴拉顿湖度假，在湖边的运动场上我碰到了山多尔·豪劳斯蒂(Sándor Haraszti)，他坐了几年监狱，刚刚获得释放。早在霍尔蒂执政时期，他就是党的中坚力量。从 1945 年开始，他担任了另一家共产党报纸《自由报》(*Freedom*)的主编。那时我们时常见面，我对他很尊敬，也很友好。山多尔是盖佐·洛松茨基的岳父，盖佐是 1956 年革命的烈士，死得很悲壮。我刚刚入报社的时候，盖佐也是《自由人民报》的一位领导。虽然我们只是泛泛之交，但我大体上知道，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党内人物。豪劳斯蒂 1950 年被逮捕，盖佐则是 1951 年被抓。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拉科西及他的同伙想把他们与雅诺什·卡达尔一起公开审判，卡达尔则被指控为主犯。虽然在劳伊克审判之后，再没有搞过第二次公开审判，但这些人却一直被关在监狱中，直到政府实施新方针后，才被释放出来。

我对他们的遭遇一无所知，在得知他们被捕的消息时，心情也很平静。我认为如果党决定要对这些老同志下手，党一定会慎重而仔细地检查他们是否有罪。我从未想过，党会无中生有地逮捕他们，我确信当时的裁定是公正的。

几年过去了，现在我们面对面坐在巴拉顿湖边的草地上，山多尔平静地跟我谈起他曾经遭受的让人发指的暴行。他们试图迫使他承认那些不实指控。后来，在他们直白的劝说不起作用之后，他们开始残忍地拷打他。

这类审判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政府会安排国家安全部门的警察负责审讯每一名嫌疑犯。负责审讯山多尔的官员是 M. M.，碰巧的是，我从 1945 年起就与他相识，当时我们都是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布达佩斯第五

支部的成员。* M. M. 本人并不亲自动手毒打年老的山多尔·豪劳斯蒂，但他却下令何时以及如何毒打他。1945 年我认识 M. M. 的时候，他跟我一样，还是一名热情而忠诚的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的成员。虽然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我相信，他不是一个精神病意义上的虐待狂。他让别人毒打山多尔，并不是因为他以残暴为乐，而是因为毒打犯人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任何一个被指控与党为敌的人，都必须由他们榨出事实真相，即使这么做意味着动用酷刑。很显然，真相就是间谍故事，或者调查官员的上司告诉他们的阴谋破坏行为，就是怀疑和犯罪指控的基础。事实上，除了编造之外，就是故意混淆真假。犯罪嫌疑人不断受到盘问，直到他们承认这种编造出来的指控是真的，而且所犯罪行能与指控中的罪行完全吻合为止。

从一个经历过这种闹剧的人口中，亲耳听到这种事情让人非常痛苦。但这场悲剧加深了我的认识。因为，我还认识另一个刑讯人员，他就折磨过这些英雄，他折磨人不是因为他天生就是个恶魔，而是因为某些人生来就有某种“崇高”的目的。发现了这样的真相让我尤感震惊，因为这一真相表明，这场悲剧并不是由参与者的个人性格造成的。制度本身存在某种致命的缺陷。

与山多尔·豪劳斯蒂的见面摧毁了迄至当时我对共产党的信念的道德基础。共产党谎称豪劳斯蒂有罪，我就相信了这一谎言。如果对豪劳斯蒂的审判是基于一个谎言，那么对其他人的审判一定也是这样。我们身处谎言之中，而我却愚昧地盲目相信这一谎言。不管是否出于自愿，我已经散播了一些谎言。

山多尔·豪劳斯蒂是一个用文字表达思想的人，我也一样，虽然我的研究领域发生过变化，但我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用文字表达思想的人。我们撰写的东西是否真实，对我和对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与山多尔·豪劳斯蒂见面后，诚实与欺骗、真理与谎言，就成了在我脑中打架的概念。

只要一想到 20 世纪还有人因为别人的某种目的而受到蓄意迫害，我就觉得无法忍受。我觉得，即使是迫害一名罪犯我都不能容忍，何况是迫害一位无辜者。一个做出这种行为的政党，能自称为领导人类进步的政党吗？

1947 年后，我一直在探讨计划和生产这类经济问题，正如我在前面所说，我已经注意到了某些负面的经济现象。不过，我并没有像大家期望的那样，对这些问题

---

* 我在这里给出的 M. M.、N. N. 等并不是当事人真实姓名的缩写。我将在后面给出他们的真实姓名。

进行分析，然后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计划经济理论，或者匈牙利的经济政策，出了什么岔子。我的早期世界观在道德基础崩溃之后，发生了动摇。我觉得，我迄今为止的全部信仰和思想，都需要进行重新审视。如果道德基础不稳固，我不能不加审查地接受这种基于不可接受且没有根据的道德基础的知识结构。

我不是在说我脑海中各种各样的想法突然瓦解。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对每个要素的知识结构和思想逐层进行讨论。这样会花费一些时间。但从那一天起，共产党教义中的所有主张和命令之后的惊叹号，都被一个问号取代了，到那时为止，我实际上一直不加怀疑地接受这些说辞和命令。

澄清思路的讨论和阅读

我很幸运，我找到了能够帮助我重新厘清自己思路的人。帕尔·勒切伊(Pál Lőcsei)是第一个与我讨论六月决议和伊姆雷·纳吉政策的人。对帕尔来说，进行这种讨论是要冒风险的，因为按照共产党的规矩，这是一种“反党”行为。但他认为，他信得过我们之间的友谊。他也确信，他的观点会对我的思考有所帮助。

我们秘密讨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之前，他一直在《自由人民报》的农业新闻部担任要职，所以，他对伊姆雷·纳吉专长的许多领域都非常了解，比如强迫性集体化、武力压制农民、迫害富农，等等。

勒切伊告诉我的拘押和监禁的数字，让我着实大吃一惊。我记得有一个数据是，在斯大林去世的时候，匈牙利不到一千万人口中，关押的政治犯就有四万多人，这一数字包括那些已经审判并定罪的，也包括那些未经审判就被关押的，还有那些仅属暂时性拘押的人。*

那些与山多尔·豪劳斯蒂有相同遭遇的人，不仅仅使我认识到了问题所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看法。也就是说，他们使我认识到，五年计划提出

---

* 马加什·拉科西在 1953 年 6 月苏联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引用的数据是：当时匈牙利关押的政治犯为 45 000 人(Baráth, 1999, p. 42)。据说，当时在莫斯科大会上给出的这一数字属于高度机密，但我猜想这一数字一定是从匈牙利党中央泄露出去的，通过某一途径到了勒切伊手中。我并没有找到这个国家关押囚犯的准确数字。此外，1953 年 11 月，内务部副部长拉斯洛·皮罗什和总检察长卡尔曼·扎科也向党的领袖报告了一些数据(Rainer, 1999, pp. 24—25，当时，这一数据并没有泄露出来)。大赦行动涉及大约 748 000 人。每一名符合大赦条件的人都从监狱和劳改所中释放出来，或是获准从指定居住地返回家中，终止刑事诉讼或政治调查。75 万人相当于匈牙利总人口的 8%。所以，这一数字非常惊人。

的目标不仅极不现实，而且还降低了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在当时，我仍然将经济困难归因于五年计划的错误，而不是归因于制度的弊病。然而，大规模的政治压制已经指向了另一个目标，即其根本性的困难。

与勒切伊进行的这次发人深省的讨论，是对我的一次思想指引，我曾从米克洛什·吉迈什那儿接受过这种指引。1953 年 6 月，在柏林暴乱的消息第一次传来时，他就提醒过我注意这一天。当时，我们就这一问题交换过意见。在最初的几个小时内，我对这一消息没有任何特别的看法，但他却有。现在，也就是几个月后，他向我解释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自从 1921 年苏联喀琅施塔得起义失败之后，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自发组织起来反叛社会主义势力。而这正是柏林人民试图要做的事情。吉迈什跟我说，尽管这次起义很快就被苏联坦克镇压了下去，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工人已经开始进攻工人自己的政权。（这里我不想谈及吉迈什言论中的预言成分，或许他已经有了某种猜想，即柏林发生的事情有一天将会继续进行。）

有一句话我无法忘记，米克洛什把他与雷沃伊的这句谈话告诉了我。他说，他俩讨论了在苏联或近期东欧历史上，“人民”为什么不站在共产党阵营这边。他们认为，尽管如此，共产党仍然通过采取强制手段来维持共产党统治的未来。如果有必要，他们会采用野蛮手段（mit barbarischen Mitteln）（雷沃伊用了一个德文词）。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对共产党救世主精神和不加约束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这一简洁表述。我觉得，我必须与这一教规中的两个因素决裂：为了救赎，将一种制度强加到人民头上；在救世主似的事业中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如恐吓、大规模拘禁以及刑讯，等等。

吉迈什曾任《自由人民报》驻日内瓦记者，在日内瓦呆过很长一段时间。日内瓦的富裕和宁静以及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超过了他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对他影响很大。他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了这些印象。

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过，出于超理性的原因（meta-rational reason），可以把思想关在门外，或者相反，可以敞开大门让思想进来。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思想封闭之后，我再次开始阅读。不夸张地说，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批评斯大林政策的著作。

当时，我还是半个共产党人，或者说，我还是四分之三个共产党人。那些对我当时的思想状态影响最大的书籍，并不是那种对斯大林政策持截然相反观点的书。也就是说，不是那种从外部攻击共产党的书。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党内人

士批评斯大林政策的书。我读过伊萨克·多伊彻撰写的德文版的论斯大林的著作，突然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到了斯大林的个性。我还读过一本德文书，我忘了作者和书名，那本书是从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的却是反斯大林的角度，把苏联共产党放在历史中加以考察。

南斯拉夫很多学者的著作给我很大刺激，其中就包括爱德华·卡德尔（Edvard Kardelj）撰写的小册子。[1]斯大林与铁托发生冲突后，一怒之下，将南斯拉夫共产党从共产党国家阵营中赶了出去，迫使南斯拉夫领导人走上了一条与斯大林完全不同的道路。卡德尔的书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版的，很自然，这些书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些南斯拉夫学者最早让我了解到这样的思想，即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意味着官僚式的集权主义，而分权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模式则更健康，也更有效。但他们并没有提及奥斯卡·兰格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2]也没有参考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相关论战的内容，他们更倾向于提出一种把集体所有制与市场协调相结合的思想，然后用他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对其进行阐述。按照南斯拉夫的方法，地方分权包括两个过程：一是改变基于计划指令的集权式经济管理方式；二是引入“自主管理”模式。自主管理模式承诺为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机构和由工人选出的工厂管理委员会提供更大的自主权。南斯拉夫学者批评南斯拉夫此前采用的管理方法是照搬苏联模式，其弊病印证了我感受到的集权制的负面效果。当时，南斯拉夫意识形态上的这一创新，即“自主管理”，为匈牙利寻找工厂民主的“新方针”，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样板。

许多曾经坚定信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人，开始逐步与其决裂。决裂的第一步是在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有基本原则，包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的同时，反对斯大林政权的恐怖统治。因此，他们认为斯大林犯了“严重错误”，背离了真正的列宁路线，共产党应该回到列宁路线上来。决裂的第二步是以前的信仰者已经明白，在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发展起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包含斯大林的思想，而且包含列宁的思想，甚至还有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思想。

我的第一次“犯上”

我的思想和世界观的逐渐改变也开始影响到了我的行为。在此之前，出于

我对共产党的信仰，我一直服从党的命令，但这一服从并非出于恐惧。随着信仰的动摇，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遵守纪律了。

过去，共产党需要通过《自由人民报》向外发布的经济政策，都通过伊什特万·弗里斯传达给我。现在，党中央已经免除了弗里斯的职务，所以，艾尔诺·格罗本人偶尔也会直接告诉我，他对经济报道有什么要求。1953—1954年冬季，他就是这样下达指示的。当时，出现了几次严重的电力供应中断事故。在那几个星期里，供电局常常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切断工厂和居民区的电源。《自由人民报》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报社最终发现，必须对此事说些什么。我几次在电话中和格罗谈及此事，格罗想以“客观条件”作为这一问题主要的或唯一的原因。我明白，在这个问题中有一个一直困扰我的两难困境：我不想说谎，我要诚实地说出真相。我第一次违背了艾尔诺·格罗的想法，而在不久前，我还那么尊敬他。我告诉他，我不会在文章中否认电力供应中出现的问题，实际上是因为相关部门对发电量和电力需求增长之间的比例估算错误而致。而且，电力部门的官员在没有预先警示或通知的情况下，大面积切断了电力供应，而不是去设计一个合理的电力管理系统。后来，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都出现在我撰写的头版头条报道中了。[3]

后来，我听说了艾尔诺·格罗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一些事情。当时，他是共产党旅的政委。因为他很残忍，几十名忠实的反佛朗哥左派战士都是他下令处决的，所以人们都很怕他。如果我那时候知道这些事情，我也会害怕的，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明白了恐怖统治的可怕。但在我与艾尔诺·格罗就电力短缺的问题进行争论时，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让人害怕的事情，也不明白对短缺问题做何种经济学解释。只是之后很久，我才开始思考短缺问题。但事后想来，这件事还值得一提，因为我的第一次“犯上”就与严重短缺问题相关。坦白地说，当时我唯一考虑的是在讲真话与说谎之间进行选择。

对伊姆雷·纳吉著作的评论

最初，我是从友人帕尔·勒切伊的解释中，慢慢意识到共产党所说的“党的团结”只是一个华丽的辞藻，后来，我又从其他信息中证实了这一看法。事实上，党内一直存在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即马加什·拉科西和伊姆雷·纳吉各自支

持者之间的斗争。当然，所有这些政治斗争都夹杂有个人因素。尽管挂在口头上的是集体领导，但经典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有个小圈子围绕在最高领导人身边，参与他的决策。小圈子的成员各有分工，但会维护彼此的意见。不过，最终的权力还是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手里。当时，党内的主要问题是，谁才是匈牙利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是拉科西，还是纳吉？

然而，在匈牙利进行的这场特殊的两派斗争，并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它也是两条路线和两种政治方案的斗争。马加什·拉科西想继续斯大林的路线，最多也只能稍稍做些调整。伊姆雷·纳吉却想实施他的六月计划，即进行具体共产主义改革的新方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派的力量大致相当，最重要的是，双方在莫斯科都有自己的支持者和推手。

《自由人民报》的一群领导打算坚定地支持伊姆雷·纳吉这一方。按照姓名的字母排序，最积极的有：拉约什·费赫尔、山多尔·费克特、米克洛什·吉迈什、彼得·肯德、我、帕尔·勒切伊、蒂博尔·梅劳伊，以及山多尔·诺沃巴茨基。谁能想到 1956 年发生的事情，会迫使这些相互友好并经常聚会的人，走上不同的道路呢？其中，吉迈什牺牲了，费克特、勒切伊和诺沃巴茨基在卡达尔的监狱中蹲了好几年，肯德和梅劳伊成了流亡巴黎的匈牙利政治流亡者的领袖。而我自己呢？因为我的命运是本传记的主题，所以我不想在这里用几句话进行概括。最出人意料的是拉约什·费赫尔的命运，费赫尔曾经是最为坚定地与纳吉站在一起的人，而在 1956 年 11 月 4 日，他很快倒向了雅诺什·卡达尔，在他有生之年，他一直是卡达尔政权的政治局委员。

现在让我们回到 1954 年的夏末，谈谈我的活动以及我决定积极而坚定地支持新方针。迄至当时，我的所有文章差不多都与经济问题相关，但在这一时期，我几次跨出了这一范畴，探讨了别的问题。

那是 1954 年的 10 月 6 日，《自由人民报》发表了我为伊姆雷·纳吉的两卷本新作撰写的长篇书评，纳吉的新书精选了他过去十年发表的演说和文章。[4] 我的文章着重评论了纳吉思想中与典型的斯大林式政治宣传不同的方面。我现在从他的文章中摘选一些具有这些特征的文字："共产党必须停止向村民发号施令……由于党内对严肃而有意义的持续工作的忽视，所以傲慢与脱离群众的现象以及泛泛的空谈都出现了……现在越来越流行一种'常规'（我没法用别的字眼称呼它），过分强调表面现象，忙忙碌碌、浮夸、没完没了的鼓掌，起立欢迎，事先让人说些扼杀积极进取精神的陈词滥调。"[5]

纳吉对农业问题的看法，与尼古拉·布哈林在苏共党内提出的观点非常接近。他认为，“党内大部分人甚至在领导机构中”，“夸大资本主义的危害，以及讨厌、疏远乃至害怕发展中小农场的生产力”等思想，都是错误的。[6]

这本选集展示了伊姆雷·纳吉的良好形象。纳吉是一名共产党政治家，故他不愿意越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雷池，他宁愿采用一种比拉科西的路线更温和、更可行并更可能为农民接受的路线。我的书评就是要把纳吉的这一形象呈现给报纸的读者。

这之后没多久，即 1954 年 10 月初，匈牙利共产党举行了一次中央领导会议，认可了伊姆雷·纳吉一派的地位。当时，《自由人民报》的领导层获得了大量的内部信息。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胜利至多反映出当时那个时刻党内权力的平衡。决不能因此而判定伊姆雷·纳吉与其忠心的追随者将会长期执掌政府。我们认为，对于报社来说，在这一时刻表现出对新方针的大力支持，应该更有重要意义。

我两次就这一问题撰写了头条文章。先让读者们看看我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按照中央领导指出的道路，在六月道路上前进”。[7]这个标题很好地表明，我在政治上已经有了进步。我不遗余力地普及纳吉的思想，我想像纳吉那样，推动党内的革新，并以此来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在党内的斗争问题上，我不仅旗帜鲜明地站在纳吉一边，并且在我的文章里表明了这一点。

《自由人民报》的反叛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帕尔·勒切伊跟我们说，我们不能仅限于写文章支持新方针。当时，报纸上的每篇文章在付印之前，都要经过主编奥斯卡·贝特伦或者副主编伊姆雷·科莫尔审查一遍，而这两人都属于拉科西派。有他俩的审查，我们就不可能发表什么词锋锐利的文章。勒切伊提议，可以召开一次特别党员大会，所有人都可以在会议上开诚布公地畅所欲言。可以预料，由于《自由人民报》在党的宣传工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报社首席记者的评论，会因人们的口口相传而四处传播。

勒切伊是这次会议准备工作的原动力，而我则是组织者之一。我们事先确定了每个人应该讲的内容。会议一共持续了两天。[8]拉约什·费赫尔提出，《自

由人民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诚实地说出这个国家存在的问题。他公开批评了艾尔诺·格罗最近的讲话。勒切伊的发言有些煽动性，他谈的内容主要是“法制”（即反对残酷的镇压），意在鼓励政治道德的创新。山多尔·诺沃巴茨基则针对前几年的一些不法活动提出质问：“我们还需要多久，才能听到对这些事情真正负有责任的人做出解释？”蒂博尔·梅劳伊关注的是真相与谎言的问题，他呼吁进行一次“清洗风暴”，[9]两年后，这场风暴确实来了。肯德批评了格罗，我则批评了当时《自由人民报》的党内负责官员米哈伊·法尔卡什。我说：“党的领导要承担《自由人民报》错误的责任。”我的同事们先后发言，* 尖锐批评了党的领导层，也批评了编辑部的斯大林主义者，并强烈要求继续贯彻政府的六月计划，防止斯大林主义的复辟。[10]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批评似乎尚未深入。我们批评了那些应对糟糕的政策和决策承担责任的政治人物。这些批评都没有错，但我们没有批评将这帮人推到权力顶峰、赋予其无上权力并引导他们做出错误决策的体制。然而，与会者的道德勇气值得我们尊敬。每个人都对仍然身居政治局和政府高位的领导人（这些人很快又恢复了绝对权力）进行了尖锐而彻底的批评。我们知道，我们这种自发行为会激怒他们，而且还会招来他们的报复。

即便是在今天，参加这次会议的记者们树立的道德标准，仍然值得尊敬。因为他们谴责了谎言和空洞无物的陈词滥调，他们也要求所有记者都要做到诚实守信，忠于事实。

《自由人民报》时期的结束

不久，《自由人民报》反叛的消息开始四处流传。会议记录出现了几个版本，而且不停地被复制，不停地被传播。（在复印机、更不用说互联网出现之前，这可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了。）其他几个重要机构也以我们为榜样，举行了同样的会议。

会议之后不多久，共产党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拉科西及其追随者再次掌

---

* 下面这些人是在会议上发表了批评性意见和反判观点的人，但正文中没有提及。他们是：伊什特万·奥尔马希、埃米尔·鲍拉日、蒂博尔·高莱、艾尔诺·贡多什、雅诺什·杰奈什夫人、伊洛娜·亚索伊、茹饶·科罗克瑙伊、伊丽莎白·科瓦奇、安德烈·克韦希、加博尔·莫恰尔、山多尔·纳吉、玛丽亚·帕斯托尔、拉约什·西尔瓦希、卡尔曼·陶卡奇、蒂博尔·陶尔多什和约瑟夫·韦特。

握了最高权力。

1954 年 11 月 24 日,《自由人民报》的领导们第一个被叫到政治局,因为这次发生的事情而受到严厉批评。[11]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报社发生的这次事情也频频被提及。12 月 1 日,在会议上公开发言的那些人,也受到了批评。[12]米哈伊·法尔卡什说:"《自由人民报》的这次会议以一种让人无法容忍的方式,批评党的领导人……而且还提出了一整套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先例,电台的工作人员、《自由青年报》机关、火花出版社以及布达佩斯和德布勒森的大专院校以及……作家们都召开了类似的会议。"[13]马加什·拉科西在总结发言中,明显表现出不耐烦:"《自由人民报》的同志们究竟要干什么?……首先,报社和电台都必须坚决管住,如果有必要,我们将不得不采取组织措施……命令所有报纸立即停止对党过往政策的批评。停止一切肆无忌惮的公开批评。"[14]

上面又派来两名政工干部,进驻报社机关整顿秩序。随后,一连串党的干部陆续来到报社对记者做工作。他们希望报社的党员登报声明,放弃以前的政治立场。但他们未能如愿。反叛者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令拉科西的手下十分恼火。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想再继续负责报社经济部门的工作了。幸运的是,当时,"编委会秘书"这一职位正好出缺,这样,我就接下了这一工作。编委会秘书负责报纸出版的技术和管理工作,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但实际上,秘书并不写文章,也不安排同事写文章。

同时,党中央正在准备实施"组织措施"。早在 1954 年 12 月,[15]虽然党内领导权交接还没有完成,实质性的决定也没有拿出,但已经开始拟定需要清洗出党的人员名单了。1955 年 3 月,党中央领导层再次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央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一决议与几个月前的那份决议正好相反。[16]伊姆雷·纳吉被戴上了"右倾"的帽子,而且被开除了党籍。虽然党中央用一些空洞的词句宣布 1953 年 6 月的决议仍然有效,但事实上却在一点点后退,匈牙利共产党又回到了过去的政治路线上了。那时候,尽管拉科西的声望已经大不如前,他没能重新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但在与纳吉的两派斗争中,他显然是胜利的一方。

早在 1954 年 12 月,肯德就成了第一个被开除的人。在我们那次会议召开的时候,肯德是报社的党委副书记,负责报社的党务工作。与他同时被开除的,还有另两位颇具才华的年轻作者,安德烈·克韦希和拉约什·西尔瓦希。没有人知道,当局对他们的震怒是因为他们撰写的调查报告,还是因为他们在会上的

尖锐发言。

4 月 28 日，经由马加什·拉科西提议，政治局做出了一项决定[17]，将《自由人民报》叛逆者中几名领头的，当然包括我在内，从报社开除。* 我在这里补充一下，我们是被一种“后斯大林主义”方式开除出去的。就在不久前，像我们这种冒犯党组织的行为，甚或较轻的违纪行为，都可能会招致拘押、监禁，或者发配到建筑工地从事体力劳动。而这次我们所有被开除的人，都指派了新的工作。拉约什·费赫尔被任命为一家国营农场的经理，其他人仍然在新闻界工作，但指派的报社知名度不高，职位也很低。我则是唯一一个被调到学术界工作的人。

在组织上决定我们的调动之前，我们还经历了一个有损颜面的过程。他们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工作分配取决于我们“进行自我批评”的表现。对那些流亡莫斯科的老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他们重返匈牙利的例行程序。他们必须毫不犹豫，或者毫不怀疑地去做要求他们做的任何事情。但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的、让人丢脸的耻辱过程。我不得不说一些谎话，我不仅成了一名牺牲者，还要忍受道德挫败的折磨。现在回顾半个世纪以来自己成功的学术生涯，聊以自慰的是，如果说几句谎话是我获准从事学术研究的代价的话，那么，说几句谎还是值得的。不过，有什么地方可以对这种两难选择进行成本—效益计算吗？

“六月政府计划”的失败，伊姆雷·纳吉个人的下台以及对我们的报复行动都不出意料。在公开支持新方针之前，我们已经考虑清楚了失败的风险。事实上，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的下场可能会更坏，对我们的报复本来可能更残酷。斯大林逝世才两年，没人会预见到，斯大林时期的残酷会保留多少或者减弱多少，甚或消失。虽然我对发生的事情并不惊讶，但我非常反感。

一句话，党的这些纪律处分决议让我感到恶心。那几个月，我精神上的理想已经幻灭，痛苦而恐惧。我早年的盲目信仰已经消失，而且是永远消失了。我睁开双眼注视着正在发生的一切。让人反胃的说谎，无耻的诽谤，捏造的说辞，告密者弄出来的真真假假的报告，对反对者的威胁和勒索以及精神折磨和侮辱，所以这些都是在党的派系斗争中使用的“常规”武器。如果一个政党的最高领导层，也就是它的中央领导层，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一会儿采取某项政策，一会儿

---

* 政治局这次开除的人有：拉约什·费赫尔、雅诺什·科尔奈、泰雷兹·洛基、加博尔·莱纳特、蒂博尔·梅劳伊、山多尔·诺沃马茨基和伊姆雷·保特科。泰雷兹虽然没有在大会上发言，但也被开除报社，唯一的原因就是她是我的妻子。帕尔·勒切伊当时在一所党校（列宁学院）学习，因此在程序上暂时不能解除他的报社职务。

又反对和批评这一政策，这是一个怎样的政党啊！我想远离这种污浊。我觉得党员应该是反对邪恶的代表，为善而斗争，但我却不想再做这种事了。

1953—1955年，我不仅经历了一次思想觉醒过程，而且彻底丧失了自信心。如果我这么轻易就上当受骗，我还能建立自己的政治评判能力吗。如果我这么多年都在听他们摆布，那我的健全的学识和批判能力有什么作用呢？起先我只是有一种本能的感觉，但我慢慢地意识到，我再也不会毫无保留或不加怀疑地相信任何人了。对于任何一种思想上或政治上的说法，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真的吗？支持某种提议或计划的论据是否可靠？背后是否存在某种不可告人的意图？

多年来，我自愿服从铁的纪律，我决心不再做党的斗士了。

在《自由人民报》工作8年后，我离开了报社。1956年10月的一个夜晚，我回来过一次（我后面要讲这件事情），但只有过这唯一的一次，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进过《自由人民报》的办公楼。几年前，还有几家右翼报纸在那栋楼里办公，2005年夏末，这栋大楼被拆除了。

注 释

[1] 我无法准确回忆起1953年后我读过卡德尔的哪些著作。我以卡德尔的回忆作为我的依据：编辑将卡德尔一些相对重要的著作收在附录中，包括他就自我管理问题的著述，见其1945—1955年相关演讲和文章的结集（Kardelj，1982）。我猜当时我应该读过其中一些文章。

[2] Lange，1968（1936—1937）.

[3] Kornai，1954b.

[4] Kornai，1954c.

[5] I. Nagy，1954，p. 169.

[6] I. Nagy，1954，p. 132.

[7] Kornai，1954a.

[8] 回忆这次“造反”会议事件时，我参考了以下资料：Aczél and Méray，1960；Kende，1966；Lőcsei，1995；C. Nagy，1994；Szalay，1994。匈牙利国家档案馆关于这次会议的记录保存在MOL M-KS 276. f. 89/206ő. e. 中，其中包括关于《自由人民报》的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文件，如1954年10月22日、23日和24日的会议纪要，这次会议做出的决议以及宣传部有关这次会议的报告。

[9] Aczél and Méray，1960.

[10] MOL M-KS 276. f. 89/206. o. . e. pp. 161—219.
[11] MOL M-KS 276. f. 53/205. o. . e. pp. 1—3, 7—76.
[12] MOL M-KS 276. f. 53/206. o. . e. pp. 31—51, 73—79.
[13] MOL M-KS 276. f. 53/206. o. . e. p. 34.
[14] MOL M-KS 276. f. 53/206. o. . e. pp. 73, 74, 76.
[15] MOL M-KS 276. f. 53/208. o. . e. , and 276. f. 53/206. o. . e.
[16] Magyar Dolgozók Pártja Kázponti Vezetőseége, 1955.
[17] MOL M-KS 276. f. 53/228.ő. e.

5. 研究生涯的开端：1955—1956 年 10 月 23 日《过度集中》

1955 年 6 月，我在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始了我的研究生涯。我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此以后，我的工作就是从事学术研究。

我进入这一新领域时，匈牙利正处于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时期，因此我参与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当时，政治领域中的紧张气氛日渐浓厚，公开冲突时有发生，同时，内部的紧张气氛较之表象更甚，所有这些矛盾都在 1956 年的匈牙利革命时达到了高潮。

背景

匈牙利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引入了苏联的科研和学位制，每个研究领域（比如医学或经济学）中的初级学位叫做“副博士”。习惯上，人们一般将“副博士”这一级别等同于美国和西欧大学里的博士学位。这两者拿到学位的年龄基本相同，而且都要写出像专著一样的长篇论文。*

---

* 暂且不谈学习内容（可以肯定数学或物理学除外），这两种体系的基本差异主要体现在提交学位论文之前，学校对学生的基本要求。美国学生攻读博士学位时，至少要有两年时间高强度、高标准地学习多门功课。其间还有多次考试，还要与多名教授交流，以便为博士论文答辩做好充分准备。匈牙利那些“渴望”拿到候选资格的学生，只要有了大学学历，就不用再听什么具体课程了。他们只要简单地参加几门考试，再提交一篇学位论文，就可以参加公开答辩了。

这里还需要指出另外一个重要的差别。在西方，博士学位是由大学授予的，而根据苏联的学位体系，候选资格和其他更高的学位，都是由科学院或其他附属机构（比如匈牙利的科研资格评定委员会）授予。

1953年8月，我申请了副博士学位。12月，我听说我的申请已经获得批准。按照通常的要求，申请副博士必须拥有大学学位，就像在西方的大学中，申请博士学位，必须先拥有硕士学位。但我没有大学学位。1945年，我进过布达佩斯大学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主修哲学和历史学。有一段时间，学校同意学生不来上课。因此，学生只在学期期末，才回到学校领取由教授签字的成绩单。学校还允许学生延期考试。我在布达佩斯大学学习的两年时间，就属于这类不来上课的学生。后来，《自由人民报》的工作占据了我的全部精力，所以我最终放弃了通过正常途径完成大学学业的想法。我申请副博士学位的时候，审查者放宽了我的学位要求。我并没有找过任何人“走路子”，但我想，可能那些审核我的申请的人，考虑到我曾经在报社担任过重要职位，所以放宽了对我的要求。1956年，我在没有初级学位的情况下，最终获得了副博士学位。

学校指派陶马什·纳吉教授做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陶马什是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的二把手，但他的学术声望和实际权威却无人能及。他是学校政治经济学系的主任，曾经将马克思《资本论》译成匈牙利文。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学识渊博，涉及领域不仅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他不仅思路清晰，而且善于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聆听他的讲演和他对经济学争论所做的总结，是一件赏心乐事。他并不算是创造型的学者，所以没有留下什么具有深远意义的著作。但是，就像其他经济学家一样，只要回想起他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就心存感激。

陶马什放手让我自由选择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我对计划和经济管理感兴趣，但在那个阶段，我还无法确切表达我想从事的研究，以及如何开展研究。

我很快便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没有碰到任何困难。我在全职工作以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所以我被称为“函授生”；那些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学习和撰写论文的人，被称为“正式生”。还有一些学生本人在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工作与学位论文的撰写结合起来。1952—1953年，我两次向上级提出调离《自由人民报》，我想全身心进行研究。但上级坚决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的请求。他们对我说：“党需要你在《自由人民报》工作。”我服从了上级的命令。

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希望改变我的职业呢？当时我并没有离开烹制政治大餐的女巫厨房的想法，我还没有这种政治动机。我之所以想离开报社，是因为我已经慢慢厌烦了报社单调的日常工作。我讨厌新闻工作的肤浅和草率。虽然我并不清楚研究工作要做些什么，但我渴望从事研究工作。好几次我都主动跑去报

道科学理事会的成立，报道一些学术活动，虽然这些事情都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科研和学术工作的背后也有政治斗争。我之所以做这些分外的事，唯一的原因就是学术世界对我的吸引。

在我提出调动申请被拒绝之后的一到两年后，针对《自由人民报》之叛乱的政治风暴还没有停息，有一天米克洛什·吉迈什对我说："你不适合搞政治，如果从事学术研究，你能干得好。研究工作更适合你。"他向我提出这一忠告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当时我们刚刚从一个令人不快的会议走出来，正在等电梯。

我根本无法按自己的意愿调动工作或改变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是，党的领导机关要把我和其他人从我们现有的工作岗位调离时，改变我职业生涯的机会终于出现了。我抓住了这次机会。当时，经济研究所刚刚成立不久，所长是伊什特万·弗里斯(István Friss)，我跟他认识很多年了。在他还是中央经济政策研究部的负责人时，他就给我发过不少指示。这样，我请求调到他负责的经济所工作。

我调到经济所之后，职位降低了。失去了原来在报社的高级职位之后，我是经济所级别最低的人，即"助理研究人员"，工资也比原来少了40%。* 我原来在报社工作时，自己有一间宽敞舒适的办公室，但现在却与其他两位同事共用一间办公室。

我办公室的两位同事彼得·艾尔多什(Péter Erdős)和罗伯特·霍赫(Róbert Hoch)非常聪明，爱打听小道消息，不过他们对我很友善。我跟这两人在一间办公室工作很难集中注意力，因为在那段不同寻常的动荡岁月中，他们似乎热衷于谈天说地。

思想的砥砺

除了与我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外，我与经济所的其他同事有过一些有意思且启人深思的讨论。

1956 年初，经济所搬进了纳多尔街 7 号，这是一幢由匈牙利著名建筑师米哈伊·波拉克(Mihály Pollack)设计的优雅的新古典建筑(它现在成了匈牙利科学

---

* 为了弥补工资收入的损失，我在这个时期写了一些书评和文章。在编辑们的大力帮助下，我写的这些文章得以发表。但我只能匿名或用笔名发表文章。

院的办公楼)。陶马什·纳吉的政治经济学系就在这幢大楼的二楼,我现在也是这个系的成员了。二楼还有一间办公室属于安托尔·马里亚什(Antal Máriás),马里亚什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因为与蒂博尔·利斯卡(Tibor Liska)合写了一篇关于对外贸易之效率的论文而闻名。[1]后来,他又成了经济政策系的系主任。贝洛·琴代什的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隔壁,再过去几个房间就是弗伦茨·瓦吉的办公室。当时,他们两人刚刚开始研究农业经济。贝洛·琴代什后来当上了国家计划办公室副主任,弗伦茨则成了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部的主任。安德拉什·纳吉当时也和我们在一起,他在进入经济所之前,还在好几个地方工作过。他曾经在青年组织中担任过重要职位,教过政治经济学。在劳伊克被判刑后,他被贬到建筑行业当了一名工人。直到匈牙利进入新时期后,他才得以重返学术领域。此外,我还可以列出许多名字:罗伯特·霍赫、山多尔·奥斯、弗伦茨·莫尔纳、安德拉什·布罗迪。对于那些熟悉匈牙利后来几十年发展历程的人来说,这些名字肯定耳熟能详。

研究所里的一段走廊,更准确地说是所里年轻研究人员集中的一个地方,我们称为 Gyepsor*,意指乡村的草地。在某种程度上,这批青年人的构成很庞杂。有的人来自匈牙利农村,与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人则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城市。还有一些人以前就一直在从事学术工作,而有的人则是在职业生涯发生了巨大变动之后,才转而从事学术研究。当然,我们在很多方面也有相似之处。我们都对斯大林—拉科西的共产党体制非常失望,我们都希望看到一个更为人性,同时也更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我们所有人都非常厌恶早期经济研究中冷漠而空洞的研究模式,我们都希望对现实进行研究。从当代西方的观点来看,我们所有人都不是合格的经济学家。虽然我们并没有从彼此身上学到更多的经济学知识,但我们以相互尊重为基础,总是从自己不同的经验报告和各种真诚的政治争论中,获得灵感并受到鼓舞。我们在一起很开心,也相互开玩笑,这里的工作氛围比我曾经工作过的所有地方都更友好。

---

* 战前,人们将农村最穷的人居住的地方称为"草地"。彼得·韦赖什在他题为《草地上的午餐》(*Lunch at the Gyepsor*)那本书中写道:"草地"是村庄的边缘地区,再往外就是漫无边际的盐碱地了。盐碱地上满是鹅粪、猪粪和牛粪,就是没有植物。这些粪便堆在那里,直到完全干透后,才被草地的居民收拢起来做燃料[Veres, 1997(1939), p. 32]。这段文字我引自捷尔吉·彼得里的一篇文章(György Péteri, 1998, pp. 200—201)。彼得里对居住于纳多尔街"草地"的人们以及他们的集体生活做了精彩的描述。他的描述提供了很多有趣和富有启发的信息。

但是，对形成我的经济思想影响最大的两股力量，却不是来自经济研究所的同仁。

在进入经济研究所之前，我就见过中央统计办公室的主任捷尔吉·彼得，但只是在进入经济所之后，我才通过彼得·肯德的关系与他熟识。一开始，我们总是三个人在一起聚会，后来就形成了我和捷尔吉两个人的聚会，我们两人定期进行秘密讨论。他也来过我家几次，但通常都是我去他那间漂亮而且优雅的公寓拜访。他的妻子叫艾米·彼得(Emmi Péter)(娘家姓 Pikler，皮克勒)，是一位知名儿童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她会为我们端上咖啡，寒暄几句后就让我们讨论。

捷尔吉·彼得比我年长 25 岁，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了。在党内，他也非常有名，因为他曾经在霍尔蒂执政时期蹲过十年大狱，除了马加什·拉科西和另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佐尔坦·沃什，他蹲监狱的时间比谁都长。安德拉什·海盖迪什[2]非常准确地称他为“布尔什维克显贵”，后来，他在中央统计办公室当了一段时间的副手。彼得个性鲜明，风度翩翩，慷慨大方，为人硬朗，所以在一帮死气沉沉的党内官僚中，非常引人注目。

我们见过一两次后，他就认定我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于是，他主动与我谈起了他在经济学上的很多想法。他认为，市场且只有市场，才是能够有效协调供给和需求的机制。然而，市场的运作却有赖于解除价格管制。

供给、需求、自由价格、市场以及效益，都是西方大学中的经济学学生在微观经济学的第一堂课就接触到的概念。换一种政治背景的话，比如说，换成是在西方学术界，捷尔吉·彼得提出的这些想法就是极为普通的东西，但对于我来说，几乎具有颠覆性的意义。

捷尔吉·彼得蹲监狱的时候，就得到过一本法尔卡什·赫勒[3]撰写的经济学教科书，法尔卡什是布达佩斯一所著名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彼得本人虽然拿的是数学学位，但通过法尔卡什的教材，自学了“资产阶级”(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尽管他后来没有在这一领域中进行更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但他年轻时的这段学术经历，对他的后半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从赫勒书中学习到的理论，经由他自己的个人观察都得到了证实。他定期到日内瓦参加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会议，因此他几次提到瑞士的真实情况。他说那是一个稳定且团结的富足国家，商品供给充足，与匈牙利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贫穷和物质匮乏相比，让人印象深刻(继米克洛什·吉迈什之后，捷尔吉是我的朋友中第二位对瑞士的经历感到吃惊的人)。他在苏黎世巴恩霍夫大街上看到了很多精致考

究的商品，他对商品琳琅满目、营业员彬彬有礼，都感到不可思议。他认为这是市场有效性最确切的证据。

捷尔吉·彼得并没有考虑过当代意义上的“制度变迁”。他确信，他可以在反对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经济，并代之以市场协调机制的同时，坚守自己的共产党信仰。一开始，他只是在私人谈话中提出了这种观点。后来，也就是 1954 年和 1956 年，他发表了两篇文章。在文章中，他概述了自己的改革观点，并对其进行了辩护。[4]他也跟一两位较为亲密的同事和中央统计办公室以外的朋友讨论过文章的内容，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我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并动手写了几段，第二篇文章的定稿尤其如此。我向别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文章的形成有所帮助。但是，文章的基本观点肯定是彼得自己的。*

捷尔吉·彼得在谈话和文章中都表现出对市场的高度尊崇，但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相容的。马克思理论结构中的一根支柱，就是认为市场会引发经济混乱。但经济的进步则需要经由市场的混乱状态解放人性，并适时地建立经济秩序。捷尔吉·彼得的观点（以及他向我推荐的法尔卡什·赫勒的教科书）让我看到了市场的优点，对我帮助很大。

除了思想上的联系，我和捷尔吉·彼得还建立了真诚的友谊。**

捷尔吉·彼得的批判性言论和异端经济学思想，一直让保守势力非常恼火。1969 年，警方凭一个不足信的理由，就对他展开了调查。他被软禁起来，但不是关在家里，而是关在医院。他死的时候，胸口上插着一把刀，这表明，他或许是因为不堪忍受凌辱而自杀，但也不排除他杀的可能性。***

现在再说 1955—1956 年的那段时间。我与我最亲密的朋友捷尔吉·彼得的深入交谈，对于重新构建我的经济思想发挥了巨大作用。正如我在第 2 章中所述，我们精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对《资本论》做了注解。通过阅读，我们

---

* 捷尔吉·彼得的想法与奥斯卡·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我敢肯定，彼得与卡德尔（我在前一章提过）以及其他南斯拉夫学者一样，当时并不知道兰格的著作。这些概念都是通过自学才发现的。

** 1956 年以后，捷尔吉·彼得几次从西方给我带来经济学著作，他还帮我与移居国外的友人传递消息。我说这些，只是证明他对我的友谊以及他的古道热肠。我在其他文章（1994c）里，对捷尔吉·彼得有更详细的介绍。

*** 在 1994 年召开的纪念这位伟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的会议上，律师山多尔·尼里介绍了对捷尔吉·彼得死因的刑事调查。他透露，调查人员在勘查死亡地点时，犯下了严重的专业性错误。比如，尸体被移动了，大量的重要细节都没有记录在案，等等。因此，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知道捷尔吉·彼得的确切死因了（Nyíri，1994，pp. 45—47）。

一起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现在，我们又以一起离开马克思经济学的方式（我们仍然是偷偷地跨越了这条思想的疆界），结束了这段故事。我们有过很多次讨论，最后，我们决定将我们的想法变成文字。肯德首先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写成了文章，题目是《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5]。接着，我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论〈资本论〉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两篇文章为我们的进一步讨论提供了理论框架。

还在我撰写本传记的匈牙利文版本时，我已经阅读了肯德的文章。肯德早年流亡的时候，一直随身带着这些文章，后来他把文章交给了我。那个时候，我坚信我的这篇文章已经丢了，再也找不到了。但就在不久之前，也就是本书的匈牙利文版出版之后，英文版尚未付印之前，这篇文章的副本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面前。*

重读 50 年前撰写的这些文章，真的让人非常激动。仅就文章的篇幅而言，就足以让人印象深刻。**我们两人满腔热情地撰写了这些文章，我们精心地遣词造句，严谨地搭建理论框架。尽管我们只能将文章传给少数几个人阅读，但我们精心撰写这些文章，就好像要投稿给最有名望的出版商那样。

要说在马克思主义批判方面思想的成熟性，捷尔吉·彼得显然走在我前面。他对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提出了质疑，那时，我还在为这一理论进行辩护，还在与彼得展开争论。我现在无法回忆起当时我的思维方式是如何发生巨变的，但我敢肯定，我比彼得多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改变了对这几个问题的看法。***

我们两人还在其他许多方面尖锐批评了马克思的原理和方法论。彼得简要地陈述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看法；我也在文章中用一半的篇幅讨论了这一问题。我想在这篇不会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说出我在学位论文中无法表达的思想。**** 我

---

* 1955 年，我将文章的副本给了帕尔·勒切伊，他将这个副本保存在他自己的文件中。2006 年 1 月，他将文章还给了我。

** 彼得的文章有 72 页打印纸，我的更长。

*** 在后面的脚注中，我提到了 1956 年年底和 1957 年年初，我与山多尔·费克特进行的几次讨论。当时，我的这篇文章已经写完 6—8 个月了，我自己也已经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彻底分手了。

**** 我惊讶地发现，我后来才提出的某些想法，已经在这篇文章中有了雏形。比如说，我用几页篇幅讨论了增长速度过快的问题。当时，我称为“跃进”。15 年后，我在一本英文著作中也谈到了这一问题，我还是用同一个词来描述这一现象。

在 1955 年底的这篇文章中，我写道：“短跑运动员在冲刺之前，都会挺起胸膛，向前冲去，这样做有道理，因为或许会为他赢得夺取胜利的最后一英寸。但是，如果长跑运动员在冲刺的时候也挺起胸膛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只会让他毫无必要地浪费力气。”这个比喻非常好，但遗憾的是，我把这事忘了，所以我从来没有在发表的文章中使用过这一比喻。

想为自己以及最亲密的思想伙伴，澄清这本书形成的理论背景。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两篇非法传阅的文章并没有只局限于我的几个挚友手中，政治警察的档案中也有记录。1958 年山多尔·费克特被捕，在审讯期间他亲手写下的供认状中，他提到了 11 个人，其中就详细地谈到了我。这份供词的第二个主要内容就是我和肯德的文章。费克特说，我们的文章“颠覆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原理”，[6]费克特在这句话上加了一个引号，接着又写道：“我是从吉迈什那里第一次听到有这篇文章的，吉迈什实际上赞赏这篇文章。1956 年底，科尔奈也给我看了这篇文章。”*

当时，我们已经疏远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我们对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经济学理论还知之甚少。这并不是一个反对一种理论而接受另一种理论的问题。

开始研究工作

我开始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我的年龄并没有拖我的后腿，我是 27 岁时开始着手博士论文的，这与美国的博士研究生做论文时的年龄相当。

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在准备博士论文时，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教授们做研究的方法了，其中许多人还当过导师的助手。稍后，他们会正式提出申请，学校会为他们安排一位导师指导博士论文。所有导师都会将自己的研究方法传给自己的学生。学生成为教师后，又会培养新一代学生。这类似于行会中的手工艺大师和经由他们指导的学徒的关系。我没有这种师从导师学习研究技术的机会。我的导师陶马什·纳吉是公共理论系的主任，也是我们研究所的头儿，他对我的文章提过很多有用的意见。他有很好的战略意识，他能看出一个人在当时的政治束缚下，能有多大的发展前途。但是，他本人并不从事研究工作，所以

---

* 在供词的第五项中，费克特说他曾经给我看过他的“匈牙利”研究的文章。这里，我转述他的供词如下：“其中有一次关于‘年轻的提坦打败了马克思’的谈话，也是直接针对他的。在我家进行的一次会议中，科尔奈并不同意匈牙利研究中的观点，即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像开普勒的天文学理论一样，也是宇宙科学的组成部分。科尔奈比之以前更强烈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今天，50 年过去了，读到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谈话竟然成了警察眼中的罪行时，那种感觉非常奇怪。在下一章中，我还会谈到费克特的这份供词。

他并不知道做学问的窍门，因此不能传授给我什么研究方法。

我费了几个月时间都没有找到研究的主题。当时，正式分配给我的任务是给彼得·埃尔德什做研究助理。我跟他一起出差，也进行过多次交谈。正如他后来出版的著作所反映的那样，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抽象理论，但他在实证研究方面没有什么经验。他力图向经济负责人就管理工作和计划工作中的问题陈述自己的看法，但他的方式有问题，言辞也很尖锐，常常傲慢地打断别人的谈话，所以别人无法与他进行真诚的交流。他是一个睿智而聪明的人，而且极具嘲弄意识。如果他决定批评什么人，那个人就惨了。他讨厌斯大林的政治体制，对此牢骚满腹，他也不满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麻木状态。他认为我是一个刚从《自由人民报》贬下来的反对派分子，没什么能威胁他的地方，所以他对我无所顾忌。但这种无所顾忌只是他这一方。尽管他批评这儿批评那儿，但他终究还是保留了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和极端忠诚。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发现我的立场。每逢他对我大肆批评马克思主义，我都只是嗯嗯呃呃地支应一番。我的这种方法很管用，有助于我们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几个月过去了，我请求允许我独立工作，埃尔德什和陶马什·纳吉都没有提出什么异议。我已经决定将我的研究集中在轻工业这一狭窄的研究领域里，我想研究这个领域中的经济管理运作方式，以及中央计划在实际工作中的意义何在。我之所以选择轻工业，是因为重工业的数据很难拿到，而重工业与军事工业的关系又意味着很多资料都属于绝密。此外，我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也比较有兴趣，轻工业部门的生产与消费关系也更容易研究，因为轻工业部门的产品多为普通大众所购买。

我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并没有事先提出什么正面的假设。但我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受到一种基本否定的假说的影响：官方教科书和《共产党宣言》中的假设，即计划委员会制定出计划后，经济中的实际运作过程便遵循这一计划来运作的假说，而这一点实际上并不成立。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也没有进行实验。我采用的是向那些参与经济管理和计划工作的人提问的方式。我本能地认为，他们是唯一知道管理者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清楚他们在做些什么的人。我提问的对象有高层、中层和低层工作人员。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与受访者一对一地谈话，但有时候，我也会组织一些集体讨论。在有些工厂里，我还要反复组织集体讨论，因为要在几个小时之内就问卷中的每一个问题进行交流，时间毕竟非常仓促。

受访者都很乐意回答我的问题，几乎无一例外。他们早就准备大胆批评现状了。当时我就想知道，是什么促使他们这么乐于配合我的调查。或许一个原因是，每个人都喜欢抱怨，而匈牙利人尤爱抱怨。但是，可能也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激励因素，也就是说，他们感觉到了我对他们所说内容的浓厚兴趣。我并不是机械地按预先设计的调查问卷，一一向他们提问。他们也看见我在倾听他们的回答时睁大的双眼和渴望获取信息的眼神。我跟他们一起抱怨官僚机构的愚蠢行为，一起痛斥浪费现象，一起声讨漠视消费者需求的现象以及心胸狭窄的上级。我与受访者之间建立起了真诚的人际关系。几年之后，我被经济所开除，我想到轻工业行业里找个工作，他们不止一人冒着风险向我伸出援手。

这暂且按下不表，再回过头来说说我在 1955—1956 年使用的研究方法。我在什么地方学到了这种主要基于个人调查而获取实证资料的方法呢？如果我记忆无误，一定是我在报社工作的经历。我是第一个将这种“分析性报道”引入《自由人民报》的记者。这种分析性报道通常占据了整整一版，而不像普通报道那样，只占据几厘米宽的一个栏目。我们一般有两三名记者会花费几天时间去一家工厂与工人交谈，了解工人对工作的意见。我作为一名党报记者与厂长的关系，自然不同于我作为研究人员与他们的关系。但在从事记者这一行的过程中，我已经掌握了一些调查技巧，我也能感受到这种方法适用的范围。

匈牙利素有乡村研究的传统，大量文献资料给我很大启发。我觉得阅读这些资料是一种极好的学术经验。* 我感到倾听人民的声音，可以储备巨大的实际知识宝藏。

当然，我的实证材料并不完全来自我自己的访谈。通过阅读规章制度和相关指令，通过查找数据以及研究各行各业的统计报表，我对访谈材料进行了补充。很早之前我就意识到，一项命令与其执行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而且，处于不同地位的人，比如地位较高和地位较低的人，对同一种现象所具特征的

---

* 大约在这个时期，我阅读了佐尔坦·绍博（Zoltán Szabó）的《塔德的故事》[*A tardi helyzet*；1986（1936）]和伊姆雷·科瓦奇（Imro Kovács）的《静悄悄的革命》[*A néma forradalom*；1989（1937）]。除了他们所讲述的农民生活之外，我还发现这两位学者和描述社会学家所使用的方法，很有启发意义。他们属于“人民作家”这个很有影响力的知识群体。他们做访谈，利用调查问卷收集数据，并且用一种简单的统计总结来补充第一手经验材料。在我开始熟悉这两本著作时，我对现代社会学使用的方法几乎一无所知。

描述也有很大差异。在当时那种环境下，研究工作和发现真理的过程，真的使人万分激动。*

没有人教过我分析计量数据的当代方法。当时我并不熟悉计量经济技术，而这种分析方法现在不仅博士论文中必用，就是硕士论文中运用也很多。我对当时的无知感到羞愧，但也许我更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我虽然没有技术准备，但我还是通过努力，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关联。50 年后的今天，我斗胆提出一个更为绝对的说法。在本传记中，我还会多次谈到，我没有受过经济学方法的训练所带给我的劣势。但我要说的是，我的这种无知也是我的优势，虽然从一个热衷于自己研究领域的大学教授嘴里说出这种话，听起来像是批评。正因为我没有一位导师可以让我亦步亦趋地跟着他的步伐，所以我敢于提出有原创性的思想。也正是因为我不了解经济研究的当代技术，我才没有迷失在大量形式的和技术的工作中，也不必担心我的回归方程是否合用，也不用管顶级期刊和出版社的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严格的技术要求。除了想了解匈牙利奇特的生产运营机制和运营方式，我没有受到任何因素的影响。

历史学家捷尔吉·彼得里将弗里斯领导的经济研究所的分析方法与我所使用的方法，统称为“幼稚的实证主义”。[7]“幼稚”这个词用得非常妥帖。我的工作就像幼稚的画家或靠本能进行创作的艺术家一样幼稚。这种方法显然原始，却没有受到外部不良风气的影响。我还没有学到专业同行们所使用的更好的方法，所以我的方法较为粗糙，但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这种方法也显示出自己的“活力”，因而让人耳目一新，而且真实。

给我的方法贴上“实证主义”标签，只是说对了一半。刚才我已经谈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那些空中楼阁。在当时那种学术气氛中，漠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区别，摒弃“价值总量与价格总量相等”的戒律，以及那些同样空洞的理论，做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从经验中学习，这完全是一种革命的行动。

我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停留在描摹现实和简单记录实证数据这个层面，在这一方面，我比那些乡村研究者走得更远。我力图将我的经历纳入一个严格的学术架构，以便展示现象中呈现的规律。我一直试图进行因果分析，但也一直没有

---

* 这种研究方法现在仍然管用。比如说，如果分析人员不是零星地而是更经常地使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深入访谈，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东欧后共产党国家、苏联解体后的各国或中国的转型过程了。

拿出一个经得住推敲的理论——不过感谢上帝，我当时确实还没有全盘掌握有关经济关系的理论。但敏锐的读者会感觉到，我已经有了从具体观察中推导出一般结论的意图。

我的研究方法还反映出厘清自己思路的决心。我不是那种整天埋首于笔记的人，我早就养成了一种长时间“工作散步”的习惯，如果我要思考自己搜集起来的素材，或者准备写文章，我就会去树林或街道散步。我的口袋里经常装着一本便签本和一支铅笔，方便我随时停下脚步记录一闪而过的思想火花。*

这一阶段，我已经习惯了在家里或者其他地方构思我的文章，我已经不在办公室做这件事了。这样，我就可以不受任何干扰、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了。在我的多数同事每天都去研究所上班的时候，我却拿出大把的时间在家里写作。这期间，我也培养出一种激发工作热情的“仪式”：工作时，要播放音乐，然后郑重其事地泡上一杯咖啡。长时间伏案工作之后，要休息一下，走上几步放松放松。其实这也是很多学者共同的特征。那时候，我儿子加博尔只有三四岁，我经常送他去幼儿园（回来就成了我的“工作散步”）。加博尔很快就习惯了我的这一工作方式，后来我的第二个儿子安德拉什（András）也很快就明白了，爸爸在家的时候不希望受到别人的打扰。当然，我的这两个算盘，即尽可能抽出时间与孩子在一起和尽可能抽出时间做研究，常常发生冲突。**不过，在我的记忆中，这种冲突并不严重，尽管孩子们或者泰莉的回忆，和我有些不同。

我从研究工作中获得了极大的愉悦。访谈非常吸引人，整理笔记形成文字带给我莫大享受。如果在某件事情上我突然灵光闪现，或是得到了什么结论，那就是我生活中最快乐的瞬间了。我终于为自己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

博士论文的主要观点

不到一年，我就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初稿。根据一些同事的建议，我又对论文

---

* 再后来，在一次类似的散步过程中，我的行为引起了一位路人的怀疑，他走过来跟我搭讪，想知道我在写什么，他怒气冲冲地问我：“你是在帮偷车贼抄写汽车牌号？”

** 我跟许多父母一样，从没有忘记在孩子们睡觉前拿出时间为他们读书。孩子们稍大一点后，我们会一起阅读《维尼熊的故事》、《艾丽丝漫游奇境记》以及弗里杰什·考林蒂写的许多让人快乐的故事。不夸张地说，早期的这些阅读经历以及我们的玩闹，为我的孩子的幽默感打下了基础。即使在他们成年后，还很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点。

稍做修改，但 1956 年夏天我把博士论文交给导师的时候，文章大体上没有多少改动。接下来，我又在 1956 年 9 月，将论文交给经济与法律出版社出版。论文的题目是《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以下称《过度集中》)。

50 年过去了，现在我再次打开这本书，阅读该书仍然使我非常愉快。虽然书中有些段落反映出那时我在政治上的幼稚，但作为作者，在今天读起来，某些段落仍然让我感到自豪。*（我想让读者明白，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我的所有著作。）

我在前言中清楚地陈述了我的研究计划："当然，在大学里有大量的教科书和收集的资料供我们使用，这些教材和资料描绘了我国的经济管理和计划的方法以及我们的定价与工资体系，等等。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共同存在一个严重缺陷：这些教材和资料都没有告诉我们，在现实中，这些经济机制是如何运行的。它们只是描述，如果这些机制能够按照其作者希望的那样运行，它会如何运行……条理清晰地阐述我国经济机制的实际运行情况，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迄今为止，我国的经济学文献中仍然没有相关论述。"[8]

这本书一开始便阐述了计划指令体系，人们或许会认为，计划经济的首要目的，是使人们提前考虑未来几年的事情，事实并非如此。企业甚至连年度计划都没有做过认真考虑。主要原因是，企业没有激励机制(《过度集中》则尖锐地提出了激励问题，几十年后，这已经是经济学的一个主要问题了)。经济领域中存在物资和半成品供应的延搁以及需求的突然变化等情况。这些情况再加上国民经济计划的不断变动，就会产生出不确定性，并削弱企业年度计划的可靠性。最直接影响企业生产的是季度计划，但是，制定季度计划的并不是企业，而是企业的上级机构，即管理整个行业的政府管理机构。现实中，根本不存在我们时常提及的企业自主性。然而，企业同样也无法完成季度计划提出的目标。一个力图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生产的企业，必然会受到不断变化的运营条件的干扰。另一方面，如果企业不必严格遵循季度计划，那么计划也就失去了权威性。"这种矛盾的本质在于，在当前的条件下，我们无法通过修订计划(无论是严格推行计划还是不严格执行计划)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根子，已经深植于我们的计划方法的矛盾之中。"[9](这种言论触怒了计划经济的卫道士们，我仍然记得，在一

* 我并不是唯一认可这本书的人。35 年后，最初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商，将该书增加一篇新的导言，重印了该书的匈牙利文版。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在 30 多年后重印了英文本。

次辩论中，有人勃然大怒道："你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到底想干什么？"）

事实证明，最重要的指标是"生产价值"。企业的所有成员很快就明白了，生产价值不仅可以通过"正当而合理"的方法，还可以靠要小聪明而增加。比如说，可以改变产品组合，提高物质密集型产品的比例，从而提高价格。（《过度集中》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使在今天，这个问题在关于激励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际实施过程中，都是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也就是说，无论将定量指标与奖金联系还是与惩罚联系，指标的价值都会被扭曲。无论激励机制的设计者采用何种策略，那些受激励机制管辖的人，总是立刻就找到了与之针锋相对的有效对策。）

《过度集中》也详细讨论了其他计划目标。我用了 64 页的篇幅，逐项阐述了指令性体制的不协调性，以及这一体制产生的消极效应。

有一章专门讨论了激励——包括工资、奖金和道德激励——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还讨论了行政管制和处罚的作用（比如纪律处分、法院起诉和有期徒刑等）。"体制对物质刺激的依赖程度越低（以及对人们积极性的依赖程度越低），被迫使用强制手段的可能性越高。"[10]体制的这种不协调会诱使管理者违反那些不能严格遵守的规则，如果管理者真的违反了规则并被逮个正着，他就会因此而受到处罚。

我在 40 年后的一本书中，对社会主义制度做了总结。我的主要结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部改革或者某些方面的"放松管制"，会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行性。但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没有约束的社会主义制度。我现在重读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发现书中已经有了这个思想的雏形。按照《过度集中》的说法，"新方针"的一个后果是，上级机关已经很少使用行政手段（各种惩罚措施和其他形式的强制手段）来加强纪律。但是在开始实施放松管制的同时，又没有一个更为有效和全面的物质激励机制来取代先前的措施。以前的经济机制未经调整，仍在继续使用。不过，这种经济机制必须靠"润滑剂"的润滑，才能平稳运行，而这种润滑剂又要由广泛实施的行政管理措施来提供。如果缺少这种由行政管理措施提供的润滑剂，这一体系各部分齿轮的工作就无法让人满意。这种暧昧的做法和错配的情况，就是那一时期引发许多麻烦的根本原因之一。[11]

指令与激励方法同时使用，就会产生某种规律，下面是《过度集中》中强调的一些规律：

（1）管理者的注意力会转向定量管理。由于生产量的上升有益于公众的利

益，所以这种做法有一定的价值。同时，这种做法也有一定的损害，因为注重数量也会给社会造成一定的危害。

（2）对任务的重要性排序错误。比如说，降低成本或发展技术都被放到了次要位置。原因在于，指令计划或激励方法都没有鼓励人们从事这两项任务。

（3）迷信“100%”。如果要求严格执行计划，那么，低于 100%的完成率就是违反指令的表现。这种迷信常常会造成非常有害的结果，管理者会采用一切手段，不惜代价地 100%完成计划。

（4）“计划框架内的投机行为”。我用这句话来表明某些管理者只根据法律和指令的字面意义来达成生产与消费水平，以确保自己获得奖金和承认的行为。同时，他们常常不顾经济的最佳利益问题。

（5）是宽松计划还是强化计划，存在激烈的争论。《过度集中》一书对这方面的阐述，在后来匈牙利的论战中被称为“计划谈判”（plan bargaining）。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则称为“棘轮效应”*。如果一家追逐更多奖金或更大的认可的企业，今年大幅度超额完成了计划，那么来年的计划便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企业今年完成了计划的 105%或者 110%，那么来年就以此为 100%来制定计划。因此，企业就有了瞒报业绩的动机，而不是汇报自己 100%完成了计划，或是 102%完成了计划。此外，在计划编制完成之前的讨论过程中，企业管理者会将自己的生产能力说得比实际能力低，并夸大自己的困难，以争取获得一个“更宽松”的计划。

（6）生产活动的周期性不稳定。生产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扩张和收缩，一会儿“加班加点”，一会儿无事可做。生产的波动性与计划的时间节奏之间，明显存在一种关系。在计划期接近尾声时，如果企业计划的完成存在困难，奖金似乎难以到手，企业必定会加快生产速度，以求完成计划任务。**

（7）“今天”与“明天”之间的冲突。这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尤其今天的消费和明天的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关系，更是如此。《过度集中》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这一问题，书中主要关注人们如何将管理工作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完成短期计划上，如何忽视了可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益的长期任务（比如技术开发、新

---

* 棘轮有齿，因此只能向前无法后退，可以用来生动地比喻计划经济中讨价还价的一个特点，下级机关一旦达到了上级机关设定的绩效水平后，就必须维持这一水平，不能后退。

** 安德拉什·布罗迪（Andras Brody，1956）是第一个对生产波动及其原因进行分析的学者，我觉得他的结论和研究方法都让人信服，而且具有指导意义。

产品的引进以及工作组织形式的现代化，等等）。

《过度集中》将这些规律称为“不能简单地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他们只能通过启人思考的语句，削弱但不能彻底根除这些规律的作用。为了消除这些趋势，我们的计划和激励体系以及我们管理经济的方法，应该以全面而深层次地改进自己为目标”。[12]

现在，我们将这种方法与早先斯大林“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说法进行比较。这些文献的作者希望经济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后来，这种规范性要求被称为“法则”，这本是一个专门用于实证科学的术语。科学只能将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称为法则。《过度集中》中描述的规则或“必要的趋势”，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因此它驳斥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这个命题。

《过度集中》还用一章的篇幅讨论了短缺问题，后来，短缺成了我的另一本著作的核心主题。由于我在书中分析的是生产，所以物资匮乏成了我探讨的中心问题。当时，我已经正确地感知到了短缺的后果，即生产效率下降，消费者受制于生产者。《过度集中》表明了短缺与集中之间的密切关系，也阐明了短缺加剧集中、集中又引致短缺的趋势。*

我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周期性短缺的原因。我在《过度集中》中描述了其中的某些原因（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在深入进行因果分析之前，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接下来的一章对我的结论进一步进行了概括。企业一般会受到两个方向的影响。一个企业与其他企业有着横向关系，但与上级机关存在纵向关系。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纵向关系是主导关系，横向关系是相对次要的关系。《过度集中》是第一本运用这种区分的书，自该书出版之后，这种区分已经广为流行了。

最后一章首先简要概括了全书的观点，即“经济管理的过度集中有一个前后连贯的统一机制，它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和若干发展趋势，以及自己特有的规律”。[13]然而，这一特征并不意味着这一机制是和谐的。相反，它具有深刻的不协调性。这一机制力图用指令来规制一切，这是一个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它极力将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化处理，这也是一个无法企及的目标。

---

* 《过度集中》只有一个地方引用了马克思的理论，这一理论谈到了短缺问题。马克思很少提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如何管理经济的话题。《资本论》第二卷有一个简短的结论[1992(1885), pp. 544—545]，马克思在这一结论中建议，应该永远保持生产的相对过剩，以防止生产的波动（即让库存与生产同时增长）。

这一观念清楚地提出了我后来称为“制度范式”的概念。理解了细节还不足以充分把握整体，因为整体大于所有部分之和。因此，改变一两个细节不足以影响整体，也就是说，细节的小小改动不会产生整体的变化。

《过度集中》的最后一章力图澄清过度集中的根源，但我的这一努力只完成了一半。我现在还不清楚，过度集中在政治结构和财产关系体系中的根到底有多深。不过，那段关于自发性恐惧的阐述还值得一提，这几段彻底激怒了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读者。*

最后，《过度集中》也对谨小慎微的改革实验和失败的过程做了阐述，也对阻碍改革的保守力量提出了警告。《过度集中》自始至终只是在做正面描述和分析，全书没有提出任何改革建议。只是在最后几行宣称“废除过度集中的工作……终将取得胜利”，给读者一些鼓励。[14]

2003 年，我用了几个星期通读了我在《自由人民报》发表的文章和《过度集中》。《过度集中》文风的显著变化让我非常震动。我发现，我终于用平实客观的风格替代了以前为激发人们的工作绩效所使用的那种热情赞扬和大声规劝的文风。两百多页的《过度集中》，大部分篇幅都在报告事实。

《过度集中》想传达的信息不仅仅包含在文字中，也包含在文字之外。书中使用的是“中性的”技术术语，从而避免了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行话。改革派经济学家在进行经济机制讨论时提出的观点，不是我们必须给予市场更多的空间，而是我们必须“允许价值规律更自由地发挥作用”。多年之后，苏联的列昂尼德·康托罗维奇(Leonid Kantorovich)和他的那帮数理经济学家同事，仍然在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行话来讨论线性规划制造的所谓影子价格。

人们在传达自己思想时所使用的语言，往往具有很重大的作用。在《过度集中》或我后来发表的文章中，我没有公开批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如果读者熟悉马克思主义，马上就会发现，我非常慎重而自觉地在避免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在前面的章节中，在我未出版的《过度集中》的补充资料中，都清楚地体现出这种慎重和自觉的态度)。匈牙利有些经济学家借鉴了我提出的这种研究方法，但他们仍然长期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这套概念体系，这套概念体系阻碍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解放，也阻碍了匈牙利其他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

---

* 遗憾的是，英文版中删除了这几段文字。我将在下一章谈谈删去这一部分文字的时代背景。

对博士论文的初步认可

我的博士论文的第一批读者就是经济学家同行和亲近的朋友，他们都热情地对这篇论文予以认可。我从未料到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由于我刚刚踏入研究领域，缺乏自信，所以他们的认可给了我新的力量。

在研究所的讨论会上，这篇论文也得到了很多好评，这一消息口口相传，很快就在布达佩斯传播开来。人们说它不同于通常的论文，是一份“精选的政治佳肴”。

按照匈牙利的规定，博士论文必须经过公开答辩。研究生学位授予委员会，也就是匈牙利科研资格评定委员会，会指派答辩组成员和评审委员，评审委员会则在答辩结束后，决定申请人是否获得学位。

大多数博士答辩会吸引二三十名听众，这些听众大多是答辩人的亲友，少数人则是对论文主题感兴趣。《过度集中》的答辩会于 1956 年 9 月 24 日举行，座无虚席。[15]我的记忆力或许有些帮我添彩，但我想应该有两百人或者比这更多的人，参加了我的论文答辩会。

捷尔吉·彼得担任了答辩委员会主席，他说：“我曾经研究过物理学，我们知道，在物理学中，真正的科学研究始于伽利略。伽利略之前的物理学只是思辨，即通过思考来研究问题。伽利略是第一位将尺子、时钟和砝码引入物理学并进行测量的学者。这也是真正的科学史的起点。我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这篇博士论文符合这种客观的规范，诚实地讨论了研究对象，且没有受内心情感的影响。此即是此，彼即是彼，他是将研究对象放在显微镜下进行剖析，并记录下他所看到的一切。”[16]当然，将我的论文与伽利略的成就相比，过分夸大了我的成绩（而且，对伽利略所使用工具的说法也不准确，与科学史不完全一致）。不过，这种比喻也说明了彼得把《过度集中》与通常的经济学研究进行比较之后，视为社会主义经济学转折点的原因。正是因为《过度集中》用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观察，对现象的量度和准确描述替代了凭空的推断。

这场答辩的答辩组成员之一，是轻工业部部长米克洛什·奥伊陶伊，他明确表示对论文观点的欣赏与赞同。（后来奥伊陶伊在卡达尔执政期间，晋升为国家计划办公室副主任。在《过度集中》遭到粗暴的攻击时，我多次请求他公开他对这篇论文的评论，但他回避了我的请求。）

答辩组另一个成员是玛利亚·奥古斯丁诺维奇(Mária Augusztinovics)，她也对论文给予了很好的评价。[17]但是，她又批评说，这篇论文缺少足够的理论分析，或者说，没有使用抽象的分析方法。轮到我答辩时，我的辩驳有些激烈。我并不怀疑抽象分析方法或者“纯理论”在解释复杂现实关系上的重要作用，但是，古斯蒂(Guszti，当时和现在，人们都这么叫她)却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对我提出了这个要求。而那时候，我迫切想结束那种简单地模仿马克思思维风格的空洞抽象方法。

听众席上也出现了许多有意思的评价。当时彼得·曼迪(Péter Mándi)提出一个最吸引人的意见，也是后来的批评文章引用最多的一个意见。[18]我之前认识彼得，有一段时间，他在党中央工作过，后来在伊什特万·弗里斯的系里当头。他提的反对意见是，论文还不足以得出结论。他认为，不应该简单地在具体经济机制中寻找问题的根源。曼迪说：“如果体制不好，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清除每一个错误，而应该从根本上改变整个体制。”

我不知道曼迪是否了解这一体制。我所能说的是，用今天的眼光看，我也确实持同样的观点。《过度集中》在因果分析的关键处停下来。虽然论文正确地指出了诸多问题的原因是命令经济，一种极端集权制并排斥市场的协调作用，但它确实没有更深入的分析。它没有认识到，政治压制、意识形态垄断以及排挤私人财产的国有制对经济运行造成的基本障碍。曼迪当时或许已经理解了这些思想，但我的思想成熟过程却花了更长时间。我仍然相信，可以通过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正如我在描述我 1956 年的思想状态时所说的，当时我仍然是一个*幼稚的改革者*。

由于我坚信存在体制改革的可能性，所以在 1956 年春天，我同意指导一个工作小组，总结研究所给党和政府提出的改革建议。本所几位同仁再加上外面的一些人，有机会在我的指导下从事提案工作。我的助手有安德拉什·纳吉、彼得·鲍德和阿兰卡·雷代伊。8 月，我们拿出了一份 120 页的材料，包括一项建议，用冷静而谨慎的措词，建议匈牙利实施“市场社会主义”，而且还有大量的具体细节。[19]这份材料谦虚地将自己限制在轻工业范围内，但材料所包含的信息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这份材料可以被视为最终于 1968 年推行的新经济机制的第一份草案。支撑这份改革建议书的思想灵感就是捷尔吉·彼得的文章和我的《过度集中》。

这份改革建议书在同情其基本观点的人群中引起了实质性的不带偏见的争

论，经济所内外的专家学者都参与了这场讨论。小农党前经济政策负责人，后受邀于1957年进入卡达尔政府担任经济改革委员会领导人的伊什特万·沃尔高，认真阅读了我的《过度集中》和经济所改革建议书，并做了评论。我的论文指导导师兼我在经济所的上司，也是共产党任命的1968年改革准备委员会负责人陶马什·纳吉，也通读了我的论文和这份改革建议书。许多深受我的论文和这份改革建议书影响的人，后来都参加了1957年的沃尔高委员会以及20世纪60年代由纳吉领导的委员会。我确信，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的思想，对他们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影响。甚至在我自己已经超越了幼稚改革者阶段，开始怀疑人们能否或者应该停止社会主义的局部改革之时，我对这些人和其他人的影响仍在继续，甚至还在加强。

我原来的工作单位，即《自由人民报》也来联系我，请我为他们写一篇文章，扼要谈谈我在博士论文中的思想和改革建议书中的主要观点。说来真巧，我的这篇文章与共产党重新接受伊姆雷·纳吉的消息，都刊登在10月14日的报纸上，[20]这一巧合真是一份意外的礼物。

我到经济所开始我的研究生涯时被降职为助理研究员。现在，我的上司伊什特万·弗里斯公开强调我在工作中做出的巨大成绩，并将我升职为研究员，还提高了我的薪水，又发了奖金。我被《自由人民报》解聘才过去一年半，我的职业生涯又迅速向前推进了。

政治背景

如果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美国，发生在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大道的哈佛大学或者麻省理工学院，你或许会认为事情很简单，科尔奈只是换了一种职业而已。他原来是一名记者，现在转而从事学术研究，而且工作做得很好。

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东欧的布达佩斯，我也不是一个坐在宁静的大学图书馆里的学生，正在埋头研究导师推荐的规定问题。在本章的开头，我已经讲了我的研究生涯是怎样开始的，现在是时候来谈谈当时的政治背景了。

我进入研究所的时候，拉科西及其同党仍然控制着政府，他们坚信，他们已经再次巩固了权力。8个月之后，所有共产党国家都受到了苏共二十大风暴的冲击，在这次会议上，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发表了指控斯大林

的著名演讲。匈牙利政坛再度恢复了活力。知识分子不久骚动起来，激进的知识分子小圈子——裴多菲俱乐部(Petőfi Circle)，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意见，连续发动论战指责政府。开始，人们还有点胆怯，但反对之声逐渐壮大，人们开始要求回归“新方针”，解除拉科西的职务，让伊姆雷·纳吉重返党组织，并担任政治领袖。

我的文章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中出现，其国内效应自然要被放大。我当时并没有想入非非，认为到场参加我的论文答辩的多数人，都是被我论文的学术价值吸引而来。多数人之所以来旁听，是因为有消息说，我的论文对当时的现实状况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我的论文答辩于 1956 年 9 月 24 日进行，这时距 1956 年革命的爆发仅有一个月时间。当时，天空中阴云密布，蒂博尔·梅劳伊在《自由人民报》叛逆者大会上呼吁的所谓“清洗风暴”，正在日益逼近。

这种状况可以用来解释为何各大报纸都在报道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情况。正常情况下，无论是在匈牙利还是其他国家，报纸是不会报道国内外博士论文的主题的。这些报纸之所以报道我的论文答辩过程，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已经不仅是专业的学术聚会了：这是一个政治事件。

任何一位学者得到特殊关注都会非常惬意。我也很高兴，同时也有些尴尬。要说清楚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还得回到当时的环境，说一说我那时对学术研究和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之关系的看法。

在我知道自己要去匈牙利科学院的研究所工作时，我就暗自下了决心，要将全部精力投入未来的学术研究。就是在我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将新闻工作看成我的真正职业。我觉得，从 1945—1955 年，我一直从事的是政治职业，但我在其中担当的政治角色，到底是青年运动工作者，还是中央党报的编辑，其实已经是个次要问题。现在我想一劳永逸地与这种政治生涯断绝关系。学术研究之所以吸引我，不仅因为我对思想感兴趣，还因为我希望这是一个能让我发挥最大才智的领域。至少它可以满足我逃避政治的消极动机。

正如我在第 3 章的末尾所说的那样，我在政治上的幻想已经破灭。政治欺骗了我，所以我对政治非常厌恶。此外，我还想谈谈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对我而言，之前的十年是一个漫长的考验期，我觉得我没能通过考验。欺骗是双方的行为，骗人的和被骗的。我记得，在我儿子安德拉什十几岁的时候，我跟他谈论过 20 世纪 50 年代的事情，当时他问我：“爸爸，你是个聪明人，可你当时怎么那么愚钝?”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力图忠实地描述这一过程，并对这个过程的发展做出详

细的解释。虽然有这些解释和开脱的理由，但安德拉什的质疑问得好，不过这样说把问题简单化了。

任何一个人，如果想成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具备某些必不可少的特征。拥有智能还不够，其他很多职业也都要智能。除此之外，政治家还必须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信念，并把这种信念传递给他人。有一段时间，我努力让自己成为具有这种信念的人，但在 1955 年，我决定永远不再充当这种角色了。我希望自己能够自由地质疑任何事情，这与政治的成功之道是不相容的。

成功的政治家要有权力欲的激励。对我而言，即使当时在政治领域工作的时候，我的权力欲也非常弱。现在，我已经看到那些醉心于权力的人所犯下的罪行，因此我最终决定，我不再继续为政治而奋斗了。我要拒绝所有与政治相关的职位，即使这些职位显示出权力的诱惑，我也不接受。

政治家如果没有一点冷酷无情和寡廉鲜耻，就不可能有所成就。他们必须厚着脸皮听别人的辱骂，而且还需要在经过政治计算之后，才能回答别人的问题，而不是匆忙回应。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为政治理念和党或者运动服务的重要性要高于天伦之乐，高于友谊、艺术或者自然。而在我身上，从来没有表现出这么多的政治家禀赋。实际上，如果我要描述自己的话，我会说我的每个性格特征都与上述政治家的性格特征正好相对。所以，我决定，我不想具有与政治家相同的心智特征。

我也不想让政治家的角色与研究人员的角色纠结在一起。我担心这两种角色不可能采用相同的方式获得成功（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对的）。造成这一困难的原因，倒不是一人担当两个角色会导致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在两个角色之间分扯不开，从而迫使自己生活在与自己的永远争斗之中。此外，这两种角色都会影响我的心态。没有人能够在早上扮演一个精力充沛并具有明确偏向性的政治家，下午又成为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另一个人。我无法无条件地相信自己在双数日子里摆出正直无私的样子，又在单数日子里用怀疑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分析结果。

因此，我决定选择从事学术研究。我不能说从我做了这个决定之日开始，我便百分之百地遵守自己的决定。谁能自始至终保持一种想法呢？但我可以说，除了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坚守自己的选择。

当然，这里还存在一个严肃的问题，即这两种职业的分界线在哪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在科学世界里选择一个与政治完全无关的研究领域，尽管我可以

做出这种选择。经济学中有些课题是纯方法论问题，技术性很强，而且可以获得很高的尊重。但我对这类课题不甚感兴趣。我最希望做的，就是研究身边的事情。我非常想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我一分钟都没有想过，从一名记者转为科研人员，就会终结我对这个国家或人民所负的责任。我希望能够从事一种“有担当”的科学研究。

这样我们再转回到这个问题上：就我的情况而论，“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我坚定地做出自己的基本选择（选择科学，而不是选择政治）之时，事先并不清楚科学与政治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不久我就发现，科学与政治之间的界线，并不像地图上的分界线那样清楚，它是一条宽广的无人地带。每逢我想确定，我可以担当什么、抛弃什么时，我都会尝试逐个对每个选择进行分析，以找出这个界线在哪里，省得在中途犯错（现在我仍然在做这种努力）。

我当时很没有经验。实际上，任何一个想对科学和学术有所贡献的人，都需要公开发表自己的发现。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在西方国家，学术生涯与出版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的著作会帮我在大学里获得教职。但我从科学发展史中了解到，一本保存在抽屉里的著作，虽然可能会使几位后来的学者惊讶，但却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我是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里做研究，这个国家又从政治上对合法出版加以某种限制，那我就必须非常现实地考虑这些情况。我在后文中将再次详细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合法出版与非法出版的问题），但我在这里必须事先说明当时我陷入这一两难境地的原因。

那时候，我写了一篇针对彼得·肯德文章的长篇评论，其中陈述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米克洛什·吉迈什看到了这篇评论，他非常欣赏这篇文章，主动提出复印分发。我拒绝了这个提议，我不想冒这个风险，使我的博士论文无法合法出版。对我而言，论及马克思主义的那篇文章只有一个目的，即梳理我的思想。我当时要做的主要事情是把我撰写博士论文时的各种想法梳理一遍，这样我就能对每一个观点进行推敲，找出我已经了解并可以发表的观点，以及那些同样也了解却不能发表的观点。这就意味着，我的某些想法仍然深藏在我心中，这种不得已的沉默非常痛苦。非法派发这类著作可能会有几十名或者几百名读者抓住了书中的激进思想。如果合法出版的话，就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国内外读者，并产生持久性影响。

我在裴多菲俱乐部会议上，感受到来自学术和政治两个方面的极度兴奋。我参加了俱乐部的所有会议，也许只有一次没能到场。但是，我只发过一次言，

那是在一次经济问题辩论会上，我禁不住提了一个问题。虽然我已经就他们讨论的问题写过多篇文章，但我从未想过要在会上谈谈这些问题。作为一名听众，我觉得会议的气氛深深吸引了我。但作为一名潜在的演讲人，我觉得我并不适应这个环境。这些会议将学术领域和政治集会中的专家辩论奇妙地组合在一起。发言者必须进行客观的论证，还要利用大众心理学的手段。我感到裴多菲俱乐部的辩论发生了日益重要和可喜的变化。但我冷静评估了自己的能力之后，认为这不是我适合的风格。我欣赏的是大学讲座之后的问答阶段。这一阶段较为适合学者这种角色。你只要做好专业上的准备，学术上下点功夫，就足以应付了。而那些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会议则需要你激发出听众的热情，或者煽动他们对对手的愤怒，我觉得自己不具有这方面的天分。

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事情。有些人会认为我的选择过于绝对化了，但有些人也非常理解我的这种选择，并顺应了我的选择。无论人们对我的选择有什么反应，我决定全身心地投入科学和学术研究，我不想三心二意。

注 释

[1] Liska and Máriás, 1954.

[2] Hegedűs, 1990.

[3] Heller, 1988.

[4] Péter, 1954, 1956.

[5] Kende, 1955. 这份手稿保存在作者手中。

[6] ÁBTL V-145-288/document 2, pp. 325—326. 山多尔·费克特的供词，其中第 2 点和第 5 点。日期：1958 年 12 月 18 日。

[7] Péteri, 2001, p. 51. 更广泛的了解，参见 Péteri, 1997。

[8] Kornai, 1994b(1959), pp. viii. ix.

[9] Kornai, 1994b(1959), p. 27.

[10] Kornai, 1994b(1959), p. 112.

[11] Kornai, 1994b(1959), p. 114.

[12] Kornai, 1994b(1959), p. 146.

[13] Kornai, 1994b(1959), p. 215.

[14] Kornai, 1994a(1959), p. 236.

[15] MTALt TMB 891/368. 有关雅诺什·科尔奈论文的争论纪要。日期：1956 年 9 月 24 日。参见 Esze, 1956。

[16] MTALt TMB 891/368, p. 41. 我直接引用了档案中捷尔吉·彼得的原话，只是稍作了文字

修正。

[17] 那时玛利亚·奥古斯丁诺维奇婚后改名格罗·陶马什妮(即陶马什·格罗夫人)。我的论文答辩纪要中记录她在答辩中的表现时使用了婚后的姓名。

[18] MTALt TMB 891/368, pp. 2—11.

[19] 我个人收藏的文件中包括这份改革提案的复本。

[20] Kornai, 1956.

6. 革命及其后：1956年10月23日—1959年

1956年10月的匈牙利革命并不全在意料之外。我记得我的两位朋友米克洛什·吉迈什和彼得·肯德曾经对一些不同的征兆做过评论(我记得是分别说的)，他们觉得政治紧张程度已达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不满情绪可能会在秋天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到了9月和10月，局势明显加速升级。但或许没有一个人——当然也包括我——已经预测到事件会在何时并以何种方式爆发。

伊姆雷·纳吉的新政府计划

10月23日下午，我正在和费伦茨·多纳特谈话，有人通知我们参加在佐尔坦·沃什办公室的讨论。多纳特一直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共产党人，在伊姆雷·纳吉担任农业部部长的时候曾任州书记，后来又做过马加什·拉科西政府书记处的工作，但在准备对雅诺什·卡达尔进行审判的时候被捕，坐了几年牢。1954年他获释出狱，被任命为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成了伊什特万·弗里斯的副手。当时，许多外人将他视为右翼阵营的领袖人物。但我对他充满敬意，他对我也礼遇有加。在他结束卡达尔政权下的牢狱生涯之后，我们成了朋友。

佐尔坦·沃什也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我们常常在他的办公室讨论问题。他曾与马加什·拉科西在塞盖德奇洛格监狱中度过了15年时间。1945年，他当选为布达佩斯市市长时，凭自己的传奇经历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在他一波三折的人生历程中，他担任过经济高级理事会会长以及国家计划办公室主任，我就是在国家计划办公室跟他认识的。他的一生常常因为拉科西一时的心血来潮

而起起落落。1956年，他正担任国家合作委员会主席一职。

沃什现在支持伊姆雷·纳吉一派。我们在他办公室谈论的时候，电话一直在响，沃什接到报告说，人群已经在拜姆广场聚集，并正在向理工大学前进。多纳特估计伊姆雷·纳吉肯定会成为新一任的总理。因此，我们必须为他准备好呈交给议会的讲稿和施政纲领。我们首先就谁来执笔撰稿达成了一致意见。有人(我认为是陶马什·纳吉)建议让我起草报告中有关经济的部分。贝洛·奇科什—纳吉则自告奋勇，说他愿意承担这项工作。但是，多纳特还是决定让我来写。曾经担任过国家工业部书记的伊姆雷·考尔曹格把他的建议稿给我参考。捷尔吉·彼得的好友朱莉娅·佐洛说，如果我需要的话，她会为我提供相应的数据，她还建议我直接去中央统计办公室撰写报告。因为捷尔吉·彼得在国外，所以我们可以使用他的房间，他的秘书也可以任我差遣。于是，我接受了这项任务![1]

没有人知道1956年10月23日那个下午意味着什么。但是，像与会的其他人一样，我感觉到我们正在经历具有历史意义的几个小时。在那个重大时刻，我把一心从事科学而非政治的决定，暂时抛在了一边。

我们在会上就施政纲领的内容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当我深夜回家后，朋友通过电话告诉我事件的进展，其中包括在电台附近发生的事情，国家安全局的人在那里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了枪。第二天早上，我又来到中央统计办公室，坐在捷尔吉·彼得的办公桌旁，继续我的工作。

遗憾的是，这份草稿的原件丢了。11月4日之后，因为担心警察会来搜我的公寓，我让姐姐莉莉把稿子藏了起来。其实一开始这份稿子没出什么事情，但是几天之后，我让母亲和莉莉帮我把米克洛什·吉迈什藏在这里几天。他离开我母亲的公寓后还是被抓了，莉莉非常害怕警察会去搜她的公寓，所以她把我让她藏好的稿子付之一炬，其中就包括我10月份以来一直在起草的施政纲领。现在我只能凭借记忆重写一遍了。

如果我知道自己想要表达什么，那么一般而言，总是文思泉涌，下笔如有神助。但是我已经忘了这篇报告我从头开始写了多少，我能做的就是再一次地重新开始。两三天后，我完成了初稿。我的任务是勾勒出政纲的经济内容，以及实现这一政纲需要配套实施的社会和政治措施。但我不应该就政党/政治、法律或外交政策发表意见。

正如我所说过的，10月23日，我们在佐尔坦·沃什办公室碰面的时候，已经

就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做了讨论，但是我仍然放手写下了我认为正确的内容。伊姆雷·纳吉和他的助手会再检查一遍草稿，确定哪些可以保留，哪些应该改一改。

这份草案一旦被采用，总理就会在准备工作完成后，宣布解除之前采用的计划指导体制，从指令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顺应这种转变，他也会允许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决策，也就是将工厂民主制度化。（我为这份政纲已经忙了两三天了，有消息传来，工人委员会已经成立。这让我确信，在这份政纲中一定要写上工人自我管理的内容。）

这份草案旨在鼓励私人手工业者和商人重回自己的商业本行，但没有提及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问题。相反，草案重点强调了对国有资产的保护。

在农业领域，草案提出要根据人们的意愿，解散强行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即集体农庄），并重新恢复农民的土地私人所有制度。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仍然决定一起进行生产的合作社，一样给予支持。

草案也提出要与各个国家建立更加广泛的外贸关系，却没有提出匈牙利脱离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 的事情，也没有允许匈牙利贸易完全自由化。

这份草案也提到了宏观经济领域的紧张态势。虽然其中也提到不能恶化目前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平，但也没有提出如何进一步快速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撰写的这份草案是 1953 年“新方针”的直接延续，但其背景则是三年后的具体经济形势。草案在建设“市场社会主义”和“工厂民主”方面的说法，也超过了早期运动中的说法。在 1953 年 6 月的决议中，这些思想还没有成型。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之所以推动这些思想往前，是因为在我过去 10 到 12 个月的研究中，我提出的那些被专家乐见的改革建议，推动我的思想朝这个方向发展。

我们再回来谈谈 1954 年的事情。如果 1954 年 10 月，伊姆雷·纳吉在短暂赢得党的中央领导权后的几个星期内，向议会发表演说，那么，我的草案或许就能成为一份政纲的良好起点，这也会是为伊姆雷·纳吉量身定制的一份政纲，甚

---

* 经济互助委员会是协调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组织。西方一般称为 COMECON。

** 在 10 月 23 日的预备会议上，已经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有的人希望尽最大可能为伊姆雷·纳吉制定一个得人心的施政纲领。但有的人认为只能给出一个较为现实且可行的承诺。同样的两难问题今天仍然不断困惑并分化着政治家阵营。但对我而言，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认为应该给人民一个审慎且负责任的承诺。

至与他激进的改革共产党的思路非常吻合。

当然，历史不会在1954年10月停下脚步。1956年10月23日开始的历史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一框架。在革命开始的前几天，人们似乎还相信，可以使用“民主”的形式，通过改革来保留一党体制。但不久，我们就清楚地看见了正加速发生的变化。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与1945年的合作伙伴组成的联合政府。几天之内，匈牙利先后组建了二十多个政党，政治形势迅速向多党制方向发展。到了第三天或者第四天，我就发现我的草案与当前的政治现状完全挂不上钩了。草拟一份适用于多党联合制的经济纲领成了我始料未及的任务。

我们不可能用违背事实的说法来描述，如果形势稳定，足以允许这份政纲公之于众，伊姆雷·纳吉联合政府的经济纲领会是何种情况。1956年11月3日，也就是苏联干预的前一天——盖佐·洛松茨基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在回答一个问题时说道：“本届政府一致认可过去12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不会放弃土地改革、工厂国有化以及福利改革等等做法……政府决心——一致同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资本主义制度死灰复燃。”[2]实际上在这次新闻发布会前几天，我对政府的经济纲领已经颇感忧虑。我承认我对这个国家的政治未来产生了怀疑，我并没有排除匈牙利从根本上超越现在的社会主义改革阶段、建立类似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的可能性。

很多事情让我感到担忧：眼前的紧张气氛以及极端主义信号传达的信息，等等。从我的政治或者世界观的角度看，我并没有对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产生对立情绪。相反，我发自内心地为匈牙利能走向真正的民主感到高兴。但是我缺乏一定的专业知识或者信息，来让我拟定一份适应新的政治现实的施政纲领。我明白，也许在费伦茨·多纳特、佐尔坦·沃什或者陶马什·纳吉看来，我是一名知识渊博的经济学家，但事实上对于如何使一个国家从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从社会主义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市场经济，我确实知之甚少。*

经过几天的痛苦斗争，我最终决定停止撰写这份施政纲领。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多纳特，他对我的想法表示理解。我把已经写好的部分纲领内容让他的秘书转给了他，但我估计，那份稿子应该也丢了。

---

* 33年后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我现在已经拥有了很多知识，所以我已经能够针对这类事情提出非常成熟且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1989年，在我撰写《满怀热情》的小册子之时（即匈牙利文版本《通向自由经济之路》的前身），我就觉得我已经能够表达清楚自己的想法了，比如任务是什么，这个任务应该交给谁来承担，当然如果他们愿意承担的话。

放弃这项任务确实使我非常痛苦——这是我在专业和政治上的双重失败。历史风暴在我身边腾起，但我却因为见识短浅和知识不足，只能面对稿纸，知难而退。

《匈牙利自由报》——一份新报纸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无所事事地坐在办公桌前，有时候也给彼得办公室的秘书安排一些事情，后来我决定出去转转。10 月 29 日早晨，我经过彼得·肯德离我家不远的公寓，然后我们一起去了帕尔·勒切伊的住所。我还记得，帕尔穿着一件粉色的睡衣出来开门的那个有趣的场景。他很快换好衣服，然后我们三个就一起朝多家报馆云集的纳吉科尔街和拉科齐街路口走去。

我读过肯德回忆录中关于那天的描述，* 与我自己的记忆基本吻合。我想进一步说明的只是我自己那天的想法和切身感受。

我们首先去了纽约宫，纽约宫是革命之前《匈牙利民族报》(*Magyar Nemzet*)的办公楼。我们在那里遇见了久洛·欧拜绍夫斯基(Gyula Obersovszky)，过去几天，他一直在为一份名叫《真理报》(*Igazság*)的新报纸做编辑。(在卡达尔执政时，欧拜绍夫斯基被判处了死刑，但后来因为民众的强烈抗议而改判了缓刑。)他满怀激情地跟我们说，他的报纸是那些拿起武器勇敢面对死亡的战士的喉舌。他邀请我们加入他的行列。我们见面时，一直是帕尔和彼得在说话，我则保持沉默。我认识到且惊讶于他们的勇气，我觉得他们的武装行动让事件走向了新的转折点。但是，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群人？他们中的所有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他们真的是为了高贵思想而战吗？或者只是一群拿上枪就充满热血和激情的冒险者？是谁让他们拿起枪的？我自己也真的是因为有人起来反抗而高兴吗？难道就没有不流血的方式让我们通向民主？只有一点是确定的：我没觉得有什么道德或政治权利甚或意向，要充当这些起义者的喉舌。我不是在给这次起义作评判，我热情地期盼这次革命的胜利。但我困惑于很多事情以及作用于这些事情

---

* 肯德后来在《口述历史档案》中，以访谈形式发表了他自己的传记(见《口述历史档案》访谈第 84 卷，访谈时间 1987 年 9 月 5—20 日，第 358、359 和 372 页)。山多尔·雷维斯在他撰写的关于米克洛什·吉迈什的书中，详细描述了《匈牙利自由报》(*Magyar Szabadság*)的创办过程(Gimes，1999，pp. 317—322)。

的诸种力量，所以我无法投身其中。

我们委婉地谢绝了欧拜绍夫斯基的邀请，接着又去了《自由人民报》大楼。我曾在这幢大楼里工作了两年多。路上，我们三人一致决定不加入任何报社，而是共同创办我们自己的报社。

当时，这幢大楼被一支由起义者组成的新的政治力量占领了，领头的是伊什特万·杜达什(István Dudás)。(在卡达尔政权重新执政后，杜达什被判处了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勒切伊过去跟他们商量了一阵，回来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想办一份报纸，杜达什和他的手下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妨碍。

这时米克洛什·吉迈什也到了，他同意为第一期报纸撰写社论，社论标题采用了我们报纸的名称 Magyar Szabadság(匈牙利人的自由)。[3]勒切伊和肯德马上着手撰写文章，勒切伊主要撰写关于国内政策的文章，肯德则负责报道外交政策。我的任务当然是讨论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这种形势面临的挑战。

我曾经撰写过施政纲领，花了数天时间要完成这项任务。虽然现在我又接手了这项工作，但这次我放弃得更快。我并不想这么快就退下阵来，所以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在《自由人民报》拼命工作：整理报纸并做一些技术性的编辑工作。我觉得我做的工作很有用，这些工作有助于这家报社的正常运转。

当天晚些时候，其他同事也来了，他们是：加博尔·莱纳特、伊丽茨·科瓦奇和拉斯洛·霍瓦特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些人都是我以前的同事。这样，我们建立了自己的记者队伍，这些人都有在《自由人民报》工作的经历，现在聚集到了曾经的思想领袖和“反叛者”的手下。共同的过去以及某些共同的理念：民主、独立和自由，将我们绑在了一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社会主义还存在信仰，但是我们也清楚，这与拉科西独裁统治下的共产党制度有着天壤之别。

由于我的政治观念仍然不明确，所以我承受了一个成熟作家所遇到的写作障碍。聚集在这里的都是聪明人，他们的意图也很单纯，他们都知道什么是他们不想要的东西。除了必须忘掉的过去之外，他们希望什么人作为持久的战略伙伴，他们不准备同什么人做持久的联合？哪些手段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哪些手段应该排除不用？

几十年来，我一直面临许多艰难的选择，我已经能够客观地评价自己的能力和不足了。由于我的判断基于我坚定而自信的思想和道德基础，所以我的判断应该比较可信。另一个条件就是我有足够的时间对事物进行仔细权衡，反复检验作出抉择时的第一反应和即席反应。但在 10 月 29 日这个重大日子，在以前

的《自由人民报》办公室里，可以让我做出合理判断的这些条件一个都没有出现。我如何才能根据尚未确立的世界观，对当前的政治状况得出结论呢？面对这种情况，或许有某种具有政治直觉的人可以凭直觉做出判断，但我的直觉是保持沉默。

我在前面曾经将自己形容为梦游者，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会盲目地走到阳台或者屋顶的边缘。但现在我清醒了。过去两年发生的事情尤其是 10 月 23 日发生的事情让我彻底觉醒，但同时也摧毁了我的自信。

多年以后，我同米克洛什·吉迈什的朋友阿里兹·海尔达（Alíz Halda）谈到了那个下午。我们将米克洛什的想法和行为与我的一些经历进行了比较。下面我引用阿里兹·海尔达在她书中写的我们这次谈话（阿里兹的评论用正体表示，我的则用斜体表示）。

我真是写不出一行字了。我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怎么给匈牙利人民提出忠告。后来我确信我明白了，那不是我的责任……

从根本上来说，那不是一个大问题。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他自己的作用和责任。再说，很多人都比不上你对社会的作用。

事情没这么简单。正如你知道的，几十年来我千百次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一直将我的行为与米克洛什的自我牺牲进行对比。他显然认为他自己有那个能力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决定。

……我觉得良心的责备也驱动了你的行为。

我的确受到了良心的责备。我怎么可能不受到良心的责备呢？但很不幸，这并不意味着我就知道该做什么了。打个比方，如果我开车撞了一个人，旁边又没有医生，我也不会自己动手救人。开车撞了人这一事实并不能让我转行去做外科医生。[4]

我没有继续待在《匈牙利自由报》。随后一段日子，我有时候去经济研究所看看，有时候在城里到处走走，有时候见见朋友。一位名叫拉约什·费赫尔（Lajos Fehér）的前“反叛同道”为了给正在筹办的《人民自由报》（*Népszabadság*）招募成员举行了一次会议。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伊什特万·弗里斯也给我打过电话，敦促我去电台工作，说是让大家能听到更为冷静的声音。我也谢绝了。我在尝试理解身边发生的事情。好消息让我感到欣慰，坏消息则让我焦虑。这样一直到了 11 月 4 日，苏联坦克开进来了。

动乱的日子，动乱的岁月

我在本节准备打乱按年代记述的惯例。与大多数匈牙利人一样，革命后的两三年是我一生中最动荡的一段时期。如果我是一名电影导演，我肯定会用一连串的闪回镜头，来表现我在这一时期的经历。比如有时我会满怀焦虑地等待着驿车街监狱的审讯；* 有时我会坐在桌旁，对着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勉力做着笔记；有时在医院走廊焦急地等待我第二个孩子的降生，护士出现了，告诉我一个喜讯：生了个健健康康的男孩！** 有时候，我在经济研究所与朋友悄声私语：共产党组成了一个代表委员会，正在审查全体成员，可能又要大清洗了；镜头中也有拿到《过度集中》英文版时瞬间的欣喜；也会有好友被捕的消息让我产生恐慌；还有和一个纺织厂管理人员就企业的经营进行商业性谈话的镜头。这一连串的闪回镜头，掺杂着恐怖与欣慰、快乐与痛苦以及启发与荒诞。

但我不是电影导演。我只能放弃采用这种方法来表达我在那个情绪压抑时期思想和情感的波动。如果我想通过本传记来表达这段时期的思想和感情，我就必须对思想和感情做出分析。因此，我必须对这段时期逐段逐段进行厘清。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将讨论我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我无法将那些同时在我心中引发激情、斗志或恐慌的百感交集的结果传达给读者。

---

* 我和其他接到传票的人一起，在布达佩斯第二区驿车街 31 号的内务部办公大楼接受了审讯。这个专门负责调查之机构的官称是“内务部国家警察总部政治问讯司调查处”。

调查处位于驿车街和主街的交叉口。楼里的官员如果想对什么人进行政治审讯，有权在调查期间就将他们羁押起来。羁押的人中就有我将在本章讲述的朋友们。伊姆雷·纳吉从罗马尼亚被遣送回国后，就被关在这里，其他涉案人员也被关在这里。

面对主街的房间就是军事法庭和军事检察官办公室。其中有一间专门用于对伊姆雷·纳吉进行秘密审讯。一般情况下，这种安排非常方便检察官员，因为他们无须开车带着受审者穿过整个布达佩斯市去参加听证会。他们只需将受审者从调查处带到同一幢楼的刑讯室就可以了。这种安排也方便保密。伊姆雷·纳吉、帕尔·毛莱泰尔以及米克洛什·吉迈什都是在主街 70 号被判处死刑的。

街区的一边有个绿树成荫的广场，今天这个广场的名字叫做“伊姆雷·纳吉广场”。

在我们心中，“驿车街”这个街名等同于政治警察审讯犯人的地方。

** 1957 年 6 月安德拉什出生时的情况与 1952 年加博尔出生时的情况完全不同。1952 年，加博尔那个可笑的父亲仍然相信，如果他离开自己的岗位去办私事，或者如果因为老婆生孩子而找人代班，这个世界和这张报纸都会停止运转，至少也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道德罪过。1957 年安德拉什出生的时候，他的行为像个正常人了。

《过度集中》的后续影响

革命爆发前不久，我已经把《过度集中》的手稿交给了经济与法律出版社（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11 月初，我又去了一次出版社办公室，我想拿回我的手稿。谁知道这个国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书稿还是放在自己手上比较保险。

11 月 4 日之后，局势稍微稳定了一点，我又去了一次出版社。在落款为 1957 年 1 月的匈牙利文初版前言中，我记录了 1956 年 10 月送交手稿的情况。前言中写道：

> 本书到现在才得以面世。我自然要重读一遍——不过我认为现在还不是修改本书的合适时间。要证明本书的科学性，主要看它能否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或许会对今后几十年产生重大影响。很多人都觉得有必要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改变自己在很多政治经济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或许有人已是第二次改变立场。但是我却觉得，10 月 22 日的真理在 10 月 24 日和 1957 年 1 月也仍然是真理。问题只在于，它原来是否真理。因为我坚信，我真实地反映了 1955—1956 年的情况（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则要看那些评论家了），所以我不需要对本书进行修改。[5]

后来大肆攻击这本书的人的怒气，就是被我的这一傲慢评论激起来的。但现在我们不要谈得那么远，还是说 1957 年的事情吧。这个时候，政权仍然掌握在雅诺什·卡达尔和费伦茨·明尼希手中，当时他们正在尽全力清除起义的残余势力，平抚罢工工人的情绪，报复行动也刚刚开始。他们没有足够的精力控制书籍的出版。对我而言更为幸运的是，经济与法律出版社的经理蒂博尔·凯赖斯泰什和文字编辑玛吉特·希克洛什准备冒着风险把我的书送进印刷厂。几个月后，我的书便出现在书店里，很快销售一空。

几个月前，也就是 1956 年年底，《经济评论》杂志刊登了茹饶·埃塞撰写的报道[6]，精彩地记述了有关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的情况。这篇报道引起了很多人对我的书的关注。后来，又出现了两篇赞扬博士论文的评论。其中一篇的作者是捷尔吉·彼得，他有意将评论文章发表在重组的拉科西派系的周报上，这篇评论通篇都是对《过度集中》的赞赏。[7]

但是，随着时代风向的转变，对《过度集中》的褒扬也日渐稀少。1957 年春天开始出现了对《过度集中》的一连串攻击：经济学杂志、经济学周刊、《人民自由报》以及大学的各种教材，都将《过度集中》形容为“修正主义”* 的典型代表。批评者认为，这本书否定了计划经济的基本原则，试图解放市场的自发力量。用盖佐·里普（Géza Ripp）的话说就是“经济学领域出现的修正主义观点……常常与反革命的意识形态准备相关联，并为反革命学说提供经济学基础”。[8] 安德烈·莫尔纳（Endre Molnár）说：“严格意义上说，经济学与反革命活动并非毫无关联……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绝不能对反革命的苗头心慈手软。”他还旁征博引我的书，证明该书是反革命苗头的典型。[9] 埃米尔·古亚什（Emil Gulyás）[10] 也在党校的教材中写道：“科尔奈的博士论文，充分满足了反革命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进行思想准备的需要。”**

1957 年 9 月，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我参加了经济所所长伊什特万·弗里斯举办的一场演讲会，地点在共产党重组后的政治学院。演讲会的下半场开始了对“修正主义”经济学家的指责。伊什特万·弗里斯只是蜻蜓点水般地说了捷尔吉·彼得几句，但对陶马什·纳吉和彼得·埃尔德什的指责则非常严厉。最后轮到了我。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我在听众席上感受到的震惊与不安。我万分吃惊地听着伊什特万·弗里斯的指责，一年前他还对我的书褒奖有加，还给我奖励，甚至还因此提拔我，但他现在却在猛烈地攻击这本书。他说我在书中的言论，应该被理解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在阅读这些攻击文章时，真是百感交集。但在我仔细思考过他们的攻击言论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攻击其实不无道理。《过度集中》不仅是简单地指出几个错误，或者批评一下经济管理中的某个狭窄领域，这本书实际上揭示出指令性经济是一个运转很差的经济体系。《过度集中》确实是当时质疑社会主义基础的思想潮流之组成部分，因此该书也为 10 月 23 日革命做了意识形态准备。作者的观点确实与马克思主义泾渭分明。所以，我接受

---

* “修正主义”是一个术语，专指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又妄图修改一两个马克思的学说的人。这一说法其实并不适用于我，因为我根本不想修正马克思主义，我已经与之决裂。

** 约瑟夫·雷沃伊也在 1957 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猛烈地批评为反革命进行意识形态准备的行为，并言辞激烈地谈到了在学术争论中显示出来的惰性。这位《自由人民报》前主编也在文章中对我进行公开谴责。他的这篇文章的基调即使在卡达尔时代听起来也非常刺耳，因此一直没有获准发表（PIL 793. f. 2/116.ő. e. p. 14）。

这些指控。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事情的另一部分无关辩论和反驳过程中包含的真相，而是与这些攻击的时代背景相关联。这并不是双方参与者完全平等地进行思想斗争，比如雅诺什·科尔奈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盖佐·里普、安德烈·莫尔纳、埃米尔·古亚什以及伊什特万·弗里斯提出那样一个观点。他们可以自由地对我进行攻击，而我却不能公开地捍卫自己的立场，或是阐述自己的全部观点。这个事情发生在 1957 年，当时，我的一些最亲密的朋友都已被捕入狱，有的人则被从工作单位开除。所有赞同这次革命的人都受到了迫害。在当时的情况下，被贴上“修正主义者”或者“反社会主义经济”的标签，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事实上，安德烈·莫尔纳已经警告读者：“绝不能姑息修正主义观点，要把它扼杀在摇篮中。”

下文我还会谈这些威胁的具体形式，现在我先说一下《过度集中》的命运。正当匈牙利国内继续大肆抨击的时候，《过度集中》却开始了另一段命运。年轻的经济学家伊什特万·扎多尔准备叛逃英国时，安德拉什·纳什鼓励他带上《过度集中》的简短摘要，交给一位英国经济学家。伊什特万·扎多尔带上了摘要并最终交到了现代经济学巨擘、牛津大学的约翰·希克斯教授（他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手中。同时，匈牙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德·亚索伊（Antal Jászay）在读了我的书之后，也提请希克斯务必关注一下我的书。* 后来，希克斯建议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著作。不久后，我就收到了出版合同。

我当然想把握住这个不期而至的机会。但是按照经济所的规定，我必须得到所长伊什特万·弗里斯的批准。弗里斯这人具有两面性，事实上或许具有多面性。因为这本书他曾经把我夸到了天上，后来又把我贬到地下，这次却批准了我在英国出版《过度集中》的英文版。** 这样一来，我又开始了《过度集

---

* 扎多尔后来自杀了，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讨论有关《过度集中》的种种了。多年后，我与亚索伊教授通信，在信中谈过此事，但我仍然想不起扎多尔和亚索伊的行动是各行其是还是有某种关联。我深深感谢希克斯、亚索伊和扎多尔三位学者在《过度集中》英文版出版事宜上给我的帮助。我这里引用亚索伊教授 1990 年来信中的一段话：“不管怎样，你都不用认为自己需要感谢我。1957 年我向牛津大学出版社推荐出版你的著作，是因为在我看来，你的书具有原创性，值得出版。我唯一的功劳是读过匈牙利文原书，并让它为人所知，而且，约翰·希克斯也相信我。”我把这封信放在了我的私人档案里。

** 弗里斯对英文版的出版有一个附加条件。他想删掉原版的前言。我想保留这篇前言，但同意删掉上文引述的一些冒失的句子。我给英文版另写了一个前言，前言中说，这本书并不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般性描述，内容涉及的是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因为自该书出版以来，改革已经使社会主义制度在很多方面有了进步。我还删掉了一些让弗里斯及其同伙恼火的段落。我虽然做出了让步，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还是值得的，因为《过度集中》毕竟得到了海外出版的机会。

中》的英文翻译工作。幸运的是，我在德意志帝国学校读书时的老同学玛丽亚·克纳普有个生活在英格兰的哥哥雅诺什（约翰），他也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承担了这项翻译工作，而且令人难以置信地尽心尽责。写到这里，我又翻了一遍我们之间的来往信件，我们在通信中澄清了所有术语的确切含义以及可能引起歧义的表述。这个工作不那么轻松，我既要关注一位忠实于原文的译者的意见，还要在匈牙利出版界斥之为危险的反革命著作时，冒险在西方出版这部著作。

1959 年，《过度集中》英文版面世，[11]不久就引起了西方的广泛关注。英国的三大主流报纸：《金融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以及《卫报》[12]都刊登了赞赏该书的文章，主流经济学杂志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美国经济评论》评论道："毫无疑义，这是一本重要著作——论述坦率客观，极具洞察力，分析详尽可信。"[13]伦敦的《经济学》杂志评论道："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感谢科尔奈先生，他让我们看到了一部论述连贯且逻辑缜密的著作……所以他的这部书独一无二。我们在共产党世界中还没有看到过这样深刻的作品。"[14]

多年之后，我见到了亚历克·诺夫、约瑟夫·伯林纳、戴维·格拉尼克和尼古拉斯·施普尔伯以及其他几位评论过《过度集中》的人。他们告诉我，这本书在当时的确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们都在猜测，究竟是谁敢于从铁幕之后说出这番话来，谁敢于在英语世界讲出书中的那些话。

被经济研究所开除

我的一生中有几件决定性的事情都与布达佩斯的纳多尔街有关。"二战"之前，我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就在那条街上。我在前面也说过，后来经济研究所也搬到了那里。* 1956 年 11 月底，我在纳多尔街和默勒格街的交叉路口碰到了一位年轻女士。这位女士是新组建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五区的书记。因为我与她曾在同一个度假村相处过一个月时间，因此彼此较为熟悉。我们聊了起来，内容主要涉及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以及当时的政治形势。在谈话中我告诉她，

* 后来的国家计划办公室也设在纳多尔街。我也经常去那里从事数理计划模型的研究工作，在那里，我认识了我后来的第二任妻子茹饶·达尼埃尔，当时她还是计划办公室的职员。

我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这里我要强调一下，我说这句话时，并不是非常自信。我还请她以区党委书记的身份注意这个事实。

我为什么要向这位友善而和蔼的女士说这番话呢？我说这番话纯粹出于愤懑和蔑视心理。这时候，我只想尽快让自己与那些迅速改变立场并想脱离革命的人划清界限。在经济所里，我也当着一些人的面说过，我已经与马克思主义断绝了关系。这时候，经济所的党支部刚刚开始重新调整——重新调整意味着所有党员的身份自动中止，想要再次成为党员，需要重新提出申请。一开始，这项工作由我以前办公室的同事彼得·埃尔德什和罗伯特·霍克负责。我明确宣布不打算重新入党。我跟区党委书记的谈话很快也传到了所里。这样，我的干部档案里永久地记录了这样一句话：雅诺什·科尔奈曾经宣称，他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伊什特万·沃尔高、埃德·泰斯或者耶诺·拉茨这些人来说，因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被人视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以对他们来说，反马克思主义并不算什么罪名。但我虽然不是“异类”，却是由“持不同政见者”变成“变节者”。我曾经拥有过真理，但我又背叛了真理。人们可以认可一个人长期保持非党员身份，共产党甚至认为那些非党人士的沉默也是一种友善的姿态。但退党或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士，则被他们视为叛徒和卖国贼。

经过或长或短时间的犹豫后，经济所的大部分同事还是决定加入重新组建的共产党组织。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都认为，有必要先找我解释一下他们的选择。这真是一件怪事，他们好像是想要获得我的许可，或者获得一种精神豁免一样。

在所有人中，只有我和安德拉什·纳什始终坚守自己的立场；对于入党的建议，我们始终敬而远之。现在是 2004 年，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再根据他们是否在卡达尔执政时期加入过共产党来对他们进行评判。我知道，共产党内部有很多人非常正直而善良，共产党外有很多人非常虚伪且居心叵测。我现在在这本传记中只讨论 1956—1957 年那段时间，一家知识分子云集的研究所的情况。截至 10 月 23 日，这家研究所的知识分子，除了几个人之外，都加入了共产党。在革命爆发的那些天里，研究所里的几乎所有人都表达了自己对革命的同情，很少有谁会说不支持革命。但在苏联坦克粉碎了革命之后，很多人又悄悄重新加入党组织，在我看来，其中的意味非同寻常。眼见人们像变色龙一样变来变去，所以直到今天，我对人们的决心和坚持原则的能力，仍然有强烈的怀疑和

不确定感。

或许我那时的评判太过严厉和苛刻。确实，许多人一直保持着对社会主义的真诚信仰。他们中也有一些人真诚地认为，自己加入这个重新组建的政党后，能够比在党外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也承认，确实也有不少人意志坚定地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对改革和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但在当时，我还不能接受这样的想法。

在政权复辟几个星期后，我接到了后来的总理耶诺·福克(Jenő Fock)从党中央打来的电话。在他担任冶金与工程部部长时，我和他曾有过一面之缘。当时，共产党希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福克也听说过我的著作，所以他希望我能跟他合作。但是我谢绝了。

这时，伊什特万·沃尔高也找到了我。尽管伊什特万·沃尔高拥有丰富的经济学知识，且德高望重，但他在拉科西执政时期，一直受到排挤与忽视。现在卡达尔—明尼希政府找到他，希望他能挑头带领一个专家委员会，负责拟定具体的改革方案。最近几个月来，我跟他谈过几次。我在前面也提到过，他曾仔细读过我的书以及我在1956年夏天主持起草的改革方案。他力图说服我加入这项刚刚开始的工作，我还是拒绝了。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并不反对这场改革。我之所以拒绝他们的邀请，是有原因的。我对苏联干预匈牙利内政极其反感。我痛恨并鄙视雅诺什·卡达尔及其同伙的行径，他们一开始对革命表示支持，转过身又背叛了革命。我认为政府将伊姆雷·纳什及其同伴强制流放出境，不仅非常恶劣，而且也违背了原来的承诺。我在前面提到过，在革命胜利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内心彷徨。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的本能也没有给我任何提示。但在革命失败后，这种情况完全变了，我本能地觉得我应该拒绝这些邀请。

1957年岁末，党中央派出了一个委员会，调查经济研究所在“反革命”运动发生之前、期间以及之后的情况。*委员会负责人是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校长拉斯洛·哈伊(László Háy)。(附带说一句，他曾经说过：“只要我还在这里当校长，就不允许科尔奈在本校教书。”)委员会的书记是安德烈·莫尔纳，他曾经针对我写过一篇极其刻薄的文章。一场激烈的斗争在幕后展

* 1958年的《经济评论》上载有一篇关于对经济所进行调查的文章，文章作者没有署全名，用的是姓名的首写字母I. K.。

开了。* 当时有一种看法，经济研究所已经成为滋生修正主义的温床，应该立即予以解散，而伊什特万·弗里斯和经济所的党组织，尤其是埃尔德什和霍赫，则在极力争取保住经济所。所以我和安德拉什·纳什就成了替罪羊。**

伊什特万·弗里斯觉得由他本人亲自将这个决定告诉我们，可能会比较尴尬，所以他让陶马什·纳吉来通知我们。我们对这个决定并不感到吃惊，马上着手为自己寻找工作。安德拉什是对外贸易的知名专家，所以外贸行业是他的求职方向。我则想在轻工业行业找一个职位。

现在回想起来，我很感激轻工业部的同事们不遗余力地帮我找工作。这些同事是：捷尔吉·希克、米克洛什·希曼、山多尔·菲勒普和捷尔吉·席勒。这份工作不仅让我有了收入来源，还让我可以暗地里继续从事我的研究。一开始，我在轻工业部计划局工作，后来又去了纺织工业研究所。

来自经济研究所的支持，也使我找工作的事情容易了很多。之前我也听说过很多原工作单位对待被开除员工的事情，他们总是千方百计阻挠被开除员工找到新的工作单位。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在我背后做过什么小动作，但是我清楚记得伊什特万·弗里斯再次表现出了仁慈的一面。虽然他准备牺牲我们，但这并非伊什特万·弗里斯的初衷，而是出于哈伊和莫尔纳的命令。他仍希望帮助我们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

1958 年 9 月 15 日，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经济研究所，成为了上文提及

---

* 1958 年春天，经济研究所的党组织明确表示，经济研究所内积极参加过 1956 年 10 月活动的员工，其中包括我和安德拉什·纳吉，应该在 6 月召开的职工大会上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他们应该与“反革命活动”和伊姆雷·纳吉划清界限，并且宣布自己忠实于卡达尔领导下的新领导集体，坚决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次会议于 1958 年 6 月 23 日召开，正好在伊姆雷·纳吉的判决结果公布的前几天。我的许多同事都公开承认并谴责了自己从前的错误言行。尽管一再受到警告，我和安德拉什仍然拒绝承认错误。但是，我们决定，如果有些好心的同事坚持要求我们发言，我们就承认自己在与政治无关的经济学问题上犯有“错误”。我在发言中泛泛说了几句关于中央计划和经济领导的重要意义，承认自己在经济研究中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我没有从政治上对自己进行自我批评，也没有谴责十月革命和伊姆雷·纳吉，更没有宣称自己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忠诚。安德拉什跟我说的差不多。我们的这种行为（或者像留在经济所的同事所说的“过于固执”）无疑促使他们做出了将我们从经济研究所开除的决定。

** 陶马什·纳吉在他提交给《口述历史档案》的自传性访谈中回顾了党组织针对经济研究所的调查。他说：“人们把经济所称为‘脓包’，很多人都被从经济所赶走了。我觉得弗里斯也利用自己的关系尽量帮助这些人寻找到一份还说过得去的工作……但他也确实没有为这些人辩护过。”（OHA，1986，访谈第 26 号，第 133 页）

的工作单位的正式员工，但事实上，我还可以自由支配我的时间。有的工作，我是在轻工业部办公室做的（对面就是主街——驿车街监狱的牢房，我的一些朋友就被关押在那里，偶尔也会被带出去审问），但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家里搞研究。不过，我一般是在格雷沙姆或者热尔博咖啡店与同事们讨论研究课题，基本不会在办公室讨论。

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从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可怜或者难受的地方。虽然我失去了在匈牙利科学院下属经济研究所工作的便利机会，但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且，我身后还有一群值得我信任的朋友和同事。

尚未被捕，但面临被捕威胁

1956年12月6日，我在母亲的公寓见到了阿里兹·海尔达，他是米克洛什·吉迈什勇敢的同伴。两天前，米克洛什就在我母亲这里过了一晚上，之后又在别的地方躲了一夜。今天我才知道，米克洛什已经被捕了。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监狱的阴影正在向我靠近。从那以后，夜里一点点动静都会把我惊醒，我冲到厨房向大街张望，看是不是来了要把我带走的汽车。我在前面也提到过，在拉科西执政时期，我从来就不担心被捕入狱，因为那时我像一个梦游者，根本不在意身处阳台边缘会有坠落的危险。但是现在，随着我对当前这个体制的了解日益加深，我害怕了。

尽管我有入狱的恐惧，但我并没有离开匈牙利。在革命被镇压之后的那几个星期，铁幕多少拉开了一点点，因此非法越境的风险也比平时稍微降低了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有20万到25万人逃离了匈牙利，其中就有我的一些好朋友，比如我最要好的朋友彼得·肯德。当时，我们根本无法预知，我们是否还有再见的机会。我不知道我将来能否出国旅行，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回国。我和我妻子都决定不离开祖国。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会详述“留下还是出国”这个两难选择。

我把本章的时间跨度在标题上做了限定：截止到1959年年底。这个年份是我个人历史而不是匈牙利历史的一个分界。现在回头看，我基本可以说，警察部门无数次的骚扰，以及让我情绪崩溃的审问，都结束于1959年年底。

我曾经与《自由人民报》的另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山多尔·费克特交谈过

几次，专门讨论了如果我们被捕，而且非要我们供认罪行，我们该怎么办。* 山多尔·费克特很干脆地说，他不会屈服认错。我当时就对他的这一态度有所怀疑（后面就会看到，我的怀疑是正确的）。很早之前，我和那些在拉科西和加博尔·彼得的监狱里经历过严刑拷问的人谈过话，那时我就有了自己的看法。而且，我也读过有关苏联、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警察如何对犯人进行诱供的很多资料。因此我很清楚，没有人能够一直抵抗下去。低头的时间完全取决于受刑犯人的体力和意志力。如果审讯者准备使用酷刑狠狠地折磨犯人，那么，酷刑使用到一定程度，犯人就会按审讯者的意志做任何审讯者想让他做的事。** 我的肩膀有习惯性脱臼的毛病，每次脱臼都让我很痛苦。而且，我还有一个让人苦恼的习惯：我经常会想象着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不停地想，如果他们有意把我的肩膀弄脱臼，然后跟我说，除非……不会给我的肩膀复位，我能怎么办呢？

因此我决定克制一下自己的政治行为，以免遭受警察的严刑拷问。在苏联坦克威逼的阴影下，社会主义制度重新走上了政治舞台，但在接下来的镇压中，谁能预料他们又会采用什么手段？卡达尔政权的秘密警察从苏联契卡（肃反委员会）或者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或者拉科西的国家安全局那里，接手了什么样的审讯方法呢？我害怕受到审讯，我更担心我经受不住他们的严刑逼供，那样，我不仅会背叛自己，也有可能出卖他人。所以我决定不做任何违法的行为，以免自己做出让自己羞愧的事情。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在于，我痛苦而又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弱点。

现在回过头来说说我的谈话对象山多尔·费克特的故事。山多尔·费克特

---

* 有一次我们是在费克特公寓里谈论这个话题的。最近披露的警方记录表明，当时这套公寓里已经安装了窃听器（ÁBTL 0-10986/1，pp. 187—196，山多尔·费克特公寓窃听报告。时间 1958 年 7 月 4 日）。1958 年 7 月 4 日我确实去过山多尔家。与往常一样，我们海阔天空聊了一会儿，有的话题比较高深，比如乔达诺·布鲁诺和其他异教徒的殉教，比如中国的未来，等等。有的话题没有这么高深，比如科尔奈家的女佣很健忘以及房屋租金的政府规定，等等。我们谈到了道德力量以及道德力量需要强大到何种程度才能抵制迫害，负责录音和解释我谈话内容的警察显然误解了我们的谈话。46 年后，面对这份满是圈点和问号的记录，我心中百感交集。要是我没有让这种对自由思想的专制和对私人谈话的卑劣侵犯吓倒，我真想对警察的这种粗心和无知以及对话题内容的愚蠢理解一笑置之。

** 乔治·奥威尔用他的酷刑机和机器上的定量指针生动地阐释了这一观点［1966（1949），pp. 196—202］。只要将酷刑机的定量指针移动一格，犯人的痛苦就会增加一分。面对不同的犯人，比如承认了不实指控的犯人和背叛了爱人的犯人，定量指针也会在 50—70 刻度之间移动。在费克特被捕之前不久，我还把这本书［即《1984》。——译者注］借给他看过（ÁBTL V-145-288/文件 2，第 326 页。日期：1958 年 12 月 18 日。山多尔·费克特亲笔供词，第 6 点）。

勇敢地参加过很多非法活动，因此最终被捕入狱。虽然他没有遭受肉体上的酷刑，但警察经常用绞刑威吓他。在恐慌之下，他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交代了他所知道的朋友和同伴的信息。*（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他关于我的供词，后面还会再讲这件事情。）

所以我坚定了不做违法之事的决心，但是，合法与非法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而且，就算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这一界限也不是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条文为法律解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这样，刑事调查或法院审讯就可以利用这一点，自行决定哪些行为是合法行为，哪些行为是非法行为。我努力将自己的行为限制在合法范围之内，以减少被捕受审的可能，但还是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

但是，我也没有始终如一地按照我的决定行事。有时候我是粗心大意犯了事，有时候则是有意识地踩着法律的边界，但不管是粗心还是有意，这些行为都给政府留下了“合法”质询我的机会。虽然我一直遵守不参加任何非法活动的决定，但后来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最终让我走向了刑事审判的审判席。

当时我已经被审讯过好几次了，到后来，审讯几乎成了例行公事。但事实上，我一直无法习惯这种噩梦般的经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每次审讯之前，我都会先收到一张传票，在某种程度上，这张传票也让我有机会为聆讯做一些准备。***这张传票通常不会让你知道他们要问你的问题。我一般都会集中精力把可能审讯的内容或者双方的对话在脑子里过一遍，再盘算一下应该如何回答他们可能会问到的问题。有时候，我会从那些在我之前受过审讯的朋友或者熟人那里得到一些线索，这样我就能大致猜到今天审讯的内容。这种准备工作是个脑力活儿，事实上，也是审讯者与受审者的一次智力博弈。但这种智力博弈的确是场艰难的考验。我不止一次惊讶地发现，审问者竟然清楚地知道我想对他们

---

* 我在这里引用捷尔吉·利特万 1981 年圆桌讨论会议上关于山多尔·费克特之行为的说法：“他们给他看了一张吉迈什吊在绞刑架上的照片，他秘密透露了这件事情。他们想用这类事情对他施加影响。后来他认识到，拒绝合作只会使他的境况更加糟糕。他确实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警察，但从后果看，并没有人因为他的招供而遭到逮捕，尽管这并不完全应该归功于他，因为警察当时也正好打算停止调查了。”这次圆桌讨论会的主持人有若尔特·乔洛格、久洛·科扎克和米克洛什·绍博，这份报告现在保存在《口述历史档案》中（OHA 1981 年，访谈 800 号，第 953 页）。

** 1957 年，布达佩斯有一则笑话说：两个人正在谈论一个已经被定罪的朋友。“我对 A 判刑 8 年还可以理解，但是 B 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也判了 4 年？”“我也不懂为什么。但他们通常会白送 2 年。”

*** 有一次我重病卧床，一名警察局官员还专门来到我家里，坐在我床边向我提问。我还记得他离开时，我们家女佣毛格迪端着一杯咖啡出现在门前，我松了一口气。

隐瞒的内容。审讯者会首先听我那番半真半假的陈述，然后他告诉我，我说的哪些事情是他们已经掌握了的。

然而，真正的困难并不是审讯者和受审者之间在智力和情报上的较量，真正的难题是道德难题。我们这些依然逍遥法外的人，都会在受审之前就如何应对审讯者的某一问题达成一致口径。以后可能被捕的人也需要统一口径。（这种做法有时候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不管尚未被捕还是已经被捕的人中，总会有人不按统一口径行事。）由于不太确信受审者的供词是否会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所以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如果警察把你看成证人进行审讯，而你又拒绝交代，毫无疑问，你会被关进监狱。如果你不想被当成嫌疑犯关进监狱的话，你就必须交代点什么。但你说什么呢？事先并没有与大家统一口径。同时，我们也没有就审讯时应该遵守何种“道德准则”做出决定。

我努力设想了道德规范和戒律。我不会固执到对任何事情都打死不说的地步。我会告诉审讯者那些我认为他们早已掌握的情况，说一些我认为不会伤害到被捕朋友的信息。在审讯者与受审者之间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中，我不能肯定每次都能严格遵守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准则，但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未违背过这些准则。我知道这些准则并不是英雄主义的崇高体现。我不想像一个政治英雄那样，在法庭上慷慨激昂地为自己进行辩护。我只是给自己设定了更为现实的标准，即要保持基本的人类尊严，我将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守住这一道德底线。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事例，但我不是按照审讯的时间顺序，而是按照审讯者所关注的事情来记述。

对帕尔·勒切伊的指控包括 10 月 29 日的事件，那天，帕尔·勒切伊的《匈牙利自由报》创刊。（这是我前面大致谈到的一个例证。我并没有为这份报纸工作过，我只是在报纸的编辑室待了一晚就离开了。但警察还是不停地就这件事情对我进行审讯。）

我们几个与帕尔·勒切伊案子有关系的人，就该向警察说什么以及该向他的辩护律师说什么达成了统一口径（不过我觉得没有什么用）。[15]帕尔·勒切伊被释放之后，我们好几次谈到了这次审讯。后来，在我 75 岁生日的好友聚会上，勒切伊的一番话让我很受感动，听了这番话，也让我的内疚为之释然。他回忆起在他受审时警方对我的盘问，他说那时候，我的紧张语气和恐慌眼神已经透露出我当时的想法：“我的天啊，但愿我不会给帕尔造成任何伤害。”他还说起，我在离开证人席时，看了他一眼，我那种鼓励和深情的眼神，让他这个单独坐在被告席

上的人深受鼓舞。

11月上旬，米克洛什·吉迈什把我和其他几位以前当过记者的同事叫到他在科维纳出版社的办公室。他提议说，我们应该编辑或发行非法报纸或者杂志，继续做斗争。我没有答应参与这件事。之所以反对这一提议，除了我在前面提到的个人想法之外，还因为我觉得在当时的环境下，从事这些活动没有任何意义。革命已经遭到军事力量的残暴镇压，共产党政权也已经恢复。一份油印小报能招募多少人呢？又如何动员读者与政府做斗争呢？我觉得，这份报纸带来的风险与它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几乎不成比例。

直到今天，我也不太清楚我的观点是否正确。如果能进行“风险—收益”计算，除非这样做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手段，否则我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从历史角度看，正是因为有着像米克洛什这样不畏任何艰险的英雄，才成就了匈牙利民族伟大的道德价值。报纸《10月23日》的问世，也说明了一个政权不能完全摧毁革命的精神。

1957年4月16日，警察在驿车街开始了对我的审问，他们首先问我那天都有哪些人参加了科维纳出版社的会议。[16]我支支吾吾地说我想不起来了。于是审讯官员就拿出一份口供读了起来，这份口供是一个已经被捕的、名叫P. P.的人在4月10日供出的，他也参加了那天的会议。这份口供详细描述了那天会议的情况。[17]听完了这份供词我目瞪口呆。我觉得除了确认这份参与者名单属实之外，我已经别无选择。

这名审讯官要我承认，在科维纳出版社的会议上，米克洛什·吉迈什提议发行一份非法报纸的情况属实。下面是我从审问记录里摘录的一段内容：

问：吉迈什在谈话中都说了些什么？

答：我记不清楚了，因为我们当时讨论了很多不同的话题。

问：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吉迈什明确说过他想办一份非法报纸。我给你读一段P. P.供词里的内容吧。吉迈什说，他打算办一份油印非法报纸，并希望能够定期发行。我们现在需要你提供证据。

答：我不记得了，而且我也无法告诉你任何有关这份报纸的情况。原因是我早就说了，我不会参加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除此之外，我没什么可说的。[18]

我想，在整个米克洛什·吉迈什案中，对我的审讯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与吉迈什的“罪状”相比较，确认11月与会者名单并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

情。真正重要的应该是这份报纸的问世，后来，迫于审讯的巨大压力，吉迈什承认了这一条罪状。*

这次审讯让我深受震动。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这种案子，在这个案子中，那个被捕的 P. P. 提供了对被捕同事和仍然自由的昔日战友极其不利的供词。47 年过去后，我在为自己的这本传记查阅相关资料时，阅读了 P. P. 档案中的很多文件，才知道他在被捕后不久，就向警方举报了很多人的情况。[19]

在科维纳办公室的这场讨论，是我第二次拒绝参加政治活动，但我仍然没有因此而逃脱被传唤到驿车街接受审讯的命运。

在我看来，山多尔·费克特案颇具特殊性。这一案子也充分说明了，我为何对拒绝参加非法阴谋活动采取了前后不一致的态度。

1956 年到 1957 年之交，费克特用“匈牙利人”(Hungaricus)的笔名写了一篇文章，对这次革命的起因、过程以及成功和失败一一进行了评价。[20]他把文章传给几位朋友看过，其中就包括我。后来，他在给警察的供词中准确无误地引用了我在一次秘密谈话中的原话：在我看来，他的文章“过于马克思主义了”。这一点，我在上一章已经提到过了。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匈牙利人”的这篇文章。尽管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我对文章内容有一些保留意见，但我还是很愿意让文章在西方国家发表。我把费克特介绍给了一位年轻的希腊裔塞浦路斯共产党员约尔斯·瓦西利乌(Jorgos Vassiliou)。**约尔斯是一位很有魅力的漂亮的年轻人，当时，他正在伊什特万·弗里斯指导下攻读学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才进入经济研究所，并跟我和安德拉什·纳吉成了朋友。他顺道来访过几次。由于约尔斯·瓦西利乌能够合法地来往于英国和法国，所以他答应把费克特的文章带到国外，交给一位居住在法国的传奇人物，历史学家兼政治记者费伦茨·费伊特以及彼得·肯德。***当时并不是我要求约尔斯·瓦西利乌做些什么，但是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在约尔

---

* 山多尔·雷维斯在他的书(1999)中描述了米克洛什·吉迈什在被捕和审讯期间承受的巨大压力和可怕的威胁，吉迈什后来被判处死刑。

** 安德拉什·海盖迪什于 1991 年对他做了采访，这是书中使用的匈牙利名字，他的希腊名字是吉奥戈斯·瓦西利乌。作为这个希腊人的匈牙利朋友，我们叫他约尔斯。在回忆这一事件时，我将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 在他移民海外之前，费伦茨·费伊特与诗人阿蒂拉·约瑟夫都在《美声》(*Szép Szó*)当编辑。他后来在法国赢得了东欧问题权威的称号。在我撰写这本传记时，他正与匈牙利朋友一起庆贺自己的 95 岁寿辰。

斯·瓦西利乌后来提供给警察的证词中提到，如果这篇文章中能够出现我的名字，对于费伦茨·费伊特和他的团队来说，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情。因为这样有助于让巴黎人相信，这篇文章不是一篇挑拨离间之作。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一个很有影响的法国思想论坛里，并引起了轰动。[21]约尔斯也答应我，他会秘密地让我知道他是否已经把文章交到收信人手里了。

约尔斯因而受到警察的纠缠。[22]他曾经是一名党员，但后来因为这件事情被开除了党籍。不久之后，他就永远离开了匈牙利。

30年后的1988年，约尔斯·瓦西利乌成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总统。*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1958—1959年，谈谈在驿车街发生的事情。警察发现了我和彼得·肯德一直都有联系，也知道了“匈牙利人”撰写的文章被偷带出国的事情。[23]费克特和约尔斯·瓦西利乌受审后，都对此供认不讳。因此很显然，这件事情证明我“忽略了汇报的责任”。**

在帮助把“匈牙利人”撰写的文章送到国外的过程中，我明显违背了自己不参加政治活动和非法活动的准则。我也说不上自己到底为什么没有坚持这一原则。或许是面对朋友关系的时候，我抹不开情面。本来我给自己强加了一道自我禁令后，我已经拒绝了众多好友的一连串政治活动邀请。山多尔·费克特虽然也是我的朋友，但总不像肯德、勒切伊和吉迈什那样跟我走得很近。在我们想把“匈牙利人”这篇文章送往国外的时候，肯德已经远在巴黎，勒切伊和吉迈什也身陷囹圄。在这种情况下，我或许是担心我再不提供帮助的话，我就会失去费克特这个朋友，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中唯一一个当时还与我保持联系的人。

总之，友谊还是失去了。

友谊和团结

我觉得，团结遭受卡达尔政权迫害的人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我还记得，那

---

* 1990年，匈牙利共和国总统阿尔帕德·根茨出席日本的一个招待会的时候，他旁边有人用一种口音奇怪却非常流利的匈牙利语说：“我也是匈牙利总统。”这个人就是约尔斯，当时他已经是塞浦路斯总统。

** 所有这些事情都记入了我的犯罪记录中，每次都可以在我的名下查到某些具体内容。比如：“他知道把‘匈牙利人’反革命文章送到国外发表的事情。1957年，他就与非法反革命集团的叛逃人员有联系。1959年2月9日，警察给了他一个警告。”文件里就是这类内容（ÁBTL C-R-N 0082-479-2。日期：1969年12月21日）。

些从拉科西监狱获释的人，对我抱怨过他们以前的朋友，抱怨这些人抛弃了他们和他们家人。

我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山多尔·诺沃巴茨基，也参加过《自由人民报》的反叛活动。在革命爆发之前，他在《文学新闻报》发表了一篇广受争议的文章，对共产党人的傲慢自大进行了讨论。他引用了斯大林的话："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24]不过，当权者还是没能原谅他的嘲弄。山多尔被警察带走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警察有什么理由逮捕他。我很想和我们共同的朋友拉约什·费赫尔谈一谈，在我当年筹备叛逆大会的时候，我曾经在山多尔·诺沃巴茨基家里跟他见过几次。他以前一直是伊姆雷·纳吉最亲密的战友，现在则是卡达尔集团核心圈子成员。我像以前一样幼稚，我希望他能出手干预，释放山多尔。拉约什·费赫尔的办公室就在议会大楼里，我通过以前报社的熟人找到了他的秘书，并预先跟她说了我想见她上司的原因。可是，拉约什·费赫尔让他的秘书转告说，他不打算见我。他说他根本不想过问诺沃巴茨基的案子。

我和几个朋友定期地给那些被逮捕朋友的家属募捐。[25]我觉得募捐还在我为自己设定的界线之内，我把这种行动视为人道主义行为，而不是政治活动。在我朋友的家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不能袖手旁观。在某种情况下，受助人也并非只是"朋友的家属"，有的受助人本身就是朋友，比如吉齐·勒切伊和埃娃·诺沃巴茨基。此外，我们认为，为他们捐点钱也是在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所以我们会对那些素不相识的朋友的妻儿伸出援手。

再者，我的初衷，即"人道主义"行为应该可以将政治因素排除在外，终究还是幻想。在警察调查梅雷伊—利特万—费克特案件期间，当局就认为我们这种捐款行为具有政治阴谋。我想，警察局的头头一定还记得那场直到今天还让人费解的"群众运动"。当年在霍尔蒂政权时期，共产党非法组织红色援助会，就搞过这种帮助入狱同志家属的活动。通过这种行动，孤立的党员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那些同情共产主义的人。所以他们一定认为，我们这种募捐行为也是某个组织策划的相似行动。他们无法想象这种行为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只是想与处于困境之人站在一起，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意图。

这是一个让人痛心的故事，不过还有另一个荒谬至极的故事。尽管我们身边的朋友不断遭到逮捕，但我们还是希望能保持一点良好的幽默感，所以我们决定在 1957 年年底，举办一场新年晚会。晚会在彼得·豪纳克的住所举行，有 10 到 20 人参加。我和彼得是这场晚会"表演秀"的主要组织者。我们多数人都表

演了一段精心编排的节目，有些节目我到现在依然印象深刻。山多尔·费克特和捷尔吉·利特万把衬衣从裤子里拉出来放在外面，再把腰带系在衬衣外面，又戴上了一顶水手帽，乍看上去还真像是俄罗斯农民。短剧的场景放在西伯利亚。利特万可能已经被流放到那里很久了，而费克特则刚刚流放到那里，正在跟他讲述布达佩斯发生的事情：一个语气嚣张的革命者刚刚入了党，另外一个则刚刚被关进了监狱。这个节目引发了一片笑声，不过从很多方面看，这一幕颇具预示性。

这次庆祝活动的影响一直蔓延到了驿车街。[26]我们新年晚会上的黑色幽默引起了政府的严重关注，并被视为一种阴谋活动。他们认为，这个活动是我们这个假想的组织为了招募成员并创造反革命气氛而进行的一种试验。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秘密警察的文件和线人的报告解禁之后，我慢慢看清，并不是每一份友谊都能经受住困难时期的考验，虽然经受住时间检验的友谊会历久弥坚。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候，我依然拥有真诚、值得信赖的朋友。我在这里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我的第一任妻子泰瑞(Teri)。我们一起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无论时局多么艰难，泰瑞一直都陪伴在我身边。无论何时何地，我都能得到她的理解、建议和支持。

同样是在这段时期，我与彼得·豪纳克和考蒂·豪纳克、吉齐·勒切伊、杜琪·福尼、伊娃·乔托、久里·利特万和伊娃·利特万、安德拉什·纳吉和阿吉·洛松茨基的关系，也日益亲密起来。将我们拉扯到一起的有很多线索，从相互交换最新的政治动态到持久的学术争论，从相互开开玩笑到一起帮助陷入困境的人们，这种真诚的友谊陪伴了我们一生。

后来我在美国居住了很长时间，我发现美国人使用“朋友”这个词的时候，非常轻松随意。他们嘴里的朋友，或许是在某次聚会上一起玩得很开心的人，或许是在大学的某个社团有过一面之缘的人。但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不会随随便便就称某个人为“朋友”；朋友这个词的含意非常重。如果一个人没有朋友，在独裁专制下的生活根本无法忍受。

注 释

[1] ÁBTL V-150-352/doc. 1, p. 442. 日期：1957 年 4 月 16 日。MOL XX-5-h. 1. d. 3. k.

pp. 92—97. 日期：1957 年 7 月 13 日。我参与制定政府计划的工作经历也被记录在我的犯罪记录中（我的犯罪记录的文件序号为 ÁBTL C-R-N 0082-479-2。我看到文件复本上的日期是 1966 年 12 月 21 日，那么在此之前一定有类似的文件）。

[2] Vida, 1992, p. 34.

[3] Gimes, 1956.

[4] Halda, 2002, p. 167.

[5] Kornai, 1990a(1957), p. 6.

[6] Esze, 1956.

[7] Péter, 1957.

[8] G. Ripp, 1957, p. 3.

[9] Molnár, 1957, p. 45.

[10] Gulyás, 1957. 1958, p. 31.

[11] Kornai, 1994b(1959).

[12] "Bureaucrats at Large," 1960; R. N. W. O., 1959; Devons, 1959.

[13] Spulber, 1960, p. 763.

[14] Nove, 1960, p. 389.

[15] MOL M-KS XX-5-h. 50. d. 1. k. pp. 48—54. 日期：1957 年 3 月 20 日；MOL M-KS XX-5-h 52. d. 1. k. pp. 10. 13. 日期：1958 年 5 月 8 日。

[16] MOL M-KS XX-5-h, 1. d. 4. k. pp. 57—59. 日期：1957 年 4 月 16 日。

[17] MOL M-KS XX-5-h. 86. d. vol. 5, pp. 49—67. P. P. 的审讯报告。审讯官提到的这份报告可以在第 51 页找到。第 51—54 页讨论了吉迈什准备发行一份新报纸的计划以及报纸的实际发行情况。日期：1957 年 4 月 10 日。

[18] MOL M-KS XX-5-h. 1. d. 4. k. pp. 57—59.

[19] MOL M-KS XX-5-h. 86. d. 4. and 5. k.

[20] 以"匈牙利人"为笔名撰写的这篇文章完成后直接被封杀。只有少数几份油印本在小圈子中流传。1989 年前，该文的匈牙利文印刷本并未出现。

[21] 1957 年费伊特撰文评论了"匈牙利人"的文章。布鲁塞尔的伊姆雷·纳吉研究所在 1959 年发表了"匈牙利人"全文的法文本。

[22] ÁBTL V-145-288/document 3, pp. 482—492，约尔斯·瓦西利乌的审讯报告。日期：1959 年 6 月 11 日。参见 Vasziliu, 1999。

[23] ÁBTL V-145-288/document 2, p. 327. 山多尔·费克特亲手写的供词，第 11 点。ÁBTL V-145-288/document 3, pp. 482—492，约尔斯·瓦西利乌的审讯报告。日期：1959 年 6 月 11 日。参见 Vasziliu, 1999。ÁBTL V-145-288/document 9, pp. 156—160, 233。

[24] Novobáczky, 1956, p. 1.

[25] ÁBTL V-145-288/document 3, pp. 482—492. 约尔斯·瓦西利乌的审讯报告。日期：1959 年 6 月 11 日。ÁBTL V-145-288/document 2, p. 326. 山多尔·费克特亲手写的供词，第 7 点。

[26] ÁBTL V-145-288/document 2, p. 327. 山多尔·费克特亲手写的供词，第 8 点。

7. 我的大学：1957—1959 年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用来描述生活，而不是大学老师教会他很多知识的一个时期。我则想借用同样的名字来表述我的一个人生阶段。我在 1955 年以前学到的东西，比如那些有益的经验，那些让人冷静、觉悟的教训，都可以被称为“预备培训课程”。甚至在此之后，我已经成了一名专业科研人员，我仍然在自学，虽然比以前更有章法。

自学

革命失败之后，我决定不离开匈牙利，不过我也决定，我要掌握西方经济学专业知识。这种“西方”取向背后的强烈动力，是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所激发出来的满腔怒火。

当时，我虽仍然能够流利地阅读德文，但我已经将中学英语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我在 1957 年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好好地学习英语。我的英语口语依然很烂，但不久我就可以不费力气地阅读英文的经济学文献了。

如果说我是“书蠹”（我十几岁时就这样贪读文学作品了），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我的确系统阅读了很多书。也许我是听从了别人的建议，也许只是我的运气比较好，但我确实非常幸运地选择了许多基础性的书籍。我先读了保罗·萨缪尔森那本著名教科书的德文版[1]，然后通读了联邦德国经济学家埃里希·施奈德（Erich Schneid）编写的三卷本的初级教科书，作为“期中”检查。

读完这两套书后，我就结束了一般教材的学习。此后，我开始阅读各种专题

论文、专栏文章以及期刊论文。我现在手里还保留着这个时期的许多读书笔记。下面我列出了一些作者的名字作为证明(作者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不是按阅读顺序排列):肯尼思·阿罗[2]、阿罗、萨缪尔·卡林和赫伯特·斯卡夫、肯尼思·博尔丁、瓦尔特·奥伊肯、拉格纳·弗里希、戈特弗里德·冯·哈勃勒、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3]、约翰·希克斯[4]、米恰尔·卡列茨基、阿瑟·庇古、萨缪尔森[5]、海因里希·冯·斯塔克尔贝格*,还有扬·丁伯根[6]。根据我后来在国外的经验,我在这里列出的只是那些大人物的名字。同时,我也读过很多我后来认为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著作。我在阅读这些书籍时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本来可以用于学习更重要的著作,但不幸的是,我缺少一位掌握最新学术动态的老师对我进行指导。

我的学习热情高涨,我不仅通读全文,而且记录要点。记录要点不仅帮助我记忆,而且有助于解决问题。只要碰到值得我做笔记的书,我都会思考再三,看看书中理论是否可供社会主义经济效仿,是否可以运用这些理论,理解匈牙利企业、匈牙利产业的某一行或整个经济的运行情况。这是一个让我终身受益的思想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我不仅理解了这些著作的学术成果,而且掌握了这些学者的研究方法和风格。书中的结论,不是通过空洞的教条式推断得出来的,而是通过逻辑论证推导出来。虽然这种逻辑论证有时候很难,但总是可以辨别,且跟得上书中的思路。作者们都没有引用权威的论断来替代自己的逻辑推论。(不言而喻,所有西方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必须使用真正的逻辑论证,但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变化,因为之前我读过的文章中,引用的满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拉科西的语录。)

我最感兴趣的是微观经济学以及相关课程,尤其是福利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后来我又熟悉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理论。)我逐步接受了"主流"经济学思想,并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偏见,从我的脑海中清除出去。我对主流经济学的接受并不像我过去 10 年或 12 年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时的情况那样,毫无批判地一头扎进了一种"主义"中。我觉得这些书中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让人信服。从萨缪尔森的著作中,我已经熟悉了"新古典经济学"术语的涵义。事实上,一直到我的自学过程结束,我还远不能称自己为新古典经济思想

---

* 捷尔吉·彼得和后来担任布达佩斯歌剧院院长的作曲家安德罗什·米哈伊,都会趁在西方国家出差的机会帮我买书。在布达佩斯大学图书馆和研究所的图书馆中,也能找到其他书籍。

的追随者。克制自己的因素并不是因为我对新古典思想有怀疑，或对它有别的看法，而是以前的幻灭过程使我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抵制心理，所以我决定要在学术上保持独立。

当时，没有人鞭策我的学习，也没有人给我颁发证书以开启我未来的学术生涯。有时候，我早上还在接受警察的传讯，下午就又坐下来潜心攻读。周一也许会传来一些可怕的消息，但到了周二或周三，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按照我自己制定的计划学习。那时候（以及后来的日子，每逢我要处理重大问题时），我习惯于用学习和工作作为治病的药方，这是我治疗精神创伤的法子。

现在我再往前追溯。我在一所美国的大学正式开课时，我的那些同事和学生从来就没有想过我的经济学知识的来路。对他们来说，答案似乎很明显，但事实不是这样。我不仅没有专门学习过经济学，甚至都没有在布达佩斯的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学习过。如果我有过这种经历（就像我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那样，当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了上风，取得垄断地位），我可能就不会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了。

兰格—哈耶克论战

这里，很值得回忆一下我所经历的一个学术事件。当时，我正在研究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的一场早期论战。事实上，我读的第一篇英文的经济学文章，就是波兰大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撰写的论社会主义的经典文章。兰格撰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正居住在美国。后来，我又读到了涉及这场社会主义论战的主要学术文献，包括由冯·哈耶克[7]主编的全面抨击计划经济的文集，以及阿巴·勒纳（Abba Lerner）的名著《管制经济学》。在选择书目时，艾布拉姆·伯格森（Abram Bergson）的文献概述使我受益匪浅。在我阅读这些著作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亲眼见到兰格、勒纳或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本人，也没有想到我在哈佛的办公室会与伯格森为邻。（后来我们在坎布里奇住的公寓也是相邻的。）

捷尔吉·彼得的评论和文章，以及他对南斯拉夫经济体制的描述，让我认识到社会主义的资源配置应该交由市场运作。我自己的著作就是直接针对“过度集中”的做法。现在我发现，二十多年前，芝加哥、伦敦以及剑桥（英国剑桥和美

国剑桥)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很高的理论层次上,对一个经济体内国有企业放权后的运营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论战。兰格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模型讨论的是以利润为唯一经济目标的公有企业的生产运营问题。* 模型内的价格体制没有放开,价格由中央计划当局根据一个非常简单的规则制定。如果产品需求超过了产品供给,价格便会上升;如果产品供给超过了产品需求,价格便会下降。中央计划当局只需观察供给与需求的变动关系,然后相应调整价格即可。兰格根据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于市场和价格的传统假设,确信市场状态会趋向于均衡。我在兰格的文章中,第一次了解了英文常用词"试错法"。[8] 经过不断的尝试和失败,"均衡价格"终会达成。一般均衡理论的创始人法裔瑞士人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是经济学历史上的一位巨人。兰格文章的字里行间闪耀着瓦尔拉斯经济学思想的光芒。

兰格的文章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满足了西方许多左翼经济学家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要求。这些左翼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制度有某种政治同情,但另一方面,他们不赞同马克思主义反对市场的倾向。出于他们的实际立场和理论信念,他们赞同市场原则。他们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距离,与瓦尔拉斯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则处于同一战壕,这也是他们对兰格的理论综合格外热情的原因。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与兰格的理论气味相投。我觉得他的经济学观点让人信服,他的论证思路也让我印象深刻。或许,更为恰当的说法应该是他的理论具有一种"美感",因为他的理论体系简单、清楚,而且和谐。

但我也觉得哈耶克的批判发人深省。哈耶克从实际角度,而不是从理论角度推出了自己的主要观点。中央计划当局如何才能同时追踪百万种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呢?他的观点让我开始探索我早已烂熟于胸的事实:即信息集中的有限性。哈耶克正确地指出,市场不简单的是一个均衡机制。社会上的信息是分散的,所以只有分散化的市场和私有制,才能使每个人都获得直接的激励,从而最好地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哈耶克的著作一下子把我的注意力带到了信息、激励以及财产权的紧密关系上。当时,虽然我并不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构,但至少我已经开始系统地考虑这个问题了。

我在这里并不想回溯我在1957年的立场,我后来在好几篇文章中都表达过这一立场。该立场也是我反驳兰格建议的基础。我后来的反论都是基于财产关

---

* 兰格最初提出的是"成本最小化",但在后来的文章中有所修正。

系和市场协调之政治结构的不可分割性。但在 1957 年，我还没有弄清楚这一联系。我当时无法对这场争论作出判断。兰格和勒纳的推理，看起来都很巧妙，而且前后连贯，但哈耶克的批判也让人震撼。

我不仅受到这场论战之主题的影响，还受到论战风格的影响。当时，匈牙利也在进行一场论战，论战的主题实际上与西方的论战主题具有相关性。我和捷尔吉·彼得提出的思想与西方的兰格和勒纳提出的思想相似。但我们却遭到轻视和威胁。西方的论战是用文明语言进行，用论证回答论证，而不是用愤怒和诽谤相互攻击。

继续从事轻工业研究

我在自学经济学的同时，还想继续由《过度集中》开始的研究，而且，我希望从两个方面来拓展我的研究。首先，我想把研究拓展到之前因为没有精力而没有研究过的领域，比如价格、投资、税收和信用体系等。其次，我还想追溯一下经济管理方式的变化过程。在革命之前我们提出的建议以及由沃尔高委员会（在第 5 章中提到过）提出的建议，是否产生了效果？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实际上都有相同的指向，即如果不废除指令性计划，至少也要遏制指令性计划的作用，并拓宽市场机制的范围。

我的研究热情依然高涨，并与轻工业界的老朋友恢复联系，同时，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这一次，我的研究更有章法，使用的调查问卷也事先做了准备。此时，我力争将自己学到的西方经济学中的新知识，应用于这次的研究工作。在我理解了企业成本函数之后，我便将这个概念应用于对下一个工厂的调查，试图确定一家纺织厂的实际成本函数到底是多少。同时，我心里一直牢记，这是一个多级垂直生产并同时生产多种产品的工厂。在我接触到替代和边际替代率等概念工具之后，我便试图弄清楚，匈牙利如何才能制定可以相互替代的进口品和国内产品的价格。如果匈牙利的做法不够合理（也就是说，没有遵守我从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学到的规范模式），那么，应该如何更改这种定价程序呢？

将学习与研究结合起来，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方式。对于那些有能力将书本上的模型与实际情况进行比较的学生来说，这种方法很有启发意义。而且，这种方法对强化记忆助益颇大。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还能训练人们检查理论的实

用性。我只涉及复杂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点点知识，并没有掌握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命题，但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缺陷，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反复地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比较。

我除了实际验证和运用记在脑子里和笔记本上的新学到的理论以外，还努力在自己撰写的长短不一的文章中应用这些理论来解决问题。这样我就在技术与商业领域中小范围流通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有几个因素促使我发表这些文章。一是我拿这些文章练笔，我是一个“写作迷”，长时间不写东西我就很难受。另外，我也很想将自己的思想梳理一下。无论我想到什么问题，或是研究什么问题，我都必须将自己的想法写下来，或者写成一篇文章，或者写信给朋友（即使从来也不会寄出去），或者记笔记留给自己看，总之是将思想整理清楚。对我而言，写作就是一个梳理思想的做法。

同时，我也希望能与他人一起分享我的知识，这也是激励我写作的原因。每逢我最终理解了某一理论的时候，我都想让别人也读到这些理论，并理解这些理论。

我的这些篇幅短小的文章，没有对经济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也没有给我的学术事业添砖加瓦，但这些文章却有助于我成长为一名经济学家。现在回顾这些文章，我将它看成一个运动员所应做的训练。

划清界限

从这本传记的结构安排着眼，我不得不将事实上交织在一起的很多事情拆分开来，一一阐述。我在上一章讲述了发生在我身上和我身边的政治风暴。在本章中，到目前为止，我还在讲述平静的学术活动。我跟牛津、普林斯顿或基尔大学的青年研究人员一样，每天的活动就是读书、与同事交谈、做笔记和写文章。但我再次重申，在那段岁月里，我的情况与学校的年轻研究人员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别。我的思想和感情以及精神的自由都与当时我所阅读的经济学著作、警察的审讯、写作以及要命的政治事件纠结在一起，受到很大影响。

---

* 我也就其他题目撰写过文章，并没有只限于与我的研究相关的题目。我现在满怀感激地回想起《生活与科学》、《观察者》、《经济评论》以及《统计学评论》的编辑们，他们非常清楚当政者不喜欢看到我的文章发表，但他们还是发表了我的文章，其中部分原因是让我赚点外快。有时候，他们迫于压力，也会用匿名的方式发表我的文章，或者用我名字的缩写（或假名）。

我在经济研究所的一位老同事来找我的时候，警方对山多尔·费克特的“匈牙利人”研究展开的调查还在进行。这位同事是一名积极的共产党员，对党很忠诚。他对我一直非常友善，我们两人也算得上是走得比较近的朋友，所以他对我的观点和我的朋友圈子都十分清楚。我们开始东拉西扯聊起来，一会儿，他就告诉我一个消息：“同志们认为，如果你以某种方式与彼得·肯德划清界限，对你有好处。彼得现在在巴黎，他攻击我们的国家，而且援引了你的书。”那时候，使用无名无姓的“同志”称谓，非常普遍。当时和后来我都没有问过到底是谁让他来找我的，我撰写这本自传时他已经去世了，就更没有机会向他了解当时的情况了。不过我猜是伊什特万·弗里斯让他来传话的。警方调查人员可能已经向他了解过对我的看法了，可能也跟他说了“匈牙利人”的事情。他是约尔斯·瓦西利乌的老师，所以这个事情让他不太高兴。还值得一提的是，他读过我在《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文章，这一段我一会儿还要谈。不过，所有这些都是我的猜测而已。也有可能这个消息是党中央或者警察局的某个人透露出来的。我这位同事告诉我这个消息时，语气非常友善，但我仍然感到了那些发送消息的人对我的威胁。

针对匈牙利计划经济的情况，彼得·肯德在法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而且非常睿智的文章，文中数次引用了《过度集中》的内容。[9]很显然，他一定是认为，按照学术期刊的惯例，引用他人文章必须正确地注明引用观点和信息的来源。由于我在撰写《过度集中》时，经常与他对话，所以他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他觉得他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过度集中》的创作。而且，他或许还认为，所有的作者都会因为自己的著述被人引用而感到高兴。我当然高兴别人引用我的文章。但 1957 年彼得·肯德的引用例外。由于费克特和瓦西利乌正在驿车街接受审问，所以他的引用让我非常尴尬，尤其是，科尔奈—肯德阵线在“匈牙利人”研究出版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的问题。审讯官讯问我的时候，给我看了审讯记录。（正如我在前文提及，肯德—科尔奈阵线是警察局对我的公开指控。）

我决定遵从同志们给我的“建议”。当时，我正根据我在轻工行业的调查研究撰写文章，文章探讨了“定量观”和“经济效率观”对管理者的影响程度。[10]在文章中，我用一种有些牵强的方式，在文字上拉开了与彼得·肯德的距离。我在文章中抗议说，他曲解了我的文章，所以才得出社会主义必然失败之语。我还自我批评说，《过度集中》用语不当，所以才让他得出了这个结论。

这是迫于政治压力而产生的压抑和堕落。我尤其感到羞愧的是，我这样做针对的是彼得。我只能自我安慰说，彼得住在巴黎很安全，我的这些言论不会给他造成任何伤害，同时，我的处境也会因此轻松点。头脑冷静的经济学家称此为“帕累托有效解决方案”*。或许，我可以用生存策略来为这种行为辩解，但我总觉得这种“断绝关系”的行为，不符合自己的友谊准则。

1964年，我与彼得会面，这是彼得移居海外之后我们的第一次重逢。我们在谈话中提到了这篇文章的事情，彼得只是就一件事情责备了我，说我为什么不给他透个信，就说“我是迫于压力这样写的，这当然不可能是我的本意”之类？我承认我这一点做得不妥，我们一致同意再不提这件事情了。

在彼得旅居国外的几十年里，尽管我们在世界各地都碰过面，比如巴黎、威尼斯、比利时、荷兰、英国、瑞士和德国，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我们也在布达佩斯见过面，但我们如1964年约定的那样，从来没有触碰过这个敏感的话题。我觉得彼得在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五味杂陈。但他的幽默感和讽刺感，一定会主宰他的各种情绪。5年之后，他出版了一本研究文集，里面就收录了他在法国发表的那篇文章，他在赠我的一册上题词：“对敌人我会以牙还牙，但上帝请赐我诤友！作者。”[11]

一条死胡同

不久前，我翻阅研究轻工业时发表的文章，有一篇文章吸引了我的注意，文章的题目是《利润分成体系是否应该修正？》。[12]这一主题看似枯燥，但仍是当今让人兴奋的课题。1957年，匈牙利出台了一项计划，给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工人奖励，以激励企业提高利润。初看上去，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计划。国有企业正从“数量最大化”的激励机制转向“利润最大化”的激励机制，而利润最大化则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典型标志。在一定范围内，这是一件好事。但实施的结果表明，企业内部的利润分配非常“不公平”。有的企业只是因为无法

---

* 如果在不妨害他人的条件下，改进了个人或群体的处境，我们称这种变化为帕累托改进。如果无法进一步实施帕累托改进，这种经济状况则成为帕累托最优。（这些概念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威尔弗雷多·帕累托引入经济学的。）

控制外部经济条件的变化，比如出口产品的需求下降，企业获得的利润比较少；有的企业是由于上级机关的干预，比如上级机关强迫它们生产利润较低的产品，所以也只能获得较少的利润。还有一些企业将自己相对较低的利润收入，归因于缺少先进的技术设备，所以利润太低不是自己的过错。所有的责任都落在那些代表企业进行投资、代表企业进行技术发展的决策者身上。企业要求“纠正”它们的利润份额，这些因为它们无法控制的外部原因而造成的损失，应该获得补偿。这样，利润不再是一个由外部的供给和需求，或者价格与成本之差所决定的市场范畴，而是一个由企业的内在优点决定的公平奖励范畴，企业“干好”或“干坏”，都没有关系。

1958 年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在接近 20 年后我称为“软预算约束”综合征的问题。企业努力让上级机关为因自己的“无能为力”而产生的损失做出补偿。事实上，除非企业不允许外部力量帮它摆脱这种资金困境，否则，真正的利润激励不会再有作用，不管这种资金困境是由企业自身引起的，还是糟糕的外部条件造成的结果。这样做或许不“公平”，但却能迫使经济行为人克服困难，努力适应不利条件。即使是在极度困难时期，也要推行技术和商业创新，以获取更大的利润。相反，因为企业面临不利条件就为企业提供补偿，只能使它们更消极被动，不去努力摆脱困境，反而乞求国家补助。*

这篇文章的出现表明，如果我能够在一个较为宽松自由的环境里从事研究，我可能早就提出了后来才发现的经济学理论。不幸的是，情况不总是这样的。我在 1957 年开始从事轻工业研究时，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尤其难以回答。1956 年后，匈牙利的经济机制出现了什么变化？政府是否履行了诺言，不再回到旧有的官僚式过度中央集权体制？实际上，匈牙利在分权这个问题上极少有可喜的变化（利润分成制可算一个），很多变化在不久之后又退了回去。

从政治上说，当时公开讨论这些问题，或者将这些问题作为研究成果发表，都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我觉得把写好的文章束之高阁，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如果不能讲述或无法出版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结论以及大量的证据，我不得不承认，这项研究工作就遇到了政治约束这一困境。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

---

* 这篇文章发表于 1958 年，它预示着出现了一种研究思路，后来这一思路在与道德风险问题有关的经济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死胡同。现在，我正在撰写自己的传记，我当然想知道当时我对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我是不是应该继续从事《过度集中》的后续研究工作？换句话说，继续研究值不值？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在这两个问题上，我的答案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不”。

我慢慢相信，对这一主题的小修小改远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我必须选择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将数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学研究，这也是我下一章的主题。

本章标题中标记的时间段止于1959年。当然，我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将自己的研究从一个主题转到了另一个主题。但是到了1959年底，我已经义无反顾地彻底放弃了1956年后对轻工业经济管理方法的研究。我在这项研究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尽管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但收获甚微。这项研究工作只为我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一个锻炼的机会，其他的工作基本上都白费了。我的档案里还有几千页的笔记，仔仔细细地摞在那里。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写这本自传时再次翻阅这些笔记，心里依然非常沉重。

人生抉择

“同志们，这绝不是偶然事件。”这是那个年代人们开始说话之前经常使用的开场白。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会说，马克思的著作从来不会反映出极端的宿命观点，也不相信凡事都是命中注定。但在社会主义的日常生活中，从党委书记到记者和历史教师以及计划办公室的负责人，都喜欢暗示人们，没有其他办法。唯一可做的就是顺应历史前进的动力。一般而言，历史的支配力量正好与他们的指令相符合。比如说，除了走集体农庄道路，就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制定的经济计划只有一个版本，每个单位都必须认可这个版本，虽然从表面上说，每个单位都有接受或者拒绝这个版本的权利。而且，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党，也是必然会执政的政党。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我从各种渠道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这些意见说明，我们其实还有道路可以选择。

当时，我已经读过了匈牙利大作家拉斯洛·内梅特撰写的剧本。剧本中的人物面临重大抉择时，都有不同的选择。我对这些人物因此而获得的结局感到

异常吃惊。15 世纪最重要的宗教改革者捷克人扬·胡斯(Jan Hus)，因为拒绝向教廷妥协，被焚烧致死。伽利略却是在处境最为艰难的时候做出了让步，但从此永远失去了心灵的平静。17 世纪的匈牙利印刷工人兼神学家米克洛什·米斯托特福卢希·基什(Miklós Misztóthfalusi Kis)，因为收回了自己的言论，做了毫无原则的让步，被人视为有道德缺陷。伊什特万·塞切尼(István Széchenyi)起初并不热衷于 1848 年革命，终因无法忍受革命失败的结局而自杀身亡。山多尔·裴多菲(Sándor Petőfi)并不是自愿主动参加战争的，而是迫于身边人对他的期望，但他最后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拉斯洛·内梅特的剧本并没有告诉人们，什么是正确的抉择，它只是告诉人们，面临巨大的悲剧性两难境地时的另一种选择，以及选择的痛苦。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我接触到了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著作。我读的第一本存在主义的书是萨特(Sartre)的一篇短文。随后我又对其他存在主义者的著作进行了研究。我研究这些著作也是因为这个理由，即世上如果没有上帝，人们就可以自由地或被迫地作出选择(或许这就是我愿意阅读这些书籍的原因)。在这个世界上，还不存在无法进行抉择的绝望情况，人们也必须对自己的抉择负责。对我而言，“党会作出决定”这句话，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因此，我明白我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这对我非常重要，我不能推托说环境不好。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当时已经把理性选择模型当成了思考问题的主要概念框架。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详细讨论对这一理论模型的批评。但是，我现在想着重谈谈这个模型的优点。理性选择模型的基本结构表明，任何事情都存在选择。我们使用理性选择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时，必须回顾过去已经有过、却被我们否决了的另一种选择。尽管这样做有些违背现实。在我们使用这个模型进行规范分析的时候，我们必须确定，在我们做选择时，那些约束因素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而独立存在的。我们只能在有限的选择范围自由地作出选择。

现在让我简单说一下 1959 年前后我所做的选择。有些人可能会突然发生转变，马上开始从事一个全新的工作。但我却从 1954—1959 年，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才弄明白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经过了一系列慎重的考虑，其间也因为其他的想法而反复纠正自己的考虑，这样我才最终作出了自己的抉择。出于外部的压力，每时每刻作出其他选择的空间都十分狭窄，但每时每刻都存在其他选择的机会。无论如何(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这样说，1959 年前后，我已经有了基本的决定。在这里，我说一下我做出的几个决定：

(1) 我不参加任何党派。

(2) 我不会移民。

(3) 我将以学术研究为职业,而不以政治为职业。我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活动,为国家的复兴作出贡献。

(4) 我要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知识,我希望我的学习和研究工作,能够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部分。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提到过这些决定,但我在这里还是将这些决定一一罗列出来,以便全面回顾这些决定。上述所有决定都不是不假思索的决定,所有决定都不是预先确定下来的。我可以从我的周围,从我的熟人和朋友那里,找出无数的例证来说明这一点。面对同样的选择,他们有些人在一两个决定上与我不同,但有的人的抉择则完全不一样。

截至1959年,我的这几个决定已经不是模糊而率性的打算,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人生策略了。我把这些人生原则告诉给了家人和身边亲近的朋友。

从那时候到现在,45年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已经允许我说,我的后半生完全坚守住了这几项决定。虽然我不能宣称,我在任何时候都遵循着这些决定,因为人毕竟有弱点。但我确确实实努力尽最大可能在坚守自己的人生目标。如果我违背了哪条原则,我过后一定会责备自己,我非常重视忠实于自己思想的道德原则。

注 释

[1] Samuelson, 1980.
[2] Arrow, 1951.
[3] Hayek, 1975(1935).
[4] Hicks, 2001(1939).
[5] Samuelson, 1983.
[6] Tinbergen, 2004(1954).
[7] Hayek, 1975(1935).
[8] Lange, 1968(1936, 1937), p. 70.
[9] Kende, 1959.
[10] Kornai, 1959.
[11] Kende, 1964.
[12] Kornai, 1958.

8. 数学方法的经济学应用：1957—1968 年

《两级计划》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慢慢认识到数学在现代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掌握数学语言，我根本无法读懂现代经济学著作。如果我想从事符合现代经济学学术规范的研究工作，我必须研究数学方法的经济学应用。对应用数学的学习，成了我所进行的学习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因为只有不断进取，才能改变我的研究方法。

结识陶马什·利普塔克

因为我一贯比较注意逻辑的清晰，所以我的计划实施起来挺容易。同时，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数学和物理学的成绩都很不错，因此，我一开始学习数学知识就不断加深学习的深度。我不仅仅在家里自学，还去听了很多课，课程内容主要是当时经济学家使用最多的数学：微积分（微分和积分）和线性代数。

实际上，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非常喜欢使用数学方法。在前一章关于 1957 年后轻工业中经济管理方法转型的讨论中，我已经开始对企业利润的作用产生兴趣了。西方学者认为，企业决策人员的动机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关联，根本无需证明或解释。而匈牙利从 1957 年后，试图在轻工业尝试为管理者提供利润激励机制，并力图推广到全体工人。工人的各类奖金也都与利润挂钩，但挂钩的方式却很奇怪。利润分配取决于盈利率（销售比）是否超过了某一具体水平。政府鼓励企业管理者最大化（用数学术语来说）企业利润。但这个最大化不是绝对量的最大化，而是份额的最大化，也就是利润与销售额之比的最大化。虽然很多人

认为这两种激励方式其实是一回事，我却认为这两种方式具有不同的经济效应。

我开始用数学方法系统阐述这两种最大化标准，以及与之相关的计划任务。我草草拼凑了一个模型，但我对这个模型不甚满意。这也是我对经济研究所同事安德拉什·布罗迪谈及这个模型时，我所能达到的程度。布罗迪在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方面，远远走在我前面。布罗迪介绍我认识了匈牙利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一位青年数学家。布罗迪与数学所所长、世界著名数学家阿尔弗雷德·雷尼(Alfréd Rényi)关系很好，而且还在一起从事研究工作。他曾经听雷尼谈起过他的一名学生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很感兴趣，这名学生就是陶马什·利普塔克(Tamás Lipták)。

这样，我认识了陶马什。随着我们的工作关系日渐紧密，我们的私交也逐渐醇厚。很快，我们又找到了政治上的共同点。请记住，这是在 1957 年，那年头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与政治观点相左的人保持亲密的朋友关系。

陶马什身材瘦削(后来还是这么瘦)，但非常英俊，声音很柔和，说起话来妙语连珠，能在一瞬间获得别人的青睐。他的外表并不是他的优势，但女性都很仰慕他。

陶马什有非凡的数学才能，说他是个天才一点都不夸张。他不仅可以准确无误地运用自己丰富的知识，而且还能在必要的时候，出人意料地回忆起以前读到过的定理或方法，他是一位富有创新思想的人。

在后来的数年间，陶马什一直都是我的私人数学教师，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数学知识。陶马什并不是给我讲授数学课程，而是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出一些专题教程让我学习。他给我推荐了大量的阅读材料，阅读这些资料使我获益匪浅。在他的帮助下，我很快学到了很多数学知识，还学会了分析问题的方法。他从来都不隐藏模型借以成立的抽象假设，或者隐藏模型所使用的对现实进行简化的方式。相反，他用最大程度的学术真诚，呈现出模型中的简化部分。

数学需要绝对的精准。在陶马什身上，他已经将这种让人敬仰，而且在科学上已被证明的目标发挥到了极致，这也许是后来他出现精神问题的最初征兆。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电脑，每篇文章都是陶马什用规范的字体亲手书写的。就算他在 20 页纸满是方程式的稿件中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他也会扔掉这份稿子，重新再写一遍，而不是在原稿上进行修改。他认为，一篇手稿必须完美无瑕。

我从来达不到他那种绝对的精准。但是，他树立的这个标杆，使我在这一方

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即使现在，只要我发现了我撰写的文章中某个地方略微不准确，一个追求数学精准的堂吉诃德形象就会出现在我眼前：陶马什肯定会扔掉这篇文章，重新写一遍。

我并不想将陶马什写成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物。这位极度聪慧而且非常和善的男人，有时候也会让人难以忍受。我要求自己绝对守时，一般都会在约定时间准时到达指定地点。但如果对方迟到了，我就会非常烦躁，甚至很生气。* 我通常都会遵守约定的时间，如果迟到了，我就感到不安，至少也要争取缩短迟到的时间。陶马什在这一方面跟我完全相反，他很少准时出现在我们的约会场所，也从来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过工作。然后，他会为了自己的迟到、错过了会议或者忘记做他承诺的事情而编出一些幼稚的借口，或者绝口不提他的疏忽。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这些禀性上的差异常常引起争执。

利润分成制的数理研究

现在我们回到 1957 年促使我找陶马什的那个经济问题。不久我就发现，如果非要坚持准确性，而不采用化繁为简的方法摒弃现实的复杂性，就很难从数学上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我们不得不对非线性规划的具体形式进行分析，反复进行计算。这篇论文的各个章节都经过多次撰写，每一章节都经过长时间苦思冥想以及无数次长达数小时的讨论。最终，我们完成了这篇长达 250 页的文章，我们对此都觉得满意。

后来，我们的工作突然停止了，陶马什被捕了。被捕的原因是他自愿参与了我在前一章所谈的一次行动。山多尔·费克特署名为“匈牙利人”的那篇文章，在我的帮助下在国外杂志发表。发表之前，这篇文章曾以油印件的形式在匈牙利知识分子圈中流传。陶马什就是帮助油印文章的人。在这次政治事件中我们都出了力，但当时我们互不相识。后来，我们离开了政治前沿，开始了学术上的奋斗，这才发现我们都共同拥有这段政治往事。陶马什的被捕并没有让我们感到奇怪。

---

* 我当实习记者的时候，有一次，共产党经济政策“沙皇”艾尔诺·格罗叫我去他办公室。到那儿后我等了一段时间，然后就用不快的口气对他秘书说，我已经按约定时间等了他 20 分钟，说完我就走了。人们可能难以理解我这种胆大妄为的举动。但是，我遵守双方约定的时间似乎让格罗印象颇深，所以他对我的这种不寻常之举什么也没说。

陶马什的名字排在被告名单的末尾。他被拘留了大约一年的时间，然后进了监狱。我曾经将我们合作研究中的几个数学问题写了下来，交给他的妻子曼仪(Manyi)，想看看能不能转交给陶马什，让他在狱中考虑一下这些问题。虽然我并不认为解决这些问题本身有什么紧迫性，但我想考虑数学问题对陶马什有好处，可以将陶马什的注意力从监狱生活中转移开。* 但可怜的陶马什并没有思考这些经济学问题或数学问题，而是企图自杀。这实际上是抑郁症的病变信号，后来，抑郁症还是将他打垮了。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

我被经济研究所解聘的时候，陶马什仍然被关在狱中。我打算出版我们那部砖头一般厚的书稿，所以向轻工业部寻求帮助。轻工业部同意承担印刷费用，但坚持要把身陷囹圄的陶马什的名字从书上删掉。我又向阿尔弗雷德·雷尼求教，雷尼不仅仅是陶马什的上级，还是他的忘年交。我们一致的意见是，书名页用“与匈牙利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合作”的字样，替代了陶马什的名字。1959 年，这本书终于出版了，装帧很简单，而且是影印版。[1]

在该书的参考文献中，除了有关匈牙利轻工行业的实证文章以外，我还列上了我那段时期研究过的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比如说，我在第五章引用了埃里希·施奈德和扬·丁伯根的著作。今天看来，开列这些文献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在 1957 年的匈牙利，人们通常不会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名字以正面形象出现。

陶马什出狱后，我们又决定在西方出版我们的著作。我们用英文撰写了一篇篇幅适合杂志发表的文章。** 陶马什在这方面是行家里手，当时，我刚刚知道

---

* 这个主意也不是特别傻，事实上 1956 年被捕的一些所谓罪犯，还在狱中学习外语，后来有的从事翻译工作，有的当了作家，写了不少作品。

** 约瑟夫·豪特沃尼将这篇文章从匈牙利文译成了英文，题目为《社会主义企业利润分成制经济效应的数学调查》。约瑟夫的早年经历足以写成一部小说，一个短短的脚注显然说不清楚。他是声名显赫的豪特沃尼家族成员，家境极其富有。他叔叔是慧眼发现匈牙利大诗人安德烈·奥蒂和阿蒂拉·约瑟夫的拉约什·豪特沃尼。拉约什不仅慷慨资助了这两位文学巨匠和其他许多作家，在匈牙利文坛还是颇具组织能力的热心人士。

约瑟夫·豪特沃尼在英国剑桥大学学过物理学，他的英语口语和书面语与母语没有区别。他在英国加入了共产党，“二战”结束后他被迫回到了社会主义的匈牙利，却被当成英国间谍而被捕入狱。因为人们认为，除了这个理由之外，还有什么能吸引这名活力十足的年轻共产党人离开英国舒适的学院生活和富裕而显贵的家庭返回祖国呢？1954 年他被释放，但在 1956 年后又再度入狱。他第二次获释后，有一段时间以翻译为生，但他只接自己认为值得翻译的文章，这些文章一要使自己感兴趣，二要能赚钱。这也是我请他为我翻译文章的原因。豪特沃尼后来又重新回到学术圈，成为匈牙利计算技术研究中的主要学术力量，他在这个领域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颇得同行赞赏。

西方数学杂志和经济学杂志的风格和格式要求，陶马什却已经拥有了多年的阅读经验。这篇文章的内容是我们智慧的结果，但文章中数学的准确性，文风中的西方结构和风格，都是陶马什的功劳。

当时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任何科研或者学术著作，如果没有事先获得政府允许，就不能送去西方发表。这个过程的一般程序是，大学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先把自己的文章交给自己的顶头上司，顶头上司再将文章转呈给他的上级。如果文章有政治问题，那么，文章就会交给党中央。然后，再看应由某一级的上级决定是否允许这篇文章在西方发表。

我和利普塔克决定不申请这种许可证。我们直接将文章放进信封，然后寄了出去。当时，那些不按法律规定将“匈牙利人”（作者山多尔·费克特）的著作送往国外的人，不仅受到指控，而且还关在监狱里没有放出来。我和利普塔克也卷入了这一事件。就算我们现在寄送的这篇文章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但我们也是在做违法的事。但我们都觉得，重要的是不要把自己的著作拿去走这个规定的官方程序。这次行动也为我开了一个头，从此以后我就按照这种做法将我的作品送往国外。我从不去请求上级允许我到国外发表作品，我只是把自己的作品直接寄往国外的杂志社或出版商。在这一方面，我的做法与我的匈牙利同行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同行很不相同，他们后来都抱怨，无法拿到上级批准在国外出版著作的批准证。我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仿效奥匈帝国作家哈谢克笔下的“好兵帅克”，做就是了，不要去问。因为如果你问了，答案肯定是不行。

我们把文章寄到了数理经济学的顶级杂志《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a*）那里。数年后我才听说，杂志社的法国编辑埃德蒙·马林沃德一拿到文章就马上同意发表，而且一个字和一个标点符号都没动。* 文章刊登在 1962 年 1 月的《经济计量学》上。[2]

这篇文章讨论的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它分析匈牙利独有的企业激励机制。文章特别指出，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种社会主义经济。甚至提出这一问题都是一种思想挑战。

- 激励机制并不是预先确定的。激励机制是基于各个企业不同的情况分别

---

* 很久以后，在我已经逐渐熟悉了西方杂志的编辑和审稿程序后（也就是拒收多数来稿，选中的稿子也会返回作者反复修改），我才知道不用修改稿件就马上采用，是对作者的最高赞赏。

确定的，而不是根据财产关系或者制度条件，自然或自发地产生。事实上，这种方法为后来的研究开了先河，即对激励机制的讨论以文献资料研究为主，讨论的是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

- 价格也不是预先确定的。匈牙利实施的是中央价格控制，所以价格不是通过市场确定的。我们的文章一方面分析了企业激励机制与价格之关系的荒唐机制；另一方面，也对企业激励机制与产品数量和产品构成的关系做了分析。哪一种激励机制会导致生产过剩或者生产不足呢？它推动产出向哪个方向发展呢？

我经常听到东欧经济学家说，他们之所以没有在西方杂志上发表文章，是因为杂志编辑对东欧经济没有兴趣。我在《经济计量学》杂志发表文章以及后来其他著作出版的经历，正好与这种说法相反。我的文章能够引起杂志编辑的兴趣，只是因为这些文章是由一名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撰写的，作者从一个世界之遥远的距离向编辑们报告那里发生的事情，只不过作者使用的是西方杂志的惯用语气，即现代经济学的语言。

纺织行业的规划

我和陶马什·利普塔克已经完成了理论分析。同时，我又承担了另一个方向的研究工作。我希望能将数理方法应用于经济计划，我的研究目标不再是获得什么理论成果，而是想用反映实际经济情况的定量数据进行计算，从而为真正的决策工作做好准备。换句话说，我研究的是应用经济学。

我开始潜心研究各类文献，我不得不学习并消化微观经济学、决策理论、运筹学或成本收益分析知识中各种相互关联又相互重叠的部分，以期发现如何找到将其应用于中央集权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途径。线性规划为这种计算提供了数学工具。我因此学习了这种分析方法的概念体系、线性规划模型的结构，以及思维技巧，这有助于我将实际问题用数学语言转述出来。

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著作，是由罗伯特·多夫曼、保罗·萨缪尔森以及罗伯特·索洛撰写的《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这本书再加上 T. C. 库普曼斯的《关于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对我理解如何使用线性规划来反映我从微观经济学了解到的各种关系，帮助颇大。不久，我觉得已经可以熟练运用两种思维方式了，

即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和决策准备数值计算的操作。*

我建立的第一个线性规划模型是想回答下面这个问题。纺织行业的计划人员在技术发展问题上面临几种选择。他们可以保留现有技术条件，但使用相对较少的成本，推动少许技术发展；或者，也可以通过大量投资并购买价格昂贵的进口设备，迅速提升劳动生产率。我的这种计算并不打算提出一个单一的简单结果，而是意在展示，从数学上看，最佳选择取决于各种影响因子，比如利率、汇率以及未来的进出口价格。

这种方法的新颖性鼓舞了轻工业的计划人员、技术人员以及外贸企业商人和计算机专家，他们都参与了我的这项工作。当时，电子计算机刚刚在匈牙利露面。我们在这一领域明显落后于西方。尽管当时那台计算机使用的是真空管，而且大到占用了整整一个房间，但我们还是因为这台计算机而激动。这台巨大的计算机由匈牙利科学院计算中心负责操作，它的计算能力根本无法与今天的笔记本电脑相媲美。

一个由数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团队，热情地在这台计算机上工作了几个星期，计算一个包括 24 个方程的体系。**（现在，比这个模型大上几百倍的模型也可以在几秒钟内被轻松搞定。）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同时开创了两个大有可为的领域，线性规划以及电子计算机在匈牙利实际经济中的应用。

有两个团队应用数学方法进行这种颇具启发性的研究，这两个团队相互协作，同时也有竞争。其中，一个团队使用的是线性规划分析法，一个团队使用的是俄裔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的投入产出法。由安德拉什·布罗迪（András Bródy）率先采用、玛丽亚·奥古斯丁诺维奇继之采用的投入产出分析，具有很多优点。这些学界领军人物很早就开始研究投入产出分析法了。所以，当我刚刚开始探索线性规划的时候，他们已经非常熟悉投入产出分析了。中央统计办公室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编制基于统计调查的大型投入产出表。这些统计数据为后来的计算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支持。我们建立线性规划模型的参数，则主要来自专家的估算，换句话说，这些参数主要来源于对现实真实数字的直觉。

---

* 我很高兴在我刚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就见到了我那个时代的四位杰出学者，并且后来还与他们成了朋友。

** 更准确地说，线性规划中出现的是不等式，也就是决策的上限和下限。

关于这两种方法，无论是私下谈话还是后来在会议上，我们都有很多讨论和争论。我主要出于理论考虑，坚持采用规划方法。我认为在投入产出分析的背后，有*决定论*的哲学思想。一旦给定了最终使用的向量（计划人员也力图给出这个向量），那么，生产和所有的投入产出组合都要与这个给定的向量相吻合。但从另一方面看，线性规划却表明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我在前面已经谈到过这种方法对形成我新的世界观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安德拉什·布罗迪非常老练地向人们演示了如何使用里昂惕夫模型来描述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著名的“再生产图示”。[3]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核心部分，就是讨论*平均*生产成本和*平均*利润，马克思的说法倒与投入产出分析相符合，因为其中的每个系数都只代表一个社会平均数。后来我认识到（现在我也这样认为），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者所称的*再生产分析*，而当代经济学家所称的*动态模型*中，做出了开创性工作。然而，投入产出分析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兼容性，并没有使我倒向投入产出分析，反而让我产生了怀疑。我正确地发现了投入产出法缺失的东西，即在技术和决策方面的选择。我赞同与线性规划类似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参见我提及的多夫曼、萨缪尔森和索洛的著作）。但在西方经济理论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边际”概念（比如边际成本、边际替代率、边际收入和边际生产率，等等），都无法用投入产出分析进行计算，但线性规划却可以自动产生这些指标。*

这就出现了相互对立的两种“空洞”的数学框架，两种与政治或意识形态无关的数学框架。但是，理论层面的差异让这场争论涂上了一层特殊的色彩。虽然没有明说，但这场学术争论却引出了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借助现代数学思维技术重新焕发青春。

两级计划

将线性规划应用于纺织行业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获得了学术界的赞扬。其

---

* 我们讨论了每种条件下变量的第一个衍生变量，也就是不同的量值。这里可以举一个简化的例子：如果产出增加一个单位，成本会增加多少？这就是“边际成本”的涵义。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如果资源增加一个单位，回报可以增加多少？这就是“边际报酬”的涵义。

他行业部门也随之开始了计算规划工作。当时，我也在思考能否将这些部门的数据联在一起进行研究。实际上，长久以来，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国家的整体经济问题。怎样才能把线性规划应用到整体经济计划中呢？

如果按照部门模型的相同细致程度，用一个模型来描述整体国民经济状况，需要一个大于部门模型 20 倍或 50 倍的方程体系，当时的原始水平的计算条件排除了建立这种模型的可能性。这样我又想到一个主意，即将大规模的经济模型拆分成较小的组成部分。然后，将这些局部计算系统地相互调和，我们就能得到“大”的公共解。当时，意在实现这一任务的所谓线性规划分解运算法则已经发表，这一领域只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程序。

我反复思考了国民计划办公室是如何工作的。首先，它要制定全国性的经济计划；然后，再将这一国民计划按部门分拆开来。这些分拆的计划再发给统辖各部门的部委，由部委的计划工作人员对计划进行研究。接下来，部委开始与中央计划部门谈判，促使他们对部门计划进行修订，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中央和部委才能就国家计划和部门计划达成一致意见。

最后，我在萨缪尔森的理论著作中找到了第三个灵感。[4] 即使某一产品在任意一次交易中，可以按照不同价格进行交易，在市场达成最优均衡状态时，就会出现价格均等化，即一种产品只有一个价格。

这些想法有助于我的两级计划算法基本概念的提出。我开始勾勒一个模型。中央将数量分配到部门（比如投入配额和产出目标等），各部门则制定出能够满足中央需要的最优计划，这就跟迄今为止我们的部门线性计划相同。然后，部门再将自己的资源和目标的影子价格报给中央。* 这就是经济效率报告。中央则根据价格均等化原则，再次实施分配计划，从边际收益较低的行业调回资源，再将这些资源调配到边际收益较高的行业。生产需求也按照相同的方法进行再分配。接下来，各部门再次根据本部门的情况进行计算，这一过程会反复进行，直至达到最优分配方案。

我的基本思想就是这样，但我无法精确表述这一理论，我只能指出一种类同：如果萨缪尔森证明了他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那么，我刚才勾勒的再分配原则也能达成均等状态及最优解决方法。但是，拿出这个比喻还不够，一个命题

---

* 产品的实际价格由市场决定。影子价格是模拟计算出来的，主要用于某种具体分析。比如投资项目的成本—收益分析，就有不同的计算方法。线性规划计算可以自动生成一系列影子价格。

必须得到证明，但这已经不是我能力所及的事了。

我做不到的事情，陶马什·利普塔克可以做到。1963年，他天才地采用博弈论模型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比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兴盛还早了很多年。在这个模型中，一方是中央，另一方是所有的行业部门。这一想法得到的数学解严格证明了我们刚才讨论的程序会向最优解靠拢。

我们最后完成了“两级计划”的研究。[5]模型中的基本经济思想和计算法则都是我提出的，我也对这个数学模型和计算方法做了解释。但模型阐述的准确性和模型的精美，却要归功于陶马什。陶马什还提出了一些窍门（比如将研究任务当成博弈问题重新阐述了一遍），这使得研究项目中的难题都能用数学方法加以解决，我们的假设也得到了证明。

我们再次向《经济计量学》投稿，结果与上次相同，这篇论文仍然未做任何改动就被杂志社接受，并于1965年发表。[6]文章一面世，作者的名字立即传遍了数理经济学界。文章被引用了数百次之多，还被译成了数种语言，许多大学还将论文收入本校教学大纲。1971年，阿罗将《经济计量学》发表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22篇文章汇编成集，[7]其中就包括我们这篇《两级计划》。

这篇文章结合了我的两个研究目标。我现在想从部门一级的模型转向国家一级的规划模型，但要用适当的计算法则将各部门的模型整合在一起。一会儿我就谈谈我的想法和实现的手段，但在此之前，我还想简单说一下我的另一个目的，即对中央计划经济进行理论检验。

中央计划的理想模型

两级计划可以被视为中央计划经济的理想模型。两级计划模型可以展示出通过中央和部门两级计划人员的共同努力，达成一项满足下列要求的计划：

- 部门计划要正确地包容在中央计划的框架之内，中央计划和部门计划应该完全一致。
- 计划要有可行性，国家和部门的两级计划都要根据资源有限性，制定与之配合的计划。
- 这一计划是所有可行计划中的最优计划，且能够最好地满足中央计划的目标。

- 这一计划不是中央强加给部门的计划，也并不要求中央掌握各类信息。这一计划主要取决于分散的信息积累（在我们的模型中，是指部门一级的信息积累）。

西方数理经济学家对两级计划的理论模型非常感兴趣。因为模型极其简单明了，并且与我在前一章所讨论的兰格模型的观点正好相反。尽管兰格并没有使用数学模型表述他的观点，但是，伟大的法国经济学家埃德蒙·马林沃德（Edmond Malinvaud）后来使用数学语言将此模型重新表述了一遍，并建立了模型的理论结构。[8]但是，兰格—马林沃德模型*的经济信息流动与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中的经济信息流动正好相反。在兰格—马林沃德模型中，中央制定价格并用其对企业活动进行调节，企业则向中央汇报自己的产出量和投入量。中央则根据这些报告，确定哪些企业供过于求，哪些企业供不应求，因此会集中力量调节这些企业的价格并确定价格调整的方向。这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的理想化图景。而在我们的模型中，信息流动的方向则是调转过来的，从上往下流动的不是价格信息，而是数量信息，即资源配额和生产目标。在这里，各部门将资源使用的经济效益情况，以及产出任务的完成情况上报给中央。这就是中央计划的理想化图景。

下面我们可以进一步进行比较。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的特征是“完全计划”，与瓦尔拉斯模型中的“完全市场”，即一般均衡理论中的完全市场相反。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证实了完全集中化经济体制完美运行的理论可能性，而瓦尔拉斯模型则表明了完全分权体制完美运行的可能性。

让我再稍稍补充几句吧。我现在描述的并不是我的论文完成之时我的想法，而是在 2004 年和 2005 年此时此刻的想法。我在这里并不打算用比较方法来衡量两个与世界隔绝的东欧经济学家之研究成果的意义，我想说的是，我们的文章是否具有持久有效的理论意义。

我认为我们的文章具有持久的理论意义。数学模型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准确地阐述需要说明的理论在什么条件下成立。能够懂得如何正确地解读数理经济学理论著作的人，也能够更加清楚地思考这些假设。

---

* 我和陶马什在就两级模型进行研究时，还没有接触到马林沃德的模型。马林沃德收到我们的手稿后，因为他当时是《计量经济学》杂志的编辑，所以非常热情地帮助我们发表了这篇文章。后来，他还利用一切机会帮我进行研究。

两级计划的计算法则要根据下列条件进行：

(1) 模型的中央一级计划人员要有清晰而明确的目标。(目标函数用来表示这些目标。)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情况与此不同。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中央领导层缺少具有持续性的目标，常常会出人意料地修改政策，或无计划地临时进行政策修订。而且经常一会儿进一会儿退，犹犹豫豫，又常常有内部冲突对政策目标进行干扰。它的经济政策也无法一以贯之地协调不同的政策目的。它也无法确定不同目标的相对重要性，也不打算从事这样的工作。

(2) 模型中的各个部门也没有自己的具体目标，他们的目标要服从于中央的目标。现实中，社会主义经济中各个层次的所有经济行为人，都有自己想要追求的利益。

(3) 在模型中，只有反映了实际经济状况并满足了上下级约束条件的计划才能得到认可。在现实生活中，尽管已有的计划会遭到各种约束条件的制约，但计划仍然为人们所接受。

(4) 模型中所有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信息，都正确无误。但在社会主义经济现实中，所有信息都具有不确定性。此外，经济行为人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也会说谎话。如果不准确的信息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处境，向上流动或向下流动的信息便会因此出现扭曲。

(5) 模型要有严格的纪律。中央一级要及时发布计划，部门一级也应该及时对计划做出反应，两级应该步调一致。事实上，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经济计划推迟以及不符合实际等问题非常普遍。原因很简单，做计划的是人，不是机器。

(6) 模型中的计划机构非常有耐心，为了制定出最佳解决方法，中央和各部门之间会反复进行计划调整。在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中，制定计划也面临时间限制的压力，即使人们愿意反复修正目标数字，他们也没有时间这么做。

因此我们必须遵循以下论证思路：

第一，要理解理论模型中的命题：如果……中央计划就可以得到充分运行。

第二，全面考虑这些“如果”，并将理论假设与现实进行比较。

第三，确定这些条件没有得到满足，事实上，满足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根据先前的观察推出结论，中央计划的充分运行根本不可能。

这个理论模型的一个目的就是提供一种严谨的思路。从这个角度看，两级计划模型迄今为止依然有效，而且是一种有用的学术工具。

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个人看法。读过后面几章，大家就会明白，后来我渐渐开始对新古典思维方式及其理论硬核，即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提出批评。准确地说，强化我对主流经济学思想的批评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刚刚谈到的论证方法：对模型假说的验证及其与现实的比较。但是，在我们设计两级计划模型时，我还没有持这种批评态度。当时，我完全认同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的学术领袖也认为我们的观点相同。这种学术上的意气相投也加强了他们对我的著作及对我本人的兴趣。

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些首要原则

在我们撰写两级计划的文章时，陶马什主要是对理论方面感兴趣。作为一名数学家，用公式阐述问题形成的挑战，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与他一样，我关注的是理论分析在实际中的应用。

现在我们还必须澄清，国家计划办公室和部门的官方计划与经济研究工作者借助数学模型设计的计划之间的关系。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研究人员应该构建一种可以表达社会共同利益的“福利函数”，即模型的目标函数。如果一个计划注意到描述客观条件的种种约束，还能最大化社会成员的福利，这个计划就是最优计划。明智的经济学研究者会小心谨慎地确定并解释福利函数。他们会根据何谓福利的预设，从物质和非物质（文化、战略和地缘政治）诸方面，对福利函数进行解释。他们不仅着眼于当前福利，还要考虑下一代的福利。一旦建立了这样的福利函数，数学计划人员就可以进行计算，提交计划，并且宣称这就是为政治决策者提供的最优计划，而不是由计划人员用传统方法制定的计划。*

我则常常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完成这一任务。在我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草拟首要原则之时，有很多因素都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

我做了一些策略考虑。我不希望计划人员将使用模型和计算机的人都看成抢了他们饭碗的对手。我想让采用非数学方法（传统方法）的计划人员与使用数学的计划人员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做到了这一点。国家

---

* 在我们的争论中也出现了这样的观点，数学计划人员应该向最高经济政策决策者询问他们的个人偏好，然后将其体现在模型的目标函数中。这样，模型就能反映政治家的看法而不是公众的意愿。

计划办公室长期计划处的领导伊什特万·海泰尼，对我们的研究工作特别感兴趣，给了我们很多支持。*

在理论上我也有很多反对意见。无论那时还是后来，我都无法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可以确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单一聚集福利函数。换句话说，无法准确确立假定的社会利益是什么的方法。社会并不是一个同质体，群体和个人对各自利益的看法截然不同，比如他们如何定义福利，如何在当前这一代和下一代之间分配成本和收益，等等。利益的冲突要在政治领域才能解决，因为预算、经济立法和经济计划，等等，都是在政治领域制定出来的。数理经济学家不可能做出这种决策，我在文章中表达了这种反对意见。**

20 世纪 60 年代我开始对福利函数提出理论质疑时，完全不知道也有人在进行与我相同的工作。其中，最重要且内容最丰富的思想，出自肯尼思·阿罗著名的“不可能性理论”[9] 中。阿罗的这些观点后来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人们可以根据阿罗的观点，对下列说法做出严格的论证：世界上不存在一种能将各种截然不同的个人偏好融入一个公共福利函数的民主决策过程。****在对相关文献做过研究之后，我确信，我反对确定一个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最优（数量）标准”，并据以表述社会利益的思想，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我也对政治状况和意识形态状况做了思考。尽管没有将这些想法撰文发表，但我确实进行了认真思考。无论愿意与否，我都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即在匈牙利体制下，基本决策都是党的最高领导层作出的，国家计划办公室和各部门的计划人员，都要据此进行计划调整。如果上级交下来的基本目标有些不切合实际，他们也许会出于责任感小心谨慎地说几句，但最终他们也只能服

---

* 读者可能想知道，既然我已经拒绝加入党设立的“改革委员会”，为什么还与国家计划办公室合作呢？这个问题我将在第 15 章讨论 1968 年改革的时候回答。

** 丁伯根教授也加入这场论战，他与艾布拉姆·伯格森和拉格纳·弗里施的观点相同：有可能、也值得建立一个“福利函数”。在接受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丁伯根提到了我与他之间的论战，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丁伯根提出：“东西方都应该详细说明各自的福利函数，这样才能弄明白，两者终极目标之差别到底有多大。”[1981(1969), p. 21]丁伯根的提议表明，他深切希望双方能够和平共处，协作前行。但这个提议也揭示出他良好愿望中掺杂的政治上的幼稚成分。

*** 阿玛蒂亚·森[1997(1982)]在拓展社会选择理论方面作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在这起事件过去 20 年后，我在哈佛大学幸运地成为阿玛蒂亚·森的同事和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社会选择问题。

****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经济学家就如何解释福利函数爆发了一场论战。论战中，经济学家们对艾布拉姆·伯格森和萨缪尔森使用的方法进行了检验。但对不同的理论结构进行比较，不在本传记讨论范围之内。

从中央的指令。

我周围都是使用传统方法的计划人员，而我开始了用数学工具进行计划计算。我希望在进行计划计算时，与计划决策人员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没有就采用何种福利函数与他们进行争论，我们使用的是一个简单的公式。我们将“官方”计划视为既定的计划，将官方计划的数据看成我们模型中的约束因素。然后，我们指派其中的一个指标为目标函数，而这一指标的改善应该确定无疑地有益于国民经济。比如说，在我们的模型中，可兑换货币的经常账户的改善就是这样的指标。我们的模型提出的这个计划，可以包罗按传统方法制定计划应该包罗的所有方面。它为匈牙利安排的是比以前更少的债务，这也是我们这个计划为匈牙利提供的红利。能为匈牙利制定计划的国家计划人员，对我们这些数理规划者根本不屑一顾。我们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因此按照他们的模型，尝试着进一步改善国家的经济条件。不过，不管人们怎么看待当时的政治状况和未来的发展，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国家负债的减少等同于获得纯收益。*

在那几年里，使用数学模型制定计划的想法，也在苏联冒出了头。苏联的列昂尼德·康托罗维奇发现并阐明了线性规划的数学基础，并在莫斯科和新西伯利亚领导了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团队对计划模型进行研究。苏联学派的说辞与我在布达佩斯提出的观点截然不同。他们声称可以提出“最优计划”，但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承诺，这种说法会给人误导，并让人们产生幻想。

苏联的观点在匈牙利也有很多追随者，我就此观点反复与他们争论。我一直持一种更为谨慎的承诺：在一切良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计算提出建议，帮助正在制定的官方计划做出切实可行的改善。

我从来没有把线性规划应用于经济运行计划当成儿戏，也就是说，我从来不会草率地用线性规划来支撑每年的经济计划。对我而言，日常生产与消费的协调，显然是市场的任务，而不是数学模型的任务。我只是想为国家的中长期计划作一点贡献。我们在部门一级的规划项目研究中，已经解决了如何在各种投资选项中做出选择的难题，我现在是想在国家一级的规划项目中，继续沿着这一方向前进。

---

* 我们在完成官方计划的其他目标时，还在计算中使用了各种类型的目标函数，比如最大化个人消费等。这些函数又转化成几种可以增加选择的计划变量。再者，我们力图克服这样的教条思想，即只可能存在一种计划，人们只能顺一条道前行。

计算

现在有必要说几句把我们的想法付诸实际应用的情况。

在1962—1963年，1956年开始的残酷压制已经开始放松，许多被关押在狱中的朋友也因为政府大赦而获释。同时，也有迹象显示，我也可能从我的流放之地轻工业脱身。在我研究纺织业时，我与那些操作匈牙利第一台计算机的人有过合作，他们来自匈牙利科学院计算中心，他们邀请我到计算中心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另外，我跟国家计划办公室经济计划研究所也有工作联系，他们也同意开创将数学模型应用于经济计划的研究工作。* 为国家经济计划规划建立模型的工作开始了，有几位同事积极投身于这项研究，办公室的领导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我们按照科尔奈—利普塔克论文中描述的结构，动手建立模型网络，即一个中央模型和(用于最初的实验性计算的)18个部门模型。为了建立各部门的模型，我从中央和各部门的研究机构中聘请了几位经济学家。同时，我还建立了只有少数几个人的核心团队，全职进行模型计算，其他人则负责提出建议或解决具体问题。在研究工作的全盛时期，我们有一个150—200人组成的小部队，热情地构建模型、收集数据，从事计算。参与这项两级计划的许多人，都是刚刚踏入研究领域的新人，但后来，都成为了颇有名望的经济政策决策者(比如古斯塔夫·巴格、帕尔·拜奈代克、安娜·雅诺什、安德拉什·纳吉、费伦茨·劳巴尔、朱迪特·里姆勒、捷尔吉·西蒙、约瑟夫·西瓦克、马顿·陶尔多什等)。这是一

---

* 经济计划研究所的领导希望我能到他们那里全职工作，但遭到国家计划办公室人事部门的否决。现在我根据警察资料，可以推断出在否决之前出了什么事情。国家计划办公室的人事部门，向我过去工作过的各单位人事部门了解我的情况。我在轻工业界工作过的两个单位不想挡我的路，所以给出的评价比较中立。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评价则一般，他们强调我的专长，但也没有隐瞒我在1956年及其后的所作所为。他们还明确指出，我是因为政治问题而被除名的。这些信息使国家计划办公室在使用我的事情上失去了热情。他们还与内务部联系，了解我的情况。内务部的Ⅲ/Ⅲ司(国内情报司)和Ⅲ/Ⅱ司(国外情报司)的警司交换了情况。他们查阅了我的档案后提出："上面提到的人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中因为参与反革命活动而被记录在案。"(ÁBTL V-145-288-a. pp. 502—505. 指令Ⅲ/Ⅲ司对我进行调查的指示落款日期为1962年12月27日)很显然，因为内务部的意见，国家计划办公室才改变了聘用我的决定。科尔奈在匈牙利科学院的庇护下回来工作，也还可以，但让他进入国家计划办公室，就有些过分了。这个事件清楚表明，我当时的生活有两条平行线，看得见的那条线，是我在努力研究数学计划方法。看不见的那条线，则是人事部门和政治警察构成的网络笼罩在我身上，并干扰我的生活。

个由顶级精英组成的团队。

找到研究资金也是一个根本问题。我到过好几个政府部门想为部门模型研究寻求资金支持。我们准备了一系列小册子提供给有关人员和机构，即支持这一研究项目的主要官员和其他对项目有兴趣的人。有的小册子对如何构建模型进行了详细说明，有的则对计算方法进行了说明，或是做了一些理论解释。还有一些小册子专门汇报研究成果。多数小册子都是我亲自撰写的。在项目进行期间，我撰写了不下 2 000 页的文字材料，并将材料油印成册，分发给匈牙利经济学家。

在我的指导下，我们于 1963 年开始了第一阶段的研究工作，并持续了五年时间。* 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完成了大部分的部门模型计算，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中央一级的模型计算中，我们遇到了很多难题。当时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有限，所以科尔奈—利普塔克计算的进展很是缓慢。同时，计算量也过于庞大。虽然我们这个模型的架构非常精致，但效率不高，所以我们不得不用更加粗糙、而且准确度不高的方法取而代之。

同时，我们又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经济计划积累模型，并用此模型进行了大量计算工作。我们是这样考虑的，由于大型两级模型的计算工作要花费很多时间，所以我们至少应该有一个小型模型来向计划人员证明线性规划是有用的。**

时光流逝，在数据收集和计算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障碍，人们最初的热情慢慢消失，原来那个精力充沛的团队开始出现人员流失，而且精神也开始涣散。有些人认为，他们不应该在项目陷入困境之时离开，应该坚持到出结果的那一天。但是，最终的计算结果没有出现什么重大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我们不能说，也确实没有说，我们终于制定出了以计算机计算为基础并由数学模型证实的国家经济计划。

面对这种结果，人们的情绪变得非常复杂，人们心中交织着成功与失败的情绪。项目研究团队从来没有一起对自己的工作经验做过评估。这一庞大项目取得的某些成果，被有些人写进了自己的论文中发表了，我自己也写了几篇论文。

---

* 1968 年，关于经济规划的油印报告出来了，报告中也给出了最后的计算结果。在第一个实验规划模型完成后，我就没有直接参与这一项目了。其他经济学家和我以前的同事接手了这个项目。

** 我和茹饶·达尼埃尔（当时她叫茹饶·乌伊洛，后来成了我的第二任妻子）一起建立了一个模型，并合写了一篇论文公布了我们的研究成果。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尽管我投身于数学规划的工作没有其他报酬，但仅仅因为这一点，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的一些观察和结论还写进了我的《结构性决策的数理计划》一书中，这本书的第二版还详细论述了国家经济规划模型的编制工作，以及从模型编制获得的经济学教训。*

这样做值得吗？

今天，我应该怎样评估这个耗费了我和我的同事大量时间和劳动的庞大项目？让我逐条对比一下从一开始我对它抱有的期望，以及我的期望之实现程度。这一分析主要涉及国民经济计划模型，但我在下面的叙述也涉及其他探讨数学计划的研究项目。

我的一个期望与我周围的政治环境有关。在上一章的结尾，我描述了我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感受。当时，我始于《过度集中》的实证研究，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如果对《过度集中》的进一步研究会引发（正如通常都会发生的那样）对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的强烈批评，发表这些研究成果就根本不可能了。但是，数学模型的使用似乎可以解决这个困境。党代表和政工干部以及那些监管研究机构、出版社和杂志社的人，都不怎么明白数学语言。他们只要看到稿子中有几个方程，就会打个哆嗦把它放到一边。所以，数学语言本身就是一个保护网，可以躲开政客和协助政客的政治经济监督员（*polgazdosok*）的锐眼。数学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一种政治中立的感觉。实际上，公式、等式和几何形，与对党是否忠诚的确没有关系。因此相对而言，这个研究领域比较宁静。

关于期望实现与否的问题。从来没有人从政治立场的角度反对我使用数学方法从事我的研究。我可以这样说，尽管党代表们在盯着我，但我在课题选择上要高他们一筹。时至今日，我仍然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高兴。

我认为，我在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可以提升我的自学效率，还可以促使我掌握更多的现代经济学知识。我的这个期望现在已经充分达成。

我想，我不仅能够在研究期间进行自学，还能参与教学工作。在这方面，事

---

* 1972年，匈牙利文增订第二版面世，1975年，英文版面世。如果将这些附加内容也看成是国民经济计划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这项任务耗费了我大约10年的时间。

情的发展超过了我的预期。当时，我已经被排除在大学授课队伍之外。正式来讲，我根本没有给学生授课的许可。但是，在指导如此庞大的一个科研团队的过程中（团队的规模已经超出了之前的预想），我完全可以把他们当学生来教。当然，这并不是正式的师生关系，因为我的一些同事与我同龄，甚至比我年长，并且，我也没有被正式委派为他们的领导。但在项目工作范围内，他们所有人都自愿认可我为他们的领导。我确信我向他们传达了很多思想，他们也与我一样，发现经济规划有助于他们探究并掌握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

从严格意义上讲，数学方法在经济学计算和研究中的应用并不只具有“方法论”效应，它还发展成了一种学术活动。在这一极为特别的活动中，我们这群“两级计划人员”形成了一个派别。但是，同时还出现了其他群体，比如“投入产出派”、经济计量学家和运筹学派。实际上，他们常常不单属于哪一个学派。我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我们都远离了 20 世纪 50 年代所谓政治经济学的死胡同，明确而有意地学习和采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成果。我们组织了几次会议，其中一些人还一起组建了匈牙利经济学会的数理经济学分会。*

我已经着重解释过，我特别希望成为西方职业经济学家的一员。在这一方面，事情的发展也远远超出我的预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日渐觉得自己已经汇入了强大的西方思想潮流。就在这个时候，法国、荷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乃至其他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国民经济计划研究所。而且，所有的研究所都开始使用数学模型进行研究。那些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们，也在印度、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国，与当地经济学家一起，建立了计划模型。印度还专门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数理经济学家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匈牙利正在从事的计划建模研究吸引了西方经济学同行的强烈兴趣。这已经不仅仅是对兰格—马林沃德模型和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进行理论比较的问题了。实证工作者还将法国、荷兰和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模型结构、数据收集以及模型应用情况，与匈牙利在国家计划办公室的帮助下所取得的成就，逐一进行比较。我们的研究工作在国外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被视为一项意义重大的学

---

* 那个时候，我已经熟悉了经济计量学会的规章制度，因此我建议每年选举一位新会长，代替原来的常任会长制度。后来事情就这样进行了，但只是在我们这个分会采用。从第一任会长开始，到包括我在内的几任会长，都只有一年的任期。但这种轮换制和选举程序却让我们的顶头上司，即匈牙利经济学会的会长很不高兴。经济学会的会长是终身职位，只要上级政治领导允许，会长位子就可以一个人一直坐下去。几年之后，数理经济学分会也被迫遵循了经济学会的做法。

术成果。

在我将自己的期望与实际成果进行比较之时，有人一定会问，我们所引入的方法是否已经应用于国家的计划工作了。我这里的回答不会那么肯定。一方面，国家计划办公室和各部门已经采用了早期的投入产出计算方法和线性规划技术。他们指示各部门和研究团队采用这些方法，并定期向制定计划的部门上报计算的结果，因此我推测官方会考虑这些结果的。但是，我无法说清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采纳这些结果。*

另一方面，就我从内部观察到的情况看，我的印象是，数学规划方法仍然不见容于按传统方法编制计划的官僚机构。所以，数学规划法并没有真正用于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国家计划办公室和各部门的好几位高层人士，都很赞同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的工作使所有人都有一种确定的印象，即运用数学方法编制的计划非常科学，而且跟上了时代，因为它使用了数学和电子计算机。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所有问题都与我在前面两级计划的理论模型中讨论的六个问题有关。这个理论模型不仅在许多基本问题上与现实大相径庭，而且，模型的运用与实际的社会主义计划的具体做法也不相符合。如果必须以数学模型为基础编制计划，那么，模型必须解决以下问题：

(1) 政府必须坦诚地向社会陈述经济政策的意图，计划一旦过时，政策意图和目标也要随之发生变化。但政客们打算这样做吗？政客们通常喜欢采取含混的态度。他们并不在意自己宣布的各类目标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他们喜欢笼统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们并没有打算用数字形式给出政策目标的相对权重，然后按优先顺序为这些目标排序。也就是说，他们不打算用数量形式给出规划模型中目标函数体现的所有信息。他们之所以不愿意这么做，是因为这些数字会在以后成为问责的依据。

(2) 在我们收集编制国民经济规划的材料并给出初步结果时，我们发现，每个人和每个组织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有所不同。如果我们的计算结果碰巧支持了他们想做的，他们就会欢迎这一结果。如果计算的结果不支持他们想做的，他

---

* 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的工作发生了转向，在以后的10年中，我几乎没有直接参加过编制国家计划。后面的人使用这种方法已经超出了我建议的使用范围。此外，个人电脑的普及和计算能力的提高，也强化了数学规划所能发挥的作用。由于1989年体制改变，中央计划机构也随之解散，所以我们无法对此做出确切的评价。

们就会皱着眉头（理直气壮地）说，这个模型简化了现实，忽视了这儿忽视了那儿，（并再次理直气壮地说）依据的数据也不可靠，等等。

（3）我们常常很难使经济政策决策者和计划人员明白，他们必须将经济目标和经济约束条件区分开来，前者指决策的意图，后者则是制约他们决策的条件。如我在第 1 点中所述，负责经济问题的政客们，不喜欢说明经济增长是否比控制通货膨胀更为重要，或者控制通货膨胀比经济增长更重要。他们更愿意分别确定一个目标。这种做法不会为模型的数理结构带来问题，因为在数学意义上，这些宏观经济目标也可能作为约束条件而发挥作用。但我们无法确定的是，代表经济政策目标的这些随意而且主观的约束条件，是否相互一致，或能否同时实现，又或者它们是否符合反映外部条件的客观条件（比如自然资源、生产能力、劳动供给或者进口限制）。

（4）我们也不能毫无顾虑地对待我们输入计算机的数据，这些数据都是政府计划人员提供给我们的。他们甚至不肯告诉我们，他们做估算时使用了何种计算方法。他们只是在纸上写下了这些数据，而且一有可能就把这些数据藏了起来。因为每个计划人员都将这些数字当成自己拥有的武器，用它来争取稀缺的资源，或者抵制上级为他们制定的过高的目标。

（5）和（6）或许，如果我们使用 21 世纪的电脑，我们才能跟上计划制定的步伐。但在当时，我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们的计算结果出来太慢。相比较于使用严格的方程体系对数据进行计算，观察这些数据并用实证眼光估测这些数据在计划中的平衡情况，显然更加容易一些。

所以，这些难题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社会主义计划的编制过程就像一间厨房，厨房里的厨师并不愿意让陌生人看到他们的厨艺，不能容忍公开性和透明性。数学模型会迫使他们遵守纪律，增加必须增加的东西，删除必须删除的东西。他们无法接受这种做法。

今天我们回首讨论这个问题时，发现自己陷入了前文所述哈耶克的论证思路。将所有的知识和所有的信息都汇集到一个中心或几个附属的分中心的做法，是根本不可能的。知识必须是分散的。那些拥有知识和信息的人，必须能够利用知识和信息（或至少利用大部分）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知识才能充分有效地投入使用。信息的分散化也必须与自由企业制度和私有制相结合。虽然不是每一个信息都能通过分散的方式得到使用，但我们通过分散的方式可以尽可能多地使用信息。

这种观察可以将我们从一个狭窄的问题(即为什么数学计划本身无法嵌入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系的正常运作之中)引向一个更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政治社会经济环境下,为什么中央计划不能有效运行并与时俱进?

说到底,虽然我在制定经济计划的内部机构工作了多年,但我还是不能认同中央计划的思想。相反,多年的工作使我与之更加疏远。1956 年,我毅然抛开了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开始研究“低层”企业和低层政府的企业管理问题。1963—1968 年,我发现官僚行政体系中的奉上运行情况。我更加坚信,无论使用什么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社会主义计划都无法满足社会主义者寄托于它的希望。

结束了有关期望与其实现之比较的讨论,我还想就人们是否相信计划承诺的问题多说几句。很多人之所以受到社会主义的吸引,主要是因为人们相信社会主义能够使计划具有前瞻性和自觉性。让人类智慧而不是自发盲目的市场力量来调节经济,确实是一个绝妙的想法。国民经济计划的成功也证明了对人类理性的信心。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大胆尝试,它将人类对理性的信念和希望转变为现实。

我虽然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我仍然相信,在投资资源的配置过程,以及部门经济长期发展目标的确定过程中,中央计划可以发挥有效且不断进步的作用,尤其是在使用先进方法之时(即数学模型和计算机)。这个希望的破灭使我产生了忧郁感。

不过这个幻灭过程也有知识上的收获。在我与计划人员共处的日子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种情况有点像一名人类学者,他会用几个月时间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一起生活。我之所以认为自己的研究可信,就是因为我是从社会主义体制内部,逐渐认知社会主义体制的。从这个角度看,编制国民经济规划这一任务,对我而言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现在我暂时中断对我个人经历的叙述,转而从现在的立场,即 2004—2005 年的立场来谈谈对计划前景的看法。让人遗憾的是,体制的失败,让人开始怀疑制定计划这一思想。不仅仅是匈牙利国家计划办公室,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及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机构,都被解散了。计划工作者的地位降低了,在前苏联集团以外的国家,制定计划的机构也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实际上,你无需是一名共产党人,也可以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但仍然可以明白国民经济计划存在的可能性。这项研究工作所需要的计算,已经超出了一两个财政年度的计算范围,而且要不断调查研究摆在一个国家面前的各种发展道路。这种

计划编制工作，不需要拿出一个提供给经济行为人的指导文件。只需计算各种不同的发展路径，然后提交给政治家和其他决策者，作为他们思考和讨论时的背景材料之用便足矣。这种计划不是共产党国家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有点类似于拉格纳·弗里施、扬·丁伯根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计划人员设计并推荐的指导性计划（与市场经济相符合）。或许某一天，当人们对共产党体制下旧式计划体系的可怕记忆都消失之后，计划经济的思想或许会再获新生。或许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些昔日的数理计划人员的经验，又能够派上用场。

与数学家的合作

现在还是回到我的个人经历上。1965 年，我和陶马什·利普塔克的论文发表后，我们数次打算继续我们的合作，但不幸的是，我们始终未能如愿。陶马什的精神问题日益严重，并损害了他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在《两级计划》的论文发表之后，他再也没有与我或者其他人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他自己也没有再做过研究。他住在匈牙利时，我想为他提供一些工作（至少是可以让他维持生计的挂名差事），其他一些朋友也有这种想法。他后来去了英格兰。那里的人最初也相信，他能够做一些与其声望相称的研究工作。但后来人们只好安于接受这样的现实，这位曾经聪明睿智的学者，已经失去了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能力，只能依靠英国国家福利维持生计。1998 年陶马什重访布达佩斯，因遭遇车祸而辞世。

在我第一次开始数学建模研究时，显而易见的是，这种任务只能由经济学家和数学家共同完成。我和陶马什分别带来了我们两个学科的不同研究方法，事实也证明，这种做法可以弥补彼此的不足。数学家接受的训练是对现实世界进行最大程度的抽象，经济学家接受的训练是不断回归现实世界。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一个人同时拥有最大程度的抽象能力和最大程度的现实感，但这种情况基本上很难指望。

我与陶马什·利普塔克的合作结束之后，又与其他数学家和接受过数学训练的经济学家有过几次合作，共同研究过课题并合写过几篇文章。与我合作过的学者有：彼得·韦利施、巴林特·德默尔基、贝洛·马尔托什、约根·韦布尔和安德拉什·西蒙诺维茨。在每个合作项目和合作文章中，他们都弥补了我的观点和知识的不足。

后来，我渐渐熟悉了西方经济学研究。我认识到，这种我深以为然的合作方式，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基本没有。一位胸怀大志的经济学家必须掌握数学知识，这样才能为自己的研究提供先进的数学工具。他们的合作都是拥有精湛数学方法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合作。

这种自给自足的方式确实具有多种优势，但我也不想为我的弱项找说辞。我感到抱憾的是，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因此在使用复杂的数学方法时常常缺乏信心。但那些排斥外部合作，“自己动手”解决数学问题的经济学家，也有自身的缺点。他们只能将研究领域局限在自己的数学知识范围之内，在专业数学家眼中，他们的数学知识非常有限。在很多情况下，那些原本专业为数学的学者，比如约翰·冯·诺伊曼和约翰·纳什，都对数理经济学的技术限度做过详述。有些问题的数学意义，真正的数学家可以迎刃而解，但那些精通数学的经济学家却无从把握。

当前，人们对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有过很多讨论。值得考虑的是，在未来广阔的经济学研究中，是否不会再有科尔奈—利普塔克式的经济学家—数学家合作模式的一席之地。

注 释

[1] Kornai and Lipták, 1959.
[2] Kornai and Lipták, 1962b.
[3] Bródy, 1970.
[4] Samuelson, 1983.
[5] Kornai and Lipták, 1962a.
[6] Kornai and Lipták, 1971(1965).
[7] Arrow, 1971.
[8] Malinvaud, 1967.
[9] Arrow, 1973b(1963).

9. 西方之行：1963 年后

1963 年夏，长期埋藏在我心里的愿望和希望终于实现了，我要去英国剑桥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但在成行之前，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

出国之前的事情

1959 年，我的《过度集中》英文版面世，英国《卫报》用整整一版篇幅刊登了世界著名学府——伦敦经济学院（LSE）经济学系主任埃利·德文斯（Ely Devons）教授的评论。实际上，德文斯教授在 1958 年已经向我发出过邀请，请我到伦敦经济学院讲学，并主办一次研讨会。讲学与研讨会是访学期间唯一的工作，其他时间就由我自己支配。

这是我首次获邀去西方学校讲学，这让我非常激动。我马上递交了护照申请，但上级部门在长时间的拖延之后，还是拒绝了我的申请。这以后，我又提交了护照申请，但再次遭到拒绝。

1962 年，我获准可以出国了，虽然只允许前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准去西方，但这毕竟还是一个政治压力减轻的信号。我很感谢轻工行业的朋友，他们让我有机会参加了民主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会议，并在那里发表了演说。这是我首次在国际学术界亮相。

还是在 1962 年，我收到一个邀请，参加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的国际经济学会（IEA）1963 年圆桌会议。大会的主题是“长期增长和长期计划的经济活动分

析”。(当时,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规划和类似的数学技术,被称为“经济活动分析”。)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就是《经济计量学》的编辑埃德蒙·马林沃德。我在前一章就提到过,他读过我和陶马什·利普塔克撰写的论文。当时,他们也邀请了利普塔克,但利普塔克鉴于自己的“犯罪”记录,甚至都没有试过去申请护照。我使用国际经济学会的邀请函而不是伦敦经济学院的邀请函,又一次递交了护照申请,这一次我终于拿到了护照。

英国剑桥

经过五年的漫长等待,限制出国的壁垒终于打破了。我最高兴的是,我的朋友安德拉什·纳吉也在邀请之列。我们一起被经济研究所开除,现在,我们又一起应邀访问英国。

1963 年 7 月我们飞抵伦敦。第二天,我们便前往剑桥。这次会议的地点放在克莱尔学院,我们的住处也安排在那里。我觉得,剑桥大学是渴求知识的年轻人的天堂。我们先是漫步在克莱尔学院宁静而匀称的楼宇之中,接着又造访了其他学院,比如国王学院和三一学院等。此外,我们还欣赏了英国著名的矩形庭院草坪。那以后,我又造访过许多地方,但我依然觉得,有着数不清优美建筑和园林的英国剑桥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也是让我远离了布达佩斯的繁忙而享受和平与宁静的一个地方。

国际经济学会圆桌会议的目的是,汇集某一领域的顶级专家,就某一主题召开特别会议。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发言的学者有:莫里斯·阿莱、苏哈木瓦·查克拉瓦第、罗伯特·多夫曼、特伦斯·戈尔曼、弗兰克·哈恩、列昂尼德·赫维茨、加林·库普曼斯、莱昂内尔·麦肯齐、罗伊·拉德纳以及理查德·斯通。(阿莱、库普曼斯和斯通后来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前,我已经熟读了很多经济学文献,所以我知道大多数与会者的大名,现在我有幸与他们面对面坐在一起。后来我才知道,在座的其他经济学家中,有些人也非常有名。

会议的演讲和讨论水平都非常高,比之在布达佩斯的会议水平高出了不知多少倍。尽管所有人都很友好,但我在每次小组讨论中都非常紧张,我觉得我很

难达到这些人的学术水平。*

当时，我不敢用英语进行学术演讲，我说的是德语，有位翻译帮我进行现场翻译，有时候，库普曼斯和赫维茨也帮我做翻译。在发表演讲之前，我紧张得要死。[1]（在我一生中，每次演讲前我都感到紧张，但是，我非常高兴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尽管登台演说让我很恐惧。）

这次大会的发言涉及很多有意思并富有启发性的主题（会后，全部发言稿都汇集成册，并公开出版）。[2]我在会议中第一次听到了对我前一章提及的埃德蒙·马林沃德模型的详细介绍，人们在会上拿它与我们的两级模型进行比较。

大会期间，我们居住在大学生宿舍。舒适且自带家具的公寓式房间让我想起了匈牙利拥挤的学生宿舍，两相比较，更让我印象深刻。一天早上，加林·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和列昂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到我房间来聊了一会儿，他们问了很多关于我的研究和匈牙利局势的问题。这是我第一次与库普曼斯本人见面聊天，他不仅拿我当朋友，后来还用多种方式帮助我从事研究。库普曼斯为人严肃、不苟言笑，或者说不容易让人亲近。但他开明而且坦诚，为人方正而且善良。他的个性不是表现在热情的言辞上，而是表现在他的思维方式上。他不喜欢自顾自地夸夸其谈，而是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倾听别人的谈话。我跟他初次见面，他就是如此。

在某种意义上，我跟他的这次谈话就像是一次口头测试。我不可能再找到这么好的老师了。通过谈话，我们也有了相互的了解。这次谈话的一方是来自西方的两位学者，一位是生于荷兰的库普曼斯，他师从扬·丁伯根开始了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另一位是生于波兰的赫维茨，他曾经做过奥斯卡·兰格的助手。这两位学者都在美国住过多年，这一次或许是他们俩第一次与来自铁幕之后的某人交谈。这个人的英语虽然不佳，但也还是与他们有着相同的语言。对他们俩来说，这次见面一定很有意思。

那天晚上，我的匈牙利同乡尼古拉斯·卡尔多设家宴款待与会代表。（我在第一章中已经对他做过介绍。）琼·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身穿一袭印度纱丽也来到宴会现场。罗宾逊夫人是 20 世纪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不完全竞

---

* 当我撰写这本传记时，我很高兴地想起，我刚好是国际经济学会的会长。正是这个学会组织了 1963 年的剑桥会议。

争理论的先驱之一，我在阅读文献时已经熟悉了她的名字，* 这位传奇人物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

会议结束之后，我又去了伦敦，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最初邀请我参加大会的德文斯教授带我去拜访学院院长西德尼·凯恩爵士。凯恩爵士衣着非常随意，衬衣的前摆挂在外面，实际上我也常常如是。如果我稍加注意，或者有人提醒我，我就会整理一下，但我现在常常想起西德尼爵士，所以并不会感到窘迫。

我们双方约定，如果不出意外，我将在第二年再访伦敦。

在伦敦经济学院

重返伦敦的计划实现了。1964 年 4 月，我坐火车到了伦敦。因为过于激动，我把手提包遗失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了，而且过了两三个小时才发觉。我赶紧赶回火车站，发现手提包还放在原地没人动过。这次经历使我更相信英国人民了。**

第二天，我到了伦敦经济学院并马上开始授课，课程内容是经济计划与相关数学方法。在我的印象中，这 10 到 15 位研究生听课非常专心，所以即使他们理解有困难，他们还是听懂了我的英语和我想传达的信息。有些学生课后还找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讨论他们在听课过程中产生的疑问。这段时间最有意思的是迈克尔·埃尔曼(Michael Ellman)，当时，他就因为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看法而在学生中崭露头角。后来，他成了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教授，我们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学术关系。

西方的青年研究人员开始从事教学工作时，一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他们

---

* 琼·罗宾逊经常鼓动学术风潮和政治风潮。她晚年成了毛泽东主义热情而虔诚的支持者。1977 年，我们几个匈牙利人在卡尔多家里聚会，其中有我、蒂博尔·西多夫斯基及他的妻子伊莉莎白，还有茹饶等人。我们正在用匈牙利语交谈的时候，琼·罗宾逊不期而至(她经常造访卡尔多家)。我们当时并没有马上转换使用的语言。琼·罗宾逊一言不发地等了一会儿，接着用命令式口吻对我说："科尔奈，跟我走。"她把我拉出了匈牙利人圈子，带我到离那儿不远的她的家里，开始对我大谈中国的事情。她极力想让我相信，中国人已经找到了真正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原因在于(我这里逐字逐句引用琼·罗宾逊的原话)党和国家的公务员都是"自愿为人民服务"，不像苏联那样，做事都有金钱动机。她不愿意听取任何与她意见相左的说法，或者说，听不进任何在东欧的亲身经验。

** 自那以后，我时常丢东西。不过，这只是我的个性而已，并不表示我老之已至。

做学生时，就已亲身体验过大学的教育是如何进行的。但我没有在匈牙利接受过经济学的正规教育，也没在国外做过学生。现在，我却突然跳行，跑到伦敦来教书。我觉得这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不得不自己创造一套教学方法。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参加了很多有意思的学术活动。我去听过伦敦经济学院的老师以及访问学者的讲座，其中一位便是 A. W. 菲利普斯（A. W. Phillips，菲利普斯提出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菲利普斯曲线，也是宏观经济学中经常引用的一种理论结构）。另外两位是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他们讲学时，演讲大厅挤满了听众。在那几个月里，我第一次对西方世界的经济学授课方法有了一些基本的概念。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坦白地说，我也感到了孤独。我年龄太大，没法和学生打成一片。而且，学院里的教师也没有与我成为真正的朋友。这里的原因可能是，教师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伦敦经济学院唯一与我具有真诚交情的人是苏联问题专家阿尔弗雷德·扎乌伯曼教授。他是一位波兰移民。另一位与我有着持久友情的教授，是我访问苏格兰的时候结识的著名的苏联历史与苏联经济专家亚历克·诺夫。他善良，古道热肠，也很有幽默感。后来我们也见过几回，并就一些问题进行过讨论。他对“现行的社会主义”，即苏联和东欧实行的体制，没有多少信心。但他相信“可行的社会主义”，一种更完善而且更理想的社会主义形式，当时我们多数东欧人已经对其不抱幻想了。

当时在伦敦经济学院还有一位匈牙利教师，名叫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他卓越的才智已经引起了伦敦大学的关注。后来，他成了世界著名的科学哲学权威，他的著作也不断被人引用。在布达佩斯的时候，我就对他约略有些了解。尽管我们双方在布达佩斯的时候就认识，而且我们都知道他具有超群的学术能力，但我们也清楚他在政治历史上的坏名声。他可能意识到我多多少少了解他的过去，或者仅仅是觉得我与他志趣不合，我们只见过一到两次面，每次也就几分钟时间。同时，他也没有表现出想与我深交的意思。

幸运的是，伊姆雷·拉卡托斯疏远我的态度不过是个例外。在我无数次造访国外的经历中，我都是旅居海外的匈牙利同行们热切关注的目标。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都给了我很多帮助。仅仅因为我来自匈牙利，就足以让他们团结起来，无私地向我伸出援手。贝洛·鲍洛绍、陶马什·鲍洛格、威廉·费尔纳、雅诺什·豪尔绍尼、尼古拉斯·卡尔多、理查德·匡特、蒂博尔·西多夫斯基和陶马

什·维托里斯对我的友谊，一直让我备感温暖。

我的英国之行，不仅仅让我从学术意义上认识了伦敦经济学院。长久以来，我一直梦想访问伦敦。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最喜欢读的一本书就是《你好，这里是伦敦》。[3]从书本上我已经知道了所有著名的街道和广场，著名的历史建筑和纪念碑。现在，这一切都呈现在了我的面前。

与捷尔吉·彼得和米克洛什·吉迈什一样，在短缺经济中生活了这么多年，伦敦充足的物质供应和富裕而宁静的生活让我深感震动。1963年短时间造访剑桥，让我对英国的生活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现在我已经在伦敦生活了几个月，当然，在我来伦敦之前，我已经从书本上了解了英国生活水平与匈牙利生活水平的差距。但是，书本知识和道听途说是一回事，日常生活中的亲眼所见是另一回事。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在研究工作中真正使用“比较经济”研究方法的开端和标志。我之所以可以从理论和统计学意义上对两种制度进行比较，是因为激发我进行比较以及坚信这一比较的思想后面，是我对两种制度的亲身体验。

间谍和线人对我的相同看法

在我所叙述的这些事情过去40年之后，我有机会看到了一些秘密文件，这使我知道了当年我所不知道的很多事情，即在我的伦敦之行之前，政治警察对我这次行程的诸多考虑。

经济学家陶马什·巴奇考伊是警察的线人。他有一份关于我的情况的亲笔报告[4]：“一个月前我跟雅诺什·科尔奈有过一次谈话，他说他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他无法接受关于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理论，他也不认可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他也不接受国家在经济领域中起领导作用的观点。”

我阅读了几份我所获得的警察局线人关于我的生活情况的报告，我发现他们的报告采用了一种标准格式。负责我的行踪的警察会针对报告给出意见，然后对线人的下一步的行动给出指示。我在这里给大家引用一段警察对报告给出的评论意见。

文件：科尔奈想在秋天去英国访学

意见：这份报告非常有价值。报告显示，科尔奈并没有放弃早前的修正主义立场，如果这一情况属实，那么他去英国将对我们不利，因为（帝国主义

敌人)很可能轻易就会对科尔奈产生影响,甚或可能招安他。

指令:找科尔奈谈话,还是谈科尔奈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陶马什·巴奇考伊的报告装满了整整一个文件夹。* 陶马什报告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他的同事、朋友和亲戚,其中也包括经济学家、文学家和电影人。他还从自己与父亲和妹妹的谈话中获取信息并撰写报告。尽管多年来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但从严格意义上说,陶马什·巴奇考伊不能算我的朋友。

我要提出一个猜测,警察掌握那么多有关我的材料,为什么我还能获准前往英国访学。1962—1963 年政府大赦前是卡达尔政权统治最黑暗、压制最严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政治警察横行肆虐。像我这种人想申请护照,肯定会被拒绝。大赦之后专政机器慢慢放松了管制,政府也想向西方示好,文化和外交政策的考虑要超过政治警察的考虑,因此我得以获准前往西方。但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其实秘密警察仍然在监视我的行动。

我在伦敦的时候碰到了我之前报社的一位同事 R. R. 。我们之间已经保持了 17 年的亲密关系。当时,他是匈牙利一家党报驻伦敦的记者。我们对很多政治问题的看法截然相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朋友。以前我找过他很多次,主要是定期向他筹钱,帮助 1956 年关进监狱的亲友们,直到警察发现了这件事我才停止了筹款活动。

我们在伦敦有过几次长谈,他还开车带我远足一次。我们还一起买了一件非洲雕刻。他热衷于收藏艺术品,对在哪儿可以淘到价廉物美的东西非常在行。

最近,我得到了一份警察局和情报机关对我这段时间的监视报告的副本。我非常吃惊而且恼火地发现,R. R. 竟然也向自己在秘密警察里的上级汇报了我的政治观点以及我们之间的谈话。[5] 报告写得很详细,落款日期是 1965 年。当时,秘密警察要收集我的情况,他们发现,他们有一名常驻伦敦的情报人员,也就是 R. R. ,跟我私交很好。这样,这名情报人员就接到了命令,撰写一份我在伦敦活动的完整报告。他马上接受命令,撰写了这份报告。报告中详细记录了我们之前在伦敦的谈话。

---

* 埃瑞卡·洛齐克(Erika Laczik, 2005)写了一篇文章揭发了陶马什·巴奇考伊的告密者身份。从 1956 年 11 月 29 日到 1961 年 8 月 16 日,他有整整五年时间充当了告密人。埃瑞卡的这篇文章详细讨论了巴奇考伊收集线报的范围,以及被他告密的人员。文章发表后不久,巴奇考伊就公开承认他充当告密者的情况属实。我在后面会转回头来再对此进行讨论,并对我只公开了陶马什·巴奇考伊的名字但隐去其他告密者姓名的原因进行解释。

R. R. 不仅向秘密警察汇报我的活动，还汇报其他人的活动。他有一个正规的代号。他就我的观点撰写的报告还比较准确，既没有任意发挥，也没有夸大（从卡达尔政权的角度）我的反政府立场，他跟上级汇报的内容也就是朋友之间亲密谈话中我说的话。

我从报告中摘录一段：科尔奈“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共产党人……他不想再涉足政治……他请求我帮帮帕尔·勒切伊的妻子……他不赞同党的经济政策……他认为这些政策既不科学，也不可信”。

我是否不应该对 R. R. 以诚相待？如果连朋友都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或者说，我太天真了，从来没有考虑过友谊难敌对党的忠诚？尽管我们的政见不同，但我一直认为我们是朋友。不过，他并不是这样看我的，他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1953—1954 年前，我们曾经是很要好的朋友。在那之后，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我们的友谊也就此终结。”

读完了全部文件，我确切地知道了 R. R. 是谁。其他那些线人、叛徒和秘密情报人员，我都知道他们是谁。我在后面提到他们时，使用的是随手挑选的两个字母（不是他们名字的首字母）。很显然，读者会想知道，如果我知道他们是谁，为什么不将他们的姓名公之于世。

在我撰写这本传记时，匈牙利法律已有规定，公民有权知道谁背叛了他们，谁写报告告发了他们。* 但公民不能将这些信息资料公布出来。

东欧共产党下台后，东欧各国就如何处理前秘密机关的档案记录产生了激烈争论。许多人都支持德国采用的过激方法，将前国家安全部（Staatssicherheitsdienst）的档案记录向全民公开。匈牙利也有很多人支持这种做法，那些受命处理这些事务的政府官员却反对这种做法。在公开争论中，也有人从法律、安全和道德方面考虑，提出反对意见。党派政治利益方面的考虑，或许也产生了一些影响。虽然这件事情或许对某些党派的政治人物没有什么影响，但他们也担心，他们这派中如果有人曾经做过间谍和线人，公布档案就会对党派的声誉造成影响。社会大众一再对是否应该修订法律，是否应该公示情报人员、线人和间谍以及这个秘密组织的其他成员的姓名而大起争论。2005 年 2 月初，也就是我完成这部传记的时候，关于是否可以公开或能否公开这些线人及其上司以及受他们迫害和监视者的档案，再度引起争论。在我将手稿交给匈牙利出版商的时候，

---

* 公民的这项权利能否实现是另一回事，因为人们通常不大可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仍然没有定论。

我曾经问过我自己，如果匈牙利法律并不禁止公布这些信息，我是否会将这些人的名字公布出来。我在这里并不想借用法律条款来回避问题。我想直接面对这个道德与情感的两难选择问题。

因为传记中有很多地方都涉及这个问题，所以我不得不反复思考。我所面对的情况各不相同。有些告密者跟我没有太深的关系，他们可能是用某种方式在帮助那些为秘密机关工作的朋友或熟人，我对他们并不熟悉。但在告密者中，也有 5—10 位曾经是我的好朋友。我现在还能想起来，我们有过 15 年或更长时间的友谊，我们在一起讨论过工作、公共生活、家庭以及孩子。昔日的这些朋友怎么会背叛我呢？他们怎么会参与这种让人憎恶的交易呢？他们是否也会对其他朋友采用同样的手段？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在西方世界尤其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脑子里早就嵌入了一个重要概念——正当法律程序，即享有公正且诚实的法律程序的权利。所有受到怀疑和指控的人，都应该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如果他们认为针对他们的怀疑或指控有误，他们应该拥有反驳这些怀疑或指控的机会。如果他们有些情有可原的具体情况，他们也应该有机会说出这些情况。无论被怀疑或被指控的人是否承认，提出怀疑与指控之人都应该证明自己的指控。如果他们知道任何可以加重或减轻指控的情况，他们也应该让大家了解这些情况。法院要对证词进行听证，一旦做出判决，被告也有上诉的权利。但三四十年后，谁能实施这种正当法律程序呢？有些被怀疑是叛徒的人都已经过世了。

然而，这些都不是我最终决定隐去告密者姓名的最重要原因。我并没有权利对他们进行道德评判，或许这些人只是迫于压力才干出了这种损人的勾当，而他们承受的压力可能也是常人难以承受的。

我并不是在不做调查的情况下便宣告他们无罪，或者不经调查就说这些线人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是在恐怖的压制条件下被迫扮演了这种角色。尽管首先需要指责的是这一体制，但这并没有改变我的信念，即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些人在压力面前敢于说“不”，而有些人则根本不是秘密警察接触的对象，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些人不值得相信。但我仍然不想采用截然相反的观点对他们一概而论。我不想在未经审视的情况下指责一名线人的罪行，因为我不能对双方的证词进行评判。

我没有做出评判，甚至从来也没有产生过报复的想法。如果我公开了线人

的名字，这本身就是一种惩罚。我无权惩罚 R. R. 或者其他人，而且，这种惩罚也会间接涉及他们的家人。

这本传记的初稿中并没有出现陶马什·巴奇考伊(Tamás Bácskai)的名字，当时我用的是两个首字母。但在本传记的修改过程中，新闻媒体上出现了他的名字，而且有文章提到，我也属于他告发的人之一。巴奇考伊自己承认这种指控属实，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隐瞒他的姓名了。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报纸上揭发告密者的文章日渐增多，我在这里并不想基于法律或道德对这种做法进行评价。我只是想表明，我本人并不打算参加这个揭发活动。我已经反复思考过刚才提及的原则，所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愿意坚持我的原则。但我确信，对那个已被揭发的告密者来说，因为他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所以我在传记中写出他的名字，并不算违反原则。

绕了这么个圈子之后，我们再回到关于这份报告的主线上来，并对这份报告进行分析。

在我翻阅那段时期的文件时，我又发现了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情。其中一件事情与我直接相关，就是我申请出国旅行，遭到拒绝，后来又获得批准，然后我出国访学并最终回到布达佩斯。在这期间，我一直担心当局下一次不再批准我出国。另一件事我则毫不知情。这就是不断有关于我的报告，关于我的言论的评价。用奥威尔的说法，他们在分析我所犯下的“思想罪”。

当秘密政治警察和国内告密者及情报机关组成的网络(他们在关系紧密的同一部门中工作)决定放松对我的出国限制时，他们开始考虑对我进行招安。在我第一次访问伦敦之后，当时驻伦敦使馆的一名官员，也是秘密情报部门的 X. X.，便向他的上级提交了一份报告。我记得很清楚，X. X. 绝对是一名待人友善的谦谦君子。我当时太天真了，从来没有怀疑他是匈牙利情报机关驻伦敦的一名成员。[6]我还记得，当时他带我去了一家纺织品商店，我在那里用非常优惠的价格买到了考究的英国粗花呢。*

X. X. 的提议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重视，他们对我以及我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审查。下面我引用一段 1964 年 3 月 26 日的文件，上面对这一决定做了记录：

---

* 1963 年我第一次访问伦敦的时候，他对我似乎很友好，所以我在 1964 年第二次访问伦敦之前，从布达佩斯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准备再来伦敦一次，而且准备拿出一点时间学习英语。所以我请他帮我推荐比较好点的语言课程。后来，我在特工 X. X. 的档案中看到了这封代表友谊的私人信件时大吃一惊。他把我的这封信附在报告中交了上去。

“根据 X. X. 同志稍早前的建议，我们（对雅诺什·科尔奈）进行了可用性评估。然而，评估的结果表明，他不适合加入我们的组织。鉴于过去十年来他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摇摆性，我们不会在他出国之前，用外交部的名义或我们自己的名义，向他做什么指示……他出国之后，X. X. 同志可以根据他的表现暗中利用他，但也只能在与使馆有关的法律活动范围内利用他。”[7]

这里还必须对文中的“指示”和“暗中利用”的含义做一些解释，因为这都属于匈牙利情报机关的行话。

对于那些忠于当时的政权且又可以用于收集政治情报的人，如果到西方旅行，那么，在起程之前就会收到“指示”。接受指示的地点可能是工作单位的个人办公室，也可能是被叫到外交部或警察局。指示的内容可能是他在国外应该如何行动，与谁联系，与谁保持距离，以及需要收集的信息，等等。当局也会表示说，他们希望出国旅行者就自己在国外的经历写一份详细的报告。下达这一指示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已经被正式吸纳进组织了。这只是与他们建立一种联系，期望能在未来强化这种联系的可能性也并不确定。政治警察和情报机关只会冒险与那些他们确信对党忠诚的人，建立这种松散的联系。如果这些人到了西方，然后暴露出有人曾对他们做过这种“指示”，对匈牙利警方来说就很尴尬了。在我这件事情上，秘密警察从我的言行和线人的报告中了解到，他们不仅要克制自己正式拉我入伙的想法，而且根本不信任我，也不会给我做什么“指示”。我与共产党背道而驰的想法，让我没能进入他们的招收行列。

为了对情报机关的其他术语进行解释，我引用了雅诺什·凯奈迪编撰的术语表。“暗中收集”情报是指：“线人和情报人员从谈话中收集有价值的数据或信息，而参与谈话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她正在与敌方交谈，正在把对敌方来说非常重要的信息透露给对方。他/她并不知道敌方暗中的打算。谈话则由线人或情报人员精心设计并做了准备。”[8]从这一角度看，X. X. 与我一起前往摄政街的纺织品商店，跟我天上地下无所不谈，实际是想从我这里搞点对他的上级而言非常重要的情报。可以肯定的是，就算我对他的特工身份丝毫没有产生怀疑，他们也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现在我们再看看那个时期的另一份文件。在我收到更多邀请，不断提出出国旅行申请时，其中一份申请再次落到了政治警察的手中。写报告的人对我的活动非常了解，文件的用语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不管这个报告人是秘密警察的工作人员，还是外部专家，都说明评价我工作的人是一名经济学同行。他或她评

价说:“科尔奈在电子计算机的经济学应用(数学规划)上,确实是国内的领军人物。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基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他引入国内的理论对西方而言都不新鲜。因此,他在国内所做的工作不能保证他会不断地收到西方的邀请。科尔奈也不能给西方经济学界带去什么新东西。”[9]

对我海外访学和海外作品的看法

专家同行给秘密警察的报告中,有一条信息确实没有说错,就是我确实不断地收到西方的邀请。他或她的另一说法也没有错,即西方学术界并不想从我这里学到把电子计算机运用于经济学的好处。他们的电子计算机的性能比我们这台苏制乌拉尔计算机超前二三十年。而且,说我从西方著作中学到了将线性规划应用于经济领域,而不是西方向我学习了这种方法也是对的。然而,因为他们希望亲眼看到我并聆听我的讲演,所以,我似乎能为西方的听众带去一些新鲜的东西。

由于我不断收到国外的邀请,所以我不仅成为了秘密警察关注的焦点,也成为经济学家议论的人物。在布达佩斯,背后议人是非而且到处传播是件很平常的事情。所以我很清楚,那些琢磨我获得邀请的人认为,科尔奈这人比较“精”,他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并设法认识了一些能邀请他出国的人。

我对这些挖苦倒也无所谓,尤其是在 1963 年和 1964 年我出国访问之后,一系列邀请接踵而至。邀请我讲学的国家越来越多,我出国访学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有规律。我并不想泛泛地讨论每位研究人员出国访学的背景,因为我不想研究其他出国访学人员的经历,我只是在记录自己出国访学的情况。

每次国外的邀请都是出于对我的研究工作的欣赏。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1963 年我应邀出席剑桥大学的学术会议,是因为我在《经济计量学》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被大会的法方组织者马林沃德教授看到了,而且他对文章的印象非常好。我应邀造访伦敦经济学院,是因为系主任德文斯欣赏我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1966 年,我应邀参加经济计量学会的罗马会议,是因为学会计划部的负责人库普曼斯在剑桥认识了我,而且认为我在这个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后来,我又参加了在威尼斯举行的研讨会。在那里,我遇见了来自东西方的许多

经济学家。主办方之所以邀请我，则是因为他们非常关注我的《过度集中》。*

我当然还可以继续叙述邀请我访学的原因，但实在没什么必要。我去过很多国家，但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人为我安排过邀请。我总是忠告年轻的同事，必须在杂志上发表能引起国际关注的文章。这种努力最终都能得到丰厚的回报，引发学术界对其研究工作的关注。但只有部分人听从我的忠告，有的人则不以为然。

现代社会中，人们经常讨论人际关系在政界、商界、文化学术界以及科研领域中的重要性。有的人甚至将建立“关系网”当成生活中的首要策略。他们认为，建立一种关系广泛且有用的人脉网络，本身就标志着人生的成功。我在这里并不想讨论什么是正确的人生策略，或者对他们这种利己策略和道德观进行评价。对我来说，建立一种人际关系从来就不是一种真正的成就，它只是我的研究、教学和讲学活动的副产品而已。我与他人建立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他们对我的文章和著作以及讲座的反应而形成的。有的关系也就是学术同行或师生关系，有的关系则发展为朋友关系。我的“关系网”规模日渐扩大，已经不止于数百股线，而是数千股线了。最初的关系产生出第二个关系，一段时间之后，熟人和名气又通过自生过程创造出新的联系。我想强调说明的是，从我的情况看，最初人际关系的起源和形成首先是我的学术成就。

还是回到海外访学这一议题上，这样才与本章切题。我保证，我不会拉出一个行程单或者写一些游记来增加读者的负担。（我在这个方面没什么天赋，我从国外旅行回来后，不太会给家人或朋友声情并茂地讲述国外的事情。）我只想对我所有的海外旅行做个评论，谈谈我在国外旅行和出席活动时，为自己定的一些规矩，当然，也包括与这些活动紧密相关的出版活动。

自 1963—1964 年我首次获得机会出国访学之后，一般而言我的出国申请都获得了上级的批准。西方读者和年轻人或许不会认识到，在那个年代，匈牙利人即使拥有一本有效护照，也不能保证就可以出国。每次出国，你都需要有一个“窗口”，即允许出境的公章。要想有这样一个窗口，你每次都需要提出具体的申

---

* 起初，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有两个科尔奈。对于苏联和东欧问题专家、苏联政策研究专家和比较经济学来说，科尔奈是《过度集中》的作者。对数理经济学家来说，我是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的作者之一。在那个时期，除了个别人之外，一般的苏联政策研究专家不会去看《经济计量学》杂志，而理论经济学家也不会在研究理论的同时，阅读关于共产党国家经济的文献。现在，这两个阵营都给我发来了邀请，人们很花了一段时间才将两个方向的印象汇合到我一个人身上。

请，这个申请必须由工作单位的上级、人事部门的官员以及党委书记签字。就算签字者不故意为难你，这也是一个有辱尊严的过程。就算我每次都拿到了上级的批准，我也仍然担心有一天会遭到拒绝。*

社会体制的改变让人有了一种解放的感觉，因为体制的改变结束了这一有辱尊严的过程，每个人都获得了出国旅行的权利。

获得官方许可海外旅行回来之后，还必须向他们的上级递交一份报告。我最初从西方国家旅行回国后，都要完成这一规定的义务，尽管这一类报告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繁文缛节。但是，随着我在匈牙利的学术名望的增长，我就停止了撰写这种报告。开始他们还提醒了我一两次，后来也就对我不写报告一事习以为常了。我之所以拒绝写报告，并不是为了防止情报机关从中收集情报，只是不想做这些我觉得有损尊严的差事。

我一般是在主办方提供所有的费用之后，才接受国外的邀请。** 当时，无论我受雇于哪家机构，资金最终都来源于匈牙利政府，我的这一决定的动机并不是因为我是匈牙利公民就要为国家节约资金。我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匈牙利的所有研究机构用于学术出访的资金非常有限，所以必然导致人们为争取这笔资金而相互争斗。从人性的角度看，人们都想有个出国的机会，对此我非常理解，但我不想陷入这种争斗，所以才有上述决定。

我力图避免出现两张面孔，即在匈牙利（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一副面孔，而在西方国家是另一副面孔。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因为西方国家那种自由的氛围，会使人坦诚地说出心里话。但在匈牙利那种充斥着威胁、告发、告密者和审查及指控的氛围中，人们会觉得压抑而不讲真话。我是从自卫的角度为自己制定了这条规则，因为我知道，我在西方发表讲话时，匈牙利秘密警察的线人就可能坐在台下的听众席上。（我的这个想法没有错。最近我看到的秘密文件显示，1985 年我在纽约演讲时，就有秘密警察的线人就此写过报告。后面的章节我将更详细地谈谈这件事情。）但除了这种自卫的原因外，两面派的行为也会让

---

* 1970 年，我应邀前往保加利亚，参加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组织的一次国际会议。当时没有马上拿到批准出国的文件时我那种焦急不安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我在最后一刻，也就是飞机离港之前几个小时，才拿到盖了章的护照。

** 例外的情况也有。例外是指我不是受国外邀请以私人身份出国，而是由匈牙利政府的官方机构派送出国。比如说，苏联和匈牙利的科学院有个协议，双方可以各派代表团去对方国家，费用由官方资助。有些苏联同行非常想跟我见面，但是又不能直接向我发邀请函，他们就会说服苏联科学院，由他们建议匈牙利科学院邀我访问苏联。

我的良心受到谴责。在发表演说和撰写文章时，这种冷静的自我保护和两面派面孔之间的界线，时常模糊不清。如果我逐渐习惯了在国内用这种方式说话和写作，在国外用另一种方式谈话和写作，走到哪里才是个头？

比之公众场合，我在私人场合尤其在亲密的朋友中间会让自己更放松些。（我在东方和西方都是这样。）但是，我不会允许自己在东欧发表的演讲或文章与在西欧和美国发表的演讲和文章的观点，有任何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要符合自己用一副面孔面对世界的决定，我所有的文章都刻意用英文和匈牙利文出了两个版本（或者其他西方语言）。我所有的重要文章都不是专门针对铁幕下的东方一个版本，针对西方一个版本。

我在这个地方简单、客观并不加修饰地总结的这一决定，是我在 1964—1989 年期间最困扰我的问题之一。社会体制的变化搬掉了压在我心头的沉重负担。

一次失策的“诽谤”

还有一件事情也可以放在这一章里，就是我经常谈及的情报机构的种种活动。行文至此，我手头恰好有一封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迈克尔·蒙蒂亚斯（John Michad Montias）于 1964 年 10 月 14 日来信的复印件。当时，他想来匈牙利进行学术访问，希望我能就他的研究给点建议。他还提到说，他已经开始学习匈牙利语了。

这封信的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我最初是通过蒙蒂亚斯的著作知道他的，后来在 1963 年，我们在布达佩斯见过一面，当时他正在这里参加一个数理经济学会议。蒙蒂亚斯当时吸引了所有与会者的注意，因为他主动担任了将列昂尼德·康托罗维奇的发言从俄语翻译成英语的同声传译工作。随后，他还为主客双方的学术争论做了翻译。很显然，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而且很有语言天赋。1965 年，我们在威尼斯又见过一次，那次与会的东西方经济学家都是研究苏联和东欧的专家。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蒙蒂亚斯给我的这封信。我并不是在自己收藏的信件中找到这封信的，而是在秘密机关的档案中看到这封信的。[10] 一位美国教授给我的私人信件，在匈牙利被拆开后又复印了，然后再封好，又通过匈牙利邮政局交到了我的手中。每个人都会猜测，这种事情是不是常常发生，但在我拿到这

个第一手证据后，还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当时，我只是看到了“蒙蒂亚斯案”的冰山一角，现在我可以根据警察的记录，将这件事情完整地告诉大家了。

在研究苏联问题的美国专家中，蒙蒂亚斯算得上一位杰出人物。他的多数同事只懂得苏联多种地方口语中的一种，蒙蒂亚斯却可以说好几种，能够阅读的语言就更多了。在那个时期，虽然多数苏联问题专家都是老资格的经济学家，而且非常了解苏联或某一具体东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但他们在用正规的数学语言所表达的现代经济理论方面并不擅长。相反，蒙蒂亚斯属于掌握了这一现代工具的新一代经济学家。（他曾经与本传记中多次提及的伟大的数理经济学家库普曼斯合作发表论文。）[11]

我很高兴能为蒙蒂亚斯的布达佩斯之行提供帮助。我就他的论文选题提了一些建议，还告诉他，要把他介绍给我的匈牙利同行们。我们有过数次通信交流。在蒙蒂亚斯提交的正式申请中，他描述了他的科研项目，以及该项目与匈牙利的关系。在申请书的相关部分出现了我的名字。[12]

表面上，所有事情都根据国际科学研究的惯例在往前推进。蒙蒂亚斯和他的匈牙利同事们也在为这次访问做准备。但在暗地里，秘密警察也在全力以赴地工作。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机关最早给出了警告：我们有理由相信，蒙蒂亚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 我想，反间谍部门的官员一定认为，他们正在捕捉大鱼！

随着访问日期的临近，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了这个案子。他们对蒙蒂亚斯申请表上出现的匈牙利学者，逐一进行清查，收集这些学者的“材料”。现在公布的档案中也出现了其他人的名字，但我只是想从档案中找出当年针对我所采取的行动。

我拿到了 1956—1959 年期间Ⅲ/Ⅲ的各部门关于我的文件，也得到了关于我 1963 年和 1964 年访问英国的报告。当时，秘密警察队长 Z. Z. 将所有这些针对我的报告都整理了一遍，并撰写了一份总结报告。[13]

---

* 最近获得的几份文件显示，共产党国家的秘密机关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1963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安全局采取了一项行动，秘密搜查了蒙蒂亚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住宅，然而在他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姓名和住宅地址，包括电话号码。他们将这个信息通知了匈牙利的国家安全局。（IH 1656. 2/2-2358，p. 3. 日期：1964 年 5 月 8 日。另一张是 IH 34-4-797/1965，p. 4. 日期：1965 年 4 月 23 日。）

我在研究秘密机关的这些手写文件时，发现了始于 1963 年的电话窃听记录。与我有过电话交往的每个人的名字都列在一张单子上，但其中并没有他们感兴趣的内容。这份名单上有我在布达佩斯的朋友，还有亲戚和经济学同行，其中包括埃利·德文斯和加林·库普曼斯等外国经济学家。我这里引用一份他们抄写的内容："黑尔加？奥尔加？付钱给科尔奈。"当时的秘密警察在抄写这段话时，使用了一句匈牙利的俚语，比如，一名男子因妓女的服务而付费时就会说这句话。这就太让人怀疑了，居然有女人给科尔奈付费……。事实是，我有一位朋友叫埃尔加，我们认识很久了。暑假的时候，我借了一笔钱给他。当时我们正在电话里讨论她如何还这笔钱。如果读者只是觉得这个黑色故事有些搞笑，肯定只是笑话这些警察的愚蠢。[14]

在 Z. Z. 队长的报告上，有几句他的上级手写的评语，评语中建议他不要用我做"卧底"。[15]我请教过专家"卧底"(throwing under)的含义。秘密组织必须找到一个人，用他们的话来说，这个人必须听话可靠，还能获得被监视人的信任。这种人就可以在被监视人那里"卧底"，为秘密组织提供有用的情报。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谈一下明面上的事情。匈牙利的文化关系机构接受了蒙蒂亚斯的申请，并且给他发了签证。这样，蒙蒂亚斯过来了，并且会见了几位匈牙利经济学家，还与他们讨论了一些问题。蒙蒂亚斯也开始了匈牙利语的学习。我为他推荐了我的一位朋友考蒂·豪纳克(Kati Hamák)做他的匈牙利语教师，考蒂也同意了。蒙蒂亚斯的语言学习进步很快。蒙蒂亚斯与其他外国访问学者一样，有时候与妻子去听歌剧，有时候与匈牙利同事外出用餐。我们有时候也会请他们吃饭喝酒。

我从秘密警察的文件中清楚地看出，他一直处于警察监视之下。他的电话被监听，他外出被跟踪。我读过监视者的报告，这些报告中绝对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我只能再次重复我刚才说过的话，如果读者看不到这些调查后面隐藏的可怕的力量，你就可能只是嘲笑这些报告而已。我没有读过什么间谍小说，或许在间谍行当中有什么规矩或传统。也就是说，被监视者的真实姓名是不能出现的，哪怕在内部报告中也是如此。比如我们家住在普斯陶塞里路，所以报告上用"普斯陶先生和太太"指代科尔奈和洛琪(我妻子)。豪纳克过去住在高劳什街，所以在内部报告中，他们就成了"高劳什先生和太太"。[16]蒙蒂亚斯肯定也不会以蒙蒂亚斯的名字出现在内部报告中，他们叫他"Zimelio"(街头跟踪人员的报告中，他被称为"Master"，换了个说法)。

调查计划逐渐显出轮廓。蒙蒂亚斯被指控滥用访问学者身份，收集关于匈牙利经济和经互会的情报。凡是与蒙蒂亚斯有过接触的匈牙利经济学家，都因此受到审问。

我也受到了审问。我最近又重新阅读了这份报告。我发现，没有一个证人对蒙蒂亚斯提出指控，也没有一个人证明蒙蒂亚斯曾经收集过情报。[17]

不久，蒙蒂亚斯被驱逐出境，而且是立即执行。有一份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解释了蒙蒂亚斯被驱逐出境的原因。[18]他被指控收集秘密情报，并且从事间谍活动。然而，他们没有任何事实、证词或证据支持这一指控。他们甚至没有打算对间谍案进行公审。

这次事件在很多方面都很引人关注。它表明了我在本传记中多次讨论过（还将进一步讨论）的一个问题：学术界并不享受特权，也不受保护。政府的触角已经深入到了内部，对学术领域实施监视和恐吓。

虽然从拉科西政权到卡达尔政权都持续了这种统治方式，但也出现了一些根本性变化。如果是在旧国家安全局时代，这件事情涉及的所有人都会被抓，包括美国教授和他的匈牙利朋友，而且会遭到严刑逼供，直到他们在法庭上供认自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为止。即使在当时，即 1965 年，这些审讯仍然让匈牙利的这些证人感到紧张和不安。但我们还是有机会驳斥这些不实指控。*

与蒙蒂亚斯案发生的同时，匈牙利政治领域中出现了两股对立的政治趋势。其中，“温和派”或称改革派想与西方建立友好关系，尤其希望能与西方的文化界和科学界进行友好交往。“强硬派”或称反改革派则抓住每一个机会破坏东西方关系。对于强硬派来说，抓出一个美国间谍肯定可以为自己的主张派上用场。但他们的计划最终未能得逞。

这里还要为这次事件再补充两个后续故事。

一是这次事件之后，我与约翰·迈克尔·蒙蒂亚斯教授的关系如何继续发展的事。1970 年，我去耶鲁大学做了 6 个月的访问学者。我跟迈克尔又见面了，

---

* 我在上一章提到过，1956 年之后，我决定要成为西方经济学专业队伍的一员。我当然对其中的风险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那个时代，仅仅是“具有西方关系”这一条就足以引发人们对你的怀疑。清清白白的学术交流也会被认定为“间谍”，而受到莫须有的犯罪指控。这种噩梦常常缠绕在我们心头，直至共产党下台后才得以摆脱。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主义不可能再卷土重来，但在当时，没有人能事先肯定地说，这种卷土重来的意图必然会失败。

而且交谈甚欢。不过，我们没有谈及他被驱逐的事。他觉得最好不要翻出这件事情来说道（很对），因为他意识到，我还会返回匈牙利。后来，我每次访问耶鲁大学都要跟他见面，我还在他负责的研究所发表过演说。1976 年，他出版了一本著作，内容是比较体制理论。我专门写了一篇书评，高度评价了书中的理论。[19] 我这样写不仅仅因为我认为这是一本好书，而且我想做一个声明：我认为蒙蒂亚斯就是一名学者。蒙蒂亚斯本人是《比较经济学杂志》创办者之一，这本杂志现在已经成为比较经济体制研究方面的权威杂志。杂志经常刊登东方集团国家的经济学家的文章，我自己就几次在上面发表过文章。

20 世纪 70 年代，蒙蒂亚斯本想再次访问匈牙利，但匈牙利当局不给他签发入境签证。[20] 直到 1989 年之后，他的名字才从政府的不受欢迎者名单中删去。[21]

很不幸，蒙蒂亚斯在匈牙利的这次历险为他的“苏联研究”的热情泼了一头冷水。这确实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他此后慢慢转向艺术史研究。他关于 17 世纪荷兰绘画的著作广获好评，被艺术史学家公认为这一领域中的经典。[22]

现在我不得不用一个悲痛的消息来结束这一故事：迈克尔已于 2005 年辞世。

另一个后续故事则与我自己在布达佩斯的经历有关。1998 年，我第一次请求查看“蒙蒂亚斯案”的卷宗。虽然获得了批准，但也对我有很多限制。当时，当局不让我复制这些文件，而且在我阅读文件的时候，还必须有一名工作人员在场。或许这名工作人员被告知必须看住我的一举一动，以防止我偷偷带走一些文件。他这人其实为人不错，在我看完手边的材料之后，他会找点由头与我聊天，说一些诸如“哦，是的，你看我们从来就没有抓住过他”之类的话。我在这里无法完整地转述他的原话，因为我并没有录下他的聊天内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谈话的时候完全将自己等同于负责某件案子的反间谍人员了。他说话时使用了第一人称的复数，语调中还有些遗憾，听起来真的让人啼笑皆非。过去的行为方式诡异地延续下来。

注 释

[1] Kornai, 1967b.

[2] Malinvaud and Bacharach, 1967.

[3] Juhász, 1934.

[4] ÁBTL M 13417/1. 关于我的报告和相关评价在这个文件的第 35 页。这份报告表明，情报人员在 1960 年 6 月 10 日与我谈话。这本厚厚的卷宗还包含其他内容，也收录了关于我的报告。关于我的部分，建档时间可以追溯到 1957 年 6 月 25 日。

[5] 秘密警察指令 R. R. 对我进行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的命令，参见 IH IV/1-A 号档案，建档日期显示为 1964 年 4 月 15 日。R. R. 关于我的汇报编号是 35-634/65 和 2/B-530，建档日期显示为 1965 年 5 月 4 日。

这里我应该强调的是，我在附注中引用的文件编号都来源于匈牙利情报局(IH)为我提供的文件复本。我猜测原件是从情报局合法前身的档案中抽出来的，而原件的编号仅供内部使用。我无从查考这些编号。情报局为我提供的所有文件以及后面的注释中引用的此类文件都属于这种情况。

[6] IH 134-216/64. X. X. 关于我的报告，日期是 1964 年 3 月 2 日。

[7] IH VI/4-A. 日期：1964 年 3 月 26 日。

[8] Kenedi, 1996, p. 438. 凯奈迪在脚注中说明他的术语表基于保密的《国家安全术语词典》(*Állambiztonsági Értelmező Szótár*)。内务部于 1980 年出版了这部词典，凯奈迪在自己的术语表中补充了从其他来源中搜集到的词汇。

[9] 1966 年我申请护照时他们写了第一份专业评价。另一份文件也提到这份评价，我从文件中引用了上述段落。后面一份文件是 IH 40-27-245/64, 213-3019，日期是 1964 年 7 月 12 日。

[10] 这份复印件上勉强可以辨认出编号：IH Ⅲ/Ⅰ-1-A. 8153。

[11] Koopmans and Montias, 1971.

[12] 蒙蒂亚斯申请表上的 IH 编号已经找不到了。情报局提供的蒙蒂亚斯案相关文件复本的第 18—22 页上有这份申请表。

[13] IH 34-4-797/1965. 日期：1965 年 4 月 23 日。

[14] Z. Z. 队长的报告。IH 34-A-1027/1965. 日期：1965 年 5 月 26 日。

[15] IH 34-4-797/1965. 日期：1965 年 4 月 23 日。第 1 页上有手写的序号。

[16] IH 59/2581-4/1965. 日期：1965 年 11 月 22 日。

[17] IH 189-193/66. 日期：1966 年 5 月 18 日。IH 189-191/66. 日期：1966 年 5 月 18 日。IH 189-220/66. 日期：1966 年 6 月 6 日。

[18] Bolygó, 1966.

[19] Montias, 1976; Kornai, 1978.

[20] ÁBTL 0004-470-5-MRG, p. 24. 日期：1971 年 4 月 1 日。

[21] ÁBTL 0004-470-5-MRG, p. 47. 日期：1989 年 1 月 29 日。

[22] Montias, 1982, 1989, 2002.

10. 反主流经济学思想：1967—1970 年
《反均衡论》

在我将自己的一半精力用于数理规划的计算工作的同时，我的另一半精力已经放在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项目上：这就是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批判，尤其是对一般均衡理论的批判。这项研究的成果就是我的专著《反均衡论》。

《反均衡论》的出版过程

1967 年我完成了这本著作的简本的初稿，[1] 书的副标题为“论经济机制理论与研究者的任务”。* 与往常一样，我将这篇“论文”（下文我用“论文”指该书）译成了英文。[2]

当时，肯尼思·J. 阿罗向我发出邀请，请我到他所在的斯坦福大学研究所访问几个月。阿罗于 1970 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学术界公认他是数理经济理论方面的领军人物。我去斯坦福大学时，带上了这篇“论文”，我想在斯坦福继

---

* 在我开始撰写这部书稿时，有段时间因为集中注意力，所以养成了“闭关”的习惯。我不喜欢在舒适的家中或研究所办公室内写作，我宁愿收拾行李，躲到家人和同事以及任何人都找不到的度假胜地或者旅店中干活。我一般会在一两周内埋头写作，其间除了与女服务员和清洁女工说几句话外，基本不与人交谈。一直要到我的手腕因为不停地打字痛得不能动了，才会被迫离开打字机一会儿（后来是因为电脑的键盘）。这一习惯成了一种癖好：每当我撰写一篇重要的论文或著作时，如果没能身处这样的环境，我就觉得少了什么东西似的。《反均衡论》的第一稿是在希欧福克开始的，后来在维谢格拉德进行后续工作，终稿完成于我最为心仪的地方，匈牙利科学院在马特劳哈扎的度假村。

我非常感谢这些地方，感谢那里友善的服务员们，他们为我专注于写作提供了一个宁静的天堂。

续修改“论文”。当时，我觉得这种情况多少有些尴尬，因为这本书集中批评的理论，就是由阿罗和法裔美国经济学家热拉尔·德布鲁(Gérard Debreu)以现代形式提出的理论。我无法跟阿罗说我手边有这么一篇文章。后来，我给几位同事看过这篇手稿，阿罗听说后，请我让他看看手稿，他读得非常仔细。(阿罗能够迅速抓住文章的主题思想并提出学术意见，他语速极快，旁人很难跟得上，加之他的想法超前，一般人很难抓住他的思路。)在所有人都毫不犹豫地接受他的理论的情况下，阿罗并没有因我的文章而生气，反而满腔热情地欢迎这一学术挑战。我们从头至尾，对手稿进行过好几次讨论。阿罗欣赏我在准确理解阿罗—德布鲁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批评的方式，即首先客观而详细地阐述理论内容，然后才对理论进行批评。他给我提了几处修改建议。他微笑着说：“这会在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座精美的方尖碑。”

我回到布达佩斯的时候，完成了对“论文”的修改。但遗憾的是，“论文”已经扩充成了一本大部头的书了。该书的匈牙利文版完成时，英文翻译工作也完成了。这时，我又收到了加林·库普曼斯发给我的邀请函，请我访问美国的一家研究机构，即设在耶鲁大学的考尔斯委员会。在美国的数量经济学界，考尔斯委员会是一个传奇性的机构，比如说，德布鲁就是在这里完成他的经典之作《价值理论》，该书也是《反均衡论》试图分解的对象。库普曼斯本人也是现代数理均衡理论的大师，他公开接受了我的批评。他请我在他举办的研讨会上讲一讲，并对我手中的扩充版提出了几处修改建议。* 他还与另一位考尔斯委员会的杰出成员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教授一起，委托了他们自己的几名学生，对该书的英文版进行了仔细校订。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阿罗和库普曼斯这两位经济学家在学术上的慷慨和大度，他们允许我随便使用任何设备，以便我能够有效而准确地对他们建立的学说提出批评。**

---

* 在我翻阅为撰写《反均衡论》收集的文件时，我又一次看到了当年库普曼斯亲手为我打印的21页备忘录，每一页上都写满了他的评论，这让我非常感动。很少会有像他这样工作繁忙的伟大学者，花费这么多精力帮助一位年轻人的研究工作。

** 有一件与诺贝尔奖有关的事情可以说明库普曼斯的伟大。库普曼斯因为建立了线性规划而与苏联数理经济学家列昂尼德·康托罗维奇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库普曼斯认为，乔治·丹齐格也应该分享诺贝尔奖，因为正是丹齐格发明的计算方法，使线性规划有了实际运用的可能。所以，他本人实际上应该只获得三分之一而不是一半的诺贝尔奖。因此，他将自己这半份奖金与三分之一奖金的差额捐给了一家国际研究机构。

1971 年，《反均衡论》的匈牙利文版和英文版同时面世，后来，该书又被译成了其他语言。

促使我撰写《反均衡论》的原因

自从我开始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以指令性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机制并研究现代经济学理论以来，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些基本问题。

何种价格机制能更好地指引决策者的决策？能否放手由供给与需求自行确定价格？国家干预是否根本没有必要，至少在某些具体时刻没有必要？

社会主义经济内部是否可以建立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能否与共产党体制内部的国家所有制和政治结构相匹配？或者说，共产党体制内部的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结合得过于紧密，因此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

在对这两个“伟大”的体制进行比较时，人们会问，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会比社会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是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更有能力调整价格，从而为创造市场均衡和有效的投入产出组合提供了激励机制？或者，对于资本主义辉煌的经济成就，我们还能否找到其他更重要的解释？

当时，我拥有的知识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从理论书籍中获得的知识。我在伦敦住过几个月，其间也访问过其他一些西方城市。“市场供应”这个表达方式，总能让我想起伦敦牛津街上的塞尔弗里奇商店，或者苏黎世巴恩霍夫街上的商店。是什么力量激励着商家在商店里保有如此丰富的商品存货？我每次来到这些地方，总能看到新的产品上架。（比如，有一次我看到了便携式计算器的出现，后来又看到了第一台个人电脑的上架。）是什么激励着生产者不断开发新产品？

对于理论信念的执着很像坠入爱河。我曾经盲目而狂热地执着于马克思主义，因此，放弃马克思主义给我带来了巨大痛苦。后来，我又对新古典理论产生一丝爱慕，我觉得一开始就是一种偏爱。如果爱情还在持续，我们就会宽容地对待爱人的缺点……但是这种偏爱绝不如我当年对待马克思主义那样强烈。我的眼睛很快就睁开了，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并没有为我脑海中萦绕的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更糟糕的是，我觉得它提供的答案是错误的。一开始我很苦恼，后来就非常生气。

诚如我稍早所说，我之所以抛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因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理

论并没有将理论与现实进行比较。新古典经济学在这方面的问题虽然没有那么显眼，也不那么让人讨厌，但现在我对新古典经济学也有相同的感觉。新古典的研究者提出了几种局部理论，而且他们也一直努力用实践对理论进行检验。经济计量学这门分析经济计量的科学促进了一些一流分析方法的发展，这些分析技术也在西方的大学课堂上教给了所有的经济学学生。我不是在研究这种局部分析技术，而是在研究整体理论时，发现理论无法面对实践进行验证。在涵盖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综合理论中，尤其缺乏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比较。我的这一思路让我将所谓的一般均衡理论，置于批评研究的中心位置。

经济学家称谓的新古典理论由几个局部理论组成。流行的西方教科书对这几个部分有很好的概括，比如主要的概念，需要解答的问题，证实理论所要使用的方法，等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被认为是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 其理论核心是19世纪下半叶法裔瑞士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论。他的模型将世界简化为由无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组成。此外，模型中还包含希望最大化手中货币之效用的家庭(household)。该理论证明了可以使企业和家庭的供给与需求达于均衡的价格的存在，因此，在具体条件下就会出现有效均衡。在给定条件下出现的均衡和和谐，就是一种可能的最佳状态，这是该理论为社会描绘的景象。

在许多新古典模型中，只有瓦尔拉斯式的模型意图涵盖全部的经济活动，但它不像宏观经济学理论那样，采用压缩的形式，而是将理论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经济行为人之间在这几个部分相互交流。正是这样一个模型，把市场经济描述为一个体系。因此，如果我对新古典理论给出的答案不满意，我的批评分析对象肯定集中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这是一个合理的思路。

瓦尔拉斯本人使用数学形式表述了这一理论。后来，阿罗、德布鲁、库普曼斯以及莱昂内尔·麦肯齐等经济学家为证明这一理论，发明了很多更适用的数学分析工具。这一理论逻辑严谨，可以说具有简洁和明晰之美。它迷惑了所有对它有全面了解的人。它当然也迷惑了我，直到我清醒过来并提出了我的批评

---

* 应该如何把握“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或经济学“主流理论”，学术界一直没有形成共识。由于各种解释随时间的不同而不同，所以情况进一步复杂化。这样，对很多人来说，这些术语所包含的内容与几十年前的理解，已经有了差异。要澄清这些差异就需要对经济思想史进行全面而客观的研究。我觉得我在撰写这本传记的时候，可以避开争论，简单地利用这一术语，让人们对经济学专业领域的流派有一个大致印象。

意见。

我之所以反对这一理论，主要是因为这一理论引发的各种研究以及主流经济学的综合科学规划，都无法回答一个大问题，即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或者指出如何才能“改善”这个世界，我在《反均衡论》的前言和导论中对此已经做过解释（可能用语有些不同）。

某些引人深思的相似性

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模型可以与我们在第 8 章讨论过的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进行比较。两种模型描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经济。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模型描述的是充分分散化的经济，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描述的是充分集中的经济。前者的价格传递的是相互独立又相互平等的各分散单位之间的信息，后者的价格承载的是中央为下级机关制定的必须遵从的数量目标。

现在我们可以做出一个让人惊诧的推论：只要遵循具体的规则，两种体系都能达于均衡。实际上，给定了最优准则和其他条件，两种体系都可以达到最优状态。我们可以用数学方法对这个观点进行表述和证明。

这种相似性让我非常困惑。这么说来，我们是生活在分散经济中还是中央计划经济中，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实际都无所谓？或者说，我之所以产生困惑，是因为两种模型在解释现实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即现实市场经济和现实指令经济）时，都忽略了现存经济体系的真实属性？

我在前面指出的两种模型中的某些假设，刚好忽略了这类基本的现实属性。虽然我们在第 8 章对数理计划进行分析时，提到过这点，让我再扼要重述一下。

这两种一般模型都假定，决策人掌握准确的信息。事实上，无论是自发还是人为，两个世界里的信息都已被完全扭曲。然而，相似性到此结束，根本差异开始出现。在基于自由企业和私人所有权的资本主义体制中，信息和激励之间存在联系。任何人都力图从自己掌握的知识中获利，或者从他人手上购买知识获利，提供信息的人要保证自己提供信息的准确性，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不管你是否愿意，分散的信息都必须上交给中央，就像集体农场的谷物一样。那些拥有信息的人，不管是第一个发现了信息还是第一个收集了信息，都不能拿信息做买卖。也就是说，你不能购买更多的信息，也不能

出售信息，你只能上交中央。资本主义从分散的信息和分散的激励中获得了强化自己的能量，而这种信息与激励的融合，正是社会主义缺少的东西。

瓦尔拉斯模型和两级计划模型的所有过程都被假设为在不存在摩擦的条件下运行，所以具有完美的适应性。事实上，两种体制的适应机制都会产生摩擦，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好几个因素使得社会主义体制较之资本主义体制更具刚性。在分散经济中，最低层就可以作出决策，而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出现了任何妨碍经济发展的问题，都需要逐级上报给可以决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上级，上级的处理意见再逐级下达给能够执行消除摩擦决策的下级。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路径。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进行资源积累可以确保对需求变化进行迅速调整，但计划目标引发的资源紧张使经济行为人无法累积资源发挥效用。

模型的失败还与另一个问题相关联。这两个模型都假设决策者是依照新古典理论所定义的“理性”一词的涵义，按照严格的理性方式而行为。他们的偏好固定不变，一旦做出选择便会始终如一地持续这一选择。我就是在这里意识到了严重的问题。我现在只举出一个进行讨论。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假设，中央计划严格进行理性决策，并始终持续这一决策。我曾无数次造访布达佩斯的计划办公室，我听得最多的是党中央给计划人员下达各种指令。这种指令理性吗？始终如一吗？这些指令完全没有理性和延续性，只是与现实脱节的不切合实际的意愿而已。计划机关要面对来自不同政治势力的压力，面对贸易游说团体或地区游说团体的压力。权力关系的变化也会使发展的重点产生变化。有时候，权力关系的迅速转变会使之前所有的政策偏向发生逆转。（后面将会对个人决策中的理性和持续性进行讨论。）

虽然这两种一般制度模型在静止状态下具有相似性，但在动态状态下却存在一个根本的差别。资本主义的竞争推动生产者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相反，社会主义制度缺少这种自发的竞争力量，它们只是按照中央计划人员的行政命令，断断续续且勉强地推出新产品。

一般理论的作用范围

我已经尽力解释了我对这两种模型产生反感的原因。虽然我对两个模型都

有诟病，但我对两个模型的看法却不尽相同。我们先来谈谈两级计划模型。这里我并不想对模型作更具体的理论解释。正如我们在第 8 章和前面几节讨论的那样，两级计划模型被视为“完全中央计划”模型。如果说，完全计划模型存在可能性的话，或至少存在理论层面的可能性的话，那么，粗心的读者或有偏见的读者或许会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体制的美化。但这并不是我的初衷。

这些考虑并没有阻止我对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模型的批评。

现在，我已经在科学哲学范围内，发现了我的批评在理论出发点上的严重错误。* 最根本的问题应该是澄清我们指望从一个抽象模型中得到什么。

我们可以诟病模型建立者的诸多错误，但我们不能因为模型是现实的抽象形式而诟病模型。因为这正是建模的本质。批评一个模型的最为简单的方法就是说，看，这个模型以这个假设为前提，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假设根本不成立。

理论模型可以用于各种任务，我概括谈谈两个相关的任务。

理论模型有助于澄清一种表述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在构建理论的过程中，模型建立者通常首先考虑的不是前提条件，而是可预见的结论，然后再逆向做出推论。也就是说，为了保证这个结论成立，需要什么样的假设条件？模型建立者都希望尽量节俭地建立一个模型，所以必须考虑证明这一表述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是什么？一旦论证的思路得以建立，它就可以成为反驳或至少是怀疑其他表述的出发点。

比如，阿罗—德布鲁理论声称，当且仅当经济体内流动的信息准确无误时，均衡才有可能出现，（根据具体的标准）最优状况才有望达成。这并不意味着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就不知道信息中隐藏了多少不确定性和错误。** 正确解读模型的人会意识到理论模型中的警告：如果信息具有不确定性并被扭曲，市场机制肯定不能将经济体系引入最佳状态。只有在信息准确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最优（这里使用的是条件语气）。

如果我们使用这种方法逐一查看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模型中的每一个假设，那么这个假设最终正好成了对市场的警告，而不是为市场进行辩护。如果这种或那种抽象站不住脚，那么这一理论的最终结论也站不住脚，市场也不再具

---

* 弗兰克·哈恩在 1973 年的一篇长篇书评中，全面指出了《反均衡论》的这一错误。文章标题出自莎士比亚“我们不满的冬天”。这个题目同时表达了我们俩的不满。

** 阿罗是最早撰写文章研究不确定性的效应和市场失灵等问题的学者。比如说，他的开创性理论证明，在纯粹市场机制条件下，医疗保障体系无法有效运行。

有充分调节机制的资格。*

与这一特征相关的是这一极具概括性的“纯”抽象模型的另一种功能：模型可以用来作为比较的尺度或者标准。资本主义制度下实际运行的市场经济与瓦尔拉斯的理想模型相去甚远，但瓦尔拉斯的理想模型可以对现实与理想的距离有多远进行有效测量。比如，经过测量就可以确切知道，实际情况与瓦尔拉斯模型的绝对准确情况相差多少。同样，它也可以表明现实的摩擦情况与瓦尔拉斯模型的无摩擦状态相差多少。我还要补充一句，我在《短缺经济学》中充分利用瓦尔拉斯模型进行了这样的比较。

正如我在第 8 章中所指出的，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也有同样的用途。“完全计划”的纯理论模型，也可以与那些并不太纯且与理想相去甚远的现实计划媲美。

这里的麻烦并不在于纯理论模型展示了一种理想的极端世界，而在于许多人对模型的错误解读以及从模型推导出的错误结论。

许多读者在阅读理论著作时，都会跳过作者的思路，忘记了支撑模型的所有严格假设，因此误解了只有在模型框架内才适用的命题。比如，有人将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模型解读为在为自由放任的市场和免于所有的政府干预唱赞歌，但全面掌握了这个理论就会明白，从这个理论模型根本推导不出这个观点。这种误读或误解理应受到严厉批评。

我们不能因为理论与现实相脱离就因此责备这一理论，但我们应该着重提醒那些将理论融入了自己思想的人，格外注意这一理论所忽略的东西以及这一理论与现实脱节的情况。应该对那些执业的经济学家进行培训，让他们时刻牢记在从纯理论推导实用性结论及讨论理论的“经济政策含义”时，必须小心谨慎，对每一个假设都必须再三权衡。我们构建理论必然是远离现实的抽象，但在我们不再无视真实条件的情况下，这种抽象可能会给那些理论起到作用带来麻烦。

我在本章开始就指出，《反均衡论》在科学哲学上有一个根本的错误。我不应该攻击理论的纯（即理论假设的抽象性和非现实性），而应该攻击主流经济学

---

* 这里用来解释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模型的观点，在第 8 章中也出现过，主要用于解释科尔奈—利普塔克两级模型。但是，我那里并没有指出这种方法与科学哲学中的某些特别困难的问题有关。

对假设的错误使用。批评的真正对象应该是主流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和研究计划。我们不能强迫纯理论的创建者在其著作中提醒读者注意这些信息。然而，任何一个解释理论和教授理论的人，都要因为未作补充解释而被要求作出说明。他们把理论讲清楚了吗？对于如何正确理解这个理论他们作过何种解释，还有什么没有解释清楚的地方？理论家在撰文以及教师在授课时，通常漏掉了哪些应该向读者或学生交代的警告呢？如果《反均衡论》重点对这些问题进行批评，可能会更好。* 在我激扬文字提出批评意见的同时，贯穿《反均衡论》中的科学哲学基础之错误，削弱了它的说服力。

理性决策者

让我回过来再阐述一下《反均衡论》中的某些重要观点。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这些观点还有说服力。

对于决策者的理性行为之假设，并非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模型的专属。在新古典学派的思维模式中，理性之假设的特征非常明显。传统上，经济学家对“理性”的解释，显然有别于其他专业或日常用语中对理性的解释。

对主流经济学家来说，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要符合这一要求：即不能自相矛盾，且必须前后一致。**

根据刚才表述过的观点，极端模型假设了决策者严格按照前后一致的标准行事。这个模型就可以作为一个标准，用以确定实际决策人的行为中那些明显不一致的表现，比如他们的什么决策、在什么方向、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频率偏离了理想决策者具有一致性的行为方式。让人遗憾的是，《反均衡论》并没有充

---

* 我发现，有的读过《反均衡论》匈牙利文版的读者认为，我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更适用于现在的状况，与“理性预期”理论有关的种种理论的影响力比之 35 年前我撰写《反均衡论》的时候，已大不如前。因此，《反均衡论》是先指出了类似问题，后来才得到读者的认可。

** 为方便那些不熟悉这个问题的读者，我简单概述一下这个想法。如果决策者坚持他们的偏好，我们就认为这是理性决策者。他们可以偏好 A 而不偏好 B，或相反；或者他们对两者没有特别偏好。但如果他们现在偏好 A，他们就不会将 B 作为第二选择。多数新古典学派的著作都假设，决策者具有“效用函数”。他们的决策可以用最大化或“最优化”这一效用进行解释。用这些假设我们就可以表明，偏好排序和效用函数最大化这两种形式是相等的。阿玛蒂亚·森（Sen，1977）很贴切地嘲弄了这个相等性。他说，“理性傻瓜”也适用于模型中的理性决策者形象。如果他们一如既往地遵循疯狂的想法，他们就可以被视为理性决策者。

分重视这种观点的价值。

不幸的是，细究起来，许多主流经济学模型准确而言都没有将一致性概念应用到理性决策人身上。相反，他们的模型假设了严格的一致性、效用最大化以及最优化，多多少少接近于决策人的典型行为。主流经济学的拥护者声称，他们拥有一个能对人类行为进行普适解释的模型，可以用来描述任何事情，即不仅限于描述经济决策，还可以描述所有的选择问题，从离婚、家庭规模直到议会选举。《反均衡论》就是反对这种简单化的方法。刚才我只是泛泛谈及阐释和教授新古典模型中的错误，与最优化理论、效用函数以及偏好排序相关联。经济学家已经习惯于将这种方法视为普遍有效的模型，并使用主流经济学的术语进行思考，即使这是错误的方法，他们仍然照用不误。

《反均衡论》用了两个极长的章节来讨论这一问题，本书只想谈谈重复决策与非重复决策以及比较决策与非比较决策之间的重要区别。

我可以选择自己每天进餐时搭配的饮料，虽然具体的选择取决于当天的菜单或者我的偏好。但人们仍然能从我的消费行为中观察到我的特定模式，即从我饮用某种饮料的持久程度发现我对某种饮料的好恶。饮料的选择是一种重复决策，且今天所做的决策在每个方面都可以与昨天的决策进行比较。

我们将这种决策方法与另一种两难决策问题做一个比较。1956—1957 年，匈牙利的边境开放，人们可以没有风险地越过边界，逃离铁幕世界。因为以前政府关闭过边界，所以每个人都假设(后来证明这种假设是正确的)，不久政府又会再次关闭边界。那么，人们应该逃走还是应该留下？这就是非重复决策问题。许多人后来都是选择了“逃走”。但是，环境不同，风险也会有不同，在国外受到的待遇也不同。对于我们来说，去留问题与 1956—1957 年的两难选择问题没有可比性。

我还想对这个问题补充两点评论。

新古典的偏好模型很适宜用来分析周期决策和比较决策的问题。例如，它有助于度量不一致性。但是，理性选择模型既不能用于解释重复决策和比较决策问题，也不能用于解释非重复决策和非比较决策问题。

首先，重复性较小的决策当然有意思，尤其对经济学家非常有用。比如说，他们可以根据对消费者行为的定期观察，估算出需求函数，或者生成一种与重复管理决策相关的描述企业行为的函数。

然而，生活中最大且最为重要的决策，通常都是独一无二的且具有非重复

性。在个人和人类的发展史上，都存在转折点和非重复性事件。对于那些想使用既有的偏好排序来解释人们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如何行为的社会科学家来说，这是一种悲哀。1967—1970 年，我对这件事情有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了这种区别，我也对自己进行了反省。我无法看透他人的灵魂或者决策过程，我只能审视自己的内心。我知道在一些重大时刻，根本没有事先形成的偏好。比如在 1956 年后出现的巨大移民潮中，我就决定不移民；比如我不再重新加入共产党；比如在革命的某一关头所做的抉择，等等。* 在价值（偏好）与条件或者可选择性之间有一种互补效应，“有限性”与“偏好”也无法分开。由于每一次的巨大挑战和重大决策环境都与之前的挑战和环境截然不同，所以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严格的一致性问题。

我现在仍然认为，借助于我在《反均衡论》中指出的不同和其他重要观点，我才能够向正确的方向摸索前进。

人们不可能清楚地评价《反均衡论》出版后的一个时期，科研和学术在这方面有了怎样的发展。一些成果所指的方向正是《反均衡论》中意的方向。最重要的是，心理学家与理论经济学家在研究决策过程以及重新评估“一致性政策决策人”的理想模型中展开了合作。这里也出现了几个有价值的成果，行为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一个思想流派，力求从全新的视角来模仿人类行为，意图用更接近现实的模型来描述人类行为。这一学派尤为突出的是阿莫斯·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揭示了理论中的几个异常现象。换句话说，发生了对理性决策标准模型预期的可观察的系统偏离。2002 年，卡纳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表明经济学同行普遍欣赏他的研究成果。（不幸的是，特韦尔斯基没能活到与他共享这项荣誉的那一天。）**

然而，其他方面的发展更让人忧虑。当前，理性选择模型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乃至历史学中，也就是说，切切实实地运用于研究非重复性事件极为突出的各门学科。遗憾的是，理性选择模型在这些学科的应用上并没有采用

---

* 我在第 2 章记述了我加入共产党的决策过程。在此之前，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偏好，所以这一决策内含几种动机。一旦做出这个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定之后，这一抉择后来在许多不那么重要且一再发生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中，形成了我的偏好。

** 特韦尔斯基和卡纳曼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承认，比如，在脚注里有表示。但仿佛这一新理论从未出现那样，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继续着自己的研究。

上文谈到过的精细方式。由于在这些学科中应用这一模型对事件的解释不仅粗糙，而且过于简单，所以我在几十年前提出的警告和批评，现在看来仍然有效。

非价格信号

按照我所批评的新古典理论的说法，经济体系各个单位之间只有一种信息的流动，即价格。这种将价格视为唯一角色的决断，让我非常烦恼。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对企业之间的生产和消费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相反，其他信息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却非常大，比如计划指标，库存增加和减少的指标，消费者排队名单的长度，订单的大小，等等。如果在分析中省略了所有这些信息，那么在重新启动市场机制的时候，就无法解释价格信号应该具有的特殊优势。

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价格也不是唯一的信息载体。非价格信号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反均衡论》在这个问题上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自那时以来，研究者对信号和信息作用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欣喜的巨大发展。

均衡与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

“在经济学中，对范畴的定义似乎是一项最有难度的事情……在概念方面，总是缺乏精确性。”[3]我在《反均衡论》中引用了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的这段话。因为均衡这一概念，就存在(依然存在)着混乱。

一般而言，物理学和严密的科学都将均衡看成实证范畴。这个词(无论在拉丁语、英语还是德语中)起源于两边重量相等的天平这一概念。触碰一下天平，不久后，天平很快又会回归均衡。天平也不会自动向一边倾斜，因为存在一种稳定的静态均衡。我们同样也可以谈论动态均衡的路径。体系可以发展，但就像从一部电影中剪出的一段定格画面一样，它也表现出一个均衡体系。

新古典学派的理论使用的就是这种实证意义上的市场均衡概念。在静态均衡理论中，如果所有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相等，市场则处于均衡。这一定义满足了

许多分析目标。随着经济学知识的普及，均衡这一术语也成了经济政策决策者和专栏记者的常用术语。

规范分析方法也与均衡这一概念有关。市场均衡是一种理想状态。需求超过供给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会导致短缺，而未出售的存货不断增加也不是一件好事。

虽然我承认这一术语清楚明白，而且术语的简单性也获得了经济学家和大众的认可，但在我撰写《反均衡论》的时候，我就认为这一概念有缺漏。今天，我仍然持这一观点。

我们先来讨论资本主义的情况。给定买方和卖方，卖方总是希望能按照现行价格卖出比之实际售出产品更多的产品。如果产品受欢迎，每个卖者都打算售出比以前更多的产品，为此目的，每个卖者都要有额外的能力和库存。从这个意义上说，供给超过需求。一旦供给并不完全等同于需求，那么，实际销售量和购买量则取决于供求双方数量较小的一方。如果我们像使用物理学中的均衡概念那样使用“均衡”一词，这就是均衡状态，不是供给与需求相等的状态。尽管这种状态会被商业周期所取代，但这也是市场回归的状态。（经济繁荣将吸收或大量减少过剩的生产能力，并使库存降至极低水平。）人们完全不必为这种情况操心，因为这种不对称正是支持真正的资本主义之伟大的市场力量。这一力量驱使人们相互竞争并战胜对手。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使买方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可以选择卖方，而不是由卖方选择买方。最为重要的是，竞争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和新产品的上市。

由于我生活在与之相反的环境中，即生活在卖方至高无上并可以选择买方的环境中，我更强烈地感觉到了这种不对称性。这并不是天平的刹那间倾斜。过多的需求是一种持续的状况，特殊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不停地重复产生着短缺。在社会主义体系下，短缺经济是均衡的真实均衡状态，但不是供求相等的状态。

我在《反均衡论》中用两个人们尚不熟悉的词描述了这两种均衡状态：压制和吸纳。压制指卖方用产品压制买方，吸纳指买方急切地从卖方吸收产品。我承认，这两个词并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认可，也没有出现在大众言谈中，所以我在后来的文字中放弃了这两个词，转而使用“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表述，这两种表述早就在经济学家中通行了。

不幸的是，我必须承认，阻碍人们接受我的说法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因为我的术语体系。我的基本思想是，不对称的情况在两种体制下都存在，不是买方占

优势，就是卖方占优势，但这一思想被歪曲了，没有什么进展。现在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我很遗憾，我没能说服我的同行们同意我的观点。

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还在理论中引入了“竞争性均衡”的概念。竞争性均衡指市场各方的供给与需求都相等。我认识到，由于这个理论范畴较为准确，所以可以用作比较标准。如果能把实际体系偏离瓦尔拉斯竞争性均衡的情况如此这般比较一下，对实际体系的描述就会轻松很多。但这里“竞争”这一术语的使用不很到位。真正的竞争指如果资本主义实现了瓦尔拉斯所说的均衡点(point of rest)应该会有的损失。* 因为在这一点上已经没有进一步奋斗或创新的理由了。每位灰姑娘都找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每位厂商或卖方都为自己的产品找到了买主。幸运的是，这并不是现实资本主义的持续性常态。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厂商之间或卖者之间竞争激烈，因此他们要不断更新自己的产品组合。

现在，我可以解释《反均衡论》这一书名的双重含义了。一方面，它意在批评一般均衡理论；另一方面，它对那种希望有个平静且无创新的竞争性均衡状态的人，表示了自己的异议。

一般均衡理论的政治解释

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评指责说，新古典学派经济学的成员在用他们的理论为资本主义辩解和歌功颂德。这是一种错误的概括。

新古典理论与一般均衡理论相同，其理论核心从政治上讲都是中性的。理论的公理和概念框架都不存在政治“偏见”。新古典理论的追随者和使用者包括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者。《反均衡论》特别强调了这一观点，表明自己与当时那些将新古典学派简单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的观点截然对立。

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因为我希望能进行比较制度研究，进而研究现行社会秩序的变化，所以我在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发现了两个具体的错误。第一

---

* 正如前面提及的那样，《反均衡论》出版之前我发表过一篇较短的“论文”。在那篇文章中，我将弱性竞争性均衡比之于性冷淡的妇女和阳痿的男人。后来，我似乎想出了一个更温和更可取的对比，所以在《反均衡论》中没有使用这个对比。

个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把市场理想化的趋势，没有让经济学家充分认识到市场缺少政府干预行为和其他辅助性监管机制的缺点。第二个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没能指出真实市场的真正优越之处，以及上文刚刚讨论的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力量。它描绘的市场图景过于乐观，同时又不够乐观。

我想仔细地谈一下我在激进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发现的与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模型以及更具概括性的新古典经济学思想之间的相似性。

一个例子就是我在之前提到过的奥斯卡·兰格的著述，兰格借助瓦尔拉斯理论的思想体系，创立了自己著名的社会主义理论。

一个近例是苏联的康托罗维奇学派，该学派强烈建议用线性规划中获取的影子价格替代真实市场价格来调节经济。我们很容易就明白西方经济学家视康托罗维奇学派为精神上的同宗的原因，因为他的平衡体系就是瓦尔拉斯体系的变体，只不过在数学形式上略有修改而已。

《反均衡论》也发现，一般均衡理论与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平衡体系有相似之处。这一发现也引起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读者的不快。

尽管这样，那些激进社会主义者的同盟依然倾向于视《反均衡论》为同一战壕的战友，而不愿就此排挤它。他们为我们拥有“共同的敌人”而欣喜。他们没有发现，《反均衡论》是在为资本主义做更有力的辩护，而不是简单赞扬几句“竞争性均衡”了事。我的这本书强调了资本主义的一个优点：技术进步和持续创新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属性持续产生的推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承认过这一点，同时，这也是熊彼特理论的核心。*

科学的改革还是科学的革命

我认真检视了当时的经济学状况后意识到，很多卓有成效的研究都在向我认为可取的方向发展，这一发展在逐步填平瓦尔拉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但我还是认为这种变化太慢。我希望能有一次科学革命，而不仅仅是对当前学

* 《反均衡论》中有一张详细的表格，表格中列出了什么时候在哪个国家，有什么真正能改变生产和消费并创造出生活方式的新产品。它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在其建立的历史时期，几乎没有创造出什么“革命性”产品。大多数革命性产品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

术思想的改革。我并不自负，也从未说过我的这本《反均衡论》引发了这样一场革命。

我认为我的这本书是个半成品，它表达的只是我对一场革命的渴望。我在这本书中表达了自己的这一渴望。借用维尔纳·海森堡的话来说，我将一般均衡理论称为“数学结晶体”，一个无法校正的封闭体系。[4]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认为人们一直对革命性的方法存在误解。*

自从1962年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关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经典著作出版以来，自然科学发展史上是否发生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就成了争论的重点。但有一点非常确定：尽管在发展道路上有转折、有跃进，旧思想不断被新思想所取代，但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高度的连续性。改革的因素与革命的因素一直缠绕在一起。

在我撰写《反均衡论》时，我低估了主流经济学家自我更新的能力和意愿。在这里提到和没提到的许多新进展证明，主流经济学家已经超越了20世纪60年代的立场，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们在没有波澜壮阔革命的条件下，做到了这一点。

但我还要补充一句，我在当时产生的急躁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自那以后，我的这种情绪也一直没有平复下来。尽管主流经济学派自我更新的能力非常明显，但在一些合乎逻辑的质疑面前，他们仍然坚持自己认为可靠且给人以安慰的思想体系，就有点顽固了。

对《反均衡论》最初的认可及长期影响

《反均衡论》刚刚出版的时候反应非常强烈。肯尼思·阿罗和赫伯特·西蒙在诺贝尔奖经济学获奖感言中都提到了这本书，赞同书中的某些观点。[5]也有许多文章和著作引用了书中的提法。在《反均衡论》出版后的最初几年中，国际上出现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很多地方的经济学学生也在对其进行讨论。一个简

---

* 但激进主义在我探索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我似乎有使用这种方法的偏好）时，却没有什么作用。借用伊姆雷·拉卡托斯的说法：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并不是正在下滑的学科，而是一门仍可独立发展的学科。

单的事实是，一本全面批评一个其影响几乎无处不在的经济学流派的著作，引发了一场学术轰动，让很多人感到兴奋。

当时，对这本书持强烈异议的人并不多。我原以为我的这部著作会引发学术界的激动，取得一些成果，并产生持久性的影响。但情况并非如此。初期的反对意见并没有继以其他批评，但初期的积极引用也消失不见了。关于《反均衡论》的争论也停止了，该书出版初期引发的兴趣逐渐销声匿迹。*

我已经说过，按照《反均衡论》指出的思路，人们可以在好几个领域中获得丰硕成果。这让我感觉良好。但老实说，作为理论—历史意义上向更新方向发展的先驱人物，我对一些出版物没有提及《反均衡论》而颇感不满。**

我曾希望《反均衡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为什么该书的影响力仅此而已，且没有我希望的那么深远？我的其他著作都达到或超过了我的期望，但为什么《反均衡论》没有达到这一预期？

造成这种现象的问题之一是《反均衡论》的写作风格或“体裁”。这本书中充斥了大量的数学符号，但书中并没有使用这些符号进行数学分析。书中还有太多学究式的定义和生硬的阐述。而且，这些定义和阐述也没有融入理论分析之中。这本书使用很多新术语填入旧范畴，这种方法在这里不仅没有取得成功，其结果反而事与愿违。大量的新概念让读者有些反感。

早先的“论文”更简洁一些，没有使用方程式，所以读者的印象反而好一些。我误解了这种情况，因为我读过许多运用数学方法的著作，所以我觉得我也可以在我的文章中融入相同的写法。如果《反均衡论》坚持使用原来“论文”的风格，情况可能要好一些。

我在批评新古典学说的时候，语气礼貌而文明，完全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理论文章中那种傲慢指责的腔调。不过尽管如此，文中的语气还是过于激进。

---

* 著名的法裔美国宏观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受一本杂志之托对我进行了采访。访谈中我提到，《反均衡论》在出版一两年后便悄无声息了。他回答说：“这本书很有影响力。在我的祖国法国，我们都读过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已经成了公共知识的一部分，所以就很少被提及。很多学术思想都是这种情况，这或许是成功的一个标志。”(Olivier Blanchard, 1999, p. 433)

** 有些提出要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全面批评的著名经济学家，在好几个地方都反复提到了 1970 年我在《反均衡论》中谈到的问题，却没有提及出处。

为什么不提及出处呢？这些研究者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反均衡论》的存在，独立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或者，他们读过《反均衡论》，但在写作和演讲时想不起来了。又或者他们记得这本书，但认为没有义务与读者或听众分享这本书的内容。

后来我读到了戴维·莱布森和理查德·泽克豪泽论述阿莫斯·特韦尔斯基的文章，让我感触颇深。特韦尔斯基是以色列伟大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与丹尼尔·卡纳曼一起，为人们更好地理解决策过程作出了很大贡献。特韦尔斯基没有像我在《反均衡论》中那样，犯下“不讲策略”的错误。他从来没有说过“从零开始!”他会首先认可这一模型的优点。他会建议，让我们从这里开始，以这一优点为基础。在他试图让人们相信这种观点必须改变的时候，他使用的方法更能顺从同行的心意。

分析《反均衡论》失败(或更准确地说，是部分失败)的原因，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内容上的原因，而不是形式上的原因。

从批评本身来说，批评至多会削弱现有理论的某一方面，并缓解人们对新理论的思想抵触，但无法颠覆已得到人们接受的理论，尤其是应用理论。学术界也不是真空。只有在经济学家确信新理论更为合用之后，新理论才能废黜旧理论。*

《反均衡论》没有提出新的理论，这也是这本书没有取得突破的原因。

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反均衡论》指出，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模型勾画出一幅和谐的画面，画面中的每一个人都合意且安静地在均衡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时就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模型的冲突上。《反均衡论》给出了国家行政机关之间或企业内部的冲突模型。在博弈论复兴之前，该书就建议要对这些冲突进行研究。

这恰恰是个难题。在约翰·纳什(John Nash)及其同事发明了新的理论方法进行探索并将它们运用于新的理论架构之后，才推动了关于冲突问题的研究。

对一个重大研究课题提一个平平常常的建议就引发出丰硕的成果，在现实中很难找到这样的成例。真正富有成效的研究计划都始于振奋人心的建设性创造。通常我们称这种研究工作是影响深远的工作。

匈牙利有句俗语，没有仆人就自己干。我试着(自己一人或与同事)对《反均

---

* 在《反均衡论》出版后引发批评前，这一动向已经很明显了。在书稿讨论期间，我也已经注意到这一动向。我手上还保留了一封与此事相关的信件。这封信是1970年我在耶鲁大学时写给布达佩斯的一位同事的。信中，我描述了就《反均衡论》所讨论的问题进行的五次讲演以及人们的认可。我首先谈到了听众对我的称赞，然后我说：“另一组意见混合着称赞和不满。一位同行自嘲自讽地称之为精神分裂症行为：良心告诉我们这样做不对，但我们仍然这样做。只有当某人将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法交到他们手上，他们才会停止这种做法。”

衡论》中提到的几项任务进行了研究，其中有的还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我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回过头来讨论这一点。）

这个问题让我切实地认真思考自己毕生的科研成果。有一类研究者一旦有了一个伟大想法，一种真正的原创和重要的思想，就把毕生精力投入这个思想的研究、发展、应用和推广，由此创立一个思想流派。有的研究者甚至这样从事了两到三个重大思想的研究。理论发展史表明，这种集中精力专攻的研究策略，能产生非常重大的成果。我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即我本人倾向于另一种研究策略。虽然脑子中不断闪过新的想法，但遗憾的是，我很少有耐心专注于某一具体的课题进行研究，并且发展它、应用它、推广它，或是形成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学术流派。我在所有这一切刚刚起步时（不同情况有不同的方式），就已经大步奔向了下一个令人激动的想法。虽然这种情况不是每次都会发生，但我还是能够举出几个例子。《反均衡论》的内容和随之发生的事情恰好说明了我这种大步流星往前赶的特点。尽管《反均衡论》也进行了编辑加工，但该书还是从一个半领悟的思想冲向了另一个思想。

《反均衡论》值得写吗？

写作和出版《反均衡论》确实为我以后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首先，新古典学派中的某些顽固之徒认为不能原谅我的所作所为。其次，尽管现在我也发现了书中的许多错误和不足，但我仍然认为书中的很多观点还是站得住脚的。就是当下，我也仍然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新古典学派，仍然不会盲目相信新古典学派的观点。我喜欢称自己一只脚进了主流经济学的门槛，一只脚仍在主流经济学门外。在一些问题上，我同意主流学派的看法；在另一些问题上，我又会逆流而行。这种一脚里一脚外的状况有时候也会引起一些矛盾。我的作品常常不能打动编辑和读者，不足以让他们包容这种怪现象。

我是如何鼓足勇气撰写《反均衡论》的呢？在撰写这本书之前我就很清楚，书中对主流经济学的激烈批判会引起强烈的抵制。自从我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渐渐形成了自己强烈的怀疑和反省的倾向，而这种倾向促使我做出了撰写该书的决定。我曾经盲目而不加批判地相信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不想再这样了。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我没有读过名校，我是自学的经济学知识，这是我的弱势。但自学也是一种优势。我虽然学习了主流经济学理论，但我没有让它深深扎根在我心里，我在讲座或开研讨会或准备考试，甚至在睡梦中，都不会自动使用传统新古典的思想来回答每一个问题。我不能将自己与海顿(Haydn)相比较，但我认为我的情况与海顿有几分相似。海顿在很多年里一直远离世界音乐的中心(实际上，他是居住在匈牙利的艾什泰哈齐宫)。他曾经说过："我与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所以我有了机会拓展和冒险。艾什泰哈齐宫里没人分散我的注意力，也没有人让我心生疑窦。这也是我具有独创性的原因所在。"[6]

如果我的整个学术生涯是在美国的大学中度过的，那么正常来讲，我撰写《反均衡论》的年龄应该在升任为正教授之后。我的手稿可能会受到顶尖学术杂志的拒绝，因为手稿中包含有大量尚不成熟的说法，而且还有批评基本学说的非正统观点。这里大家必须记住，取得大学教授职位取决于你在权威杂志上发表了多少文章。一旦轮到决定我是否可以获得教授资格，我势必要避免惹恼那些可以对我的晋升产生影响的同事。从这个角度讲，生活在遥远的匈牙利倒成了一件好事。我的这种说法虽然听起来奇怪，却让我比较容易保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因此，我没有"被迫"接受西方青年学者的传统生活路数，受过学业教育之后再找一份工作，然后进入升职的程序。

那么，这本书值得写吗？我是否后悔写这本书呢？我在这里可以现身说法，阐述人类行为中的许多前后矛盾之处。有时候我认为"如果我没有写过这本书就好了"。但有时候我的想法又不同，我又不想从书中抹掉对新古典理论的批评。如果我能借用奥威尔式的伎俩，让这本 1971 年出版的书凭空消失，代之以一本能够反映我当前观点和知识的著作，事情可能会要好些。如果能用修订后的版本替换下图书馆书架上尘封已久的那一本，也是一件好事。然而，正如匈牙利伟大作家卡尔曼·米克萨特所说："人们一旦写出了自己的作品，即便用斧头也无法将其从生命中砍掉。"*

但总的来说，我并不后悔《反均衡论》的问世。我在前面已经引用了对我这本书批评得最尖锐且最全面的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的话。哈恩总结他的评论道："我其实更愿意看见这本书的面世，我并不希望该书从未出现。科尔奈是一位非常诚实而且正直的学者，人们总是能从书中那些阐述非常糟糕的地方，

---

* 彼得·艾什泰哈齐在谈及安德拉什·涅尔盖什的作品时，引用了这句话。

找到他想说的好的观点。而这些好的观点也确实很有价值。”[7] 我为我做出的这些成就感到骄傲。正如哈恩所说：“那时这本书让我很满意。”或许，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以及后来的论战中，我也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无论哪种情况，这本书肯定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一些主观评价

最后，我想暂时离开经济学和科学理论范围，谈一下我个人对《反均衡论》的评论。有位读者在看完本传记的初稿之后评论这一章说：“为什么要如此详细地探讨失败的原因呢？试着翻过这一页。”另一位读者说：“人们并不喜欢听抱怨……你这么写完全出于你的虚荣心，没有人将这件事情看得这么重要。”

我承认，如果对这本书过去带给我的种种麻烦不予理会，我可能会更有风度一些。但我不是那种轻易就可以将一些事情丢开不管的人。我很羡慕埃迪特·比亚夫这类人，她说：“我不会为任何事情感到后悔。”我对自己说不出这种话来。有的事情我会感到后悔，有的事情我会义无反顾。时至今日，我对自己做过的很多事情都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评价，我自己也经常在反思过去陷入的两难境地。当初我是否应该选择另外的解决办法？毫无疑问，失败的经历比成功的经历更让人印象深刻。

《反均衡论》不仅是我著述目录中的一个书名，也是我在学术生涯中最具抱负的一段经历。我所承担的任务在广度和难度上都超过了自己的能力范围。虽然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我仍然不想轻易就妥协让步。

无论成败，我都不可能淡然处之。我相信，虽然很少有人承认这一点，但大多数学者都和我有同样的感觉。他们担心自己会遭到公众的误解。如果一位学者给人的印象是，除了关心科学的进步和发现真理之外，其他都不在意，也不在乎作品发表之后随之而来的评论，似乎要好一些。如果情况确是这样，为什么科学领域如其他领域一样，比如文学、艺术、体育和生产以及商业，充满了形形色色名目繁多的奖励和荣誉以及地位和认可的标志？另一方面，又有从沉默到公开攻击以及羞辱人格的种种非难？可能只有学术狂人和圣人才会处之泰然。但多数人都难免犯错，他们都觉得，成功与失败的强烈体验与创造的冲动之间，有非常紧密的正相关。毫无疑问，从知识中获取的乐趣和追寻真理的意愿，都是研究

工作的主要动力。然而，这里也存在某种可以进一步加大这种动力的辅助动力。那些毫不在乎他人对自己表现之评价的人（不包括那些虚伪地假装不在乎的人），通常都是付出努力较少的人。

在本章及本书的其他各章，我努力诚实地对自己进行反省。由于《反均衡论》并没有获得我期望的效果，所以我一直试图找出我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这种诚实的态度首先赋予我回答下列问题的道德基础："这本书不成功，只是我的责任吗？"我在这里并非出于敌意而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当我提出专业人士不肯接受尖锐的批评以及缺乏记忆力的问题时，我是在为许多研究者代言。这种记忆原本应该欣然接受重要的新思想，即那些原始、粗糙但具有前沿性的新思想的第一次出现。

我本可以从容自在地倾听那两位读者的忠告。我应该删掉第 10 章的这几段，或许还可以删掉本书中其他地方的几段。如果这样做的话，马上就可以消除我在人们心中犹豫不定的形象。虽然这样产生的形象与一名"学者"的理想形象更为相近，但这并不是我。

注 释

[1] Kornai, 1967a.

[2] Kornai, 1968.

[3] Neumann, 1963[1955], pp. 100—101.

[4] Kornai, 1991, p. 367. 要了解"数学晶体"概念，参见 Heisenberg, 1967(1958), pp. 231—232。

[5] Arrow, 1974, p. 254; Simon, 1979, p. 508.

[6] 我在一份周报上读到海顿的这句话，但我无法查到它的来源。不过我还是引用了它，因为我相信海顿说过这样的话，也因为它阐明了我的观点。

[7] Hahn 1973, p. 330.

11. 研究所、大学和科学院：1967 年后

现在让我们从纯理论的世界回到布达佩斯这个绝不纯粹的社会环境中来。我在撰写《反均衡论》的初稿——“论文”的时候，任职于匈牙利科学院计算机中心，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也参与了那里的数理计划研究工作。同时，我还在 1958 年将我开除的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兼职。1967 年，经济研究所所长伊什特万·弗里斯(Istrán Friss)给我打电话，让我回经济研究所全职工作，我接受了这个邀请。从那以后，我在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了 25 年。

经济所掌门人

现在可以说一下把我召回经济研究所的伊什特万·弗里斯了。匈牙利科学院及其下属的研究所有一个极为复杂的等级制：弗里斯主管第九学部，该学部的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学、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在第九学部内部，弗里斯还担任了经济学学术委员会主席，因此他还主管经济学学科。最后，他还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像这种一身跨三个行政级别的人，真的比较罕见。所以从理论上说，他自己又是自己的老板和上级。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他的这些位置都拥有相当的权力。

弗里斯的性格有些矛盾，他的价值观相互冲突，他的行为也反映出他有传统的和本能反应的好几种类型。除此之外，他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早年，他放弃了优越的中产阶级生活，加入了当时还属非法组织的共产党，虽然这种行为可能会招致政治迫害。但他至死不渝地坚持了自己的列宁主义信念。他的行为表明，

他在莫斯科流亡的那个时期已经给他打下深深的烙印。他一直与同事非常疏远，而且疑心很重。但是，他并不热衷于摆老板架子和玩弄权术以及扩张自己的势力。他曾经在德国和英国做过一些研究工作，所以他后来一直保持着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作为学者和研究人员，他基本没有什么研究成果，而且也没有提出过什么重要的原创性思想。但作为一名组织者，他有很多功劳。他在他可能的范围内（当然，这个规定本身就有些奇怪），尊重下属的言论自由。他与苏联和东欧国家那些与他地位相同的人不同，他并不要求下属对党言听计从。他热情鼓励我们开展实证研究和观察现实。

我与弗里斯的关系好坏参半。他比我年长 25 岁，所以我们的关系中夹杂着家长制的味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喜欢使用亲热的第二人称，不过，他叫我雅奇，我却与其他人一样，称他为弗里斯同志。

我现在又要谈谈我在前几章中谈到的几件事。我在《自由人民报》工作的时候，弗里斯常常向我传达关于党的经济政策的信息和指示。我被《自由人民报》开除后，他让我进入经济所工作，但是却将我的工资降低到最低一级。随着我的工作再次风生水起，他不仅给我升职，而且将我树立为全所学习的榜样。1956 年革命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想让我在电台发表支持共产党的言论，我婉言拒绝了。革命失败之后，他在党内谈话中称我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他并没有说要把我从经济所开除，但他也没有反对别人提出开除我的主张。他就像一个严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战士一样，坚决执行上级开除我的决定。另一方面，他又帮我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而且帮助我在英国出版学术著作。

现在，他又请我回到经济所，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用好几种方式表达了对我的工作的欣赏。我动完手术在家养病的时候，他还来我家看我，并询问我是否有意接任他的经济所所长一职。（我没有这个意愿。）

若无其事

被经济所开除是我生命中的一大危机。重返经济所却波澜不惊，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伊什特万·弗里斯没有提过以前发生的事情，我和其他同事也都闭口不谈。

当时，我心里翻腾着很多想法。匈牙利正全力为 1968 年的新经济机制做准

备。在我回到经济所的几年前，我曾经见过雷沃·涅尔什一面，并有过一次短暂的交谈。涅尔什当时是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正负责改革工作。在交谈中他随便提了一句："你知不知道你快恢复职位了？"我回答说："我没地方听到这种消息。没人跟我说这些。"许多人都读过我在 1956—1957 年出版的著作，也有人参加过我们关于 1956 年改革提议的讨论，还有人在十年前就和我讨论过这个主题，现在，这些人都参与了改革的准备工作。我敢肯定，这些人的思想都受到过我的影响，但是，没有一个人在自己的讲话或文章中提及这种影响。弗里斯也从未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现在根据党的路线方针全力支持的改革，是由他几年前以党的名义公开抨击的人（尤其是我）发起的。

然而，如果有人想探究我与经济改革的关系，我一定会觉得有些尴尬。我本人已经超越了人生中的"幼稚改革者"阶段，而且我非常强烈地确信，这场变革不会走得太远。

从本质上讲，我与现政权的分歧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我记得 1958 年派到经济所的政工干部对我的指控。他们正确地认为我是他们的意识形态的敌人。我的文章确实也有助于削弱共产主义世界观。在 1956 年革命中，我也发挥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因此，他们认为我这人不可靠也是正确的。我的许多朋友都进了监狱，有的被流放国外，有的丢掉了工作。因此，谁都无法保证他们不会一夜之间将所有的东西都收回去。从政治角度考虑，共产党在历史上只给那些一直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恢复名誉"，尽管这些人一度放弃了这一身份。*

那些决定让我回到经济所的人，并不一定就愿意放弃他们对我的看法。从我自己来说，我也不想让人们有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与那些以前开除我，但现在又请我回去的人，已经达成了一种谅解。我们双方都能接受的一种解决方法，就是对任何事情都不做解释。这是在卡达尔执政时期普遍采用的一种做法。

然而，这种粉饰太平且漠视过去的假象依然让我很是烦恼。我必须承认，对于我这样一个在以前的政治斗争中暂时受挫的人来说，这是当时唯一可以让我减少尴尬的解决方法。对于那些进入政坛的人来说，他们不可能有太多的疗伤时间。但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和科学工作者，我亲眼见证了 1958 年实施的对研究

---

* 20 世纪 50 年代流行一则笑话，说科恩被开除党籍后，还梦想有一天美军会占领匈牙利，艾森豪威尔总统会像 1919 年的米克洛什·霍尔蒂那样，骑着白马进入布达佩斯。马加什·拉科西跪着将城市钥匙交给艾森豪威尔。随后，艾森豪威尔命令说："拉科西，恢复科恩的党籍！"到 1967 年，我已经不可能产生可怜的科恩这种滑稽的想法。

自由的毁灭性打击，我也亲眼见证了弗里斯已经完全失去了谈论这件事情的道德勇气。

信任与宽容

现在我想谈一下我从同事们那里感受的信任。先不谈我在1967年前就认识的亲密朋友，比如安德拉什·纳吉（他与我同时被经济所开除，然后又在1973年同时受邀回到经济所）、朱迪特·里姆勒（我提议经济所聘用）* 以及马顿·陶尔多什（自1956年起，我们就是好朋友，他也在70年代末进入经济所）。我在这里只想谈谈我与经济所其他同事之间的关系。

我回到经济所之后，任何直接涉及政治内容的谈话，都会让我产生一种很压抑的不信任感。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对我的一次审讯中，我的一位亲密朋友向审讯者交代了我在评论他的文章时所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我迫不得已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任何一个与我交谈过的人都可能做出类似的事情。

我的同事们也意识到了这种疏远和冷淡。我曾经与英年早逝的考蒂·法尔卡什共事多年，相互之间关系不错。有一次，她满脸善意地看着我，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告诉我，雅诺什，你为什么这么不信任我们？"我们谈了一下这个问题，我力图解释让我产生这种态度的原因。我们说了一些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次谈话对我的影响。从那以后，对那些我感觉不会辜负我信任的人，我放松了一些警惕。但这种放松是一个非常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部分地还是老样子。

即使到了后来，如果我没有首先想清楚谈话对象的身份，在谈论重大政治问题的时候，我从来都不会坦陈自己的观点。我一直有种极强的自我控制能力。我根据每个人的性格、文章、言论和行为，对每个人进行评估。然后再根据这一评估分配自己的信任度，对有些人采取不信任态度，对有些人则采取信任态度。诗人阿蒂拉·约瑟夫曾经说过："不要挥霍你的信任。"[1] 我真的不能放手信任

---

* 1959年，我被"流放"到轻工业部期间，有机会可以招聘一名助手，我便让我在大学的朋友帮我推荐一名优秀学生。这样，我便认识了朱迪特·里姆勒（Judit Rimler）。她是我的第一位研究助理，后来又成了一名颇有声望的研究人员。我调动工作时，坚持让她与我一起调到新的工作岗位。

别人。

如果说我对周围的同事有过影响，尤其是对年轻人产生过影响，那也不是我的政治观对他们有影响，而是其他方面。他们从我的工作中对我有了了解，从我的谈话中知道了我的学术标准，从我的文章中明白了我的思想取向。那些思想开放的人就能从中感受到我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能随意交谈的人越来越多。几年之后，我也可以介绍一两个人进入经济所了。后来，我又被任命为一个团队的头，手下有几个归我直接指挥的年轻研究人员。雅诺什·加齐和玛利亚·拉茨科夫妇曾经是我的学生，我提议他们中可以有一人到经济所工作（当时我无法同时提供两个职位）。他们商量后，玛利亚来到了经济所与我一起工作。我在大学任教时教过的另一名学生朱迪特·绍博也进入了研究所与我一起工作。陶马什·利普塔克也推荐了一位刚从数学系毕业的大学生安德拉什·西蒙诺维奇到我这里。后来，米哈伊·洛基也成了我们团队的一员。茹饶·卡尼塔尼最早是中学的数学教师，后来成了协助一位同事的电脑操作员。当时她也找过我，想到我们团队当电脑操作员，经过不断的努力，她也成了一名经济研究人员。所有这些人都比我年轻。也有与我年龄相仿的人跟我一起工作，那就是贝洛·马尔托什，他最初也是一名数学家。不过，他并不是我们团队的成员。

当然，使科尔奈团队的所有成员团结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研究工作和相同的学术研究方法。*（我在下一章还会谈到。）同时，我们也相互支持、相互关爱。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从来就不满足于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保持一种纯粹的工作关系。在《自由人民报》工作时是这样，在经济所工作时也是这样，后来在哈佛大学教书时还是这样。或许，这并不是组织工作的最有效且最专业的办法，但这种方法可以防止人们在工作之外还保持一种上下级关系。我也没有为自己的这种习惯和规定后悔过。对我来说，温暖的人际关系、友谊和信任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科尔奈团队会在 11 点 30 分一起吃午餐，这已经成为了习惯。老实说，是我主张早一点吃饭的，我喜欢早一点去吃饭，我不喜欢在餐馆里排队等吃饭。我希望自己是餐厅里的第一批客人。我们吃饭时，总有另外几位同事和我们在一起。

---

* 当时，经济所内有很多平级的研究团队，每个团队都由一名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领头。我在这里使用的“团队”一词，具有机构组织的涵义。

午餐本身通常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我们可以从相互陪伴和畅谈中感受到快乐。

我与同事的这种特殊友谊不仅仅限于我这个研究团队中的年轻人，这种关系还扩展到了那些年里在经济所工作的其他人身上。比如陶马什·鲍尔、阿拉达·毛道拉斯、卡罗伊·阿蒂拉·绍什、伊万·马约尔、雅诺什·克勒、彼得·佩特以及加博尔·凯尔泰希和彼得·米哈伊。这还只是少数人而已。从那以后，他们所有人都在学术上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都成为了各大学的教授。在社会经济体制发生变革之后，其中有些人还进入政坛担任了要职。我跟他们认识的时候，他们都正处于思想发展的成型阶段。我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有过一系列长时间的思想交流，但与有些人的关系没那么紧密。他们中的有些人是我在大学教书时教过的学生。除了为研究所仔细阅读和评判其研究之外（我手边还有当时的阅读记录），我还与他们谈论研究工作与经济改革，当然也讨论过一些一般性的思想和道德问题。

跟团队成员和其他人的讨论以及阅读他们的文章，都让我深受启发。我从中了解了很多匈牙利经济的运行情况、经济学家的论战、匈牙利的动向以及未来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让人精神振奋的学术环境，我很高兴能身处其中。我不太清楚其他人在这个团队中收获了什么。他们说，我的文章以及我与他们的接触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我经常与他们见面，其中有些人更是定期见面，但可以理解的是，影响不影响这个话题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

一位社会学家或许可以非常专业地绘制出经济所的关系网络图。这个图中有一个中心，然后可以用箭头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连接在一起，数字可以用来表示关系的强度。这张图可以清楚地表明在不同因素影响下不同团体的组成。

有助于这一关系形成或妨碍这一关系形成的一个因素，就是人们对于数理研究方法的看法。在这个方面，匈牙利的情况有些类似于几十年前美国大学中经济系的情况，即大多数研究者都反对使用数学模型和计量经济分析。在我们经济研究所，某些人面对数学的发展几乎患上了恐惧症，他们认为数学就是一种学术花招。相反，数理方法的使用者却奇怪地团结到了一起，这与他们是否信仰马克思主义或是否同情或反感卡达尔政权无关。

与所有规模较大的组织机构一样，经济所也有几位强势人物，他们通过吸引或排挤其他人而形成自己的团队。

这些人吸引谁或排挤谁的主要决定因素，就是看其世界观或政治立场。* 在经济所，人们虽然并不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每个人心中都有政治态度。我认为，政治认同感在匈牙利知识分子中的作用大于其在西方世界的作用。

任何时候，经济所研究人员中流行的政治观点，都涵盖了宽广的政治范围。我们这里虽然没有死硬的斯大林分子，却有一些教条主义者和老派保守的共产党人。其余多数人则属于逐渐醒悟的“共产党改革派”，他们渴望现状有所变化，希望为经济注射一支剂量或大或小的市场强心剂，希望能有更多批评现实的机会。因此，他们虽然知道自己与卡达尔政权还存在本质上的联系，但他们也希望找到实现“民主化”的措施。还有一部分人则已经与共产党断绝了关系，或者从来就没有靠近过共产党，甚至有人还强烈批评执政党。

经济所的政治组成随着人员的流动而不断变化。许多人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样的变化有时也会影响到这些非正式派别的规模。在这一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基于政治信仰的非正式派别一直都存在着。如果更仔细观察则会发现，那些具有相同政治立场的人，相对于政治立场有别的人，具有更强的政治信任感。我自己也只愿意与那些不受制于政治分歧的人打交道。**

经济所虽然存在不同派别，但派别之间并没有出现阵仗。年龄较大的人和中年人（比如那个时候的我），都经历过 1956 年创伤，所以神经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自那时以来，我们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世界观，一直在反复思考这段经历。这几代知识分子的共性是，他们不会因为意识形态或政治斗争而相互诋毁。我们之间存在一种奇怪的神的休战（*treuga dei*）现象：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但希望你们也不要跟我们过不去。相互宽容，互不干扰，没有尖锐而公开的政治冲突。

如何描述这种状态呢？我们所有人都会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会做出可耻的退让。*** 如果某人性好与人争斗，那么，他会以个人身份在研究所范围之外与人争斗。如果某人对公共利益有什么看法，那么，他会以个人身份在学术著作中提

---

* 根据不同标准形成的关系网络会有部分重叠。任何人都可能与几个派别存在或紧或松的联系。

** 对我而言，这并不意味着我在相对温和的卡达尔政权后期，仍然严格坚守派别界线。我的一些朋友具有与我迥异的信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朋友。

*** 我意识到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一观点。有些思想激进的人认为，卡达尔时期的地方“和平协定”是一种无法接受的妥协，它有助于延长卡达尔政权的统治。或许，这种和平协定确实延长了卡达尔政权的统治，但确实也使人民生活更轻松一些。这一结论引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在人民的个人生活改善之前，是否期望他们要胸怀一个大的共同目标。就匈牙利而言，即是否尽快推翻现政权。

出或表明自己的观点。但是在研究所范围之内，因为害怕打破平衡而引致更大的外来的伤害(外来人会带来更严酷的控制)，所以都会相互容忍。也许我们都具有这种共同危险和共同敌人的意识，所以我们之间才出现了那个年月知识分子圈中极为罕见的相互容忍。当时，经济所的权力关系也非常有利于那些公开支持卡达尔政权并歌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我不得不说非常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挑动政治论证，也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揭发"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们放任那些思想异己者在平静中思考。*

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对经济所这个风暴海中的宁静小岛感到满意。对我而言，研究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事情，研究工作需要投入全部精力，需要最大限度地全神贯注。为了研究事业，我需要这份宁静。**

夭折的经济所改革

那个时期我经常出国旅行，有时是参加学术会议，有时是去国外讲学，但时间会稍微长一些。这样，我逐渐了解了国外的生活方式，了解了西方著名的学术中心开展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方式。我希望能将其中的某些方面移植到我们经济所来。1971 年，我与两位同事亚当·施密特和雅诺什·科瓦奇一起提出了一个改革建议。[2]尽管这份改革建议书是我们三人提出的，但其中最微妙且最具争议的部分是我提出的。

我建议在经济所研究人员的升职和发表作品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研究所应该将发表作品看成重点，尤其应该重视在海外发表作品。同时还应考虑出版著作的出版社和发表文章的杂志社的学术声誉。

这是西方学术界不言而喻的标准，***但匈牙利没有这种标准。在匈牙利，出

---

* 这里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经济所的历任所长伊什特万·弗里斯、雷热·涅尔什以及阿拉达·希波什都没有进行过政治清洗运动。相反，在陶马什·鲍尔遭到政治攻击，上级要求他们开除陶马什的时候，当时的所长涅尔什还保护了他。

** 当时，我的个人生活正处于一个危机阶段，工作单位的宁静氛围对我帮助颇大。我与泰雷兹·洛基的婚姻破裂。1970 年在耶鲁大学访学半年回到匈牙利后不久，我就与第二任妻子茹饶·达尼埃尔搬进了新公寓。

*** 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另一个极端：如果发表文章的压力太大，那么这一政策就会成为有害的政策。我会在下一章中再讨论这个问题。

版著作的门槛并不高。质量较高且内容丰富的学术著作当然可以出版，但一些几乎没有学术意义的作品也很容易与公众见面。匈牙利只有很少几位经济学家在西方出版了著作，能够在西方权威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就更少了。虽然“市场社会主义”的不成熟体系也承认，对产品质量的实际检验应该看这一产品能否在西方出口市场竞争，但这种出口检验制度并不适用于研究著作。

不仅学术著作的出版缺乏严格的国际质量检验，经济所的研究人员也能无所事事地在那里工作多年，且很少发表作品或根本就没有作品发表。一旦你进了经济所，即使门口还有比你更有才华且更具创作能力的人想取代你的位置，你也可以终身待在经济所里。

另一个问题是，用西方的标准看，许多发表过作品的人也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虽然他们不像西方大学的同行那样，要拿出一半时间用于教学，但他们出版作品的数量只相当于西方知名大学的同行发表作品的一小部分而已（这只是从量的角度来看）。

我在海外的经历并不是影响我形成上述改革提议的唯一因素，我还力图将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学术抱负传给其他人，并用我评价自己的标准来评价他人。我也喜欢在工作时间里和同事闲聊几句，但我更愿意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我见很多人花费大量时间聊天，真的很生气。我也承认，关起门来聊天或讨论可以部分抵消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缺乏公开性和言论自由的烦闷，能够帮助人们厘清自己的思想，并激发新思想的产生和促进知识的传播。但是这种谈话的前瞻性方面不可避免地与啰嗦的闲谈搅和在一起，占用了宝贵的研究时间。

经济所的管理层想引入上下班打卡制度，以规范我们的工作纪律。这种荒唐的行政管理措施没有任何用处。工作动力来自人们的内心。根据我在西方的经验，我相信许多研究工作者的工作动机与外部激励、进入研究所的条件、工作的持续性以及升职和工作单位正式或非正式认可等条件都有密切关联。因此，我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建议在激励机制、职称评定以及升职等方面进行改革。

人们对这份改革提议的接受程度并不相同。尽管还是有人在私底下表示赞同，但事实上，大多数同事并不喜欢这个方案。有些人提出，西方的杂志社和出版商，仅仅因为文章是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就会拒绝刊登或出版。（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我可以给出几个反面例证。）有的人说，西方人对东方的事情不感兴

趣。(这种说法也不准确,一篇文章是否有发表的机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章是否符合学术标准。)还有人(私下)说,他们对现行体制的批判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他们就是无法合法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倒是一个严肃的说法,我在后面一章会对此进行详细讨论。)那时候,我其实并不相信西方学术期刊的选稿机制尽善尽美。就是现在,我也是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他们的编辑工作。有时候他们也会错误地放弃一些想法独到的前沿性文章,并因此阻碍了一些重要成果的传播。当然,相反的错误也时常发生。有些基本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文章,只是因为顺应并符合学术界主流的要求,同时又采用了学术界主流的风格和方法论,因此就能通过筛选流程。然而,尽管西方学术期刊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和错误,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概率还是很大的。所以,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坚信,鼓励同事们在权威的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并没有什么不对。

讨论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反对我们改革提案的观点。即为什么要大力提倡发表文章呢?经济所的同仁们都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过影响,都以专家或顾问的身份发挥过作用,当然,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公开出版的政府文件、党的决议和法律文件中。这与改革方案中的衡量标准相比,意义或许更大一些。我们也就这一观点进行过讨论,我们认为,这种经济政治活动也值得赞扬和欣赏,但这种活动并不足以说明科研的进步。

我在上一节提到过,经济所内是以现有世界观和政治态度为标准,划分出了不同派别。改革提案无视这种存在,用另一种方式将研究人员组合在一起。很多人赞成改革方案中的这种变化,因为有些人已经在权威期刊上发表了文章,有的人则非常支持改革提案的精神,他们也非常希望将来自己的文章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 但这份改革提案也受到那些缺少才能和勤劳态度,或者胸无大志且无法适应西方学术规范的人的反对。他们不想因为发表作品而与人竞争,虽然发表文章未必是证明某人学术成就的可靠标准,但仍然是一个有用的标准。

实际上,这份改革提议还是被经济所放弃了。经济所并没有选择我们在改

---

* 在这份改革方案提出之前,包括经济所研究人员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已经拥有了让人印象深刻的发表作品的清单,后来,他们还在不断发表作品。所以,并不是在这次争论结束后的数年间,发表作品已经逐渐成为学术评价和升职的主要标准之后才开始发表文章的。

革提案中推荐的运行规范和程序，一切仍如常照旧。

另外一个需要谈及的问题是，所里的同事们如何为自己制定终身的职业发展策略。有些人（事实上相当少）认真研究了西方的学术标准，坚持不懈努力在国外发表文章，并通过自己的讲演让西方经济学同行增加对自己的认可。虽然这种做法有时候成功，但有时候没有取得成功。大多数同事还是没能加入竞争。在社会体制发生变化之后，我跟那时候的几位同事谈起了这个问题，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当时犯下了多大的错误，但他们已经永远无法弥补他们失去的时间了。

羁绊下的教学

我在第 6 章中提到过，1958 年，党的一个政工组在经济所进行过调查。当时，这个政工组的组长拉斯洛·哈伊曾经发誓说："只要我还在这里当校长，就不允许科尔奈在本校教书。"他言必行，行必果。他的继任者也遵守了他的这一决定。海外的许多著名大学都曾邀请我到他们那里执教，但几十年来，控制了匈牙利经济学高等教育的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从来没有给我提供过一席教职。我觉得党内高层一定有个决定，或者至少肯定了一个决定，即科尔奈可以从事研究，但不能让他接触年轻人。*

卡达尔政权崩溃的步伐加快之际，我收到了时任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校长乔鲍·恰基发给我的聘书，这是我收到的匈牙利大学的第一份聘书。我在回信中这样说：

> 收到您的邀请函时，我已经接受了哈佛大学的聘请。我很高兴能得到您的关注，但我还是要说，您的邀请函来得晚了点。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如果贵校早些给我发出邀请函，我不知道我的生活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我在这里只能说，在我接受哈佛大学邀请之前的 30 年里，我时时刻刻都在准备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为贵校的服务之中……在我的整个学术生涯

* 党的领导人都还记得，在 1956 年 10 月的革命中大学生发挥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他们会尽力将大学生与那些他们认为会对学生产生危险影响的学者隔离开来。1956 年革命之后受到迫害的许多人都进入匈牙利科学院的研究所工作，但没有一个人进入大学任职。

> 中，贵校这一培养匈牙利年轻经济学家的学校一直没有聘请我担任教师，既不让我拥有教学的权利和发挥学术影响力的权利，又不给我与年轻人亲密接触的机会，这真的让我非常痛苦和伤心。这对我而言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其他的教学成就和研究成果都无法弥补这一损失。[3]

虽然我没有接受这一教职，但我还是以其他方式在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从事教学工作。1968年，我被授予了荣誉教授的头衔。荣誉教授头衔虽然不能让我像全职教授那样，有权对学校事务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但也能使我偶尔在学校举办系列讲座。我连续三年挑头举办了“特别研讨班”。由于没有任何可供遵循的成例，所以我都是自己决定教什么、怎么教。每年我都会认真准备一组问题，其中大部分都是我在实际研究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我非常享受这一工作，时至今日，只要想到研讨班的成员，我心中就会充满快乐的回忆和温暖的感觉。我希望我的课程是那个死板机械的官方教程的解毒剂，我相信，让学生亲耳聆听研究人员对各种思想的讲解，让学生了解课外的某些非正统思想，对他们非常有益。我的目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很多参加过我的研讨班的学生，后来都成为了杰出的经济研究人员、教授和商界领袖。

我很看重自己与劳伊克·拉斯洛学院之间的关系。劳伊克·拉斯洛学院创立于1970年，隶属于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学院创始人兼院长阿蒂拉·奇坎将这所学院办成迥异于匈牙利其他大学的思想学术场所。学校的运行模式大量借鉴了在拉科西时代被解散的“人民大学”的传统模式，同时，也借鉴了厄特弗什罗兰大学的厄特弗什学院、巴黎的大学校以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运行模式。他在实施这些模式的同时，还创造性地做了一些创新。劳伊克学院的学生，都是从大学里精选出来的优等生，他们在劳伊克学院里接受的是普通大学课程中没有开设的当代课程。学校培养学生摆脱教材束缚的独立思考能力。这种独立性从学校请来开设讲座的人员身上就能体现出来。这些人中包括几年前还被关在监狱中的知名知识分子，以及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反对共产党体制的“民主反对派”领袖。

我在劳伊克学院开设过几次讲座。如果我正好从事某项研究，我一般非常乐意首先向这些精力集中且知识广博的听众宣讲，以测试听众的反应。

西方的多数大学都会向博士学位申请人提供必需的资格培训课程。我在第5章讨论自己的教育背景时，解释过采用苏联模式的国家不同的资格培训程序。在

匈牙利教育体系中，博士学位候选人获得博士“资格”的培养过程，不由大学提供，而是由一个特殊的中央科研资格评定委员会(TMB)提供。这个委员会要为候选人指定一名论文导师，或是类似于西方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aspirant leader)。另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东方国家的研究生不能自己选择导师，而是由中央科研资格评定委员会根据几条标准，帮助学生进行选择。其中，政治标准最为重要。*

我后来在哈佛大学担任过研究生的指导老师，但我没有在匈牙利指导过研究生。我是 1956 年拿到的候选人资格，这说明在当时的学位规定下，我已经有资格担任论文指导教师。但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中央科研资格评定委员会从来没有请我承担过这份工作。按西方大学的说法，他们从来没有委派过任何一名研究生让我辅导。

我一想到这件事就很难过。在西方的大学里，如果某位教授担任过某名学生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他就可以说“这是我的学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在匈牙利没有一个学生。不过，我听到有些经济学家说，他们自认为算我的学生，听到这种说法，让我心里略感安慰。

我怎样成为院士

遵循苏联模式的匈牙利科学院有好几个功能。我是在其下属的研究所工作，所以算是科学院的正式员工。匈牙利科学院拥有几万名工作人员。

同时，匈牙利科学院还肩负着国家科学院的传统职能，并宣称自己是国内最优秀学者组成的学术机构。然而，根据什么衡量标准说这些学者是国内最优秀的人呢？匈牙利科学院章程提出的院士遴选程序与西方著名学府大致相同。科学院的成员在经过审慎的预先评估之后，采取匿名方式投票，获得多数赞成票的人当选新院士。**但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考察这一选举程序的实际操作情况。我可以以我自己的情况为例。

细察科学院当时的章程就可以发现，科学院成员应该具备“最进步的世

---

* 两种制度都需要导师和论文负责人同意承担这个工作。

** 院士有两个级别：通讯院士和正式院士。获得较低级别的院士资格也要克服极大的障碍，即首先要有正式院士的提名和强有力的支持。第二步相对轻松一些，获得通讯院士资格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自动转为正式院士。

界观”，* 换句话说，科学院成员必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那些推荐我参加院士评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标准。** 在我的“干部履历表”中有文件表明，我已经宣布过自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时，任何一位认真读过我的文章的人，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20 世纪 70 年代初，科学院院士们第一次提出了我的院士资格问题，当时，我已经在国内外获得了一定的声誉。或许让科学院尴尬的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已经选举我为荣誉外籍院士，我还得到了其他国际学术机构的认可。再加上当时的卡达尔政权急于证明匈牙利多么文明、优雅，拥有西方式的精神生活，所以，如果一位匈牙利研究人员已经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但还不是匈牙利科学院院士，面子往哪里摆？这样，我的科学院院士身份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要详细描述一下这个选举过程，以便大家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合法的选举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负责相关学科的学部（比如我是属于负责经济学、法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第九学部）通过匿名投票，决定可以提交给院士大会讨论的候选人名单。候选人只要获得简单多数票，就可以通过这一阶段。然后再由全体院士参与的院士大会，对各部门提交的候选人名单再次进行匿名投票。院士大会的投票不过走个形式而已，一般而言，候选人都会得到压倒多数的选票。因此，真正的争夺发生在各学部决定候选人的过程中。

科学院的大多数院士都是党员。众所周知，在学部的“正式”提名大会之前，要先召开一次党员大会，党员大会要就赞同或反对某位候选人达成一致意见。由于党员在院士委员会中占了多数，所以，党员才能最终决定谁将当选院士。

1973 年，我的院士提名在第一阶段，即在学部的党员大会上就被刷了下来。我现在有一些收集的资料，其中有一份党中央相关部门为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准备的报告，报告提及 1973 年科学院大会的情况。[4] 我从这份报告中了解到一些关于我之提名的端倪。报告中有一份党员们支持哪位候选人，反对哪位候选人的说明。支持提名我的有伊什特万·弗里斯，但是大多数党员（其中包括 1956

---

* 匈牙利科学院章程的第一段第一条规定，科学院应该“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基础”从事科研活动。

** 有些人是“主动”申请院士资格，他们在院士中间游说寻求他们的推荐，然后再拼命说服其他院士为自己投票。当然也有人认为，这种自我推销的做法有些掉价，他们认为应该相信同事们会遵循职业道德进行选择。我就属于这种人。在这件事情和其他荣誉上，我都持这种看法。20 世纪 70 年代提议我为院士候选人的人，也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主动推荐了我。

年之后被禁止登上大学讲坛的拉斯洛·哈伊）都反对对我的提名。* 政治局也考虑了对我的提名，但最终“未支持”（即否决了）对我的提名。[5]

按时间，第二次选举应该在 1976 年。这一年，各种准备程序又按部就班进行。在党员大会上，反对我的院士候选人资格的党员人数，刚刚过了半数。但是，这个微弱的过半数票足以使党员大会再次拒绝对我的提名。

与往常一样，党中央的相关部门于 1975 年 10 月提交了一份关于 1976 年科学院大会准备情况的报告，其中就谈到了我的问题。这份报告提到两年前政治局的否决，并这样评论道：“情况基本没有改变。”[6] 这一次，政治局没有马上就科学院院士的提名情况做出决定，而是将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此后，事情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折。没过多久，科学院的经济学和法学学部（科学院第九学部）举行了学部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仅是党员，学部全体成员都参加了大会。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次会议将预先“决定”向科学院大会提交的候选人名单。理论上，如果每一位党员按照他们之前的决定进行投票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反对对我的提名，我是不可能在匿名投票中获得大多数选票的。但出乎我的意料，我的候选人资格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意。很显然，那些在党员大会上没有公开表态支持我的党员，现在在匿名投票的掩盖下，无视党的纪律，投了我的赞成票。除了我之外，另一位经济学家（他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也获得了必要的多数票。

但是，当时的情况较为复杂。另外还有几名受到党中央支持的经济学家，在匿名投票中获得的票数刚好是 50%。根据科学院的章程，由于他们没有获得大多数选票，所以无法获得候选人提名。

负责科学院事务的工作人员觉得这一结果有点添堵。政治上有疑点的科尔奈获得了大多数选票，两名政治上可靠的经济学家倒没有获得多数选票。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严重到不能由科学院大会或者由党的中级领导层来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提交给这个国家的最高政治机构——共产党政治局——来解决。

1976 年 1 月，政治局再次讨论了候选人提名的问题。相关人员又准备了新的报告，在会议的辩论过程中，报告提交部门陈述说，他们对我的工作进行了全

---

* 1975 年，科学院第二次考虑我的院士候选人提名事宜，党中央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米哈伊·科尔尼代斯对 1972 年我第一次获得提名时，他们得到的对我之研究工作的评价进行了回顾。我这里引用一段他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第一次提名他为候选人时，我们听到了关于这个人的相互矛盾的说法。有人说他专业上还存在不足，根本达不到标准，而且，他的研究工作不切合实际。同时，他们还认为他在政治上也不太可靠。”（Mol M-KS 288. f. 5/682. 省略。第 3 页。会议纪要）

面调查，这一次他们的说法对我有利。[7]最后，雅诺什·卡达尔发表了以下看法（我逐字逐句引用了会议纪要）：

> 就这些变化而言，我认为可以接受科尔奈为院士，因为这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大。虽然很难进行比较，但我还是要说，我们并不是在谈论党内任职人选或是入党问题，而是讨论科学院的问题。如果某人的学术著作是在实实在在地讨论问题，哪怕他略微有点政治问题，他也可以成为具有创造力的、有用的科学院院士。所以，虽然科尔奈没有达到老共产党员的严格的意识形态标准，但这并不是拒绝接受他的理由。[8]

这样，这件事情最终确定下来，我的院士资格可以按照正常程序评定了。

但党中央仍然觉得在这件事情上要有平衡。科学院迫于上级的压力，另外两名刚好只有50%赞成票的学者，也被列入院士大会的候选人名单。因为有三位可靠人士与科尔奈一起加入了科学院院士队伍，所以满足了党中央的平衡要求。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1976年，四名经济学家成了科学院的通讯院士。

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科学院崇高的匿名投票和那些具有法律效应的章程保证的科学院的自主权。这一选举过程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一样，对学术成就的评估中混杂着行使权力的欲望。根据政治标准来选拔院士在科学院的人员构成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一结果至今仍然能够感受到。

我的情况就像美国内阁就某位教授能否成为国家科学院成员或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展开争论，最后由总统拍板决定一样，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程序。

这件事情不仅说明科学院的独立自主性已经大大削弱，而且还反映了另一个重要现象：卡达尔政权愿意在文化政策上做出某种让步。他和他的手下并不害怕在文化政策上偶尔做一点妥协。我被科学院“录取”就是这种妥协的表现。如果有些生有反骨的党员，想借着匿名投票的掩护表达自己的看法，那就遂他们所愿吧。同时，他们也想借此保证领导权仍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如果这种妥协是他们在“自主”机构内部实现其政治意愿必须满足的形式上的条件，他们得到的将是大多数人忠实地紧跟党的路线。

院士的特权

在当时的体制下，国家科学院院士属于特权阶层。他们拥有极高的工资收

入，还有其他很多特权。

在苏联，拥有院士头衔的人，其级别和声望更高于匈牙利的院士。我获得院士头衔之后不久，就收到了苏联科学院邀我访问莫斯科的邀请函。我的一些苏联朋友了解我的研究，也希望和我见面，所以向苏联科学院推荐了我。我到达莫斯科后，没有人来机场接我，我费了一些周折才找到了落脚的宾馆。第二天，宾馆电话铃响了，苏联科学院的国际部打电话向我致歉。昨天，他们一直以为我只是一名“科学博士”，今天，他们才听说我已当选为院士了。他们因为没有派车到机场接我而请我谅解。此后，苏联科学院为我配了一辆专车和司机，供我在莫斯科随意使用。

院士头衔在匈牙利很有价值。在我当选院士前的若干年，我们家便从一套较小的公寓搬进一套更为宽敞的公寓。公寓的条件很好，但就是没有电话。现在的年轻人整天手机不离手，同时，还有很多相互竞争的电信企业用各种手段诱使他们更多地使用电话。所以，年轻人很难想象在那个年月里，花费数年时间排队等着安装一部电话意味着什么。有时候，个人关系也会发挥一点作用。1975 年我搬家后，我向经济所的新所长雷热·涅尔什请求，是否可以为我安装一部电话。来经济所之前，他曾经是一位大权在握的党委书记，从事经济工作的每个人都唯他马首是瞻。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熟悉这类事情的专家，并征询了他在邮电局熟人的意见，然后给了我一个建议。他说，对于我而言，现在这个时候，跳过排队等待安装电话的人群优先安装电话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我最好等一下，等再提升一级并成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之后再来申请，事情就简单了。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在我当选为科学院院士之后，雷热·涅尔什又打了一个电话，几天后，电话局的技术人员就到我家中为我装了电话。

这些特权让我陷入了道德困境。我知道，很多著名的研究人员和知识分子都没有我的这些福利，这让我非常不安。* 我也不认为我所获得的这些福利是用

---

* 在与西方同行交谈的时候，我总是发现他们对院士的物质特权有非常严重的误解。他们多数人都相信，根据西方的标准来衡量，院士的生活水平极高。这肯定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即使在提高福利待遇之后，院士的工资与他们相比，仍然只及他们的一部分。匈牙利为学者和科学家做研究提供的宾馆，一般也就是西方二星或三星旅店的标准。西方的教授们完全负担得起更为奢华的住宿条件。虽然西方的教授享受不到公车到机场接送的待遇，但他们可以没有任何麻烦地自己找到出租车，而且也有能力支付出租车费。更别说他们完全不用为了免于排队数年安装一部家庭电话而被迫走后门。

院士的特权与社会主义制度下其他特权阶级相同：他们享受到的物质特权，只是相比较于研究人员的较低生活水平而言。就我而言，学术地位提高给我带来的最大益处是，我出国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有了放松（尽管没有完全放松这种限制）。

卑鄙的方式取得的。那些努力使我当选为院士的同事们从心里赞赏我的工作。我觉得我可以平静地接受随匈牙利科学院院士身份而来的这些特权。

注 释

[1] 引自阿蒂拉·约瑟夫的诗《安慰》(Vigasz, 1933)。József, 2003, p. 390。

[2] Kornai, Kovács, and Schmidt, 1969.

[3] 这封信的复本我一直保存在文件档案中。

[4] 正是蒂博尔·胡萨尔提醒我注意到从哪些资料入手了解我当选院士的全过程:MOL M-KS 288. f. 36/1. ő. e. p. 9。

[5] MOL M-KS 288. f. 5/675. ő. e. p. 10.

[6] MOL M-KS 288. f. 5/675. ő. e. p. 10.

[7] MOL M-KS 288. f. 5/682. ő. e. p. 3.

[8] MOL M-KS 288. f. 5/682. ő. e. p. 7.

12. 探索与准备：1971—1976 年

《突进增长与和谐增长》

《非价格管制》

1971 年，我的著作《反均衡论》出版。在其后的六七年间，阅读、讨论、学术研究和旅游，再加上以房屋消费者和建筑者的身份对经济进行直接观察等，都给了我许多学术上的启发。现在回首那段时间，可以说所有这些活动都对我完成 1976 年开始的社会主义经济综合分析产生了影响。这一阶段的许多经历都将影响我的余生，并在我后来的大部分研究工作中留下印记。当然，能够在若干年后撰写的传记中将这段时间称为准备时间，这仅仅是一种后见之明。甚至在 1971 年的时候，我依然没有意识到我将写一部专门研究短缺经济的书。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目的之一是自我反省，总结经验，阐明在经济学研究中这一创造性过程是如何发展的，认识和理解是如何深化或进入死胡同而停滞不前的。为了这一目的，我会将各种学术事件与后来的著作一一对应，谈谈两者之间的联系。

与本书其他部分不同，我在本章想要叙述的内容并非按照逻辑顺序安排。将各种相继发生或同时出现的事件联系起来的凝聚力是最终的结果，我在 1980 年完成的著作就是这一最终结果。在那些年，匈牙利经济发生了几个重要的事件。1968 年，人们满腔热情地开始改革，然而这一改革只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原因在于，反对改革的政治力量暂时在政治较量中获胜；在某些方面，改革甚至出现了倒退。同样，早期对学术和意识形态的限制也开始死灰复燃。当然，这不可避免地要直接影响到我，加上其他方面的触动，这些都对我的思想产生了持续的冲击。

经济增长：强制增长还是和谐增长

1971 年，荷兰教授扬·丁伯根邀请我到鹿特丹大学的德·弗里斯论坛发表

演讲。丁伯根教授曾与挪威人拉格纳·弗里希(Ragar Frisch)共同获得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伟大人物之一。他拥有超乎常人的渊博知识,独特而新颖的思维方式,并且为人朴素和谦逊,待人热诚而善良。或许我从他身上发现的唯一的人性弱点就是,他近乎天真地坚信其他人也像他本人一样理性、诚实和无私。

与以往在其他场合一样,我还是对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感到紧张,我觉得自己应该提出一个新的演讲主题。在此之前很长时间,我一直研究长期计划的可能性,并且已经参与过关于各种增长战略的几次辩论。因此,我把参加在荷兰举办的这次论坛所选择的演讲主题,确定为增长理论。[1]

我的演讲以这样一个类比开始:"一位男士上身穿着用料考究的衬衫,系着精致的领带,穿着讲究的夹克衫,下身却穿着一条破旧的、勉强可以遮羞的裤子,脚上蹬着一双鞋底已经破洞的鞋子,这种装扮会给人留下不和谐的印象。"[2]同样,一个国家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如果不均衡,也会给人以不和谐的印象。我在演讲中批评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这种增长理论在创造成绩的同时产生了巨大的问题:强制增长所产生的比例失调和发展不和谐。在我的演讲题目中,我在增长之前的定语上选择了英语单词"rush"(突进的),这一形容词或许比"forced"(强制的)更为贴切。匈牙利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以最大限度进行突进式增长。这种突进式增长是以其他方面的落后为代价的,其中包括人民的生活水平;建筑、机器设备和道路等国家资产的维护;医疗服务和教育体系;环境保护;应对艰难时期所需的充足物资储备等。

这次演讲的讲稿编辑成书出版时,题目就叫做《突进增长与和谐增长》,以此对阿尔伯特·赫希曼和保罗·斯特里滕提倡的非均衡增长提出异议,这两人的观点在当时是受到广泛关注的。[3]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瓶颈因素、劣势及非均衡条件可以成为明显的优势,原因在于这些因素促使一个怠惰的社会重建成合乎比例的均衡的社会。然而,惨痛的生活经历告诉我,这种比例失调所造成的恶果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好处。* 社会主义经济中各种计划所产生的问题,并不是计划会导致社会惰性,相反,计划会引起宏观经济层面的过度投资,而

---

* 我的书已经被译成多种语言,其中也包括中文。不久前我再次访问中国时,谈话中重新提及这本书中的相关分析。与过快、过热的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往往是可怕的后果和社会损失,而且一边倒的"增长狂热"令人触目惊心;对于和谐增长的强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适时。

且这种投资的步伐还会被迫不断加快。我的研究触及了扭曲且激进的增长与广泛存在的短缺两者之间的联系，当然，我还没有开始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对被动增长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我与其他几位学者合作，利用匈牙利的统计数据，建立并应用了动态仿真模型。当时我刚刚知道，计算机的仿真技术是一种灵活的方法，非常适合用于分析。有一种我们称为“计划探测”的计算方法，我们利用它对不和谐增长的恶果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描画——结果表明，这一恶果显然是因为忽视基础设施而造成的。*

剑桥大学的邀请

1971 年，我在日内瓦参加一次会议时再次遇到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1963 年，我第一次去英国时，就与他相识。**在私下交谈中，他说他非常希望能够邀请我到剑桥大学担任终身教职。当时，剑桥大学两个派别之间关系紧张，对立不断升级。一派是以弗兰克·哈恩为首的数理经济学派，另一派的核心成员则是琼·罗宾逊和我的匈牙利同胞尼古拉斯·卡尔多(后称卡尔多男爵)。在向我发出邀请之前，斯通试探了同事们对我到剑桥大学工作的态度。他相信，两派都希望看到我在剑桥大学任教，这可能有助于缓解当时的紧张局面。他并非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学院的名义邀请我担任剑桥大学的教授。

剑桥大学！这里可是经济学的重镇，凯恩斯曾在这里工作和授课。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亲身体验到西方的学术世界。拥有数百年历史的优美校园，繁花似锦的公园，安详平静的河岸，所有这一切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这是我移居国外的第二次机会，现在的形势显然不同于 1956—1957 年的社会动荡期和由此引

---

* 与我在这项工作中合作的人包括，我的妻子茹饶·达尼埃尔、安娜·约纳什和贝洛·马尔托什。

** 斯通并非象牙塔中拘泥于抽象理论的学者，他对能够直接指导实践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率领的团队设计了获得联合国认可的经济核算和统计体系，从而确保了国际经济统计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几年后，斯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性格让他在学术工作和享受日常生活乐趣中游刃有余。他的衣着非常优雅，喜欢美食和美酒。他担任许多社会职务，而最让他引以为傲的则是国王学院“葡萄酒委员会”主席一职。这一委员会负责决定学校酒窖购买的酒类。

发的移民潮。15 年过去了，现在，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之一邀请我担任终身教授。

我要求斯通给我几天时间考虑，我要和当时也在参会的妻子商量一下。几天后，我向斯通表示，非常感谢他给予我的这一殊荣，但我还是婉拒了他的邀请。我将在后面的部分做出更详细的解释，描述我在移民国外和留在匈牙利之间的两难选择。在此提到这一事件，只是按照时间顺序此事发生在这个节点上。

腰部以上打了石膏——凯恩斯和赫希曼

1972 年，我的双肩越来越频繁地脱臼，外科医生看后认为，只有通过外科手术进行矫正，才能摆脱关节错位的痛苦。所以，当年我做了两次手术。手术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一直打着石膏，这极大地限制了我的活动。* 但是，我把这段时间看作一个绝好的读书机会。我在医院住的十人病房非常拥挤，甚至连一把椅子都没有。当我能借助拐杖站起来时，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走廊里读书。后来，我回到家里做进一步康复休养。到医院和家里来看望我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我手里拿的是凯恩斯的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而不是通俗的犯罪小说。

很多年以前，也就是 1957—1958 年间，我在自学“大学课程”时，已经学习了宏观经济学的知识，但是后来，我逐渐把这些知识遗忘了。当我重读凯恩斯的著作时，我意识到，匈牙利的短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凯恩斯非均衡理论的现实写照。对凯恩斯而言，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可以通过失业这一明显的现象得以凸显和证实。而在我的分析中，短缺综合征从相反的角度表明了这一问题。凯恩斯描述的经济状况中，买方和卖方的交易受制于需求。生产者在某一给定的价格水平上想要生产更多，但是需求不足。我试图描述和解释的是这一情况的现实镜像，即买方和卖方的交易受供给的制约，消费者想要在既定价格水平下购买更多，但供给不足。

---

* 手术后，我看上去十分滑稽。当我到家时，一个孩子在电梯里见到我的样子后，笑得流出了眼泪。我的一只胳膊水平伸到身体前面，然后在肘部弯曲。我的儿子加博尔以幽默感闻名，他说我伸出的那只胳膊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挂钩，并且真的挂上一条裤子看看整体效果如何。

当时，另一本让我印象深刻的著作是阿尔伯特·赫希曼的非常精彩的小册子《退出、呼吁和忠诚》。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理解这本书的基本观点。一名消费者对某家餐馆的服务一次又一次地表示不满。他该怎么办呢？他可以选择向经理投诉（发出声音），或者去另一家餐馆（退出）。如果他想要做后一种选择，那么他与这家自己最喜欢的餐馆之间的长期关系（忠诚），有可能会让他放弃这种想法。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消费者对一家经常光顾的商店不满，股东对某只股票的表现不满，或者学生和家庭对学校不满。如果他们因此而投诉，并就这一问题采取行动的话，有人会注意吗？发出声音的人会不会有风险？退出会得到什么？有退出的可能吗？正是赫希曼提出的这些发人深省的问题让我关注短缺经济问题。如果菲亚特或者雪铁龙汽车的很多车主投诉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这当然会引起公司管理部门的关注，如果这些车主不发一言就转而购买丰田或者大众汽车，就会导致菲亚特公司和雪铁龙公司出现更大的恐慌。但是，特拉贝特和斯柯达的工厂会关心上面这些车主的投诉吗？如果这两个品牌的汽车购买者要排几年的队才能买到车，那么汽车厂家当然不会害怕。在长期的短缺经济中，根本不存在有效的声音或者退出威胁。如果你不喜欢，你只能忍受。

赫希曼强调了呼吁和退出作为信号的功能，并且在幸运的情况下，得到反馈。如果这一机制运转良好，信号会让经济形势向好的方向转变。只有在这两个信号都能自由发挥有效作用时，一个系统或者子系统才能有效运转。

赫希曼的思想不仅仅适用于经济范畴。他本人也提到过在斯大林体制下共产党员遭受的迫害。他们因为害怕受到打击报复，不能就实质问题发表意见，他们也不能主动退出共产党。反馈机制的破坏导致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僵化和逐渐变质。赫希曼的观点还可以用于论证移民问题上的两难境地。人们是应该留在祖国并发出不满的声音，还是应该选择退出（离开祖国）以表示抗议？

那时，我只是通过阿尔伯特·赫希曼的著作对他略有了解。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十年以后，当时他邀请我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经历，在这段时间，我接触到他独特的思维方式，与主流趋势保持距离的研究态度，令人炫目的广博知识，以及对文学的精通。

尽管我在手术之后从肩部到腰部都打着石膏，但我还是参加了母亲 80 岁生日的家庭聚会。我母亲蒙约一直期待着这一天，她非常兴奋，同时又有点紧张，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活到这一天。在当天拍摄的照片中，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满怀

爱意地围绕在她的身旁。几个月以后，她在睡梦中安静地离开，再也没有醒来。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们一起度过许多快乐的时光，并且每天都要通电话。对我来说，不能再听到她那愉快的声音是一个无法形容的损失。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她在说起给家里人治病的医学教授时，总是喜欢称他们为“著名教授”。她将教授这一称谓看得比国家给予人民的任何财富和地位都重要得多。她没有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子也成为教授，这是多么大的遗憾！她不能到美国来看我们，又是多么大的遗憾！如果她能在自己家隔壁最喜欢的咖啡店里面，与一群老友一边喝咖啡，一边细述她的见闻，那又将是多么的骄傲啊。

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

我从手术中康复以后，和妻子到美国游历了一年。* 我们的第一站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学期。** 在那里，我感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观察经济学专业性格各异的年轻学生。在我的课堂上，有些欧洲学生深入思考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缺陷，他们对以建立福利国家为方向的完善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非常欢迎。这一系列思想激发了这几位学生对计划经济的兴趣。同时，他们尤其感兴趣的是，我这个身处计划经济之中的人研究计划经济所得的印象。我与其中两名学生建立了个人友谊，他们后来都在各自的领域大获成功，这让我非常欣慰。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以安德拉什·帕潘德里欧为首的社会党领导下，卢卡·卡策莉成为希腊计划办公室的主任，现在，她担任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发展中心主任。另一个学生凯末尔·德尔维什曾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后被土耳其召回国，处理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在非常艰难的几年时间里，他临危受命，成为土耳其社会民主财政部长。现在，他在联合国最大的扶贫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担任署长。长期以来，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由于各种原因，冲突不断。然而在超越国家概念的学术世界中，一个希腊学生和

---

* 我在上文曾向读者保证，绝不过多叙述我的旅行，我将遵守这一承诺。虽然我在这里和本书的其他地方提到曾游历过的国外某些地方，但是我的描述不是从游客的角度，而是严格限定为学术和政治经历上的叙述。

** 我的同胞理查德·匡特(Richard Quandt)教授曾撰写过许多宏观经济学名著，当我回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生活时，他的热诚好客，他给予我的那些温暖友爱的帮助，都让我既感激又感动。

一个土耳其学生以及两位学生的妻子之间，却能保持真正的友谊，这让我们感到安慰。

卡策莉、德尔维什和其他许多抱有同样思想的学生，很赞同左派所提出的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经济改革，但是他们不希望抛弃资本主义制度，或者用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他们之所以拒绝接受革命思想，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然而，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中还有另一派，他们自称“激进经济学家”。他们刻苦钻研《资本论》——不过或许没有我在 25 年前研究《资本论》那样彻底，他们知道我的身份，了解我的背景，清楚我在课堂上对现存社会主义制度有关问题的讨论。* 然而，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到我的课堂上来听我讲课。不过，他们有一次曾邀请我参加关于自我修养的课外聚会。我认为他们是天真而充满善意的年轻人，拥有真诚的信仰。

我不仅拥有在东欧的生活经历。1968 年，我在美国新左派运动的发源地加利福尼亚停留了一段时间，并逐渐了解了新左派的观点。我们曾经历过 1968 年的巴黎学生暴动，我在包括布达佩斯在内的许多欧洲城市都遇见过“新左派分子”。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和他们辩论，有时候我很有耐心，但有的时候我也很生气。他们抗议“电冰箱社会主义”，这让我十分苦恼。因为当时匈牙利的短缺经济略有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刚刚有所提高，消费者终于能够买到以前不可能买到的商品。按照我的观点，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向更大范围的市场经济前进的步伐，并非是对崇高理想的背叛，而是常识的胜利。

大概那个时候，我偶然读到瑞典经济学家埃萨·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的新作《新左派政治经济学：一个局外人的看法》。这本书简练而诙谐地总结了新左派的观点，以及与新左派观点相对立的自由派观点。

在遇到普林斯顿大学那帮年轻的“激进经济学家”之前，我曾试图与他们展开辩论，但是没有成功。他们强调，问题的关键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缺陷，而是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没有正确应用社会主义制度。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正确应用社会主义制度。与普林斯顿大学和发达国家的许多新左派分子的接触，让我确信我在本书前几章中的自我反省：信仰比理性思考的力量更为强大。那

---

* 许多东欧知识分子以嘲弄的口吻使用“现存”这一形容词。而我认为该词是一种恰当的表述，愿意不加引号地使用该词。社会主义是存在的，我们讨论的是它的现状，而非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状态。

些抱有坚定信仰的人，通常需要经历重大事件，而且是一种足以动摇他们以往信念基础的剧烈震动，才能彻底转变他们的观念。

在普林斯顿大学访学的半年期间，我的三个孩子加博尔、朱迪特和安德拉什轮流来美国陪伴我们。作为老师，我知道美国、希腊或土耳其学生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作为父母，我们也看到了三个匈牙利年轻人第一次接触美国生活的情景。每个孩子的行为方式不同，经历的事情也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与其他游客一样，他们惊叹于纽约的摩天大楼、画廊和普林斯顿大学优美的校园。作为一个短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者，我在这里只想谈谈他们种种反应中的一点，而这一点非常具有典型特征。在他们刚到美国的前几天，面对匈牙利从未见过的食品和软饮料，孩子们吃相生猛。他们中的一个难以抗拒冰激凌和一种叫佩珀博士的饮料，另一个则嘴里塞满玉米片，还有一个整天坐在电视机前，惊奇地看着无数的电视频道播放的无穷多的节目，为摇滚乐和著名的音乐家而疯狂。他们也想象不到自己甚至能听到其中某些音乐家的现场音乐会。安德拉什和朱迪特在普林斯顿的高中上了几个星期的课，加博尔在耶鲁大学度过了几个星期。他们最珍视的是美国学校为学生提供的多种选择，这一点远远超过了他们在匈牙利学校的经历。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第一次体验，使他们三个人受到了极大震撼，以至于后来他们回到匈牙利的时候，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再次适应匈牙利的生活。他们长大之后，这一次的美国之行对他们的思想影响非常强烈。今天，他们和他们的父母都相信，第一次到美国的经历，帮助他们开拓了思想，有助于他们建立起热爱自由的价值观。

对 1972 年我在普林斯顿的这段时光，我还要补充一段小插曲。1974 年，在我接到剑桥大学的邀请时，普林斯顿大学也向我发出邀请，请我担任该校的全职教授。[4]两所大学就连环境都如此相似，普林斯顿大学校园也拥有像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样让人回味无穷的建筑和花园。因此这一邀请对我的吸引力很大，但我仍然再次谢绝了他们的邀请。

继续在斯坦福大学和华盛顿大学访学

1972—1973 学年的下半个学期，我们是在斯坦福大学度过的。短短的几个月大大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我们和肯尼思·阿罗、艾伦·曼恩和杰姬·曼恩

建立了亲密关系，与 1970 年在耶鲁有过一面之缘的蒂博尔·西托夫斯基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的关系，也更进了一步。这段日子，我们的关系已经从学术关系发展成了温暖而牢固的友谊。

蒂博尔在匈牙利出生和长大。他的父亲是匈牙利公共生活和商界首屈一指的人物，曾经担任过匈牙利外交部长和国内最大的商业银行行长等职务。他的父亲思想非常保守，蒂博尔虽然尊重父母，但是父子两人很快在世界观上产生了分歧。蒂博尔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同情穷人和弱势群体，尤其关注那些最落后国家的发展情况，并拥护改善这些群体和国家状况的经济政策。

在我们成为挚友之前，蒂博尔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他有着良好的修养，谈吐优雅，并且精通欧美文化。有一次，我们说起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比如他们虽然生活富裕，却不能真正享受生活：比如他们很少去剧院或者听音乐会，比如他们喜欢吃“快餐食品”而不是更美味和健康的食物。这样的谈话虽然只有几次，但是几年后，蒂博尔将这些观察结果变成科学的统计数据，并以此为基础写成一本非常好看的书，书名就叫《无趣的经济》。*

遗憾的是，我们在 1973 年的谈话并未涉及市场运行的分析。在我完成《短缺经济学》一书几年之后，我才发现我们的观点有重要的交集。我们两人都在研究买方卖方之间的地位不对称问题。（这与通常的研究方法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倾向于将交易双方对称地看作对方的镜像。）西托夫斯基在早期的研究中，通过区分*价格接受者*和*价格制定者*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和采取的不同行动，阐明了这种买卖双方间的不对称关系。1973 年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蒂博尔已经将这种区别引入经济学分析，他出于谦虚，所以没有提过，这也是我们讨论中没有涉及这一话题的原因。

在这一学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和妻子到华盛顿游览了一个月。此前很长一段时间，许多东欧人相继来到这座城市的国际金融机构担任要职。据我所知，我是唯一一个早在 1968 年便在世界银行研究部门工作的东欧经济学者。这项工作要求我与被共产党国家打上了帝国主义烙印的这一部门进行开放式合作。我为世界银行撰写的两篇研究报告都得以发表。我还公开宣称，自己是受世界银行的委托完成这两篇报告的。

---

* 这本书似乎有着某种先见之明，在它 1976 年出版后的几十年间，美国人一直在克服书中发现的当时美国社会存在的消费扭曲现象。

“水门事件”爆发的时候，我恰好在华盛顿。在那段时间里，我已经非常熟悉美国的国内事务。甚至在此事件爆发之前，《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就对我产生了强烈影响。在这些报纸上，基于可靠信息发表的匿名评论，以简练和清晰的逻辑表述的自由主义观点，切合我的心意。专栏和评论文章中公开的辩论和针锋相对的观点，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主要由私人赞助的公共广播系统、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也让我叹服，其中著名的一档节目叫做《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刻》(MacNeil/lLehrer News Hour)，节目通常会就某一新闻话题展开辩论。如果主题与国内政治有关，那么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代表将在节目中并肩而坐，表达他们的观点。如果主题和印巴冲突有关，那么印度和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将成为节目嘉宾。观众可以听到所有对立的观点，对手之间也以文明的方式展开辩论。主持辩论的人并不发表意见，他只是抛出所有的敏感问题。我从这些每日新闻事件的评论中，了解到了言论自由和辩论文明的真正涵义。对我而言，这就是我接受的所有民主教育。*

因此，“水门事件”发生时，我已经了解了美国的新闻自由是如何运作的。但是，即使在这个新闻自由已经与文明社会共生几百年的国家里，当一份日报抓住阿喀琉斯之踵，揭露了一位不受欢迎的总统是如何玩弄权力和自由时，这一事件仍然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华盛顿邮报》像警犬一样，紧追细节不放，终于成功披露了事件的真相。但在匈牙利国内，官方评论员和消息闭塞的独立知识分子坚持认为，尼克松是因为在对待中国和苏联的问题上，放松了美国的强硬立场，因而遭到极端反对派的猛烈攻击。从另一方面来看，在某种程度上，我能够从事件发生地看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美国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对尼克松的攻击并非来自他的反对分子。那些希望尼克松下台的人，只是想极力挽救美国的民主和人权制度，担心这些制度在尼克松手中毁于一旦。尼克松是一位强势而疯狂追求权力的总统，他怀疑每一个人，他使用的手段常常踩到法律的边线。他们攻击尼克松，不仅是因为他在选举前的非法行为，而且也包括他后来尝试隐藏证据，并且鼓动事件的参与者和证人作伪证，掩盖他的罪行。我们坐在电

---

* 我没有读过小报，也从不看那些铺天盖地、毫无价值的电视节目。然而，我全盘接受美国新闻界和电视界的精髓以及他们高水平的新闻报道。很快我就发现，媒体的两个极端出现融合。新闻自由允许人们就政府日常事务发表高水平的演讲，进行猛烈的抨击，但是它同时打开了文化垃圾的闸门。不幸的是，这两种新闻是相伴而生的。当出版自由与市场经济和商业自由联系起来时，文化垃圾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无疑为人们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视机前，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国会的调查和证人的证言就像惊险小说一样刺激。

很长时间以后，“水门事件”尘埃落定，我们也早已离开美国。回国后，我们最终满意地听到尼克松下台的消息。

自主管制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反均衡论》出版之后，我和我的同事贝洛·马尔托什、安德拉什·西蒙诺维奇、茹饶·卡皮塔尼合作，运用数学模型来对书中的某些观点进行验证。* 1973 年，我和贝洛·马尔托什就这一主题合作，完成了《经济系统的自主控制》一文，该文以英文发表在 1973 年的《计量经济学》上。[5]

我们以人体神经系统作比喻，提出了经济学中的自主控制理论。从人体的神经系统看，中枢神经系统负责高级的控制工作，但是简单任务如呼吸、消化和血液循环等，则由心脏、肺部、胃肠和肾脏自动完成，这些器官本身也受自主神经系统的控制（在匈牙利语和其他语言中，确切的说法是“植物神经系统”）。经济系统中的劳动分工与此类似，许多具有重复性以及可以自主控制的任务，都是由非常简单的机制完成的。

文章首先概述了上述观点，然后给出具体例子并用数学形式对这些例子进行解释：即根据库存水平信号对经济进行控制。例如，一家超市不能等到商品供不应求或供大于求时才提高或降低商品的价格，或者在利润率上升或下降之后再下订单补充库存。只要监控存货水平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某种商品库存下降，那么就要再下订单预定。如果库存高于正常水平，那么要等到库存水平下降到正常水平后，再下订单补充新的库存，依此类推。商业领域的通常做法是，通过观察存货水平的升降，就可以让顾客获得稳定的供给，完全不必依靠价格信号。

我们研究了各种类型的信号。另一个重要的非价格信号就是订单的存量以及相关信息，即等待提货的队伍长度。每一种队列都有一个平均值，即“正常的”

---

* 在这一部分，我特意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原因在于我讲述的观点属于整个研究团队。在安德拉什·西蒙诺维奇写于 2003 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将这里阐述的研究趋势称为“匈牙利控制理论流派”。

长度。如果队列长度超过正常长度，就需要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提供更多的服务。如果队列长度非常短，那么就有必要重新配置生产资源，将资源用于那些等候队列更长的产品生产。*

我们可以从这些观察中得到种种结论。

许多作者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描述，让人们以为中央政府手中集中了所有的调控功能。这一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即使一个系统属于极端中央集权控制，但通过刚才提到的各种自主控制体制，许多过程仍然是分散控制的。

然而，这种自动分散机制并不能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它也不能推动技术发展，满足人们对新产品的需求。经济机制中推动技术进步和新产品研制的控制功能是价格和激励，价格反映了商品的相对稀缺性，激励是人们对价格、成本和利润作出的反应。自动控制仅仅能够协调人们已经习惯采用的技术、现存的投入产出和供求组合。你可以认为，它只能以保守方式提供基本的生产协调。它只能保证早期模式的重复和再生产，除此以外别无其他。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有限的经济运行方式。

这一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生存能力”。**我们的研究目的在于，了解社会主义制度在扭曲了价格和激励机制并存在缺陷的前提下，却能继续运行至今的原因。（请允许我先谈谈应该在后文讲述的社会主义制度变成资本主义制度之后，民众乃至专家都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崩溃的原因是它“不能运转”了。这种说法虽然看似正确，却站不住脚。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进程自始至终都在“运转”。人们照常上班，商店正常营业，学校继续上课，医院收治病人，等等。只是这一制度没有很好地运转。制度的功能被削弱，拥护者失去信心，制度不再能够抵抗外界的压力，我们通过认真分析可以发现，还有其他许多导致制度崩溃的因素。但是，这一制度最终仍能满足基本的生存下去的条件。）这是为什么？在这里，仅仅分析中央计划指令或者专制统治的压制力并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自主控制给出了重要的答案。

虽然我们在这里将注意力放到社会主义经济上，但是自主控制思想绝不仅限于社会主义经济领域。所有的经济制度中都存在自主控制：它为所有经济制

---

* 我在《短缺经济学》中提到过另一种值得注意的非价格信息：“灾难”信号。人们在做出一些决定时总是向后推迟，直到有了大的麻烦，并且确定灾难随即降临后，才会采取行动。

** 效率和最优性是以生存能力为条件的，但是这一表述不可以颠倒。一个既无效率也无最优性的系统也可以具有生存能力。

度提供了大部分原始的基本控制功能。

在设计某些模型时，我们的出发点是，经济运行中某个基本进程的控制，有些类似于家庭中央供热系统的控制机制。人们可以通过调温器设定想要达到的平均温度。我们设此温度为标准温度。如果房间的实际温度高于标准温度，那么加热开关会关闭，室温下降；如果实际温度低于标准温度，那么加热开关启动，室温升高。这一操作过程可以称为标准控制。我们看到，在经济领域中，有许多这种进程是由这类机制控制的（在社会的非经济领域中，这种进程也切实存在）。我们不研究标准如何设定的问题，只研究标准一旦设定后，标准控制的可行性。

足够的经验表明，标准确实存在，并且，社会使用各种方法让异化的个人和组织回归或者接近标准。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对越线或者不按照标准行动的人尤其不能容忍。但是我们相信，这种现象在其他制度中同样存在，或许更为普遍，只不过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而已。*

我们的这些成果首先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后来随着内容的扩充，于 1981 年出版了专著，书名是《非价格控制》。[6]因此，我有必要总结一下我对这项研究结果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反思结果。我们并不是不满足于发表研究成果的学术出版物之声望。这些期刊都是高等级刊物，出版商也是享有盛誉的诺斯—荷兰德出版社，该书还被收入著名的“绿皮书系列”**丛书。[7]然而，我不得不说，我刚刚开始这一系列研究的时候，我的期望远远超过了现在的情况。***

我推测以下几个原因导致我的期望没有变成现实。第一，从事政治和社会经济体系比较研究的经济学家，对包含某种意识形态或政治的内容更有兴趣，或者至少愿意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何种政治立场，市场与中央计划，价格与指令，集中与分散，都是真正让人兴奋的主题。对苏联问题研究专家或者专门研究东欧或中国的经济学家来说，这些体制中的共有现象引不起他们的兴趣。**** 这种

---

* 还存在另外一种自主控制机制，在这种机制中，观察所得的变量只能在制度容忍的上限和下限之间运动。法籍波兰裔研究者伊丽娜·格罗斯菲尔德设计了在容忍限度内运行体制的数理模型。这一体制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且广泛存在于政治和社会行为控制领域。

** 这本书是该系列丛书经济分析类的第 133 种。

*** 谈到这些期望，以及它们是如何实现的时候，我必须重新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我不知道团队的其他成员是否认同我的观点。

**** 他们中的很多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可能就被我们研究中所使用的数学模型吓跑了。相反，其他经济学家愿意读依据数学模型所写的文章；然而，他们也反感我们的文章。下文我马上会讨论，为什么这些人将我们采用的独特的数学方法拒之门外。

解释尤其可以用于那些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和外部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他们希望看到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缺陷的模型（我在其他著作中建立过这些模型），而不想看到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尽管存在明显的功能失常却仍能存活的模型。

现在，让我们看看另外一类经济学家：理论经济学家。我很容易理解，在我们经济研究所的敏感氛围下，那些反对数学方法的理论经济学家是如何看待我们的研究的。但是，匈牙利国内外那些信奉形式化理论分析的学者，为什么也对我们的研究反应平平呢？他们不可能没有看到我们的文章，因为《经济计量学》和“绿皮书系列”丛书是他们经常阅读的资料。过去，我的一些著作在西方国家受到冷遇，是因为书中没有使用数学公式，但是这次不可能是这个原因，因为我所有的观点都是以数学语言呈现出来，并且使用最新的甚至优雅的公式进行表述。

我想，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理论工具。我们的研究没有界定“最优标准”。我们没有讨论各经济主体是否具有效用函数，或者他们是否具有想要达到的目标。我们用一个更简单的初级模型，预测经济系统中的主体行为（因此，主体在许多方面具有普适性）。一个决策制定者受到一种刺激时，会根据某种规则做出自己的反应。（应激反应）这一简单的公式，包含在我们使用的数学工具，即微分或微分方程中。* 我们不是在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法。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在现存的控制机制中，制度是否具有可持续的动态发展路径，如果有，它们的特征是什么。我们的模型试图表现经济系统和子系统的简单运动规律。事实上，这些模型与许多自然科学所采用的方法极其相似。

缺少最优分析的模型不能称其为模型，这一想法深深植根于主流经济学家，尤其是采用数学方法的理论经济学家脑中。有意义的微观经济学分析要求，研究者必须说明决策制定者的效用函数。某个宏观规则必须与它的“微观基础”相适应，即适用于“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决策制定者的新古典条件。这一强制要求在过去的几十年从未放松，而且变得更加严格。过去在凯恩斯的激励下，研究者基于对刺激（例如利率上调）引起某种反应的经验观察就可以获得某种结论的宽松研究时代，已经过去了。研究者必须向人们展示观察到的规律是否与新古

---

* 之前，经济学已经使用了微分和微分方程，但是大多是将其用于宏观经济模型。我们的研究使用了这一数学工具，将宏观经济进程模型化。

典理论的微观基础相吻合！我们所展示的这套模型背离了这一苛刻的规定，因此与正统的决策理论格格不入。

研究前景虽然黯淡，但并非毫无希望。如果一种有效性有限的理论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有效，那么它的垄断地位将在某一天成为理解和认知进程中的绊脚石，对这一现象进行思考的人决不仅限于我一个人。教条主义的微观基础可以成为解释许多事情的起点。但是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很多事情，这种微观基础完全没有必要那么苛刻（例如，不给自主控制的研究以存在空间），或者产生出非常明显的误导作用（例如在研究政治领域、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时）。如果许多人都以我这种方式思考，那么这一枷锁最终将被打破。

勉力运行的适应性机制

1974 年，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勉力运行的适应性机制》[8]，我在文中预先使用了《短缺经济学》一书中的很多观点。文章题目是恰如其分的，但文中有很多说法比较拙劣的段落，论证思路也不太清楚，理论框架也不很成熟。当我把这篇文章拿到经济研究所进行讨论时，有些人认识到了“勉力运行的适应性机制”的内在价值。但是，文章还是遭到了很多人的粗暴批评，我的同事彼得·埃尔德什批评得尤为严厉。

我在前面已经几次提到过这个名字。1955 年，我刚刚来到经济研究所时，我跟他在一个办公室，当时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谈话对象。有一段时间，经济所还任命我为他的助手。后来我们的关系日渐疏远，尤其是在 1957 年后。他在那一年是第一批加入新组建党的党员之一，而我坚持没有加入这个行列。当然，我们的私人关系一直非常融洽。

彼得思维敏捷。他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与西方经济学学识相当，尤其精通凯恩斯的理论。他既有开放的思想，对现存政治经济形势持批评态度，同时又无条件地服从共产主义思想。他曾不止一次在党内受到排挤，甚至被开除出党，但是他至死仍然坚定地坚持共产主义理想。

如果他不喜欢某篇文章，那么他不仅仅是批评这篇文章，而且将文章批得体无完肤，他一边会对文章进行理性的争论，一边又会对文章大肆嘲弄。他从很多人身上学到这一批判方式，比如马克思和列宁，但他更胜一筹。顺便说一句，除

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外，我在其他人当中也发现了这类学术虐待狂的现象。有些人看似非常享受将别人的作品批判得体无完肤，并且在侮辱作者的行为中找到快感。在埃尔德什攻击别人的时候，我对他们这些抨击就深恶痛绝。现在轮到《勉力运行的适应性机制》以及我本人了。

我没有被批倒。我甚至高兴有这次批评。由于没有将这篇半成品公开发表，所以才有后来取而代之的更成熟的《短缺经济学》一书的出版，这个结果岂不是更好。但我认为，实在没有必要通过对研究者的学术羞辱来激励他（或她）对文章进行彻底的修改。* 如果批评者能与作者一起分析错误原因，认识和确定论文的成绩和优点尤其是许诺（如果确实有许诺的话），鼓励研究者进行深入思考，重新开始研究，那么也能达到上述结果。

经过如此粗暴的批判之后，研究者必须咬紧牙关并坚定立场，否则就会有失去继续研究的意志的危险。我很高兴地看到，我对自己的研究方向抱有必要的献身精神和坚定信念。

除了《勉力运行的适应性机制》一文，我还有另外一个研究方向，这一研究非常雄心勃勃，目标是以匈牙利经济数据为基础，建立庞大的宏观经济模拟模型。这一项目最终陷入困境，没能完成。但我在这一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精力，我的年轻的合作伙伴雅诺什·加齐和玛利亚·拉茨科为此耗费了精力和心血（他们投入其中的精力或许比我还要多），所有这一切都让我觉得非常可惜。

如果要对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的“行为方式”进行描述，那么我在1971—1976年这段时间的研究工作可以提供典型的例证。许多西方学者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方面时相对轻松，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学术架构，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即可。而解释社会主义制度则没有现成的架构可以利用。那些试图真正了解社会主义的人不得不摸索前进，在前进过程中无一例外地进入了死胡同，被迫转过头来重新开始摸索。

我在寻找新道路的过程中，从未气馁过。我经常同时开始几个项目，每一个

---

* 也许有人会问，对这段往事，我为什么不能耸耸肩，一笑置之。如果我这么做，那么就是对读者的不诚实。不久前，我读到德威·德拉埃斯马阐述记忆性质的一本书。这本书表明，人的记忆对于羞辱的经历记录得非常清楚，通常比对成功和快乐时刻的记忆更加详细和精确。似乎对于羞辱的记忆长期占据人类记忆的一角，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甚至不能像其他记忆那样可以压缩。受辱的记忆不仅保持着最初的冲击力，而且它们的颜色、气味和剧烈程度不变。即使人们老去，尽管人们宁愿保留其他记忆，这些记忆仍然鲜活”（Draaisma，2004，p. 185）。

项目都有一位全职研究者负责。问题在于，我的研究战线过长，我想在每个方向上都有所进展。虽然我对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问心无愧，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研究的投入产出比却令人担忧。我发表了大量文章，但是许多项目在取得可以发表的成果之前就夭折了。我的大型项目涉及几名同事，却突然终止了。这些同时进行的项目的许多成果，最终收入《短缺经济学》一书，但是，另外一些成果却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就像一个雕刻家，他获得了一块比他的作品尺寸大得多的石材，在完成雕刻之前，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材料和时间。

我并非刚刚发现这个问题。事实上我很早就发现了这一问题。但我似乎改不掉这个缺点。所以直到现在，我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自己以同样的方式在浪费精力。

建造新居

在我忙于研究的同时，我还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另一项事业之中：建造房屋。1974 年，我家和另外四个家庭的公共公寓房完工。按照法律，这种房子属于“自建房”，这就意味着没有外部承包商协调所有必须的活动，全部工程只能由未来的住户自己雇用工人完成，这些工人既有政府认可的商人，也包括赚些外快的兼职人员。盖房子所需的大部分材料和设备，也需要住户自己购买。

随着房屋工程的推进，我和妻子逐渐发现，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项工程的管理者。我们面对的现实是，所需的建筑材料根本不可能搞到。寻找灰砖或浴室用的瓷砖需要花很长时间，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还要被迫降低对这些材料质量的要求。* 我们经历了短缺经济中的消费者必须承受的十字架苦难，我在《短缺经济学》一书中系统描述了这一经历。盖房子的每个阶段，我们都不得不在寻找和等待之间进行选择，在由于长期短缺而被迫购买替代品和放弃购买意愿中煎熬。除了产品的短缺，我们还面临劳动力的短缺，有时候某位技术工人来不了，整个工程就不得不停工等待。我们不得不承认短缺导致腐败的现实。我们学会了如何向工厂的仓库保管员行贿，这样才能拿到我们缺少的材料，我们也学

---

* 我不得不和住在索尔诺克的岳母联系，请她帮忙弄来一个浴缸。她找到的浴缸有些小毛病；我们从距离布达佩斯 100 千米的地方把它运了过来。

会了向地区委员会的官员送某个牌子的法国白兰地，以便拿到批条。*

那些年，我经常到西方国家讲学，每到一个地方，我都随身带着购物清单。我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清单上的物品在西方国家要比在匈牙利便宜，或者是当地值得购买的特产，而是因为清单上的物品在国内根本就买不到，而这些物品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国家都应该能够买到。

我在莫斯科的一次经历可以看作东西方买方—卖方关系存在差异的标志。在西方国家，机场外面有成排的出租车。乘客坐进车里，说出想去哪里就可以了。而在莫斯科，乘客必须拦截出租车，一旦出现出租车，乘客就会蜂拥而上追问车子要去哪里。只有那些目的地和出租车愿意去的地方一致的乘客才能上车。到底应该由谁选择终点，乘客还是出租车司机？

每个人都会有相似的经历。不管我和谁说起这件事，从研究员到清洁工，从公司经理到司机，他们都会对短缺经济牢骚满腹。所有这些事情都被我记在心里，当我开始动手研究短缺经济时，它们都一一浮现出来。

印度毛泽东主义者眼中的市场导向改革

1975 年，应几位印度经济学家的邀请，我和妻子开始为期两个月的印度研究和讲学之旅。我现在用整整一小节的篇幅来讲述这次旅行，当然仅限于学术范围。

在我去印度之前，我研究过印度的一些统计数据，这个有着灿烂的文化传统的大国，现在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我之前认识的印度著名经济学家包括：后来成为印度计划办公室主任的苏卡哈莫伊·查克拉瓦蒂，我在 1963 年去英国的时候与他相识；T. N. 斯里尼瓦桑（他的朋友都叫他 T. N.），我在斯坦福大学时的朋友。他们领着我游览印度各地之前，向我解说了许多事情。但是通过语言和文字了解的印度与我亲身经历的印度完全不同。在加尔各答的人行道上，我看到所有的贫穷家庭都住在帐篷里，妇女则在肮脏的水沟里洗碗盆，奄奄

---

* 雅诺什·凯奈迪出版了一本日记体的小册子，里面记载了与我相似的建造房屋的个人经历。他风趣地将书名定为马加什·拉科西时期的旧时口号："国家是你们的，要靠你们的双手来建设。"该书后来入选"匈牙利小册子丛书"，由巴黎的一个匈牙利移民团体出版。

一息的人躺在大街上。这使我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专家们说加尔各答(加尔各答的官方名称从 Calcutta 改为后来的 Kolkata)是印度最拥挤的城市，因此它所有的悲惨和不幸也都集中在这里。

当时，印度共产党分裂为两派。亲莫斯科派主张苏联式的缓慢改革，而激进的革命派，即毛泽东主义者则与北京为友。后者也包括一些不回避恐怖手段的团体。加尔各答是印度毛泽东主义者的思想中心。

我在印度举办了一系列演讲，但是引起激烈争论的一次演讲，至今仍然让我记忆犹新。* 在这次演讲中，我谈到 1968 年的匈牙利国内改革以及随之发生的变化和面临的两难境地。几位发言人在辩论中异常尖锐而愤怒地反对任何主张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观点。他们宁可建立一种以小额定量和短缺为特征的配给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每个人凭票获得完全相同的配给！这些人虽然反对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但是也没有为计划经济具有的组织优势做辩护。他们承认计划经济存在严重缺陷。但对他们来说，使用哪种宏观政策和微观激励来提高生产和供给，根本无关紧要。他们只从学术上和感情上关心分配平等。在目睹加尔各答的悲惨世界后，我能理解某些人甚至大学教授的思考方式。但是我只是理解，理解并不等于同意。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解决这些悲惨事件的最终办法，就在于对生产而不是分配进行改革。配给体系只是将这种不幸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它或许可以暂时缓和人们的不平等感，却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后来，我们几个人到一位教授家做客，辩论也因此继续到了教授家中，但是主题却变成了政治话题。当时，印度是少数几个采取议会民主制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人们反对政府是合法的，执政党也可能在选举中下台，报纸也可以自由批评当权者，司法机构也独立于执政党和政府。但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完全看不见这些事情。如果数百万人填不饱肚子，那么形式上的民主只是徒有其表而已，这种空架子有什么意义？如果专政意味着公平分配，减少饥饿，那么它要远胜于与大范围贫困和饥荒相关的资产阶级民主。

当我在印度讲学时，“大跃进”的悲剧后果并不为人所知，尽管这原本可以成为让人信服的证据。因此，在这场辩论中，任何一方都没有说服另一方。

---

* 我正在尝试运用一种不成熟的论证方法，这一方法在我后来的文章《社会主义伦理的效率和原则》[1986b(1980)]中将会用到。

注 释

[1] Kornai, 1972.

[2] Kornai, 1972, p. 5.

[3] Hirschman, 1988[1958]; Streeten, 1959.

[4] 这封邀请信保存在我的档案中。

[5] Kornai and Martos, 1973.

[6] Kornai and Martos, 1981.

[7] Kornai and Martos, 1981.

[8] Kornai, 1974.

13. 思想的成型：1971—1980 年
《短缺经济学》

1976 年初，应埃萨·林德贝克教授的邀请，我和妻子以国际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的身份来到斯德哥尔摩工作了一段时间。刚到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不顺利。我们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住在旅馆里也很不舒服。后来，我的一本厚厚的笔记落在地铁里了，这些笔记是我几年来所有读过材料的整理结果。斯堪的纳维亚的秋天经常阴云密布。在一个阴冷潮湿且有大风的早晨，我走在去往学校的路上，突然就想收拾行李，离开这里回家。

如果我当时打包回了家，我后来一定会追悔莫及。* 研究所的秘书波姬塔·伊莱亚森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她不辞辛苦地为我们找到一间合意的公寓。我的笔记也完好无损地物归原主。斯德哥尔摩理想的工作条件成就了我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时期，就在这段时间内，我完成了《短缺经济学》一书的写作。

启发灵感的环境

目前，人们对学术研究的资助问题有很多争论。在国家机构或者国际机构分配研究资金时，它们通常要求申请者提前提交研究计划，说明研究者在项目中要完成的预定目标，以及发表研究“产品”的最后期限。越来越多的公共和私人

---

* 如果我们当时回国，我们的女儿就不会在瑞典结婚，我们那两个可爱的瑞典裔匈牙利外孙女苏菲和安娜也不会出生了。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因为最初的不顺就打道回府。

基金会也开始有类似的条款。

如果我在斯德哥尔摩的工作也要削足适履，强求一律，我可能就什么也干不成了。我在来到斯德哥尔摩之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只是在头脑中有一个类似于“反均衡再思考”的大概想法。直到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安顿下来几周之后，我才厘清了我的研究主题。幸运的是，邀请我访问的研究所比我所提到的那些机构要开明得多。他们同意我随心所欲地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没有用任何“项目”来约束我。

我就在我们的公寓里面开始了研究工作。我偶尔去一趟研究所处理一些事情，听一些有意思的讲演。他们原本邀请我在那里工作一年，由于一年期满时，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他们毫不迟疑地为我延期三个月。

我很幸运，虽然在家工作有些孤单，但是我周围的学术氛围很是活泼有趣。* 我身边的同事都是饱学之士，与他们交谈也是妙趣横生。我主动申请在学校就社会主义经济作了一系列报告。参加报告的研究生和教师，都成了我的实验对象，我能观察到第一排观众对我的观点的反应。每次报告结束后，我都被一大群人围住，他们友好地向我讲述他们的观察所得，并提出一些建议。

后来，《短缺经济学》出版了，人们从前言中得知，我是在瑞典完成《短缺经济学》一书的。有些读者想知道，在我研究短缺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制度时，我是否会忘记东欧的环境和日常生活。不，我绝不会忘记！在我到达斯德哥尔摩之前，我已经积累了大量素材。我写书所需的只是安宁和平静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可以远离国内激烈的冲突，琐碎的争斗，惹人恼怒的事情和繁杂的生活。

我在前面一章已经说过，我在写作、争论以及个人经历中的许多感悟，为我撰写《短缺经济学》铺平了道路。事实上，我很早就对短缺经济感兴趣。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就专门有一章讨论短缺问题。在此之后的 20 年中，我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但这么多年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这样零零散散地堆积在大脑之中。现在，在瑞典的宁静生活中，这些碎片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

---

*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曾提到我在美国的大学观察到的民主氛围。这种政治教育在斯德哥尔摩得以延续。我不会忘记，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默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在执政 40 年后遭遇选举失败时，他在电视上的表现。对他而言，这无疑是个艰难的时刻。但是他却笑着宣布失败，并且用最自然的方式表示，将向胜利者移交权力。我认识到，当民众获得政府许可，用文明的方式解散和更替政府时，这种方式下的民主是容易得到大众认可的。

当我正式开始《短缺经济学》的写作时，我的进度惊人，经常一周完成一章。* 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在我的脑子里成型，我所需要做的不过是把它们形成文字而已。我还发现，很多问题和连接问题的线索，就是在撰写过程中明朗起来的。

早期有许多经济学文章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时，也提到过短缺问题。有的是一篇文章中有几个段落，有的是一本书的整个一章，专门用于研究短缺主题。然而，《短缺经济学》是第一本全面研究短缺问题的专著。我在导论中对短缺进行了解释，我不辞辛苦到处寻找可供引用的早期相关文献。只要找到提出相关理论的先驱者，我都会按照惯例，在参考文献中列出这些文章。同样，那些曾在我的研究准备阶段提出建议或参与研究准备工作的人，我都在书中对他们的帮助表示了谢意。**因此，我并没有宣称书中所有的观点都是我的原创观点。但我可以说，我的基本灵感并非来自任何前人提出的观点。因此，我也不能说《短缺经济学》是对某一学术著作的继续。然而，某些著作还是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到我，例如马克思、凯恩斯和赫希曼的著作。*** 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阐述过他们对我的影响，这些影响并不仅限于社会主义制度长期存在短缺的研究主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1955 年以来我通过阅读获得的所有理论知识、在匈牙利进行的实证研究、与他人的讨论、听过的报告、学术会上的辩论，以及在国外的长期经历等，没有对我产生强烈的影响。在写作《经济管理的过度集中》时，我还只是睁着眼睛观察现实的天真的研究者，而在写作《短缺经济学》时，我已经成为专业的经济学家，这时候的我已经过适当训练，并依靠各种文献和自身的经验，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中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研究道路。

让我暂时回到本章一开始所提到的一些事情：我带了几千克重的阅读资料来到斯德哥尔摩。事实上，在我写《短缺经济学》时，我几乎没有参考这些笔记，

---

* 每一章完成时，茹饶都立刻阅读并发表评论。这一习惯早在《短缺经济学》写作之前的几年就开始形成了，但是在这本书的完成期间，这一习惯得以固定下来，以至于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一习惯，我怎样完成一部新书。我的妻子在我每写完一章后，都用一盒上好的瑞典巧克力奶油糕点奖励我。（那时候，医生还没有强迫我注意自己的胆固醇水平。）是不是巧克力奶油糕点让我的写作进展神速呢？

** 《短缺经济学》一书有两个数理经济学的附录，在附录的编制上，我得到了合作者约根·韦布尔和安德拉什·西蒙诺维奇的协助。

*** 《资本论》一书尤其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马克思认为，失业既非市场运行中的随机错误，也非错误的经济政策的后果，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设法确认和解释制度性功能失灵如何深刻影响社会的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特征方面，马克思是伟大的先驱者之一。我对马克思本人的尊重，与我同作为整体世界观和政治纲领的马克思主义的决裂，两者并不矛盾。

撰写其他几部著作时也大致如此。显然，我已经将这些观点记在脑子里了，而且总能在适当的时候想起它们。事实上，在写作过程中查找这些资料会打断我的写作进程，干扰我的思路。又或许，查阅资料使我受到资料的束缚，而丢掉了自己的思考。我一般是在修改初稿时，再回头查找资料来源，并检查参考文献。

《短缺经济学》的主旨

《短缺经济学》的写作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我想全面刻画社会主义制度的运行。另一方面，我试图系统呈现长期短缺经济的现象、起因和影响。或许我不应该采用二分法，而是直接说明讨论短缺经济的目的，就是要超越探讨这一现象的起因和影响而呈现更广泛更深刻的图景。短缺经济只是我通过它向大家描述的整体现象的一部分。既然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每天都能遇到短缺的事例，所以他们对困扰他们及其生活的短缺，有较深的感受。书名中的短缺一词本身就是一种挑衅，这一术语直达问题的核心。该书从日常生活概括出普遍性结论，并上升到了综合理论的高度。

既然每个人无一例外都要扮演消费者的角色，那么如果我在书中一开始就对消费领域的短缺进行描述，后一个写作目的或许就更容易达到。但是，这不太符合论证的逻辑顺序，因为短缺问题的根源在于生产。因此，我在讨论一开始就从企业的运营和投入品采购入手。（在建造我家的公寓房时，我对采购有了最新了解。）

所有经济领域都有短缺的例子。旅客因为最后一张机票被排在他前面的人买走而无法乘坐自己想坐的那班飞机。人们在电影院售票窗口前排起长队购票，想要看某部最热门的电影。这些例子如果只是偶尔发生，那么并不是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短缺出现在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出现在企业和家庭、产品和服务以及劳动的分配和投资领域中，就成了短缺经济。这种短缺是长期的而非暂时的。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两者之间的缺口通常很大，换言之，短缺极其严重。

总之，短缺经济表明，所有经济领域都广泛且长期地存在极度的短缺。市场不能暂时在供求均衡点附近波动。它偏离了前文所谓的瓦尔拉斯均衡。长期短缺成为制度常态，而不是偶然事件。

短缺（我不能每次提到短缺时都使用广泛且长期存在的极度短缺字样）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短缺经常意味着买者不得不购买他不想购买的商品。这种被迫使用替代品侵蚀着人们的消费满意度。采购稀缺商品要求消费者付出巨大的搜寻和时间成本，即排队购买。由于消费品数量固定，所以短缺经济中的消费者福利，少于供应充足的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者福利。

原材料、半成品和零部件供应的间断和不充分，再加上劳动力的短缺，导致生产中的诸多矛盾和障碍，因此降低了劳动生产率。*

短缺经济中的生产者不必费心于产出的销售，因为到处都是饥渴的购买者。生产者之间不必为争夺购买者而竞争。因此，短缺消除了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动力，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停滞的根本原因之一。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列举了短缺经济造成的各类直接经济损失，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短缺对整体福利的影响。**生产者或卖方具有的优势扭曲了人际关系。大多数产品和服务的分配，只能通过定量配给或行政分配进行解决。定量分配成了官僚机构手中的重要武器，官僚机构可以据之强化对人们生活的控制。

人们可能认为，上面最后一点表述可能暗示着，当局可能有意制造短缺经济，但这种想法并不正确。由于买者不能选择或拒绝商品，那么卖者就占据了优势；然而，每个卖者同时又是买者，他们也要费尽全力采购各种商品和服务，这时他（或她）也处于弱势地位，也会受到侮辱。许多官僚机构成员（除非享有很高的特权），也会因为短缺而使自己的个人生活极为不便。没有人想要短缺，但短缺还是存在。如果短缺只取决于少数人的意志，那么他们一定会被迫结束短缺，改变市场上买卖双方的力量对比。但是短缺并非任何人的自由意志，它是制度本身的创造。不管社会成员是否喜欢短缺，长期短缺经济都会出现，并且不断进行自我复制。

---

* 制度变化后，产量的增加、劳动者效率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是几种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基于充分的统计分析的几项研究证明，生产者对于消费者的竞争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在读了卡尔林等人（Carlin et al.，2001）和扬科夫与穆雷尔（Djankov and Murrell，2002）写的文章后发现，社会主义转轨带来的生产变革支持了《短缺经济学》的主要结论之一。

** 国外的学生（和匈牙利年轻人）不能理解短缺所带来的折磨。当我在演讲中试着解释住房短缺时，我会举出一对年轻夫妇的例子，他们虽然在法律上离婚了，却被迫住在一所房子里。前妻和现在的妻子由于住房紧缺而被迫共处一室，共用厨房和浴室。每次我讲这个故事时，听众都会哄堂大笑。他们将这种压抑而屈辱的处境看成趣事。

我们无法使用任意单独一个因素，令人满意地解释短缺是如何出现并如何复制自身的。要想对短缺进行充分解释，必须有一个更为复杂的因果分析机制。在这一因果链条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在书中将这一环节称为“软预算约束”。这一概念以及对这一环节的解释引起了强烈反响，并成为独立于《短缺经济学》之外的研究课题。因此，我要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解释这一概念。

因果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体系。在《短缺经济学》最后几页的“结语”部分，我写道：“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制度条件产生了一定的行为方式、经济规则和标准，这些不可能由于政权的决策而失效。政府决策和国家计划并未规定要产生投资紧张、长期劳动力短缺、价格走势波动等现象，但是，只要保持这些现象的前提条件存在，没有一个政府决策和国家计划能消除这些现象。”[1]短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制度特有的属性，改革可能会缓解短缺，但不可能消除短缺。

这就是《短缺经济学》一书的主旨。

自我审查

《短缺经济学》一书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我确信我写的每一个词都是真实的，除了事实别无其他。但是我也知道该书没有说出全部事实。

当时，我们住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利丁厄，这是海湾的一个小岛。我清楚地记得我和妻子在海岸的丛林中漫步之时，就反复讨论过哪些内容应该写进书里，哪些不应该。

一开始，我们这本书的读者以匈牙利人为主，在我们离开瑞典后，仍然要回到匈牙利生活。* 因此这本书必须在匈牙利国内合法出版，这样一来，我在初稿中的分析能够深入到何种程度呢？当初动笔的时候，我也曾考虑该书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可能会面临的命运。它能在这些国家出版吗？如果不能，它会被宣布为“怀有敌意”的作品吗？该书的读者会因此受到迫害吗？

来瑞典之前，我们就看过安德拉什·科瓦奇 1968 年拍摄的电影《墙》。《墙》

---

* 我和妻子就这一问题的细节进行了讨论，我们总是设法最终达成一致。当然，我作为作者对书中出现的内容要承担全部责任。因此，我觉得用第一人称单数来叙述讨论结果较为公平。

描写了暗室中剑客们的战斗，他们害怕撞到墙，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墙在哪里。因此他们只敢在房间的中央移动。* 观众都非常清楚科瓦奇的电影所指。

我不仅意识到墙的存在，而且知道墙在哪里。虽然匈牙利的活动空间比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要大得多，但是对合法出版物的内容仍然在政治上加以限制。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我已经有了一定的国际声望，这一声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这也是我要考虑的事实。因为这一事实，我可以适当越过刚才所说的限制性的墙。应该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我不仅想爬上限制“我的”围墙，而且想翻越这堵墙。这也是我在该书中努力实现的目标，即帮助其他希望仿效我的人，努力扩充围墙所限定的空间，使受到的约束略有放松。

即使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但我至多也只能说，我只是略多一些活动空间而已。如果这本书要合法出版的话，我就不可能将研究中的所有观点都写进书中。我必须回避三个话题。第一，我不会明确讨论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以及这些国家彼此间的贸易和经济联系。第二，我不会纠缠于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等问题。第三，我不会讨论如果国家所有权让位于私人所有权后，将会发生什么变化的问题。

显然，这些都不是次要问题。这些问题在理解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发挥着根本性作用。我不想半真半假地讨论这些问题，我也不允许自己就这些问题说一些不符合事实的话。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保持沉默。

但是，我要向有洞察力的读者指出书中刻意回避的这些问题。我在《短缺经济学》的导论中对该书没有涉及的内容——例如党派的作用——做了重点说明。我明确指出，该书的分析只包括国有企业，不包括“第二经济”和“非正规部门”。

我认为，与其对读者暗示来暗示去，还不如用充分的阐释吸引他们，让他们接受该书的逻辑，这对读者来说似乎更为重要。如果我能成功做到这点，读者就能用自己的智力做进一步的思考。《短缺经济学》全书共 22 章。对在何处结尾，

---

* 我在此引用了一段电影剧本（A. Kovács，1968，p. 37），剧本中的演员动作说明用楷体字表示。主角本科评论正在发生的事情。

两名剑客开始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对方。

本科：看他们是多么地害怕墙！但是他们离墙还远着呢。

他们继续摸索，极力避开对方，却都在向房间的中央移动。

本科：房间这么大，但他们根本没有充分利用这个空间，他们看起来真是笨手笨脚。

我经过了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在所有的考虑中，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读者能够自己推导出未写的第 23 章。《短缺经济学》并没有明确社会主义制度中普遍且严重的长期短缺经济的根源，以及一劳永逸解决短缺问题所必须的制度变化。该书并未指明现有制度的哪些关键特征是无法经由改革而改变的。然而，许多读者分明读懂了书中暗含的主张。*

在这里，我只是如实描述了我在写作《短缺经济学》时进行自我审查的情况。在本章的结尾处，我还会重新阐述我所面临的政治和伦理困境。

出版社的审稿人

不熟悉共产党制度运行的西方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共产党制度中也有正规的审稿制度。有些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初期，实施过审稿制度，但在政权巩固之后，就不再需要这类制度了。审稿的任务委托给负责文字（或广播）的人员：报纸的总编、出版社的社长、电视台和电台的负责人等。虽然这些任务通常是交给他们的下属完成，但是这并不能免除总编的责任。他（或她）必须向上级（例如，国家级出版社的社长向文化教育部的出版司汇报）汇报出版的书目和内容。然而，所有国家机构的领导人最终要对上级党负责。如果党内某人（实际上是党的某位领导人或党内分管这一事务的领导）对要出版的内容表示不满，那么审稿人就要想方设法阻止该书的出版，即使书已出版，也会在出版之后对相关人员做出处罚。

在专制统治时期，这种限制非常严格。任何一篇文章只要稍微涉及敏感问题，如过于严厉的批评或表现出偏离正统的信号，那么就会被负责审查稿件的总编辑否决。如果总编辑对此不确定，那么该文章就会送交中央裁定。如果总编辑自作主张通过了一篇文章，而文章的发表引发了政治风波，那他会受到非常严肃的处理。

当我写完《短缺经济学》时，卡达尔政权正处于相对“温和”的阶段。现在让

---

* 当时，对政治和经济很感兴趣的一位物理学家读了这本书。不久前，他向我描述了当时阅读《短缺经济学》的经历，以及他对于书中关于必须进行制度变革的论断感到的震惊。25 年后，他还坚持认为，书中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所以我费了很多口舌向他说明书中根本没有这一内容。

我们看看在这种情况下，这本书经过的一道又一道关卡吧。

首先，出版社的社长没有反对《短缺经济学》的出版。总编辑拉斯洛·费博对出版该书充满热情，并尽其所能推动出版工作。在西方学术书籍的出版过程中，出版社往往自行决定书的审稿人，无需与作者商量，从而保证审稿人观点的公正性。匿名审稿制度可以防止作者因为审稿人的负面评价而怨恨审稿人。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国家的审阅人姓名都会印在书的扉页上，他们必须公开承担该书的学术责任以及风险更大的政治责任。在某些情况下，作者或许会私下与主编商量选择谁做审稿人。我这本书的情况就是这样。由于一位审稿人身上不可能同时具备审稿所需的所有必要条件，那么就应该找一位有很高专业声望的审稿人，或者有政治地位和影响力的审稿人。

经过讨论，我们认为经济研究所的一位同事安德拉什·布罗迪适合担任本书的学术审稿人。[2]他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没有人质疑他的专业地位。我一度曾是布罗迪的密友，但是后来，我们的关系变得有点疏远。我知道他并不喜欢我早期发表的几部作品。然而，布罗迪冒着政治风险全力支持这本书的出版。他表现出了一位真正的学者令人尊敬的博大胸襟，他认为我在《短缺经济学》一书中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与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布罗迪的鼓励和支持，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另一位审稿人是当时的财政部长拉约什·法卢韦纪。[3]（他后来升任国家计划办公室主任。）他是一位经济专家，而非党内干部，但是他的意见得到党内高层的尊重和信任。他属于坚定的改革者。

这是我第一次说起法卢韦纪担任《短缺经济学》审稿人的事，说起来我还有些尴尬。我的一位好友安德烈·戴阿克是部长的一名亲信。在高层政治人物中有个约定俗成的惯例，他们的很多材料例如某篇讲稿，虽然署领导的名字，但并非领导所写，而是由他们的下属完成的。部长的《短缺经济学》审稿报告本来是由安德烈·戴阿克负责撰写，但完成报告的不是安德烈，而是我！我说不清是谁先提出这样做的——或者是安德烈请求我来写，或者是我主动给他写的。比起安德烈，我当然对这本书更加了解，所以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易如反掌。我用谦虚冷静的笔调对该书进行了评论，我虽然指出了书中的优点（没有过分吹捧），但只字未提书中的深层含义。

这一切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出版社或者其他人都不知道报告

真正的作者是谁。事实上，这一点并不重要。当安德烈将审稿报告初稿送交部长时，部长就必须对审稿报告负责。审稿报告中如果有任何不妥之处，法卢韦纪都会指出来。更重要的是，法卢韦纪在审稿报告签字之前，显然已经看过这本书了，否则，一旦以后党内对该书有任何批评意见，他都要为此负责。

出版社现在有了两份赞成并支持该书出版的审稿报告，同时，该书也通过了匈牙利的“审查”程序。编辑和审稿人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 我准确估算出可能限制我的墙的位置。书中所有通不过审查的观点，都由我自己预先删掉了。

第一印象

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1980 年我和妻子在教会大学对面的大学广场书店橱窗中，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时的情景，当时我们非常高兴。该书第一版很快售罄，一本文学周刊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短缺经济学〉出现短缺》。[4]《短缺经济学》在匈牙利一共重印了三次。

几乎就在同时，该书的英文版面世。在英文版出版之前，我已经与诺斯—荷兰德出版社的编辑达成共识，他们理解我的处境，愿意提供帮助。因此，即使《短缺经济学》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在匈牙利国内出版，他们也将出版英文版。

随后就是法文版和波兰文版的面世，然后是中文版。其中，中文版销量达到 10 万册，并在次年荣获非小说类图书“年度畅销书”称号。该书被译成捷克斯洛伐克文，并在当地出版，但没有进入发行渠道，而是在学术界内传阅。俄文版是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流传的。一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行将结束之时，该书才得以合法出版并获得巨大成功，销售量高达 7 万册。

1978 年，我在国际经济计量学大会上发表的主席演讲中，对该书的主要观点

---

* 出版社的设计人员与我讨论过书的封面设计，他笑着向我提供了几个选择。最终，我选择了其中的一个，上面只有简单的字母。另一个封面设计是一幅彩色图片，一个裸体男人站在镜子前：皇帝的新衣！这幅画至今还挂在我的办公室墙上。它也被收录到本书的图片集中。

伟大的平面艺术家雅诺什·考斯受到《短缺经济学》一书的启发，创作了一系列杰出的作品，为此，我的妻子曾为他举办了一次真正的《短缺经济学》研讨会，茹饶将他的作品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它们至今还挂在我们家的墙上。这位艺术家后来继续创作这一系列，这些作品成为我的匈牙利文版和日文版论文集的插图。其中一幅也收录到本书的图片集中。

进行了归纳，我的这一讲话有力地推动了书中思想的传播。这篇演讲也发表在《经济计量学》杂志上。[5]

西方几个主流经济学杂志都发表了书评，书评几乎都对该书表示了赞许之意。而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出现书评则取决于执政路线是否强硬。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也由经济学家 R. G. 卡拉乔多夫撰写了内容极其详尽的评论，评论满是溢美之词。[6]卡拉乔多夫对该书英文版的书评，使得当时还属于地下出版物的俄文版流通得更快了。

此后几年，东西方经济学家对于该书的引用达到数百次。高校也开始作为教材使用。让我高兴的是，布达佩斯的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的劳伊克学院每年都要举办“《短缺经济学》研讨班”，逐章讨论该书。

正是公众对于《短缺经济学》的兴趣，促成了我第一次应邀到大学就此书公开发表演讲。（以往我只参加小范围的研讨会。）每周，偌大的演讲大厅都挤满了学生和来自校外的听众。*

与“非均衡”学派的争论

我并不想让读者有这样的印象，即这本书从问世起就被各种赞美簇拥着。事实上，有些人对《短缺经济学》颦眉蹙额。有些人甚至根本没有理解该书主题的重大意义。在匈牙利国内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该书持保留意见，有些人甚至公开对其进行批判。本节要谈谈当时出现的两种典型的反对意见。（下一章，我将着重谈谈，在匈牙利，赞同和反对经济管理制度改革的两派对《短缺经济学》的不同解读。）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两位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J. 巴罗和赫歇尔·I. 格罗斯曼设计了一种独特的模型以代替瓦尔拉斯均衡分析，该模型专门用于研究市场中的供给或需求过剩状态，[7]他们称为非均衡模型。他们的这一模型与我在《反均衡论》中首次提到，后来在《短缺经济学》中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有很密切的关系。

---

* 在第一次赢得赞誉的演讲中，为了解释被迫适应以及人们在短缺经济中面临的屈辱和顺从，我引用了天才歌手佐兰·斯泰娃诺维蒂广为流传的歌曲中的一句歌词：“啤酒是温的，但还可以忍受。”

巴罗—格罗斯曼模型的理论结构后来为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波特斯采纳，用于经济计量。当时，波特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经济上，他根据这一模型创立了一个学术学派：他和同事以及后来的追随者们，为各种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设计了一系列非均衡模型。[8]

20世纪50年代末期，理查德在布达佩斯攻读计划专业的硕士学位时，我曾遇到过他。从那次以后，我们偶尔也碰面，并且通常都会使用相似的方法解释经济问题。然而，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出现了极大的分歧。

我反对巴罗和格罗斯曼将消费者市场描述成宏观集合的观点，而波特斯和他的追随者则赞同这一观点。根据这类模型对市场进行扭曲描述，市场的状态时而表现为普遍的供给过剩，时而表现为普遍的需求过剩，这两种非均衡状态反复出现。以波兰为例，波兰人饱受严重短缺之苦，这种经济体制怎么能出现哪怕一瞬间的普遍供给过剩呢？如果基于错误的假设和定义建立了这一模型，那么，经济计量学的计算结果也只能证实这一错误的结论。

我在书中强调，总量分析不能充分描述短缺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短缺和盈余通常同时存在。因为经济体制的适应能力很差，所以两者通常毫不干扰地同时存在：某类商品和服务的严重短缺，与某类商品售不完的存货以及无法使用服务能力造成的挥霍浪费，可能同时出现。

进一步说，我们不能按照常见的统计指标来衡量短缺，波特斯和他的同事则是用这些指标进行计算。如果实际的购买和需求相一致，那么对购买和销售数据的观察，足以反映出实际的需求。但是，如果购买者不能按照他们的购买意愿进行购买，谁会知道真正的、最初的和未被满足的需求到底有多大？由于购买者为应对短缺，不得不经常购买他们原本不想购买的商品，关于真实需求的信息就更无从知晓了。被迫替代品肯定会部分或者完全吸收过剩需求。

我反对波特斯模型的另一个理由在于，该模型只描述了消费市场，并将消费市场与投资市场分割开来。但问题的关键恰恰就是投资领域的持续扩张：负责经济运行的管理者和国有企业经理，表现出“投资饥渴”症，总是贪得无厌地渴望扩张，从而使得市场上的需求总是超过可利用资源的供给量。

在这场争论中，波特斯和他的同事拥有更大的优势。他们有大量的统计数据可以利用，他们利用这些数据进行数学—统计学计算，这无疑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除了借助人的直觉和常识外，没有其他手段；我不能用科尔奈的定性分

析模型来反对波特斯的定量分析模型。*

如果人们真正要度量短缺，那么需要使用新的方法。我们开始着手设计一种新的度量方法。典型的例子就是劳伊克学院院长阿蒂拉·奇坎设计的指标，他在同事的帮助下，基于匈牙利的数据构建了定量分析模型。在短缺经济中，企业产出的存货趋于下降，是因为购买者努力购买任何能买到的东西。相反，消费者一方则会表现出囤积的趋势。厂商由于担心未来会出现短缺，因此也会像仓鼠一样，囤积原材料和半成品。产出的库存与投入的库存之比，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指标。如果该比率下降，那么表明短缺在加剧；如果该比率上升，则表明短缺得到缓解。

人们开始观察并系统收集其他短缺指标（例如，不同产品和服务的排队长度，被迫替代品的分布和频率）。由于需要观察的时间序列必须有足够的长度，才能通过数据得到结论，因此，这项工作需要五年到十年的时间才能获得成果。但是，我刚刚确定这一研究方法后，短缺经济就悄然消失了！感谢上帝，短缺经济终于不存在了，但是这一变化意味着争论永远无法解决了。我坚持我的逻辑观点，但是我再也无法用其他更有说服力的计算来反驳波特斯和他的同事的结论了。

在匈牙利，这种辩论经常会使辩论双方的个人关系变质。幸运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我和波特斯（后称为理查德爵士）之间。我们的关系一如既往地真诚而融洽。

与正统的苏联经济学家的争论

另一场争论发生在 1981 年，当时我正在雅典参加国际经济学会圆桌会议，会议主席是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爵士。**我的演讲内容是刚出版的《短缺经济学》的主要观点，书中强调短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特有的缺陷。另一位发言者 V. R. 哈恰图罗夫时任苏联经济学会会长，他在争论中强烈反对我的观点。他没有否认生活中可能存在的诸多短缺现象。（只是可能存在吗？当时，匈牙利与苏联相比，物质丰富很多。在苏联，住房极度紧张，商店里的主食

---

* 一些早期的研究结果看似非常有前景。在匈牙利，我的大部分同事和学生开始对《短缺经济学》中的核心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其他国家的一些研究者也基于该理论进行调查分析。这方面最有趣的研究成果是热拉尔·罗兰 1987 年和 1990 年发表的文章。

** 我早些时候提到过希克斯爵士；他曾积极支持我出版第一本英文著作。

和日常服装也经常缺乏。)他认为,这些情况源于计划的错误。如果提高计划制定工作的标准,问题就会解决。

当时在场的还有著名的数理经济学家和线性规划理论的创始人列昂尼德·康托罗维奇,他曾于1974年与他人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坐在自己位子上,始终一言不发。

希克斯在他的总结发言中对我的演讲表示赞同,但是,他没有评论我与哈恰图罗夫的分歧。像其他同时代的西方经济学家一样,他不希望在东西方会议中,公开参与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两位经济学家的争论。*

哈恰图罗夫的评论和他那激烈的口吻,让我确信我最初的想法,即《短缺经济学》一书传递的信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有助于削弱体制

我从版本、发行量、书评和引用等各个角度,说明了我的著作所受的书面欢迎和口头赞扬的情况。然而,比起这些看得见的影响,更为重要的应该是它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分子思考方式的影响。

许多年后,我第一次拜访新来的社区医生时,他像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那样跟我打招呼。他读过《短缺经济学》,按照他当时的原话,他认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从那以后,他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社会主义经济现象。不久以后,我在波兰的克拉科夫访学时,也听到一位波兰社会学家说了同样的话。

除了这些私下的交谈,同样的看法也出现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这里我只讨论俄罗斯经济学家的观点。**1998年,丹尼尔·耶金和约瑟夫·斯坦尼斯拉夫

---

* 在那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吴敬琏教授,他后来成为中国改革的设计师之一。他说他已经发现我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他希望中国人民熟悉我的观点,这样,这些观点就能够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从那以后,我们又见过几次。他也是我的著作中文版问世的一股推动力量。

** 2004年,阿蒂拉·奇坎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回顾了该书在匈牙利国内的影响。我也愿意提到另一组关于该书对匈牙利影响的统计数字。1989年,两位匈牙利研究者捷尔吉·萨齐和伊什特万·雅诺什·托特发表的关于"科学计量学"的研究论文,具体分析了匈牙利经济学文献中谁被引用及引用频度。其中有一个表格对于过去5年间作者引用情况进行排名(György Such and István János Tóth, p. 1207)。在1963—1972年间,马克思排名第一。在1973—1978年间,马克思仍然排名第一,其后是列宁和科尔奈。在1978—1982年间,这一排序出现颠倒,我的引用情况排名第一,同样的情况又出现在1983—1987年间,在这段时间,匈牙利经济学家在论文写作中引用我的著作的次数是引用马克思著作的两倍。

出版了一本关于体制变革的著作，他在书中回忆了在苏联经济转型期间，他们与俄罗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的一段对话。他们将盖达尔的观点总结如下："当前仍然健在的经济学家中，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整整一代人产生了影响的经济学家，只有科尔奈。他一丝不苟地剖析了中央计划体制，证实该体制的不合理性和自我毁灭趋势。他也阐述了该体制可能产生的变体，即市场社会主义的不足之处。"他们还引用了盖达尔的原话："20 世纪 80 年代，科尔奈是对我们所有人影响最深的经济学家……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科尔奈对于短缺经济的分析，对我们所有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努力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我们读过他的所有著作。"[9]

《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的前通讯员戴维·E. 霍夫曼几年前曾写过一本书《寡头政治：新俄罗斯的财富和权力》，他在书中回忆了盖达尔和阿纳托利·丘拜斯身边的年轻苏联经济学家。书中写道："天空突然出现了一道闪电。1980 年，匈牙利经济学教授雅诺什·科尔奈的一部两卷本、630 页的《短缺经济学》，深深触动了他们，与其他著作相比，这本书更为透彻地洞察了苏联社会主义走下坡路的本质。"霍夫曼引用这群人的原话："这本书的影印本第一次被偷带到列宁格勒后，立刻'成了圣经'。最初我们只是对社会主义有一些想法，但是这本书净化了我们的思想，推动了我们的思考。我们见面时会相互问道：'读过科尔奈的书吗？'然后，一场讨论开始了。"[10]

如果有人问我，这一生中最骄傲的成就是什么，那么我会提到上面这件事。让我备感欣慰的是，我的书赢得了许多知识分子和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以及其他专业人士的赞同，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同视角。

柏林墙倒塌之后，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起因出现了许多理论，在铁幕后的东方和西方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都声称自己对这一历史事件作出了贡献。有些人认为，里根政府的强硬和美国的军事压力，是推动柏林墙倒塌的主要力量。另一些人则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老谋深算促成了柏林墙的倒塌。还有一些人认为，安德烈·萨哈罗夫、瓦茨拉夫·哈维尔和亚当·米奇尼克等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是事件的决定因素。另一些人则将"共产党改革派"的作用放到名单首位。以我的亲眼所见，人们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虽然 1989—1990 年的变革发生之快让人难以置信，但是其前兆早已出现，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经历了长期的衰退。所有复杂而广阔的历史进程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侵蚀了它的基础。任何用"单一因素"解释问题的学术方式，都让人怀疑，因为它们

将复杂的历史进程的复杂性简单化了，常常掩盖了一些政治意图以及自我扩张的欲望。

有一个主要因素发挥了重要的准备作用，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主要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人们的思考方式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尽管这并不是最重要或唯一的原因。没有一个政权哪怕专制政权，在缺乏相信其合法性和生命力的支持者的情况下还能继续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基础之一，是信仰他们所献身之事业的共产党员。他们相信，所有问题都是暂时的，在救世主般的使命感驱使下，他们也会做出自我牺牲。

思想的消沉主要来自人们的亲身体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不振，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损失惨重以及人们的苦难。在那个时期，对有政治头脑的知识分子而言，这些文章有助于他们解释自身的经历，因此加速这一衰退进程。我可以列出几部这类作品。排在首位的是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这部作品当年轰动一时；乔治·奥威尔和阿瑟·科斯特勒的著作在沉寂了几十年后，再次引起读者的关注。《短缺经济学》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真实地描绘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前三位作者揭示了高压统治的残酷、贪婪、虚伪和不人道的本质。我的书则冷静而客观地触动了读者的思想和感情。《短缺经济学》逐渐摧毁了人们幼稚的想法，他们原本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具有“人性面孔”，因此有能力完成它的使命。列宁非常正确地指出，如果社会主义制度在生产力上超过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它将获得胜利。《短缺经济学》让读者们明白了，它不可能具有这种优势。

我不知道有多少政治上活跃的知识分子直接或间接阅读过我的作品，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读过书后仍然不为所动。我从未进行过此类调查。据我所知，仅仅因为这本书在几个月内就成为“时尚”，或者因为知识分子都在谈论这本书而对它产生兴趣，这种情况从未有过。* 这也再次警示我，不要过分夸大这本书的影响。但是，即使从现实和谦虚的角度来评价《短缺经济学》的影响也是相当广泛的。

---

* 我读过匈牙利著名作家费伦茨·考林蒂的日记，日记中记录了他的阅读情况。我们个人之间很熟，这可能让他注意到这本书，但是，考林蒂显然从未读过《短缺经济学》，也从未在他的活动圈子中提及这本书。著名历史学家加博尔·克洛尼曹伊在他的精彩回忆录中解释了影响他们这一代人——主要指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匈牙利知识分子——的著作。当然，我的书不在其中。

再谈出版的政治和伦理困境

从斯德哥尔摩回国以后，我在科学院位于马特劳哈扎的招待所遇到费伦茨·多纳特，多纳特是反对卡达尔政权的知识分子领袖之一，我在前几章曾提到过他。当时，我正在写《短缺经济学》的最后一章。我们在一起吃饭，还经常在树林中散步，热烈谈论科学、学术、政治和经济等话题。

在一次散步中，多纳特说他正在编辑纪念伊什特万·比博的文集。* 可以预料的是，这本书是不可能合法出版的，所以只能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发行。有些知名人士已经应邀为文集撰稿，他问我是否也愿意写篇文章。我明确而坚决地拒绝了他的约稿。多纳特非常清楚我对合法和非法出版物的基本看法，并且知道我当时正忙于《短缺经济学》的写作，所以他并没有强求。他只是平静地接受了我的拒绝。

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我都没有感觉到多纳特因为此事对我有任何怨恨。我们后来又有过几次有意思的深入讨论。1983 年夏天，他曾来看望我。当时他正在慕尼黑接受治疗。他回到布达佩斯之后，我又去布达佩斯的医院看望了他，我惊异于他在罹患绝症时表现出的勇敢，就在那种情况下，他脸上还带着他一贯的讽刺笑容。我们的生活策略完全不同，但这丝毫无碍我们的友谊和相互尊重。

费伦茨·多纳特并不是我的熟人中唯一一位在卡达尔政权下参与非法或半非法组织的知识分子。出于对人性的理解，他们都理智而平静地接受我的决定。我一直认为，他们尊重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欣赏我的研究成果。

我在本书第 5 章和第 7 章说过，我在 1955—1956 年间做出了决定，我不会用非法出版物的形式影响局势变化。1957 年，我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决定。我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我立志要成为一名专业的经济学家，并融入西方学术界，通过合法出版物发挥自己的影响。作出这个决定就意味着我要做出某种让

---

* 出版一部文集纪念比博的七十华诞，这个想法是雅诺什·凯奈迪最早提出的。比博去世后这项工作就开始了。费伦茨·多纳特担任编委会主席，编委包括捷尔吉·本斯、山多尔·乔里、阿帕德·根齐、阿里兹·海尔达、雅诺什·凯奈迪、雅诺什·基什、帕尔·雷兹、耶诺·胥奇和扎多尔·托尔道伊。思想出版社起初同意合法出版该书，但后来又表示拒绝，这显然是与党内高层领导人商议的结果。因此，直到 1981 年，这本书还是地下出版物。1991 年社会制度变革后，该书由帕尔·雷兹重编和作序，并最终出版。

步。只要这种让步没有违背我的良心，我就准备做出让步。

我始终努力坚守这一生活策略，在撰写《短缺经济学》一书时也是如此，因此，我没有为比博的纪念文集撰稿。

自我审查要求我做出痛苦的牺牲。对于社会学家，或者更可能是作家和诗人而言，将自己的意思隐藏在字里行间，巧妙地躲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这可能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但是我从未在这种行为中找到过这种愉悦。我总是痴迷于将所要表达的事物清楚而毫不隐讳地说出来，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如果将我本来无法表达的内容留给读者去发现，这对我而言相当于自残。自我审查是有损人格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将制度变革看作一次新的解放的原因，它将我从自我审查的一次次痛苦折磨中解放出来。

那些曾经为非法出版物撰稿的人或许没有感受到这种束缚。他们将他们坚信的全部真理写出来与公众分享。我羡慕他们有这个机会。

拒绝与自己拥有共同政治目标的朋友的要求，是一种让人不愉快且痛苦的经历，这就像让与自己同生共死的战友失望一样。曾经好几次，朋友希望我为地下出版物撰稿，或者在抗议书上签字。我拒绝了所有这些邀请。

我不想在两种生活策略间摇摆不定。我不想像那些抗议者一样，面临嘘声和禁止出版的惩罚。我还想保持我可以去西方国家的特权。但出国绝不是为了游山玩水。每次出国的经历都让我相信，如果我能定期与西方国家的同行们见面，有大量的时间在西方最优秀的院校学习，从主流渠道获得最新的前沿知识，那么我就可以成为一位全职的专业经济学家。在近亲繁殖的东欧学术界中，一个人很容易变得思想狭隘。社会制度发生变革后，与我同时代的一些经济学家在踏入国际学术圈时，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劣势。

一些人在回首往事时总是试图为自己的生活做辩解，认为他们做出了一个可以接受的且符合道德的决定。这种决定不会太过激进，也不会太过让步。他们认为，激进的人过于鲁莽，这些人制造的麻烦超过了可能带来的好处。而那些做出过多让步的人，在与当局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最终向当权者出卖了自己的美德。

评价他人的行为时，我的道德判断表现出更多的宽容，但是我不能接受无原则的道德相对论。有些人的让步太大，在我眼里就是背叛。有些人没有必要地虚张声势，无谓地挑起争端，这对他们的事业没有任何好处。我鄙视政治上的变色龙，他们像挑内衣一样不断改变自己的观点，时刻准备牺牲自己的原则，以换

取政治权力或者有利可图。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生活中存在多种道德上可以接受的策略，事实上，其中有几种策略值得人们尊重。我非常敬佩那些为了民主和人权进行非法斗争，不怕牺牲个人生活和自由乃至生命的人们。

然而，还是说说我自己的选择问题吧。地下出版物的读者通常只有几百人而已，而且基本上局限于一国之内。而像《短缺经济学》这种通过自我审查的合法出版物，则可以影响匈牙利国内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读者，规模可以达几十万人。如果我以此作为辩解的理由，未免有些自私，虽然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人们立刻会提出反驳的观点：地下出版物的作者可以更加激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我在某些问题上只能闪烁其词。但我认为，在专政统治下，这是相辅相成的两种出版形式，而非对立。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始终有人有勇气甘愿自我牺牲来编辑和分发非法出版物。作为匈牙利民主的忠实信徒，我以与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感到骄傲。我深信，他们的文章和我的作品相互支持，互为补充。

注 释

[1] Kornai, 1980, p. 569.

[2] 安德拉什·布罗迪审稿报告的复本保存在我的文件档案中。

[3] 拉约什·法卢韦纪审稿报告的复件保存在我自己建立的文件档案中。

[4] 1980 年 10 月 4 日这篇短文署名 bes，发表在周报《生活与文学》(*Élet és Irodalom*)上。

[5] Kornai, 1979.

[6] Karagedov, 1982.

[7] Barro and Grossman, 1971.

[8] 代表巴罗、格罗斯曼和波特斯学术思想的经典著作是波特斯和温特于 1980 年出版的专著。

[9] Yergin and Stanislaw, 1998, p. 277.

[10] Hoffman, 2002, pp. 89. 90.

14. 一个突破：1979 年后

《软预算约束》

几天前，就在我开始写这一章的时候，在经济学家中拥有最大读者群的《经济学文献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软预算约束的评论文章，作者是埃里克·马斯金、热拉尔·罗兰和我。[1]1979 年，我首次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了软预算约束这一概念。在过去的 25 年里，这一概念已经广为人知。

概念的涵义和重要性

我是从微观经济学的家庭理论中借用了“预算约束”这一表述。假设一个家庭拟定了一份预算计划，为了使收入和前期的储蓄能够弥补支出，这个家庭必须计划自己的收入与支出。家庭可以利用的所有收入，就是它的预算约束，家庭的支出不能超过这一限额。

现在，我们看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是如何运营的。如果企业运营良好，那么，收入能够补偿支出，而且会有盈余。但是，如果支出超过收入，而且还用光了所有的经济来源，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企业完全依赖自己的资源，那么它的预算约束很硬。如果长期亏损，企业在一段时间后将会破产。另一种可能是，上级主管部门可能向企业伸出援手，帮助它摆脱经济困境。在这种情况下，预算约束就很软：即企业的支出没有真正意义的上限。即使企业的支出长期超过收入和创始资金的总和，企业仍将继续生存下去。

对于熟悉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状况的人来说，这个故事耳熟能详。这一问

题在匈牙利这样的国家尤其严重，因为这些国家正在向改革迈出尝试性的步伐，例如，给予经理们基于利润的激励等。尽管人们在不断强调追求利润的重要性，但是利润的激励机制却在遭受实质性的破坏。如果公司盈利，那当然是好事。如果公司亏损，也会有人将它从破产的边缘拉回来。这就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虚假市场经济与真正市场经济的区别。真正的市场经济中，既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

软预算约束的危害非常严重。它表现为，即使价格合理，厂商也不会对价格信号、成本和利润敏锐地做出反应。硬预算约束可以自动惩罚没有竞争力和出现亏损的企业。软预算约束使得企业免受惩罚，并容忍企业的低效率。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不负责任地下订单（这会引起需求失控），因为即使厂家没钱支付账单，帮助厂家摆脱困境的主管部门最终也会买单。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投资计划盲目扩张，这种扩张通常在开始时开支目标非常低，但最后超额支出情况达到令人担忧的水平。

无论是软的还是硬的预算约束，最终都要表明企业管理人员以何者为重。* 如果是硬预算约束，那么企业管理人员将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率上。如果是软预算约束，企业管理人员最重要的事情是搞好与“上面”的关系，这样才能保证企业遇到麻烦时能够获得经济支持和援助。对于管理人员而言，游说并陪伴在上级主管身边比监督工厂运营更加有用。

为什么软预算约束的概念吸引了如此多的关注，影响如此广泛？原因主要在于，它确认了与所有人明显相关的一个现象——软预算约束综合征的原因和规律及其必然带来的结果，是可以理解的。我从一开始就强调，虽然有些现象在社会主义国家广泛存在，但是它也会在私人所有制的市场经济中出现。虽然我最初重点分析的是企业行为中的软预算约束，但我后来注意到，在其他组织中，例如医疗服务机构、教育和非营利组织以及地方政府中，也同样存在这种现象。而且，国际金融机构或者世界金融界在陷入金融危机时，也采用这种方法来摆脱困境，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看到这一综合征的症状。

---

* 当然，在极端软预算约束和极端硬预算约束之间还有若干中间地带，可以分为几级。我在关于预算约束的专著中，就预算约束的软度分级和其他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论述。这本自传的目的是归纳这一思想的主要特征，以便非经济学专业的人士也能理解这一概念。因此，在此谈到的理论都是简化形式的。

但是，人们之所以普遍接受这一概念，并非只是因为它与现实相关联，而是该理论的结构与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契合。研究微观经济学的人都熟悉预算约束的观点。通过扩大并提炼这一广为人知的概念之内涵，我们很容易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曾说我们关于自主控制的思想没有被普及，原因就在于这些思想在几个重要方面不符合主流经济学家的思维习惯。幸运的是，现在的情况刚好相反。由于这一理论以人们熟悉的“预算约束”概念为基础，因此立刻获得了人们的好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也因此有助于这一思想的接受和传播。

背景

我对软预算约束的理论思考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在第 7 章，我曾讨论过匈牙利的国有企业在引入利润激励后，在出现亏损的情况下是怎样为获得补偿而进行辩护的。我在 1958 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利润分成机制是否正确？”从那时开始，这一问题就困扰着我，我感觉到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更重要的东西。

1972 年，日后成为希腊首相的安德列亚斯·帕潘德里欧，寄给我一本有他亲笔签名的《父权制资本主义》，当时，他在一所加拿大大学教授经济学。他的书让我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在许多不同类型的社会中都存在的父权主义特征。其中对我触动最大的，当然是这些特征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

即便在匈牙利专政统治最为残酷的时期，共产党执政者也喜欢扮演“人民之父”的角色。在统治有所放松时，严父的形象被慈父的形象所取代。从政治结构角度来看，父权主义意味着在其他社会中由个人、家庭、中介团体或底层组织（例如厂商）掌握的决定权，将集中到政府手中。在社会发展早期，父亲掌握家庭的决策权，他有责任照顾家庭。父权型社会将其社会成员看作未成年人，几乎与婴儿一样。父权型社会不认为社会成员可以照顾自己，而是认为他们在面临任何困难时，理所当然地应该等待来自上级的救援。

一个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即父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援助处于困境中的厂商，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在奥斯陆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我首次提出这一观

点。我用家庭抚养子女的例子来描述政府与厂商的关系。我将父权主义从零到四划分为五个等级。在第四等级中，政府向社会成员发放实物补贴，成员被动接受。这就像新生儿接受父母给予的一切，而不需要提出任何要求一样。在第三等级中，社会成员积极表达自己的意愿，政府根据社会成员的意愿发放实物补贴。孩子长大之后，他虽然仍从父母处获得所有东西，但是他能够向成人表达自己的愿望了。这两个等级的父权主义类似于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中政府与厂商的关系。政府制定生产计划，提供完成计划所需的资源。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十分强硬，那么厂商甚至不能与政府进行商议（第四等级）。如果统治有所放松，那么厂商就有机会与政府就计划指标讨价还价（第三等级）。

在第二等级中，政府发放财政补贴。孩子（例如一个典型的美国大学生）已经离开家，但还没有完全独立。父母仍会给他零花钱，并且支付生活费和学费。如果钱用完了，孩子会要求父母增加零花钱，通常父母会同意。在与此类似的经济生活中，厂商接受政府对于某个投资项目的资金分配，并且控制这笔资金的使用。但是，如果钱用完了，政府仍然会为他们支付额外的支出。

我将第一等级称为已经自立但仍需扶持阶段，而零等级是完全自给自主阶段。在这一阶段，孩子已经长大。他（或她）通常可以养活自己，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出现困难时应该怎么办呢？父母或许会伸出援手（第一等级），或者觉得孩子现在应该自食其力（零等级）。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厂商的实际运营情况，第一等级反映了以市场为导向、正处于改革进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厂商自负盈亏，但是一旦出现长期亏损，政府还是出来伸出援手。零等级描述了完全摆脱父权主义的社会以及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企业破产就是自己的问题。不能指望任何人为它偿还债务。

后来，我将这种对于家庭和社会中父权主义的分级描述写进《短缺经济学》一书。在奥斯陆大学演讲期间，我还没有采用软预算约束和硬预算约束这种说法，但在《短缺经济学》中，我在父权主义的表达中，用到了这些新术语。父权主义的第二等级，尤其是第一等级，构成我所定义的软预算约束的主要内容，而零等级为硬预算约束。

在思考预算约束的作用，或者试图界定这一概念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个术语。我的出发点是真实的经济现象和观察到的社会现实。对我而言，“预算约束”这一短语的出现差不多是偶然的。我在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系列讲演做准备时，我写了一些描述国有企业运营情况的数学方程式，其中包括国有企业的产

出约束下限和可用资源约束上限。为了模型的完整性，我不得不同时增加了财务约束这一因素。虽然在利润最大化厂商的标准微观经济学模型中，不太常见“预算约束”这一概念，但我还是将预算约束写入了我的模型。但是我立刻发现，它并非有效约束。厂商无法克服资源约束，比如原材料限额；但是，如果厂商的预算约束是软的，那么厂商就知道，如果自己遇到困难，上级部门肯定会进行援助。

因此，我在讲演中使用了“软预算约束”这一表述。我记得当时观众席上有两位教授，一位是来自瑞典的本特-克里斯蒂安·伊桑德，另一位是美国的哈维·拉帕姆，还有一位学生拉斯·斯文森(Lars Svenson，现在是著名经济学家)，他们在我演讲结束后走上前来，表示他们非常欣赏软预算约束的观点。这几句简单的鼓励，促使我更加认真地思考这一表述，并且从事相关的理论问题研究。

此后，在关于短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概况的演讲中，我都将软预算约束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功能失常的典型特征，对它的描述和分析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知识的发展历史中，一定存在这样的实例，即某一理论在某人的头脑中出现时，就具备完整而成熟的形态。但是，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在我身上。从 1958 年的那篇关于短缺经济的匈牙利语文章开始，直到 2003 年《经济学文献杂志》发表的评论文章，其中的基本思想从未发生过变化：然而这 45 年的时间，使我在描述方法、解释原因和展示结果的诸多方面有了变化。我现在对于软预算约束的观点，主要体现在 2003 年的文章，以及 1992 年的概述性著作《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由于早期和后来的观点存在两个区别，又由于这些变化已经超越了狭隘的专业范畴，因此我在这里有必要予以说明。

在早年发表的文章中，我对软预算约束的解释重在强调政府的家长角色。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家长，既然已经有了国有企业这个“孩子”，就不能置之不理。而且，国家还要保障企业雇员的生活。许多人读到这里，会认为这是对软预算约束因果分析的终点，但实际上，这并非分析过程的终点。即使在当时，我心中就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要如此行事？它是如何接受与不可分割的权力需求相联系的“关爱”角色的？这一角色如何与政治结构和官方意识形态相适应？《短缺经济学》的最后一章，即第 22 章讨论了父权主义，接下来本应该还有一章讨论这些关系的更深层次内容，但是我没有写。就像我在前面所提到的，自我审查阻止了我继续

撰写第 23 章。

幸运的是，很多读者已经能够想象《短缺经济学》一书所蕴含的思想将如何发展。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沿着我的思路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只是认为我没有更多要说的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想知道，这些同行是如何看待我的思想的？他们真的相信，我住在布达佩斯那么长时间，却不知道共产党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吗——即使我没有明确写出来？* 当然，我确实清楚地看到了政治结构在国家与企业关系上留下的印记。我曾试着在字里行间暗示这种联系，但这种努力只是徒劳而已。在该书的最后几页，我笼统地描述了“制度体系”所起的作用，但是，对于某些读者而言，我这样做显然不够。

我在前一章中曾讲过，为了《短缺经济学》和其他著作能够合法出版，我付出了惨痛代价。我决定终止对父权主义下短缺的因果链条做出解释这一举动，也引起了许多误解。我认为这一结果是合法出版该书的一个代价。1992 年，《社会主义体制》一书出版时，自我审查的障碍已经开始瓦解，因此在这本书中，我终于可以说出我对软预算约束的全部看法。

由此，我的思想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我认为软预算约束和短缺两者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现在，我特别强调这一因果关系的强度。

在一国出现全面、长期和剧烈的短缺经济之前，负责生产大部分产品的企业所面临的预算约束必然是软的，但这并非充分条件。其他因素一定也在发挥作用：比如取缔自由企业制度，比如政府采用行政措施，以限制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的竞争，比如价格体制扭曲，等等。《短缺经济学》重点强调软预算约束。这一论证弱点不能用自我审查和需要自愿删减以保证合法出版来解释。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分析不够成熟。

在对软预算约束的后果所作的分析上，还出现了另一种偏见。短缺是《短缺经济学》一书的主题，因此该书的重点放在探讨短缺综合征如何影响“失去控制的”需求。这种影响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软预算约束对生产与竞争以及激励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成为研究这一问题的所有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短缺经济学》也指出了这些影响，但是我现在更多的是强调它的严重性，而且把这一

---

* 几十年来，我一直发现，一些西方同行对于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可能受到审查或自我审查的限制一无所知。他们的不理解总是让我惊讶。

影响放在预算约束造成的有害影响之首。

实证检验

我认为，理论的诊断如果能够在实践中得到证实这非常重要。1983 年，我和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的青年讲师阿格尼斯·毛蒂奇开始建立过去几年匈牙利国有企业主要财务指标的数据库。我们将大约 130 万个数据输入计算机，当然，当时计算机的计算效率要远低于现在的计算机。阿格尼斯和她的同事们将数字转换成更容易处理的形式后，我们进行了各种有启发意义的经济计量分析，表明了企业利润二次分配渠道的复杂性。企业利润经过官僚机构曲折的再分配过程后，已经严重偏离企业原始的利润或亏损，因此，人们无法辨别最后出现在企业账本上的“最终利润”数据。这一计算明白无误地证明，官僚机构的再分配将初始盈利企业的大部分利润抽走，输送到初始亏损企业。盈利多的企业受到惩罚，亏损企业反而受到不正当的奖励。这一结果为我们提供了存在软预算约束的确实证据。1987 年，我和阿格尼斯·毛蒂奇在《企业利润的官僚式再分配》一书中共同给出了这一计算结果。

在苏联解体之前，其他研究者也对软预算约束进行过实证检验，但是，这种研究非常零散。如果将时间快速推进到 20 世纪 90 年代，那么我们会看到，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只有在那时才获得飞速发展。这是思想突飞猛进的一段时期。到访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西方学者突然认识到，软预算约束是这些国家之前的体制固有的经济顽疾之一。同时，许多人开始理解，硬化预算约束是完成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任务之一。人们根据仔细收集的统计数据和计量经济分析，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研究。另外，世界银行或欧洲复兴和发展银行关于社会主义或后社会主义经济的报告，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涉及软预算约束如何影响厂商行为的问题。

对软预算约束现象建立数学模型

与实证检验一样，在为软预算约束综合征建立数学模型的过程中，我觉得我

也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正式理论检验。我找到了一位优秀的合作者约根·韦布尔(Jörgen Weibull)。* 约根不喜欢“软预算约束”这一表述,但对父权主义的概念很感兴趣。我们成功设计了一个数学模型,证明在亏损企业可以通过父权主义方式获得国家帮助的情况下,企业在安排下订单时会缺乏谨慎态度,而且需求的增长会快于在竞争环境中自负盈亏时的需求水平。[2]

普林斯顿大学的匡特教授也就软预算约束建立了一个有意思的模型。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授课期间,理查德·匡特就一直为我提供帮助,现在,他也开始研究软预算约束理论。他和他的同事就这一主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例如,他们证明了“科尔奈效应”的存在,即证明了软预算约束的“软度”与厂商对投入品需求增加之间的理论联系。[3]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和当时还是博士研究生的马赛厄斯·德瓦特里庞建立的模型,使软预算约束理论的研究出现了转机。[4]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在哈佛大学授课时,就与埃里克就社会主义经济包括软预算约束问题有着非常多的交流。他和马赛厄斯已经对众所周知的博弈论中的“承诺”问题研究了一段时间。这一观点认为,“博弈主体”(在给定的情况下,进行合作或发生冲突的博弈参与者)间的关系会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向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博弈各方是否遵守他们之前的约定,或者实质性地改变他们的立场而背弃承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行为是始终如一还是前后不一致?这两位理论经济学家认识到,我所提出的软预算约束是一个特殊的前后不一致现象。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家大型银行向某厂商的投资项目提供贷款。银行承诺会严格遵守初始的贷款合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银行都希望厂商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投资项目。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投资者的厂商如果发现自己出现资金紧张,无法履行初始的贷款合同条款时,尽管银行当初有过承诺,在企业资金紧张的情况下,银行还是会向企业提供资金援助,这表明,银行愿意在事后改变贷款条件,或提供更多的贷款。

---

* 我在瑞典时遇到约根,他当时还是一名学生,但是,就像是命运的安排,他不仅成了我的合作者,而且成为我女儿的丈夫和两个瑞典外孙的父亲。

我们对于父权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当时,在约根对布达佩斯的一次访问中我们开始合作,通过斯德哥尔摩和布达佩斯两地间的通信往来,我们完成了这一研究。今天,在互联网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里,这种合作形式或许并不让人感到惊奇,现在的合作者经常相隔万里却能共同完成一篇论文。

模型分析表明，银行出于狭隘的经济利益考虑，愿意提供资金援助。一旦它将资金投入这一项目，即使出现坏账，它还是会继续投资，这是一种理性选择。

德瓦特里庞—马斯金(Dewatripont-Maskin)模型在两个方面尤其重要。首先，它充实了软预算约束的因果分析。它不再局限于从政治、宏观经济或社会因素来解释某一机构对亏损企业的援助动机。* 即使简单的利己主义动机也会促使一家以利润为导向的银行，援救和帮助处于亏损状态的贷款企业。我们可以从商业实践中看到这一实情：在一段时期内，大银行做好充分准备，救援经营不善和不可靠的企业客户。这样做或许比单纯的破产清算显得更加合理，损失也更小些。

德瓦特里庞—马斯金模型另一吸引人之处在于，它利用博弈论的数学工具来解决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学家的兴趣已经转向博弈论——数以百计的研究者都愿意使用博弈论的方法。博弈论成为研究热点。人们想要应用和深刻理解这一令人着迷、精巧而灵活的方法，现在，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一简单明了的模型，描述软预算约束问题了。

在德瓦特里庞—马斯金模型推出之后，又出现了这一模型的几个变体。每种变体都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软预算约束综合征诸方面的起源和影响。

第一篇总论性文章背后的故事

现在，让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回到前面没有讲完的故事。截至 1984 年，我在几篇文章和《短缺经济学》中都提到了软预算约束问题。我觉得是时候就这一主题写一篇文章，总结我对这一问题的所有思考。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广为流传，而不仅限于受到苏联和东欧问题专家的关注。我相信，如果其他经济学家也接触到这一仍然鲜为人知的观点，或许会促使他们将这一概念用于市场经济的研究。

这篇总论性文章没有使用任何数学模型。文章自始至终都是用文字论述自

---

* 我们何时可以认为某种救助行动是合理的呢？对于那些希望获得类似救助的人来说，救助对他们的行为会产生更为间接和持续的影响，那么，救助所产生的预期宏观经济或社会效应要比这种影响更加重要吗？当然，对这一重要的、在学术上具有激励作用的规范问题的讨论已经超过了这本自传的范围。

己的观点。虽然使用了一些说明性的表格，但仅限于用表格中的数字说话。文章没有对数据作任何数学统计分析或经济计量分析来支持其中的观点。

我将这篇文章提交给经济学领域最权威的期刊《美国经济评论》。几个月后，我收到编辑的回复。编辑告诉我，文章已经交给三位审稿人审阅。其中的一位审稿人认为，文章略作改动就可以发表，但是另两人作了激烈的批评。编辑认为，虽然这两份批评的意见措辞严厉，甚至有些过分，但他认为，如果我能以调查报告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不是投给他，而是投给《经济学文献杂志》，也许效果会更好。他知道我已经答应该期刊，为他们写一篇相关题材的文章。[5]

编辑的婉拒是因为他了解的情况并不准确。我确实在为其他期刊撰写文章，但是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关于匈牙利经济改革的全面调查和评价，完全不同于上一篇文章的主题。两篇文章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相通之处。

简而言之，《美国经济评论》拒绝了我的文章。我又将这篇文章交给了《学术界》(*Kyklos*)杂志，文章未作任何改动就发表了。[6]文章发表后成为我所有发表作品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

我只能安慰自己说，其他更伟大的作者也曾有过作品被拒的经历。许多年后，两位美国研究者约书亚·S. 甘斯和乔治·B. 谢泼德对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做过调查，了解他们是否有过文稿遭拒的经历。* 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罗伊·哈罗德爵士(Sir Roy Harrod)，到 20 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保罗·A. 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调查对象中的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一些顶级期刊曾经拒绝过他们的投稿，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经济学理论经典的文章。既然我的经历远非孤例，那么我就不再讨论这个话题了。

但是，这个故事的后续发展却非常有意思。几年后，钱颖一(Yingyi Qian，当时他还是哈佛大学的研究生，现在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也向《美国经济评论》投稿；文章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短缺如何与预算约束的软度产生联系。他设计了一个精巧的数学模型，也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德瓦特里庞—马斯金模型的变体，来研究这种关系。他以学术期刊的惯用方式，运用准确的数学

---

* 我也是被调查对象之一，但是当时没有告诉他们这个故事。既然《经济学文献杂志》的一篇文章已经讲述了软预算约束思想的传播过程，那么我认为，是时候说出这个故事了。这些回忆把事件放在其背景中来叙述，为讲述这个故事提供了最好的框架。

语言和严格的论据，提出了他的理论命题。文章列出了他的学术来源：《短缺经济学》、我发表在《学术界》杂志上的文章和德瓦特里庞—马斯金的研究。这篇文章成为钱颖一博士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和埃里克·马斯金曾当过他的老师，而且被学校指派为他的博士论文导师。我们都读了文章的初稿，并且以论文导师的身份提出了意见。钱颖一也在文章中表达了他的谢意。

钱颖一在文章中提出了与软预算约束相关的问题，在广泛引用了该主题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严谨而明晰的语言提出了自己的原创性观点。我认为，编辑接受并发表这篇文章是非常正确的。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产生一丝一毫对于后辈的妒忌。在钱颖一的学生时代，我们就结下了友谊，并且这种友谊日渐加深。我总是尽力帮他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也给了我很多专业上的帮助，无论何时我们相遇，总是互致友善真挚的问候。* 当我最优秀的学生在经济学最知名的论坛上发表他的研究成果时，我由衷感到高兴。

但是，《美国经济评论》为什么拒绝了第一篇文章却接受了第二篇文章呢？尽管我是以被拒绝者的身份提出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个人的故事还是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审稿人采用什么标准来决定稿件能够发表呢？文章的发表会对作者的学术生涯产生什么影响？从更深层次来看，现今在出版、任职和晋升上的做法鼓励了哪些学术行为？

几点教训

开始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指出，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对该问题的充分阐述已经超出了这本自传的范围。因此，我在这里只进行局部因果分析，而且只涉及与我的故事有关的部分。** 我不会分析杂志社的选稿标准中其他同样重要的方面，也不会考虑这些选稿标准产生的所有有益或有害影响。例如，期刊的编辑和审稿人在选择可以发表的稿件时所持的严格的专业

---

* 我和妻子第二次访问中国时，钱颖一特意从美国飞回中国，协助我与中国同行的交流。我们的口译员出了很多问题，因此，很多场合都是他担任我的翻译。他曾开玩笑地说，自己精通三种语言：英语、汉语和科尔奈语！

** 我只考虑社会科学的问题，对于自然科学家如何工作，或者引导他们有所发现的过程如何，我知之甚少。

标准，我不会讨论这些标准会产生何种有益的影响，尽管我认为它们也非常重要。

顶级期刊的选稿过程也包括了偶然因素。两种可能的错误显然都有出现的可能：有发表价值的文章被拒绝，没有发表价值的文章得到发表。取舍的决定都是由人做出的，而任何人都不可能从不犯错。问题是，是否会出现系统性错误。在接受和拒绝的工作中，是否存在带某种规律性的和反复出现的扭曲做法？许多人都提出，在这个过程中有几种扭曲的倾向，我只详细讨论其中一种。

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第一次提出真正具有重大意义和前瞻性的新观点时，很少能够用近乎完美和准确无误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 新观点第一次出现时，通常是以模糊的推测形式出现，人们由此开始一段漫长的思考和理解过程。有时候，一个错误却发人深省的表述，会引发一系列探索，并最终取得丰硕成果，研究者正是在反驳错误的实验过程中，一步步接近真理。

自从数学进入经济学的工具箱后，它就在经济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根据我对许多学术理论发展过程的追溯，令人兴奋且意义重大的发现，通常都是由开拓性研究者以文字表述而非数学模型的方式提出的。亚当·斯密最初是以散文形式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协调作用，很久之后，才出现了莱昂·瓦尔拉斯数学形式的均衡理论，当然，按照现在的观点，当时的均衡理论多少有些不准确。后来，肯尼思·阿罗和热拉尔·德布鲁提出了更为精确而完美的均衡模型。关于利率和流动性偏好理论，先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不够准确的观点，后来才有约翰·希克斯的 IS-LM 模型（即投资—储蓄、流动性—货币供给模型），该模型以数学方法证实和深化了凯恩斯的观点。[7] 最早提出正义论的是约翰·罗尔斯，后来是阿罗以数理形式描绘了其中的一个观点。[8] 约瑟夫·熊彼特首先著述讨论了企业家的作用，但书中没有任何数理分析。[9] 几十年后，菲利普·阿吉翁等经济学家则以简明而严格的数学模型，为熊彼特思想搭建了框架。[10]

虽然我的论述非常简化，但是我们仍然能从中看到经济学研究的三个连续阶段（当然，这三个阶段有时候会出现暂时的重叠），或者更准确地说，本质上全

---

* 当然也有例外。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可能就是这样的范例，这一理论是真正出色的、原创性的发现，它从出现的那一刻起就以准确的数学方式加以表述。

新发现的出现和发展包括三个连续的过程。第一阶段，某些学者认识到并提出一个问题，给出了关于这一“谜团”的第一个模糊的解答。第二阶段，某位学者“厘清”了论证的思路，提出了准确的概念体系，阐明了获得可证明的结论所需的假设和抽象概念，并且为这一命题提供了逻辑证据。第三阶段，也就是最后的阶段，人们得出了结论，或许还进一步提出了理论问题，同时也为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有实际意义的经验教训。

第一阶段扮演主要角色的是直觉和发现问题的能力与想象力，以及以新的方式将孤立的观察和陈述联系起来的能力。数学模型的分析作为一种重要技术主要出现在第二阶段（在某些主题的研究中，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方法）。在第三阶段，即得出理论结果的阶段，包括与第一阶段相类似的认知过程。实用的结论主要依赖对现实的充分了解和批判精神，这使得人们能够对理论命题与实际应用加以比较。

我从不认为，这三个连续的阶段构成了经济学领域重大发现的普遍适用的模式。我知道有些研究者在第一阶段已经建立了数学公式，规划了模型，或者用几何图表展示了各种关联，我也知道另外一些人极力避免使用这类技巧。研究的过程通常是反复的过程：第二阶段初期的试验会促使研究者重新思考第一阶段。换言之，研究者要澄清提出的问题和设计新的猜想。在以集体方式开展科学研究时，不同阶段的任务通常由不同的研究者完成。我对研究过程三阶段的划分，重点不是各阶段暂时的顺序，而是强调认知过程中较为松散和较为严格的部分之间是有区别的。*

按照我的经验，数理经济学泰斗们都非常清楚认知过程的复杂性以及不同角色的分工。我从未听说，阿罗或者库普曼斯这样的经济学大家会蔑视那些表达不准确或者不够准确却包含真知灼见的思想（或者这些思想的创造者们），或者诋毁创造这些思想的人们。**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维尔登·卡尔（Wildon Carr）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模糊的正确好过准确的错误。”[11]

---

* 我的批判性观察实际上有两个非常显著的重点：在对表述不完整的新观点进行选择时缺乏耐心，对于没有数理模型的纯语言风格陈述的偏见。在实践中，这两个问题经常同时出现，因此，将它们放到一起研究也是合理的。

** 我清楚地记得，一位平庸的数理经济学家曾经贬低赫希曼的《退出、呼吁和忠诚》（1970）一书，我在前文中曾讨论过这本书。这个小册子从新的角度揭示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新观点。而这位经济学家全盘否定这本书，认为它冗长而混乱。他完全没有看到作者用这样的篇幅论述如此简单主题的意义所在。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学术期刊的选择标准。那些具有很高学术价值、不过尚需完善的原创性文章应该发表在哪里呢？是不是只有结构完整且表述足够准确的论文才应该出现在最负盛名的期刊中呢？这些期刊只有在完全确认投稿人不会犯错的情况下才会选用他的稿件吗？*

例如，如果《美国经济评论》专门刊登我所谓的“第二阶段”的研究成果，只要其他不那么著名的期刊能为“第一阶段”的论文留出空间，那么也不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作者提出最初猜想和未完成的思想的文章，应该与成熟的论文一样，也能得到发表。**

我刚才使用了“不那么著名”的字眼，幸运的是，仍然有期刊愿意发表那些有前景的半成品。但是，这些刊物通常是二级刊物，在面试和晋级时发挥的作用远远低于一级刊物。我们现在处于两个主要问题的交会点：顶级期刊如何选择文章和顶级研究型大学如何选择教师。当我第一次听到一位瑞典研究者半是嘲讽、半是认真地说，在瑞典，只要在《经济计量学》上发表两篇文章就可以晋升为教授时，我感到大吃一惊。即使这个说法并非完全真实，但是也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在西方国家，刚刚拿到博士学位进入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如果他想尽快晋升，那么他就不应该尝试提出新的观点。对他而言更有保障的方法是，在研究中采用专业领域内广为人知和得到接受的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经过尝试和为人所接受的数学模型。他需要做的只是将它们稍作改动，使每个概念变得精确，每个前提准确无误。这样的文章被顶级杂志接受的机会非常大。***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光彩夺目的最保险的方式是，按照这些标准，在顶级期刊发表一系列此类论文。

---

* 如果一个重要的理论出现，甚至已经建立完整的体系，那么也就无需编辑或审稿人具备深刻的洞察力，进而判断作者对于已经成立的模型稍作变动是否有意义。但是，对于不够完整的理论和命题的挑选需要敏锐的眼光，以鉴别出哪些理论具有发展前景，未来可能成长为成熟的理论；哪些理论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或者让人迷惑的，然后发表前者而拒绝后者。

** 就这个问题，我也可以以自己发表作品的经历作为例证。1978 年，我参加计量经济学会在芝加哥和日内瓦召开的会议时，提出了我当时正在写作的《短缺经济学》一书的主要思想。该书从头至尾采用了“散文”手法，没有任何数学模型。当时的理论观点还很不成熟。然而，《经济计量学》当时的主编雨果·索南沙因决定发表这篇文章。我相信，在《经济计量学》的办刊史上，这样一篇文章的发表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它完全没有数学公式，完全不同于其他稿件的通常形式。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索南沙因教授敢于创新的勇气和对非主流思想的开放态度。

*** 提出全新的命题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这一命题不可避免地要用很长的篇幅讨论，而顶级期刊只喜欢篇幅短小、简洁明了的作品。

我发现上述选择过程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它使学者们远离尝试和反复试错的研究过程。期刊编辑们认为，一旦出现错误，给自己带来的风险太大。然而，只有经过一次又一次脱靶的失败，枪手才能练就一枪命中靶心的本领！这种审稿体系使研究者习惯于谨小慎微，而他们本应该被培养成充满理论勇气的人。瑞士经济学家布鲁诺·弗雷(Brune Frey)2003 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出卖灵魂获得发表？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学术失败间的选择》，这个标题正是对问题严重性的最好诠释。

今天，经济学顶级期刊仍然不会给年轻的研究者们提供磨练的机会，鼓励他们小试牛刀。这是一个自我强化和自我发展的过程。更多的学术期刊以《美国经济评论》为榜样，采用它的编辑准则。更多的二流和三流大学向世界排名前五位或前十位的大学看齐，要求助理教授们使出浑身解数，写出能够挤进期刊绞肉机的文章，而不给他们任何动力来从事危险的(例如不大可能发表的)观点的研究。顶级期刊会从这些发表文章的年轻人中选择未来的审稿人，他们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仍然偏爱与自己写作方式相似的作品。这种既定的选稿方式会固定下来并传承下去。因而，期刊在文章风格、内容、形式、研究结构和方法上逐渐统一，变得千篇一律。

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探讨这个话题。我们发现，其他国家的经济部门和经济学期刊也在逐渐效仿美国这一带有偏见的出版标准，将其作为雇佣、保留职位和升迁的依据。或许更加危险的是，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也在效仿美国经济学研究的不良方式。有时，这些学科领域的人会受到威胁：一定要为你所研究的现象建立模型，否则我们就认为你的工作是非科学的。数学方法使投稿增加了“让人尊敬的成分”，这一现象最初主要发生在经济学领域，但现在在其他社会科学中也越来越多。虽然观点可以用日常语言简单明了地表达，但是如果将它以更复杂的方式，即以数学公式展示出来则是更聪明的做法。虽然这种形式的表达更难以理解，但看上去却更加科学。在通常情况下，数学公式或等式就像论证过程中多余的装饰物一样；这种装饰没有任何解释功能，只是让论证看上去更让人印象深刻而已。

我的批判性观点并非针对理论的形式化或者数学方法的运用本身。我本人一直是这些方法坚定的拥护者和谦虚的实践者。我所反对的是对这种研究方法盲目的夸大和偏见，强势地将一种方法或手段置于垄断地位。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我希望更多的学者支持和理解并推崇尝试、学术实验、创新和原创性等重

要学术要素。

我经常为自己没能在美国平静的学术世界中生活而不胜唏嘘。我非常自信我在那里能够从讲师顺利晋升到终身教授。我本可以避免误入歧途或进入死胡同，获得直接的进步！但是有时候，我又为自己能有这样不同寻常的经历而庆幸。从我开始进行研究的那天起，我便没有让外界强加的纪律成为自己的枷锁。与其成为一个机械化的“模式复印机”，我更愿意成为一个局外人。由于这个原因，我可能多次偏离正轨，但是我总是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学术独立性。

最近，顶级期刊的选稿标准和期刊对于经济学发展的影响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国际争论。* 我希望我的评论对这场讨论有所贡献。我已经详细分析过这一问题，因为我相信，我的投稿经历绝非个案。我不是以被拒绝的投稿人身份，利用这个机会发泄怨气，而是要说出一个重要而广泛存在的现象。

在前面几章里，我曾提到为布达佩斯经济研究所撰写改革报告的经历。1971 年，我认为任职和晋升时应该更多地考虑一个人发表的作品。我提出，应该让东欧人也参与到国际顶级期刊的竞争中去。我承认，33 年前，我对西方经济学界扭曲的选稿标准并不像现在这样了解。但是，即使我知道这些扭曲的方面，我仍不会收回我当初的建议：东欧的作者应该竭尽全力在这些具有国际地位的期刊上发表文章。我曾在第 11 章将其比喻为向西方市场出口商品，这里我要进一步扩展这个类比。为了改进匈牙利（或者更普遍的说是东欧）的产品质量，有必要强迫匈牙利国产商品满足西方市场更高的需求标准。即使我们知道西方市场并非完美无缺，但是这样做仍然是正确的。完美市场应当具有的理想选择过程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扭曲：即垄断、大公司的特权和消费者对于未知产品的歧视等。我们不能将自己局限在本国范围内；我们千万不能抱着狭隘的本土思想，仅仅满足于在熟悉的国内市场上获得成功。这样做只能导致妄自尊大和质量标准下降。

因此，尽管我对国际经济学界提出了批判性的观点，但是，我仍然坚持之前关于发表文章的建议，尤其是发表文章对于匈牙利国内晋升和专业任职的决定性影响。

---

* 这场论战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是格伦·埃利森（Glenn Ellison），他曾经是顶级理论数理经济学期刊《经济计量学》的主编。他猛烈抨击了当下学术期刊的做法。

注 释

[1] Kornai, Maskin and Roland, 2003.

[2] Kornai and Weibull, 1983.

[3] Goldfeld and Quandt, 1988, 1990, 1993.

[4] Dewatripont and Maskin, 1995.

[5] 我与杂志编辑的通信以及审稿报告都保存在我的文件收藏中。

[6] Kornai, 1986b(1980).

[7] Hicks, 1937.

[8] Arrow, 1973a.

[9] Schumpeter, 1983(1934).

[10] Aghion and Howitt, 1998.

[11] 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这种说法,文章作者误以为这句话来源于凯恩斯,但这句话实际上出自维尔顿·卡尔。参见 Shove, 1942, p. 323。

15. 温和而客观的批评：1968—1989 年

《匈牙利改革过程：愿景、希望和现实》

1948 年，南斯拉夫与苏联集团和苏联的政治霸权决裂，紧接着在 1949 年，南斯拉夫拒绝实行斯大林的经济控制体制，转而采用土生土长的“自我管理”体制。然而，匈牙利是苏联集团中第一个尝试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国家。1968 年，匈牙利终止实行指令性经济。政府不再对国有企业发布指令并控制企业的生产，也不再对企业的原料、能源、劳动力和工资进行集中分配。“经典的”斯大林模式被“新经济体制”所取代。

可以说，摒弃民族主义的偏见，匈牙利改革进程所具有的意义早已超出了国界。匈牙利的发展给所有受僵化的指令性经济压制的地方带来了希望。当时的许多人认为，匈牙利是一个可以效仿的榜样。它的经验影响了中国的改革，也影响了苏联和东欧经济学家的思想。那些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西方学者，也在仔细研究匈牙利的改革进程。

或明或暗的希望

1968 年的转折点之后，匈牙利经历了 20 年的狂热时期。随着政治势力之间关系的不断变化，改革进程几经反复；如果反对改革的政治力量占了上风，那么改革就出现逆转。最终，前进的势力取得了胜利，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匈牙利显示出比 1968 年更为强烈的市场经济特征。但是，这种市场经济仍是一个混合体，这一混合体表现为官僚机构和市场的矛盾组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89—1990 年制度变革的前夜。

匈牙利的国有经济部门所建立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充斥了虚假和人为成分的赝品。虽然政府不再制定详细的指令计划，而是将决策制定权交给了经理层。但是，如果经理仍由党委和政府部门选拔，而且党委和政府部门掌握着对经理们的生杀予夺大权，那么，企业拥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独立自主权？真正的市场价格应该由买卖双方协商决定。而在匈牙利，许多价格仍然不是由买方和卖方直接决定，而是由中央价格办公室决定。在比较理想的情况下，中央价格办公室“模拟”市场机制，根据现存的供求比率找到合适的价格水平。但在比较糟糕的情况下，它甚至不会尝试模仿市场价格。从一开始，匈牙利的价格水平就是如此确定下来的，这导致有些产品——甚至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而其他企业的高价格则保障了它们的利润。因为利润的作用日益重要，公司管理层不得不比以往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提高盈利能力。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由于价格机制出现扭曲和官僚机构的利润再分配，追求利润这一激励因素也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如果一家企业创造的利润“太多”，那么它的收益将被掠夺，并通过再分配转移到亏损企业。这是一场只有胜利者没有失败者的竞争。换言之，预算约束始终是软的。

那些原本寄希望于市场机制取得进展的人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同样，另外有些人则主张将部分决策权分散，同时最重要的决策权仍需保留在中央政府手中，但他们对于现状也是喜忧参半。他们主张用间接管制取代先前的直接管制（即计划指令），这些间接调控手段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利率、汇率、税率和国家补贴等，中央经济主管部门的意愿，可以通过这些手段传递给生产者和消费者。

但是，这只是白日做梦而已。* 我在 1982 年写道：“我眼前出现这样一幅画面，我首先走进一家工厂的现代化控制室，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调控设备’：数以百计的按钮、开关和信号灯。控制室的工作人员穿梭其中，不时地按下按钮，启动开关。然后我来到生产车间，看到工人推着装有原材料的手推车走来走去，工头们声嘶力竭地发号施令。是的，这里才是真正从事生产过程的地方，但是完全独立于控制室，那里的哪个按钮何时按下与这里的生产没有任何关系。毫无疑问，控制室和生产车间并未连接起来。”[1]

控制室和生产车间之间缺乏联系。如果企业对于价格和成本仍然缺乏足够的敏感，那么利率或汇率有什么用呢？中央官僚机构对于利润的再分配意味着盈利能力仍不是决定企业生死的关键，所以，企业对价格的反应仍然很迟钝，经理的职

---

* 拉斯洛·安托尔（László Antal，1982）恰如其分地称为“调控幻想”。

业生涯更多地取决于他们与高层政府的关系，而非他们在市场上取得的成功。

官僚主义者还在控制着企业的经营者，但是他们尽量采用更加松散的方式进行控制。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也有好处，它为企业层面的创新者提供了空间，同时也让市场的波动在某种程度上对企业造成影响。虽然某些重要领域还是存在短缺现象，如许多进口商品的交易、房屋出租、电话服务和医疗服务等，但是，许多商品和服务的短缺得以缓解。

在微观层面上同时普遍实行的分散决策和宏观经济控制较为松散。当时，整个东欧地区处于体制改革的临界点，各国正在经历分权化改革。匈牙利和后来的波兰都出现了通货膨胀率急剧攀升的局面，而阻碍放松工资管制的机制仍然存在，国家的外债也呈现螺旋上升趋势。旧的斯大林式的行政纪律不再能够控制不利的宏观经济走势，而真正的利润激励、竞争和市场力量还没有形成足够的约束力。这些进行局部改革的国家相比社会主义专制统治的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萨克政府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政府——而言，经济形势出现恶化，这些国家经常账户盈余较多，工资和物价水平更加稳定，当然，这些宏观利得是以人们生活水平下降为代价的。

1968 年的改革主要是在国有部门建立新的经济机制。这次改革进程的副产品就是非国有部门不断扩展自己的产品和服务领域，而且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所有制形式。当时还出现了多少独立于政府的所谓小型合作社，与称作简单合作社的实体相对，后者实际上是由党委政府任命的管理者负责。当时，还出现了产权完全归私人所有的小型手工作坊、小商小贩和个体服务提供者。还有一种奇怪的所有制形式叫做企业内部经济劳动合作（*vállalati gazdasági munkaközösseg*，VGMK），这是国有企业内部的一座私有制孤岛。最后，这些国家还出现了“第二经济”的萌芽，数万甚至数十万在“第一经济”部门上班的人，对本职工作敷衍了事，却在业余时间自谋职业。匈牙利改革进程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政府虽然没有鼓励人们侵蚀经典社会主义中非常典型的垄断和国有制主导地位，却对这种侵蚀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

从幼稚的改革者到严谨的分析家

上文对于匈牙利改革的描述过于简单，没有涉及这一极其复杂的改革进程

的细节部分。我只是突出了被我视作新经济机制的典型特征。如此简单扼要的说明，不可能追溯这一改革进程的整个发展过程，它只是提供了一幅 20 世纪 80 年代匈牙利经济体制的静态画面。我希望在本传记中表达的是，我对社会主义制度再生过程的立场，我是如何看待这一再生过程的，以及我在这一过程中的所作所为。

本章的标题将 1968 年作为新起点的年份，因为正是在 1968 年，匈牙利废除了指令性经济，代之以官方所谓的新经济体制。但是故事本来要开始得更早一些。虽然在前几章中我已经提到这一话题，但是，我还是要在这一章更详细地说说这个故事以及我在其中的作用。当然，这有自我重复的嫌疑。

从 1954 年起，我开始对社会主义经济复兴的思想产生浓厚兴趣，我相信这一思想的正确性，并对它充满热情。虽然我在讨论权力过度集中的书中对旧体制做了实证分析，但是这本书从头到尾贯穿了我对社会主义经济复兴思想的信仰。从 1956 年夏天开始，我和几个同事提出了改革建议。在 1956 年匈牙利革命初期，社会主义经由改革而不断完善的观点仍然对我影响很大，我为当时的总理伊姆雷·纳吉制定了经济改革方案。

革命失败后，随着政府发动各种残酷的报复行动，社会主义经济复兴思想受到排挤。从此以后，“幼稚改革者”阶段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画上了句号。* 而我之前坚信的社会主义复兴思想，再也没有在我的心中出现。

1957 年，党中央邀请我加入一个新的改革委员会，我毫不迟疑地回绝了这一邀请。委员会中的某些人在苏联坦克的阴影下卑躬屈膝，却将朋友送进监狱，竭尽打击报复之能事，我不想与这种人有任何密切的接触。

20 世纪 60 年代，出于对这些人的深恶痛绝，我又一次拒绝加入党中央组建的改革委员会。一想到自己必须边听边琢磨最新的指示精神，以便发现本周负责经济工作的党内红人 X 同志偏爱基于边际成本标准的汇率理论，还是坚持基于平均成本标准的汇率理论，我就胆战心惊。我不想与其他委员一起拼凑一份折中的委员会建议，并期望它最终能够在党的会议上进行讨论，而且最好得到

---

* 我第一次使用这一表述是在 1968 年为美国的《经济学文献杂志》(1968c)撰写的一篇文章，本章的副标题就是当时文章的标题。在这一研究中，我将匈牙利改革之父捷尔吉·彼得、波兰改革运动的精神领袖弗拉基米尔·布鲁斯、“布拉格之春”中的重要经济学家奥塔·锡克称为“幼稚的改革者”。我认为戈尔巴乔夫也应该属于此类人物。许多经济学家都曾经历过“幼稚改革者”阶段，而这个阶段的长短则因人而异。(一些人从未放弃这一信仰。)

肯定。

在卡达尔执政期间，许多有影响的匈牙利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与当时文化领域的最高统治者捷尔吉·阿克塞尔有私底下的接触。评价阿克塞尔的著作或准确评判他的行为的是是非非，并不是这一章的任务。对于那些与阿克塞尔定期或者经常聚餐的人，为了讨好他而阿谀奉承的人，或者为了那些身陷囹圄的同事而请求他帮助并不惜自我牺牲的人，我不想对他们做出评价。我是少数从未向阿克塞尔有所求的“知识分子领袖”之一，我认为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我认识到，我在这件事上的行为前后并不一致。我像躲避瘟疫一样回避阿克塞尔。但是，正如我在早些时候提到过的，当我请求雷若·涅尔什（他在党的核心领导层失势后被发配到我们研究所担任所长，当然，他仍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利用关系设法为我安装一部家庭电话时，我没有一丝尴尬。我没有参加党中央的委员会或者工作组，却和我们单位党组织办公室的一位同事成了很好的朋友，甚至一度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我没有按照一个人是不是共产党员而对他进行分类。然而，这样做有些自相矛盾。我始终置身于改革准备工作之外，因为参与改革准备工作，必然使我与共产党的领导层发生组织联系，从而会让我进入围绕在党中央周围的非党人士阵营。**

对我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产生影响的第二个因素，是 1956 年后我为自己设立的行为准则和任务目标，虽然这一因素与主要的政治因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我还是对两者的角色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即影响政治决策的顾问专家和科学研究者。当然，我承认这样的区分标准过于苛刻。***我在这里讨论的并非民主社会中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关系。我只关注我和同事们所处的两难境地——当极权政府征求顾问专家的意见时，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两个角色要求那些全身心投入其中一个角色的人进行完全不同的训练，具备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成功的顾问专家必须是精明狡猾且足智多谋的战术家。他们机动灵活，

---

* 1980 年秋，阿克塞尔通过计划办公室主任拉约什·法卢韦纪向我传达他的意见，他对我当时一篇关于社会公平与效率冲突的文章非常不满。（后面我会讲到，他并非唯一表示不满的人。）我听完后只说了一句话：“我们似乎存在分歧。”事后，法卢韦纪发表文章对我猛烈批判。

** 匈牙利科学院院长雅诺什·圣阿戈陶伊一定是受到某位经济学家院士的鼓动，他讽刺意味十足地问我：“你为什么如此挑剔？你为什么如此害怕自己那洁白无瑕的外衣沾上泥点？”

*** 根据这种思路，这里提到的所谓顾问并非职业政治家，例如党组织或党的运动的领导人、立法机构成员，或者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人。这些顾问依靠平民的职业谋生，但是他或她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对政治事件施加影响。

而且善于妥协。这些政治领域的优点在科学研究领域却会带来严重的风险。在政治生活中,那些对自己所说的话坚信不疑的人,会把自己坚定的政治信念到处传播。但是,一个科学研究者必须保持客观公正,用理性而非信念评判各种观点的正确性,甚至对他(或她)已经接受的信念,也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怀疑。那些想要按照自己的观点改造社会的人发现,自己很难具备一个学者所应有的特质。

我不喜欢做事三心二意。我不能将一半的身心用于研究者的角色,另一半用于政府的顾问角色——更何况这个政府是我希望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政府。其他人可以做到,但我做不到。我担心,如果我那样做,我会在这两个角色上都一败涂地。

我为自己一再提到这个两难选择而向读者致歉。我甚至不能承诺这一话题会在后面的章节中消失,因为这一两难选择伴随了我一生。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面临完全不同的特殊选择时,我总是在政治参与和彻底的学术研究中做出选择,而且这也是所有选择中最难做的一个选择。选择因此也成为我这部传记的主题之一,对这一话题的某些重复是不可避免的。

度过生命中的"幼稚改革者"阶段后,我最终成为一名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批判分析者。毫无疑问,我不能对这一问题置之不理。虽然在过去的岁月里,我没有就这一问题写过只言片语,但这一问题自始至终深深困扰着我。无论我读到哪一本书或哪一篇文章,我总是不断思考如何用它的观点解释社会主义经济。这种特殊兴趣也不仅限于研究领域。在经济管理实践中发生的所有变化,我都给予密切的关注。

几年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成了我的研究中心。《反均衡论》已经通过几种方式触及这些问题。就像我在《短缺经济学》中写的那样,我极力表明,如何用社会主义的基本特性对社会主义经济特有的功能失调加以解释,体系内部的局部改革最多只能减轻这些症状,而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我研究了以利润为主导的匈牙利局部经济改革,我的研究结果显然引起了人们对软预算约束的关注。

后来,我和同事们又写了几篇主要描述和分析改革进程的研究论文。我们将这些文章发表在同一本匈牙利杂志上。有时,我和我的同事们甚至在同一个匈牙利论坛或者国际论坛上发言。

我的文章简单直接地表达了我对改革观点的同情立场。我并非为改革的反对派加油鼓劲,我原本非常愿意看到改革取得成功。当我批评改革状态时,我的批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因为"改革派经济学家"也会这样做,而且批评的严

厉程度不亚于我。然而，在他们和我的观点之间还是存在本质区别。一位自信的改革者提出的口号是“还没有”或者还不够，价格体制还不够好，官僚机构仍然过度干预公司事务，金融市场还没有良好运作，等等。但是“还没有”或还不够只是暂时的，事情最终会好起来。

相反，我并不相信这些乐观的论调。我的观点在当时属于改革怀疑论。我的朋友米哈伊·洛基调侃我们是“挑剔的改革派”。我们以及一些观点相似的同事，都反对我在前面写到的改革的诸多方面，认为这种改革非常虚伪和做作。这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而且从改革所走的道路来看，这种改革的最终目标也不是市场经济。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50 年代的政治风暴和道德冲击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对社会主义经济复兴的信仰经历了政治和道德创伤，已经彻底粉碎。从那时开始，我学习了与自己的研究领域相关的西方文献，并掌握了西方发达经济的第一手资料。无论是基于批判性还是理性角度，我对私人所有制、公有制、官僚机构和市场的关系，已经有了深入思考。这种理性探索的过程是一个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必须经历的过程，它使我确信，在公有制为主导的经济中，市场不可能在协调经济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这两者互不相容。问题并不在于市场经济的特征“还不够”明显。真正的原因在于，只有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才能让真正的而非虚假的或模拟的市场经济运转起来。

这种论断让我对那些最热情的改革者的主张也产生了怀疑。他们或许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某些更加坚定的改革措施，走上“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同时也没有建立真正的资本主义制度或摒弃资本主义所有丑陋特征的市场经济道路。理论观点上的根本分歧在我与相信市场社会主义可行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之间划出了一条鸿沟。

我卷入各种无休止的争论之中，有时甚至是与对方面对面地唇枪舌剑；但有些时候，对方的争论只是直接针对我的观点和立场。我处在来自各方的明枪暗箭之中。请允许我讲几个典型的事例，来充分展示我当时的处境。

“不要指手画脚发指示……”

蒂博尔·利斯卡（Tibor Liska）是匈牙利改革时期的传奇人物。我们在

很多场合都有过激烈的交锋，但我每次回想起来，总是会想到他那热情洋溢且具有超凡魅力的演讲，我非常尊重他的智慧和坦诚，以及他忠于自己的原则并抵制卑劣手段的立场。利斯卡是一种奇怪的社会主义式的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式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者。他的观点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获得一定份额的社会集体财产作为起始资本，然后在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经济体制中，利用这些资金创建企业。* 利斯卡勾勒出了这个蓝图中几个要点的所有细节，但那些相对不太重要的地方依然模糊不清。蒂博尔在这个概念中，融入了对机会平等这一良好道德假设的纯粹信仰，以及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特有企业精神的尊重，他确信，如果人的意志足够坚定，那么任何乌托邦都能成为现实。**

利斯卡是一位宗师，门生众多。他经常组织聚会，并邀请知名的经济学家与会；他们总是心平气和地就某一问题展开讨论，利斯卡总能用几个强有力的证据击败他们，而且往往一招制胜。他曾邀请我参加过此类学术聚会，我也一如既往地采用自己通常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客观评价匈牙利局部经济改革的状态，指出利斯卡观点中的优点和缺点以及社会转型的现实可能性和局限性。[2] 蒂博尔对此非常生气。在这里引用他当时的原话一定非常有趣，只可惜当时并没有将这些话全部记录下来。因此，我只能根据记忆尽量重现他当时所说的话："[科尔奈的发言]是那种评价粪便的价值、粪堆的深度和种类的理论，而不是告诉我们怎样摆脱粪便的理论。这就是本质区别，因为如果一个人想要以粪便为分析对象，整天研究粪便已经淹到我的脖子或嘴巴还是眼睛的问题，那么他和另一个从不在意粪便的价值，只关心怎样尽快摆脱粪便的人的观点，就大相径庭了。"[3]

如果我当时能够想到一些机智和针锋相对的话来反驳利斯卡，那么局面一定会好得多，但是这从来都不是我的特长。我所能做的就是冷静地列出一些干巴巴的反驳论点——例如，科学的任务是观察和理解现实——而这些根本不能

---

* 匈牙利制度变革后，一些利斯卡的追随者为"凭证式"私有化努力斗争，这种私有化主张将国有财产免费分发给社会成员，这是可以理解的。

** 1966 年，利斯卡写出了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经济稳定》(*Econostat*)，但是在之后长达 22 年的时间里，这本书只能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流传。1988 年，就在卡达尔时代行将结束时，该书才首次得以出版。但是利斯卡从未系统阐述他的改革愿景，或者用简洁的形式系统总结这些观点。今天的读者只能从他的儿子蒂博尔·F. 利斯卡所写的专题文章中，获得关于利斯卡理论的全面概括。

打动那些情绪激动的观众。我在辩论中说道，我们不需要匈牙利经济学家们混乱的梦魇。他们必须彻底了解匈牙利的现实和真正的市场经济现实，由此做出现实的选择来改善现状。

金融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拉斯洛·安托尔是匈牙利改革派经济学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并非利斯卡一类的理论开创者。他是一位眼光敏锐的观察者，熟悉匈牙利当前的经济状况，是这方面少有的专家之一，也是拥有理性的头脑和良好判断力的分析者。和我不同，他是一位积极的、彻头彻尾的改革者，对参与决策充满热情，而且将其作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相信至今仍是如此）。对他来说，向幕后那些拥有决策权的实权人物提供好的建议，远比自己的著作出版后在国内广受关注更加重要。他根本不在意国外同行是否了解他的观点。1983 年，文学周刊《生活与文学》（*Élet és Irodalom*）对他进行采访。记者山多尔·塞纳希问他："你喜欢称自己为改革派经济学家，这是否意味着这类学者与'普通经济学家'相比，有一些特殊的立场？"安托尔回答道："如果一定要有所区别，我只能说，有的经济学家只是发挥了观察者和描述者的作用，他们从道德的、偶尔也从规避风险的角度出发，对疾病做出诊断，但没有提出建议。虽然我承认他们有权这么做，但是这种基本立场让我讨厌。我可以开诚布公地说，我在努力影响政府的决策。"[4]

如果批评得对，就接受吧。甚至在当时，我认为安托尔的话就是针对我的。除了安托尔，还有很多改革派经济学家并不赞同我在改革问题上的态度。

在这一点上，请允许我重复我在前面章节中谈到地下出版物时的观点。我不认为只有一种行为即我自己的行为是合乎道德的，我也不会"厌恶"与我的行为不同的其他类型的行为。我虽然反对某些行为，并且从伦理角度谴责这些行为，但我认为，符合道德的可以有几种态度，而不只是一种。人们通过积极参政而免受排挤是对的。对于那些在国内冒着受到政治迫害的风险进行非法斗争的人来说，这样做是有益的。"改革者"努力劝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官方领导者接受更好的经济政策是有利的。但是，客观的分析者通过科学研究来探讨制度的真正本质，同样是有用的。从根本上说，最理想的是在这些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中建立合理的分工。

说实话，有时我对改革派经济学家以及他们与当权者妥协感到厌恶，但是我最终克制了这种情绪，并且从未公开表达过这样的情绪。流行的一种看法是，改革者的活动产生的好处远大于他们向执政者妥协所带来的危害。这种感觉或许

不会得到某些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回应。我只能通过他们的语言和文字，认真进行判断。我无法真正了解我的这些同事们的内心所想。

关于行为问题，我要做进一步补充说明。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理论批判被证明是有效的工具。虽然这一功能或许很重要，但是我不想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将社会科学的角色限于政治工具。思想有它的内在价值。对于某些人而言，思想和理解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只要有人将科学视为自己生活中的使命，那么事情就总是如此，今后也将一直如此。

效率与社会主义道德

1979 年，我应邀前往爱尔兰参加吉尔里讲座，该讲座以著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R. C. 吉尔里(R. C. Geary)命名。在那里，我用更加成熟的形式，阐述了我首次在印度提出的观点。*

我比较了两种价值体系。一种价值体系提出的问题是，要满足市场机制的哪些需要，才能最大程度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另一种价值体系则强调，社会主义道德提出了哪些需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两种需求不可能同时得到满足。我无法用严格的数学模型证明这一“不可能定理”，让我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完成这项工作。我只是提出了这个设想，并且通过匈牙利改革中前后不一的事实来说明这一设想。例如，如果人们想救助社会中那些处境不利的弱势群体时，表现出的团结一致就与经济竞争的原则产生冲突。

我的演讲主要针对那些认为社会主义信仰与市场改革很容易协调的人，对他们来说，两者不同寻常的组合仿佛不存在任何冲突一样。

当我结束演讲时，R. C. 吉尔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他非常高兴地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出现失业现象；事实上，这是一种劳动力短缺的表现。而西方国家的优势是，每样东西都供应充足，人们根本不知道商品短缺为何物。这两种体制的优势不能相互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吗？

---

* 在演讲现场，我从来不只是照本宣科地大声朗读准备好的讲稿。我的演讲方法是，首先口头解释自己的观点——如果可能，我要在几次演讲中进行解释——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演讲来打磨这些观点，从观众的反应中吸取养分。只有当我觉得演讲已经足够成熟时，我才会把演讲内容写下来。

我在后来的一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回答了这一问题，该文发表在 1980 年的《现实》(*Valóság*)和《剑桥经济学评论》上，内容如下：

> 现在出现了一种一定能设计出“最优经济体制”的主张……这一观点的出现尽在情理之中……那些以此为目标的人认为，这就像去超市购物一样简单。他们可以在货架上找到这一体制的各种不同组成部分，这就可以将所有体制的全部优秀品质集于一身。在第一个货架上放的是东欧国家已经实现的充分就业，第二个货架上摆放着在联邦德国或瑞士工厂(可以找到的)高度发达的车间组织和严密的工作纪律，第三个货架上是没有衰退的经济增长，第四个货架上是物价稳定，第五个货架上是产品能够根据国外市场的需求迅速做出调整。这些制度设计者需要做的只是推动购物车，将这些“最优部分”放进去，然后带回家组合成“最优经济体制”。但是这种想法是幼稚且一厢情愿的白日梦。历史不会提供这样的超市，让我们在里面按照自己的喜好做出选择……体制的选择只能在各种“一揽子组合”中进行。[5]

这篇文章随后被翻译成几种语言发表，并马上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得不稍微离开这一主题，回忆与我刚刚提到的那篇文章相关的一个小插曲。那段时间，匈牙利国内有一位活跃的公众人物拉斯洛·伦杰尔，伦杰尔首先与反对他的观点的著名经济史学家伊凡·T. 贝伦德和捷尔吉·兰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随后，他和米克洛什·波尔加尔参与讨论了我那篇关于效率与道德的文章，并提出两个观点。第一，所有道德观念背后都隐藏有特定集团的利益。第二，我在文章中提到的引起改革相关问题的矛盾，根本不存在。

第一个观点无非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惯用术语，根本不值得我回应，但对第二种观点，我想有所表示。我尖锐地驳斥了他的说法，呼吁作者们以诚实的态度参与辩论。在这篇文章的导言中，我已经明确表示我不是在进行因果分析。我从未在我的文章中将匈牙利经济的灾难或改革面临的困难归因于前面提到的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而且，他们的评论也歪曲了这篇文章希望表达的其他观点。

曾经有无数文章批评我的理论，但是我不习惯做出回应。如果我不赞同他们的观点，那我只会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不会与他们进行争论。如果我认为他们的批评有价值，那么其影响很可能会出现在我的后续

文章中。伦杰尔和波尔加尔之流让我难以接受的一点在于，他们公然违反了学术辩论中不成文的道德规范。*

拉斯洛·伦杰尔在埃莱梅尔·洪基斯对他的自传性采访中提到了这一事件："我们的辩论风格，有的来自马克思的辩论方式，即无情地嘲弄和蔑视对手，有的来自糟糕的科研方式……我在20世纪70年代分别攻击了科尔奈、贝伦德和伦杰尔。虽然我在辩论的各个环节都没有犯错，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对他们个人而不是他们的学术观点进行攻击的这种方法，不太可取。"[6]这种真诚的自我批评的态度值得赞扬，但是我提到这段插曲的真正原因在于，伦杰尔只是对他早期傲慢自大的辩论方式加以批判。但是，问题不仅限于批评的风格，而是这种批评在道德上让人不能接受。伦杰尔在说到"虽然我在辩论的各个环节都没有犯错"时，他的观点就大错特错。现在，如果我重新审视这次争论，我再一次意识到，他们的批评甚至根本就是错误的。他们扭曲了我的观点，将其任意篡改后强加到我的头上，然后再对这些观点加以批判。我之所以提到往日的这次论战，就是因为直到今天这样的争论仍然存在；事实上，这样的争论在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普遍了。在匈牙利的公共生活、出版界和学术文章中，肆意篡改和歪曲对手的观点，然后驳斥和反对这些经过篡改的观点，这样的争论已经司空见惯，这种现象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产权的重要性

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安德里亚·塞格(Andrea Szegö)是一位参加过1983年《现实》杂志发起的改革辩论的学者。[7]她强调，她并非要复辟斯大林主义，但是，她坚持通过更加先进的方法，加强中央控制。她从"左派"的观点出发，猛烈抨击改革进程，其中引用了《短缺经济学》中某些她所赞同的观点。她对这本书的理解是，公共产权导致短缺经济，即限制生产的不是需求，而是集中在中央手中的资源。只要公共产权在经济体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改革就不

* 在此之前的卡达尔专政时期，我就遭到当时的意识形态家们的攻击，这些污蔑对我造成严重的伤害。当时的批判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让人难以接受，但是我并未感到道德上的愤怒。这些批判者与我站在学术分界线的两侧，但是他们并未歪曲我的观点。他们批判的正是我的真实观点和想法。

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中央控制与市场机制相比，公有制与后者更为相容。*

之后不久，改革派经济学家与安德里亚·塞格展开争论。在这场争论中，陶马什·巴奇考伊和埃莱梅尔·捷尔吉·泰尔塔克发表于 1983 年的文章最具有代表性。他们驳斥了“左派分子”对我的观点的解读，强调我的著作是支持改革的。**

当我读到这些文章时，我觉得很尴尬。当然，我真诚地为改革派的每一次胜利而高兴。我认为任何“左派分子”复辟都贻害无穷。从这个意义上，我是站在改革派一边的。但是在另一方面，理解我的基本理论观点的人正是安德里亚·塞格，而不是那些极力为我辩护，以免我与她产生瓜葛的人们。如果你想要建立市场体制，那么你就不得不建立私人所有权。如果你坚持公共所有权占主导，那么在看到官僚控制卷土重来时，你就不必大惊小怪。改革者们的狡猾之处在于，他们想要将公共所有权与市场的协调作用结合起来，但是这种结合不可能保证经济运行长时期保持平稳、顺利和不受干扰。我在后来的文章中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解释：一方面，私人所有权与市场协调机制间存在天然的联系；另一方面，公共所有权和官僚协调机制间存在天然的联系。[8]将公共所有权与市场相匹配的努力，必然要求人为地建立监管机制，以弥补这一天然联系的缺失。

在 1981 年和 1986—1987 年发表的文章中，我在评价匈牙利国内的改革进程时，已经清楚地阐明了这一观点。我认为，生机勃勃且多样化的非国有部门的出现与发展至关重要。在非国有部门，并且只有在非国有部门，才存在真正的市场经济。

20 世纪 80 年代，支持改革的激进派将“所有制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9]改革派经济学家的领导人之一马顿·陶尔多什提出，效仿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控股公司”，建立类似机构。控股公司代替政府部门拥有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对

---

* 安德里亚·塞格后来在 1991 年根据卡列茨基派的观点批判了《短缺经济学》，并且就此与我的理论划清界限。

** 当时，无论是这篇文章的合作者，还是读者，其中也包括我本人，都不清楚热情的改革者陶马什·巴奇考伊多年来一直充当秘密警察的告密者角色，这一点我在第 9 章已经提过。正是现在为我“辩护”的陶马什·巴奇考伊在 1960 年认为他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即我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决裂，并报告给秘密警察。

企业的管理行使“所有者权利”。

让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官僚机构的领导们将向其他官僚下达这样的指示：“你们要以所有者的身份进行管理……”我的问题是：“一个被委派（由何人？）来代表社会扮演‘所有者’的人创建的机构，能够代表所有者权益吗？”[10]

后来，匈牙利发生了制度变革，但是我仍然反对“市场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现在仍在改革日程上，因为至少中国、越南和古巴仍在寻求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之路，市场社会主义的愿景还是有它的吸引力的。

兰格模式和匈牙利改革现实

匈牙利的改革在西方国家和匈牙利国内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国内，所有参与讨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就此交换观点的人，都对改革形势有着或多或少的了解。人们的分歧主要反映在对改革的期望和改革前景本身。另一方面，在国外，我经常发现一些教科书中存在对匈牙利改革的肤浅认识。当时，人们经常阅读的比较经济理论教材是保罗·R. 格里高利（Paul R. Gregory）和罗伯特·C. 斯图尔特（Robert C. Stuart）在 1980 年出版的著作，他们在书中如此描述匈牙利经济管理的改革：“总的来说，匈牙利实行的新经济机制（NEM）与兰格模式非常相似。”[11]这是多么荒谬的说法！请读者回想一下本书第 7 章的内容，我在那里已经介绍了奥斯卡·兰格的社会主义理论。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所有企业都应该为公众所有。中央按照供给过剩或需求过剩的情况，相应地分别降低或提高价格，以此对企业进行控制。

匈牙利的现实并非如此。匈牙利经济协调机制中，仅有相对很小的一部分与兰格模式的控制相似：价格虽然由中央决定，但并非刚性，而是经常变化。另外，多数商品都通过其他方式定价。而且，官僚机构采用了大量其他的干预手段，干预经济运行进程。国有企业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竞争，因为软预算约束使真正的竞争出现了扭曲。匈牙利经济与兰格模式的根本区别，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公共所有权在匈牙利国内不再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幸运的是，匈牙利已经出现私人部门，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虚拟的市场经济——由于私人部门的出现而存在。

不幸的是，这种概念混淆的情况仍然存在，澄清这些错误的任务似乎不可

能完成。如果我们用“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来表达奥斯卡·兰格的原创思想，那么公共所有权与市场协调机制相结合的经济，即 1968—1989 年的匈牙利经济，根本不是市场社会主义。但是，有关市场社会主义的这一表述并非注册商标，没有人规定我们只可以用这一术语来描述兰格的理解。让我们回头看看这一命名的产生过程。对于共产党执政的体制，共产党官方将该体制描述为社会主义体制。在这一体制中，虽然出现了某些市场协调机制的组成部分，但是却受到严格的限制，并且在各种官僚机构的影响下，扭曲变形。学者们将这一混合体制称为“市场社会主义”，如果这一表述没有吸引力，他们还可以将词序颠倒，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谁能剥夺他们命名的权利呢？我们不能剥夺任何一个政权为自己命名的权利。与此同时，我在著作中指出，在教室里讲解经济思想史的时候，不要将理论模型与它的历史现状混为一谈，这一点非常重要。

题外话：匈牙利的另一种现实

“现实”一词曾出现在上一节的标题中。如果我们现在谈论现实，那么，我们不应该停留在光明而崇高的理论思辨层面上。有时候，深入到黑暗的角落后，我们会发现其他事情。当我在匈牙利—美国论坛和纽约的讲演中将主要精力放在市场社会主义和匈牙利改革方向研究时，某些人正忙于将这些内容全部记录下来。

当我为撰写这本传记收集材料时，我看到了前秘密警察处的大量档案资料，这些材料让一个事实逐渐显现，即秘密警察通过在国外的间谍获取我公开演讲的情况。

其中一份报告出现在 1981 年 12 月 10 日的《每日情报汇编》中。[12] 这份汇编是由上万家情报机构组成的网络和秘密警察机器提供的最新且最重要情报的每日汇编。它主要报送给秘密警察机构的最高长官，即内务部长。副本则呈送内务部所辖的秘密警察部门的主要领导，摘要则送到共产党和政府领导那里。12 月 10 日《每日情报汇编》的第六点，记述了最近我参加在布达佩斯举办的匈牙利—美国论坛的情况，材料写道：

匈牙利著名学者雅诺什·科尔奈向美国人提供了大量秘密和详细的信

息，主要是关于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的内部情况、苏联经济出现的困难和匈牙利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出现的问题。科尔奈对匈牙利改革面临的困难和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美国经济学家在到达布达佩斯之前，还曾到访波兰。他们希望得到科尔奈的帮助，以检查他们从波兰获取的经济政策信息是否真实可靠——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们已经成功地获得这些信息。[13]

针对我的调查立刻开始了，而我当时却一无所知。调查的最终结果是，他们一致认为我并未从事任何泄露国家机密的活动，当然也不必对我采取任何行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从来都是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即使对于数据是否属于保密范围的划分有的时候非常荒谬，但我从不在任何演讲和讨论中使用保密的数据。)另一份 1985 年 4 月 26 日的《每日情报汇编》也出现在这部分秘密文件中。[14]其中第七点提到我 3 月 7 日在纽约一家研究机构发表的演讲。报告坚持认为，该机构“受到中央情报局的资助”。按照警察总署署长、内务部副部长 Y. Y. 的指示，秘密警察对我展开了新一轮调查。当然，这次我还是一无所知。署长发布的命令是：“责令内务部 III/II-1 调查科尔奈。”“调查”意味着再次翻出关于我的以往记录*，第一份文件引出第二份，第二份引出第三份，依此类推——所有文件都表明我有罪。我不清楚他们审查这些文件的顺序。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重新浏览了我上面提到过的 1981 年对我的调查汇总。那份手写的索引卡总结了关于我的案件的各种细节：“雅诺什·科尔奈，匈牙利经济学家，匈牙利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荣誉教授(未被聘用)。”然后是关于我的所有文件的索引编号。在这张卡片[15]的最后一行，手写着“III/II-20：85 美国客座教授。受 CIA 邀请发表ea”。**

回忆这些事情的意义在于，当我尝试重现改革进程背后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本质时，它们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前台，匈牙利和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相互交好，就奥斯卡·兰格理论和价格问题展开严肃的学术辩论。在幕后，情报收集和

---

* “他们能调出我的所有电话记录/(何时因为何事与何人通电话。)/他们的文件里记录了我的梦想和计划/哪些人知道我的梦想与计划/谁知道他们是何时发现这些东西的/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挖地三尺来获得这些东西/这侵害了我的权利”(摘自阿蒂拉·约瑟夫写于 1934 年的诗集《呼吸空气》；József 1997，pp. 96—97)。

** 我认为“ea”表示“演讲”(eloadas)。毫无疑问，他们引述了 1985 年的情报报告，认为这理应是一次“CIA 演讲”。

监视以及背叛仍在有条不紊地继续进行。

用今天的眼光回顾过去

让我们再次回到经济改革的世界。当我重新阅读自己那些关于匈牙利改革的文章时，我发现自己仍然认同当时的观点，这让我松了一口气。如果这些文章现在得以再版，我最想做的就是，在当年的自我审查迫使我不能畅所欲言的地方增加一些解释性内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的文章指出了改革进程中某些模糊不清的部分，并且尝试扑灭它们在人们心中燃起的希望之火。

回顾以前的研究，我完全认同自己对于改革的真实描述和分析，但是谈到对改革的评价则是另一回事。现在，我为改革的成绩打出了更高的分数。俗话说，事后诸葛亮人人会做。我为自己辩护的唯一理由是，只有获得关于这些事件的所有信息，人们才能对现象做出公正的判断。

让我们暂时假设苏联帝国没有解体，东欧国家仍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不彻底的改革、令人好奇的幻象、误导性的意识形态和局部改革的成就，或许可以帮助卡达尔政权苟延残喘。改革者赢得的妥协延迟了真正激烈的变革。

幸运的是，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现在看来，一旦制度的变革真正发生，这种复杂的准市场改革，就被证实是一所非常好的预备学校。当然，这是从今天的眼光出发看问题。改革派社会主义者的经济领导小组成员（或者是这些人中更有才能的专家们），多少已经习惯了市场运作方式的问题：人为什么关注成本、价格和利润；私人契约有何意义，等等。许多人已经理解，改革期间私人部门的企业家的意义所在，这一所预备学校使匈牙利与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占据了一定优势。

不幸的是，就像良好的教育不可能决定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一样，这一优势在 15 年后大多已经消失。最初，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容易进步，但是，如果那些教育相对落后的人获得能量和财富，他们可以很快赶上来，甚至后来居上。这就是中央集权的东欧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历。1968 年，极端的专政和中央控制经济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在改革方面的尝试夭折。紧跟着制度变革的就是该国分裂成两个国家。然而，该国却并未落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领导者匈牙利，它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并且运作良好。

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们真正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我们对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评价是否应该以它们对20年后的国家未来产生的影响为标准？或许，我们应该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出发，对大型集体实体做出评价，这样的评价才是正确的。但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用今天的眼光和感受来评价1968—1989年的匈牙利人和捷克人的生活，我敢说，匈牙利人的生活环境更加宽松；社会更加自由；旅行相对更为方便；有更多来自西方国家的商品和现代文明；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这些虽然看似平常，但是正如当时匈牙利国内的说法一样，匈牙利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快乐的营房，匈牙利当然比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和罗马尼亚都要好。与匈牙利经济改革紧密相连的是，当时斯大林时期的僵化刻板有所缓和。事后，我才认识到，这次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远比我当时所想的要更加伟大和珍贵。

注 释

[1] Kornai, 1983a, p. 229.

[2] Kornai, 1982.

[3] 我从口述历史档案对蒂博尔·利斯卡的采访(OHA，第39号采访，第346页)中引用了这段话。我只对这次采访的文稿稍作了文字修改。

[4] Szénási, 1983, p. 7.

[5] Kornai, 1986b(1980), p. 137.

[6] Lengyel, 2002, pp. 157, 158.

[7] Szego, 1983.

[8] Kornai, 1984.

[9] Tardos, 1982, 1988a, 1988b.

---

* 那些在思想上反对政治体制的父母们，如果在专制统治最严厉的时候，他们的子女恰好年轻或年幼，那么他们将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他们在家里公开谈论政治，子女就会由于不成熟和过于好奇而在不恰当的场合说出父母的观点。然而，如果父母过于谨慎和注意自我保护，不对家里人诚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那么，父母就剥夺了对子女必要的政治启蒙的权力，不能够纠正媒体、宣传机器乃至学校对他们的误导。

幸运的是，我们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就敏感的政治话题与子女坦诚交换意见，我们和他们总是所见略同。让父母和子女产生代际冲突的基本政治和道德问题对于我们而言并不存在。有助于我们之间相互理解的一个因素是，当我们的孩子开始对社会和政治问题感兴趣时，当时的社会氛围还没有那么压抑，人们可以在家里和其他地方公开发表观点。这种相对开放的社会氛围要归因于我上面提到过的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10] Kornai，1986c，pp. 1733，1734.

[11] 这段文字节选于这本教材的初版(Gregory and Stuart，1980，p. 299)。在后来的版本中，作者更加准确地介绍了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如果想了解最近的版本，参见 Gregory and Stuart，2004)。

[12] Müller，1999. 详细地描述了“每日情报汇编”的目的及其收集和系统整理情报时使用的方法和组织。

[13] ÁBTL NOIJ Ⅲ/1-218-265/6，p. 3. 日期：1981 年 12 月 10 日。

[14] ÁBTL NOIJ Ⅲ/Ⅱ-80，p. 5. 日期：1985 年 4 月 26 日。

[15] ÁBTL，手写的注解，附于文件 ÁBTL NOIJ Ⅲ/Ⅱ-80A。

16. 哈佛大学：1984—2002 年

1983 年秋，当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园子里散步时，看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向我走来，他上身穿一件短袖衬衫，赤脚趿拉着拖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这个人从脸庞、飘动的白发到表情和衣着，几乎与爱因斯坦一模一样，地球上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难道我看到了鬼魂？

后来我知道这是在拍一部电影，拍摄地点就在爱因斯坦到美国后居住的地方，爱因斯坦曾经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园子里，一边愉快地散步一边思索问题。

当时，我们已经在普林斯顿大学住了几周了，我们就住在爱因斯坦路 45 号的一座小房子里，这片住宅区是我的同胞马塞尔·布鲁尔设计的。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对爱因斯坦的崇拜，在普林斯顿仍然非常盛行，他的过人才智仍然激励着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们。在谈论我的个人经历之前，我要简单介绍一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因为在美国，不隶属于任何大学的研究院非常少见。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学者和科学家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授课。我的许多美国同事非常羡慕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研究机构的同行们，他们不必讲课（甚至禁止讲课），可以专心于研究工作。爱因斯坦到达美国时，向他发出邀请的科学家们认为，不应该强迫爱因斯坦全天授课，而是应该创办一家研究院，让爱因斯坦用全部精力从事研究。虽然不可能出现第二个或者第三个爱因斯坦，但是，至少应该招募一些杰出的科学

家，作为爱因斯坦的长期研究伙伴。这样一来，这个研究院以及这些成员的才智，可以吸引全世界的天才来这里从事研究，即使每个人只在研究院工作一年，但是由于他们在这里从事研究时，不必承担大学的教学和行政事务，就能将全部精力用于他们所选择的研究课题之中。

一些富有而慷慨的美国人捐款成立了一家基金会，之后不久，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开始运作。起初，研究院主要是为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提供理想的研究场所。匈牙利的天才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在美国时就一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我们居住的住宅区里，有一条小路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做诺伊曼路。）逻辑数学巨擘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也在这里工作。伟大的物理学家 J. 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于 1947—1966 年担任过研究院的领导。1973 年，研究院成立了社会科学学院，每一个学科由一位教授牵头负责。1983—1984 学年我在那里工作时，阿尔伯特·赫希曼是经济学的负责教授，迈克尔·沃尔泽（Michal Waltzer）负责政治学，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负责人类学，这三位教授都是各自研究领域最负盛名的学者。

在以后的数年中，研究院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最初的结构仍然保持不变：即以少数终身研究员为核心，然后由人数大约为核心成员六七倍的访问学者与他们一起组成团队，这些访问学者都由核心成员亲自选定，人员的组成每年都有变化。研究院从成立那天起，就聚集了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研究院的魅力之一就在于研究工作的多学科交叉。

我将研究院的邀请看作巨大的荣誉，在研究院工作生活的那一年也是我学术生涯中最有意思、最激动人心的一年。任何希望为学者和科学家提供一个与众不同学术天堂的人，都应该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样板。研究院的建筑位于一座大型公园里，公园中心有一个小湖；离研究院不远的地方是一片私人拥有的树林，溪水潺潺穿越其间，茂密的树林中隐藏着一条小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个理想的隐居地，我喜欢在大自然中一边散步一边思考。同时，经常与同事共享丰盛的午餐，又让我可以及时了解社会动态。

研究院对于访问学者的选择，一方面取决于申请者提交的材料，另一方面取决于研究院的终身研究员对于他的评价。阿尔伯特·赫希曼曾经召集过不少这样的经济学家，他们在某些方面非常突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团队。我在那儿遇见了美籍瑞典裔教授阿

克塞尔·莱琼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他因为重新解读凯恩斯理论而名声大噪。我当时经常交往的人有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唐·麦克洛斯基(Don McCloskey)。阿克洛夫才华横溢，他那篇讨论“柠檬市场”(二手车市场)的论文使他跻身不对称信息理论的创始者之列，他也因为不对称信息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唐·麦克洛斯基有些口吃，但总有那么多有趣而新奇的想法。他对经济学“修辞”的研究已经引起巨大的关注。(如果用最简练的语言概括他的观点，那就是，所谓社会科学的真理，不过是人们使用当前普遍流行和广为接受的方法，说服他的同事确信某些事情而已，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坦率地说，我当时正处于创作的瓶颈期。我已经完成了《短缺经济学》的出版工作，却不知道下一项主要任务应该是什么。我在艰难地寻找前进的道路。

“正常”来说，我平日的阅读书目主要集中于我当时所作的研究。但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学期间，我享受到了最大限度的自由，我利用这一优越条件进行广泛的研究和信息收集。我读了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和查尔斯·林德布罗姆(Charles Lindblom)关于民主和“多元政治”的著作，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关于策略的令人振奋的观点，还有当时许多其他人的著作(当然包括莱琼霍夫德、阿克洛夫和麦克洛斯基的)，以及阿玛蒂亚·森和奥利弗·威廉姆森的著作，他们两位曾经访问过研究院，并发表演讲。当然，这些书仅是我在普林斯顿那一年丰富的知识体验中的部分书目。**

同时，我的头脑中已经慢慢有了一个构想，我想写一本书，总结过去几十年来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和研究心得。我在研究院时，已经开始草拟著作提纲，然而十年之后，我才完成这本《社会主义体制》的专著。

正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其他类似机构宽松的组织结构和财务框架，为科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到研究院时，我的研究方向还不很清晰，但是，在那里工作的一年期间内，我的长期计划明确起来，并且完成了《社会主义体制》一书的提纲初稿。后来，我又花了八年到十年的时间，逐渐完善了在普林斯顿时形

---

* 当时，没有人想到体格健壮的麦克洛斯基会在几年后接受变性手术，以迪尔德利·麦克洛斯基的身份继续其辉煌的职业生涯。麦克洛斯基按照自我认知做出了极其艰难的决定，这需要非凡的勇气，值得我们尊敬。

** 我的阅读也反映了我想要在《短缺经济学》之外寻找新的研究课题，并且在我的分析中要增加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的问题。

成的最初想法，并最终将该书的手稿交给了出版社出版。申请公共或私人基金的研究者们，必须在申请书后附上一份详细的研究计划说明。但是，人们更加需要的是其他形式的资助，即不会对申请者提出严格限制条件的资助。* 那些受邀来到高等研究院的学者们，当然会在他们的申请材料中谈到他们想要集中精力研究的领域，研究院不会使用任何法律约束或者官方的合同，来确保他们必须在什么时候完成研究工作。我本人的经历也表明，来到普林斯顿的学者们都享受了几乎毫无限制的极大自由。慷慨的资助结果可能是毫无建树，这个风险由研究院承担。如果研究院选定了他们邀请的对象，这些科学家唯一要保证的就是，要始终对研究抱有热情，并充分利用研究院提供的自由和时间。**

我还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时候，一天，哈佛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迈克尔·斯彭斯打来电话，邀请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一个公开演讲。*** 当我向阿尔伯特·赫希曼（他在来普林斯顿之前长期在哈佛任教）提到这件事时，他对我微微一笑，我当时并不清楚这一笑的含义。不管怎样，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于几周之后在哈佛大学发表了演讲。

哈佛大学如何聘任教授

在讲述我受聘于哈佛大学的故事之前，请允许我先说说哈佛大学的聘任程序，这些都是我以哈佛大学教师身份参与遴选过程的所见所闻。

---

* 我认为，能在许多西方国家的研究院按照我自己的选择和进展速度进行研究，拥有这样的机会真是非常幸运的。例如，我前面提到过的《短缺经济学》一书的写作，就是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完成的，当时，研究所没有向我提出任何要求。

** 关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运行机制（邀请条件、希望研究者达到的要求等），我已经写得很详细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已经成为其他高等研究院的模板，这里面也包括中欧地区第一所与它类似的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从该研究院成立那天起，我就是它的终身研究员。

*** 同其他美国大学一样，哈佛大学的组织结构与欧洲大陆的大学，其中也包括匈牙利的大学相去甚远。美国大学内部各单位的称呼并不一致。在哈佛，由院长所领导的“院”或“系”的规模要远远大于匈牙利的大学院系。经济学属于艺术和科学系，它几乎包括所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院由各个系组成，这是一些比大多数欧洲大陆学校里的“系”或“所”要大得多的实体。美国大学的各系本身由一位首席教授领导，他负责协调本系的教学工作，并实施管理。他或她与其他教师的地位是平等的，只是排名在第一位而已。即使副教授或助理教授也并非首席教授的下属。他们独立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和德国或匈牙利的教授职位（Lehrstuhl）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那里，系主任和成员间属于垂直的上下级关系。

美国大学的正教授是终身授予的职位，教授与学校间的工作合约表现出令人惊讶的不平等。*终身教授如果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或者在别处得到更好的待遇，他随时可以辞职，但是大学即使对教授的表现不满意，也不能主动辞退他。**

虽然这种法律安排是否妥当还存在争议，但是，因为它能够为教授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而被认为是学术自由最重要的保证，因此，它还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他们可以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或科学观点，也不会因此受到威胁。在麦卡锡时期，许多美国大学的教授因为终身聘任制而免遭政治迫害，为该制度辩护的人们经常提到这个例子。

既然大学很难辞退终身教授，那么就要在终身教授的遴选上大费周章。美国没有适用于所有美国大学的一定之规。我只能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亨利·罗索夫斯基的《大学：所有者手册》一书来介绍哈佛大学遴选教授的程序。罗索夫斯基长期担任哈佛大学最大学院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院长，这一职务让他对于聘任程序非常了解。

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经济系需要一位教授讲授公司理财这门课。第一阶段的选拔程序完全掌握在该系正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手中，级别低的教授和学生无权参与。每月一次的委员会例会首先讨论聘任教授的提议。系里是否确实需要聘任新的教师来加强这一领域的师资力量？如果就此达成一致，那么将会任命“遴选委员会”成员。这一小型委员会的成员们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要阅读该研究课题的最新文献，展开调查，经过几次内部讨论，确定候选人。他们将尽可能对候选人设置很高的门槛。让我引用罗索夫斯基写的选拔标准：“谁是最睿智、最有趣和最有发展前途的学者……谁是‘世界上’最符合该职位要求的学者……谁是世界上公认的权威？”[1]我在哈佛大学的一位老同事曾这样形容委员会对于候选人的期待：“正是由于他的贡献，他的研究领域所属的学科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在他开始工作后，该学科就变得完全不同了。”

遴选委员会的工作绝不仅仅是列出一个候选人名单，并在后面给出每位候选人的简介。该委员会的主席要对候选人的学术工作做出认真的讲评报告，以便系里的其他教授确信该候选人符合苛刻的标准。遴选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要

---

* 哈佛和其他一些大学的终身职位只限于正教授，这是教师所能获得的最高职位。然而，一些大学将终身职位也给予副教授。

** 当然，根据常理判断，这种制度也存在例外。例如，如果一个教授犯罪，学校就可以开除他。

提供一份个人意见。这些意见汇总后，教授委员会将就此开始讨论。那些与候选人相识或者读过候选人著作的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候选人的研究成果是否优秀，是否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是否就像遴选委员会的评价一样？候选人在未来的研究潜力如何？委员会中的每个人都要做出评价，反对候选人提名的教授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候选人的人品也是讨论的内容。如果有人了解他（或她）的教学能力和学生对他（或她）的评价，那么这个因素也要考虑。但是，我惊讶地发现，所有这些因素都不是决定性的。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候选人的学术成就和未来的研究潜力。

教授委员会将对候选人进行长时间的辩论，但即使辩论结束，最终的决定还是不会做出。首先，系主任要向该分支学科（在本章的例子中为公司理财）的几位知名专家写信咨询。信中会列出几个名字，其中包括一位遴选委员会确定的推荐人，但是，信中不会提及该任命的最终人选。收信人按照几位学者的学术水平将这些名字排序，并说明排序的理由。既然这些收信人并不知道哈佛大学考虑的候选人是谁，因此，他们的回信就被称为“盲信”。这相当于在该学科最博学的人群中进行一种封闭的民意测验。

遴选委员会会为教授们提供候选者的个人简介、作品列表和两到三篇论文，当然，候选人的其他作品也可以随时获得，以便他们进行研究。教授们的任务就是熟悉直接候选人的作品，以便掌握第一手资料。几个月后，关于候选人的提议会再次提交教授会议，教授们将会就这一问题重新交换观点。或许他们会在第二次会议上达成共识。如果无法达成共识，那么该事项就要进入第三轮讨论日程，所有人的投票结果都要被记录下来。如果候选人获得多数票，那么第一阶段的行动告一段落，但这并非整个遴选过程的结束。

只有在这个时候，系主任才可以正式询问候选人是否愿意加入本学校。候选人不用对这份工作提出申请。* 成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的邀请只针对那些被未来的同事们认为值得共事的学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收到邀请的学者都会欣然同意，当然，有时候因为某种原因，候选者也会对这一荣誉表示感谢，然后婉言拒绝——例如，因为他（或她）更喜欢现在的职务，或者由于家庭原因而

---

* 对于正教授的任命，大部分来自学校外部。如果学校内部晋升，那么程序会略有不同。本校的副教授必须决定是否参加“终身教授”的程序评审。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因为对于终身教授的申请经常遭到拒绝，这对于副教授而言是一个可怕的打击。许多人倾向于保守的措施，去另一所能够给予他更高职称和终身职位的大学。

不便迁居。这时，选拔程序就要重新启动，遴选委员会要再次提出新的候选人名单。

如果候选人同意接受哈佛大学的提名。那么在这一阶段，他（或她）只需要原则上表示同意接受这一任命就行了，随后校方会告知聘任过程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工作。下一步，候选人将和系主任讨论薪酬条款，不过院系在这一问题上完全没有发言权。薪酬完全属于严格的个人隐私，学院里面任何人都不知道其他同事的薪酬情况，即使学院的院长也不例外。哈佛大学雇用经济学家的成本相对较低，因为学校仅仅需要向他们支付工资，但如果教师需要搬家找住处，学校还需要提供经济补贴。* 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聘用成本最为昂贵，因为他们要求配备的实验室可能耗资数百万美元，另外，他们也会要求学院提供助手和资金支持。新聘任的正教授没有固定的薪酬界限，他的报酬和其他福利条件只取决于院长与聘任者之间的约定，其他人无权干涉。

一旦院长或系主任与候选者达成协议，院长就会向校长提出聘任新教授的任命申请。院系中的所有成员都可以给院长写信表示他（或她）同意还是反对该候选人。校长会考虑这些意见和盲信的内容。

院里的多数票和院长的同意是任命新教授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学校需要确定，这个学院没有被持有相同的科学观和政治观以及相同世界观的小帮派把持，防止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吸收志趣相投的人。因此，学校还要进行更加深入的公正审查。为此，校长会成立特别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应该包括一位哈佛大学精通该学科并在校内另一院系工作的教授（例如，一位商学院的教授）。校长还会邀请两位来自美国其他大学，甚至国外大学的校外专家。特别委员会成员将收到哈佛大学送给他们审读的候选人论文，委员会成员在接受任务后，还要充分了解候选人的著作。

接下来，校长、院长和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将在校长办公室召开完全保密的会议。（我曾担任过本校其他院系聘任教授的特别委员会成员，因此，得以亲身观察这一程序。）会议开始时，要听取“证人”的发言。院长只是作为第一证人参加会议，他要汇报院系大部分人的意见，并接受委员会成员的质询，然后就需离开会场。之后，其他证人进入会场，这些证人主要是候选人所在学科的专家。如果

---

* 诚然，由于学术之外的劳动力市场对于经济学家的服务需求很多，因此，经济学家的薪水相对较高。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可能会收到来自政府或企业的邀请，这样的竞争推高了他们的薪酬水平。

有人反对这项任命，他也可以作为反对候选人的证人发言。委员会成员比较热衷于倾听反对者的详细看法。在听取了所有证人的发言后，特别委员会主席要求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阐明自己对于该项任命的支持或反对意见。由于该委员会并没有决定任命的权力，所以委员会成员不需要投票。最后，校长以邀请每位委员吃午餐来结束会议。

遴选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校长的任命决定。* 大多数情况下，院系和系主任的推荐都可以获得批准，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被驳回。一般而言，校长的反对总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从确定存在职位空缺开始，到最后正式任命的下达，整个过程常常会持续一年或两年时间。

在深入了解这一程序之后，我感到十分震惊。我已经习惯于国内在处理“人事问题”时的歧视和见风使舵。当然，在匈牙利国内，专业的考察也会发挥作用，但是真正起作用的是候选人的人脉关系。是什么力量导致候选人得到任命，或是导致候选人遭到拒绝？任命的决定是基于政治考虑，还是出于对个人忠诚的回报，比如希望以此互利互惠，还是完全的任人唯亲？哈佛大学的标准就是研究领域的一项卓越典范，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教授们非常认同学校出于声望考虑而制定的苛刻标准：他们希望这样的选拔能够巩固哈佛大学世界第一的地位。** 许多人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无数次会议，其目的就是确保学校的任命的正确性。各院系都将对教授的任命看成他们能够决定的最重要的事情。如果遴选出来的教授名副其实，那么一切都好说；但是，如果遴选出的教授名不符实，那么学校一定会沦为一所平庸的学校。

没有人可以保证这一传统的人员任用程序的完美无缺。或许，参与选择过程的某些人也存在偏见，另外，纯粹的学术标准经常受到个人感情和外部压力的实际影响。这样的现象非常隐蔽，我无法观察到。同样，即使每个人都绝对从学术标准出发考虑问题，错误还是有可能发生。一些获任者没有达到学院对他的

---

* 严格地说，决定是哈佛大学最高权力机构根据校长的推荐做出的。但是，这只是形式；真正的最终决策权掌握在校长手中。

** 大部分民众认为，哈佛大学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最近，许多机构开始发布大学排行榜，当然其计算方法不尽相同。这里，我只引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的排名，它通常按照综合标准（对学者的观点调查，教师成果的引用数量，教师/学生比例，等等）对世界上的大学进行排名。在 2004 年的调查中，哈佛大学名列第一，得到了 100 分，而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得分分别为 88 分和 79 分。

期望；反过来说，杰出的学者也可能被错过。在哈佛大学一直流传着一个关于保罗·萨缪尔森的故事。萨缪尔森曾在哈佛大学师从熊彼特。他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基础》后来成为经济学的经典著作。[2]在数学方法还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常用工具的时期，他就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然而，哈佛大学并没有给他一个职位，* 萨缪尔森后来去了同在坎布里奇市的麻省理工学院，并在那里对经济学院进行了改组。由于他的学术影响，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成为了国际经济研究的学术中心。萨缪尔森也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

哈佛大学在遴选人才上超乎寻常的高标准，造就了外界所谓的“哈佛式傲慢”。就像其他院校的教授以学校的传统和成就为骄傲一样，哈佛大学的教授们也为本校的传统和成就感到骄傲，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姿态，但是，外界通常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他们的傲慢态度，并对此非常反感。

虽然哈佛大学的聘任程序不尽完善，但是每次我亲身经历这一流程时，我都会仔细观察，并且尽我所能且满怀敬意地完成任务。

迁居坎布里奇

下面，该说说哈佛大学对我的聘任了。在我撰写这本传记时，我非常想知道，时隔这么多年，我能否看到当年遴选过程的论文、会议记录和盲信。我询问过一些经验丰富的同事们，他们坚决阻止我向学校提出此类请求。他们提醒我注意许多我早已知道的事情。这一聘任过程的基础之一就是保密性。那些在候选人任命问题上畅所欲言的人们完全相信，他们的评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候选人知道。在这种原则的保障下，他们才会毫无顾忌地说出否定候选人的意见。如果他们以后恰好与该同事在一起工作或一起参加会议，他们也不必担心如何与之相处。不过同事们建议说，如果我只是请院里的一两个同事回忆一下当年的事情，这应该不违反保密规定。

正是基于我后来得知的关于遴选程序各阶段的情况，故事的主线才变得清晰起来。大约在 1983 年到 1984 年的某个时候，哈佛大学经济学院觉得他们需

---

* 为什么会这样？一些人简单地将其解释为反犹太主义。其他人认为，守旧派的教授们只是担心萨缪尔森的观点和批评意见过于激进，而无视他的数学才能。

要一位研究共产党经济的专家。由于艾布拉姆·伯格森(Abram Bergson)即将退休,所以物色人选的工作迫在眉睫。伯格森是美国苏联问题研究方面最知名的学者,此外,他通过建立以他命名的社会福利函数,对于福利经济学理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物色人选阶段,我的名字进入了遴选委员会的考虑范围。我和几所美国大学的同行私交甚好,有些人还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在哈佛大学恰好没有关系紧密的朋友,我只是和一两个教授有过一面之交。因此,他们需要增进对我的了解。

哈佛大学首先邀请我到学校发表演讲,然后在午餐时间与我进行了学术讨论。随后,哈佛大学邀请我担任 1984—1985 学年的客座教授。这样,我需要搬到坎布里奇,并由院里提供住处。我在哈佛大学只教授一门课,其余时间可以做研究。我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从普林斯顿来到了坎布里奇。

我在哈佛大学举行了系列讲座,并提出了许多首次公开的观点。在后来的几年中,我不断打磨并扩充讲座的内容,最终完成了《社会主义体制》的书稿。同时,我也在这一过程中熟悉了哈佛大学,现在看来,哈佛的经济学家们显然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了解了我。当我收到客座教授的邀请时,他们曾经要求我提供简历和几篇成果。我猜想,这些材料一定是遴选过程中人们传阅的材料。

经过哈佛大学的充分考察后,我在上文当中说到的遴选第一阶段的行动终于结束了。哈佛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杰里·格林(Jerry Green)教授告诉我,学院决定邀请我担任正教授。系主任准备与我讨论具体细节问题。

(现在,20 年过去了,我在信中询问杰里·格林教授关于当时的情况。他的回答原文如下:"我们委托一个小组委员会阅读了你的部分著作,并向委员会报告评估结果。结果是毫无疑问的……你的任命获得了院内的一致同意……我想这么多年过去了,应该没有人介意我告诉你当时的情况。"[3])

就在哈佛大学的遴选工作第一阶段完成的时候,我收到了其他学校的邀约:一份来自伦敦经济学院,这也是我第一次到西方国家讲学的地方,另一份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但是,真正可以与哈佛大学相抗衡的是斯坦福大学,我已经通过了斯坦福大学第一阶段的系内投票,他们已经准备向我发出正式邀请。我与哈佛大学的系主任谈完后,就与妻子来到斯坦福大学,想考察一下那里的学术前景。我将自己的选择范围缩小到两所学校: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

斯坦福大学对我的吸引力很大。在哈佛,我几乎不认识任何人,但是在斯坦福,我有许多朋友:我从 1968 年第一次访问斯坦福以来,已经认识了肯尼思·阿

罗、蒂博尔·斯托夫斯基、阿兰·曼宁和青木昌彦。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并经常对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构成竞争威胁。除此之外，加利福尼亚美丽的自然景色、大海、森林以及旧金山的多彩生活，也让我们心醉。面对这两所如此优秀的大学，很难做出决定。

由于选择引起的精神紧张压力，我和妻子先后病倒。斯坦福的系主任把他在海边的房子借给我们在周末度假。在那里，我们置身于优美的自然环境之中，同时得到了很多好消息，美好的生活前景在我们眼前展开。但是，我的腰痛却在此时发作，折磨得我几乎无法行走。疼痛显然是由压力引起的。同时，我的妻子也开始高烧不退。最后是斯托夫斯基开车将我们接回斯坦福。

最后，出于学术研究的考虑，我艰难地选择了哈佛大学。那里集中了比其他任何大学都要多的学术资源，尤其是将波士顿地区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其他大学都考虑进来的话。就我的研究领域而言，哈佛大学的学术资源更是强大。在哈佛以及与它毗邻的其他研究中心里，从事苏联、东欧、中国经济和比较经济制度研究的人要比斯坦福大学多得多。

加利福尼亚的美景让我们心动，但是我们也在逐渐了解并爱上波士顿。波士顿比其他美国城市更像英国和欧洲城市。此外，另一个影响我的选择的重要因素是，我已经和这两所学校约定，每一学年，我只能在美国工作一半的时间，另一半时间我会以无薪假期的形式回到匈牙利工作。尽管两所学校都不十分情愿，它们当然希望我将全部精力放在本校，但是它们还是答应了。一旦我决定以这种方式在美国和匈牙利间往返，那么波士顿显然更有吸引力，因为布达佩斯与波士顿的距离，比之旧金山到布达佩斯的距离，要少跨越一个大洲。

我和系主任就具体细节达成一致。在寻找和装修长期住所上，学校答应帮助我，学校还会为我们支付每年往返布达佩斯和波士顿的机票。同时，他也预先告知我，这只是一份提议，我还需要等待最终的决定，因为这个提议有可能遭到否定。

这一警告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一直处于焦急的等待之中。（后来我才知道，在此期间召开了特别委员会会议。）终于，我们收到了学校的通知，我成为了哈佛大学的教授。

我们开始四处找房子，最终我们在一座快要完工的大楼里面找到一间公寓。按照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习俗，建筑物都要有自己的名字。我们所在的大楼名叫格林大学，它位于奥本山街，毗邻哈佛校园和哈佛广场。这是坎布里奇市著名

的生活中心，它的一侧是校园核心区，包括哈佛园、坐落着古老演讲堂的广阔草地以及学校主要的办公楼和住宅。它的另一侧是广场、写字楼、餐馆、银行和商店，其中最重要的是，有一间一直营业到深夜的大书店。每到周六和周日，哈佛广场上到处都是街头音乐家、艺术表演者和小商贩，有时，甚至会组成一场巨型街头嘉年华。哈佛广场就是城市不停跳动的心脏，因此，靠近广场的公寓对我们颇具吸引力。

1985—1986 学年，我和妻子回国工作。1986 年秋，当我们回到坎布里奇时，我们在系招待所住了几晚，等着搬到新的公寓里。当时，公寓虽然已经可以入住，但里面空空如也。我们从几个朋友那里借来几张床垫放在屋子里，直到买家具之前，我们都用床垫替代床。

教学的快乐和烦恼

也许这就是我的命运，当与我同龄的其他人已经有了几十年的教学经验，能够几乎不加准备地走上讲台讲课时，我却刚刚开始正式的教学生涯。

请允许我将自己当时的情况与一位典型的哈佛大学教师，比如微观经济学教师进行比较。哈佛的教师还在学生时期，就已经全部学习过这些微观经济学教材，并且由于他曾在名校学习，因此，他还可以观察不同老师在课堂上所使用的教学方法。一般而言，在 30 岁之前，他就可以评为助理教授，等到了 50 岁或 60 岁的时候，他教这门课已经 20 年或者 30 年了，他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修改讲义，增加文献中有价值的新观点，更新他的统计数据。他能够轻易地将自己的研究融入到课程中去。他也可以选用一本经过多次试用效果良好的教科书来确定自己的课程结构，或者将几本书中的内容综合在一起，再加入自己的原创性发现和理解。这些都是可以接受并且在实践中得到广泛使用的方法。

而我在 56 岁的时候，不得不从头开始。我的课程名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授课对象仅限于准备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西方国家的一些教科书对这一主题虽然有所涉及，但是我只是将其中的某些章节布置为补充阅读材料，我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讲这门课。我从未听过其他教授的类似课程，因此，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讲这门课的。我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当然，最后我重新整理了课堂上要讲的内容和介绍给学生阅读的材料，我

在课堂上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自写出来的，都是我要表达的观点和我想强调的材料。

而且，我教的课程不像标准的微观经济学或宏观经济学那样，属于比较稳定、发展成熟的分支学科。在那些学科中，理论解释的现实相对比较固定，每一年发生的变化非常细微，几乎不能察觉。与此相反，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就像射击移动中的目标。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开始在哈佛大学授课时，当时的共产主义阵营正处于动荡之中，重要的历史事件次第发生。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计划正在推行。1989 年，柏林墙最终被推倒。这些事件使我不得不重新准备“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后社会主义转轨”这门课的教案。虽然在制度变革之前，我对于共产主义经济和制度内改革的论述仍然有效，并会引起学生的兴趣。但是，我不得不缩减教学大纲中第一部分，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留出时间讨论转轨问题。这方面的新鲜信息非常多，但是我当然不能将大学教室变成新闻演播室。我要尽力为学生提供更加深入和系统的分析。

我并不认为，我的同事们十分清楚我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我不得不尽力追赶，并逐渐了解其他人通过西方大学教育和工作经验已经掌握的东西，同时，我还要解决课题研究上的学术难题。站在哈佛的课堂上，我面对的都是从众多优秀申请者中脱颖而出的年轻人，他们用挑剔的耳朵认真听我的每一堂课，我必须克服怀疑、犹豫，甚至专业上的自卑感，否则，我无法走进教室。

当时，我一定犯了不少错误。我那不可救药的匈牙利口音让学生们头疼。但是，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赢得了他们的关注和尊重。对于为毕业生开设选修课的老师来说，我吸引的听众异乎寻常地多，而且听课人数与最初相比始终有增无减，* 这至少是因为各国的事件不断将共产党制度的问题推向公众视野。但是另一个原因在于，我的课程在学生们中间有很好的口碑。

教授并不是哈佛大学唯一可以打分的人。每个学年结束的时候，经济学系的学生都会拿到一份调查问卷，他们可以匿名在上面对老师的工作打分，然后交给学院。让我感到骄傲的是，至今我还保留着学生对我的课程评价。其中当然有一些批评，例如，有的学生对我挑选的必读和选读书目不满。我曾经担心，因

---

* 在每个学年开始，我和妻子都要为听课的学生人数打赌。我们每人写一个数字，然后放到信封里，与实际数字最接近者为胜者。我的预测总是比较悲观，但是每次都是她赢。这意味着，她可以选择中意的餐馆享受一次大餐。

为我很少在黑板上写公式或演示数学模型，会有部分学生反对这种教学方法。还会有学生认为我的讲课方法缺乏“技巧”。不过总的来说，我的这种教学方法几乎没有为我带来负面评价。相反，对于我的课程的正面评价非常多。一些学生愿意来听我的课，原因在于他们感到我那“散文式”的讲课风格很新鲜。我经常在课堂上讲述一些亲身经历和直接观察所得。有时候，我会放一些电影或读一段小说，它们生动地描绘了共产党体制的特点。学生们喜欢这些教学方法，这让他们了解了世界的真实情况。我的课堂另一个吸引人之处在于，我能够坦率地回答学生的提问，即使有些问题是关于我个人的，甚至是一些“私人”的问题。我的口头演讲和作为教学资料所使用的书面材料在基本原理和方法上都有别于其他课程。这样的差异不但没有吓跑学生，反而成为我的课堂吸引人的一个方面。一些受调查的学生认为，我对于经济学的教学没有局限在狭窄的范畴内，而是引入了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的分析，这点值得称道。50 年前，综合社会科学大师熊彼特曾就教于哈佛经济学院，但是，50 年后的学生接触到的多学科交叉分析方法非常少了。

我不想夸大调查问卷在提供学生反馈意见方面的价值。这个调查并不是针对所有哈佛博士生的。参加调查的学生是被民意调查专家称为自愿者的人员。我的课程并不是必修课。学生有选课的权利。但是，一旦他们选修了这门课程，他们就必须上课并参加考试。选修这门课的学生首先要对课程内容感兴趣，并且从前几年上过这门课的同学那里，听说了这门课程的授课方式。我并非认为我的授课方法对于哈佛的学生特别有吸引力。我想得出一个更加谦虚和有一定限度的结论。在授课的过程中，有令人兴奋的事情，也有艰辛的劳动。但最能坚定我的信心的是，年复一年，有那么多的学生在我的课堂上享受到了学术的快乐，在我解答他们课上和课后问题的时候，也促进了他们的思考。

多元化与宽容

虽然我的讲课风格本质上有别于他人，但是在哈佛大学，这绝不是特立独行。哈佛大学（和其他许多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极为推崇这种学术多样性。学生可以从众多的学术标准、理念和不同学派的科学观点中，自由进行选择。

阿玛蒂亚·森分别在经济系和哲学系任教，多年来一直与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举办哲学研讨会。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出版后，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研究领域中冉冉升起的新星。* 森的政治观点与诺齐克针锋相对。他研究贫困和饥荒问题，呼吁国家无条件发挥再分配作用。他们在观点上的分歧从未妨碍他们之间的真诚友谊，反而为他们的联合研讨会增加了闪光点。

在我们系有很多不同的经济思想流派，很多人的政治观点不仅是存在差异，有时候完全对立。在这些老师中，有激进的左派经济学家斯蒂夫·马格林(Steve Marglin)和几位老派的凯恩斯主义者，以及从事理论研究并定期向保守的《华尔街日报》每日政策评论专栏投稿的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有些教授曾经长期或短期在政府为总统服务，然后重新回到学校任教。在我到哈佛的时候，80 岁高龄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已经退休，但是，他仍然定期参加院里的工作。(我们也经常能在游泳池里看到他那健美颀长的身姿。)他不仅因为自己的学术著作而赢得了巨大声望，他还曾是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智囊团成员，并担任过美国驻印度大使。马丁·菲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负责协调大型机构中的大学生教学组织和教育任务。他隶属另一个政治团体，曾经多年担任里根总统的高级顾问。另一位同事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离开学校后担任世界银行的副总裁，负责公共服务部门。在克林顿执政期间，他出任财政部副部长，后升任部长。卸任之后，他又回到哈佛继续执教。虽然他名义上属于经济系的老师，但是，他在 2001 年又担任了哈佛大学的校长。退休后，从 2006 学年开始，萨默斯以特聘教授的身份回到经济系。经济系和哲学系有一对教授组合，他们就是罗伯特·巴罗和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他们经常联手举办学术研讨会，向观众展示各自相互对立的观点。

所有这些人在教学、演讲或公众活动中或许都存在很大的分歧，他们都以支持不同的政治观点而闻名，但是在经济系的会议中，他们从未就政治或者世界观产生过争论。观点的争论和分歧从未阻碍过他们从事富有成果的合作。或许只有我一个人对此感到惊讶，而其他人早就习以为常了。

---

* 诺齐克在几个问题上已经逐渐改变了他早期激进的自由主义观点。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优秀的作家，他的幽默和友善温暖着大家，但是，2002 年，他在创作的盛期去世。

在我们的好朋友中有一对夫妻，丈夫是共和党人，而妻子是民主党人。每当伶牙俐齿的妻子在朋友面前奚落丈夫的保守观点时，我们都不禁开怀大笑，但是，政治观点的分歧从未影响到他们的“和平共处”，他们已经共同幸福生活了几十年。这让我想起我的一位匈牙利朋友，匈牙利国内制度变革后，他与已经成年的孩子们坐下来共享一次家庭聚餐都变得很难，因为这对夫妇已经不能容忍彼此的政治观点，这真让人伤心。

道德操守

哈佛大学的教授非常注意遵守与自身地位相应的道德要求，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如果将美国大学采取的严厉措施，如禁止教师对于学生的性骚扰、禁止师生恋*等，在学校里发生的变化过程记录下来，那一定非常有趣，同时也具有启发意义。我对于这种事情没有亲身经历，也没有听过那些流言蜚语。在那些狂热的年代，“政治上正确的”行为意味着，一位男性教授应该和他的女性同事保持一定距离，并且行为举止上要表现得好像他并没有意识到她们是女性一样。在哈佛，我的行为方式与在布达佩斯时没有任何差别，如果我认为那些女同事充满魅力，我会不吝赞美她们的衣着或发型，如果我不这么认为，我或许会和她们开个善意的玩笑，我不会注意这些行为是否得体。我感觉我的女同事们更喜欢一位充满人情味的男同事，而不是一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然而，这并非我希望在这里详细讨论的内容。这里，请允许我说一说与教学和研究相关的道德问题。

现在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实践应用研究和研究的商业应用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以科学为目的的单纯的学术活动便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商业利益驱动的研究工作。哈佛大学从不虚伪地回避这个问题。**商业捐赠是科研的主要资金来源。因此，学校尽量避免从法律方面触及这个问题，而是用明确的标准表明，哪些是道德上允许的捐款行为，哪些是道德上不允许的

---

* 在学生办的报纸中，加尔布雷斯承认他在当助理教授时曾违反这条规定。之后不久，他就和那位学生结婚并共同生活到现在。

** 哈佛大学成立了由一位学校高级官员领导的教授委员会，就这一问题做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提出了规范学校与商业机构间接触和合作的详细指导意见，制定了解决潜在矛盾的原则。

捐款行为。

学校对两类冲突有明确的划分：利益冲突和承诺冲突。从道德上来说，大学的教授和其他教职工必须尊重学校的物质利益。例如，如果教师收取了商业企业的研究报酬，那么，他就不应该在不向学校支付任何费用的条件下，而使用学校实验室的设备。如果教师同时承担两种工作，例如，学校的工作和公司的有偿工作，那么后者一定不能妨碍前者。

学校教师有时需要承担美国情报机构的任务或保密项目。不过这绝不是电影中那些秘密潜入办公室，窃取军事情报的间谍工作。我们以经济学家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众所周知，中央情报局会定期召集美国经济学家估算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因为美国人有理由认为，苏联的统计报告不可靠。这是一项严肃的科学任务，任何在政治上忠于国家的美国经济学家都没有理由拒绝这一任务。这自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教师为情报机构工作，那么怎样保证大学的独立性和政治操守？大学教师允许接受军事或情报研究的商业报酬吗？这种安排会让大学遭受哪些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政治责难？

学校分析了上述问题后制定了一条规则：校园内不得进行任何“机密”研究。学校教职工以个人名义承担研究工作时，他（或她）要凭着自己的良心，决定是否接受来自情报机构或军事部门的资金资助。但是，研究者必须向学校报告这一情况。如果研究成果得以正式发表，那么他们要正式宣布，该研究得到五角大楼或中央情报局的资助。

然而，无论学校的规章制度如何深思熟虑且周到详细，仍然会出现介于许可和不许可之间的临界个体行为。鉴于这种情况，哈佛大学成立了各种道德委员会。哈佛的教授和其他教职工都可以向委员会寻求帮助，获得建议。另一种简单的方法，是直截了当地咨询委员会的意见。* 如果委员会获知，有些行为可能存在道德问题，那么就要开始进行相应的调查。

我不想给读者这样的印象，即哈佛大学或其他美国一流大学在处理道德问题上表现得完美无缺。事实上，那里绝不仅仅是发生了某些可疑的事件，只要有人类工作的地方，这种事情就不可避免要发生。但是，不幸的是，大学或者大学社团的领导们也不能正确处理此类事件，或对此明确表态，或将其公布

---

* 我曾在接受一位学生的礼物后向委员会询问是否可以接受。由于礼物只是表达感谢的象征，并不昂贵，经过委员会的调查，他们建议我接受礼物，不必拒绝，以免伤害学生的感情。

于众。

每当我与大学里的朋友们谈起此类具体事件时，我发现他们总是提出很高的道德标准，希望从总体上加强哈佛大学和其他美国学术机构的世界声望。如果他们能够公开表达这一观点，效果一定会更好。

注 释

[1] Rosovsky, 1990, pp. 194—195.

[2] Samuelson, 1983.

[3] 这封信保存在我的文件收藏中。

17. 在匈牙利和世界各地的家：1985 年后

哈佛大学给予我教授职位时，希望我能全职工作。学校明确表示，可以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帮助我申请美国公民身份。如果我不想加入美国国籍，我至少可以在学校的帮助下申请“绿卡”（永久居住权）。我拒绝了所有提议。就像我早些时候曾说过的一样，我在与学校的协议中，坚持留出一半的时间在匈牙利工作。我这样做是为什么呢？

是什么让我心系匈牙利

我将履行本书前面做出的承诺，谈谈我的移民问题。1956 年匈牙利革命之后，匈牙利国内向西方国家的移民迅速增加，但是，我并没有离开匈牙利。我拒绝了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提供的工作机会，这些都意味着我可以离开匈牙利。到了 1985 年，我与哈佛大学（其他美国大学也同时向我发出了邀请）讨论工作问题时，再一次拒绝了移民建议。（我将本章的起始时间定为 1985 年，当时这一问题再次变得非常紧迫。）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以家庭原因为借口。我的三个孩子，一个在匈牙利，一个在瑞典，一个在美国。* 我们的七个孙辈

---

* 我们的儿子加博尔学习经济学，但是，他真正学习到如何创建和成功运营一家公司，并不是在大学，而是在他的工作实践中。他成功领导了一家 IT 公司，工作之余，还在佩斯大学教授管理学，这给了他很大的乐趣。我们的女儿朱迪特也毕业于布达佩斯大学经济系；她现在是斯德哥尔摩大学商学院的项目经理，负责组织商界领导人的拓展课程。我们的儿子安德拉什是三个孩子中唯一一个没有和经济学沾边的：他获得了数学和语言学的博士学位。现在，他的主要活动是在美国最激动人心的领域——互联网的发展领域——进行应用研究。他喜欢到布达佩斯旅行，在匈牙利科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协助指导博士生。作为他们的父母，我不禁感到骄傲。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是，三个孩子都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努力工作。

也住在这三个不同的国家。如果我们与三个孩子中的某一家住得比较近，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要和其他两家离得更远。因此，这也是影响我们选择的原因。我曾与妻子反复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并没有在最终结论上取得一致，但是我们都同意做出这一决定的这些理由。为了与这本传记的风格保持一致，即本书在讲述我的思想和情感时，还是以第一人称来叙述这件事。

我对匈牙利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我每次回国经过链桥和伊丽莎白桥，看到布达佩斯的美景时，总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奥拉尼、奥蒂、阿蒂拉·约瑟夫和其他匈牙利诗人的诗集和考林蒂的文集，我都有两套，一套放在布达佩斯的家里，一套放在美国的家里。我在哈佛大学的家里还挂着一幅巴托克的肖像画。

我习惯用匈牙利语思考。我在做演讲时，从来不会干巴巴地照本宣科；我也习惯即兴发挥，并使用英语自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在写作时，我更愿意使用匈牙利语，我觉得那样更加得心应手。我在出版专著前，会找一位专业翻译，将我的匈牙利语手稿翻译成英文。我在计算时使用匈牙利语，偶尔做梦也会说匈牙利语，当然，我很少能够回忆起梦中的情景。

如果我说我热爱所有匈牙利人，那没有任何意义。从人生观和情感角度出发，我都不会对一个群体进行总体评价。我欣赏某些匈牙利人，但对某些匈牙利人毫不关心，也拒绝接受某些匈牙利人，还有一些匈牙利人的做法我根本不能原谅。我对于美国人、德国人或者爱尔兰人，也持有同样看法。我在匈牙利国内和国外都有真正的朋友，但是，那些与我无话不谈，并且因为过去的经历而紧密相连的朋友们，都生活在匈牙利。

匈牙利的命运时刻牵动着我的心。我了解它的历史胜过任何一个国家。从我记事起，我就一直关心匈牙利的事情。即使我生活在美国，我仍然以旁观者的身份关注着匈牙利国内的一举一动（当然掺杂着个人的同情心）。我们坚持订阅匈牙利报纸，互联网普及后，更是时刻关注匈牙利的国内新闻。从内心来说，真正能够引起我们深切关注的事情都发生在匈牙利。

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优越感，但是，当伊什特万·绍博的电影《梅菲斯特》获得奥斯卡奖时，当匈牙利人获得奥林匹克奖牌时，当我向美国朋友说起拉斯洛·内梅特的戏剧《伽利略》时，当谈话转到布达佩斯的学校曾培养了约翰（雅诺什）·冯·诺伊曼、尤金（耶诺）·魏格纳和威廉（威尔默斯）·费尔纳时，当《纽约时报》盛赞伊利迪库·恩雅蒂的电影《我的20世纪》或安德拉什·希夫的钢琴独奏会时，我的内心总是充满喜悦。当我在关于社会主义的国际研讨会上，听到美

国人、中国人或者苏联人赞扬匈牙利经济学家的开创性贡献时，我总是感到欣喜和自豪。因为找不到更准确的表述，我将此称为民族自豪感。

我不是在博取同情，我也不会引用匈牙利第二首国歌中的歌词“你必须在这里生活，直到死亡”*。我更喜欢用经济学家相对枯燥的语言风格，来谈论我所要求的观点连续性的看法。在之前的章节中，我已经说到我在匈牙利申请护照时遭受的挫折，在那几年，我被禁止出国，即便获得批准出国，每次都要重新申请。尽管如此，我现在仍然使用匈牙利护照，难道我应该更换护照以方便出国吗？在受到压迫，自由严重受限的时候，我顺从自己的意愿留在了匈牙利国内，忍受了匈牙利公民权之缺陷带来的所有不便。那么，当旧的体制已经放松并解体时，难道我应该违背自己的诺言吗？

我决定不移民美国的理由，更多是出自对匈牙利的感情依恋，但我必须补充的一点是，促使我做出这一决定的还有其他职业的考虑。我的研究领域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后社会主义转轨，西方国家也有很多人研究这一课题。但是，从我的第一本书到最后一篇文章，它们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权威，原因就在于我所写的是我在匈牙利的亲身所见所闻。我的很多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研究，都是以匈牙利为案例进行的。我的许多文章从一开始就阐明：文章主标题界定的是普遍性研究对象，文章的副标题则说明“基于匈牙利的经验”。我从不担心我的读者们可能会不喜欢我的文章所具有的地方主义倾向。我一直认为，在利用比较方法完成实地调查和信息收集工作后，真正的智力考验是从特定的观察结果总结出普遍性结论。

每个人都有选择他要生活在哪个国家的崇高权利。按照我的价值观，某些生于匈牙利的人决定移居别处，完全可以理解。这种迁移背后也许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逃避政治迫害，对社会现状不满，或者只是因为他（或她）在别处感觉更为快乐。

任何热衷于政治的人都可以通过移民表达对于国内政治现状的不满，拉约什·科苏特、米哈伊·卡洛伊、奥斯卡·亚西和贝洛·巴托克等许多民主政治人士在 1945 年后离开匈牙利的举动就是如此。这是一种英雄的姿态，需要做出巨

---

* 这些匈牙利人经常引用的词句，出自伟大的匈牙利诗人米哈伊·沃洛什毛尔蒂（1800—1855）的诗歌《请求》。这首诗第一节的最后四行向“匈牙利人”大声疾呼：“除了这里/广阔世界没有你的容身之处/虽然命运之手赐福或灾与你/你必须在这里生活，直到死亡。”

大的牺牲。当然，我并不认为留在国内就是道德上的妥协，或者对于政治事件的超脱。但是那些反对专制统治的人们，只能通过离开自己的祖国表明态度吗？留在国内就是向统治阶级卑躬屈膝吗？我从不认可这种死板的划分。流亡他乡的人可能会低调行事，留在国内的人也可能挺直腰杆做人。对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判断，应该依据他的行为，而不仅仅取决于他选择居住的国家。

坎布里奇和布达佩斯的生活比较

到哈佛大学工作后，我每年在坎布里奇住半年，然后在布达佩斯住半年，这种奔波于两地的生活方式，当然会让我们有机会对两座城市进行对比。这两个城市的优势和劣势各在哪里？或者两个城市的区别在哪里？我们不是将“美国”与“匈牙利”或者“东欧”做比较，我们在地球两边的所见所闻只是当地繁杂的生活现象中的一小部分。我也不是在将两种制度或两种文化加以比较，这种比较已经出现在无数的专著和研究中了；我只是根据亲身经历来比较这两个地方。我要向读者传递的只是一些个人的回忆和印象。我曾经接受过一份调查问卷，里面问道，我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美国的三件事情是什么。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叙述框架。

美国人脸上的微笑深深吸引着我。我并不是指那种强迫性的“保持笑容”，而是相比较于匈牙利人，无论教授还是学生，无论售货员还是侍者，无论早间节目中的记者还是受访者，他们都表现出善意的幽默。美国人也一定有他们的担忧和恐惧，但是他们不会把这些挂在脸上让所有人看到。我在美国工作时，担任我第一任秘书的玛德琳·勒瓦塞尔，先是照顾她身患重病的妈妈，然后是照顾不久于人世的丈夫，她为家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生活得非常艰难。但是，每当我走进办公室时，她总是面带笑容，从不怨天尤人。办公室另一位年轻的秘书苏珊身患癌症，手术前的治疗造成她严重脱发，但她依然充满魅力。她喜欢开玩笑地向大家展示她的新假发和帽子，大方地询问我们，这些东西是否和她的肤色相配。

每当我们从美国回到匈牙利，迎接我们的总是一片抱怨声——虽然这些抱怨都有合理性，但是问题不在于麻烦有多么严重，而在于我们对待麻烦的态度。我们刚刚开始这种往返于两地之间的生活时，每次回到布达佩斯，人们经常问我

们的生活怎么样，我们总是回答说："哦，很好。"每当这时，人们经常还要再问一次："你们真的很好吗？当然，生活对你们会很容易，毕竟你们生活在美国。"后来，我开始谨慎地留意自己的言辞了。我会提前准备一些抱怨的语言，以便在我回到匈牙利后派上用场，这样，我们就显得与匈牙利人合拍多了。

我们高兴地看到，与我们往来的美国人都非常诚实和敬业。我在这里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国家导致了官员滥用权力、腐败和政治伪善，等等。我只是在思考生活中的一些小琐事。我在商店买东西付钱后，找给我的零钱对不对？如果修理工说他会在周三早上 9 点到，那么他能否按时出现？如果你从电话中得到一些信息，信息准确吗？如果我给某人的语音信箱留言，他能回复我吗？虽然在坎布里奇，也会碰到一些对人的可靠性和诚信度失望的事情，但总的来说，数量少于布达佩斯的情况。

美国同样存在"灰色"经济，当然，其规模要远远小于东欧国家。但是，当我们接触到灰色经济时，我发现灰色经济的运作奉行的道德原则，要比匈牙利国内更能让人接受。我们搬进新家时，需要一位勤杂工帮我们完成打孔、移电源插座和组装书架等零活。我们找到了斯蒂文来帮忙，下班后会过来干这些活，他把所有的杂活都干得井井有条，但他没有安装窗帘。他白天在一家生产窗帘的企业工作，因此，即使在他晚上打零工的时候，他也认为和自己的雇主竞争并不妥当。

美国人的专业精神和工作纪律让人印象深刻。无论你和哪个领域或层次的人接触，你都能感受到他们非常了解自己的工作，并且尽心尽力完成本职工作。这一特征并不只限于那些高学历的业务人员，例如我们的保健医生，他虽然只是初级医师，但仍然时刻关注最新的医学进展，如果医学界对某种治疗或药物的观点有所变化，他也会立刻做出反应。这种敬业精神同样表现在音响工程师、汽车修理工或房屋粉刷工身上。我们的印象是，相比于匈牙利同行，他们全都经过良好的训练，而且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们没有人在工作的时候闲逛或聊天。我们的脑海中逐渐形成了勤奋工作的美国人形象。当然，并不是每个美国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匈牙利人中也有敬业而勤奋工作的人，而且，这样的人现在在匈牙利越来越多。但是，这样的人在美国更为普遍。这也是美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生产力发达的主要源泉。

现在，我要谈谈我在美国生活时的三种不快经历。首先是语言，语言给我造成很大的麻烦。当然，这并不能归咎于英语本身很强的表现力。但是，对于一些在非英语国家长大的人来说，英语的发音很难，并且词汇量惊人，在实际应用的

时候很难掌握。我的语言能力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非常明显。我刚到美国时经常出错，请允许我说说其中的两件事。我参加波士顿的驾驶员考试时，州警察向我出示交通标志，让我回答这些标志的含义。我看到其中一个标志时，毫不犹豫地回答警察，“禁止劫持”(No hijacking)，其实我真正的意思是“禁止搭乘”(No hitchhiking)。这马上引起了一片哄笑声，当然我还是拿到了驾驶执照。另一次，我在课堂上讲到存货问题时，三次将“仓库”(warehouse)误说成“妓院”(whorehouse)，逗得学生们笑个不停。虽然我的语言技能后来得到提高，但是，我至今还很难听懂我的中国或日本学生古怪的英语发音，或者在话筒里听到的连珠炮似的英语讲话。

我在美国的第二种不快经历要比第一种带给我的麻烦更大。美国公众的想法中存在奇怪的地方主义色彩。尽管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和科学领域中，都处于核心地位，但是它却有着强烈的内倾性。了解美国人的这一特征最好的办法，就是分析三大有线电视网具有的强烈影响力的新闻节目。它们报道的内容，很少与美国无关，如果它们同时报道同一国外事件，那么你也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到，他们是从美国的角度讨论这些问题。而欧洲，尤其是一些欧洲小国家，对于世界的态度则要开放得多。

最后是我在美国人身上看到的难以言说的精神：美国人不变的乐观主义和对行动的信念。如果某一地区发生自然灾害，那里的人们在受访时，不会表现出任何经受灾害打击后的沮丧，也不会要求联邦政府的干预或援助。相反，他们总是说“我们能应付”或者“是的，我们会从头开始”。他们总是立刻开始谈论未来的赈灾计划。这种面对逆境的自强自立非常可贵，确实值得我们的推崇和学习。

但是，与这种随时准备行动的态度相伴而生的，是幼稚和低估局势复杂性的倾向。美国人遇到问题时，总是确信自己能够解决问题。他们想象不出世界上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经常不假思索地提出自认为能够让事情得以解决的建议。不幸的是，这些建议经常基于对形势过于简单的描述，因此，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非常笼统。

面对困难迅速采取行动经常能够创造奇迹。当欧洲的哈姆雷特和奥勃洛莫夫们还在犹豫不决或者裹足不前时，美国人可能已经组织起来开始行动了。在其他情况下，贸然行动可能导致人们走上错误的道路。(这里我要先讲述一些后文发生的事情)记得共产主义阵营刚刚解体时，美国政府的顾问们立刻就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开始提出各个领域的改革措施。有时候，这样做确实有效；但是有

时候，却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世界文化的中心

当某些趋炎附势的匈牙利知识分子用不屑的口吻谈论美国人的蒙昧和缺乏教养时，我认为他们显然在夸大其词。当然，美国确实存在一些粗俗且没有教养的人，但是匈牙利和其他欧洲国家也存在这样的人。可能我非常幸运，恰好住在一个世界科学和文化中心。波士顿地区有七所大学，其中两所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它们同在马萨诸塞大道上，相距只有十分钟的路程。我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遇到过知识渊博的学者，但是我可以大胆地宣称，波士顿所聚集的敏锐的头脑和天才以及教育机构，全世界绝无仅有。

布达佩斯的艺术博物馆也许为拥有梵·高、高更、马克斯·贝克曼、克里姆特甚至拉斯洛·莫霍伊-纳吉的画作而骄傲，而这些都可以在哈佛的博物馆里找到，更不用说波士顿伟大的画廊和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所收藏的奇珍异宝了。

我们只需花几分钟时间乘坐地铁就可以到达贝多芬音乐厅，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交响乐团之一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所在地。我们在那里听到的音乐真是无法言说！所有到访美国的著名音乐家，都将获邀到波士顿演出看成是一种荣誉。此外，波士顿还有两个非常好的音乐厅：一个是墙上镶着木嵌板并有着温暖声音的乔丹音乐厅；另一个是哈佛大学演讲厅的桑德斯厅。在哈佛的那几年里，我们听了几场音乐会，并且在观众席中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这甚至比我们在匈牙利音乐学院见到的熟人还要多。

我们也去看了很多电影。虽然我们可以租到很多录影带，但是，录影带不能与电影院相提并论。（当时最让我们兴奋的是，一有电影公映，我们马上就可以在电影院观看。现在的布达佩斯也可以看到美国的最新电影了。）有些我们在美国看过的电影，从未在布达佩斯放映过。例如，改编自契科夫戏剧《万尼亚舅舅》的电影《42 号街的万尼亚》，描写格伦·古尔德这位钢琴怪才的电影《格伦·古尔德 32 短片》等。

至于书籍方面，哈佛广场有三家大型书店，藏书十分丰富，距离我们的公寓也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书店里总是挤满了学生和图书爱好者，而且，这些书店都

是营业到晚间才关门。我们的瑞典外孙女来美国的时候，她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广场的书店。在这里，我们能找到最新出版的所有新书。（我们经常浏览《纽约时报》的周日增刊或者《纽约书评》，希望通过报纸的推介，使我们在浩瀚的书籍海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书籍。）

如果你觉得波士顿的文化环境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那么，你也可以去近在咫尺的纽约和华盛顿。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去其中的一个城市玩几天。这三大城市的音乐厅、歌剧院、剧院和美术馆让我们拥有无尽的选择。我们经常因为没有时间或其他安排，而错过我们认为值得欣赏的艺术，并为此追悔莫及。

朋友们

友谊对我而言至关重要。当然，不同的友谊在深度、真诚程度和接触次数上可能有所区别，但是，熟人和朋友间的界限，还是清晰可辨。无论我和周围的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与周围人的亲密接触总是带给我快乐。

正如我前文提到的那样，如果我能与身边的同事友好相处，我在工作中会感到非常愉快。在这方面，我非常幸运。我在哈佛的秘书都是友善而和气可爱的人。我在前文中已经谈到了玛德琳。凯特·皮尔森和我通常在早上就开始讨论，讨论的内容并不仅仅是一天的工作安排，还会交流彼此对政治事件、电影和读书的心得。劳伦·拉罗莎送给我一本她自己所写的诗集，这无疑象征着她对我的极大信任。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她们了，但我始终和她们保持着通信联系，偶尔也会互通电话。

我从未担任过领导职务，但是，我曾有一位或几位研究助理。从1985—1997年，玛利亚·科瓦奇[朋友们都叫她毛尔奇(Marcsi)]与我一起工作，我感到这是一种特权。她在颇有声望的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劳伊克学院完成学业后，便开始做我的全职助理。她在每件事上都能助我一臂之力：收集数据，编辑我的手稿，处理信件，联系相关人员和管理我的文件。她熟悉我的许多工作细节，有时候甚至我还没有说需要什么，她就已经知道了。当我在哈佛开始工作时，她每次都同意和我们一起去美国。

在玛利亚之后，阿格尼丝·本尼迪克特担任我的助理，然后是雅诺什·沃尔高。就像玛利亚·科瓦奇一样，他们也跟随我们在布达佩斯和坎布里奇两地奔

波，并且在为我工作两年后，自愿续约一年。

这三位年轻人不仅是我的助手，也是我亲密的朋友，我和妻子都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孩子或孙辈（他们在年龄上属于这两代人）。如果他们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愿意伸出援手。我们经常在工作之余聚会，他们非常喜欢吃我妻子茹饶做的饭菜。

在我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期间，我和学生之间也产生了温暖的友谊，他们在研究和写作上成为我的助手。安娜·塞莱尼、钱颖一、许成钢、卡拉·克鲁格、简·普罗科普、亚历山德拉·瓦克鲁、翁笙和、约翰·麦克黑尔，他们不仅位列我的致谢名单之中，或者属于我的合作者，他们也是我温馨的回忆。我们不仅在学校，而且在家里见面。虽然他们和我相继离开哈佛，但是我仍同他们保持联系，只是有些人联系得多些，有些人联系得少些而已。

在哈佛时，我们需要找一位家政人员，于是在树上贴的求职广告中找到一个电话号码。拨通号码后，一位可爱的女孩苏珊·瑞安-沃尔玛出现了。她当时刚从大学毕业，偶尔写些短篇小说和诗歌。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她需要靠家政工作谋生。我们谈好了工作条件，随后她来清扫我们的公寓。在我们成为朋友之后，我们开始劝说她继续学业，回到大学深造。她听从我们的建议，参加了一个高等新闻学研修班，并在一家小报社找了份工作，之后又跳槽到波士顿一家主流报纸，并且现在成了那里的副主编。

苏珊在我家工作一段时间后，问我们是否可以请一位朋友帮助她，我们当然同意。从那以后，当时已经是记者的苏珊和她的伙伴、初中教师琳达·克罗图开始轮流清扫我们的公寓。她们始终忠心耿耿。无论苏珊后来的职务有多高，无论琳达的教学任务有多重，她们始终帮助我们做家务，成为我们的朋友。这真是有趣的经历。她们总是努力工作，一丝不苟，把家里清扫得一尘不染。*

一次，在游泳池边，茹饶和一位面容端庄、身材健美的白发夫人聊天。这次谈话促成了一段友谊。这位夫人是咪咪·伯林，在哈佛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教授俄罗斯历史，她的丈夫格里·伯林是一位知名的律师、业余单簧管演奏者，以前是一位人权斗士，他们夫妇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当我们从欧洲回到坎布

---

* 当我从哈佛退休时，苏珊和琳达应邀参加了学校为我举办的答谢晚宴。我们坐在一张大圆桌旁，邻座间彼此进行自我介绍。她们周围坐着的都是大学教授，当别人问到她们的工作时，她们的第一个回答是雅诺什·科尔奈家的清洁女工。其他人有些惊讶。即使在开明的哈佛，清洁女工出现在教授的晚宴中也是不常见的。后来，她们进一步解释说，她们分别是记者和教师。

里奇时，我们都会到他们家先住上一晚，享受一顿美味的晚餐，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当我们要离开坎布里奇时，我们也要去享用咪咪的美味晚餐，然后再离开。我们离开美国后，他们也曾到布达佩斯看望我们，共度快乐时光。

我们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和鲍比·索洛(Bobby Solow)也度过了许多有趣的夜晚，大家经常一起去听音乐会。每个经济学家都知道索洛对于经济学的意义。听他讲课是一种美妙的经历。* 我没有见过哪一个人，能够将艰深复杂的经济学理论用如此清晰的方式解释出来，他的课一点也不倨傲，闪耀着智慧和幽默的光芒。即使在餐桌边，他的朋友们也能感受他的过人才华、人文关怀、风趣幽默和乐于助人。

我们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大学里的同事。兹维·格里利谢斯和他的妻子戴安娜，戴尔·乔根森和琳达·乔根森，我们的同乡弗朗西斯(费里)·巴托尔和杰·罗斯福、阿玛蒂亚·森和艾玛·罗思柴尔德，罗伯特·多尔夫曼和南希·多尔夫曼，弗兰克·霍尔兹曼和马蒂尔达·霍尔兹曼，罗伯特·舒尔曼及妻子，朱迪特·费耶……我不知道该在哪里停止这份长长的名单。其中，兹维·格里利谢斯、罗伯特·多尔夫曼和霍尔兹曼夫妇已经过世，我们深切地怀念他们。

家庭聚会是美国最常见的社交形式。一大群人聚到一起，手里端着饮料，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起，和不同的人聊天。在大家彼此熟悉之后，通常就是正式的晚宴，在餐桌边，人们通常只和自己的邻座交谈，即使他们以前并不认识，甚至也可以聊上一两个小时。如果你不够幸运，没有遇到投缘的邻座，那么两个人通常只是客气一下而已。

我不得不承认，我在美国时从未举办过类似的家庭聚会；如果我们受邀参加这样的聚会，也通常会礼貌地婉言谢绝。我们喜欢的那种聚会形式是，主人邀请两个、三个或者四个客人，每个人都能发表长篇大论。如果话题合适，我们会满怀激情地参与讨论，而不是每过五分钟就要换一个话题。

我讨厌不断变换话题的闲谈。一些人向我们解释，美国的学术界不会在聚会上谈论某个人自己的专业问题，因为这对于非本专业的人来说是不礼貌的。我们曾经邀请三对夫妇到家里做客，其中两位先生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另一位先

---

* 1972年，我们的女儿朱迪特当时一直在考虑她应该申请哪所大学，当她第一次来美国时，曾陪着我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当时的发言人之一就是罗伯特·索洛。听了索洛的演讲后，她当即认定经济学是一门非常有趣的学科，大学里的经济学专业值得学习。后来，她有些失望。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老师讲课都像索洛一样生动有趣。

生是著名的政治学家，他们的妻子也是各自专业的研究者和艺术家。我们之前曾到他们家里做客，因此，我们也同样热情地回请他们。起初，我们一想到客人们在一起热烈交谈的场面就感到兴奋，但是，由于我们的客人总是谨慎地避开各自的专业话题，大家的谈话都是中规中矩的老生常谈。我们吸取了这一次的教训。后来，我们尽量用偶尔提出的问题或建议来引导大家的谈话，让讨论变得生动有趣，具有启发性。当我们的朋友看到我们喜欢这样的社交形式时，他们尊重我们的意见。通常意义上的家庭聚会邀请减少了。相反，更为小型的谈话性聚会经常邀请我们参加，而这是我们所喜欢的。如果将我们在坎布里奇的娱乐活动按照喜欢程度排序，那么，我当然会将丰富多彩的社交生活放在前几位，因为这样的聚会充满学术的乐趣。

客人们喜欢到我家做客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总是能发现些特别的美味。茹饶做的一款蛋糕在坎布里奇特别有名。我们听说，一些不太熟悉的人曾四处打听，怎样才能得到科尔奈的邀请，因为他们特别想尝尝茹饶做的杏仁蛋糕。

我非常喜欢到哈佛的教工俱乐部参加活动，我在那里感觉非常自在。几乎每周，我都要去那里和同事或客人们吃一两次午餐，曾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生活过的人们或许发现，教工俱乐部的吸引力是不言自明的。在坎布里奇，我热衷于这种聚餐：人们在餐桌旁开始亲密无间的交谈，谈话主要围绕专业话题展开，但是政治、艺术和个人生活等都可能成为话题。

然而，对于我们新结识的美国朋友而言，即使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但是我们缺少可以分享的旧日时光。而我们在匈牙利的朋友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减少。因为我们和朋友们分隔两地，或者因为我们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发展方向不同，我们和一些朋友慢慢疏远。我们的友谊正在经受考验。历史是一名严厉的考官，考验着人们的忠诚和性格。但是，只有经受过考验的友谊才更加深厚，关系才更加稳固，这是我们后来所发展的缺乏深厚基础的友谊无法媲美的。

如果谈到美国人所遭遇的专制统治，那么，我们的朋友会立刻想到麦卡锡时期。我们不明白，他们怎么能把美国麦卡锡时期的烦扰与匈牙利拉科西时期的无情镇压以及 1957—1958 年的疯狂报复行为相提并论。在麦卡锡时期，仅有几百人失去工作或受到影响，但是在匈牙利这样的一个小国家，作为惩戒，法庭宣判了仅参加过十天革命的 229 人死刑，上千人坐牢数年。[1]美国人对于极权体制的理解是什么呢？或者反过来说，他们觉得我们不能理解，在一个已经习惯于自由的社会中，人们的权利遭到了怎样的威胁和限制。但是，通过理性的争论和对

历史知识的讨论，想让我们与他们相互理解对方的感受是徒劳的。同样，亲身经历并感受过专制统治的人，与没有亲身感受过的人，对于专制统治的理解也完全不同。

谈到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我们和美国人也很难相互理解。我的所有朋友，无论是否犹太人，都强烈谴责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但是，他们自己却没有佩戴过那代表耻辱的黄色星形标志。我的许多美国朋友对于犹太人命运的关注，胜过对于我们的关注，但是，作为与犹太人一样亲身经历过创伤的人们，我们对于同情、团结和道德责任感的理解显然与美国人不同。

共同经历过的艰苦岁月让我们和匈牙利朋友们紧紧相连。当我们经过很长时间再回到匈牙利时，我们几乎迫不及待要听到朋友们的消息。当制度变革的步伐加快，卡达尔政权日渐衰弱，苏联不断瓦解的时候，我们分享着同样的喜悦。无论在布达佩斯还是坎布里奇，我们远离时髦的聚会、大型的集会和知识分子沙龙，只是进行小范围的聚会，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例如，历史学家彼得·豪纳克和他的妻子凯蒂、帕尔·勒切伊和伊娃·肯德、安德拉什·纳吉和阿格尼斯·洛松茨基和我们促膝长谈。* 我们不仅会在利特万家里和他们共进晚餐，而且会一同去布达山散步。我们也非常喜欢与我的同事和以前的学生们聚会，例如米哈利·洛基、考蒂·法尔卡什、陶马什·鲍尔、雅诺什·加齐、玛利亚·拉茨科、安德拉什·西蒙诺维奇和茹饶·卡皮塔尼。我将哈佛教工俱乐部那令人愉快的交流习惯带到了布达佩斯。我和他们在餐馆里相聚甚欢，其中就有曾和我在《自由人民报》共事的爱娃·乔托，《短缺经济学》一书的翻译者伊卢斯·卢卡奇，在研究软预算约束时和我一同进行大量实际调查的阿格尼斯·毛蒂奇。我都是通过工作和他们相识，并且成为长期的朋友。

我们从匈牙利朋友那里所获得的，是任何一个美国朋友不能给予我们的。

悠游于欧洲和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中间

自从我 1983 年来到普林斯顿后，我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要在美国度过。但

---

* 彼得·肯德和他的妻子汉娜·B. 肯德与我的会面非常难得。自从匈牙利发生制度变革后，彼得就不能重返布达佩斯，因此，当我在国外时，我们要抓住每次机会与他们见面。

是，这并没有把我变成半个美国人。一个原因就是，我和其他国家的许多人保持联系，而不仅限于匈牙利人和美国人。

很早以前，我就开始在跨国机构任职。1972 年，在丁伯根的建议下，我当选为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任期一直持续到 1977 年。在那里，我与来自印度、墨西哥、法国、苏联、荷兰和波兰的经济学家一起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出谋划策，并将形成的建议书送达其他联合国机构。

后来，我积极参加了数量经济学家的国际性组织——经济计量学会。我被选为第一任执行委员，并于 1978 年成为学会会长。* 在履行会长职责期间，我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促进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参与学会事务，这有助于他们进入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界。

我竭尽所能通过各种方法推动这一工作的进行。只要有机会，无论是以客座研究员还是以客座教授的名义，我总是希望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同事们能够获邀参加国际学术活动。

我刚到哈佛大学工作时，同时参加了欧洲经济学联合会（EEA）的活动。该联合会的成立得益于比利时教授雅克·德雷泽（Jacques Drèze）的努力。我十分敬重德雷泽教授，不仅因为他的学术成就，而且因为他对于公益事业的积极参与。所以，我也支持他创立该学会。我发现欧洲一词所代表的内涵，并非始于 2004 年匈牙利加入欧盟。德雷泽教授任主席的欧洲经济学联合会成立于 1986 年，当时匈牙利仍处于铁幕统治下。随后几年，我和弗兰克·哈恩成为会长候选人。1963 年，当我第一次去英国参加剑桥大学的一次会议时，我就认识哈恩了。正如我在本书第 10 章所写的，哈恩曾在一篇文章《我们不满的冬天》中严厉批评了我的《反均衡论》一书。现在，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当我请他帮助刚刚移民到美国的陶马什·利普塔克找工作时，他起了很大的作用。让我们回到会长选举上来，按照惯例，我们两个都被问到是否愿意参加匿名投票，我们都同意了。最后，我赢得了多数选票。

就像我早些年在经济计量学会所做的一样，我再一次做了大量工作，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同事们介绍给学术界。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一届欧洲经济学联合会会议上，我想方设法邀请了几位当时不为西方经济学界所熟悉的、有前途的经济学

---

* 在经济计量学会两阶段的选举中，首先从几名候选人中选出会长，在其后的一年里，会长要逐渐熟悉任职期间的任务。第二年，他或她作为唯一的候选人参加第二轮会长选举。

家。他们包括莱塞克·巴尔采罗维奇,他后来成为波兰改革的领军人物;社会学家塔季扬娜·扎斯拉夫斯卡娅,她对于苏联制度的批判性研究为其赢得了国际声望;年轻的弗拉基米尔·德劳希,他在东欧剧变后成为捷克政府的党首和总理。

在1987年的欧洲经济学联合会年会上,我在主席报告中写道:"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因此,东欧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参会就成为我尤其关心的事情,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列举了东欧国家的同行们面临的许多特殊困难,希望获得西方经济学界同事们的帮助:"(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们)是幸运的,他们不会知道东欧同行们所面临的种种困难。让东欧国家的许多公民经常感到痛苦的是,西方学术界将欧洲等同于西欧。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欧洲的边界并非易北河。我们也希望被看作欧洲人。"[2]

选择年会的学术主题是会长的特权和职责,该主题应该体现在会长发言和两个主旨演讲中。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中,最重要的主题是自由,因此我将会长发言命名为"个人自由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3]我邀请阿玛蒂亚·森发表主旨演讲,他的题目是《选择的自由:概念和内容》。[4]另外一位主旨演讲者是埃萨·林德贝克,他的演讲题目是《个人自由和国家福利政策》。[5]

在演讲中,我通过列举匈牙利的例子试图阐明,分权、私人所有权扩张、短缺的缓解和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官僚束缚放松不仅促进经济效率提高,同时也给予个人选择的权力和自由。我强调,在社会主义世界中,从"国家最大化"向国家作用弱化、个人自由提升的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之行

1985年夏,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的邀请,我和妻子到中国访问四周。首先,我们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讨论国有企业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极富启发性,但只是一个开端。我参加过许多学术会议,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与我以往的经历完全不同。

中国一共邀请了七位外国经济学家评论该国的形势和发展前景。除了我以外,这七位经济学家还包括耶鲁大学教授、美国著名宏观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他在几年后获得诺贝尔奖),前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奥特玛·埃明格,前法国

计划委员会主席米歇尔·阿尔贝，剑桥大学教授、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政府和工党首席经济顾问亚历山大·凯恩克劳斯爵士，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知名的“自我管理”专家亚历山大·鲍伊特，曾经就韩国计划体制著书的美国教授勒罗伊·琼斯。*

中国国务院总理接见了七位经济学家以及陪同的中方人员，会见时间长达两个小时。会见中，中方谈到了中国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并且希望听到各位西方学者的意见。

第二天，我们和一批中国经济学家飞抵重庆，在那里，我们乘船顺长江而下。我们受到了贵宾般的礼遇。游船上不仅有美味的中国菜，甚至还有一个游泳池。然而，我们并没有太多时间享受这些。

主办方为我们安排了紧凑的会议日程，每位外国客人要参与半天的讨论，讨论以他的演讲开始，然后由中方高级经济学家提出问题。对于改革中最为敏感的话题，中方主要的经济学家不便公开发表观点。而那些年轻的经济学者如果提出有关的问题，也是不合适的。显然，他们要在外国客人走后，在内部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并得出结论。

当时，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改革。中方在向我们描述这一阶段改革情况时，始终强调这些改革都是符合共产党路线的，事实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农业已经完全放弃了“人民公社”的伟大创举。在农业领域，一项农民运动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国，农民私人所有制** 基础上的耕作模式已经重新确立起来。食物的短缺被充裕所代替。中国在农业改革方面比匈牙利进行得更加彻底，充满活力的中国农村与死气沉沉、效率低下、不适应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苏联国有农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农业成功后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将改革推进到经济的其他领域。

当我在美国为这次中国之行的演讲做准备时，我努力从各种可能的渠道获取关于中国形势的消息，我想，这对于弄清楚中国与匈牙利改革之路的异同点尤

---

* 时任世界银行中国首席代表的林重庚(Edwin Lim)，主要负责此次会议的准备工作，并邀请众多中西方经济学家。他的工作有力地证明，西方国家的顾问同样能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出谋划策。不管怎样，林先生没有强迫中国人采纳自己的解决办法。相反，他尽量给出可供中国人选择的财富之路。从上面列举的经济学家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想要了解美国、西欧和东亚国家的经验，以及东欧国家的改革构想，而林先生组织的这次会议满足了各方的愿望。

** 指在中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译者注

为重要。我不能停留于那些明显的区别:例如两国的人口分别为 10 亿和 1 000 万,两国分别属于亚洲和欧洲文化,中国和匈牙利(或东欧)的历史不同。这次中国之行,中国人最想从我这里听到的是,他们能从匈牙利的改革中学习什么——哪些经验值得借鉴,哪些问题需要避免。因此,我对于演讲的准备主要在于分析两种改革在现状和改革范围上的异同点。

虽然中国和匈牙利在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方面存在差别,但是,在参加北京举办的第一次会议,以及稍后与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商界领袖们座谈时,我在某种程度上感到非常自在。人们遇到的所有现象,人们所关心和担忧的所有事情都是似曾相识的。中国面临的困难也是我们在匈牙利时曾经遇到过的。中国当然能从美国的宏观经济学家或者前联邦德国央行行长那里听到很多有趣的事情,但是只有我们东欧的经济学家才真正理解中国人的想法。

回到 1968 年,当时的匈牙利已经废除了基于中央计划指导的指令性经济。但是,由国家所有制和共产党指令性计划主导的经济体制却仍在运转。虽然官僚体制和市场体制间的摩擦加剧,但是两者仍然并存。当我在布达佩斯时,我猛烈批评这种不彻底和前后不一致的改革本质;然而,我认为中国取消指令性经济将标志着改革进程向前迈进一大步。这是一个积极的经验,我当然要向中国的领导层强调这一点。此外,我还要强调这一步骤所隐藏的麻烦和危险:匈牙利改革的前后不一致、"软预算约束"和价格机制扭曲。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也曾经制定过野心勃勃的增长计划。我指出了这种跳跃式增长隐含的风险,即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危险和一些经济部门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我提醒中国同行们注意,中国思想和文化中和谐的重要性。我建议用和谐式增长取代跳跃式和强制性的增长。

当时,同样令人沮丧的是,中国和匈牙利都坚持政治上的集中制。我们发现了这方面的一些苗头。通常在欧洲和美国的经济会议上,你很容易判断与会者的情绪、观众的表情,以及人们能否理解演讲并加以回应。但是,在长江里航行的游船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无法从观众或主席的表情中做出判断,我无法由此获知我的演讲成功与否。在会议休息时,许多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围在我身边,用只有他们听得懂的、不太流畅的英语兴奋地向我提问。他们开始和我讨论如何将我的著作引进中国。我稍后会继续这一话题,现在,还是让我说说船上的情况吧。

有时,我们会休会半天,船也停靠到岸边。一天,我们来到河边的乡村市场,

看看当地农村的改革情况：各种新鲜的水果、蔬菜、鱼和其他水产品、甲鱼、肉类在市场上随处可见。另一天，我们来到长江三峡，这是中国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我们乘着小船欣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当时，我们谈到这一地区的洪灾，以及三峡大坝的修建将淹没三峡美景。几年后，这一工程真的开始了，而三峡这一自然奇观也不复存在。我们在武汉结束了长江之行，而且，我获邀到当地的大学发表演讲。

后来，人们才意识到，这次在中国巴山轮（这艘船在中国经济学界广为人知）上举行的“巴山轮会议”对于中国人的经济学思想产生的标志性影响。这次会议的记录集结成册出版，会议演讲稿也发表在期刊上。[6] 中国的经济学家经常引用这次会议参加者的建议，直到今天，还经常把它当作一次著名的历史事件来回忆。

一年后，也就是 1986 年，我的《短缺经济学》中文版出版。它在中国售出 10 万册，并于 1998 年再版。该书成为中国取消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也被当作经济学专业的教科书。包括《短缺经济学》在内，我的 8 本书都在中国出版。当我几年后再次造访中国时，不时有大学教师、市长和企业经理们过来对我说：“我是您的学生。”这让我非常感动。

客居如家

多年以来，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住在匈牙利的家中。但是，我们在坎布里奇的生活却绝不是暂时的。我们在那里的公寓和在布达佩斯的一样经过精心布置。我们在屋里面摆放照片和个人的纪念品。我们不仅结交那些严格意义上的朋友，而且认识从看门人到理发师、从医生到游泳池管理员在内的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所有人。我们在哈佛、在坎布里奇、在波士顿和在美国其他地方都有家一般的感觉。

我在这里用到了复数形式，这是因为，茹饶和我并非天生就能适应那些短途或长途旅行，其中包括几天或者几个月的行程。经过一段时间，我们都意识到，无论我们去哪里，我们都需要家的感觉。如果技术上或者经济上许可，我们会尽量在旅途中使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环境具有某种个人色彩。因为我们的旅行总是在学术世界里，这个任务当然要相对简单一些。虽然旅途中经历的国家、文化和

历史可能迥然不同，虽然我们要不时与印度、日本或墨西哥的教授或学生打交道，但是很快，我们就可以发现与他们之间在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上的共同点，并相互分享。我们在全世界的学术圈子中能够很快找到家的感觉。

我的朋友不仅在匈牙利和美国，而且在许多其他国家，每当想到这点我就非常愉快；我们不时通信以了解对方的工作进展，如果可能，还会进行私人的会面。在这点上，我尤其要强调的是，那些不仅愿意阅读我的著作，不仅撰写关于我的著作的评论文章，而且为了出版我的作品而主动联系当地出版社，甚至将翻译和编辑我的书作为自己的任务的人们。他们是法国的玛利亚·拉维涅、贝尔纳·沙旺斯和迈赫达德·瓦哈比，中国的肖梦，越南的阮光亚，日本的盛田常夫，捷克的卡雷尔·考巴，波兰的塔德乌什·科瓦里克和格热戈日·科洛德克。他们都为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为了将我的作品介绍给本国读者而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在“全球化”的学术世界中，这样的事情随处可见，因此，我们总能找到家一般的感觉。我不想片面地描述这种感觉。在美国和匈牙利间奔波，加之经常造访世界各地，让我在各地都能找到回家的感觉，同时，我在世界各地都难免有异乡人的感觉。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让我身心温暖，因为时间总是太短了：我们不得不赶往下一个地点。回到布达佩斯时，我们会遗憾于离开美国的朋友，不能与哈佛的学生见面，也不能听到近几个月我们乐于欣赏的音乐会。当我们在一个地方时，我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另一个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这让我们备感遗憾。我们总要向别人说再见。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布达佩斯，经常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老科恩移民到了美国。他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是并不喜欢那里，于是想要回国。当他第二次申请移民护照时，人们问他：“科恩先生，说说你到底喜欢住在哪里吧。”他回答道：“在路上。”*

如果我们在某地感觉不舒服，我们就经常说起这个笑话。当我们与别人聊起经常要这样“奔波于各地之间”时，别人也许会略带嘲讽地指出，我们似乎也喜欢在路上。当我们一直都在旅途中时，我们的精神状态却并非如此轻松。旅行

---

* 这个笑话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移民政策的宽松。不过，当时只要你不属于政府限制旅行的人，只要你没有明确说出自己不想回来，事实上，你只是有可能出国，你就很容易拿到护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美国的匈牙利人也很少能自动获得永久居住权。

总是令人疲惫的，我们还是喜欢待在家里。

其实，让我们感到疲惫的并不只是在出发前和到达后需要整理行李、笔记、书等物品。签证申请和其他行政任务也需要在每次旅行前重新准备。而且，调整时差也让我们筋疲力尽。*

我没有考虑年龄增长后舟车劳顿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疲惫。让我们备感负担的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后，我们的生活变成双份的。我们在匈牙利所热衷的活动，我们对匈牙利难以割舍的情感，同样存在于美国。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家，在那里也有一个家；这里有车，那里也有车。**在美匈两地，我们都要缴纳机动车税和保险费，申报所得税，开立银行账户，对我的文件编号并编制目录，等等。我在无薪假期间离开美国，在其他地方工作并领取薪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只需处理一地的工作即可。我总是带着问题和职责从一地到另一地，通过电子邮件、信件、传真或电话工作或处理事务。由此带来的工作负担并非每项工作的简单加总，而是 1＋1＞2 的效果。

尽管我们经常变换居住地点，但是茹饶一直坚持研究匈牙利住房分配和政策。她在坎布里奇时，就利用自己的时间研究西方国家这方面的经验，并进行国际比较。虽然两地间的地理距离给她的研究造成很多困难，但是她仍然坚持原来的研究课题。

这种奇怪的双重生活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精力，经常要在奔波两地的同时在世界各地长途跋涉。****但是这种付出是值得的。我获取了很多在西方国家生活的亲身感受，并且置身于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前沿，同时，我的根又深深地扎在匈牙利。

---

* 无论如何，我们每次从坎布里奇回到欧洲，都会在斯德哥尔摩稍作停留，与朱迪特、索菲和安娜一起住几天。朱迪特会为我们准备可口的饭菜，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帮我们适应欧洲的生活。由于时差，我在餐桌旁会打瞌睡，她总是假装没有注意到这点。只要在斯德哥尔摩得到充分休息，并且与他们亲密无间地连续聊几个小时，我们就为出发到布达佩斯做好了准备。

** 1980 年产二手大众高尔夫车是我们所钟爱的，它虽然外表有些旧，但是发动机却非常好，一直忠诚地为我们服务，2002 年我们最终离开美国时才把它处理掉。

*** 我周围许多人一定以为我在两地都拿全薪。

**** 无论我是在匈牙利还是美国，都有人在当地帮我处理各种事务，这大大减轻了我的工作负担。我曾提到过善良而可爱的美国秘书和研究助理。我在布达佩斯的所有工作都得到了伊曹·福泽考什和考蒂·绍博的帮助。朱丽安娜·帕蒂专门负责出版我的作品，并且尽心尽力地负责相关行政事务，她的丈夫布莱恩·麦克里恩专门负责将我的作品从匈牙利语翻译成英语。他们非常熟悉我所关心的事情，并且总是尽量减轻我的负担，即使我不在匈牙利，他们也会主动处理我的事情。从工作上的帮助和友谊的角度看，我是令人羡慕的——即使西方国家的同行们也没有我这么好的运气。

匈牙利和其他国家都曾就人才流失进行过很多讨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吸引了各国的人才，从而削弱了人才流出国的学术实力。我在接受哈佛大学任命时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有力地驳斥了人才流失论。我可以同时立足于我的祖国和美国，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们经常听到美国朋友将我们奇怪的生活方式总结为，我们享受到“两个世界的优越性”。我知道哈佛大学、坎布里奇、波士顿并不代表“美国”，但是对于那些渴望进行学术和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而言，它们提供了最好的环境。（为了避免所谓的哈佛式傲慢，我或许应该说最好的环境之一。）同时，匈牙利是其他阵营中“最快乐的营房”。当然，作为匈牙利的学者，我的生活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更加有趣和舒适。我感谢命运之神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注 释

[1] Szakolczai, 2001, p. 92.

[2] Kornai, 1988b, pp. 737, 739.

[3] Kornai, 1988a.

[4] Sen, 1988.

[5] Lindbeck, 1988.

[6] 1985 年，中国的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这次会议的论文精选。书名译成英文是《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由于我不确定这本书的编者是谁，所以没有把他加入本自传的参考文献中。

此次大会上提交的部分论文还保留在我的文件收藏中。

---

* 我们不能忽略的事实是，这样的选择带来的物质后果。考虑一下任职于美国大学的匈牙利学者和研究者们。他们选择在美国全职工作，并且最终移民（不少匈牙利研究者都会这样做），在工作和退休后，享受比他们的匈牙利同行优厚得多的物质待遇。我所选择以及我希望其他人注意到的解决方法是，将这种物质待遇减少大约一半。选择这一解决方案的研究者，由于将一半的时间用于国内，因此要牺牲一半的待遇。但是，这仍然让他（或她）比留在匈牙利国内的研究者拥有更好的经济保障。

18. 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综合研究：1988—1993 年
《社会主义体制》

1983 年，我决定写一本综合分析社会主义制度的书，当时，我还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我在那里阅读了大量文献，为这本书的写作做了充分准备，同时，我也在那里完成了该书的提纲。

我开始在哈佛大学授课后，又获得了新的创作动力。我先在 1984 年开设了全面讲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这本书的前身，就是我在 1986 年发给学生的课堂笔记。

我在哈佛大学的课程吸引了来自各个国家的学生。他们之中有一位中国学生，他在毛泽东时期曾经作为知青上山下乡，还有一位曾亲身经历过计划经济的年轻波兰经济学家，而其他听课者对社会主义体制的运行情况一无所知。学生中有些人是坚定的反共产党人士，但是有些人则是德国或美国新左翼的成员，并天真地坚持自己的信仰，无视集权主义的本质。我多次开设这门课程，并且每年都要进行修改和补充。形形色色的学生（后来也包括读者）提出的问题和不同的意见，促使我尽快阐明自己的观点。在准备一本学术专著，而且这本专著注定要成为相关学科的教科书时，能够多次向一群兴趣浓厚的学生反复讲解书中的内容，没有比这再好的事情了。

撰写该书之种种

1986 年春天，我完成了《社会主义体制》一书的初稿，并将各种素材分配到了不同的章节。之后不久，我到位于赫尔辛基的联合国大学所属世界发展经济研

究所(WIDER)访问,正是得益于所长拉尔·贾亚瓦德那博士的帮助,我才能有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在平静中继续我的写作。我和妻子在1988年5月搬到那里,并在那里度过了半年多的时光,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对我的照顾十分周到,为我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支持,其中包括舒适的公寓和完美的工作条件。

赫尔辛基宁静平和,环境非常理想。虽然它的夏天很凉爽,但是我们到那里时,正是天气温暖宜人的好时候,我们经常在波罗的海和奥林匹克游泳场畅游。对于远离大海的居民来说,在海边生活几个月,欣赏日落时海边的壮观绮丽,真是令人难忘的经历。在一整天的写作之后,能够在夜晚十点钟沿着美丽的海滩和保存完好的古老海岛,或者只是一段海湾散步,真是再好不过的放松方式了。这时,我和妻子会一边散步,一边讨论我当天的写作情况,或明天的写作计划。在写作最为艰苦的阶段,我们找到了一种更好的放松方式:比如到停靠在市场边的渔船上,购买刚刚打来的鱼儿,去芬兰歌剧院或岩石教堂听音乐会,到芬兰神秘的湖泊远足。

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吸引了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我们有许多朋友都曾访问过这里。雅克·德雷泽为了拜访研究所,特意中断了一个漫长的海上帆船远航旅行。我们在哈佛大学的朋友斯蒂夫·马格林和阿玛蒂亚·森也来过这里;此外,我们还设宴款待了埃德蒙·马林沃德,他曾是我早期研究工作的良师益友。我们在这个研究所还遇见了杰出的印度经济学家苏卡哈姆伊·查克拉瓦蒂,以及极具人格魅力的瑞典朋友本特-克里斯蒂安·伊桑德。* 我们与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和工作人员,以及芬兰的经济学家,也进行了很多次有趣而又启迪思想的讨论。

宁静而又赋予人灵感的自然和学术环境当然有助于写作,我的工作进展神速,写作的进展速度与我在瑞典撰写《短缺经济学》时相当。每周我都会完成一个新的章节。**除了理想的写作环境之外,我写作进展很快还有一个原因,即《社会主义体制》总结了迄今为止我所有的研究工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在开始写作前我已经做了32年的工作(或者是5年的直接准备工作)。每当我坐在赫尔辛基的办公室电脑前时,我总是马上开始连续敲击键盘,因为我想要写的大部分

---

* 这也是我与这两位朋友的最后一次会面,他们都英年早逝。

** 当然,这只是初稿,还相当粗糙。就像《短缺经济学》一样,这本书也经历了几轮修改。例如,我曾邀请众多同事阅读草稿,他们的高见对于以后的书稿修改具有重大价值。

内容，早已在我的头脑中成型。

《社会主义体制》不仅包括我在那些年已经成熟的想法，而且包括大量的表格、图形、统计数据、参考文献、引文和参考书目。幸运的是，我在匈牙利和美国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团队来帮助我；这个团队中不仅包括严格意义上我曾教过的学生，而且包括我的观点的追随者，还有些人与我存在专业或个人的联系。这种学术上的紧密关系意味着，无论我在赫尔辛基、布达佩斯还是坎布里奇，人们都能够快速而灵活地满足我的请求。

与此同时，匈牙利国内传来消息，国内政治制度开始分裂，从学术和政治上反对政府的声音日益高涨；但是，只要我还在赫尔辛基，匈牙利国内的事情就只是远处隆隆的炮声。每次我与布达佩斯的朋友通过电话后，都会惊讶地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危机四伏，公众怨声载道，政治斗争日趋白热化。但是我尽量不让这些事件影响到我的写作。几个月来，我将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写作上，无暇顾及其他。我认为这本著作非常重要，并且写作过程非常顺利，这点燃了我的创作热情。因此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全力以赴完成它。15 年后，我回忆当时的感受，觉得在赫尔辛基的几个月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甚至是唯一最快乐的时光。每一位热爱自己职业的人，无论他是木匠、雕刻家还是修路工人，都会为自己新的创造而欢欣鼓舞。幸运的是，我也多次经历了这种喜悦，但是没有哪一次喜悦能够比得上 1988 年夏天在赫尔辛基所经历的创作快感。

1988 年秋天，我们回到布达佩斯。当时，隆隆的炮声已经日益临近。我的著作也完成了大半，不过还有大量剩余工作需要做。从那时起，我无法再将全部精力集中在这本书上了，我首先在布达佩斯住了一阵子，然后于 1989 年上半年回到了坎布里奇。1989 年下半年，我暂时搁置了《社会主义体制》的写作，因为我觉得我必须就匈牙利的制度变革发表看法，提出一些相应的经济政策建议；我将自己对制度变迁的看法，写入了《经济转型过程中充满激情的小册子》中，这本书也是本传记下一章的主题。之所以在这里提到它，是因为我在写作《社会主义体制》的同时，也在准备《通向自由经济之路》(《经济转型过程中充满激情的小册子》的英文版)和该书的其他语言版本。我在对制度变革进行其他研究并发表演讲的同时，还在撰写《社会主义体制》的后半部分。如果要准确描述当时的情况，那么可以说，我是在这两个主题之间兴奋不安地跳来跳去。这些工作和哈佛的教学占用了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每逢我需要处理当前的经济时事话题时，都会因为丢开了那本伟大的总结性著作而遗憾。而当我回过头写书时，我又为没

能对日常经济政策给予足够的关注而感到内疚。尽管我分身乏术，但是无论在布达佩斯还是坎布里奇，我仍然尽量抽出几天或几周的时间专心写作。1991 年夏天，我甚至拿出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写作。无论什么时候，每当我完成了手头临时性工作，回到电脑前继续写作时，我一直确信笔下的东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1989—1991 年，东欧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继土崩瓦解。包括这方面研究专家在内的许多人感到，他们应该修正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无需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前半部分做任何改动。书中的描述和分析经得起第一轮历史风暴的考验。但主要讨论改革活动的下半部分，则不得不进行修改或补充。虽然我在草稿中已经对部分改革失败的命运做了预测，但我必须在修订稿中，分析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原因。

经过三年的写作，我最终于 1991 年完成了《社会主义体制》一书。

虽然该书用匈牙利文写成，但是将该书翻译成英文的工作也很快完成了，而且英文版还早于匈牙利文版出版，这在我的著作出版中也是比较少见的情况。

进行综合的意图

《社会主义体制》的首要写作目的，是要总结迄今为止我的所有主要研究成果。在过去几十年里，我已经研究过许多课题，并且试图对一些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给出回答，就像在快速浏览经济学编年史一样。尽管这些作品的主题互有区别，但是它们相互补充，覆盖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当然，我总是要回到同样的研究主题（例如非均衡现象）——事实上，按照我自己的判断，我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越来越熟练。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这些作品连接在一起组成了一种弧形。我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设计一个分析框架，按照这一逻辑顺序，将处于分散状态的研究结果综合起来得出一个结论。*

同时，我不想将这本书的内容局限在回顾过去的研究成果。我想将所有的结论和我认为重要的他人的思想，整合成一个概念性的结构。我已经读过匈牙

---

* 就像我过去的学术工作一样，我也想总结我的直接经验。读到这里，读者或许会理解，是什么动力促使我在一本又一本书中，描写专制集权的本质、短缺，我对于社会主义信仰的转变，以及来自个人经历和书本的其他种种现象。

利同事和国外研究者的大量著作。我尤其要强调的是，鲜活的匈牙利经济生活对我产生了诸多影响。另外，我不仅受到公开出版物的影响，同时也从与周围人的交谈中获益颇多，一些匈牙利人从心底关注社会主义制度所遇到的困难，并努力寻找制度改良的可能性，这样的爱国热情让我十分感动。书中的引文和长长的参考书目，可以引导读者透彻了解我所提到的其他人的思想。然而，必须补充的是，我并不是要写一部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经济思想史，也并非要冷静地记录所有引起争论的或许自相矛盾的社会主义理论。

我在《短缺经济学》匈牙利文版的前言中强调，该书并未涵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领域，而只是讨论了其中的一部分。我还用数字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如果将全面描述社会主义经济的专著之内容，设定为研究了该主题的 100%，那么《短缺经济学》只涉及 30%。现在，完整研究社会主义制度并将 100%的研究成果放到一本书里的时候到了。当然，这并非表明《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会包括所有该主题的细枝末节，这对于一本旨在提炼观点、总结归纳的学术著作而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不应该成为它的目标。* 本书的分析完全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确认，并讨论了我们称为社会主义体制这一政治—社会—经济机制出现和运转时，具备的全部充分和必要条件。

《短缺经济学》一书并没有讨论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而这是《社会主义体制》一书（第一章导论之后）开篇就要分析的主题。数不胜数的“比较经济学”著作在总结社会主义制度时，都是以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或国家所有制开篇，而我的这本书不同于以往的分析，它在一开始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最为典型的政治特征和共产党的政治。我在解读《短缺经济学》的一章中曾经说过，政治风气和随之而来的自我审查机制是如何禁止我在早年讨论上述观点的。1983 年，当我开始写作《社会主义体制》一书初稿时，我就决定突破这些禁锢。1984 年，我在哈佛大学授课时，我开始就共产党的作用、政治结构和官方意识形态等问题自由地发表看法。1986 年，在我发给学生的课堂笔记中，以解释共产党的角色开始我的论证，就像我在《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的内容安排一样。从这层意义而言，我终于能够撰写一本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专著了。

---

* 同样在这篇前言中，我计算了如果 600 页的《短缺经济学》一书只包括了全部分析的 30%，那么完成整个任务大约需要 2 000 页。但是，当旨在进行全面分析的《社会主义体制》最终完成时，由于我极力压缩篇幅，因此，我努力的结果是，这本应该 2 000 页的综合著作“只有”600 页。其中与《短缺经济学》重叠的部分少于 30%，这部分内容只占了全书 24 章中的 2—3 章。

我也不想将《社会主义体制》的主题局限在可能重叠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主题之内。我希望它包括诸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其他研究方法，这样，《社会主义体制》就不仅是单纯研究经济问题的书，而是一本整合所有相关学科的社会科学著作。

大部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著作都只进行了局部分析，主要考察社会主义制度中某些界限明确的领域，或某些体制特征。我感兴趣的是，探讨体制的各个部分如何构成整体。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如何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角色的行为规范。我将这样的分析方法称为制度范式。* 范式分析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最伟大的研究者就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也写文章讨论局部问题，但是在其代表性著作《资本论》中，他努力展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全貌。他的研究兴趣在于，知晓自己所处时期的社会特有关系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以及这些特有关系如何相互决定彼此的存在状态。我在《社会主义体制》一书的前言中，强调马克思对我的思想产生的巨大影响，该前言写于1991年——即使对于那些之前经常引用马克思著作的人来说，当时引用马克思也完全过时了。但是，马克思对于我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制度范式的应用上。

除了马克思之外，前言中还提到约瑟夫·熊彼特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和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都是这一制度范式应用的典型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本书也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在写作《社会主义体制》这一综合性著作时，并没有简单“加入”这个或那个社会理论学派，那些想把《社会主义体制》一书进行通常归类的人们会遇到麻烦。人们无法将这本书简单地描述成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或哈耶克主义的著作。

我不仅希望在这本书中总结自己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研究主题的观点，而且希望通过分析这一特定的制度，向人们展示我极力推荐使用的研究方法和

---

* 因为制度范式的使用经常是五花八门、模棱两可的，因此，按照人们通常的说法，“范式”的内涵也是不明确的。我所使用的涵义主要基于托马斯·库恩写于1962年的著作，即范式是一群研究者共享或共同使用的一种典型的方法、观点、方法论、工具和论证风格等。

**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是对我产生影响的主要学者之一。虽然如此，他对我的巨大帮助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问题和非均衡分析上。他的著作没有使用我所谓的“制度范式”分析，因此我在此处没有提到他。

科学的方法论。

实证分析和价值

我在《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极力避免规范分析。在书中，我甚至没有探讨什么是“好社会”，以及马克思、列宁及其后继者们关于社会主义的幻想是否适合建立这样的“好社会”之规范性问题。我对这类问题敬而远之，我的目的是实证分析。共产党在一部分国家有着长期的绝对统治权。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这一阵营有 26 个国家，拥有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我在书中想要描述的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实际特征，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们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的特征。

《社会主义体制》并不想对社会主义做出判断。在柏林墙倒塌之后，这种判断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过于简单。就如我在《社会主义体制》前言中写的那样：“今天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制度时，需要有勇气，需要具备科学的冷静态度，避免刺耳的批评性谩骂。”[1]

但是，决定进行客观的实证分析，并不表示我在评价社会主义制度主要特征时，会排除价值观的影响，因为这些价值观构成了我的世界观的基础。我尤其强调自由、人权、人的尊严和个人自主权这些价值观，尽管我极力让自己的表述更为客观，但是我认为，违背上述价值观的行为应该受到严厉谴责。

在我的价值观体系中，社会制度的经济表现虽然不在优先考虑之列，但仍非常重要。我利用传统的经济标准考察社会的经济表现：人民福利增长情况如何，增长率为多少，技术进步速度如何，经济体能否促进创新的产生和应用，等等。最终，我将列宁的经济评价标准应用于社会主义转轨初期，即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竞争可以保证具有较高生产力的制度获胜。

对于这本书的命名，我也曾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制度之间犹豫不决。在西方，政治著作和日常用语多偏爱“共产党”一词。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执政的共产党将“共产主义”一词特指为一种难以实现的乌托邦状态。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人都是按需分配。所以他们更倾向于用“社会主义”一词表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从而对国内民众的承诺也可以更少些。我在这两种表达方式间选择时，我采取的立场是，如果企业、社会团体、政党和国家可以为

自己选择一个名字，那么对于一个更大的实体而言，为什么不允许它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为自己的名字呢？如果制度本身（或者制度统治阶层）称自己为社会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者），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一点。对我而言，完全没有理由用“社会主义制度”来描述“真实”社会主义的理想化概念，但又拒绝让现实世界中的26个国家使用这个名字。既然那26个国家构成了“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就要称它们为社会主义国家。

一般性模型

比较经济学通常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苏联。它描述了1917年俄国革命之前的历史，然后论述苏维埃制度的出现、稳定、发展和分裂过程，同时补充了苏联周边卫星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苏维埃式经济体系”是比较经济学通常的表达方式。而中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特例。

这种研究方法，对于鉴别历史发展中各个国家的个性特征以及相互差异非常有用，也确实有助于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在我的综合性著作中，我却想使用另一种方法。我力求进行一般性分析——暂时不考虑这些国家的差异性，而是将它们所具有的共性提取出来。如果能够发现一些基本的共同特征，并用以描述一个特定国家群体，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些国家作为一个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立的制度群体。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准确描述这些基本的（而且只需要描述这些基本的）特征。

建立一个一般性模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尽可能详细地描述社会主义制度。为了保证全书内容紧扣主题，我不想对苏联和后来的东欧国家以及最终的中国和越南的庞杂历史进程与其他独有属性进行描述。相反，我想要向读者展示的，是苏联、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运行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构建一般性模型的技巧在于，在选择主要特征时，尽量做到俭省和简化。* 描述研究对象的特征，主要特征的数目应该尽可能少些——够用即可，绝不要过多。

---

* “简化”一词来源于奥卡姆剃刀理论中关于理论构建的原理，该理论因为14世纪英国哲学家奥卡姆的威廉提出而得名。威廉认为，理论应当构建在尽可能少的前提条件基础上。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自己的假设条件时应尽量简洁。

为进行一般性讨论，我将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制度向成熟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型。这一阶段在苏联结束的标志是农业集体化和第一次大肃反运动（1936—1938 年），该运动给了党内反对势力致命一击。因此，就苏联这一案例而言，这一阶段大约持续了 20 年——这个过程相较于苏联从社会主义制度回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要漫长得多。在东欧国家，由于第一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对东欧的军事占领，第一阶段持续的时间要比苏联短得多。

《社会主义体制》一书将社会主义制度第二阶段称为经典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以固定形式在全社会流行。一些读者或许不喜欢“经典”一词。一些人认为这种说法暗示着对于当时制度的赞许。其实，“经典”一词没有任何价值判断，它只是表示早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一阶段已经成熟，并具备了所有的主要制度特征。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情感依赖的其他人或许认为，把不适合经典社会主义阶段开始的标志设定为肃反、没收财产、大规模流放和逮捕。

社会主义国家经过经典阶段进入第三个历史阶段时，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方向，走上了不同的改革道路。在这一阶段，有些国家尝试利用重组和现代计算机技术“完善”中央计划。南斯拉夫尝试了自我管理实验。继南斯拉夫之后，匈牙利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陆续开始这一实验，它们的实验指导思想是，在保留共产党专政和国家所有制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引入市场经济体制。这些国家在每一次引入市场经济体制时，都会使政治压迫有所削弱。

这种三阶段研究法考虑了历史发展的进程，而且也是一种模型分析。但三阶段法只是描述制度的发展进程，而非描述每个国家的历史。

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受到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其他思想家的诸多影响。例如，我在《社会主义体制》中不同意有些人的说法，他们为马克思开脱，认为马克思不应当为社会主义制度缺乏效率承担思想责任。他们坚持认为目前的状况不是马克思的本意，只是马克思的思想在实践中没有得到正确的运用。

但是，我也不同意另外一种看法，即目前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现状，完全是由这些思想造成的，正如社会主义的宣扬者和领导人所计划的那样。我认为，目前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自发性和演化发展。我在《社会主

义体制》一书中表达了这一思想：共产党在获取政权的同时，就开始着手推行消灭私人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计划。这就像基因密码一样，激发并引导后续的发展进程。然后，这种制度开始服从自然选择规则。在建设国家和管理经济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试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被证明不可行的改革措施经过一段时间后就会自然消失，而那些能够很好地服务于制度运行的措施，变成了制度的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提供详细的蓝图规划，也没有提出必须实现的计划，更没有规定国家内部各组织的人员与政府警察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根据当时的现实条件，符合逻辑地发展起来的。

《社会主义体制》隐含的一个思想，就是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组成部分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制度和随后的演进过程中的自然选择。它们像齿轮一样，完美嵌入专政机器中。经典社会主义虽然表现出集权主义，但它却是一个协调的整体。

这种协调性遭到改革进程的破坏。压制的减弱和中央集权的放松，使人们的生活不那么难以忍受，同时，制度本身也被削弱。“布拉格之春”运动的口号之一，就是“人性化的社会主义”，虽然这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人性化程度越高，制度运行能力便越差。

一旦那些自称忠诚于共产党的人们失去信仰，制度就会失去支撑的力量。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人们可以在意识形态、信念和政治代表中做出真正的选择时，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目前的执政体制。

《社会主义体制》一书的后半部分详细列举了这方面的论据，选取各种改革路径为案例，阐明它们最终如何走进了死胡同。

太早还是太晚？

《社会主义体制》匈牙利文版出版以后，我接受了加博尔·考尔绍伊的访问，他曾在商业周刊《观察家》(*Figyelö*)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书评，具有专家水平的书评满是溢美之词。在我们的交谈中，他问我这本书的出版是否太晚了。我必须承认，他的这个问题是出于好意，但对我却打击很大。就像他在书评中写的那样：“如果科尔奈在四五年前完成这本书，并且用

匈牙利文公开出版，那么，该书会像《短缺经济学》一样，成为经济学领域的畅销书。那些自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会贪婪地抱着这本书不放，那些正在觉醒、力图改变社会制度的人们也会把这本书奉为科学的指引。”他在后面接着写道：“今天，谁会有时间去读一本长达 700 页，而且是专门研究过去的专业性书籍呢？”[2]

我在《社会主义体制》的前言中，引用了西蒙·沙玛在描述法国大革命的史学新作中写的一段话：“中国总理周恩来在被问及对法国大革命的重大意义有何评价时，据说这位总理做出了这样的回答：‘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或许再过 200 年仍然为时尚早（或为时已晚）。”[3]我在前言中继续补充说：“沙玛所说的耐人寻味的回答正是我的救命稻草：对于一位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就重大历史事件发表评论的文章，即使发表于事件发生后的 200 年，仍是为时尚早，也可能为时已晚。但是，即使这本书是为时尚早或为时已晚，书的作者也不会再等待了。至于能否接近于历史真实，作者愿承担所有风险和缺陷。”[4]

我没能更早地完成《社会主义体制》，我也不想再推迟这本书的问世。

完成一项雄心勃勃的任务，需要长期的准备时间。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思考如何归纳总结这个主题。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当时出现了很不严谨的著作，作者们草率地将共产主义制度的一些真实或者半真半假的命题拼凑成书。我想要完成一部更为严谨的著作，在书中，每一个论证都经过缜密思考和严格的逻辑推论，所有的参考资料都准确无误，我希望在整本书中，用令人信服的数据充分阐明事实。

我感到我必须加快书的写作进度了。我记得，在哈佛大学教工俱乐部为一位来自布达佩斯的社会学家和民主反对派知名人士所举行的欢迎午宴上，他曾经问我目前的研究课题。我回答我正在写一本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综合性著作，我永远不能忘记他那惊讶的表情。“你疯了吗？”他的表情好像在说，“现在你还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他的嘲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在 1989—1990 年之后，《社会主义体制》的写作时常被一些临时性事务打断。假如当时我没有强迫自己集中精力撰写《社会主义体制》，那么不管别人有什么反应，这本书都只会半途而废。我需要极大的自我克制和强烈的使命感，才能坚持完成这本书，坚持完成最后一个表格和参考文献，并最终把它送到出版社。

如果这个课题半途而废，那对我将是巨大的耻辱。当然，其他人以后也会来研究这个课题。或许几个世纪以后，一些人会重新看待这段历史，就像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并且能够提出更加客观的观点。但是他们仍然需要以我们当前的研究成果为依据。至少在东欧国家，我们是事件亲历者。我们在那里从始至终观察并参与了整个过程，这个身份，使得提供的实证检验更具特殊的意义。

东西方的认可

《社会主义体制》一书在经济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书评超过了40篇，当然，这只是我注意到的部分。该书先后被译成德文和法文出版，后来又在当时的（或者仍是）社会主义国家翻译出版，其中包括保加利亚、俄罗斯和越南。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在越南的出版经历尤为有意思。在一个共产党仍占据执政地位的国家，出现了一本讨论其经济体系和其他社会领域中政治结构会造成社会体制运行失灵的书，在一个“社会主义改革”仍然按照官方规定的方针进行的国家，居然出现了一本暗示这一改革进程具有天然的杂交性和不完整性的书，想想就让人发笑。*

大多数书评都对《社会主义体制》一书持赞同态度。让我引用其中的两篇。当时英国最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已故的阿列克·诺夫称这本书为“一本真正具有标志意义的著作。无论你是东方还是西方国家的普通公民，无论你是经济学家还是对政治学感兴趣的人，无论你是研究共产党国家的专家还是初学者，都可以从科尔奈的书中受益良多。这本书内容安排合理，显示了作者对于相关材料的熟稔，堪称清晰论证的典范之作。书的作者运用所掌握的令人艳羡的所有相关经济理论，对‘东方’国家制度运行的详细情况进行了分析”。[5]他在书评的结尾总结道，这本书“用完美的技巧描述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基本特征，并且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必然遭到失败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一理论贡献，作者才赢得如此多的赞誉和广泛的读者”。[6]

---

* 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颇为曲折。书的翻译已经完成，但是出版社还不确定能否得到官方批准。（此书的中文版已于2007年出版。——译者注）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理查德·埃里克松教授如此评价《社会主义体制》一书："这是一部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是作者一生的思想结晶……这是一部充满智慧和洞察力的大师级作品。"[7]

左派和右派的异议

当然，对《社会主义体制》的赞誉声中也夹杂着对其经济观点的批判。有些人的反应过于激烈，他们甚至反对我在书中的全部观点。就像我对待赞扬的做法一样，我在这里同样举出两个反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例子。

瓦茨拉夫·克劳斯和杜尚·特日斯卡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体制》长篇书评，瓦茨拉夫·克劳斯担任捷克共和国的财政部长和所在政党的领袖。后来他飞黄腾达，先出任捷克总理，现在已经是捷克共和国的总统。特日斯卡发表上述书评时，担任捷克共和国私有化部部长。

他们把我的书批评得体无完肤。他们反对的不仅仅是这本书，也反对我的全部作品。反对的主要理由，是我偏离了主流经济学中已经得到验证的方法论和概念框架，在他们看来，完全没有必要偏离主流方法。共产党制度的任何特征都可以使用通常的方法，利用最优化模型和传统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模型进行检验。

我在书中对共产党的分析，彻底激怒了他们，进而引发了对我的批判。按照他们的观点，完全可以用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部门的职能进行阐述。这一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论认为，政府行为与个人行为一样，表现出追求权力和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趋势。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共产党的例子时，你只需要简单扩大众所周知的垄断理论模型的适用范围就行了。共产党和垄断者一样，只是阻碍了政治市场的自由进入机制。

如果所有大学的政治学院都认真对待这篇书评，那么它们就应该立即解散，然后将学院的教师们回炉，培养成新古典经济学家。

我没有与评论者争论的习惯，而且，这本传记是最后一个为自己进行学术辩护的地方。我只想问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与经济学无关的心理学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两位为党内事务和国家大事忙得焦头烂额的政府高官，亲自动笔发表长篇大论，对一本学术著作及其作者发动攻击？

另一个尖锐的反对声音来自陶马什·克劳斯，这是一位匈牙利历史学家*，与政治毫无关系。他对我的作品提出了很多不满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的作品缺乏历史方法。他强烈反对使用“缺乏具体历史事件且不能产生结果的模型”。另外，他还总结道：“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科尔奈在方法论方面的缺陷，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他并未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即世界经济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这个整体受到历史发展结构性特质的控制（例如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间的制度联系；劳动力分工结构；闭关锁国与剥削的关系；国家间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和政治权力关系，等等）。”我在这里忍不住还要再引用下面一段话[8]：“这本书中‘好’与‘坏’的方面，就像世界上两种基本原则之间的斗争一样：一方面是经济理性和纯粹的市场逻辑；另一方面是不合理的国家剥削。”**

对于克劳斯和特日斯卡而言，我的作品缺陷在于没有忠实地坚持主流的新古典经济思想和工具。然而对于克劳斯（用他的原话）而言，我又变成了“匈牙利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领袖”。[9]

你不可能同时取悦所有人。如果你表明了自己的学术态度，阐明了鲜明的立场，那么，你不可能期望自己的作品获得一致的同意和认可。《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不合瓦茨拉夫·克劳斯或陶马什·克劳斯的口味，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也可以理解。对我而言，反而更加安心，而不是感到悲哀。

一件奇怪的事情

1988年底，听说政府将给我颁发“匈牙利社会主义贡献奖”荣誉勋章。我当时正忙于写作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书，得到这样的勋章着实奇怪。

我给匈牙利科学院的一位高层领导打电话，告诉他我不能接受这一荣誉。如果他能够对评奖进行干预，最好阻止这一奖项的发放。我们之间发生了争执。他问我为什么前几年可以接受国家奖，而这一次拒绝这一奖项。我解释说，我将国家奖看作学术界对我的认同，而这次的奖项由政府颁发，带有明确的政治意

---

* 确定陶马什·克劳斯的著作在激进社会主义各思想流派中的地位，并非本书的研究范畴。我在这里能够向读者交待的是，他对于《社会主义体制》的评论似乎将他置于西方新左派之列。

** 我几次翻阅《社会主义体制》一书，想找到关于国家的不合理性或剥削性的论述，可惜没有成功。

图。接下来，我又迅速给其他几位科学院领导写信，说明我的态度。

我的行为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科学院不能够也不愿意终止颁奖程序。很快，我收到了与我同时担任科学院院士、时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总统的布鲁诺·F. 施特劳布的正式通知，他要求我前去领奖。当时的官方报刊也发布了这一新闻。因此，我给总统写了一封信：

> 我满怀敬意地向您表示，我不能接受这一奖励……这一奖项带有政治特征和色彩。我并不同意政府的改革计划和总体政策与经济政策。我已经克制了几十年，没有用反政府的行为表达我的不满。现在，我希望从相反方向克制我的情绪：我不会接受政府颁发的勋章，因为这将表明我对政府的政策持有默许的态度。[10]

当我拒绝了“匈牙利社会主义贡献奖”荣誉勋章，并且完成了总结我的研究工作的著作后，我告别了对我的生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社会主义制度。

注 释

[1] Kornai, 1992c, p. xxi.
[2] Karsai, 1993, p. 19.
[3] Schama, 1989, p. xiii.
[4] Kornai, 1992c, p. xix.
[5] Nove, 1992, p. 23.
[6] Nove, 1992, p. 23.
[7] Ericson, 1994, pp. 495, 497.
[8] Krausz, 1994, p. 158.
[9] Krausz, 1994, p. 157.
[10] 这封信的复本还保存在我的文件收藏中。

19. 转折点：1989—1992 年
《通向自由经济之路》

1989 年 11 月 10 日，柏林墙轰然倒塌。

经常有人问我，是否预见到了柏林墙的倒塌。或者换句话说，我是否预见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

1989 年 11 月，我的书《通向自由经济之路》（该书匈牙利文版的原名为《经济转型过程中充满激情的小册子》）在书店上架。这恰好是对上述问题的一个回应；因为我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写完这本书，这本书证明，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解体之前，我就预计到了它的命运。

不过现实中发生的事情更为复杂。但是，我将尽力做出忠实的记录。

预言的局限

我是否曾经预料到了制度的解体？答案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否定的。

肯定：在《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我用几百页的篇幅支持这一假定，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内部改革，无法拯救制度本身。相反，这种改革会削弱制度的基石。政府的压迫越是缓和，官僚管制越是放松，旧的权力关系越难以维系。

否定：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我在书中和其他科学研究中，都没有公开阐明（本可以公开阐明）社会主义制度何时会完结。

我们遇到了一个重大的科学哲学问题，在这里我只能略加解释这个问题。检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种方法，是可以根据该理论，预言其他恒星发出的光线在经过太阳时会发生弯曲。1919 年 5 月 29 日发生日食时，天文学家对于该理论

的假设进行检验，并最终证实了这一假设。[1]由于根据相对论做出的预言完全准确，爱因斯坦因此享誉世界。但是，与天体运行规律相比，研究由几百万人组成的社会的运行规律，要复杂很多。很少有社会科学家可以傲慢地宣称，他可以根据科学理论，预见什么时候，在哪里会爆发革命。

肯定：1986—1987 年间，那些掌握社会主义制度内部情况的人们，都感觉到了越来越多的体制瓦解迹象。危机的迫在眉睫显然并不表现在糟糕的经济状况上（以苏联为例，当希特勒军队占领该国西部时，它的经济就已经恶化了），而是表现为社会中政界、商界和军界精英们的日益觉醒上。*

现在回首往事，人们普遍认为，柏林墙倒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标志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一历史事件时，就会发现在此之前，旧制度已经开始发出终结的信号：波兰议会选举时，政府当局与反对派的会谈以及匈牙利的圆桌谈判，等等。

无论如何，从社会主义制度瓦解这一事件来看，虽然匈牙利或者波兰国内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用，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在苏联。苏联改革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在苏联推行改革，改革虽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没有带来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生，或者增强苏联的实力，但事实证明，这些改革举措在世界历史发展上，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苏联国内的气氛更加自由，体制开始“软化”，而且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也随之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在改革之前，苏联向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甚至阿富汗派驻武装。在苏联帝国解体之前的几年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苏联都似乎无力再进行这样的军事干预了。这是一个征兆，不是严密的科学预测。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不需要专业知识，也不必全面掌握体制特点，也不用对各种观察结果进行评估，就可以做出预判。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直觉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有一些人已经猜到了社会主义制度正在走向危机，事实上是向危机全速前进，我自认为属于这些人之列。

否定：虽然人们感觉到事件发展的速度，但是没有人能够预测事件的发展会以让人目瞪口呆的速度加速。后见之明当然容易，甚至在事情发生之后设计一

---

* 一些人想起了列宁的话：“对于即将发生的革命而言，受到剥削和压迫的贫苦大众们意识到在旧制度下无法生存，要求进行变革，只有这些是不够的；对于即将发生的革命而言，社会精英们应该无法在旧制度下生活和按规则行事，这才是最重要的。”[1964(1920), p. 97]

个数学模型也并非难事。所谓的混沌理论，就是在给定一系列参数的前提下，描述复杂系统沿着或多或少有些规律的路径前进的状态，但是，即使只有几个参数出现十分微小的变化，也可能导致前进路径突然坍塌。现实中的情况就是这样发生的。

所有人都在推测时局的发展。或许，一些研究社会主义的专家可以凭借自己的著作和言论，声称自己准确预见到了五个月后发生的那次制度崩溃。但是，即使这些言论也无法证实，人们可以准确预测这样一个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历史事件，会在何时并以何种方式发生。这就像买彩票一样。虽然买彩票的人总有中奖的机会，但是，这样的几率只有百万分之一。

我必须承认，局势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范围。

哈佛商学院校园和布达佩斯盖勒特山上的解决方案

我尽力为即将到来的激烈变革做好思想准备。我看了很多关于拉丁美洲军事独裁统治的书，研究了民主政治取代军事独裁初期的经验。我重新学习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以更新自己的知识。我向历史学家请教，想知道历史上诸多伟大的帝国是如何从出现裂痕到最终土崩瓦解的过程。*

我在哈佛大学工作的时候，与同事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多次进行过关于这场激进改革发展前景的讨论。萨克斯的妻子索尼娅生于捷克，我们刚到坎布里奇市定居时，他们夫妇热心帮我在那里安顿下来，并领着我们游览了波士顿地区，我们因此成为好朋友。玻利维亚政府曾经根据萨克斯的建议，成功地抑制了恶性通货膨胀，他也因此声名大噪。或许正是因为这件事，莱赫·瓦文萨(时任波兰总统)和他的经济学家智囊团在苏联东欧的共产党制度解体前，邀请萨克斯担任团结工会经济顾问一职。从那时开始，萨克斯对东欧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而我当时正致力于宏观经济稳定性的研究。因此，我们有非常多的共同话题。

除了进行技术上的准备之外，对我更为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

---

* 记得大约在 1987 年，我在和几个朋友的一次谈话中，曾向两位著名的匈牙利历史学家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他们惊讶地瞪着我。虽然他们在政治上表现积极，但以前却从未听说过我这样的类比。

政治转折。我曾在本书第7章结尾处，讲述了1956年革命之后我为自己制定的人生策略。可以说，除了极少数无关紧要的事情之外，在1989年的重大历史转折之前的那段时间，我始终严格按照这一策略行事。但是现在，我生命中一个新的阶段，正在徐徐拉开大幕。

在这场变革发生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一个自己从理性、道德和心理上都深恶痛绝的政治制度中。现在，民主政治的曙光已经出现，我有望看到一个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都能让人接受的新社会。因此，现在正是我重新思考未来人生策略的时候了。换句话说，我是否应该对自己的职业规划进行根本性调整？

我从不喜欢临时抱佛脚。我认为，基于一时冲动被迫做出的决定往往都不是好的决定。我要提前考虑可能出现的局势，然后根据经验法则——做出具体决策时依据的一般选择标准——提前做好准备。

在坎布里奇生活时，我们最喜欢的散步地点，就是哈佛商学院校园，校园就在查尔斯河边。1989年早春时节，我和妻子经常在那里一边散步，一边谈论目前的动荡时局。来自布达佩斯的消息常常让我们激动不已。3月22日，反对派召开了圆桌会谈，6月10日，召开了执政党、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第三方代表间的“三角”会谈。之后，从美国的电视节目中看到了最让人激动的场景：1989年6月16日，匈牙利政府为伊姆雷·纳吉以及他的那些被杀害的同志重新举行了安葬仪式。这些人中也包括一直都活在我的记忆中的米克洛什·吉迈什。

这一学年结束后，我们回到了布达佩斯，在布达佩斯，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重要的新闻。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匈牙利政府在8月1日开放了本国西部边境。在此之前，民主德国人是无法穿越民主德国边境到达联邦德国的。匈牙利西部边境开放后，大量的民主德国人像潮水一样涌向匈牙利和奥地利边境，希望借道匈牙利进入联邦德国。在8月1日之后的几周里，匈牙利境内等待进入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人人数急剧攀升，他们主要集中在布达佩斯。这个重大决定表明，匈牙利政府决心撕破铁幕，让这些民主德国人过境。

在布达佩斯，我们最喜欢的散步地点就是盖勒特山。面对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我们必须处理一些严峻的感情和道德问题，这一点我在后面的章节中会经常提到。在一次散步时，我们达成了最重要的一些决定。虽然我和妻子共同讨论了这些问题，但是由于我参加公众生活更为积极，因此我们的决定主要围绕我今后的人生策略。

我们最重要的决定是，我的职业发展不能有任何实质性改变。当我需要在

政治家和学者身份间选择时，我已经毫不犹豫地坚持第二种身份长达 32 年，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也会继续保持这一身份。

1956 年，我已经脱离了共产党，从那时起，我不再参加任何政党活动。今后，我也会坚持这一原则。我不会参加任何党派，也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我坚定了自己过去的经济政策概念、政治理念、价值体系和世界观。我没有理由做出改变。到目前为止，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如一，忠实于自己的立场观点。

我之所以会沿着既定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主要取决于我的人生准则，而不是因为固执己见或无力改变。我在谈到自己在某一历史时期所做的决定时，经常重复这样一句话：我非常重视自己和其他人保持自己的观点之延续性，这也是我已经提到过的人生信条之一，也许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些已经通过最严格道德测试的人，出于某种原因，认为自己必须改变关于生活基本问题的观点和价值体系，我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于那些屈服于权力或者金钱的诱惑，而轻易改变自己世界观的人，我深恶痛绝。

由于一党制已经让位于自由选举和多党制，我必须做出实质性转变，我需要竭尽所能提出建议，帮助我的祖国重新开始经济发展，顺利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去我一直专注于实证科学研究工作。从现在起，我需要对规范研究给予充分的重视，同时考虑经济政策问题。

《通向自由经济之路》的写作

早在 1989 年 8 月，我收到一份会议邀请，主办方请我就匈牙利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次会议的地点设在经济和市场研究所（Konjunktúra és Piackutató Intézet，KOPINT）的大会议室，当时整个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参加会议的，不仅有那些正在组建或已经成立的几家政党和政治运动的领导人和经济顾问（反对派的主要成员），而且还有许多科学研究人员，其中不少人后来在政府担任要职。

参加这次会议的演讲主题，我已经考虑了几个月之久。我对新兴党派的专家和党员已经形成的想法以及他们对计划的建议，都进行了深入思考。我力图按照这些想法和建议，准备会议演讲。

我为演讲做了充分准备。但我在演讲时，仍然非常紧张和兴奋，不过在我的举止和声调上，并没有表现出这种情绪。当时，许多参会者在那几个星期内都在忙于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所以我认为，我的演讲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众多演讲中的一个而已，但是对于我，这次演讲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和转折点。早在33年前，即1956年夏天，我还是一个年轻而幼稚的改革者之时，我就在经济研究所的全体会议上提出了全面改革的建议。几个星期后，伊姆雷·纳吉的亲密战友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即准备一份经济改革计划。然而，政府并未像先前计划的那样，编写出经济改革计划，并交给议会讨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提出任何全面的改革计划。1989年的这次演讲，标志着我的职业生涯开始了新的阶段，此时此刻，我真是百感交集。

我的演讲持续了一个小时，现场反应热烈，支持者和反对者在现场展开了讨论，并向我提了很多问题，我都一一作答。

两天后，我的背部出现了痉挛，并且伴随着剧烈的疼痛：德语形象地将背痛称为女巫的一击。我一动也不能动，在床上小心翼翼地平躺了十个星期。医生诊断的结论是，由于两节腰椎间的一根神经出了问题，所以引发了剧烈的疼痛。我必须遵照医嘱打针，服用强效药物，后来又通过身体锻炼和游泳来缓解痉挛。

请允许我暂时跳过这一段，说说后面的事情。1990年，我到纽约的萨诺教授那里就诊，他是一位不用主流治疗方法治疗风湿病的专家——风湿病治疗专业也有主流方法！萨诺教授的理论认为，运动组织的痉挛和其他有关身体的异常情况，都有可能与紧张和压力有关。他给了我一些非常有用的建议，防止这类问题的发生。虽然我并不是医生，但是从外行的角度来看，这一诊断确实符合我在1989年夏天的发病情况，即紧张和压力引起了我的腰背部痉挛。当时我有一种巨大的责任感，同时，心里认为自己能够，而且应该为国家复兴作出贡献，这种情绪就是导致我发病的原因。即使不考虑其他因素，仅仅这一身体原因也使我不能担任任何政治职务。如果一位政治家每次出席重大公共活动，都会因为紧张导致身体发病，那他怎么能够胜任这一工作呢？

在背部的疼痛稍有缓解后，我准备继续之前的研究工作。我想将1989年那次会议的演讲整理成文章发表，但是，当我开始这项工作时，我很快发现一篇文章的篇幅根本不足以表达我的思想，而应该用一本书来体现。我通常都是亲自完成所有论文和书籍的写作，这就需要长时间坐在打字机前（近年来又改成坐在电脑前）。这次，我只能破例口授文稿。我在病床上口授文稿，将内容记录下来

并整理成可供出版的书稿的艰巨任务，落在了我身边的同事们身上。这项工作用了几个星期才得以完成。

在我患病期间，许多人对我关怀备至，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每当我想起这些，内心都会感到无比温暖。我的好朋友、风湿病专家盖佐·巴林特经常到病榻前探望我，并且亲自照顾我。身体开始复原时，我的另一位朋友、理疗师埃斯特·德劳什科奇又开始指导我的身体锻炼。如果我的妻子有事必须离开，而我在患病初期又必须有人照顾，那么我的弟媳玛丽安·迪克尔或者我们的朋友就会过来照顾我。在我卧床口授书稿期间，经常有人来看望我，这时我就会把书稿拿给他们看，听听他们的评论。此外，有些政治组织的经济学家也曾和我讨论过书稿。还有几名记者也参与过讨论。我至今难忘卡塔琳·博沙尼和我第一次见面的情况，她毫不拘谨地坐在我的病床边，在我胸前戴好麦克风，然后开始了长时间的采访。

在我卧床第六周的那个周末，《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完成。我从未见过像阿格尼斯·埃雷尼那样精力充沛且待人友善的编辑了，她很快便看完了全部书稿，而且奇迹般地（从出版时间上来看）在同年 11 月中旬把这本书摆上书店的书架。

最初的反应

《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出版几天后，对该书的书评就出现在匈牙利的各种媒体（日报、周刊和月刊）上。加斯帕·米克洛什·陶马什的短篇书评标题为《科尔奈投下的炸弹》。尽管在此之前，人们就一直在以口头或者文章的形式，持续而广泛地讨论了匈牙利应该如何应对眼前的危机和经济转型的问题。但是，《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的出现，还是在这场讨论中一石激起千层浪，将论战推向了高潮。

一位医生在为我做背部按摩和注射药物的时候说道："现在，就连自来水龙头里的水，都在与科尔奈一起流动。"之后的几个星期内，出现了至少 50 篇与《通向自由经济之路》有关的文章。各种声音此起彼伏。许多人热情欢迎这本书，而有些人却采取中立的态度，同意书中部分观点，反对另一部分观点；还有一些评论者强烈反对我在书中的建议。虽然大多数人都是以严密的推理和文明的方式

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但是，对我的人身攻击还是出现在一些媒体上。这次我又要面对我在本书前些章提到的那种论辩方式，即将对手论证中的论点抽取出来，加以扭曲，断章取义后形成一个所谓的观点，然后针对这一观点展开争论。

《通向自由经济之路》迅速荣登畅销书榜首，并且多次重印。由该书引发的争论也在三个月后达到顶峰，之后逐渐减少。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也开始转向其他方面。

1989 年 9 月，我本应回到美国开始新一学期的工作，但是由于病情较为严重，所以一直拖到年底才回到坎布里奇。在匈牙利期间，我们亲眼目睹了争论逐渐平息的整个过程。同时，这本书的英文版的出版工作也准备完毕。

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更名为《通向自由经济之路：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以匈牙利为例》。书名的主标题呼应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虽然该书的标题和前言明确说明，书中的具体建议都是针对匈牙利的现实情况提出的，但是作者阐述这些建议的方式，使得这些建议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也产生了联系。该书其他语言的版本相继出现。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分别是俄文版（三家出版社分别发行了三个不同版本）、捷克文版、斯洛伐克文版、法文版、意大利文版、西班牙文版、波兰文版、乌克兰文版、爱沙尼亚文版、日文版、塞尔维亚文版、泰米尔文版和僧伽罗文版（斯里兰卡的官方语言为泰米尔语和僧伽罗语）、中文版（首先在中国大陆出版，然后在台湾地区出版）以及越南文版。*

《通向自由经济之路》无论哪一种语言的版本发行，就会立刻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应。从《纽约时报》到法国《世界报》，从《新苏黎世日报》到《金融时报》，各种权威媒体都发表了对它的书评。[2] 就像在匈牙利国内一样，各国的反应褒贬不一。有的人热情赞扬这本书，有的人在赞同部分观点的同时，也对其他观点持保留意见，还有人表示强烈的反对。对于那些想要用某种既非共产党制度、亦非资本主义的混合制度来替代国家社会主义的人来说，这本书尤其不受欢迎。

在《通向自由经济之路》英文版问世之前，我修改了原来的匈牙利文手稿。我改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并补充了新的内容，同时，我根据人们对匈牙利文版本的反应，对一些观点做了相应的调整。我将改动的部分整理成文，发表于匈牙利经济学杂志《经济评论》上。[3] 所有其他语言的版本，都是以修改后的英文版

---

* 《通向自由经济之路》被翻译成 17 种语言。据我所知，在匈牙利作家的社会科学研究著作中，它是被翻译的语言种类最多的著作。

为基础翻译的。

我针对《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还发表了一些演讲，并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拓宽了某些观点的应用范围，也更为详细地探讨了其他一些观点。

1990 年，我到荷兰发表向扬·丁伯根致敬的年度演讲。在这次活动中，我拜会了丁伯根教授，他虽然身体虚弱，但思维还像以前那样敏捷。因为我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将他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因此，我觉得能见到他非常幸运。在这次演讲中，我详细说明了自己对于私有化原则的看法。[4]

1992 年，美国经济学会给予我极高的荣誉，邀请我在学会年度会议的伊利讲座(Ely Lecture)上发表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我阐述了国家在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作用。[5]其中有一句话饱受争议，但是我现在仍坚持这一观点，即社会主义制度催生了“不成熟的福利国家”。

1992 年，纪念伟大的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ed)的缪尔达尔讲座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我的演讲主题是加强金融监管，强化预算约束。[6]

我在后文中提到《通向自由经济之路》时，也包括这些演讲的内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这一章标题中将这一阶段截至 1992 年。现在，请允许我总结《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及其相关演讲稿的主要观点，并谈谈该书与相关演讲内容面世后，在当时引起的反应。最后，我还要用现在的眼光，对这本书重新做出评价。

模仿时代的结束

《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尖锐批评了在社会主义改革最后阶段，在所有制关系改革过程中的前后不一致问题。例如，缺乏真正私人资本的资本市场；国有企业相互持股；国家官僚机构对“国有控股公司”行使所有者权利；像南斯拉夫那样实行企业自主管理等。我在书中写道：

> 我十分厌恶这种模仿行为。我们已经尝试模仿了许多事情：国有企业模仿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官僚产业政策模仿竞争的作用来调节各生产部门的扩张和收缩；价格控制办公室模仿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最近，这一模仿名单上又增加了对于合资企业的模仿、对资本市场的模仿、对股票交易

> 的模仿。总之，这些新生事物共同造就了匈牙利的华尔街——不过是塑料制成的仿品而已！……所有这些银行、合资企业和股票交易市场，都是山寨货。匈牙利国内上演的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大富翁”游戏而已，只不过参加游戏的不是孩子，而是成年的官员们，他们使用的不是虚拟纸币，而是在拿国家的资产冒险。[7]

有些匈牙利经济学家曾试图与接受改革的开明商界精英和政界精英们合作，深化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但是在面对批判时却退缩了。他们曾经是改革进程中的参与者和发起者，甚至是主要的思想理论者。我曾在本书的前面一章中，详细叙述了我对于他们的评价，以及这个群体与我的作品之间的关系。现在，我在15年后重新审视《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的社会反应时，我发现，最激烈反对我的提议的人，主要就是“改革派经济学家”。这些人有时甚至以粗鲁而且侮辱人的腔调与我进行争论。

经济学家伊万·塞格瓦里曾写道：

> 到目前为止，科尔奈的书已经在匈牙利经济学家中造成了这样的后果：麻木、强烈的抵触和学术上的消化不良……这种混乱主要由于科尔奈质疑匈牙利经济改革的一系列准则。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科尔奈的书都让人感到极不舒服。回顾过去，科尔奈的书让人们觉得，他们在学术上过于轻松地宣称自己为改革者，但真正的改革内容被政治、国家机关或者改革面临的内外压力所掩盖，这已经是广为人知的事实。[8]

安德拉什·谢姆延认为，在社会的激烈争论背后，隐藏着一种社会心理效应。他写道：

> （这本书）充满了皇帝的新衣之涵义，即给国家财产穿上想象的外衣是徒劳的，因为即使这样，国家财产仍不会像私有财产那样发挥作用。对于我们来说，仅仅忘记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是远远不够的。* 现在的事实证明，我们所提出的解药一样的经济改革建议，虽然取得了几个表面的成绩，但是，这些成绩不过是我们需要扔掉以重获自由的负重而已！[9]

按照我的想法，如果将书中的观点按照重要程度划分，那么最重要的观点当然是：世界上根本没有第三条道路。我在该书的匈牙利文版和英文版中都毫不

---

* 在改革之前，政府向民众灌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思想。

掩饰地阐明了这一观点，我希望通过该书的书名进一步强调这一观点。在书名中，我使用了“The Road”而不是“A Road”，以此特意强调我的观点，不存在任何第三条道路。*

这一研究主题在一段时间内曾被人们从日程表上删除，但是，对于第三条道路（也有许多作者称为第三条途径）的幻想，总是阴魂不散，并且开始死灰复燃。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公正和侵犯人权的现象。只要经济陷入困境，人们就对社会现状表示不满。虽然没有几个人希望旧的社会制度卷土重来，但是许多人会同情地倾听那些反对新制度的呼声。在潮水般涌现的观点中，包括“第三条道路”的观点，例如那些陈旧而罗曼蒂克的“人民的”反资本主义论调，对于银行业者的纳粹式憎恨，对财阀政治和强盗资本主义的抗议活动，以及妖魔化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新左派等。在这些观点中，许多观点在经济内容上并没有问题，我们要批判的是它们模糊不清的分析和概念混淆。例如，温和的社会民主建议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国家和经济的关系平静改革的主张；将这些建议称为“第三条道路”，只不过更堂而皇之而已。

回首过去，我想《通向自由经济之路》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东欧国家经济学界到处充斥着胡编乱造的概念和思想时，它试图阐明朴素而简单的真理。这本书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直到现在，这仍然是对学术研究的中肯要求。

为了私有部门的健康发展

《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将所有制关系的转变看成制度转变中的主要经济任务。这延续了我在《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的观点，即所有制关系是比社会协调形式（例如市场力量或者官僚机构规制的相对比重）更深层次的社会关系，而且更具有决定性。

---

* 1991 年，我荣幸地受邀到斯坦福大学主讲坦纳讲座。（这一讲座的早期演讲者包括雷蒙·阿隆、肯尼思·J. 阿罗、索尔·贝娄、约瑟夫·布罗德斯基、米歇尔·福柯、尤尔根·哈贝马斯、瓦茨拉夫·哈维尔、罗伯特·诺齐克、卡尔·波普尔、约翰·罗尔斯、理查德·罗蒂和赫尔姆特·施密特。）我的演讲题目是《再谈市场社会主义》（1993b）；比起以前的研究和《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我在演讲中更加详细地论述了阻碍奥斯卡·兰格理论应用的社会和政治因素。

在这里，我希望将我在《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中的观点提升到一定的国际高度。当时的经济学家推荐了两种行动方案。《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首先提出的一种策略是，支持私人部门的有机发展。其中的主要任务是，清除阻碍私人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并放宽其自由进入生产领域的限制。政府应该允许乃至鼓励开办新的私人企业。国有企业的产权不该被浪费，而是要以公平的价格出售。政府应该避免随意处置国家资产。如果国有企业经营不善，应该对其进行破产清算。当然所有这些发展措施的实施，都要借助硬预算约束。

这样一种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只能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因此，西方学术界在争论中，称为渐进主义策略。

与之相对立的建议强调，应该尽可能快地处理国有资产。这是一种加速私有化进程的策略。该建议的提出者认为，既然旧的国有企业不可能在一夜间卖完，那么国家不应该坐等合适的买者出现，而是应该向每个公民发放代表国有资产的凭证。所有公民都有权获得一定份额的国有资产；每个人也可以凭证提取投资基金，从而获得以前由国家所有的企业的一份股权。提出这一建议的人并不反对开办新的私人企业，但是他们希望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国家管理机构，要把注意力放到凭证私有化上来。《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坚持认为，这种无偿分配国家资产的计划，会使制度转轨进入歧途："这一建议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父亲一样的国家突然离世，留下他的孩子们像孤儿一样平均分配他的遗产……现在的重点不是将财产分到每个人手中，而是将财产交给真正有能力的所有者。"[10]

当时，我有幸了解到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保罗·萨缪尔森对于私有化步骤的观点，他们是美国经济学界最伟大而且最知名的学者。*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谈到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认同该书的理论价值，并且同意书中的许多建议。然而，他并不同意渐进私有化观点。**

我在复信中为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当然这些观点不仅限于私有化问题，还

---

* 在《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只有英文版的草稿时，肯尼思·阿罗、马丁·菲尔德斯坦、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和杰弗里·萨克斯就曾对这本书进行过评论。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能一一赘述。

** 弗里德曼在另一问题上的看法也与我大相径庭。他强烈反对这样的建议，即在制度转轨期间，国家应当实行固定汇率。他认为，固定汇率与自由市场体制的要求完全不相容。我不能同意他的看法。就像其他人一样，我坚信制度转轨动荡不安的前几年，政府有必要实行固定汇率制。这一"锚"有助于稳固新形成的相对价格。

涵盖其他相关问题，我补充道：

> 我感到我们的所有分歧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在讨论中的立场不同。我是从布达佩斯、华沙或布拉格的一个局内人的角度，看待这一地区的变化。因此，我感到我们必须根据社会现实来考虑自己的出发点。我承认，旁观者从远处观察这些国家，会发现更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我们这些深陷于内部事务的人发现不了的。因此，我非常欢迎您的批评，并且会反复斟酌您的意见。[11]

萨缪尔森对这本书的第一次评论，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教师俱乐部午餐会的一次谈话中，几个星期后，他在美国的一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 文章的前半部分讨论的是中国的改革政策，然后，他将话题转向我的新书。“我刚刚读完它（《经济转型过程中充满激情的小册子》）的英文译稿，我认为它非常值得一读。”他详细论述了书中提出的几个建议，其中也包括针对私人部门发展的建议：“科尔奈坚持认为，全体公民应该培养起对于私人部门的‘社会尊重’。妒忌赚取利润者，并将他们看作骗子的做法，都将阻碍生产发展。（他特别强调这一点）匈牙利急需新兴中产阶级。拿破仑曾经轻蔑地将英格兰称为店小二民族。显然，科尔奈不是拿破仑。”[12]

让我们回到发展私人部门的两种战略上。实际上，两种战略选择的背后是价值观的选择。整体发展观的倡导者们特别强调社会的重新分层和资产阶级化的过程，这样才能产生由业主和企业家组成的新兴中产阶级。而信奉无偿分配计划的人，则更看重制度转轨速度。瓦茨拉夫·克劳斯和杜尚·特日斯卡在对《社会主义体制》一书进行评论的文章中写道：“我们认为，速度是绝对必要的因素，因此，除非一种战略能够快速产生结果，否则它就不是可行的战略。”[13]

位于华盛顿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家和顶尖学府的经济学家，曾对此问题进行过辩论，其中“加速者”的观点占了上风。有些人和我一样，青睐渐进主义，但是我们这种观点在西方各国只是少数派。大多数参与后社会主义转轨工作，并对政府有影响力的西方国家顾问，都赞同加速私有化进程的战略。

---

* 就连这篇文章的标题也是非常讨人喜欢的：《想知道社会主义改革计划吗？听听雅诺什·科尔奈怎么说》（Samuelson，1990）。

当然，不同国家在这方面的事态发展历程也不相同。有些国家对大部分国有资产进行了无偿分配，而在有些国家，只拿出少量国家财产用于分配，或者几乎没有动用国有资产。俄罗斯就是强行推进私有化进程的国家，它的行为有力地推动了一个几乎不可逆转且不幸的世界历史的重要进程，同时，它的这种私有化，造就了俄罗斯国家资产迅速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寡头”手中。

在匈牙利国内，也有一部分人拥护无偿分配资产的计划，他们的大声疾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议会讨论了他们的提案。但是最终，这种加速私有化战略遭到政府的拒绝。取而代之的是《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推荐的转轨进程。当然，没有人能确认这本书是否对政府的决定产生了直接影响。

15 年后，大多数专家在回顾这段历史时，都认同渐进主义者是正确的发展道路。*

还需要指出的是，《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在探讨所有权问题时，出现了一个错误。我的建议中，并没有排斥外国资本进入国内的可能，我也指出了国外直接投资的各种好处。但是我对这个问题强调不够。我没有预见到，这样的投资会成为匈牙利经济和新兴私人部门发展最强劲的推动力，并且在增加出口和提高技术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共资金的责任

如果私人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加，而不是跳跃式增长，那么，国有部门也不会突然消失。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并存。《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表达了我对于国家所有制的不信任。有些人将国有企业领导人看成企业家，认为具有独立性和商业自由的经理人，可以为企业业绩承担真正的所有者责任，我反对这一观点。那些拿着国家的钱做生意的人绝不是企业家。那种貌似将企业交给员工，实际上却使企业落入经理们手中的计划，尤其让我忧心忡忡。

---

* 杰弗里·萨克斯起初同意我的观点，但是后来成为加速私有化的拥护者。我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我们都试图说服对方，最后却发现这是徒劳的。过了很久，当他看到俄罗斯的发展过程后，他承认我是对的。

我警告大家，当心国有企业管理者们向国有企业伸出魔掌，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我的警告非常正确。我笨拙地尝试将这样一个好主意用法律语言进行表述，但却没有成功，这让我十分惭愧。（例如，我曾建议议会批准主要国有部门实行配给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期间，那些坚持提高国有企业领导者的权限并为之努力进行斗争的人，辛辣地讽刺我想要复辟斯大林计划体制。*

可悲的是，《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中真正的警告却被人们忽视。虽然国有企业不再像过去那样居于主导地位，但仍然为数不少，伴随它的运营和私有化进程出现的是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由于政府没有对它们进行行政控制，私有化进程又缺乏透明度，所以媒体和公众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监督。当然，这些问题不仅出现在匈牙利，前社会主义地区所有国家的私有化进程中，都出现了这些弊病。

我的书实际上在探讨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公众如何通过民主进程对公共开支加以控制？对于国有企业的监督只是这种控制的一个方面，当然这是一个重要方面。我在书中用当时的一个时事热点问题，发表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 现在，关于匈牙利是否应该申办 1995 年世界博览会还存在争议。这一问题将提交议会表决……仅就这一问题，表明我的观点如下。
>
> 那些负责提出申办动议的政府官员、委员会成员和部委官员，应当将他们的共管式公寓、私人住宅、第二套住房、汽车和艺术品等个人财产，拿出来作为申办抵押品……当然，这些资产的价值可能只是预计投资额的一小部分。但是，在这些人毕生积累的全部物质财富中，这些抵押品应该占有相当大一部分。
>
> 关于世博会的提案，应该向动议发起者们说明，他们能够获得丰厚的红利，当然附带条件是，世博会像他们所承诺的那样获得成功。同样，提案还要规定，一旦世博会失败，他们将丧失全部抵押品的赎回权。
>
> 按照我的看法，这些条件会使那些申办活动发起者们非常清楚地明白，他们可能因此要承担掏空钱包的风险。[14]

这段颇具讽刺性的寓言在国会讨论中被引用了多次。最终，政府决定放弃申办世界博览会，当然，我不会就此认为人们正逐渐认识到这份建议书希望他们注意的条件：即花费公共资金的人，应该从始至终对公共资金承担个人责任。

---

* 这份关于国有企业的建议只在匈牙利国内遭到反对，因为这些建议剥夺了国有企业管理者在改革中艰难地获得的特权。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因为这些建议在匈牙利之外并没有引起任何批评。

维稳手术

现在回顾起来，在《通向自由经济之路》讨论宏观经济的那一章节中，有的观点较为中肯，但也有错误的观点。

我觉得当时提出需要抑制通货膨胀的说法是正确的。处于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的地区，面临着通货膨胀加速的危险，几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在几年后都非常严重。匈牙利的通货膨胀率逐年上升，[15]在《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面世当年，达到17%。* 另外，我还强调重建预算平衡的问题，这在当时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但是，当《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出版时，人们并未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许多人将高通货膨胀率和高预算赤字，看成是社会转型时期自然而然的现象，因此认为，并不值得与它们做斗争，甚至不需要处理这些问题。其实，社会上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金融和货币纪律的必要性。

在《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的宏观经济建议中，还有一个这样的关键假设：生产规模不会大幅下降。这一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有些专家发现，国内经济结构的剧烈改变，东欧市场的萎缩，以及逐步放松进口后国外商品的竞争，所有这些因素都降低了人们对于国产商品的需求，并因此引起供给和需求螺旋式下降的连锁反应，最终造成经济的严重衰退。

《通向自由经济之路》提出要快速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和放开相关价格，这与该书主张的所有制关系渐进式改革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我将这一建议形容为对匈牙利经济疾病进行的外科手术。所以请允许我对这一个术语做出解释。当时，“休克疗法”已是国际争论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词，但我尽量避免用到这个词，原因有两个。首先，那些拥护休克疗法的人，迫切要求政府在推进私有化和重建宏观经济平衡上尽快采取行动。虽然我在所有制关系改革的问题上，属于渐进主义者，但也提倡在宏观经济稳定方面采取迅速而彻底的措施。因此，我的分析模型中引进了“稳定化”一词。此外，我反对使用“休克疗法”这一术语还在于，我担心它会引起可怕的联想。当时，匈牙利人已经熟知肯·凯西的小说《飞越疯人院》，小说后来被改编成一部非常精彩

---

* 我在这本书中直言不讳地提出抑制通货膨胀的建议，但是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匈牙利的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生活成本在1991年上涨了35%。

的电影。片中，杰克·尼克尔森所扮演的那位坚强而具有反叛精神的英雄，被迫接受电休克疗法(ECT)，结果导致大脑受损。这一疗法在精神病治疗中的应用现在还有争议，如果用它来类比“休克疗法”，不仅不会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在稳定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休克”可能并非一种治疗工具，人们更可能视其为一种副作用，只有当它有望为人们带来希望的改革成果时，人们才愿意忍受它。

现在回到 1989—1990 年的争论，我因为提出通过外科手术来稳定经济的建议而在匈牙利备受孤立，其他经济学家或者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都不接受我的观点。但有些国家将这种迅速而彻底的解决办法付诸实施并产生了效果，其中以波兰、捷克共和国和俄罗斯最为突出。在前两个国家，它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从而驳斥了某些人在批评《经济转型过程中充满激情的小册子》时的预测，即维稳手术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 对于俄罗斯，时至今日国内外专家还在争论，当初是否有必要如此迅速地实施稳定化进程，是否必须做出许多牺牲，还是应该避免这些风险，以及这种稳定化最终对国家的未来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害。

读者可以发现，我已经对写于 1989 年的那本书开始自我批判了。我从不回避对于早期观点的批评，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这个问题，我不可能得出确定的结论。1989 年后，民粹主义色彩的“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在匈牙利仍然残存了很多年。其间虽然出现多次政府更迭，但是每一届政府都尽力保持和延续宏观经济的稳定，为此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但是令人不快和不受欢迎的措施。政府的这一民粹主义政策导致了匈牙利 1995 年的经济危机(这一点我在下一章要详细论述)。在这一关键时刻，有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开始承认，如果政府接受我在 1990 年《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中提出的建议，引入一揽子措施重建宏观经济平衡，情况可能会更好。虽然在 1990 年或者 1991 年推行这一建议会给社会带来一些痛苦，但是匈牙利民众的负担会比五年后轻得多。而且，在制度变革的初期实施这种制度，由于人们正沉浸在巨大喜悦的历史时刻，所以会更容易接受这种必要的牺牲。而五年以后，随着人们对于新制度的幻想破灭，这种牺牲也变得难以接受了。

---

* “维稳手术”这一带有黑色幽默的表达方式出现在对我的作品的批评中。那些批评家嘲讽道：“手术成功了，不过病人死了。”或者“医生，我们是在手术还是在验尸？”言归正传，许多国家在稳定化加速过程中表现出优势和劣势并存，因此，这一改革建议的效果最终可能是皆大欢喜，也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将这一改革进程看做致命的治疗方法还是有些夸大其词了。

“如果当初……”这类问题是历史分析中感兴趣的话题，但是这一问题永远没有答案。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匈牙利政府缺乏实施维稳手术的政治愿望，同时，匈牙利国内的经济形势还没有糟糕到必须实行这一措施的地步。

论平衡

现在回头看看在那个重要年代出版的书籍，我不禁纳闷，我是否合理地安排了时间，或者适当地分配我的精力。难道我不能提前赶出《社会主义体制》的书稿吗？难道我不能将《通向自由经济之路》的写作时间拖得更长些，将书里面的思想打磨得更精细吗？*

我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不打算在《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探讨当时的热点问题。不自夸地说，我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希望全面了解这一时代的人，能够从这本书中看到亲历者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详尽而真实的记录。因此，书中的证据必须准确。我对每句话和每段描述都字斟句酌，不想匆忙赶稿子。

另一方面，《通向自由经济之路》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解决今后的热点问题，即不远的将来社会主义制度的转轨问题。我感到，如果我在这个领域的想法略有超前，我就有责任将它们尽快公布于众。正像我在补充说明中所写的那样：“我加快了这本书的写作速度，当然，这并非为书中的错误寻找借口。无论如何，我不允许这本书像那些散漫的研究成果一样，需要反复的修改。”[16]我知道这种方法很危险。一心求快很容易留下一些错误。但是，第一本著作引起的争论，会为后面出版的许多作品提供借鉴。许多作者都在一两年后提出了更为深思熟虑和彻底的建议，虽然这些建议还是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

---

* 1999年，世界银行邀请我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我的演讲题目是“《通向自由经济之路》面世后的十年：作者的自我评价”(2001)。我选取书中的几个建议，对它们在各国的应用以及我现在如何看待它们做了陈述。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支持其中的一些建议，但对其他建议的看法已经有了改变。我又一次过于天真了。我原以为，制度变革十周年纪念活动会促使许多有责任感的政策制定者和有影响力的经济顾问们，以自我批评的态度重新审视他们早些年的观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恐怕我是唯一一个像堂吉诃德那样进行自我审查的人。

将不准确和夸张等不足之处减少到最低限度的一种方法，就是进行团队工作。早在圆桌会议时，尽管人们主要关注制度变革的政治和宪法问题，但是也提出了经济政策问题。[17]当我一个人躺在床上，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本书的时候，其他几个党派和政治团体，也在加紧制定经济政策计划，或者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18]布达佩斯有两个著名的委员会，坚持按照通常的委员会方式工作，[19]准备材料并定期召开会议，展开争论，达成一致，直至最终产生决议。他们的结论在许多方面与我书中的观点相似，但是在表达方式和煽动性上，远不如我的建议所产生的冲击力，因此没有引起广泛的讨论。

我意识到，谨慎周到地为立法和政府管理或大的行动计划做的准备，需要集体思维和团队工作，以及上下一心。我羡慕那些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委员会工作的同事们，但是坦率地说，我一直在避免承担那种工作。我喜欢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愿意为了让大家达成一致意见而做出让步。我知道，有些让步是必要的，但是我宁愿把这种让步留给那些面对压力，更有灵活性，更有外交手腕，而且不会因让步而生气的人来承担。民主的决策进程需要一个准备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在消除分歧之前，先粗略地表达对草案的不同意见。在第二阶段，各方权衡利弊后相互妥协，并最终制定出一个可以接受的建议。与对待其他问题一样，我相信劳动分工的好处，如果可能，我也会在第一阶段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不希望这种行为还要得到别人的许可才能做，我希望自己主动去做，而且愿意承担表达自己观点的风险。

人们对此的反应仍然不尽相同。有位评论者认为我提出的国家经济计划是“独一无二的学术成就”。其他人却不喜欢我那“孤胆英雄”式的行为。现在重读这本书和相关评论，我的感受也很复杂。我阅读国外关于《通向自由经济之路》的评论时，都是从专业角度出发，绝不掺杂其他特殊感情。但是面对匈牙利国内的评论，我却常常情绪波动。虽然我不会再像 18 年或者 20 年前那样容易激动，那一历史时刻的情绪仍然再次深深触动了我。无论对于整个国家还是对于个人，真正意义上的转折点都极其罕见。

我有幸通过《通向自由经济之路》的写作参与到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一想到这点我就备感欣慰。不管我的建议是对还是错，为人接受还是遭到拒绝，我都可以确定地说，我对于公众的思想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我在书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在当时的匈牙利都没有定论，许多政治团体都在对此展开争论，各党派在编写政党计划时，也参考了这些内容，但是，这些问题的表现形式还不固定，从

专业理论的角度来看仍然杂乱无章。我认为,《通向自由经济之路》的重要意义表现在,它建立了一种理论结构,并将松散的辩论结果纳入其中,明确说明了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而且拟定了议事日程。* 从这本书的思想进入匈牙利公共讨论领域那天起,人们对于应该就哪些问题进行争论,就不再有争议了。就连那些强烈反对本书内容的人们,也受到该书的影响,他们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也开始讨论这本书向公众提出的诸多问题。

每当我读到这本书和匈牙利国内的相关书评时,我就感到心情愉快,同时我也有一些痛苦的回忆。有些评论使用不友好的甚至带有敌意的论调,让我非常震惊。我对这种做法十分敏感,而且难以忍受这样的辱骂,尤其是这种辱骂出自过去与我亲近的那些人之口,我尤难忍受。这一点(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就表明,我不适合从政。与匈牙利公共生活中每天都要发生的辩论相比,这些争论中偶尔出现的粗鲁论调又算得了什么?当我读到那些曲解我的观点的不公正文章时,我怎么能一边忍受这些无礼攻击,一边继续不受干扰地公开演讲?当然,当时使用的攻击方式和现在相比,在形式上要温和得多。

过了一段时间,我逐渐克服了这种痛苦情绪,在此之后的许多年,我都不去多想自己当时受到的攻击。这是典型的弗洛伊德式心理压抑的表现。这些评论藏在我的潜意识里,一旦触动它们,所引发的不是理性的再评论,而是过去痛苦情绪的反应。

商业周刊《世界经济周刊》(*HVG*)的编辑帕尔·雷蒂采访我时,《通向自由经济之路》还没有上架销售。他当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不认为用某个党派的名义提出你的建议,而不是以'无党派'人士的名义提出建议,更容易让人接受吗?"

在匈牙利国内第一次自由普选之前,我的书完成并出版。这本书的主要针对目标,是通过民主进程产生的未来议会和政府,当时,我不可能知道他们的政治构成。所以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我不能想象,那个无党派团体会听从我的建议,并且加以实施。只有一个或几个得到议会多数支持的政党采纳这一建议,而且议会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反对力量阻止实施建议时,这一切才可能实现。"

---

* 借用2004年匈牙利政治分析人士和记者的流行说法,该书明确了经济争论的主题。"主题"的表述是当时最时髦的说法之一。当然,时髦的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因此,这本书后来的读者可能很容易不再理解这一表述。

采访者接着又提出下面的问题："你是否准备将来担任政府经济顾问？甚至准备投身政坛？"我回答道："我将始终保持科学家的基本身份；我不想成为部长、国会议员或者政府顾问。"[20]我补充道，如果新的政府成员对我的观点感兴趣，我愿意倾囊相授。

当然，这是下一章的主题了。

注 释

[1] Coles, 1999.
[2] Passel, 1990; Bosworth, 1990; Salgó, 1990; Gy, 1991; Denton, 1990.
[3] Kornai, 1990b.
[4] Kornai, 1992b.
[5] Kornai, 1992a.
[6] Kornai, 1993a.
[7] Kornai, 1990c, pp. 72, 73.
[8] Szegvári, 1990, p. 5.
[9] Semjén, 1990, p. 7.
[10] Kornai, 1990c, p. 82.
[11] 这些往来信件的复本都保存在我的文件收藏中。
[12] Samuelson, 1990, p. 7.
[13] Klaus and Tříska, 1997(1994), p. 167.
[14] Kornai, 1990c, pp. 78, 79.
[15] Kö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 1996, p. 314.
[16] Kornai, 1990c, p. 211.
[17] 这次圆桌会议的文件被整理成八卷本的论文集出版。第五卷收录了关于经济政策的重要文件：Z. Ripp, 2000, pp. 15—79, 571—633。
[18] 对各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制定的经济政策计划的调查，参见 Laki, 1989, 1990。
[19] "蓝带委员会"的成员是匈牙利和外国专家，而"桥梁组织"的成员全部是匈牙利经济学家。这两个委员会都在 1990 年发表了各自的经济建议书。参见 Kék Szalag Bizottság 1990; Híd-csoport, 1990。
[20] Réti, 1989, p. 5.

20. 在科学与政治之间：1990年后

《公路与小路》

《奋斗与希望》

《转轨过程的福利、选择和一致性》

让我们回到1990年3月，当时，我和杰弗里·萨克斯组织了一次学术会议，邀请正在经历制度变革国家的众多经济学家参加；会议所有与会者都来自大学和科研机构，并且都对实际政治问题感兴趣。这次会议在位于赫尔辛基的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召开，几年前，我正是在那里开始了《社会主义体制》一书的写作。我们在会议上就稳定化、私有制和转轨中的政治选择等问题，展开了激动人心的讨论。第二场会议接近尾声时，一位捷克经济学家表示，他不能继续参会了，要马上赶回国内。他还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补充说："现在不在文塞斯劳斯广场的人，将来就没有机会当部长了。"

他匆忙赶回国的努力果然有成效；不久，他就被捷克政府任命为部长了。今天再看看与会者名单，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多数与会者都曾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过部长、中央银行行长、立法委员或者其他政府要职，虽然任职时间有长有短。*

我并没有急着冲向匈牙利的"文塞斯劳斯广场"。从制度变革开始至今，各种政治派别都曾试探过我的意愿，想知道我是否愿意进入政界。这些政党给我提供的职位包括：部长、党内首席顾问、议员等。一次，有份报纸披露我即将出任匈牙利中央银行行长一职。事实上，早在他们与我接触的阶段，我就婉辞了所有邀约。老实说，任何政治权力对我都没有吸引力。

我没有担任任何高级职务，因此也不存在被解雇的可能性。我没有像许多人那样，沿着权力阶梯匆忙上爬，当然也就不会像他们那样，从自己爬到的高处

---

* 匈牙利也是如此，许多代表各方的政治派别领导人都来自学术界和大学。

重重跌下来。我遵从早期的人生规划，主要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但我并不认为与我的原则相背离的匈牙利政治力量，还掌握着独裁权力。在民主国家，每个人都要对国家的发展承担责任。作为一个研究者和教师，我知道我正面临全新的形势。从那时起，我的工作就处于科学与政治之间。

对匈牙利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

谢绝政府权力部门的邀请，绝不意味着我对于匈牙利国内政治事件漠不关心。相反，我在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一直在尽力观察和了解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不管身处布达佩斯还是坎布里奇，我就各种热点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而且所有文章都不仅仅是简单分析，并就经济政策提出自己的建议。这里我只列举出其中几篇文章的主题："私有化的原则"、"怎样强化金融纪律"、"政府角色转变的必要性"以及"养老金体制和医疗体制改革中应遵循的价值观"。

所有这些文章，都是我花费了大量辛勤的研究工作而写出的成果。我花费了很多精力，重新学习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所有知识，并且将这一领域中的最新研究成果，补充进自己的知识体系。我年轻的时候，身边没有人指导我进行学术研究。现在，我幸运地生活在世界经济研究的学术中心。如果我希望了解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向这个领域最好的专家请教。

我的这些研究成果都发表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如果按照我的价值观对这些成果进行分类，我认为那一时期针对博学的读者撰写的文章，与我前几章讨论的那几本书一样，都是我的重要成就。它们不仅体现了我的研究成果，而且为制定经济政策作出了贡献。但是，我也会用批评的眼光来评价当时的局势，正是这种时局，推动我努力向公众传扬自己的观点。

许多知识分子喜欢利用报纸专栏文章，更加迅速、频繁而广泛地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建议。他们也会抓住任何在电视上露面的机会，向成千上万的观众发表演讲。我认为，如果他们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并且这种方法又确实有说服力，那么这样做确实可以更好地为公众利益服务。有些人认为，电视宣传是"精英"或"贵族"式传播方式，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利用，我不赞成这种说法。我对于电视的看法就像对其他行为的看法一样，采取自由主义的观点。那些有勇气出现在大众媒体上的人，如果他们做得很好，我对他们表示尊重。同时，我对

那些尽量避免公开露面的人之行为，也很尊重。对我而言，公开露面让我感到十分紧张和吃力，因此，我很少做这样的事情。我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观点，但我通常不会参加那种需要直接回答听众提问的活动。* 聪明的政治家能够利用中肯而简洁的讲话，概括自己的立场。而我发现，我并不擅长这种讲话方式，它会让我为难。如果我没有充分的时间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宁愿保持沉默。

由于我很少在电视上露面，因此我也不会在大街上被人拦住，向我提出问题。有时，我也会在一闪念间，羡慕那些在电视和新闻里有很高国内声望的专家学者们，但是很快，我就放弃了这种虚荣的想法，为坚守自己的原则感到高兴。

我在前面也提到过，自己有过几次破例。有时候，我会对一些问题（主要是匈牙利国内经济问题）迅速做出的反应，写些篇幅较长的文章，讨论当前宏观经济热点。** 1992 年，我在《匈牙利新闻报》（*Magyar Hírlap*）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讨论当时匈牙利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1] 我痛心于匈牙利国内经济发展的停滞，敦促政府谨慎推出调节措施，“半路掉头”（half-turn）的政策会导致现实经济陷入更大的危机。这篇文章提出的半路掉头概念，一度成为匈牙利的流行语。人们对这一概念的使用证实了我的观点，即放松一种概念，或放宽一种清晰明确的术语表述限制，任由它进入政治舞台随意使用，会给这一概念带来危险。这篇文章的推理过程很严密，它警告人们，必须慎重使用这一概念，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谁能阻止各种政治力量为了自身利益，而在论战中使用这一概念呢？

1994 年，匈牙利日益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促使我再次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两种思想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一是经常项目持续恶化引起的均衡问题，一是严厉的政府干预将遏制经济增长的问题。其他经济学家早已对此发出了警告，但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衡量，才下定决心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一气呵成写完一篇文章，其篇幅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相当，（在后来的英文版本中）标题是《必须将持续增长作为首要任务：匈牙利国内紧张的宏观经济局势和政府经济政策》。我的朋友卡塔林·博沙尼力劝我将该文发表在每日出版的《人民自由报》（*Népszabadság*）上。[2] 对于一份报纸而言，连载一篇

---

* 在美国，也经常有电视台主持人和记者邀请我参加电视节目，他们希望我对最近发生的新闻做简短而尖锐的评价。除了个别情况之外，我多半都谢绝了邀请。

** 有几次我是出于个人原因发言的——当我的书出版，或者我的整岁生日到来时，我会接受采访。在这些场合，我通常会顺应媒体的请求，回答他们的问题。这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占据5个整版篇幅的文章可不是一个小事情。但这样的文章长度让我充分阐明了思想精妙之处，并用详尽的理由证明它的正确性。

从1994年8月底起陆续面世的这一系列文章，为后来政府推行经济调整和经济稳定计划，做了前期工作和准备。我非常担心政府为了刺激消费，而扭曲消费投资比例。工资和公共开支的失控会加速侵蚀经济体系的均衡状态，尤其是经常账户平衡。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的文章不仅描绘出政府推行这种不受人欢迎且令人痛苦的经济政策会带来的经济前景，而且认为这一阶段不可避免。同时我也指出，经济稳定和调整改革，通常伴随着严重的经济衰退，因此必须在坚持改革的同时，努力避免经济衰退的出现。

与以前一样，人们对文章观点的反应不一，有的甚至针锋相对。有些人赞成我的建议，有些人认为我的建议缺乏足够的理性，还有一些人歪曲或误读了我的本意。但那些远离匈牙利政治斗争的专业观察家们，则高度评价了我的文章。在为庆祝我70岁生日而编辑出版的纪念文集中，有一篇是目前在世的最伟大的宏观经济学研究权威之一罗伯特·索洛的文章。索洛赞同我的观点，他写道："首先，增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绝不能让它置于从属地位；其次，国内生产总值如果下降，国内其他稳定目标更加难以实现；第三，如果经济停滞甚或下滑达几年之久，那么，即使存在经济增长机会，多年的经济停滞或衰退也会使得后续增长越发艰难。"[3]索洛认为，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不仅可以帮助匈牙利克服当前的困难，而且对于匈牙利今后的发展和其他国家也具有重要意义。

1995年3月，时任匈牙利财政部长的拉约什·博克罗什开始推行政府经济调整和稳定计划（简称博克罗什一揽子计划），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全力支持他。我主动接受了一家电视台采访，努力用朴素的语言向观众解释，匈牙利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痛苦的调整过程，人民为什么要做出必要的牺牲。这次讲话后来整理成文章发表在媒体上，标题是《陡峭的道路》。[4]

我还主动请求与伊万·绍博会面，他是匈牙利十分受人尊重的反对派人士，并且在1990—1994年间，出任匈牙利民主论坛党执政期间最后一任财政部长，我试图说服他同意我的观点，让他认识到必须采取极端的一揽子经济计划。我建议他应该尽力说服议会中反对派的党内同事们，不要反对这一调整计划。我还记得他同意了我的观点。或者至少他没有反对这些观点，但是我的提议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当时，对于经济调整计划的反对声浪已经达到了最高点。

一揽子计划中的某些条款受到了宪法法院的质疑。为此，我在法院判决前

特意拜访了法院院长拉斯洛·绍约姆(László Sólyom)*。当然，这一行为并非秘密的游说活动，而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活动。我以法院顾问的身份与他见面，不带任何私心杂念地表明了我这样一个匈牙利普通公民对这件事的看法。关于为什么要采取迅速而彻底的经济措施，我向他提供了详细的经济论证。我认为，匈牙利的经济危机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危机的发生。不久前爆发的墨西哥经济危机，已经让该国遭受了巨大损失。因此在危机临近的关头，政府在没有预先警告的情况下，马上采取果断的经济措施，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完全符合宪法精神。但是，法院最终的判决仍然撤销了一揽子计划中的某些重要条款，这表明，我的游说没有产生任何正面效果。

到了 1996 年，随着时光流逝，统计数据已经清楚证明了事情的结果。我在匈牙利发表了一篇文章，并且将它作为出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巴黎会议的发言稿，文章标题为《没有衰退的经济调整：基于匈牙利经济稳定政策的研究》。文章使用国际数据，测算了这样一种痛苦的外科手术在拉丁美洲等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这一手术没有造成生产力下降和失业率激增的后果，而每次危机之后的经济调整计划，总会引发生产下降和失业率增加的副作用。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我的评估结果，但也有人表示异议。捷尔吉·毛托尔奇就反对我的观点。甚至他的演讲标题都与我的演讲标题针锋相对：《伴随衰退的经济调整》。我在所有的讨论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论文中，都非常谨慎地提出以下建议：必须以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目标实施经济调整，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在平稳和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上前进。毛托尔奇早就在自己的文章中表现出对于强制性增长道路的偏爱，后来，他担任经济部部长时，将这种偏爱付诸实践。所谓强制性经济增长，就是利用超出正常范围的财政刺激手段，将经济推上可持续发展轨道，并最终导致经济均衡出现问题。

1996 年，我将在稳定计划推出前后接受采访的记录以及为报刊撰写的文章，整理成文集出版，书名就是《奋斗与希望：后社会主义时期经济稳定和改革文选》。这一标题反映了我对匈牙利事态发展的感受，以及对当时整个国家某种心理状态的基本看法。

在围绕博克罗什一揽子计划展开的斗争中，我不仅感受到自己拥有的优势，也深切体会到了自己的弱势地位。我在演讲和书面文章中，阐明了宏观经济分

---

* 拉斯洛·绍约姆 2005 年当选为匈牙利共和国总统。

析的结论，这种宏观经济分析确实有助于许多人认清当前的任务，也使许多人更容易接受调整过程中的某些牺牲。但是像凯恩斯（我只是随机选了凯恩斯为例）这样的名人如果处在我的位置上，他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他会更好地说服那些摇摆不定的人们和反对者，并且会更加执着地与尽可能多的人交谈，而且还会使用对方习惯使用的语言。我承认我通常过于甚至幼稚地痴迷于文字的力量，相信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的影响力，所以通常不会去为我的提议进行游说。在博克罗什一揽子计划提出之前，近在咫尺的危机为我敲响了警钟，让我不得不扮演我所不习惯的角色。

博克罗什计划使匈牙利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彻底的经济调整在几年后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经济均衡指标有所改善，经济增长加速。但不幸的是，它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所有困难。几年后，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又卷土重来。刻意讨好民众并不加节制地提高工资，根据“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精神对国家财富的分配，并没有随着卡达尔政权的解体而消失殆尽。它们还在我们的生活中时隐时现，阴魂不散。无论是左翼政府还是右翼政府，无论掌权的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政治势力，他们都在追求民粹主义经济政策。旧时代具有破坏性的经济发展趋势，还在反复出现。

2003年，匈牙利的金融界风波再起。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接二连三发表文章，敦促政府马上采取行动，并对当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提出批评。在这样的局势下，我接受了《人民自由报》的长篇专访。我在专访中强调，从我1994年在报纸上发表系列文章以来，我对于宏观经济的基本观点从未改变。在我的强烈要求下，这篇专访的大标题再次定为《持续性经济增长是当前的首要任务》。[5]

不幸的是，在这篇专访发出的警告引起人们注意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只有少数几位经济学家同意我的观点。我们呼吁“约束”国家支出，限制急剧膨胀的住房抵押贷款，控制工资的增长，原因在于，它们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生产力的增长速度。令人遗憾的是，将经济重新引入可持续增长的道路的工作已经被耽搁得太久了，而且政府对此总是犹豫不决。

医疗体制改革

1992年，我应美国经济学学会邀请发表演讲时，谈到了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

的福利社会改革问题。我在演讲中将卡达尔政权下的福利制度结构，描述为“不成熟的福利社会”，因为这种福利制度需要国家承担的义务，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履行这种义务所需要的资源，与国家现有资源不成比例。我敢肯定从我提出这种观点开始，我的研究同行们一定会因为这种观点而对我报以愤怒和鄙视的眼光。他们相信，必须阻止我“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取得的社会成就。他们没有认识到，现实中无法逃避的比例失调，才是对社会主义成就的真正攻击。自从我发表这种观点后，我的一位老朋友就不再和我说话。另外，我相信那些研究主题与福利国家有关的专家们，也会立刻强烈反对我的观点，他们不会考虑我的论证过程，只会断章取义地歪曲我的观点。

但是，我在 1992 年指出的问题不仅没有自行消失，反而不断恶化。后来我认识到，这些问题并非东欧国家特有的问题。福利国家所面临的危机不仅出现在福利国家条件尚未成熟的东欧地区，在福利国家的发祥地——北欧和西欧——也出现了危机。这是我们所处时代最严重的不协调现象。一方面，福利国家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经济成就之一，它使得数百万人的生活更有保障。因此，一旦触动福利国家问题，就会引来所有人的嘘声，人们害怕这样的改革会损害自身的安全保障，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以及昂贵的医疗技术支出，也使得福利国家无法以现有形式、通过现有手段、在现有程度上维持人们的福利需求。矛盾的激化显然不仅体现在匈牙利或者波兰国内对于改革的抵制，而且出现在法国（阿兰·朱佩领导下的右翼政府）和德国（格哈德·施罗德领导下的左翼政府），法德两国温和且不连贯的改革也引起了国内的政治风暴、示威游行和抗议活动。然而，所有的统治势力，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派别，只要它对于自己国家有真正的责任感，都必须采取行动约束福利国家的开支。

从我接触到这一问题的那天起，我就对它十分着迷。我试图从各个角度入手解决这一问题。我与以前的学生约翰·麦克黑尔（他是一位爱尔兰人，现在加拿大从事教学工作）合作，利用经济计量学方法，进行了国际比较分析。[6] 之后，拉斯洛·琼托什（他不幸英年早逝）和社会研究所（TÁRKI）的伊什特万·捷尔吉·托特也加入我的研究，他们负责了解匈牙利民众对各种不同改革方案的接受程度。[7] 我和另外一个团队通过与患者和“红包”收受者坦诚交谈，测算了医疗机构医生收取的“红包”数量，并利用这些数据计算医生获得的利益。[8]

1998 年，我出版了一本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匈牙利文小册子。[9] 各方对它的反应不一。有些人认为我所提出的建议很及时，而且切实可行。有些人则暴

跳如雷，谴责我为某一政治团体说话，或者为那些贪婪并受利润驱使的资本家助阵，这些资本家对于患者毫无怜悯之情。但震怒的批评家们并不知道，我没有提议政府实施激进且草率并可能对人民造成伤害的改变，而是建议政府采用平衡谨慎的改革计划，协调两种无法相容的需求。*

这本书从未主张建立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市场竞争，当然，它也描述了不引进市场竞争的害处。我们不能满足于放任这一部门垄断了国家补贴和公共财政，也不能允许家长式政客和官僚机构，在养老金、医疗和其他福利服务问题上，独断专行地做出决策。

大多数关注医疗体制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一般是从这一行业的具体性质、承担的工作和财政问题入手，考察对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次，他们才会关注与这些问题相关联的伦理道德问题。即使有些人关注了医疗改革的道德问题，他们也会在改革主张中寻找改革思想的道德原则。我的著作反其道而行之。我是从一套为公众所接受的价值体系和伦理原则入手，以此为基础，推导出实用的改革途径。

我在书中提出了两个基本假设。一个假设是个人主义原则。理想的转轨过程应该拓宽个人在福利服务中的决策范围，并相应压缩国家的决策范围。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决策制定过程，而且适用于个人，我们要对自身生命负责。我们必须改变任由一个保姆式国家替我们做选择的现状。

另一个假设是团结原则。我们必须帮助那些遇到麻烦或处于弱势的人们。与那些努力弱化国家作用的自由主义立场不同，这一观点认为，只要国家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能够解救那些处于困境的人们，就可以允许国家拥有再分配职能，而且这是非常必要的。

说到我对于医疗体制改革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我将自己对于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兴趣也带到了哈佛大学的课堂上。我和约翰·麦克黑尔组织了一次研讨会，希望从国际视角来考察福利国家改革。这次研讨会的客座演讲者既有这一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也有一些学生。会议议题包括美国养老金制度改革（主题演讲者是马丁·菲尔德斯坦和彼得·戴蒙德），世界银行对于东欧国家养老金改革的建

---

* 专注于医疗问题的政治家、前卫生部部长帕尔·科瓦奇没有严肃地评价我的建议，而是代之以诙谐的调侃。当一位电视台记者采访他会如何使用这本书时，他说这本书的厚度正好可以用来垫他那张跛脚的桌子。

议，中国医疗卫生改革，降低失业率的方法（该主题的演讲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埃德蒙·菲尔普斯教授），世界各地区财富分配的变化情况等等。听众们都全神贯注聆听了这些演讲，听课的学生和老师，当然也包括我本人，都从中学到了大量的知识。这些丰富的知识为我提供了国际视角，让我能够获得许多发人深思的结论。

下面回过头来谈谈我在 1998 年所写的那本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著作，这本书所引起的争论使我清楚地认识到，我没有足以令人信服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当时公开发表对这本书的书评，比我与其他学者私底下的冷静交谈要少很多。我与以前在哈佛大学的学生翁笙和合作修改了这本书，翁笙和是卫生经济学方面的专家。2001 年修订扩展后的英文版出版，书名为《转轨过程的福利、选择和一致性：东欧国家医疗部门改革》。[10]这本书的新版提出了同旧版相同的改革原则和主要思路，但其使用的资料更具国际性；书中批判性地分析了其他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的积极和消极经验，以及这一领域所发生的变化。与早期的匈牙利文版相比，新版本更为详细和准确地提出了改革计划，并且更为仔细地权衡了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它揭示了从单纯商业利益出发组建医疗部门的风险。但是，这本书绝不是让人们在这一行业引入私人资本问题上止步于门外，而是描述了对这一行业进行干预和监管的具体方法，以及用来控制风险的平衡机制和再分配机制。这本书试图客观地评价各种激励方案的优点和弊端。

该书英文版最初问世时，引来了一片赞誉之声，而且让作者高兴的是，这本书还被翻译成波兰文、中文和越南文出版。在我撰写这本传记时，这本书的匈牙利文版也出版了。这本书刚刚面世时，正值人们对于医疗体制改革进行激烈争论之时。当时，学术观点的交流被充满敌意的政治斗争所取代。公众人物表面上拥护公共福利，其实代表的只是部门内部小团体的利益，他们在电视上各执己见，唇枪舌剑。天知道会有谁关心我们在书中提出的冷静客观的意见呢？

鉴于人们对于我的宏观经济分析和第一本医疗改革著作的反应褒贬不一，所以我很想知道，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最终决策时，我的观点是否引起过他们的注意。

他们征询你的意见吗？他们留意你的意见吗？

匈牙利国内和国外的朋友有时问我，是否有人向我征询过有关经济政策的

问题，如果询问过了，那么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是否听从了我的建议。我非常希望简单明了地给出清楚而准确的回答，可惜我做不到这一点。

这个问题可能有几个答案。让我们从问题的字面意思开始。匈牙利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们，是否曾经在面对面的交谈中，请教过我的观点？

匈牙利体制变革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费伦茨·劳巴尔与我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熟识，当时我正在研究“两级计划”，我曾经邀请他加入我的研究团队。后来，他在靠近维也纳的卢森堡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以及国家计划办公室工作时，我们见过几次。1990年暑假我回到匈牙利时，劳巴尔给我打电话说要与我会面。我来到了财政部他的办公室，我正打算坐到会议桌旁，他却微笑着把他的椅子让了出来，说我应该坐在那里。他热情地告诉我，他非常赞同我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充满激情的小册子》中提出的观点。之后我们还在其他场合有过多次见面机会，每次他都专注地倾听我的建议。

后来，劳巴尔供职的那一任政府，让米哈伊·库保接手了劳巴尔的工作，库保组建了一个包括各行各业众多人员在内的非正式智囊团。智囊团成员中，有博学多才、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伊什特万·海泰尼，海泰尼曾担任计划办公室副主任，后来担任财政部部长一职直至1986年。另一位成员是捷尔吉·欧什瓦特，时任首相约瑟夫·安托尔的私人经济顾问。还有一些人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民主联盟（Szabad Demokraták Szövetsége，SZDSZ）或者民主青年联盟（Fiatal Demokraták Szövetsége，FIDESZ），但这两个联盟都不是联合政府中的政党成员。库保邀请我加入智囊团时，我犹豫再三，但最后还是答应了。库保经常听取智囊们的意见，我也与他有过几次会面。尽管我和库保的关系会让别人以为我赞同政府的政策，而且这样的误解会给我带来麻烦，但其实我在许多方面都对政府的政策强烈反对或持保留意见，不过我很高兴他愿意接受我的观点。库保被解职后，这种模棱两可的关系也随之终止。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库保的解职是因为他在经济转型和宏观经济方面的举措，过于偏离政府的倾向。

对于自己在库保担任部长期间的经历，我的总结是，我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之前的人生原则。如果民主选举政府的官员在私人场合询问我的观点，我会很乐意说出来。但是无论哪种政治力量当权，我都不会再接受任何“政府顾问”之类的正式任命，或者成为官方指定的智囊机构成员，我希望人们不要对我产生误解，认为我愿意对政府献计献策，从而表明我认可了政府的政策。政府当然希望任何获得正式任命的政府顾问，都表现出对于政府的忠诚，因此他（或她）不能在

公开场合尖锐批评政府或者提出不同意见。相反，我则希望利用每一个机会，公开表明我的观点和批评。

截至 2004 年底，匈牙利已经实行了长达 15 年的议会民主制，在此期间，先后有十位财政部部长履职。有些情况下，我曾主动要求与他们见面；有些情况下，财政部部长希望与我交谈。他们中的某些人其实并没有兴趣知道我对于经济形势或者当前面临任务的看法。*

除此之外，我也不时与政府或公共生活中的其他领袖人物会面，同他们交流看法，当然我也会用文字表达我的观点。

1991 年，属于自由党的自由民主联盟（SZDSZ）主席雅诺什·基什，邀请我加入该党顾问团，担任客座顾问。在此我要引用 1991 年 4 月 14 日给他的回信中的原话：

> 我非常乐意与您讨论匈牙利面临的问题……然而，我不能接受您的盛情邀请，定期参加贵党的政治顾问团会议。请允许我解释谢绝邀请的原因。每逢遇到具体行为问题时，决定我的政治和职业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及政治和学术上的自主权。从 1956 年我脱离共产党后，我就决定不再参加任何党派或者政治活动。现在我也绝不会参加任何活动。我很清楚，定期参加顾问团会议并不意味着成为贵党成员。但是这将使我与贵党产生密切的联系，因此，固定的合作关系会与我之前表达的人生原则发生矛盾……向政党领导人或者担任要职的经济顾问表达我的个人观点，使他们了解我的想法，则是我可以接受的做法。我会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是否与他们见面交流，比如根据党派的政策基础、征求意见的个人，或者涉及的主题，等等，来决定是否进行这种私人交谈……我确信我所提出的人生原则，从政治道德层面上可以为人所接受。然而，我绝不认为这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原则。各个党派都急需活跃的政治家。我和这些基于派系斗争而反对议会民主制度的人，没有任何共同点……而且，从个人角度来看，我非常尊重那些献身于党内工作的人，他们本来可以在别的行业大有作为，但为了本党的事业，甘心做出了牺牲。[11]

---

* 在这些财政部部长离职后，我曾经探望过那些在担任部长职位之前与我关系很好的人，因为我希望他们清楚，无论他们是坐在部长的豪华长毛绒椅子上，还是从高位退下，我们的同事关系都没有任何改变。

我还愿意引用1992年10月24日从美国寄给青年民主联盟(FIDESZ)主席维克多·欧尔班的一封信的部分内容,他曾邀请我对于该党的经济计划草案发表评论:

我认为这一经济计划草案,对于基本原则的表述不够精练。

"自由主义"一词虽然得到认可,但是它的含义模糊不清。因此,应当强调"自由主义"主要指:自由即个人享有自己的权利,企业拥有自主经营权,避免国家对于所有事情的干预等。

大多数人对于"实用主义"的表述并不清楚。你一定要更加清晰地将其解释为,强有力的原则与灵活性的结合,同时说明你反对狭隘的教条主义,随时准备根据现实情况做出妥协……

在这份清单中,缺少三个我认为十分重要的观点。我在这里只列出关键词;还需要你们继续研究,补充其内容:

(1) 现代化。日新月异的技术、现代的生活方式、不断变化的道德观和社会契约——不要让"旧"的东西死灰复燃。

(2) 商业和政治活动的诚实与合法。采取一切措施抵制欺诈、舞弊、腐败、阴谋诡计、任人唯亲、利益的道德冲突和违法行为。

(3) 安全感和可预见性。政府要遵守自己的诺言;要说话算话。

我对于这份经济计划草案中的经济建议,做出如下评价:

(这份计划的)关键问题在于,没有清楚指出实现计划目标的具体步骤,国家如何在不引发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进入新的经济增长轨道,创造就业机会……这一问题千万不能用货币政策刺激来解决……计划应该更多地强调对于外国资本开放的必要性,补充说明仇外心理和民族主义有害性的内容……草案中提到的(国家再分配)"伟大制度"偏离正题。关于医疗和福利计划的分权化和私有化,你们想要如何完成……对于草案中关于福利计划的内容,虽然我从总体上不支持民粹主义的承诺,但是它使得未来的发展进程具有了可预言性,这点我尤其欣赏。[12]

我还是坚持12年前的那封信中提出的人生原则。

一次会面或者一次信件往来,本身并不能表明政治人物对于我的真正兴趣。这还要取决于其他方面。我感到,有些与我交谈的政界人物,确实关注我的意见,他们认真思考我的观点,并将其与其他观点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最后的结论。但有些政界人物,似乎只是假装对我的观点感兴趣,他们其实只想听到与他们的

想法相同的声音。他们只在自己的政治观点已经成型后才展开讨论，或者希望通过交流意见和征求建议的方式，巩固他们对自己所做选择的信心。如果我确实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就会在与其他人的交谈中引用我的意见。如果我恰好反对他们的观点，那么他们就会继续向其他人征求意见，直到找到相同观点的人为止。我不得不承认，我本能地回避这样的观点交流，但无疑大部分交流都是以这种形式出现。任何以非正式形式向政治家提供意见的个人，都要承担这种风险，对方虚伪地请求自己提供意见，自己不得不同意他的要求。

我在会议或者庆祝活动中遇到政治或者政府领袖人物时，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哦，您已经回国了啊？我还以为您在美国呢。我真的非常愿意与您交谈。我会和您联系的。"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几个星期过去后，我没有收到任何承诺过的邀请。我曾与一两位旧相识有过五次或者十次相似的谈话。或许那些人确实从内心觉得听听我的意见是有用的，但是繁忙的日常事务使得他们无法脱身，向一位学者征求意见或者与他进行一次安静的谈话，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我认为，与像我这样的专家交流，仅仅是政治家出于公关目的而利用的手段，这种做法很不能让人接受。这就好像他们向公众吹嘘，那些学识渊博的科学开拓者和经济专家，向他们提供了意见。当我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时，曾经有一两次被这种拙劣的政治宣传举动所蒙蔽。后来，我对这种事情产生了本能的防御心理，而且越来越谨慎。每次我都会提前弄清楚，政治家想要就哪些主题征求我的意见。尤其是在有媒体或者电视台报道的场合，我更是加倍小心。这并不是说，我希望与政治家们的交谈处于保密状态。我既然荣幸地接到邀请，就没有必要不让人知道：我时时刻刻准备着向那些对我真正感兴趣的人阐明我的观点，我很高兴做这种事情，我也不介意在公众面前进行这种交流——但是，我不希望成为毫无意义的政治促销活动中的宣传品。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花了大量时间仔细考虑上述事情，问题很明显，在政治家和具有社会责任感与社会良知的学者角色之间，有一条分界线。我不能接受自己扮演前一角色，但是我想要成为后一种人。有时，我感到我已经越过了自己规定的界限，有时我又觉得自己与这一分界线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但是，这条分界线到底在哪里呢？

这些事件让我模糊地感到，自己的心理和行为习惯，使我不愿意在一些涉及政治的问题上，经常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作出贡献。我宁愿缩在自己的研究

领域里从事研究，我在研究中感到非常自如，也能够更好地利用一名经济学家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实际效果

到目前为止，我只回答了前一标题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下面，让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即人们是否认真听取了我的意见。

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我不想将讨论范围局限于相互信任的、面对面的交谈，或者私人信件中的评论、批评或建议。我更喜欢说说我在书中、文章中和其他出版物中，公开谈到的、在我看来真正重要的观点——当然，前提条件是这么做不会与一些重要的国家机密或者经济利益相冲突。那么我所有这些观点，是否影响了局势的发展？

让我从几个引人瞩目的统计数据入手，来讨论这个问题。1990—2003 年，我的名字或者我的作品在匈牙利国会中被提及 46 次。[13] 如今，对于引用率的统计本身也是一门学问，研究者们争相查看自己的哪篇文章被人引用以及引用的次数。当然，这通常是对学术期刊而言。我当然也对这个感兴趣，但是我和他们的赛道完全不同！当我发现国会议员在辩论中引用我的文章时，我感到很满意，尤其是在我刻意躲避他们这种日常政治斗争的情况下。

几乎所有人都曾经积极引用我的文章，以此支持他们的观点。在引用我文章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是现在当权的党派成员（匈牙利社会党和自由民主联盟），另外三分之一的人来自反对党（青年民主联盟、匈牙利民主论坛、基督民主党和独立小农党）。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其次是《短缺经济学》、《奋斗与希望》以及关于医疗改革的书。1995 年，我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数达到高峰，当时正值政府推行经济稳定和调整时期。我在议会会议记录中读到，有两位议员在议会就如何更好地理解我的作品而发生争论时，作为一名学者，我深感荣幸。

议会对于作品的引用虽然有一定价值，却不能说明我的作品是否真正地影响了匈牙利的转轨过程。我恐怕不能对这个问题给出可靠的回答。在方法论上，我一直提倡多因素分析法。如果人们试图对一种复杂现象进行因果解释，那么，只是用一个原因就能解释这一复杂现象的情况，实属例外。如果有几种因素

影响到这一现象，那么量度这几种因素的相对权重就非常困难。

匈牙利和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在转轨进程中的前进方向，正是我在著作中建议的方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是我的作品促成了这一结果。这可能是一种巧合，真正的推动力或许来自其他地方。* 也可能我的作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其他因素或许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当然，也不排除我的一些思想最终以间接的方式产生影响，对决策制定者的思维产生了重要的效果，这样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有。

匈牙利是最早采用强有力的措施全面“硬化”预算约束的国家。小 J. 巴克利·罗瑟和玛丽娜·V. 罗瑟在广为人知的比较经济学教科书中，曾对此做出评价，他们指出，我的著作对这一事件产生了强大的学术影响，他们的评价看似令人信服。** 不可否认的是，在整个后社会主义地区，我是硬化预算约束最积极的倡导者，我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

至于其他更全面的问题，我所能说的是，在大家共同提出改革意见时，我只是其中的成员之一，或者至多算是几个领头人之一。例如，我曾经与他人一道，支持政府推进渐进式改革并反对第三条道路，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是人们争论的最重要话题。我也曾和志趣相投的知识分子一道，强烈支持一个主张，即经济增长应该与宏观经济均衡的要求相协调。我认为可以假设我在这个方面有一定影响，但是这一假设却不能得到证明。

除了对于政治家和经济决策产生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的思想是否影响了公众思想，即权力范围之外的人们的思想，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的思想。我没有进行相关调查，所以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我在谈论《短缺经济学》一书时，曾说过我得到过一些零星的读者反馈。他们中有的是给我治病的医生，有的是我的邻居，有时是路上偶遇的一位历史学家，他们都跟我说他（或她）看过我写的东西，认为它非常有信服力。我听到最多的赞扬是人

---

* 弗里吉斯·考林蒂曾经讲过一个善良的精神病患者的故事，他站在忙碌的十字路口，像一位管弦乐队指挥一样指挥交通。虽然路上发生的一切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陶醉于自己对于这一切的指挥：“现在有两辆车在拐弯……很好……对面应该是来了一辆电车。等一下，这是什么？哦，来了一队士兵……啊，他们来了。他们从那边过来了……”[1975(1914), p. 329]无论如何，我希望自己像考林蒂笔下的人物一样，到处挥舞着手中的指挥棒。

** “迄今为止，在所有前社会主义经济体中，匈牙利拥有最硬的预算约束……正如人们所论证的那样，这反映了雅诺什·科尔奈对于他的祖国有着巨大的政策影响力。”(Rosser and Rosser, 2004, pp. 377—378)

们认为，我的文章比那些官方文件更容易让他们理解社会的弊端和面临的任务。如果一个人的作品能够帮助读者找到方向，那么对于一位学者而言，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就。我虽然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赞扬，但这并不能表明我的作品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制定货币政策

1995年，匈牙利国家银行行长捷尔吉·舒拉尼邀请我加入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的机构——中央银行理事会。因为我希望能对该理事会的法律和政治地位有所了解，因此没有马上回答他，而是请他给我一段时间考虑这件事情。* 最后我同意接受他的邀请，诱使我接受邀请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中央银行拥有法律保障的独立性。法律规定，中央银行理事会独立于政府和政党之外。在任命理事会成员时，总理要先与匈牙利国家银行行长磋商，然后提出理事会成员人选，这些人选需要获得国会批准，不过最终的任命权却掌握在共和国总统手中。

总理居拉·霍恩推荐我担任央行理事会委员，第一任期为三年，当时的匈牙利由社会党—自由党联合执政。第二次推荐我出任理事的人，则是保守派联合政府的总理维克多·欧尔班。在这两次推荐提名中，所有的政府官员和国会中相关委员会（负责经济和预算工作）的反对派成员对我都没有异议。在委员会听证会上，他们向我提出了一些不掺杂任何政治因素的技术性问题，我都尽力给出客观的回答。我发现我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认同，这让我感到舒服和安心。我希望政界将我看作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个人，我不会忠诚于任何党派，而是完全依赖自己的专业知识和道德良知发表意见。虽然后续的几届政府一直都有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是他们都希望委托我完成理事会的工作，这证明我的努力成功了。

我在理事会工作了将近六年时间，我认真准备每一次会议，经常完成职责以外的工作，还会提前准备好需要提交的书面观点。我努力熟悉与议题相关的最新数据和其他信息，全面研究与日常工作主题相关的理论文献，分析与其相似的以往情形。所有这些都是我关起门来独自完成的工作。中央银行理事会需要对

---

* 2001年，匈牙利制定了关于货币政策方向的新法律。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担任理事会成员的那段工作，可以反映这之前的法律框架。

货币政策，尤其是利率政策做出短期和中期决策。为了配合政府的工作，理事会还要针对汇率调控空间，确定宪法约束。* 在那段时间，匈牙利的货币政策赢得了世界的认可，国际金融活动的领袖们将匈牙利作为转轨国家的典范。毫不夸张地说，我认为我的工作也为这些成绩作出了贡献。

同时，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更加深刻洞察了最高层的经济政策制定过程。每一次重要决策的准备工作，都是一次学术上的挑战。让我安心的是，理事会的争论非常冷静，即便在国家银行陷入政治风波时，也是如此。在争论中，人们使用有理有据的论据回应对方的观点，基本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理事会的同事们彼此尊重，形成和谐的工作氛围。

2001 年 8 月，就在我的任期到期之前几周，我在给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中辞去了中央银行理事会成员一职。我认为，新近通过的法律已经改变了理事会的法律框架。按照这项新的法律，新成立的货币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是匈牙利国家银行的雇员（因此也是行长的下属），这一规定削弱了货币委员会成员的独立性。** 这种新形势显然与我之前设定的人生原则发生矛盾。

当时，人们不可能预见到货币政策制定者们后来的错误，但是一些不好的迹象已经表现出来。过去，理事会的会议是闭门会议，公众并不知道各个委员各自的观点，这样不会对人有什么困扰。但是现在，我担心自己永远都会成为少数派，并且不论我是否愿意，都必须支持那些我并不认同的货币政策。而且也许我再没有机会，向经济专业人士和国家公民说出我的个人观点。

或许一位政治战术家或者外交家处在我的位置上，会更好地妥善处理问题，例如，他们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成功或较为成功地干预其他成员的错误观点被付诸实践。我觉得我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来完成这一任务。

如今回顾担任货币政策理事会成员的这六年，我积极参与了货币政策的制定，并获得成功。2002 年后，我摆脱了理事会成员的束缚，可以在媒体和专业讨论中，自由批评货币政策制定中出现的各种错误。无论在任还是卸任，我都无怨

---

* 按照经济学的专业说法，这可以称为汇率机制。例如，政府要在固定汇率制和自由浮动汇率制之间做出选择。或者说，政府是否应该为市场力量在其中发挥作用留有余地，或者事先用固定汇率限制其活动？在后一种情况下，汇率波动的幅度应该有多大？

** 按照早期关于中央银行的法律，中央银行理事会的一些成员要从银行内部的高级官员中选择（即“内部委员”），同时，其他委员（包括我）必须来自学术界（即“外部委员”）。后者可以保留他们在大学或者研究机构的全职职务，参与货币政策制定只是他们的额外工作。这种外部人身份保证了他们拥有完全的个人独立性。

无悔，问心无愧。

对其他国家经济转型的评论

1989—1990 年所发生的政治事件，使得所有后社会主义国家突然感到需要国外经济顾问的帮助。在此，我不会就这一问题进行总结性判断。我知道，有些顾问总是尽量全面了解他们将前往地区的情况，为他们的任务做好认真而谨慎的准备，在提出建议时也十分谦虚，慎之又慎。不幸的是，还存在另一类顾问：这些经济学家根本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只是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有些处于转型期的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多种渠道联系过我，希望我参与当地经济计划的制定。我在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学术抵制期间，就认识了许多国外的同事和朋友，他们向我发出邀请，希望我去他们国家访问并进行学术交流。

按照我之前一再提及的人生原则，我本该拒绝大多数这种邀请，请注意只是大多数，而不是全部。我当然不会带着自己的思想到几个国家游说，说服那里的人们接受我的观点，而不是其他人的观点。但是我觉得，拒绝所有的请求也不对。我的知识或许能帮助转轨国家更加容易地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反过来说，我也可以从对这些国家的访问中学到很多东西。我访问了俄罗斯和其他几个东欧国家，在那里发表演讲，与那里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邀请，数次来到华盛顿发表演讲，向人们阐明我的观点，或者参与非正式讨论。我还在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EBRD)科学理事会工作过几年，这家机构旨在通过投资贷款资助，帮助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完成转轨，并为这些国家提供政策建议。

只要有可能，我都力争做出准确的自我评判，我自认为自己没有沾染学术傲慢的恶习。我亲耳听到那些爱出风头的同事说，某些国家只有一条发展道路，他们给出的建议，恰好就是那唯一的道路。我总是强调，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而言，某条道路是否唯一的道路，似乎不该由我们来决定，而是应该由那些真正了解当地情况的当地人决定；他们有责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我

们应该做的，不过是向他们传授我们在其他国家获得的经验，以及我们从理论著作中得出的结论。外国顾问们受到的关注越多，他们就越是应该谦虚谨慎。

我曾在 1999 年和 2005 年两次访问中国，并于 2001 年第一次访问越南，这三次经历尤其让我深感触动。如果为这两个处于转轨期国家中的任何一国，开出与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的处方，那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果这两个国家让我觉得似曾相识，那么绝不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东欧，而是 20 世纪 80 年代卡达尔政权后期的匈牙利。这两个国家已经沿着经济改革之路走了很远，市场经济和私人所有制已经全面铺开，这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匈牙利在许多方面非常相似。

我对中国和越南的访问，也是一次特殊的学术经历，因为我在这两个国家感到非常自在。我虽然不会讲中国话和越南话，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我能用他们的经历作为语言，因为我的亲身经历让我十分了解这些国家的精神状态，它们正在寻找发展道路，或者仍对改革犹豫不决。当我与一些人进行坦诚而友好的交谈时，他们告诉我，比之美国、法国或者德国的经济学家，他们更愿意与我交流，因为他们能感觉到，我本人也经历过与他们现在相似的发展阶段。因此，我所说的话更可信赖。

让我高兴的是，我的一系列书和文章都在这两个国家公开出版。它们或许也为后来所进行的改革做了前期准备工作，发挥了学术启蒙的作用。

注 释

[1] Kornai, 1992d.

[2] Kornai, 1995b.

[3] Solow, 2000, p. 408.

[4] Kornai, 1997b, pp. 100—120. 多瑙电视台于 1995 年 4 月 9 日报道了拉斯洛·若尔特·绍博对我的采访。

[5] Blahó, 2003.

[6] Kornai and McHale, 2000.

[7] Csontos, Kornai and Tóth, 1996, 1998.

[8] Kornai, 2000a.

[9] Kornai, 1998a.

[10] Kornai and Eggleston, 2001(匈牙利文版见 Kornai and Eggleston, 2004a)。

[11] 这些往来信件的复本保存在我的文件收藏中。

[12] 这封信的复本保存在我的文件收藏中。

[13] 议会演讲稿可以在 Arcanum 出版社出版的《1990—2002 年议会期刊》(CD, *Országgyűlési Napló*)以及互联网找到。我们根据不同的标准整理,归类了演讲的参考文献。相关结论的图表保存在我的文件收藏中。

21. 继续向前：1990 年后

《制度转变的是与非》

《诚实与信任》

现在我要回过头来说说另一面的活动，这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工作，而且也是我真正的职业：研究和教学。

对制度变革的解释

制度变革开启了我的人生新阶段。1990 年，我开始再次感到自己有责任采取规范分析方法，为匈牙利和其他经历转轨阵痛的国家，提一些实用的经济政策建议。同时，我依然重视使用实证分析方法客观把握当前的形势，描述和分析事情的起因，并从事相关的理论工作。

对于制度概念的理解已经成为贯穿我整个学术生涯的中心课题。我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对于同时期的不同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可以对一个国家先后出现的不同制度进行观察和解释。虽然每个人都在使用“制度变革”这一术语，但是人们对制度变革的确切涵义未达成一致意见。事实上，人们在描述制度变迁时使用的通用解释，遭到了猛烈的抨击，这种概念上的众说纷纭，也引起了政治话语中的混乱。

我在《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澄清了这个问题。该书的书名就清楚强调，制度才是该书的核心概念。虽然我已经在前文提到了制度的相关内容，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总结一下，我所认为的“伟大”制度应该具有的特征：(1)政治结构和与之相关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2)财产关系；(3)协调机制(即市场机制、官僚机制及其他机制的相对权重)。三者的次序并非随意排列，而是按照它

们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做的排序。这三个特征进而决定了制度的其他重要特征：比如行为规则和持久的市场力量等。

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的典型特点是对权力的垄断以及反对私人所有制和市场，而且以公有制和官僚协调机制为主导。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典型特点，是支持私人所有制和市场，并以私人所有制和市场协调机制为主导。当社会主义制度让位于另一种表现出资本主义制度各种特性的新社会制度时，制度变革就发生了。

我在这里已经尽量用最少的标准来阐述两种社会制度的特征和制度变革的发生。因此，我要警示读者，注意我在解释上述内容时，哪些不属于制度变革范畴的情况。

我不想对制度及其变革做出价值判断。这并不是我在克制自己不去进行价值判断，这点我马上就能说清楚，主要原因在于，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实证的、描述性的以及价值中立的。也许当你为制度变革深表遗憾时，我可能在欢呼雀跃，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术语的解释上达成一致意见。利用一个新制度的实证定义，来混淆人们对于一个“美好”社会的期望，必然将人引入歧途。社会主义制度不是邪恶帝国统治，资本主义制度也并非公正和自由的社会化身。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只是两个真实历史社会结构的一般模型。

“制度变革”表示结构、制度、社会关系和典型的社会冲突的彻底变革，而不是任何个人或者团体的守护者发生变化。当然，结构和制度的转变过程，与个人角色和地位转变过程之间存在相关性。某种程度上，前者包含后者，而且经过一段时间后，必然导致后者出现；前者毫无疑问是决定力量，而后者更像是一种副作用。

关于政治结构的最后一个附带条件是：即使新的统治方式不是民主制度，而是类似某种军事独裁的暴政或者独裁统治，那么制度变革仍然可以发生。我对制度的定义，只是要求制度应该“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即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制度应该促进而不是阻碍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的扩张。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结构也许可以让位于皮诺切特式独裁军政府的恐怖政治，或者家族派系从旧的权贵阶层手中夺取权力（这种情况在几个中亚国家发生过），或者仍然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对于领导权的长期主导。万幸的是，东欧国家在经历制度变革时，那里的政治结构从专制转向了民主政治。

正如许多历史经验所表明的，没有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仍能存在。但是

逆命题并非一定成立。没有资本主义制度，民主制度就不能存在，* 这是逻辑论证和历史经验已经证实的。

我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上述思想，文章标题为《从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是与非》，发表于美国拥有最大读者群的学术期刊之一《经济展望杂志》。** 虽然这篇文章从社会主义经济变革的理论层面探索了这一主题，但是它同样包含着某些政治信息。人们经常发表一些具有煽动性的民粹主义观点，探讨制度变革怎么还没有发生。我认为，那些在文章中鼓吹这种观点的人，恐怕根本不知道“制度”和“制度变革”的真正含义。

当然，两种重要制度间的转换确实已经发生了，这一事实毋庸置疑。世界上也存在多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有些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家被委以重任；而有些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家的作用就不很重要。有些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权力、权利、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非常严重；有些则不那么明显。有些资本主义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激励机制；有些则根本没有建树。随着讨论的深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制度变革是否已经发生，而是变革的方向何在。与之相关的规范性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这就涉及了价值判断。

希望与失望，乐观与悲观

在匈牙利和东欧地区，许多人对现状大失所望。他们期待制度变革能给他们带来完全不同的且更伟大和更美好的事物。我在这里涉及的，并不是那些生活确实很糟糕的人——比如失业，收入减少，或者某种特权被剥夺的人。很多知识分子也经历了这种梦想幻灭的过程，虽然他们并没有遭受物质上的损失，甚至也享受到比以前更多的福利，他们也没有受到任何个人伤害，甚至获得了更多的认可。让他们痛心疾首的是，亲眼见到诚信缺失、谎言泛滥和国家财富流失。政治上毫无意义的骂战，掩盖住的腐败，被揭发或未被揭发的犯罪，商业和政治的

---

* 在这一表述中应该补充一个前提条件：我所说的民主制度是现代工业社会中运行的民主制度。显然，作为历史开创者的古希腊人所奉行的民主制度，与一种和现代社会截然不同的经济秩序相关。

** 这篇文章之前在英国发表时的篇幅更长(1998a)。2002 年，《经济展望杂志》的主编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压缩篇幅，以便发表于该刊的千禧年特刊中。这篇文章还被翻译成匈牙利文和其他几种文字。

相互勾结等，都让他们不寒而栗。当他们看到炫富阶层和极贫阶层之间鲜明的对比状况时，更是感到自己的正义感遭到了侵犯。

我也感受到了这些痛苦和愤怒。但是我不认为我的梦想也幻灭了。失望是期望过多的结果，与那些对制度变革感到沮丧的朋友和熟人们相比，我的期望相对低一些。

我在前面一章曾提到过发表于 1980 年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我讽刺了一些人的观点，他们将历史看作便利的超市，在市场中，购物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将各种制度所具备的吸引人的特征放到购物篮里带回家，组合成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制度。历史提供的是“一揽子交易”，其中也包括存在许多制度内在特有顽疾的“现存”资本主义。

1983 年，我写了《国家的健康》一文，文中简要评价了国家所患七种重病的病理学基础，这几种重病包括通货膨胀、失业、短缺、外债增长过度、增长失调、恶性失衡和官僚化等。[1]（当然，这份名单还可以再长一些。）当时，我贸然下了一个判断，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任何疾病的社会经济制度，但是我们有权选择疾病。如果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只有两到三种上述疾病，就让人很高兴了。在最坏的情况下，社会制度可能要承受四种或者五种疾病的折磨。

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中出现的大规模失业现象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努力降低失业率，但是失业这一问题却不可能完全得到解决。我也并不惊讶于突然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现象。虽然我们不可能实现极端平等化，但是我们仍要努力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并为他们提供保障人的尊严所要求的基本条件。

很多因素使我的期望比其他同事更加现实。我是一个比较社会科学的职业研究者，这是我的专业所长。几十年来，我的研究一直集中在探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并对它们进行比较。我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印象不仅来自书本，也不仅来自我以访问者身份进行的短期参观，而且来自我在这些国家长达数年的生活经历。我有机会将我在书中所写的与我亲眼所见的进行对比，我可以负责任地保证，我没对资本主义抱有任何幻想。* 尽管资本主义的许多特

---

* 我发现这两种幻想之间存在着相似性。新左派将自己的幻想建立在社会主义乌托邦基础上，对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十分厌恶。同时，许多知识分子在面对制度变革时，对于“西方世界”及其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印象是扭曲的。由于他们将这种印象与自己乌托邦式的想象相比较，而不是与现实的期待相比较，因此面对现实中的资本主义，他们不禁目瞪口呆。

征具有破坏性，也存在严重的道德问题，但是我宁愿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中。

我还必须补充一点，以说明制度变革并没有让我感到失望的原因。在我的内心深处，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分析一种现象时，必须严格区分所采用的实证和规范分析方法。我们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梦想——如果诗人失去梦想，那么世界将会让人悲伤。但是那些标榜自己为社会科学家，同时又将乌托邦与现实混为一谈的人，让我感到恼火。尤其是，他们将梦想与现实可能性进行比较，将自己思维混乱的结果看作理所当然，而对现实置之不理，这点尤为让人恼火。

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的制度变革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这一观点让我和其他知识分子多少有些格格不入。我感到自己非常幸运，能够亲历这一历史转折点，这种欣喜的感觉并未随着 1989—1990 年的结束而消失，它一直持续到 15 年后的今天。

过去，每次我从西方世界回国时，箱子里都要塞满当时国内短缺的商品。现在，布达佩斯可供选择的商品比波士顿还要丰富。过去，我要利用个人关系才能为自己安装电话。现在，电话公司争着为我提供服务。作为《短缺经济学》一书的作者，难道我是唯一一个认为消除长期短缺有重要意义的人吗？难道其他人，甚至老人们都不记得我们以前是怎样因为短缺而牢骚满腹吗？

过去，我在拿着护照到窗口办理出国手续之前，都要获得工作单位党委书记和人事官员的批准。现在，我可以随心所欲乘火车或者飞机去任何我想去的国家。过去，如果有人想要表达自己对制度的不满，我们通常会相互使眼色加以提醒。现在，不在报纸或者电视上攻击政治领导人的人，反而不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对我而言，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非理所当然，或者当然应该如此。如果我对朋友说起这些，他们也会表示同意。“哦，是的，你是对的，但是……”他们会这样说，然后转过头去又开始抱怨，列举一长串让他们恼怒或者讨厌的事情。

我并没有说，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出现过失望心理。有些问题的出现，也让我一时措手不及；有些事虽然在我的意料之中，但问题的严重程度也超过了我的设想。我是抱着自我批评的态度，如实地描述这种现象。我在这里讨论的，不是那些根本无法预料的且具有破坏性的事件以及令人厌恶的事情，我讨论的是那些当时如果能够更加深入和充分地思考这种变革可能带来的后果，就完全应该预料到的问题。

例如，我曾对议会的工作抱有天真的幻想。在《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和

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些观点。我对于权力的分立（利用立法权监督行政权）寄予了太高的期望。或许，我所想到的只是在美国民主政治的重大历史时刻，美国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关系。对我而言，“水门事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当时，参议员和众议员，其中包括尼克松总统所属的共和党成员，连续地对“水门事件”进行调查，并最终迫使总统下台。当时，我在电视上多次收看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会议辩论，在这些会议上，立法者全力监督行政机构的工作，并经常超越了党派利益范围。在这里，“经常”是一个重要的词汇，因为他们不会总是超越党派利益。* 即使在一个相对完善的民主制度中，希望立法机构的成员，通过选举这一途径而提升成员的道德水平，使他（或她）只从选民和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而忽略对党或者政府的忠诚，这只是一种幼稚的希望而已。我原本应该更慎重地评价政府和国会在正常条件下的工作方式。但我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必须从匈牙利和其他东欧国家新生的民主制度的表现中，吸取更多的教训。

对于前社会主义国家突然爆发的民族主义或与其有关的运动高潮，我也有些始料不及。我曾经设想过这类事件可能出现，但是没有想到这些运动会给政治和学术生活以及人际关系带来这么显著的影响。

分属不同民族联邦的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并彻底分裂，前南斯拉夫不断爆发战争。在原苏联的领土内，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间也爆发了战争。同时，车臣内部的冲突一直持续至今。即使在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方，长期被压制的民族独立运动也呈燎原之势。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两个国家。东欧地区相邻国家由于少数民族问题出现了紧张关系，冲突时有发生，只是强度有不同而已。少数民族要求获得更多的权利；例如，俄罗斯民族在苏联解体之前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但是在苏联解体后，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少数民族，甚至是受到压迫的少数民族。

伴随这些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国际冲突，在各个国家内部也出现了与之相关的民族主义事件，而且同样具有破坏性和排斥性。我在这里列举仇外情绪、鄙视邻国民众、反吉卜赛和反犹太心理等现实中的个案，这些事件开始时，都只是偶发态势，但是之后就发展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甚至几乎得到社会的认同。

---

* 在美国国内外，信奉美国式民主的人们担心，为了防止恐怖袭击而设计的各种规定也会限制人权。我希望美国的民主力量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护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在这本传记的第 1 章和第 2 章，我曾描述过生为一个犹太人对于我的童年和成年的意义。当然，半个世纪后我也没有忘记我的身份，但是这对于我没有什么意义。马克思是犹太人，而斯大林不是犹太人，这些事实对我无关紧要。早些年，我信奉这两个人的观点，但后来却与他们划清了界限。拉科西是犹太人，而卡达尔不是犹太人，这些对我也不重要了，开始的时候我信任他们，后来却与他们彻底决裂，并进而反对他们。对我而言，那些影响我的人、攻击我的人、帮我出版作品的人、禁止我在大学教书的人或者邀请我担任教授职务的人，他们是不是犹太人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不是种族主义者。那些依照纽伦堡法案或本国法律认定我为犹太人，并且要求我佩戴黄色星形徽章的人，对我而言也不重要了。匈牙利诗人山多尔·乔里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公开宣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惨剧发生之后，人们认为生活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已经没有任何希望成为真正的匈牙利人了，当我读到这篇文章时，我思想中的犹太人意识突然再次萌发。* 按照他的观点，我难道不再是真正的匈牙利人吗？

我不接受反犹太分子和其他民族主义者按照种族和宗教划分社会阶层的做法。从这方面看，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为了个人尊严而进行正当防卫的犹太人。如果你是一位反犹太主义者，那么我会昂首挺胸地向你宣布，我是一个犹太人。除此之外，我并不关注这种不道德的让人厌恶的歧视行为。

必须说明的一点是，我没有预料到，有一天一些人会将“犹太人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这是制度变革后让我非常失望的一个问题，因为在这里我不得不承认，对这个问题我缺乏先见之明。

我已经充分说明了让我感到压抑和始料未及的事情，这是为了让读者确信，我并不是一个对制度变革不加批评的旁观者。我们生活的社会正处于动荡之中，好事和坏事掺杂在一起，美好与庸俗并存。当然，对于诸种事项各自所占比重的计算，并无客观准则。每个人必须用自己的个人感受，去经历这一善恶混杂的古怪时代。

我发现在我周围有很多悲观主义者。朋友们给我讲述一段恐怖的传言之后，都会问我：“现在，你对这件事怎么看啊？”我能说什么呢？如果我开始为他们

---

* “在霍尔蒂时代的议会共和，尤其是在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期，思想和精神融合的机会彻底消失了。现在，获得自由的匈牙利犹太人只想在生活方式和心态上与匈牙利人同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犹太人为自己建立了一个议会平台，而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Csoóri, 1990, p. 5.)

描述制度变革值得肯定的方面，以及未来可能获得的成就，那么这听上去就像是人民导师和乡间鼓动者们过去的鼓吹一样，全是粉饰太平的官方腔调和哗众取宠的空话。对于一本单纯讲述自己故事的传记而言，我只说说自己的悲观与乐观就足够了。

在制度变革之前，我倾向于悲观主义。我曾在1983年发表的《国家的健康》一文中提到，悲观主义并不排斥人的行动。我援引了加缪的小说《鼠疫》里医生里厄与朋友塔鲁的一段对话，当时里厄正在帮助塔鲁与鼠疫做斗争。“塔鲁说：‘是的。但是你的胜利从来都不持久；仅此而已。’里厄的脸色变得阴沉：‘是的，我知道这一点。但是我没有放弃斗争的理由。’”[2]

1986年，我的《矛盾与抉择》一书在美国出版，在前言中我写了下面一段话：

> 我必须提醒读者：这并不是一本充满乐观主义的书，但也并非悲观主义的。几个世纪以来，匈牙利人一直有这样的传统：你可以听天由命，你也可以绝望或愤怒，只要美好的前景并不确定或是根本不可能，你都要为生活的改善而努力真诚地工作。曾经读过匈牙利古典戏剧或诗歌（一些已经被翻译成英语），或者曾听过巴洛克音乐的人，都会清楚地体会到其中包含的矛盾情绪。或许，从事沉闷非哲学职业的人，例如经济学家，也遵从同样的传统。[3]

对我而言，自从制度变革发生以来，我内心的乐观和悲观交织不休的情绪开始向乐观主义倾斜。处于变革进程中的国家和世界所呈现出的变化，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只用寥寥数语就描绘出其平衡对比，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即使一部鸿篇巨制，也无法说清这个问题。我只说几个现象，以此描述影响我的生活态度的几种变化。我不会逃避问题，我会直面问题，但是，当后社会主义地区数亿的人们有机会获得自由时，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在自由之门打开之后，新的民主浪潮出现，其规模远远超过早期民主主义运动。按照历史学术语的解释，处于专政统治下的地区正在日渐缩小，民主覆盖的地区则迅速扩大。虽然这一民主进程在某些地区出现中断甚至倒退的现象，但我确信这种历史退步只是一个小插曲。我也会因为听说极端主义分子的可怕行径而浑身战栗，而且我相信，如果恐怖主义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果可能无法想象。不管怎样，我相信民主必将传播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这一历史进程将遵循过去几十年或者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趋势，不断延续。

世界各地的生产水平都在增长，虽然发展水平并不平衡，但是技术在进步，可供人类消费的资源总量也在增加。我充分认识到，新的困难在不断涌现，需要

人们去克服。然而，我不会因为消费者社会和人口老龄化趋势以及计算机的普及带来的灾难而哀叹。对我而言，如果乡村里的电灯点亮，下水管道铺设好，如果流行病得到控制，人均寿命得以延长，如果人们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远程通信能够更好地沟通，我就认为这是一种进步。我已经成为这样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识到世界存在问题，并希望缓解这些问题。

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

制度变革发生后，我在布达佩斯的工作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从 1955 年开始，我就在匈牙利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工作，当然不包括我被迫调动到其他研究所的 9 年时间。

1992 年，刚刚成立的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邀请我去那里工作。我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成为研究院创始者之一。我在布达佩斯的活动中心，也随之转移到新的工作场所。离开经济研究所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许多感情纽带、友谊和回忆都将我和经济研究所联系在一起，我和那里的很多同事至今还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是由柏林高等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WIKO）院长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教授发起创立的。柏林高等研究院是效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建立的，我曾在前文中谈过，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所有到访人员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他们有长达一年的时间在那里思考、写作、研究和学习，而不必承担任何教学或者行政任务。勒佩尼斯教授和他的亲密同事、柏林高等研究院秘书约阿希姆·内特尔贝克认为，在东欧地区建立这样一所高等学术研究机构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对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建立研究所的可能性进行反复考虑后，几经犹豫，他们选择了在匈牙利建立柏林高等学术研究院的兄弟机构，并且开始寻找赞助人，其中包括几个西欧国家的政府和基金会。

勒佩尼斯教授开始与我谈话，希望我能够与他合作建立研究所。我没有接

---

* 我曾在第 11 章描述过我在经济研究所的工作生活情况，当时，我和我的团队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天中午 11:30 一起吃午饭。由于我长期在那里工作，因此即使在我走后，以前科尔奈团队成员现仍在经济研究所工作的人，还保持之前的习惯，即中午 11:30 吃午餐，无论我去看他们时，还是其他日子，这一习惯都一直保持着。

受他提议的研究院的职务，因为我至少有一半的时间要放在哈佛大学，但是我同意以终身成员的身份加入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并领导一个团队。

我很愿意抽出一部分精力帮助新成立的研究院开展活动。例如，我会参加每年一次的访问学者筛选会议。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是匈牙利国内的一家国际机构，每年在访问学者的选择上会平衡匈牙利人（包括匈牙利国内和国外的匈牙利裔人）和其他来自东西方国家的外国研究者的比例。此外，它也是一家多学科的研究机构，这也是它吸引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研究院活跃的午餐交谈中，音乐学者和遗传学者、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能碰撞出火花并从中受到启发。研究院要求所有成员在研讨会上向其他学者报告自己的研究工作进展，这一方式使得其他领域的实践者们也能理解你的研究工作。研究院在选择访问学者时往往非常慎重，它希望所有学科都在研究院内有自己的入选者。

当然，有些学者喜欢在自己的研究领域独立完成工作。有些人则会组成研究团队。也有专门就某一特定主题成立团队的情况。我自己曾三次发起和组织这样的团队。最近，我和耶鲁大学的苏珊·罗丝-艾克曼教授共同指导一个团队，专门研究“后社会主义转轨阶段的诚实和信任”，这一团队包括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科学、人类学、哲学和法学及其他各个分支领域的研究者，这些人来自14个国家。我们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而且从中选择部分文章编辑成两卷本的论文集，文集已经在2004年出版。[4]

我参加这一研究项目时，发现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分支都被高墙分割开来。当团队中的成员彼此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时，我们发现，分属不同学科的团队成员只能理解自己所在学科的习惯用语、基本概念和常用的研究方法。所有人都对自身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以及最新学术进展了如指掌。但是他们对其他研究领域的写作风格和方法体系知之甚少。在我们的小团队中，每个代表自己研究领域的学者，都不得不向其他人解释本学科的内容，让别人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实际上这对于任何人都是一个难得机会，他可以借此按照要求厘清自己的学术思路。我们也发现，对于经济学家不言自明的道理，社会学家或者律师却难以明白，他们的研究原则与方法完全不同，反之亦然。通过合作，团队成员不仅学到了具体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而且发现跨学科合作是一种会产生持久影响力的学术形式。

在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的工作，经常需要我们做出困难而微妙的决定。为了保证匈牙利国内这家独一无二的研究机构的完整性、学术和政治上的独立性，

我们不得不多次进行斗争。如何机智果断地面对各种干扰和政治压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完成了这方面的工作——虽然公众没有看到这些工作，也没有获得公众的认同，但是我仍然认为，这项工作是我这一生所做的最成功的事情之一。

现在，我是唯一一个从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成立起就在此工作的学者。自从成为研究院的终身荣誉成员后，我已经不再承担行政职责，不过，仍以研究员的身份参与研究院的工作。从我走进那里的第一天起，那里的一切都让我在学术和精神上感到愉悦。当我在夜晚走出研究院的大门，我会抬头看看泛光灯照射下的马提亚教堂塔楼。布达城堡区的街道和广场让我沉醉，能在这样迷人的环境里拥有宁静的工作条件，每次想到这点，都让我觉得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一段美好的时光：我的 70 岁生日

前面的内容都与我的工作有关，后面的也将如此，但是我要在这两段内容之间插入一段个人生活的描述，这也是发生在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的事情。

我的妻子茹饶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为我准备 70 岁生日庆祝活动。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研究院的院长加博尔·克洛尼曹伊在各方面都给了她很大帮助，并且提供了庆祝活动所需的场所。

到了生日那天晚上，茹饶告诉我说要外出用餐，因此要求我穿上正装，我甚至还为此戴了领结。当我们坐进汽车来到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时，一切已经秘密准备就绪：一场生日宴会！茹饶为此邀请了 52 位来宾，其中包括我们在国内外的家庭成员和好朋友。所有受邀嘉宾都参加了宴会，并对这事守口如瓶。我们到达宴会现场时，我还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所有人到齐后，我们来到演说大厅，在那里茹饶首先发言。她首先感谢帮助她组织这一活动的人们，最先提到的就是我们的亲密朋友、历史学家彼得·豪纳克，他参与了这场宴会的所有前期准备活动，但却在宴会开始前不久离开了我们。茹饶本来有很多事情想说，但是没说几句就哽咽了，眼里充满泪水，无法继续下去。最后，她在大家的鼓掌声中走下演讲台。

感人的一幕之后，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家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表演。我的朋友拉约什·韦卡什是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同时也是一位狂热的

音乐爱好者，他在那天晚上为我们演奏了《奥尔四重奏》。

接下来是几位朋友激动人心的演讲，他们回忆了在我们过去的美好岁月中发生的趣事。彼得·肯德说起我们在小学第一年共同度过的时光，他在家里举行生日聚会时，他的父母建议他邀请我参加。他说道："哦，绝不。我不会请汉斯（我的昵称）的，他太好斗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居然好斗？

接下来是捷尔吉·利特万和安德拉什·纳吉，他们谈起我们在经济研究所的岁月。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几乎每顿饭都要在衬衫或外套上留下痕迹，我刚到经济研究所时穿的一套新西装也被弄脏了。朋友们建议我马上把裤子送到清洁工那里，让他们帮忙除掉油渍。我穿着内裤被反锁在办公室里，这时电话铃响了。不幸的是，清洁工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明天才能把衣服送回，所以让我最好耐心等待。幸运的是，这只是个玩笑，我的裤子没过一会儿就在笑声中被送回来了。

米哈伊·洛基也讲了他所知道的关于我的一些趣事。有一次，他到马特劳哈扎度假，而我恰好在那里紧张工作。他们邀请我去散步时，我马上答应了。不过在我们出发前，我看了一眼手表说道："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散步。"这个故事十分可信，即使现在，我准备散步时，我也会看看手表，然后说现在是"洛基时间"几点钟。

随后，我们和所有来宾共进晚餐。在餐桌旁，我的儿子安德拉什代表子女们讲了一段幽默风趣的话，然后，我的瑞典外孙女索菲用流利的匈牙利语代表孙辈们做了贴心的发言。最后，朱迪特·里姆勒作为所有朋友的发言人，向我隆重赠送了一块特制的匾额，上面写着"学术楷模"（The Order of the Top Dog）。这确实是一个极高的荣誉，因为狗是朱迪特最喜爱的动物。

看到亲友们围坐在一起为我庆祝生日，我感到非常快乐和感动。我们的三个孩子和孙辈们以及所有亲近的家庭成员齐聚布达佩斯，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除了他们，我的许多不是经常见面的朋友也来了。这些朋友中有些人互相认识，有些人却是第一次见面。想要向我表示祝贺的美好愿望让他们走到一起。

我以前也参加过这样的庆祝活动。按照我们的家庭传统，我们一般要为家庭成员的生日举行庆祝活动，而不只是几句简短的祝福和送一些生日礼物。我也曾非常荣幸地参加过其他更为正式的庆祝活动。有几次是我获得大学的荣誉博士称号，一次是驻布达佩斯的法国大使邀请我的朋友出席向我颁发荣誉军团勋章的仪式，还有两次是我的同事和朋友们在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为我庆祝 70

岁和 75 岁生日。为了庆祝我的 70 岁生日，几位朋友出版了一套两卷本纪念文集作为礼物，这两卷书的编辑分别是雅诺什·加齐和雅诺什·克勒、埃里克·马斯金和安德拉什·西蒙诺维奇，[5]这都让我感激不尽。对我而言，每一次聚会都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但是，茹饶像变魔术一样为我准备的 70 岁生日活动，尤其让我感到周围人的深情厚谊和温暖关怀。这也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刻之一。

哈佛大学：教学与告别

制度变革之后，我们仍然继续之前在布达佩斯和美国之间一年两次往返的生活方式。同时，1989—1990 年发生的事件，也给我在哈佛大学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期望。

哈佛大学是研究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传统学术中心之一，这主要归因于几个因素。首先，这里是古典经济学说史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离开苏联后一直工作的地方。其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瓦西里·里昂惕夫和西蒙·库兹涅茨也在这里教书。这三位经济学家一直对东半球所发生的事情非常感兴趣。所有致力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东欧国家的学者，最终都汇集在哈佛大学的俄罗斯研究中心。同时，学校里面还有一个著名的远东问题研究中心，一些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在那里工作。我在哈佛大学的时候，始终与这些研究中心以及那里的许多研究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经常在那里发表演讲。

柏林墙的倒塌在哈佛大学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有一段时间，几乎所有教授的兴趣都转向刚诞生的后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一些教授甚至抽出时间和精力，闪电式地访问了这几个国家，或参加了一些相关会议。另一些人，其中包括一些有杰出才能的人，则在接下去的几年里全身心投入了后社会主义国家转轨问题的研究。

当时，我的电话铃声经常响起，我的同事要去布达佩斯或者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给我电话，希望从我这里简单了解一下当地的局势。我也受邀到哈佛大学的一系列研讨会上发言。有一次，我在为一千多名本科生开设的经济学入门课上，拿出一节课的时间解释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运行方式，以及转轨过程中的变化。在哈佛大学四壁镶着木板的精致的桑德斯剧院，给这么多学生上课是

一次难忘的经历，那里也是我和妻子经常去听音乐会的地方。

在制度变革后的那几年里，我经常在教工俱乐部里组织“晚餐研讨会”，邀请与后社会主义转轨的研究、教学和顾问工作有关系的所有教授参加。我们定期聚会，每个参加者都要在餐桌旁说说各自的经历；其中经常发生各种有趣的讨论和激烈的观点碰撞。

新的形势不仅引起教授们的兴趣，也吸引了学生的注意。我的社会主义制度课程一直都吸引很多学生听课，人数通常超过了其他博士生选修课的学生人数。现在，这一人数更是成倍增长。20 世纪 90 年代后，来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学生逐年增加，其中有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学生，当然也有中国学生。尤其让我感到高兴的是，还有几个匈牙利学生。

上课前，我总要为教学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是现在，这的确变成了一项困难的任务。政局的变化和制度的变革，对比较经济学、“苏联问题研究”和所有东欧问题研究专家都提出了巨大挑战。有些人干脆放弃了这一研究领域，认为今后的研究不可能再用到这方面的知识了。其他像我这样的学者，则卷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文献阅读，我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思考已经成熟。另一方面，后社会主义地区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法律体系，都在以迅猛的速度持续发生变化（今天仍然如此）。正如我坦白对学生说的那样，我只能传授给他们一些尚不成熟的待定观点。但是我觉得，即使这样也比什么都不说要有用。

成为一名“转轨经济问题专家”显然只是暂时的工作，就像这一头衔本身所暗示的那样：一旦转轨过程结束，这一特定的任务和职业也会随之不复存在。但是，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稍纵即逝的机会，那么我们会从这一研究课题中，获得一笔宝贵的经验财富。历史正在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实验室，我们能从中看到伟大的制度转型如何在历史长河中、在极其短暂的瞬间发生并完成。回首往事，我不会因为与其他几位学者专门从事转轨研究而后悔，让我遗憾的是，经济学（或者更广泛地说是社会科学）没有利用当时难得的历史机遇，获取大量信息并展开研究。

我第一次在课堂上讲到转轨时，我觉得我不可能对转轨过程进行充分的描述。为此我举办了一系列讲座，邀请这一问题研究方面的“重要人物”来演讲。大量的学生涌进来听讲，并提出了有趣的问题。然而，我从与学生的私下交流中越来越感觉到，学生很难系统掌握他们的演讲内容。每个演讲者都是根据自己

的研究，从不同的视角、研究方法和概念前提出发阐述问题，对演讲者而言，这一切原本就是这个逻辑；但是对于听讲的学生来说，他们却无法将所听的内容很好地组织起来。当社会转轨大致清楚之后，我试着运用统一的结构和思路做了一系列演讲。学生们欣然接受了这样的形式。但是，我没有像十年前讲社会主义制度时那样，将所有的信息都整理成书。虽然确实也需要有一本专门研究转轨问题的总结性专著，但是这项工作还是留给年轻一代去做吧。

随着时间的流逝，似乎到了我该为退休生活考虑的时候了。作为这部分的开场白，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美国的退休条件。美国法律禁止年龄歧视。雇主如果不需要雇员了，无论雇员现在是 30 岁还是 70 岁，都可以解雇。但是，法律不允许雇主强迫雇员在某个年龄，比如 60 岁或 65 岁退休。一般来说，“年龄”不能成为解雇的理由。而对于大学终身教授而言，他们不仅可以获得这一保障，同时还享有其他特权。就像我在前文对于哈佛大学的描述一样，除非发生特殊情况，否则大学不能辞退终身教授。归根结底，这就是美国大学与欧洲大学的不同之处，在这里，我所属的这一特权阶层不会面临强制退休。美国的大学教授自己决定退休时间。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一直工作。

和所有缴纳社会保险金的人一样，美国教授所享受的国家养老金相对较少，只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另外，大学会为其职工向非营利性的私人养老基金缴费。教授退休后，就可以拿到累积的养老金和红利，但是总额不定。养老金数额主要取决于你的服务年限和收入情况。另一个决定因素就是学校为雇员选择的投资组合以及这种投资组合的收益情况。

在美国，退休对于大学教授意味着什么呢？收入方面，他（或她）会面临几个选择：他们可以一次性拿到所有养老金，也可以领取年金，还可以要求在自己去世后，向其配偶等亲属支付年金。如果教授执教时间达到 40—45 年，并且在大学的职业阶梯上爬到高处，那么退休并不会造成收入锐减。同时，退休还可以让他从繁重的教学和行政任务中解脱出来。如果退休教师希望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经费申请通常可以获得学校的批准，他们可以获准使用学校的办公室，并得到其他方面的支持。他们可以继续感受学校的勃勃生气，出入图书馆，经常去游泳池锻炼，在教工俱乐部消遣，并且仍是学校资助的医疗计划的受益者。总而言之，美国大学教授在退休后，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学术上的损失都很小，同时还可以摆脱许多义务。难怪很多人最终都会选择退休。

但是我的情况却不同。虽然没有法律或者合同要求我必须退休，但是我和

妻子都仔细考虑过，我们是否应该在如此高龄还担任两份工作。每年两次收拾行李、踏上旅程、打开行李的生活还要持续多长时间？我们在布达佩斯和坎布里奇承担了许多相似的行政工作，更不用说在两地工作时，需要付出的额外努力，这种忙碌的生活，我们还能持续多久？我们不想在突发疾病后再做决定。相反，我们希望趁着还有能力高效率完成研究任务时，结束在美国的工作。

与我的美国同事不同的是，退休对于我们并不意味着放弃了研究工作，减轻了教学负担，同时也没有什么损失。回到匈牙利居住，意味着我们要远离哈佛大学、坎布里奇和波士顿这里无法比拟的学术和文化环境。此外，哈佛大学的一间办公室、世界上最大的学术图书馆、与老同事在教工俱乐部共进午餐，对我来说，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特权——我再也没有机会利用了。

经过再三考虑，我们决定在 2001—2002 学年结束后，终止在哈佛大学的工作。然后我们将永远离开这里，回国生活了。

我对学生们说，他们将是我教的最后一届学生。他们在最后一节课结束后，为我举办的庆祝仪式，以及他们在参加院系匿名教师评价时，为我写下的温情话语，至今让我难忘。

许多布达佩斯的老年人告诉我，他们的同事和上级的退休仪式，都是那种没有意义的正式庆祝仪式。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退休宴会充满了真诚友爱，内容充实。戴尔·乔根森在简短的演讲中，满怀尊敬地赞扬了我的学术工作和公共工作，这不仅体现了他对我的尊敬，还体现了他特有的全面性。接下来发言的是埃里克·马斯金，他当时并不是哈佛大学的老师，而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经济学家，为了参加我的退休宴会，他专程赶到坎布里奇。他在演讲中穿插了许多幽默的轶事，回忆了我们在研究软预算约束时共同工作的时光，以及我们共同指导一批极有才华的中国学生时，是如何与他们打交道的。杰弗里·萨克斯说，他每次给我看他写的文章，总是非常紧张，因为他知道，我对于手中的任何文章都会毫不留情地进行公正的评判。他从我的文章中获得的最重要的认识是，我是在充满独断和谬论的世界中讲真话。因此，出于对真理的尊重，他将我比作亚当·米奇尼克和瓦茨拉夫·哈维尔。我将这一结论看作是对我的至高赞誉。

在我的三位经济学家朋友发言之后，我的儿子安德拉什起身发言，他根据家庭生活的体验，用一贯的幽默风趣谈起了做学问和哈佛大学对于我的意义。

我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做了发言。我不能也不想表现出自己的感伤和激动。就像很难用散文写出舒伯特音乐的精妙之处一样：一个人在快乐的同时，也

感受着悲伤。我心中充满了对这里的深厚感情，我曾经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生活了 18 年，在这里学习、教学和交友。要将所有这一切放在身后，想想就让人感到痛心。

仪式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告别组成：我们向朋友说再见，然后漫步在熟悉的波士顿街道和广场，最后看了我们所挚爱的哈佛广场夜景，甚至还到深夜才打烊的那家书店转了一小会儿。

我们与安德拉什和他的妻子及孩子们道别，以后我们只能在他们回到匈牙利时才能见面了，而这样的机会非常少。遥远的地理距离尤其让我们很难看到米什卡的成长，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了，达尼和诺里则刚刚上学，正是最可爱有趣的年纪。

我们开始清理奥本山街公寓里的东西，那里的每件物品都是我们精心选购摆放在家里的。我们把其中的一些送给了朋友，另外一些带回布达佩斯。搬运工人在纸箱和板条箱里塞满了东西，然后将它们搬上集装箱发往布达佩斯。

我们就像在看一部电影，它记录了我们到奥本山街公寓第一天的情形。这一次，我们又在公寓地板上睡了几天橡胶充气床垫。我在书房里搭起临时书桌和书架，将我工作使用的计算机和文件放在上面。即使在临走的最后一刻，我仍然还有事情要做，有东西要写。每当这时，茹饶就会把我叫做“坚定的小锡兵”，比喻我是安徒生童话《小锡兵历险记》中的人物。我们还用摄像机记录下了这有趣又令人心碎的最后几天。

启程的日子终于到了。我们离开美国踏上了前往欧洲的旅程。还是和以前一样，我们先到斯德哥尔摩稍作停留，和我们的女儿朱迪特、外孙女索菲和安娜小住了几天。接着我们乘飞机回到布达佩斯，在那里，我们的儿子加博尔和他的家人通德、尤尔奇和托米到机场迎接我们。我们希望将来能不时回到坎布里奇看看。但是，这与以前我们在布达佩斯生活几个月后，就回到美国的家里不同，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几年。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阶段，已经不可逆转地结束了。

返乡

回到布达佩斯后，搬家这件事就让我们忙了好一阵子。我们过去 28 年一直住在多布希瑙伊街的公寓里，现在，每天爬上三层楼梯已经让我们力不从心了。

所以我们开始寻找有电梯的公寓，最后，我们在奥布达找到了一间非常满意的公寓，我们用那些能够唤起我们过去美好回忆的物品，将公寓装饰一新。在坎布里奇的家具、画和书籍，以及我们从布达佩斯以前的家中带来的家具、装饰品和书籍，一起摆放在这间新的公寓里。

搬过家的人都知道，这项工作是多么劳神费力。对我们来说，搬家尤其复杂，因为我们要把在美国和匈牙利的两个家合二为一。相比身体的疲劳，物品的选择更让我们劳神。哪些东西应该保留，哪些东西应该送人或者扔掉？我们曾经见过年纪大的美国朋友，在把家从宽敞的郊区寓所搬到更加紧凑的城市公寓时，就面临这种取舍问题。现在，面对堆积如山的家具、书籍和旧报纸，我们也显得束手无策。然而，搬家这项工作出现的时机也正是时候。我们忙于和商人们见面，跟他们讨价还价，购买各种设施和建材，整理书籍、录音带和录像带，千头万绪的搬家工作占据了我们全部时间和精力，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怀旧，也没有时间为离开坎布里奇而感到伤心。*

回国以后，我们不止一次被问道："你们疯了吗？你们在那边拥有一切，有工作、住房和优越的环境，你们为什么还要回到这里？"

另外，许多曾排挤和侮辱我们的人也将我们包围起来。我经常刚刚打开电视或者广播就迅速将它们关掉。里面的新闻节目中充斥着谩骂、或真或假的揭露、刺耳的声调、多余而空洞的承诺和肤浅的信息，我不想听到这些。

除了政治领域外，我在其他领域也遭遇了许多无礼和缺乏理智的行为。司机在红灯前不耐烦地按着喇叭，商店或餐馆里的工作人员服务不周，我都会感到生气。

然而，在这个世界里，我仍然感到自在。这里虽然有丑陋的行为，却是我所熟悉的场景。我了解我所生活的世界。我知道或者可以猜到那个司机为什么生气，或者商店里的女营业员为什么会想着工作以外的事情。

曾经有一件陈年趣事，讲的是匈牙利代表团访问中国的事情。当时，毛泽东问代表团成员匈牙利有多少人口。听到回答后，他说道："你们可真好！你们国

---

* 多布希瑙伊街公寓的装修经历成为我写作《短缺经济学》的动因。这次，我本来可以根据1974年和2002年的建房经历进行案例比较分析，描述卖方市场如何变为买方市场，经济中的供给约束如何转变为需求约束。在第一次装修时，我们需要动用个人关系才能买到一个有些小毛病的劣质浴缸和二等硬砖。而在这次装修时，在供应充足的商店里，我们可以从琳琅满目的商品中随意选择铺面材料和各种设施。

家人口这么少，那大家一定互相认识吧。”

在美国担任哈佛大学教授的经历为我打开了很多扇门，但是在那样一个辽阔的国家，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在匈牙利却不是这样。我在这里度过了 77 年的时光。我认识这里的许多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同时，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我，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知道我是谁。如果我想向部长表达我的意见，他一定会与我见面。如果我给报纸编辑打电话，我也不需要做长时间的自我介绍。

虽然我与儿子安德拉什一家的距离变得遥远，但是现在，我们和住在布达佩斯的儿子加博尔一家人离得更近了。到瑞典看望女儿朱迪特一家，也比从坎布里奇更为方便，更不用说我们两国现在同为欧盟成员国了。尤其让我们高兴的是，我们可以和已经长大的孙辈们讨论一些严肃的话题了：尤尔奇是一所高中的老师，索菲、安娜和托米也是大学生，当我遇到一些计算机问题时，我可以向托米寻求专业帮助。（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如此权衡。和身边的儿孙们亲密相处，并不能补偿我们对远方儿孙的思念之苦。）

我们又一次适应了在匈牙利的定居生活，虽然，其间有过几次短期的出访。当然，我们非常怀念当年的时光，那时候，每当我们对于国内混乱的局势感到身心憔悴时，我们马上就可以坐上飞机，将匈牙利的紧张氛围与这些问题抛在脑后，飞向坎布里奇享受和平、安宁和美丽。* 每当我们为此感到遗憾时，我们就会用另外的想法安慰自己。我们终于不用在夏末开始忙于打包行李、准备迁移或者开始修改教案了。这 18 年来，我们的生活节奏以六个月或者一年为周期，这样的两地往返使我们过去的日子变得支离破碎。现在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我们回家了。

“您现在做什么？”

每当我遇到朋友或者熟人时，他们经常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几乎无法想象，如果我回答“什么都不做”，他们会有什么反应。我已经获得哈佛大学和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两家机构的荣誉退休教授称号。我有权停止工作。即使我现在不

---

* 但是，我们在美国享受的和平和安宁只是提供给那些每年在那里旅居几个月的匈牙利人。在美国，我们毕竟是局外人。我们没有经历我们的美国朋友所经历过的政治风波和紧张局势。

工作，我们的收入也可以保证我们舒舒服服地生活。

停止工作的时候早晚会到来，但是现在，我还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另一个答案。

担任国际经济学会（IEA）会长一职让我承担了各种责任。我的会长任期将在2005年国际经济学会年会后结束，这次会议原定在摩洛哥召开，参会人数达到几百人，参会论文数目众多。当然，许多人在帮我做这项工作，但是作为会长，我终究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我开始准备我的会长演讲，同时，作为第一个担任会长的东欧人，我还要就后社会主义转轨问题（或者更具普遍意义的重大历史转轨阶段特征问题）发表讲话。我计划在结束会长任期后，仍将对这些主题的持续探索作为主要研究任务。

与此同时，我将很多事情放到一边，专注于这本传记的写作。对于一名过去几十年来一直从事专题论文和学术文章写作的研究者而言，这是一种他并不常见的写作体裁。现在到了停笔的时候了，其他工作还在等着我去完成呢。

注 释

[1] Kornai, 1983b.

[2] Camus, 1991(1948), p. 128.

[3] Kornai, 1986b(1980), p. ix.

[4] Kornai and Rose-Ackerman, 2004; Kornai, Rothstein, and Rose-Ackerman, 2004.

[5] Gács and Köllő, 1998; Maskin and Simonovits, 2000.

缩略语

以下缩略语表示注释引用的匈牙利档案

ÁBTL	匈牙利国家安全局历史档案
IH	匈牙利共和国情报局档案
MOL	匈牙利国家档案
MTALt	匈牙利科学院档案
OHA	口述历史档案
PIL	政治史和工会档案

年 表

年表中所包括的事件，并不是以事件的实际历史地位为选择标准——有些非常重要的事件并没有被收入，而是按照非常狭义的标准来选择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自传中所描述的各个人生阶段的历史背景。显然，表中所列的一些历史事件并不是发生在匈牙利国内。另外一些事件虽然发生在匈牙利，但在文中并未清楚说明。

1921 年 4 月 14 日	伊什特万·贝特伦伯爵组建政府，1919 年建立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白色恐怖统治只维持了短短几年。统一的半独裁半议会政治制度建立。
1933 年 1 月 30 日	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兼帝国总理。
1938 年 3 月 12 日至 13 日	德国占领奥地利。
1938 年 5 月 29 日	匈牙利国会通过第一部所谓的犹太人法案，限制犹太人从事某些职业和享受某些等级的公共服务。
1939 年 3 月 15 日	德国军队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
1939 年 5 月 5 日	匈牙利国会通过第二部所谓犹太人法案，进一步削减犹太人的就业配额，并对犹太人采取更多的限制措施。
1939 年 9 月 1 日	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1 年 4 月 6 日	德国军队进攻南斯拉夫。
1941 年 4 月 11 日	匈牙利参加德国对南斯拉夫的战争。
1941 年 4 月 16 日	政府发布命令强迫匈牙利的犹太男性服劳役。
1941 年 6 月 22 日	德国进攻苏联。
1941 年 6 月 26 日	匈牙利参加苏德战争的德方作战。
1941 年 8 月 8 日	第三部犹太人法案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
1941 年 12 月 12 日	匈牙利对美国宣战。
1943 年 1 月 12 日至 2 月 3 日	匈牙利军队在苏联前线顿河湾战场遭遇惨败。
1944 年 3 月 19 日	德国军队占领匈牙利。
1944 年 5 月 15 日	匈牙利开始将境内外省的犹太人集中驱逐出境。

1944年6月6日	诺曼底登陆开始。
1944年8月27日	第一批苏联军队穿越匈牙利边境。
1944年10月15日	匈牙利最高统治者米克罗什·霍尔蒂通过广播宣布停战。匈牙利的纳粹政党箭十字党掌权。第二天,霍尔蒂任命箭十字党党首费伦茨·绍洛希为国家总理,并提出辞职。
1944年12月21日	临时议会会议在匈牙利东部城市德布勒森召开,当时该地已经从德国和箭十字党统治下的匈牙利获得解放。第二天,临时国家政府成立。
1944年12月26日	苏联军队完成对布达佩斯的合围,攻城开始。
1945年1月18日	对布达佩斯的进攻在多瑙河左岸的佩斯特结束。
1945年2月4日至11日	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参加雅尔塔会议。
1945年2月13日	经过一个半月的进攻,苏联军队从德国人和他们的匈牙利纳粹党同盟手中解放布达佩斯。
1945年4月12日	匈牙利境内战争结束。
1945年8月6日	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
1945年9月2日	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5年11月4日	在匈牙利国会选举中,右翼的小农党获得总票数的57%。
1946年3月5日	丘吉尔访问美国,其间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市向全欧洲发表“铁幕”演讲。
1946年8月1日	随着匈牙利引入新的货币单位福林,金融历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结束。
1946年11月28日	匈牙利经济大规模国有化进入第一阶段,在此期间安装的工业生产设备数量最多。
1948年6月12日	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实际的一党制形成。
1948年6月28日	苏联领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实体机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公开谴责铁托及其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
1949年1月25日	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机构经济互助委员会在莫斯科成立。
1949年9月16日至24日	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斯洛·劳伊克在公开进行的大苏维埃模式的公审秀中成为主要被告,并被处以叛国罪。
1949年10月15日	拉斯洛·劳伊克和他的同伴被执行死刑。
1949年12月10日	国会批准第一个五年计划。
1949年12月28日	雇员人数在十人以上的公司进行国有化。
1951年6月17日	匈牙利共产党党报《自由人民报》发布政府命令,号召人们将“前剥削者们”驱逐出布达佩斯。
1953年3月5日	斯大林病逝。
1953年6月17日	反对共产党体制和苏联占领民主德国的起义在柏林爆发。
1953年6月27日至28日	关于匈牙利之前所犯的错误及今后改正错误的方式等,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工人党(MDP)]中央领导机构通过了“六月决议”。

1953年7月4日	伊姆雷·纳吉成为匈牙利政府总理。
1953年7月26日	匈牙利政府宣布取缔(不经审判即关押)拘留所,结束流放。就在之前一天,国内部分地区宣布大赦。
1955年3月9日	《自由人民报》发表共产党中央领导层决议,宣布放弃之前执行的后斯大林主义的党内路线。
1955年4月14日至18日	伊姆雷·纳吉被解除总理职务,并被剥夺共产党内一切职务。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	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发表讲话,揭露斯大林。
1956年6月28日	波兰波兹南地区爆发工人起义。
1956年10月19日至21日	在波兰政治转折时期,哥穆尔卡当选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随后宣布大赦和进行改革。
1956年10月23日	布达佩斯爆发革命。
1956年10月24日	伊姆雷·纳吉就任政府总理。反叛者和苏联匈牙利联军间的战斗在布达佩斯各处发生。动荡的局面蔓延到匈牙利国内其他城市。
1956年10月29日	苏联军队开始撤出布达佩斯。第二天,伊姆雷·纳吉宣布一党制结束,并组建联合政府,欢迎共产党执政之前活动的各派政治力量复兴并加入新政府。
1956年10月29日	第二次阿以战争开始。
1956年11月1日	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
1956年11月4日	苏联军队进攻布达佩斯。亲苏的雅诺什·卡达尔领导下的新一届政府强行掌权。
1956年11月11日	布达佩斯的武装抵抗活动结束。
1956年11月22日	伊姆雷·纳吉和他的同志们遭到绑架,并被关押在罗马尼亚的监狱中。
1957年9月10日	联合国大会开始就"匈牙利问题"展开辩论。
1957年10月4日	苏联成功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尼克号送入绕地轨道。
1958年6月16日	革命政府总理伊姆雷·纳吉、国防部部长帕尔·毛莱泰尔和记者米克洛什·吉迈什被执行死刑。
1959年3月19日	政府发布命令实行农产品合作社制度,预示了匈牙利新一轮集体化浪潮的到来。
1961年8月13日	柏林墙开始修建。
1961年8月26日	1956年匈牙利革命时期的叛乱者们被处以死刑,标志着一系列政治处决的终结。
1963年3月22日	政府宣布大赦1956年匈牙利革命时期受到起诉的人们。
1964年8月7日	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批准政府用军事手段直接干预越南。
1966年5月16日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开始。

1968年1月1日	新经济机制开始在匈牙利实行。
1968年1月3日至5日	改革派共产党员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
1968年5月2日	巴黎附近的南特大学校长宣布关闭学校。之后几天，示威学生开始进入巴黎。
1968年8月20日至21日	苏联、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解散杜布切克政府，“布拉格之春”运动在残酷镇压中结束。
1969年7月21日	一艘美国宇宙飞船登上月球。
1970年12月14日至18日	波兰工人因为物价上涨举行罢工，政府在多个罢工地点向工人开枪。
1972年5月22日至30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SALT-1)谈判中，双方签署武器控制条约。
1972年11月14日至15日	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MSZMP)]中央委员会通过限制经济改革的决议。
1975年8月1日	《赫尔辛基协定》签署，成为政治局势缓和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逝世。
1978年1月6日	美国国务卿塞勒斯·万斯率领美国代表团访问布达佩斯，并归还匈牙利国家标志圣伊什特万王冠。
1979年12月26日至27日	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
1981年12月早期	第一本非法期刊《发言人》(*Beszélő*)出现。
1981年12月13日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宣布波兰进入紧急状态。团结工会组织被取缔，其领导人遭到逮捕。
1982年5月6日	匈牙利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1982年7月7日	匈牙利加入世界银行。
1985年3月11日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共产党新任总书记。
1985年6月14日至16日	反对派知识分子在布达佩斯附近的莫诺尔召开会议。
1985年11月19日至20日	戈尔巴乔夫—里根首脑会谈首次举行，其后双方有过多次会晤。
1986年2月25日至3月6日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批准公开性(*glasnost*)和改革(*perestroika*)计划。
1986年10月	总结匈牙利改革派经济学家立场观点的文献《变革和改革》准备完毕。
1987年8月23日	反苏联示威活动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爆发。
1987年9月27日	在匈牙利东部村庄Lakitelek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匈牙利民主论坛成立。在1990年匈牙利第一次自由普选的第一轮投票中，该党得到大多数选票，并且组建联合政府。
1988年5月20日至22日	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雅诺什·卡达尔结束对匈牙利长达32年的统治，匈牙利共产党的统治也随之结束。

1989年2月10日至11日	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开始支持实行多党制。
1989年6月13日	关于国家和平转轨的“全国圆桌”谈判在各个当权政治派别和反对党之间展开。
1989年6月16日	伊姆雷·纳吉和他的同志们在布达佩斯以烈士身份被重新安葬。
1989年11月9日	柏林墙开始拆除。
1990年4月8日	匈牙利举行自由选举。
1990年5月29日	鲍里斯·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
1990年6月25日	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南斯拉夫开始解体。
1990年10月3日	德国统一。
1991年6月19日	苏联完成从匈牙利的撤军。
1991年7月1日	共产党国家的军事联盟华沙条约组织解散。
1991年12月26日	苏维埃立法机关宣布苏联解体。
1997年7月8日至9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布,与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就三国加入北约展开谈判。
2001年9月11日	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华盛顿特区附近的五角大楼遭到恐怖袭击。
2004年5月1日	匈牙利成为新加入欧盟的十个成员国之一,其中另外八个国家是前社会主义国家。

术语表

术语表来源于作者存档的文件，承索即供。

捷尔吉·阿克塞尔(Aczél, György, 1917—1991) 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家。1935 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45 年成为共产党负责人，1949 年被错判入狱，1954 年获释。1957—1967 年，担任匈牙利文化部第一副部长；之后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文化工作；1974—1982 年，担任匈牙利共和国副总理。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他是匈牙利文化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的文化政策比其他许多苏联集团国家更为宽容。阿克塞尔将文化工作纳入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仅凭个人好恶，一方面使用威胁和惩罚手段，另一方面运用利益和特权，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管理匈牙利的文化生活。

匈牙利国家安全局(Állámvédelmi Hatóság, ÁVH) 1945 年 2 月，模仿苏联契卡以及后来经过改组的机构在匈牙利建立起来的政治警察机构。1956 年大革命时期，它成为公众愤怒的主要目标，并被解散。匈牙利国家安全局从一开始就从共产党员中招募人员；虽然他们通常向总理报告，但是，其最高领导阶层处于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马加什·拉科西(请参见下文的相关词条)的直接控制下。在斯大林时期，匈牙利国家安全局执行匈牙利党和国家的镇压任务。安全局的成员被称作“党的爪牙”。

米哈伊·鲍比契(Babits, Mihály, 1883—1941) 20 世纪上半叶匈牙利文学的代表人物。鲍比契是一位抒情诗人，对于诗歌以及其他许多文学体裁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他将索福克勒斯、但丁、莎士比亚和维尔伦的作品翻译成匈牙利文。从 1929 年直到逝世，鲍比契一直担任《西方》(*Nyugat*)杂志的编辑，由此奠定了他在这本期刊中的永久地位。鲍比契学识渊博，他对于文学具有的卓越的形式感与强烈的道德敏感和哲学倾向完美地结合起来。他所编撰的《欧洲文学史》(1935)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一部文学史著作，而是一组相互交集的短论。在书中，一位创作不辍的诗人“通读”欧洲文学作品，从古典的希腊罗马传统文学到 20 世纪初的文学巨著，无所不包。

柏林墙(Berlin Wall) 在西柏林地区建立的防卫工事，以此将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隔离开来，并将柏林市分为东西两个部分。1949—1961 年，政治压迫和低生活水平使得超过 100 万民主德国人通过西柏林地区的开放边境逃到联邦德国。1961 年 8 月 12—13 日，民主德国政府沿着柏林市西部边界修建了柏林墙，以阻止更多的人逃往联邦德国。这道围墙成为冷战中两大阵营分裂的标志。由于人们对柏林墙进行了大规模破坏，并且不断举行示威活动，危机重重的共产党领导层于 1989 年 11 月 9 日开放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境，墙体本身也出现了一些破洞。最终，

这道墙在1990年2月被彻底拆除。

奥斯卡·贝特伦(Betlen, Oszkár, 1909—1969) 匈牙利共产党记者。1931年,他因为从事共产党活动而入狱九个月,其后被流放到他的出生地波若尼(Pozsony,当时已经更名为布拉迪斯拉法,位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他在那里成为斯洛伐克共产党干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抓进德国集中营。战后1946年,他进入匈牙利共产党日报《自由人民报》工作,并且在1951—1954年担任报社主编。在匈牙利新闻界,他是斯大林式思维和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

伊什特万·比博(Bibó, István, 1911—1979) 匈牙利法学家、散文家和政治家。1946—1950年,他担任塞格德大学教授,在"二战"以后匈牙利共产党掌权期间,他是重要的左翼非共产党政治思想家之一。1948—1949年,匈牙利主流意识形态开始转向斯大林主义,这促使他退出公共生活。1956年11月2—4日,他出任伊姆雷·纳吉政府的国防部长。1957年,比博遭到逮捕,1958年被判处终身监禁,但在1963年获得特赦出狱。之后,他在匈牙利中央统计办公室担任研究员,直至退休。他的葬礼演变成反对卡达尔政权的示威活动;事实上,这也是反对派在当时发动的早期反政府公共活动之一。

博莱斯瓦夫·贝鲁特(Bierut, Bolestaw, 1892—1956) 波兰共产党政治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共产党活动的积极分子。在加入共产国际之前,他在苏联的党校完成学业,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1933—1938年,他因为参加共产党活动而在波兰被捕入狱,1939年获释后前往苏联,并为当时臭名昭著的政治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会(Nzirodnyĭ Komissariat Vnutrennikh Del, NKVD)工作。1943年他返回波兰,并于1945年成为国家领袖。1948年,他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52年出任政府总理,1954年辞去总理职务。他是波兰斯大林式统治的代表人物。

制度变革(Change of system) 在匈牙利,这一术语被广泛用来指称1988—1989年苏联、中欧和东欧的共产党制度几乎同时出现崩溃的现象。在此期间,独裁统治被民主政治取代,一党制被多党制取代,公有制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被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共产主义党国体制内部所出现的严重危机,导致雅诺什·卡达尔(请参见下文相关词条)在执政32年后的1988年5月辞职。自匈牙利执政党和反对党开始召开国家圆桌会议后,人们就回归民主政治的路线图逐渐达成一致。1989年10月初,前共产主义执政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Magyar Szocialista Munkáspárt, MSZMP)自动解散,10月23日,新的匈牙利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1990年3月,匈牙利举行自由普选,并且就此建立非共产党政府:这一事件被视作制度变革的起点。

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 一个国际性经济机构(1949—1991)。1949年1月,苏联和六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莫斯科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它的官方目标是帮助并协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在苏联的指导下,它实际上成为强迫各成员国必须进行专业化分工的机构,引起各国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该机构另外一个秘而不宣的目的在于,将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国家隔离。东欧国家的政治体制解体后,经济互助委员会随之解体。

匈牙利公社,即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Commune, Hungarian Soviet Republic, 1919) 俄国式的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也被称为"公社"或者"议会共和国"。1919年3月21日成立,同年8月1日结束,它在匈牙利的统治时间持续了133天。1918年10月31日爆发了所谓的菊花革命,通过这次革命,执政的民主政府被后来的公社所取代。1919年3月,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后,贝洛·库恩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接管国家政权。但是,迫于罗马尼亚军队入侵、民众不满、通

货膨胀和封锁导致的供应短缺等压力，共产党的领导者们辞去职务，并于 8 月 1 日逃往国外。

宪法法院(Constitutional Court) 匈牙利制度变革时期成立的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实体机构，由特别法官组成，效仿欧洲民主国家的法院，以保护民主立宪政体为宗旨。宪法法院独立于政党、政府的行政和立法机构以及其他司法机构(包括最高法院)。宪法法院于 1990 年 1 月 1 日开始工作，其任务包括考察立法或者国际条约是否违反宪法，解释宪法，鉴别法律和行为是否违反宪法，以及根据宪法内容处理人们的投诉。任何人或者组织都不能挑战宪法法院对于合宪性的裁决。宪法法院由 11 位法官组成，他们的任命都必须得到国会中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确认。他们的任期为 9 年，而且可以连任一次。

厄特沃什学院(Eötvös Collegium) 匈牙利最古老、久负盛名的学院。它位于布达佩斯，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为建校榜样。成立于 1895 年，致力于培养最优秀的师资。学院的教育不仅体现在高度专业的标准方面，而且体现在宽容民主的学术精神上，这在当时实属罕见。1949 年，斯大林式的政治体制不断加强，这所学院被迫关闭，原校址被改建成学生宿舍。

彼得·艾什泰哈齐(Esterházy, Péter, 1950—) 匈牙利作家。作品包括多部小说、短篇故事集和大量报刊文章。他出身于匈牙利最为知名的一个贵族家庭。在 2000 年出版的一部小说《天空的和谐：一部小说》中，他回忆了自己在共产党体制下度过的童年生活，同时描述了自己的家族跨越几个世纪的历史。两年后，他认为必须在小说修订版中补充一些他刚刚了解的早期事件的信息，即在共产党执政期间，他的父亲马蒂亚斯·艾什泰哈齐曾被秘密警察招募为告密者。艾什泰哈齐的散文通常表现出“后现代”特征。他是公认的语言大师，匈牙利语在他的文章中得以重生。他是匈牙利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米哈伊·法尔卡什(Farkas, Mihály, 1904—1965) 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家。“二战”前，他在国际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任职，并在许多西欧国家从事党务工作。之后的 1944 年底，他回到苏联。1945 年，担任匈牙利共产党副总书记，1948—1953 年，担任国防部部长。法尔卡什成功地在军队中建立起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并因为残暴和强烈的复仇心理而臭名昭著。他和马加什·拉科西(参见下文的词条)都要为斯大林时期政府对于人民的残酷镇压活动负主要责任。但是，拉科西成功地把所有责任推卸到法尔卡什的身上，因此，在 1956 年革命之前，法尔卡什就被捕了。1957 年，他被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不过在 1960 年的大赦中，他被释放。之后，他一直担任出版社的审稿人，直至去世。

德国占领匈牙利 1941 年，匈牙利宣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与德国结为同盟。1944 年初，德国感到匈牙利似乎是一个越来越难以信赖的同伴，因为随着战争局势的改变，匈牙利统治者米克洛什·霍尔蒂(参见下文的词条)开始变得犹豫不决，并且广为人知的是，匈牙利首相米克洛什·卡洛伊对于英国表示强烈的同情和支持。1944 年 3 月 19 日，希特勒命令德国军队袭击匈牙利，德军几乎未发一枪便占领了匈牙利。之后，大批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往死亡集中营。

厄尔诺·格罗(Gerő, Ernő, 1898—1980) 匈牙利共产主义政治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西班牙内战中担任政委。1945 年，他担任匈牙利交通部部长，并且积极参加提升共产党在匈牙利威信的各项活动。1953—1954 年，他担任匈牙利内务部部长，并且在 1956 年 7 月，马加什·拉科西被赶下台时，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斯大林时代的匈牙利四大核心领袖之一(另外三位是拉科西、约瑟夫·雷沃伊和米哈伊·法尔卡什，分别参见各自的词条)，格罗主要负责经济事务。他是共产党内部最出色的官僚和组织者。1956 年匈牙利革命期间，他逃往苏联，1960 年获准重返匈牙利。1962 年，他因为在拉科西时代从

事非法活动而被开除党籍，之后一直从事翻译工作。

公开性（俄语 Glasnost，字面意思是“公开性”） 1986 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政治主张，同时，还提出了新思维（perestroika，参见下面词条）。在受到某些限制的情况下，“公开性”的主张显著提高了苏联人民批评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由度。大量本着公开性精神的批评文章开始出现在苏联报纸上，因而为苏联学术界带来生机和活力，引发民众对于苏联体制中的无数弊端展开争论。更加开放的批评氛围，促使民众进一步要求国家进行民主化改革，有力推动了当时的局势发展，最终导致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解体。

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Goulash communism） 西方媒体在提及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开始日益巩固的卡达尔政权时用到的一个说法，借用了匈牙利人用牛肉烧制的一道菜。当时，许多匈牙利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有所提高，消费增加，政府的压迫放松，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更大的权利和自由。

伟大的分配制度（Great distribution systems） 匈牙利人普遍接受的一种表述，用来描述卡达尔时期继承下来的教育资助、医疗、养老和家庭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匈牙利政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起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虽然取得了某些重大成就，但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对于这些再分配制度的资助逐渐变得愈加困难，甚至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90 年后，政府在某些领域（如养老金制度）中开始进行实质性改革，但是对于其他领域的改革则非常有限。

米克洛什·霍尔蒂（Horthy，Miklós，也称纳吉巴尼奥伊·米克洛什·霍尔蒂，纳吉巴尼奥伊是加在贵族姓氏前面的附加词，1868—1957）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匈牙利国家领导人。霍尔蒂早年是一位海军军官，1918 年晋升为海军少将，负责指挥奥匈帝国的舰队。1919 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期间，他在塞格德（匈牙利一城市，当时被协约国军队占领）组建起“国民军”，并于 1919 年 11 月进军布达佩斯，在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进入布达佩斯。1920 年 3 月，他在已经取消君主制的匈牙利王国出任摄政王（国家元首），而且他的名字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匈牙利守旧主义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1944 年 10 月，他在德军的压力下被迫辞职，并且被软禁在巴伐利亚。此后的 12 年，他一直流亡葡萄牙，直至去世。

匈牙利国家圆桌会议（Hungarian National Roundtable Talks） 1989 年，匈牙利就共产党和国家的权力交接、向民主政治过渡等问题展开的讨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袖们，成为苏联集团中第一个宣布愿意实行多党制的共产党人。此后，匈牙利国内迅速成立了许多反对派团体和政党。1989 年 3 月 22 日，这些团体发起“反对派圆桌会议”，旨在就多党制达成共识。1989 年 6 月，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附属社会组织，与反对派圆桌会议代表举行会谈，以决定转轨的法律和政治条件。这一系列会谈被称为“国家圆桌会议”。同年 9 月，各方就制度变革（参见上文词条）达成一致，但是参加圆桌会议的某些反对派团体最终并未在协议上签字，他们对一些具体议题持不同意见。

1956 年匈牙利革命（Hungarian Revolution，1956 年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4 日） 这次革命开始于 10 月 23 日布达佩斯街头学生示威游行，当晚发展成武装起义。10 月 24 日，受到民众欢迎的共产党改革派伊姆雷·纳吉组建了新政府。革命者与匈牙利国家保安部队和苏联军队展开斗争，并取得胜利，迫使苏军撤离布达佩斯。10 月 30 日，一个多党派联合政府在匈牙利成立。由于在新政府成立之初，苏联便已经表现出武装干预的迹象，因此纳吉政府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保持中立。11 月 4 日，苏军再次进攻布达佩斯，并且建立了以雅诺什·卡达尔（参见下文关于雅诺什·卡达尔的词条）为首的反政府内阁。战斗持续了一个星期。这也是苏联集团成员国

内规模最大的一次反苏起义。革命失败后，政府对民众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报复性镇压，被法律认可的总理伊姆雷·纳吉及其同伴被处以死刑。

奥斯卡·亚西(Jászi, Oszkár, 1875—1957) 匈牙利社会学家、政治家和政治评论员。1900年，他创办了《20世纪》(*Huszadik Század*)杂志，并担任该杂志的编辑。1914年，他还组建了国家资产阶级激进党。作为米哈伊·卡罗伊(参见下文词条)的挚友和顾问，亚西是1918年匈牙利民主革命中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有一段时间，他在卡罗伊政府中负责少数民族事务。1919年匈牙利公社革命(参见上文的相关词条)时期，他离开匈牙利，前往维也纳，成为政治流亡者中的重要人物。亚西是匈牙利资产阶级激进派理论的领军人物，他尖锐地批评了苏联体制。此外，他是中欧国家民族和少数民族问题方面最权威的学者。由于极端仇视共产党，1945年后就不能回匈牙利了。

雅诺什·卡达尔(Kádár, János, 1912—1989) 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家。"二战"之前，他就加入了当时还属于非法组织的匈牙利共产党，并多次被捕入狱。在1948—1950年担任内务部部长期间，他和其他领导者一道残酷镇压民众。1951年，他本人也因为遭到诬陷而被捕入狱，1954年获释。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中，他被任命为伊姆雷·纳吉政府中的一位部长，但在同年11月4日，他组建了忠于苏联的反政府内阁。1956年11月，他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党新任领袖，并且成为匈牙利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直至1988年5月才辞去这个职务。与卡达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1956年匈牙利革命失败后政府对于人民的血腥报复。1963年以后，他推行"温和的"独裁统治，人民受到的压迫才有所缓和。

费伦茨·考林蒂(Karinthy, Ferenc, 1921—1992) 匈牙利作家、翻译家和记者，弗里吉斯·考林蒂(参见下文相关词条)之子。他的昵称"奇尼"在匈牙利家喻户晓。弗伦茨早期专攻语言学，之后投身写作，1951—1953年担任《自由人民报》和《匈牙利民族报》的自由撰稿人。除了小说和戏剧之外，他的作品还包括大量报刊文章，以及他死后出版的生前坚持数十年所写的日记。他的幽默风趣、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体育运动的热情，使他成为匈牙利知识精英的一种特殊现象。

弗里吉斯·考林蒂(Karinthy, Frigyes, 1887—1938) 匈牙利作家、诗人和翻译家。作为个性独特的著名文学家，他是匈牙利文学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之一。他创作了大量幽默而怪诞的作品，因此被视为匈牙利天才的小丑。他的滑稽之作《你像这样写作》，把匈牙利作家和非匈牙利作家的各种写作风格放到哈哈镜前。他对匈牙利城市方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创作出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包括从新闻报道到戏剧、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到诗歌的各种文学体裁。1936年，他在瑞典接受了脑瘤手术。康复后，他创作了《环绕头骨的旅行》，客观描述了他的病情和治疗过程。

米哈伊·卡罗伊(Károlyi, Mihály, 1875—1955) 匈牙利政治家。他出身于一个守旧而富有的贵族家庭。1910年，他进入议会。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建立了一个反对党，并且提出一个计划，包括在匈牙利实行普选制、秘密投票以及匈牙利与协约国和平共处。在1918年10月的民主革命中，他被任命为总理，从1919年1月开始，他担任匈牙利共和国临时总统，直至同年3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才卸任。1919年7月，他离开匈牙利，在巴黎和伦敦生活了几十年，并且日益同情和支持共产党。1923年，匈牙利正处在保守的民族主义政府统治之下，政府在对他的缺席审判中宣布他犯有叛国罪，并处没收全部财产。1946年他回到匈牙利，并于1947年接受了匈牙利驻巴黎大使一职，但在1949年，为了抗议政府对劳伊克的审判(参见下文相关词条)，他愤而辞职，并再次流亡国外。

拉约什·科苏特(Kossuth, Lajos, 1802—1894) 匈牙利政治家。科苏特是匈牙利首届独立议会政府(1848年)的财政部长,匈牙利独立战争(1848—1849年)的主要政治领袖,短暂的匈牙利独立政府(1849年)的国家领导人。1848年之前,他是匈牙利国内自由化和激进改革的主要倡导者,但是在独立战争(1849年)失败后,科苏特认为匈牙利重获独立是他的主要目标。从1849年起,他先后流亡至英格兰和意大利,即使在1867年之后,他的流亡生活仍然没有结束,因为他强烈反对匈牙利和奥地利正式签署的和解协议。1851—1852年间,他在英格兰和美国长期巡回演讲,不遗余力地宣传匈牙利的独立事业。从1861年直到去世,他一直居住在意大利的都灵。科苏特是匈牙利历史上最重要和最受民众欢迎的人物之一,是重要的政治作家和演说家。他的文章和演讲被匈牙利人民广为引用。

富农(Kulaks) 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对于富裕农民阶层的称谓,斯大林政府宣布他们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1948—1949年,匈牙利政府模仿这种模式,划分富农阶层,并对这一阶层课以重税,施加超过其能力范围的各种义务。许多富农被迫迁移或入狱。在第一届伊姆雷·纳吉政府执政期间,这些富农的境况略有好转。1954年,匈牙利彻底废除富农制度。

匈牙利改革辩论中的"左翼"力量 1968年1月开始推行的"新经济机制"的巨大反对力量,猛烈抨击匈牙利的改革尝试。一些政治家和共产党知识精英担心,这次改革会导致过去社会主义制度所坚持的平等、集体主义和社会公平等价值观遭到抛弃。他们认为,拒绝中央计划和给予企业有限的独立性等措施,是"小资产阶级贪得无厌"和"个人主义"取得胜利的结果,这些措施与共产主义世界观背道而驰。匈牙利政党组织的保守派中,逐渐发展出所谓的工人反对派,并且得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联政府的支持(当时新斯大林主义政治路线在苏联得以加强)。由于1972—1974年这一团体的压力,匈牙利政府被迫推迟很多年才实行新经济机制计划中的许多改革措施。匈牙利知识分子依据共产主义世界观,反对改革,支持苏联式经济管理模式的呼声持续高涨,直到匈牙利制度变革(参见上文相关词条)时才停止。

群众组织(Mass organizations) 共产党泛指隶属于党和国家的各大规模社会组织和协会的术语。在匈牙利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群众组织垄断本领域内的所有活动,如工会、妇联、共青团、作家协会,等等。各个群众组织的主管机构只是在名义上行使权力,事实上,群众组织的所有决定都由党和政府做出,而且执行决定的官员也由党和政府任免。群众组织的功能是把党的观点和希望传达给本组织面向的社会阶层(例如工人、青年和妇女等)。

《人民自由报》(*Népszabadság*) 匈牙利发行量最大的政治日报。最早出现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时期。11月2日,刚刚成立不久的匈牙利社会工人党发行了《人民自由报》的创刊号。它的前身是执政党的喉舌《自由人民报》(*Szabad Nép*),本书作者曾在这家报社工作,该报后在革命时期停止发行。《人民自由报》甚至取代了《自由人民报》,成为卡达尔执政时期匈牙利的中央党报。1989年10月8日,制度变革时期,它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义报纸。1994年,它停止使用报头中的"社会主义"一词。

伊什特万·厄尔凯尼(Örkény, István, 1912—1979) 匈牙利作家。他曾学习化学工程和药学。1941年,他发表了第一部作品。1942年,他应征服劳役。1943年,他被苏军俘虏并关押,直至1946年才获释。他刚刚回到匈牙利时,曾担任出版社的审稿人,并为报纸撰稿。但是,由于他曾参加1956年匈牙利革命,因此,被禁止发表作品数年。在此期间,他在一家制药厂担任工程师。1963年,厄尔凯尼再次开始以写作为生。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一分钟故事》中,他通过描述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怪诞和荒谬现象,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创作的戏剧《托特一家》和《猫戏》

成为匈牙利国内外最受欢迎的作品，并且先后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

党校(Party college) 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机构。这些学校通常是寄宿制的，开设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党史的课程。只有得到共产党推荐的人员才具备入学资格。1945 年春天，为了培养新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匈牙利共产党创办了党校。匈牙利最优秀的党校，当属布达佩斯市卡罗丽娜街的党校。推荐某人到党校学习，通常代表党对他的充分信任。

人民大学(People's college) 匈牙利在 1945—1949 年建立的寄宿制学校，贫困工人和农民家庭的有才华的年轻人，在这里接受高等教育。人民大学的前身是 20 世纪 30 年代末建立的博尧伊学院(后更名为哲尔菲学院)。在哲尔菲学院校友的发起下，匈牙利建立了人民大学，并且学校数量迅速增加。1946 年，匈牙利成立了全国性的人民大学联合会(Népi Kollégiumok Országos Szövetsége，NÉKOSZ)。由于这场运动是在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因此人民大学学生在匈牙利建立共产党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然而，从 1948 年春天开始，这一组织因为过于独立自主而遭到匈牙利共产党的干预和抨击。1949 年 6 月，人民大学联合会解散，各个人民大学也随之关闭。

"人民作家"("People's writers") 20 世纪 20 年代末出现的运动。匈牙利语 *népi írók* 在英语中的意思是不确定的，"人民的"(people's)或者"大众的"(popular)等释义都不能准确反映匈牙利语 *népi* 的含义。"人民作家"指在政治运动中关注普通民众利益的作家。最积极的人民作家通常出身于农民家庭，或者愿意为农民阶级献身。他们在文学作品和社会学著作中描述了匈牙利社会的落后以及农民阶级所面临的困境。他们认为，当前社会中出身高贵的中产阶级，以及"与农民阶级格格不入的"城市资产阶级缺乏信誉。他们相信，解决他们眼中的匈牙利国家危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为农民阶级提供教育，培养新兴的中产阶级，并且用它来取代上文提及的社会阶层。这场运动的代表性观点是农民—民主激进主义和对理想化农民生活方式的尊重，而隐藏在这种政治观点和思想后面的是极其复杂多变的世界观：支持这一运动的人包括同情共产党的人、追随西欧式民主政治的左翼社会主义人士和追随匈牙利某些极右翼政党的右翼人士。部分"人民作家"在保护国家和匈牙利文化的设想中掺杂了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仇外思想的成分。这一运动的黄金时代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但是至今对于匈牙利思想界仍然有着强烈的影响。这一运动的代表作家有拉斯洛·内梅什、久洛·伊耶什、约瑟夫·埃尔代伊、彼得·韦赖什、盖佐·费尧、雅诺什·科多拉尼和费伦茨·艾尔代伊。

新思维(Perestroika，俄语字面意思是"转轨")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试验。苏联于 1986 年制定了"新思维"计划，旨在改革国家和社会结构，以提高苏联的国力。但是几年之后，随着苏联几经改革的失败和社会不满情绪高涨，"新思维"计划全面崩溃。虽然这次改革宣称是为了加强苏联国力，事实上却启动了导致苏联政权在政治上解体的进程。

山多尔·裴多菲(Petőfi，Sándor，1823—1849) 匈牙利诗人。他在匈牙利诗坛横空出世时尚不足 20 岁。由于他的诗歌激情澎湃，具有预见性，因此短短几年后，他便成为同时代中最受欢迎的诗人和领军人物。在他的政治诗篇中，他坚决捍卫人民的权利，拥护国家独立。1848 年 3 月 15 日匈牙利革命爆发时，人们在没有得到奥地利审查机构通过的情况下，将裴多菲尖锐抨击时事的诗歌《民族之歌》在报纸上发表。这一事件标志着新闻界开始为自由而斗争。在极具影响力的组织"青年匈牙利"中，裴多菲是领导者之一，并且在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参加立法机构的

竞选，但是其激进的共和主义观点遭到其他政治力量的孤立，最终未能当选。1848 年底，他以军官的身份参加了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独立战争，随后在抵抗俄国沙皇军队的瑟克什堡战役中失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匈牙利人民都无法接受他已经牺牲的说法。有人传说他躲藏起来，也有人说他被囚禁在西伯利亚。裴多菲是匈牙利最著名的诗人。

波兰圆桌会议(Polish roundtable talks) 1989 年 2—4 月在波兰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会议启动了波兰向民主政治转变的进程。波兰民众对于经济危机的不满，以及随之爆发的罢工浪潮，迫使波兰党和政府代表坐下来，与团结工会(参见下文相关词条)领导人进行谈判。波兰团结工会起初被政府视为非法组织，后来在 1989 年 2 月获得法律认可。在这次公开会谈中，党和政府领导人同意在局部地区举行自由选举。按照协议，新成立的上院立法机构，即参议院的所有议席将通过自由选举产生，但是，在制定决策的国民议会中，执政党仍然保留 65%的席位。让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大吃一惊的是，在自由选举中，所有参议院议席和 35%的下院席位都由团结工会候选人获得。共产党被迫接受团结工会候选人塔德乌斯·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波兰总理，并且与团结工会成立联合政府。1991 年，波兰举行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选举。

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共产党改革试验，目的在于建立“人道社会主义”。这次事件的起因是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计划。苏联领导层担心这一改革进程会导致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格局向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发展，因此，在施加外交压力劝说捷克斯洛伐克领导者改变立场无果后，于 1968 年 8 月 20 日悍然出动《华沙条约》成员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强行终止这一改革。杜布切克政府很快被赶下台。他的继任者古斯塔夫·胡萨克在东欧建立起压迫性最强的反改革社会主义体制。

拉斯洛·劳伊克(Rajk, László, 1909—1949) 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他都被关押在匈牙利的监狱里。获释后没多久，他便参加了反抗德国的武装斗争。1945 年，他成为最受民众欢迎的共产党人之一，尤其受到青年知识分子的拥护。1946—1948 年，他在担任内务部部长期间，曾策划多次肃反运动。他本人在 1949 年被捕，在政府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的公开审讯中，他与其他人一起被执行死刑。1955 年，他获得平反，并于 1956 年 10 月 6 日重新安葬。当时，数十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并进而演化成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示威游行。

马加什·拉科西(Rákosi, Mátyás, 1892—1971) 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家。1919 年，拉科西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担任高级官员，之后他移居海外，为共产国际工作。1925 年，他秘密返回匈牙利后，被政府逮捕并处 15 年有期徒刑。在匈牙利政府与苏联政府进行的一次人员交换活动中，他获准在 1940 年移民到苏联。1945 年，他以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身份重返匈牙利。1948 年，他清除了所有其他政治力量，亲自监督和一手建立起苏联式的一党制。1952 年，他出任匈牙利政府总理。拉科西具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博学。他在匈牙利不仅单纯模仿斯大林式的统治，而且努力提前猜测斯大林的愿望，并且尽量超越这些愿望。1953 年 6 月，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领导人强迫拉科西辞去总理职务，但是他仍然担任共产党的领袖，并且在 1955 年再次担任政府最高职务。1956 年 7 月，他被解除所有职务并流亡苏联，最终在流亡中死去。

约瑟夫·雷沃伊(Révai, József, 1898—1959) 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918 年，雷沃伊和其他人一同成立了匈牙利共产党，1919 年，他开始流亡维也纳、布拉格和莫斯科，直至 1944 年 10 月才回到匈牙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的斯大林时代，他是匈牙利四大核心领导人之一(其他三位分别是马加什·拉科西、厄尔诺·格罗和米哈伊·法尔卡什，参见相关词条)。1945—1950 年，他担任匈牙利最重要的共产党日报《自由人民报》总编。1949—1953 年，

他担任文化部部长。当时，他是匈牙利最重要的思想家，是国家文化生活的最高领导。但是，随着1953年伊姆雷·纳吉发起的政治变革，他被解除所有实权。

匈牙利"右派"，1953—1956年 主要由支持伊姆雷·纳吉改革计划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匈牙利共产党内部一个派别。1955年4月，随着以马加什·拉科西（参见上文相关词条）为首的斯大林主义政治势力逐步收复党内最高控制权，这一团体被指控犯有"右倾倾向危及党和社会主义"罪行。1955年改革的忠实追随者几乎都被排除在权力之外，或者被撤职。1956年春，右派知识分子开始组织反斯大林主义的运动，诸如裴多菲俱乐部的辩论和拉斯洛·劳伊克（参见上文相关词条）重新安葬等公共事件都发生在这次运动中，这些为十月革命的准备发挥了重要作用。1956年革命失败后，许多在政府清洗活动中幸存下来的"右倾分子"，都成为卡达尔时期民主反对派的核心人物。

地下出版物（Samizdat，来源于俄语 *sam* + *izdatelstvo*，字面意思是"自己出版"） 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得到政府批准而非法印制并发行的政治文章或文学作品。20世纪70年代中期，匈牙利开始出现地下出版物。

1956年围攻电台 1956年10月23日，在布达佩斯市中心的匈牙利电台大楼外举行的和平抗议活动，但随后演变成武装冲突。23日下午，大批游行者聚集在国家安全警察守卫的电台大楼外，要求电台播出抗议者提出的"十六点要求"。但是，共产党领导人不允许电台这么做。因此，当共产党领导人厄尔诺·格罗（参见上文相关词条）在23日晚8点的广播讲话中，威胁要对抗议者采取报复措施时，抗议人群虽然没有任何武装，却被进一步激怒了。随后，安全警察几次开火驱散抗议人群，但是到那时候，抗议人群已经获得武器，他们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围攻电台大楼。武装对抗一直持续到拂晓时分，起义的人群控制了局势。这是武装起义和匈牙利革命开始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

团结工会（Solidarity，波兰语为 Solidarność） 1980年8月，在格但斯克港口的造船厂爆发大范围的工人罢工，同年9月成立的波兰工会组织和政治运动被称为波兰团结工会。该组织是苏联集团国家中第一个独立的工会组织。鉴于团结工会的影响力不断增长，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兼波兰总理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1981年12月颁布戒严令，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组织，并且开始逮捕其领导人。但是团结工会继续开展地下工作。1989年，共产党领导人承认它的合法地位，并且允许它参加波兰圆桌会议（参见上文相关词条）。

小农党（Smallholder's Party，Független Kisgazdapárt，FKgP） 1930年，在基督教—民族主义霍尔蒂体制下建立的独立小农民、农场工人和市民党，是农民阶级中的反对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小农党迅速成为匈牙利最大的政党，其成员主要来自反对左派观点和信仰宗教的人。1945年11月，尽管以绝对优势在首次自由选举中胜出，但是迫于苏联的压力，不得不与左翼政党组成联合政府。独立小农党的领导人蒂尔迪·佐尔坦担任匈牙利共和国首任总统。但是共产党假借联合政府的名义，利用政治阴谋、非法手段和苏联当局的积极干涉等各种手段，在1947年将小农党全面摧毁。小农党最重要的领导人或者被逮捕，或者流亡国外。然而，小农党里的部分政客却与共产党讨价还价，赋予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帮助其建立斯大林体制。第二年，小农党在政府中已经变得无足轻重，随着匈牙利一党制的建立，几乎完全消亡。1956年革命期间，小农党曾一度恢复活动，蒂尔迪在伊姆雷·纳吉政府中担任部长。1989年匈牙利制度变革期间，小农党再次出现，在首次自由选举中成为第三大党。后来，小农党日益转向民粹主义，由于内部意见分歧，最终于千禧年之际分裂。

伊什特万·塞切尼(Széchenyi, István, 1791—1860) 出身于匈牙利最富有和最有声望的一个贵族家庭。1825年,他将自己一年的房产收入捐献出来,创建了匈牙利科学院的前身,这件事使得他广为人知。1830年,他所著的《信誉》面世,书中所阐述的他的经济和政治思想被视为开启了匈牙利的改革时代。他的书对于公众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塞切尼曾帮助政府组织对多瑙河的监管工作,并修建了连接布达和佩斯的第一座永久性桥梁——链桥。他在第一届匈牙利独立议会政府(1848)中担任交通和公共工程部部长。塞切尼的同代人以及后人都视他为"最伟大的匈牙利人",送给他这一称号的不是别人,正是拉约什·科苏特(参见上文相关词条)。科苏特在19世纪40年代曾与塞切尼就国家转型问题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公开辩论。1848年9月,塞切尼因精神错乱而被送入精神病院,直到去世。他在精神病院完成了反对哈布斯堡王朝暴政的小册子,并且通过非法途径出版发行,为此,他遭到警察的干扰。最终,他以自杀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安托尔·塞尔布(Szerb, Antal, 1901—1945) 文学史家、小说家和散文家。他的两部主要著作《匈牙利文学史》(1934)和《世界文学史》(1941)描述了文学领域的重大历史变化。这些著作的写作受到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历史哲学思想的影响,表现出卓越的分析能力、轻松的风格和含蓄的幽默。塞尔布虽然只是一位高中教师,却在1937年被授予大学荣誉教授,不过他从未在任何大学任职。他的小说《月光之旅》和悬疑犯罪小说《王侯传说》在匈牙利广为流传,最近还被西方国家引进。其作品的特点是将几种文学体裁——犯罪故事、游记与小说、散文糅合在一起。塞尔布拥有犹太血统,但是从出生起就是一个天主教徒。1942年,他失去工作,其著作也被禁止出版,并且此后再也无法发表作品。1943—1944年,他应征服劳役。1945年2月,在匈牙利西部的一个劳工集中营里,由于遭受残忍的虐待而去世。

瓦尔特·乌尔布里希(Ulbricht, Walter, 1893—1973) 民主德国共产党政治家。1923年,他进入德国共产党领导层,1928年成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逃往国外,并为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国际工作。1945年,乌尔布里希从苏联返回德国,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并在民主德国建立了与斯大林体制相一致的政治体制。1971年,乌尔布里希被迫辞去所有党内职务,但是直至去世,他仍是国家元首。

文塞斯劳斯广场(Wenceslaus Square,即 Václavské náměstí) 位于布拉格旧城中心的一个广场。在捷克斯洛伐克制度变革(又称"天鹅绒革命")过程中,文塞斯劳斯广场是一个重要场所。1989年11月,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那里举行了一系列示威活动。11月17日,示威者开始向文塞斯劳斯广场进发,却遭到国内治安部队的袭击,五百多名群众在袭击中受伤。此后,布拉格经常爆发几十万人的示威游行。在公众压力下,共产党的整个领导层被迫解散,古斯塔夫·胡萨克也辞去国家元首职务。民主派反对党"公民论坛"组建了联合政府。12月底,反对党里的著名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当选总统。1990年6月,反对党"公民论坛"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劳动竞赛(Work contests) 斯大林主义国家以提高产量为目标发起的生产运动。其中最著名的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起的、以煤矿工人A. G. 斯达汉诺夫命名的劳动竞赛。斯达汉诺夫完成的工作量通常要超过定额数倍。企业必须超额完成计划目标,个人也必须超额完成计件工作定额。1949年春,匈牙利第一次组织劳动竞赛运动。竞赛中表现突出的工人,被授予"斯达汉诺夫式工人"的称号,并且在奖金、住房或休假上获得奖励。此外,政府还对他们大肆宣传。由于人们在劳动竞赛中完成的工作量远远超过现实可行的工作定额,这会导致上级不断提高产量定额,所以严重损害工人的健康。同时,这些劳动竞赛也削弱了工人之间的团结合作。1977年,安杰依·瓦伊达拍摄的电影《大理石人》生动描述了这些"斯达汉诺夫式工人"的命运。

参考文献

科尔奈的著作

专著

Kornai, János. 1948. Marx Tőké-je magyarul (Marx's *Capital* in Hungarian). *Társadalmi Szemle* 3 (8–9), pp. 615–619.

———. 1951a. A megnövekedett feladatok terve (Plan for increased tasks). *Szabad Nép*, January 9, p. 1.

———. 1951b. A munkaidő jobb kihasználásáért (For the better utilization of working hours). *Szabad Nép*, July 4, p. 1.

———. 1951c. A takarékosság—a munkaverseny egyik központi feladata (Economic efficiency—the key task in a work contest). *Szabad Nép*, March 18, p. 1.

———. 1951d. Kövessük a csepeli példát (Let us follow the example of Csepel). *Szabad Nép*, April 7, p. 5.

———. 1954a. A Központi Vezetőség iránymutatásával tovább a júniusi úton (Further along the June road with the Central Leadership pointing the way). *Szabad Nép*, October 11, p. 3.

———. 1954b. A villamosenergia kérdése (The question of the electric power). *Szabad Nép*, February 11, p. 1.

———. 1954c. "Egy évtized" Nagy Imre elvtárs válogatott beszédei és írásai ("One decade": Selected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Comrade Imre Nagy). *Szabad Nép*, October 6, pp. 2–3.

———. 1955. A "Tőkéről" és a szocializmus közgazdasági kérdéseiről (On "Das Kapital" and the economic questions of socialism). Manuscript.

———. 1956. Gyökerestül irtsuk ki a bürokráciát (Uproot bureaucracy once and for all). *Szabad Nép*, October 14, pp. 3–4.

———. 1958. Kell-e korrigálni a nyereségrészesedést? (Should the profit-sharing [system] be corrected?). *Közgazdasági Szemle* 5 (7), pp. 720–734.

———. 1959. "Mennyiségi szemlélet" és "gazdaságossági szemlélet" (The "quantitative outlook" and the "economic outlook"). *Közgazdasági Szemle* 6 (10), pp. 1083–1091.

———. 1967a. Anti-Equilibrium. Esszé a gazdasági mechanizmus elméleteiről és a kutatás feladatairól (Anti-Equilibrium: Essay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mechanism and on the tasks of research). Mimeographed. MTA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 Budapest.

———. 1967b.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of Long-Term Plans in Hungary. In *Activity Analysi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and Planning*, edited by Edmond Malinvaud and M. O. L. Bacharach, pp. 211–231. London: Macmill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1968. Anti-Equilibrium. Mimeographed. Institute of Economics,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Budapest.

———. 1972. *Rush versus Harmonic Growth: Meditation on the Theory and on the Policies of Economic Growth*.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1974. Az adaptáció csikorgó gépezete (The creaking mechanism of adaptation). Mimeographed. MTA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 Budapest.

———. 1975. *Mathematical Planning of Structural Decisions*. With contributions by Tamás Lipták and Péter Wellisch. 2nd enl. ed. Amsterdam: North-Holland;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65.)

———. 1978. John Michael Montias: The Structure of Economic System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 (2), pp. 277–292.

———. 1979. Resource-Constrained versus Demand-Constrained Systems. *Econometrica* 47 (4), pp. 801–819.

———. 1980.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1982. Comments on Tibor Liska's Concept of Entrepreneurship. *Acta Oeconomica* 28 (3–4), pp. 455–460.

———. 1983a. Comments on the Present State and Prospects of the Hungarian Economic Reform.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7 (3), pp. 225–252.

———. 1983b. The Health of Nations: Reflections on the Analogy between the Medical Sciences and Economics. *Kyklos* 36 (2), pp. 191–212.

———. 1984. Bureaucratic and Market Coordination. *Osteuropa Wirtschaft* 29 (4), pp. 306–319.

———. 1986a.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86b [1980]. Efficiency and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ist Ethics. In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Studies on the Socialist Economy and Society*, pp. 124–138.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86c.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Visions, Hopes, and Re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4 (4), pp. 1687–1737.

———. 1986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Kyklos* 39 (1), pp. 3–30.

———. 1988a.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Reform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2 (2–3), pp. 233–267.

———. 1988b. Report from the President to the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2 (2–3), pp. 737–739.

———. 1989. *Indulatos röpirat a gazdasági átmenet ügyében* (Passionate pamphlet in the cause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Budapest: HVG Kiadó.

———. 1990a [1957]. *A gazdasági vezetés túlzott központosítása*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1990b. Kiegészítések a "Röpirathoz" (Complements to the "Pamphlet"). *Közgazdasági Szemle* 37 (7–8), pp. 769–793.

———. 1990c.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Shifting from a Socialist System: The Example of Hungary*. New York: W. W. Nort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Hungarian in 1989.)

———. 1991. *Anti-Equilibrium: On Economic Systems Theory and the Tasks of Research*. 3rd ed. Amsterdam: North-Holland.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71.)

———. 1992a. The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and the State: Reflections in the Light of Hungarian Fiscal Proble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2), pp. 1–20.

———. 1992b. The Principles of Priv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De Economist* 140 (2), pp. 153–176.

———. 1992c.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d. Visszaesés, veszteglés vagy fellendülés (Recession, idling, or prosperity). *Magyar Hírlap*, December 24, pp. 12–13.

———. 1993a. The Evolution of Financial Discipline under the Postsocialist System. *Kyklos* 46 (3), pp. 315–336.

———. 1993b. Market Socialism Revisited. In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edited by Grethe B. Peterson, pp. 3–41.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 1994a. A legfontosabb: A tartós növekedés (Lasting growth as the top priority). Parts 1–5. *Népszabadság*, August 29, p. 11; August 30, p. 11; August 31, p. 11; September 1, p. 11; September 2, p. 11.

———. 1994b [1959].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Based on Experience in Hungarian Light Industry*. Translated by John Knap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Hungarian in 1957.)

———. 1994c. Péter György, a reformközgazdász (György Péter, the reform economist). In *Egy reformközgazdász emlékére: Péter György, 1903–1969*, edited by János Árvay and András B. Hegedűs, pp. 75–89. Budapest: Cserépfalvi Könyvkiadó–T-Twins Kiadó.

———. 1995a. *Highway and Byways: Studies on Socialist Reform and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95b. Lasting Growth as the Top Priority: Macroeconomic Tensions and Government Economic Policy in Hungary. *Acta Oeconomica* 47 (1–2), pp. 1–38.

———. 1997a. Adjustment without Recession: A Case Study of Hungarian Stabilization. In *Lessons from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1990s*, edited by Salvatore Zecchini, pp. 123–152.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OECD.

———. 1997b. *Struggle and Hope: Essays on Stabilization and Reform in a Post-Socialist Economy*.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 1998a. *Az egészségügy reformjáról* (On the reform of the health system).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1998b.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What Is Meant by the "Change of System"?* London: Centre for Post-Collectivist Studies.

———. 2000a. Hidden in an Envelope: Gratuity Payments to Medical Doctors in Hungary. In *The Paradoxes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edited by Lord Dahrendorf and Yehuda Elkana, pp. 195–214. Budapest: CEU Press.

———. 2000b. What the Change of the System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Does and Does Not Mea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4 (1), pp. 27–42.

———. 2001. Ten Years after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The Author's Self Evaluation. In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0*, edited by Boris Pleskovich and Nicholas Stern, pp. 49–66.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4. *What Can Countries Embarking on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s So Far?* Cuba Transition Project. Miami: Institute for Cuban and Cuban-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ami.

合著

Bognár, Géza, Róbert Gál, and János Kornai. 2000. Hálapénz a magyar egészségügyben (Gratuity payment in the Hungarian health care system). *Közgazdasági Szemle* 47 (4), pp. 293–320.

Csontos, László, János Kornai, and István György Tóth. 1998. Tax Awareness and Reform of the Welfare State: Hungarian Survey Result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6 (2), pp. 287–312.

Kornai, János, Zsuzsa Dániel, Anna Jónás, and Béla Martos. 1971. Plan Sounding. *Economics of Planning* 11 (1–2), pp. 31–58.

Kornai, János, and Karen Eggleston. 2001. *Welfare, Choice and Solidarity in Transition: Reforming the Health Sector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4. *Egyéni választás és szolidaritás. Az egészségügy intézményi mechanizmusának reformja Kelet-Európában* (Welfare, choice, and solidarity in transition: Reforming the health sector in Eastern Europe). Budapest: Nemzeti Tankönyvkiadó.

Kornai, János, János Kovács, and Ádám Schmidt. 1969. Észrevételek Intézetünk munkájához: Munkastílus, irányítás, nevelés, szervezet (Comments on the work of our institute: Working style, administration, education, and organization). Mimeographed. MTA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 Budapest.

Kornai, János, and Tamás Lipták. 1959. A nyereségérdekeltség matematikai vizsgálata (The mathematical analysis of profit incentives). Mimeographed.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Budapest.

———. 1962a. Kétszintű tervezés: Játékelméleti modell és iteratív számítási eljárás népgazdasági távlati tervezési feladatok megoldására (Two-level planning: A game-theoretical model and iterative computing procedure for solving long-term planning problem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MTA Matematikai Kutató Intézetének Közleményei* 7/B (4), pp. 577–621.

———. 1962b. A Mathematical Investigation of Some Economic Effects of Profit Sharing in Socialist Firms. *Econometrica* 30 (1), pp. 140–161.

———. 1971 [1965]. Two-Level Planning. In *Selected Readings in Economic Theory from Econometrica*, edited by Kenneth J. Arrow, pp. 412–440.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Kornai, János, and Béla Martos. 1973. Autonomous Control of the Economic System. *Econometrica* 41 (3), pp. 509–528.

——— (eds.). 1981. *Non-Price Control.* Amsterdam: North-Holland.

Kornai, János, Eric S. Maskin, and Gérard Roland. 2003. Understanding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1 (4), pp. 1095–1136.

Kornai, János, and Ágnes Matits. 1987. *A vállalatok nyereségének bürokratikus újraelosztása* (The bureaucratic redistribution of a firm's profit).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Kornai, János, and John McHale. 2000. Is Post-Communist Health Spending Unusual? A Comparison with Established Market Economie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8 (2), pp. 369–399.

Kornai, János, and Susan Rose-Ackerman (eds.). 2004. *Building a Trustworthy State in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Kornai, János, Bo Rothstein, and Susan Rose-Ackerman (eds.). 2004. *Creating Social Trust in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Kornai, János, and Jörgen W. Weibull. 1983. Paternalism, Buyers' and Sellers' Market. *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s* 6 (2), pp. 153–169.

其他人的文献

Aczél, Tamás, and Tibor Méray. 1960. *The Revolt of the Mind: A Case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Resistance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New York: Praeger.

Ady, Endre. 2004. *Ady Endre összes versei* (The complete poems of Endre Ady). Budapest: Osiris.

Aghion, Philippe, and Peter Howitt (eds.). 1998.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Akerlof, George A.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 (3), pp. 488–500.

Antal, László. 1982. Fejlődés kitérővel—A magyar gazdasági mechanizmus a 70-es években (Development with a detour: The Hungarian economic mechanism in the 1970s). *Gazdaság* 14 (2), pp. 28–56.

Arrow, Kenneth J. 1951.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the Theory of Choice in Risk-Taking Situations. *Econometrica* 19 (4), pp. 404–437.

——— (ed.). 1971. *Selected Readings in Economic Theory from Econometric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73a. Rawls's Principle of Just Saving.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75 (4), pp. 323–335.

———. 1973b [1963].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2nd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51.)

———. 1974. General Economic Equilibrium: Purpose, Analytic Techniques, Collective Choi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 (3), pp. 253–272.

Arrow, Kenneth J., Samuel Karlin, and Herbert E. Scarf. 1958. *Studies in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Inventory and Produ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abits, Mihály. 1998 [1936]. *Az európai irodalom története*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literature). Budapest: Merényi.

Bácskai, Tamás, and Elemér György Terták. 1983. Mesterséges érdek—növekedési kényszer (Artificial interest—Compulsion to growth). *Valóság* 26 (10), pp. 91–94.

Baráth, Magdolna. 1999. Az MDP vezetése és a rehabilitáció (The leadership of the MDP and the rehabilitation). *Múltunk* 44 (4), pp. 40–97.

Barro, Robert J., and Herschel I. Grossman. 1971. A General Disequilibrium Model of Income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 (1), pp. 82–93.

Bauer, Tamás. 1981. *Tervgazdaság, beruházás, ciklusok* (Planned economy, investment, cycles).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Bergson, Abram. 1948. Socialist Economics. In *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 edited by Howard S. Ellis, pp. 412–448. Philadelphia: Blakiston.

Blahó, Miklós. 2003. A fő cél a tartós növekedés. Interjú Kornai Jánossal (The main aim is lasting growth: Interview with János Kornai). *Népszabadság*, January 25, pp. 23, 27.

Blanchard, Olivier. 1999. An Interview with János Kornai. *Macroeconomic Dynamics* 3 (3), pp. 427–450.

Böhm-Bawerk, Eugen von. 1975 [1949].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Clifton, N.J.: A. M. Kelle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896.)

Bolygó, János. 1966. Mit kutatott professzor Montias Magyarországon? (What did Professor Montias research in Hungary?). *Magyar Nemzet*, July 3, p. 7.

Bosworth, Barry P. 1990. Which Way to the Market?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y 27, p. 17.

Boulding, Kenneth E. 1966. *Economic Analysis*. 4th 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41.)

Braham, Randolph L. 1981. *The Politics of Genocide: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2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rámer, Frigyes. 1997 [1972]. Koncentrációs tábor a Rabbiképző épületében (Concentration camp in the Rabbinical Seminary building). In *Évkönyv*, edited by Sándor Scheiber, pp. 219–228. Budapest: Magyar Izraeliták Országos Képviselete.

Bródy, András. 1956. A hóvégi hajrá és gazdasági mechanizmusunk (End-of-month rush and our economic mechanism). *Közgazdasági Szemle* 3 (7–8), pp. 870–883.

———. 1970. *Proportions, Prices, and Planning: A Mathematical Restatement of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Hungarian in 1969.)

"Bureaucrats at Large." 1960.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April 15, p. 244.

Camus, Albert. 1991 [1948]. *The Plague*. Translated by Stuart Gilbert.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in 1942.)

Carlin, Wendy, Steven Fries, Mark E. Schaffer, and Paul Seabright. 2001. *Competition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a Cross-Country Survey*. EBRD Working Paper 62. London: EBRD.

Chikán, Attila (ed.). 1989. *Készletek, ciklusok, gazdaságirányítás. A magyar gazdaság készletalakulása és befolyásoló tényezői, 1960–1986* (Stocks, cycles, economic management: The position of the Hungarian economy's stocks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it, 1960–1986).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2004. A hiány szerepe az átmenet szellemi előkészítésében (The role of "The Economics of Shortage" in the intellectual preparation for the change of system). *Magyar Tudomány* 49 (7), pp. 698–707.

Coles, Peter. 1999. *Einstein and the Total Eclipse*. Cambridge: Icon Books.

Csoóri, Sándor. 1990. Nappali hold. II. rész (Daytime moon: Part 2). *Hitel* 3 (18), September 5, p. 5.

Dahl, Robert A. 1979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ebreu, Gérard. 1965 [1959]. *Theory of Value: An Axiomatic Analysis of Economic Equilibrium*. New York: Wiley.

Denton, Nicholas. 1990. On the Brink of Transformation.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7, p. 2.

Deutscher, Isaac. 1968 [1949].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vons, Ely. 1959. A Study in Central Planning: Evidence from Inside. *The Guardian*, October 22, pp. 10–11.

Dewatripont, Mathias, and Eric S. Maskin. 1995. Credit and Efficiency in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Economies. *Review of Economic Sudies* 62 (4), pp. 541–555.

Djankov, Simeon D., and Peter Murrell. 2002.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A Quantitative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0 (3), pp. 739–792.

Donáth, Ferenc (head of the editorial board). 1981. Bibó-emlékkönyv (In memory of Bibó). 2 vols. Samizdat.

Dorfman, Robert, Paul A. Samuelson, and Robert M. Solow. 1987 [1958]. *Linear Programming and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Draaisma, Douwe. 2004. *Why Life Speeds Up When You Get Older: How Memory Shapes Our P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rant, Will. 1991 [1926]. *Story of Philosophy: The Lives and Opinions of the Greater Philosopher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Ericson, Richard E. 1994. Book Review.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8 (3), pp. 495–497.

Esterházy, Péter. 2003. Mik vogymuk. 1. könyv. (What are we: Book 1). *Élet és Irodalom*, May 9, p. 3.

Esze, Zsuzsa. 1956. Egy kandidátusi értekezés vitája (Discussion of a candidate's dissertation). *Közgazdasági Szemle* 3 (11–12), pp. 1483–1495.

Eucken, Walter. 1951 [1940].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ejtő, Ferenc. 1957. La première autocritique des "Communistes Nationaux" hongrois. *France Observateur* 8 (January 31), p. 6.

Fóthy, János. 1945. *Horthyliget—A magyar ördögsziget* (Horthy-liget—The Hungarian Devil's Island). Budapest: Müller Károly Könyvkiadóvállalat.

Frey, Bruno S. 2003. Publishing as Prostitution? Choosing between One's Own Ideas and Academic Failure. *Public Choice* 116 (1–2), pp. 205–223.

Frisch, Ragnar. 1961. A Survey of Types of Economic Forecasting and Programming, and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Channel Model. Mimeographed. Oslo: University of Oslo.

Friss, István. 1957. Népgazdaságunk vezetésének néhány gyakorlati és elméleti kérdéséről (Some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questions of managing the economy). *Népszabadság*, October 2, pp. 3–4.

Gábor, R. István, and Péter Galasi. 1981. *A "második gazdaság": Tények és hipotézisek* (The "second economy": Facts and hypotheses).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Gács, János, and János Köllő (eds.). 1998. *A "túlzott központosítástól" az átmenet stratégiájáig: Tanulmányok Kornai Jánosnak* (From "overcentralization" to the strategy of transition: Studies for János Kornai).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Gáll, Ernő. 2003. *Napló* (Diary). Vol. 1. Budapest: Polis Könyvkiadó.

Gans, Joshua S., and George B. Shepherd. 1994. How Are the Mighty Fallen: Rejected Articles by Leading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8 (1), pp. 165–179.

Gimes, Miklós. 1956. Magyar Szabadság (Hungarian freedom). *Magyar Szabadság*, October 29, p. 1.

Goldfeld, Stephen M., and Richard E. Quandt. 1988. Budget Constraints, Bailouts and the Firm under Central Planni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2 (4), pp. 502–520.

———. 1990. Output Targets,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nd the Firm under Central Plann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4 (2), pp. 205–222.

———. 1993. Uncertainty, Bailouts, and the Kornai Effect. *Economics Letters* 41 (2), pp. 113–119.

Gregory, Paul R., and Robert C. Stuart. 1980.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2004.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7th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Grossfeld, Irena. 1989. Disequilibrium Models of Investment. In *Models of Disequilibrium and Shortage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edited by Christopher Davis and Wojciech W. Charemza, pp. 361–374. New York: Chapman and Hall.

Gulyás, Emil. 1957–1958. Az árutermelés, értéktörvény és pénz a szocializmusban (Production, the law of value, and money in socialism). Manuscript.

Gy [pseud.]. 1991. Skizze eines Reformprogramms am Beispiel Ungarns. *Neue Zürcher Zeitung* Fernausgabe, June 30–July 1, p. 7.

Haberler, Gottfried von. 1964.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Cyclical Movements*. 5th ed. London: Allen and Unwin.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37.)

Hahn, Frank. 1973. 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 *Economica* 40 (159), pp. 322–330.

Halda, Alíz. 2002. *Magánügy. Dokumentum/regény* (Private affair: Documentary/novel). Budapest: Noran.

Hašek, Jaroslav. 2000 [1973]. *The Good Soldier Švejk and His Fortunes in the World War*. Translated by Cecil Parrott. London: Pengui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zech in 1920–1923.)

Hayek, Friedrich A. von (ed.). 1975 [1935].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Critical Studies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m*. Clifton, N.J.: A. M. Kelly.

———. 2001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Routledge.

Hegedűs, András. 1990. A bolsevik grand-seigneur tragédiája (The tragedy of the Bolshevik *grand seigneur*). *Pesti Hírlap*, November 3, p. 8.

Heisenberg, Werner. 1967 [1958]. Az elemi részek (Elementary particles) (Lecture presented in Budapest). *Válogatott tanulmányok* (Selected papers), pp. 219–237. Budapest: Gondolat.

Heller, Farkas. 1988. *Közgazdaságtan* (Economics). 2 vols. 5th ed.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12–1920.)

Hicks, John R. 1937. Mr. Keynes and the Classics: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Econometrica* 5 (2), pp. 147–159.

———. 2001 [1939]. *Value and Capital: An Inquiry into Som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íd-csoport. 1990. Híd a közeli jövőbe (Bridge to the near future). *Közgazdasági Szemle* 37 (4), pp. 442–458.

Hirschman, Albert O. 1988 [1958].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ffman, David E. 2002. *The Oligarchs: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New Russi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Huizinga, Johan. 1996. *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 Translated by Rodney J. Payton and Ulrich Mammitzs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Dutch in 1919.)

Hungaricus [Sándor Fekete]. 1959 [1956–1957]. *Quelques enseignements de la révolution nationale et démocratique hongroise*. Brussels: Imre Nagy Institute.

———. 1989 [1956–1957]. *Az 1956-os felkelés okairól és tanulságairól* (On the causes and lessons of the 1956 uprising). Budapest: Kossuth Könyvkiadó.

József, Attila. 1997. *Winter Night: Selected Poems*. Translated by John Bátki. Oberlin, Ohio: Oberlin College Press.

———. 2003. *József Attila összes versei* (Complete poems of Attila József). Budapest: Osiris.

Juhász, Andor. 1934. *Halló, itt London!* (Hallo, it's London!). Budapest: Révai.

Kalecki, Michał. 1965.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 An Essay on Cyclical and Long-Run Changes in Capitalist Economy*. 2nd ed. London: Allen and Unwin.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54.)

Karagedov, Rajmond G. 1982. Mechanizm funkcionirovaniya socialisticheskoy ekonomiki (Mechanism of the function of a socialist economy). *Isvestija Sibirskava Otdeleniya Akademij Nauk SSSR* 3 (11), pp. 115–128.

Kardelj, Edvard. 1982. *Reminiscences: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and Independence: The New Yugoslavia, 1944–1957*. London: Blond and Briggs–Summerfield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Serbo-Croatian in 1980.)

Karinthy, Ferenc. 1994. *Napló* (Diary). Budapest: Littoria.

Karinthy, Frigyes. 2001 [1914]. A felelős ember (The man in charge). In *Humoreszkek*, 2:155–157. Budapest: Akkord.

Karsai, Gábor. 1993. A szocializmus genetikai programja (The genetic program of socialism). *Figyelő* 37, November 11, pp. 17–19.

Kék Szalag Bizottság 1990. *[A Bizottság] Gazdasági Programjavaslata* (Recommendations for an economic program). Budapest: Kék Szalag Bizottság.

Kende, Péter. 1955. Kritikai jegyzetek a marxizmus gazdasági tanaihoz (Critical remarks on the economic theories of Marxism). Manuscript.

———. 1959. L'intérêt personnel dans le système d'économie socialiste. *Revue Economique* 10 (3), pp. 340–364.

———. 1964. *Logique de l'économie centralisée. Un exemple: la Hongrie*. Paris: Société d'Éducation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e.

———. 1966. *A Szabad Nép szerkesztőségében. Tanulmányok a magyar forradalomról* (In the editorial offices of Szabad Nép: Studies on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Munich: Aurora.

Kenedi, János. 1981. *"Tiéd az ország, magadnak épited"* (The country is yours, you build it for yourself). Paris: Magyar Füzetek Könyvei.

———. 1996. *Kis állambiztonsági olvasókönyv. Október 23.—március 15.—június 16* (Small state security reader: October 23—March 15—June 16). 2 vols. Budapest: Magvető.

Keynes, John M. 1997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Klaniczay, Gábor. 2003. *Ellenkultúra a hetvenes-nyolcvanas években* (Counterculture in the '70s and '80s). Budapest: Noran.

Klaus, Václav, and Dušan Tříska. 1997 [1994]. Review of János Kornai's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In *Renaissance: The Rebirth of Liberty in the Heart of Europe*, by Václav Klaus, pp. 163–169.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Koestler, Arthur. 1993 [1941]. *Darkness at Noon*. Translated by Daphne Hardy. New York: Bantam Books.

Koopmans, Tjalling C. 1957. *Three Essays on the State of Economic Science*. New York: McGraw-Hill.

Koopmans, Tjalling C., and John M. Montias. 1971. On the Description and Comparison of Economic Systems. In *Comparison of Economic Systems*, edited by Alexander Eckstein, pp. 27–7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ovács, András. 1968. Falak (Walls). *Új Írás* 8 (3), pp. 28–48.

Kovács, Imre. 1989 [1937]. *A néma forradalom* (The silent revolution). Budapest: Cserépfalvi–Gondolat–Tevan.

Kö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 1996. *Magyar Statisztikai Évkönyv, 1995* (Hungary's statistical yearbook, 1995). Budapest: Kö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

Krausz, Tamás. 1994. A történetietlen politikai gazdaságtan (A non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 *Eszmélet* 6 (24), pp. 157–178.

Kuhn, Thomas S. 1996.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62.)

Laczik, Erika. 2005. Egy besúgó tisztikereszttel (An informer with an Officer's Cross). *Magyar Nemzet*, January 29, pp. 1, 5.

Laibson, David, and Richard Zeckhauser. 1998. Amos Tversky and the Ascent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16 (1), pp. 7–47.

Laki, Mihály. 1989. Az új politikai szervezetek a gazdaságpolitikáról és a gazdaságirányításról (The new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about the economic policy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Tervgazdasági Fórum* 5 (4), pp. 1–16.

———. 1990. Rendszerváltás küszöbén. Az ellenzéki pártok gazdaságpolitikai programjai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change of system: The economic policy programs of the opposition parties). Mimeographed. Közgazdasági Információs Szolgálat, Budapest.

Lange, Oskar. 1968 [1936–1937].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In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edited by Benjamin E. Lippincott, pp. 57–143. New York: McGraw Hill.

Leijonhufvud, Axel. 1968. *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 A Study in Monetary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ngyel, László. 2002. *A távol közelében. Kérdez: Hankiss Elemér* (Near to far away. The interviewer: Elemér Hankiss). Budapest: Helikon Kiadó.

Lengyel, László, and Miklós Polgár. 1980. Gazdasági elvek, etikai elvek—és a valóság (Economic principles, ethical principles, and reality). *Valóság* 23 (9), pp. 101–107.

Lenin, Vladimir I. 1964 [1920]. 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In *Collected Works*, 31:17–118.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Lerner, Abba P. 1975 [1944]. *Economics of Control: Principles of Welfare Economics*. New York: A. M. Kelley.

Lindbeck, Assar. 197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Left: An Outsider's View*. 2nd 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71.)

———. 1988. Individual Freedom and Welfare State Polic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2 (2–3), pp. 295–318.

Lindblom, Charles E. 1977.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Liska, Tibor. 1988 [1966]. *Ökonosztát: Felkészülés a mechanizmusreformra* (Econostat: Preparation for reforming the mechanism).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Liska, Tibor, and Antal Máriás. 1954. A gazdaságosság és a nemzetközi munkamegosztás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Közgazdasági Szemle* 1 (1), pp. 75–94.

Liska, Tibor F. 1998. A Liska-modell (The Liska Model). *Közgazdasági Szemle* 45 (10), pp. 940–953.

Lőcsei, Pál. 1995. "Politikai és lelkiismereti lázadás volt..." (It was a political and moral rebellion). *Respublika* 2 (13), pp. 36–40.

Lukács, György. 1973 [1945].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In Lukács, *Marxism and Human Liberation: Essays on History, Culture and Revolution*, edited by E. San Juan Jr., pp. 267–276. New York: Delta.

———. 1978 [1950]. *Studies in European Realism: A Sociological Survey of the Writings of Balzac, Stendhal, Zola, Tolstoy, Gorki, and Others*. Translated by Edith Bone. London: Merlin Press.

Magyar Dolgozók Pártja Központi Vezetősége (Central Leadership of the Hungarian Workers' Party). 1955. A Magyar Dolgozók Pártja Központi Vezetőségének határozata a politikai helyzetről és a párt feladatairól (The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Leadership of the Hungarian Workers' Party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party's tasks). *Szabad Nép*, March 9, pp. 1–2.

Malinvaud, Edmond. 1967. Decentralized Procedures for Planning. In *Activity Analysi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and Planning*, edited by Edmond Malinvaud and M. O. L. Bacharach, pp. 170–208. London: Macmill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alinvaud, Edmond, and M. O. L. Bacharach (eds.). 1967. *Activity Analysi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and Planning*. London: Macmill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arx, Karl. 1992.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lated by Ben Fowkes (vol. 1) and David Fernbach (vols. 2 and 3). London: Penguin Book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867, 1885, and 1896.)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2002 [188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ranslated by Samuel Moore. London: Penguin Book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848.)

Maskin, Eric S., and András Simonovits (eds.). 2000. *Planning, Shortage, and Transform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János Kornai*.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Matolcsy, György. 1997. Kiigazítás recesszióval. Kemény költségvetési és puha piaci korlát (Adjustment with recession: Hard budget constraint and soft market constraint). *Közgazdasági Szemle* 44 (9), pp. 782–798.

McCloskey, Deirdre N. 1998.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2nd e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85.)

McKenzie, Lionel W. 1959. On the Existence of General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Market. *Econometrica* 27 (1), pp. 54–71.

Molnár, Endre. 1957. Revizionista nézetek a szocialista állam gazdasági szerepéről (Revisionist views on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socialist state). *Társadalmi Szemle* 12 (2), pp. 44–59.

Montias, John M. 1976. *The Structure of Economic System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2. *Arts and Artisans in Delft: A Socio-Economic Study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9. *Vermeer and His Milieu: A Web of Social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2. *Art at Auction in 17th Century Amsterdam*.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Müller, Rolf. 1999. Napi operatív információs jelentések, 1979–1989 (The daily operative information reports, 1979–1989). In *A Történeti Hivatal Évkönyve 1999*, edited by György Gyarmati, pp. 251–284. Budapest: Történeti Hivatal.

Nagy, Csaba. 1994. Lázadás a Szabad Népnél 40 évvel ezelőtt. Beszélgetés Lőcsei Pállal és Méray Tiborral (Rebellion at *Szabad Nép* 40 years ago: A conversation with Pál Lőcsei and Tibor Méray). *Kritika* 23 (10), pp. 10–11.

Nagy, Imre. 1954. *Egy évtized. Válogatott beszédek és írások (1948–1954)* (One decade: Selected speeches and writings, 1948–1954). Budapest: Szikra.

Neumann, John von. 1963 [1955]. The Impact of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cience on the Economy and on Economics. In *Collected Works*, 6:100–101. New York: Macmillan.

Nove, Alec. 1960.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Economica* 27 (108), pp. 389–391.

———. 1992. No Third Way? *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 June 19, p. 23.

Novobáczky, Sándor. 1956. Különös emberek (Strange people). *Irodalmi Újság*, October 6, p. 1.

Nozick, Robert. 1998 [1974].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Oxford: Blackwell.

Nyíri, Sándor. 1994. A Péter György elleni büntetőeljárás (The criminal case against György Péter). In *Egy reformközgazdász emlékére: Péter György, 1903–1969* (In memory of a reform economist: György Péter, 1903–1969), edited by János Árvay and András B. Hegedűs, pp. 45–47. Budapest: Cserépfalvi Könyvkiadó–T-Twins Kiadó.

Ortega y Gasset, José. 1993 [1932].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New York: W. W. Nort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Spanish in 1929.)

Orwell, George. 1966 [1949]. *Nineteen Eighty-four*. Harmondsworth: Penguin.

Papandreou, Andreas G. 1972. *Paternalistic Capitalism*. Minneapolis: Unive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assel, Peter. 1990. Socialist Eggs, Market Omelet. *New York Times*, April 11, p. 2.

Péter, György. 1954. A gazdaságosság jelentőségéről és szerepéről a népgazdaság tervszerű irányításában (On the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efficiency in the plan-based management of the economy). *Közgazdasági Szemle* 1 (3), pp. 300–324.

———. 1956. A gazdaságosság és a jövedelmezőség jelentősége a tervgazdaságban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profitability in the planned economy). *Közgazdasági Szemle* 3 (6), pp. 695–711; (7–8), pp. 851–869.

———. 1957. A gazdasági vezetés túlzott központosítása. Kornai János tanulmányáról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On János Kornai's study). *Magyarország* 1 (1), p. 2.

Péteri, György. 1997. New Course Economics: The Field of Economic Research in Hungary after Stalin, 1953–1956.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6 (3), pp. 295–327.

———. 1998. *Academia and State Socialism: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Academic Life in Post-1945 Hungary and Eastern Europe.* Highland Lakes, N.J.: Atlantic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 (ed.). 2001. *Intellectual Life and the First Crisis of State Socialism in East Central Europe, 1953–1956.* Trondheim Studies on East European Cultures and Societies, no. 6. Trondheim: Program on East European Cultures and Societies.

Phillips, Albin W. 1958. 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61–1957. *Economica* 25 (2), pp. 283–299.

Pigou, Arthur C. 2002 [1952].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4th ed.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20.)

Pogonyi, Lajos. 2003. A munkásosztály megsemmisítése. Interjú Vajda Mihállyal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workers' class: Interview with Mihály Vajda). *Népszabadság*, October 15, p. 14.

Portes, Richard, and David Winter. 1980. Disequilibrium Estimates for Consumption Goods Markets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7 (1), pp. 137–159.

Qian, Yingyi. 1994. A Theory of Shortage in Socialist Economies Based on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1), pp. 145–156.

Rainer, M. János. 1999. *Nagy Imre—Politikai életrajz* (Imre Nagy: A political biography, vol. 2, 1953–1958). Budapest: 1956-os Intézet.

Rawls, John. 1999. *A Theory of Justice.* Rev.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lknap Press.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71.)

Réti, Pál. 1989. Miénk az ország (The country is ours). *Heti Világgazdaság*, November 11, pp. 3–5.

Révész, Sándor. 1999. *Egyetlen élet. Gimes Miklós története* (One single life: The story of Miklós Gimes). Budapest: 1956-os Magyar Forradalom Történetének Dokumentációs és Kutatóintézete–Sík Kiadó.

Réz, Pál. 1961. Thomas Mann and Hungary—His Correspondence with Hungarian Friends. *New Hungarian Quarterly* 2 (3), pp. 84–99.

——— (ed.). 1991. *Bibó-emlékkönyv* (In memory of Bibó), by Ferenc Donáth. Budapest: Századvég; Bern: European Protestant Hungarian Free University. (First available in a samizdat edition, 1981.)

Ripp, Géza. 1957. Revizionizmus "az új gazdasági mechanizmus" leple alatt (Revisionism under the veil of the "New Economic Mechanism"). *Népszabadság*, July 23, p. 3.

Ripp, Zoltán (ed.). 2000. *A rendszerváltás forgatókönyve. Kerekasztal-tárgyalások 1989-ben* (The script of the change of system. The roundtable negotiations in 1989). Vol. 5. Budapest: Új Mandátum.

R.N.W.O. 1959. Iron Curtain Economy.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28, p. 12.

Roland, Gérard. 1987. Investment Growth Fluctuations in the Soviet Union: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1 (2), pp. 192–206.

———. 1990. On the Meaning of Aggregate Excess Supply and Demand for Consumer Goods in Soviet-Type Economi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4 (1), pp. 49–62.

Rosovsky, Henry. 1990. *The University: An Owner's Manual*. New York: W. W. Norton.

Rosser, J. Barkley, Jr., and Marina V. Rosser. 2004. *Comparative Economics in a Transforming World Economy*. 2nd e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96.)

Salgó, István. 1990. Les propositions de l'économiste János Kornai provoquent un vif débat. *Le Monde*, April 20, p. 3.

Samuelson, Paul A. 1980. *Economics*. 11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48.)

———. 1983.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Enl.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47.)

———. 1990. For Plan to Reform Socialism, Listen to János Kornai.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4, p. 7.

Sartre, Jean-Paul. 1990 [1957]. *Existentialism and Human Emotions*. New York: Carol Publication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in 1946.)

Schama, Simon. 1989.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Schelling, Thomas C. 1980 [1960].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chneider, Erich. 1962. *Money, Income, and Employment*. Translated by Kurt Klappholz. New York: Macmilla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49.)

Schumpeter, Joseph. 1983 [193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Translated by Redvers Opi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11.)

———. 1987.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6th ed. London: Unwin.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42.)

Scitovsky, Tibor. 1992. *The Joyless Economy: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Satisfaction and Consumer Dissatisfaction*. Rev.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ed. published in 1976.)

Semjén, András. 1990. A műtétet az orvosnak is túl kell élnie (The operation must be survived by the surgeon, too). *Figyelő*, February 22, p. 7.

Sen, Amartya K. 1977. Rational Fools: A Critique of the Behaviou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6 (2), pp. 317–344.

———. 1988. Freedom of Choic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2 (2–3), pp. 269–294.

———. 1997 [1982]. *Choice, Welfare and Measure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hove, Gerald F. 1942. The Place of Marshall's *Princip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y. *Economic Journal* 52 (208), pp. 294–329.

Simon, Herbert A. 1979.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in Business Organiz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9 (4), pp. 493–513.

Simonovits, András. 2003. A magyar szabályozáselméleti iskola (The Hungarian school of control theory). *Közgazdasági Szemle* 50 (5), pp. 465–470.

Solow, Robert. 2000. Stability and Growth: Commentary on a Commentary. In *Planning, Shortage, and Transform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János Kornai*, edited by Eric S. Maskin and András Simonovits, pp. 407–412.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Spengler, Oswald. 1991 [1965].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Abridged by Helmut Werner; English abridged ed. prepared by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18–1922.)

Spulber, Nicolas. 1960.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A Critical Analysis Based on Experience in Hungarian Light Indust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0 (4), pp. 763–764.

Stackelberg, Heinrich von. 1952 [1943]. *The Theory of the Market Economy*. London: William Hodge.

Stalin, Joseph V. 1949 [1940].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Russian in 1938.)

———. 1953 [1940]. On the Death of Lenin—A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Second All-Union Congress of Soviets, January 26, 1924. In *J. V. Stalin, Works*, 6:47–53.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Streeten, Paul. 1959. Unbalanced Growth.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s. (11), pp. 167–190.

Such, György, and István János Tóth. 1989. A magyar közgazdaságtudomány a Közgazdasági Szemle tudománymetriai vizsgálatának tükrében (Hungarian economic science in the mirror of the scientometric analysis of *Közgazdasági Szemle*). *Közgazdasági Szemle* 36 (10), pp. 1163–1241.

Szabó, Zoltán. 1986 [1936]. *A tardi helyzet* (The Tard story).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Kossuth Könyvkiadó–Magvető.

Szakolczai, Attila. 2001. *Az 1956-os forradalom és szabadságharc* (The 1956 Revolution and War of Independence). Budapest: 1956-os Intézet.

Szalay, László. 1994. Előhang 1954-ből: a Szabad Nép taggyűlése (Overture from 1954: Th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meeting at *Szabad Nép*). *Világosság* 35 (10), pp. 48–56.

Szegő, Andrea. 1983. Érdek és gazdasági intézményrendszer (Interest and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al system). *Valóság* 26 (6), pp. 22–36.

———. 1991. The Logic of a Shortage Economy: A Critique of Kornai from a Kaleckian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13 (3), pp. 328–336.

Szegvári, Iván. 1990. Az egységesség mítosza. Vita az "Indulatos röpirat"-ról (The myth of unity: Debate on the "Passionate pamphlet"). *Figyelő*, February 11, p. 5.

Szénási, Sándor. 1983. Pató Pál elvtárs. Interjú Antal Lászlóval (Comrade Pál Pató: An interview with László Antal). *Élet és Irodalom*, November 11, p. 7.

Szerb, Antal. 2003a [1941]. *A világirodalom történet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Budapest: Magvető.

———. 2003b [1934]. *Magyar irodalomtörténet* (History of Hungarian literature). Budapest: Magvető.

Tamás, Gáspár Miklós. 1989. A Kornai-bomba (The Kornai bomb). *Heti Világgazdaság*, November 11, p. 66.

Tardos, Márton. 1982. Program a gazdaságirányítási és szervezeti rendszer fejlesztésére (A program to develop the system of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the system of organization). *Közgazdasági Szemle* 19 (6), pp. 715–729.

———. 1988a. A gazdasági szervezetek és a tulajdon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ownership). *Gazdaság* 22 (3), pp. 7–21.

———. 1988b. A tulajdon (Property). *Közgazdasági Szemle* 35 (12), pp. 1405–1423.

Thassy, Jenő. 1996. *Veszélyes vidék* (Dangerous territory). Budapest: Pesti Szalon.

Tinbergen, Jan. 2004 [1951]. *Econometrics*. London: Routledg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Dutch in 1941.)

———. 1981 [1969]. The Use of Models: Experience and Prospec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 (6), pp. 17–22.

Vasziliu, Georgiosz. 1999. *"Nagyon jó egyetemre jártam, a magyar forradalom egyetemére" Georgiosz Vasziliu elmondja életét Hegedűs B. Andrásnak* (I studied at a very good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Vassiliou Georgios speaks about his life to András B. Hegedűs). Budapest: 1956-os Intézet.

Veres, Péter. 1997 [1939]. *Gyepsor. Elbeszélések, versek* (Gyepsor: Stories and poems). Budapest: Szabad Föld.

Vida, István. 1992. Sajtófogadás 1956. november 3-án. A Nagy Imre-per irataiból (Press conference on November 3, 1956: From the documents of the Imre Nagy case). *Rubicon* 3 (7), pp. 31–34.

Yergin, Daniel, and Joseph Stanislaw. 1998.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索 引

（根据英文版索引编辑）

Academic career depending on publications，依赖出版的学术生涯，95，199，200，271，274

Aczél，György，捷尔吉·阿克塞尔，283，423

Adjustment and stabilization program，调整和稳定计划，377—379

Adviser（political，governmental），顾问（政治顾问，政府顾问），283，284，373，375，384—387

Ady，Endre，安德烈·奥蒂，30，140

Aghion，Philippe，菲利普·阿吉翁，272

Ajtai，Miklós，米克洛什·阿杰泰，92

Akerlof，George，乔治·阿克洛夫，301

Albert，Michel，米歇尔·阿尔贝，331

Allais，Maurice，莫里斯·阿莱，162

Alliance of Free Democrats（Szabad Demokraták Szövetsége，SZDSZ），自由民主联盟，384，385，388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经济评论》，110，270，271，274，275

Antal，László，拉斯洛·安托尔，280，287

Antall，József，约瑟夫·安托尔，384

Anti-Equilibrium，反均衡，181—183，185，187，203，221，231，242，251，284，329

Anti-Semitism，反犹主义，26，28，429

Aoki，Masahiko，青木昌彦，309

Appointment，university，大学的任职，199，200，310，311；～的程序，302—307；～与出版，200，274—276

Approach（methodology），方法（方法论），比较～，165，166，319；历史～，350，369；负面与正面的～，88，192—194，342，358，395，398

Arany，János，雅诺什·奥拉尼，11，310

Arrow，Kenneth J.，肯尼思·J.阿罗，177，178，183 n.，192，224，300，353 n.，图 21

Arrow-Debreu theory，阿罗—德布鲁理论，182，187；不可能定理，272，288；其他著作，142，197，234，255，266

Association of Young Democrats（Fiatal Demokraták Szövetsége，FIDESZ），青年民主党联盟，384—386，387

Asymmetric information，theory of，信息不对称理论，300

Attachment 依恋，对匈牙利的～，317—319，327，328；对犹太人的～，4，27—29，400，401

Augusztinovics，Mária（Guszti），玛丽亚·奥古斯丁诺维奇，143

Auschwitz，奥斯威辛，4，14，401

Autonomous control，自动控制，参见 Control

Autonomous nervous system，自动神经系统，231

Babits, Mihály,米哈伊尔·鲍比契,31
Bácskai, Tamás, 陶马什·巴奇考伊,166, 167, 170, 291
Bajt, Aleksander,亚历山大·鲍伊特,331
Balcerowicz, Leszek,莱塞克·巴尔采罗维奇,330
Balzac, Honoré de,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1, 33
Barro, Robert J.,罗伯特·J.巴罗,251, 313, 314
Barro-Grossman model,巴罗—格罗斯曼模型,252
Bartók, Béla,贝洛·巴托克,318, 319, 402
Bator, Francis(Feri Bátor),巴托尔·弗兰西斯,325,图 98
Bauer, Tamás, 陶马什·鲍尔,208, 210, 328
Beijing,北京,239, 330, 332
Benedict, Ágnes,阿格尼斯·本尼迪克特,324
Berend T., Iván,伊万·贝伦德·T., 289, 290
Bergson, Abram, 艾布拉姆·伯格森,127, 150, 308
Berliner, Joseph,约瑟夫·贝林纳,110
Berlin Wall, 柏林墙,255, 353, 354, 407, 418, 421, 423
Betlen, Oszkár,奥斯卡·贝特伦,41, 42, 49, 66, 424
Bibó, István,伊斯特万·比博,253, 254, 420
Bierut, Bolesław,博莱斯瓦夫·贝鲁特,26, 424
Blanchard, Olivier,奥利弗·布兰查德,197
Blind letters,匿名信,304, 305, 307
Boat conference(Bashan Lun) in China,中国巴山轮会议,331—333
Bokros, Lajos,拉约什·博克罗什,378
package,包装,378—380
Bossányi, Katalin,卡塔林·博沙尼,377
Boston,波士顿,309, 322—325, 333, 336, 355, 399, 410, 411
Breuer, Marcel,马塞尔·布鲁尔,299
Bródy, András,安德拉什·布罗迪,76, 87, 138, 143, 144, 249, 252
Brus, Włodzimierz,弗洛基缅什·布鲁斯,282 n.
Budget constraint,预算紧缩,硬～, hardening of, 261, 262, 264, 267, 389;软～, 131, 261—269, 280—333
Bukharin, Nikolay,尼古拉·布哈林,66
Buyer-seller asymmetry, 买方卖方不对称,193, 229

Cairncross, Alexander,亚历山大·凯恩克劳斯,331
Calcutta(Kolkata),加尔各答,238, 239
Cambridge, Massachusetts,麻省剑桥,307—310, 320, 321, 326
Cambridge, UK,英国剑桥,127, 140, 161, 162, 317
Camus, Albert,阿尔贝·加缪,401
Capital(Marx),《资本论》(马克思),31—34, 42, 80, 81, 144, 195
Ceauşescu, Nicolae,尼古拉·齐奥塞斯库,281
Censorship,检查制度,174, 175, 249, 250;自我审查,246—248, 259, 260, 265, 266
Central Bank Council of Hungary,匈牙利中央银行委员会,390, 391
Centralization versus decentralization,中央集权与民主制,62, 63, 127, 147, 281, 330;经济组织中的～,49, 85—89
Central Leadership, Central Committee,中央领导,中央委员会,69, 70,147, 216, 418, 420;会议,57, 65, 66, 68
Chakravarty, Sukhamoy,苏卡哈莫伊·恰卡瓦蒂,162, 238, 338
Chavance, Bernard,贝尔纳·沙旺斯,334,图 66
Chikán, Attila,阿蒂拉·奇坎,214, 253, 254 n.

China,中国,222, 330—333, 393, 419
Chou Enlai,周恩来,347, 348
Chubais, Anatoly, 阿纳托利·丘拜斯,255
Clinton, Bill,比尔·克林顿,313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of,认知失调理论,52
Collectivization,集体化,61, 345, 419
Collegium Budapest,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302 n., 402—405
COMECON(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经济互助委员会,101, 294, 418, 419, 424
Command economy,指令经济,101, 185, 279, 282, 332
Communism,共产主义,～解体,232, 339, 353—355, 424;土豆炖牛肉,369, 380, 426;改革,58, 209, 255, 430
Communist Party,共产党,匈牙利以外国家的～,92, 238, 295, 393;令人失望, 58—63, 65—70, 111;对～的认同,23—25, 37—39;～行话, 58, 108 n., 170, 171, 对～的忠诚,39, 43, 109 n., 167;对～的垄断,47, 58, 348, 349, 393, 395;～的角色, 218, 282, 341, 345, 348
warrior, worker,工人斗士,24, 25, 47, 50
Competition,竞争,186, 193, 194, 245, 381;不完全～,163
Computer simulation techniques, 计算机模拟技术,223
Conflict of commitment,信任的冲突,314
Consistency(moral),一贯性(道德),111, 203, 319, 356
Control,控制,自治,230—235;based on inventory level, 基于库存水平的～,231;正常的～,232
Cooperatives(collective farms),集体农庄,58, 101, 134
Coordination,协调,官僚～,291, 345, 395;市场～,63, 126, 291, 293, 395
Cost-benefit analysis, 成本收益分析, 140, 142, 145 n.
Csáki, Csaba,乔鲍·恰基,213
Csendes, Béla,贝洛·琴代什,76
Csikós-Nagy, Béla,贝洛·奇科什-纳吉,100
Csoóri, Sándor,山多尔·乔里,257, 401

Dahl, Robert A.,罗伯特·A.达尔,301
Dantzig, George,乔治·丹齐格,182
Deák, Andrea,安德烈·戴阿克,249
Debreu, Gérard,热拉尔·德布鲁,177, 178, 180, 268;阿罗—德布鲁理论,182, 187—189, 194, 198, 272
Debussy, Claude,克劳德·德彪西,6
Decision,决策,可比的与不可比的～,190;可重复的与不可重复的～,190—192
aspirant leader(adviser),雄心勃勃的领袖(顾问),72, 82, 214, 215
candidate of sciences(Ph. D. level),理工科博士候选人(博士水平),77, 78, 90, 92, 214;遴选程序,77, 78, 90, 214, 215
Democracy,民主,239, 258, 393, 396, 402;美国的～,230, 242 n., 400 n.;匈牙利的～, 102—104, 384, 385, 424, 426,工作场所, 58, 63, 101
Democratic opposition, 民主的对立面, 210, 430, 432
Democratism,民主主义,58
Dervis, Kemal,凯梅尔·德尔维什,227
Deutscher, Isaac,多伊彻·艾萨克,63
Devons, Ely,埃利·德文,161, 177
Dewatripont, Mathias,马赛厄斯·德瓦特里庞,268
Dewatripont-Maskin model,德瓦特里庞—马斯金模型,268—270
Diamond, Peter,彼得·戴蒙德,382
Discipline(plan, wage, work),学科(计划、工资、工作),50

Discrimination,歧视,10,26,28,29,276,306,401,409
Disequilibrium,失衡,凯恩斯学派的～,224,334 n.;～的诸种模型,248
Dissertation,论文,71,72,82,92,95
Diversity,多样性,312
Djankov, Simeon D.,西蒙·D.扬科夫,245 n.
Dlouhý, Vladimir,弗拉基米尔·德劳希,330
Dobb, Maurice,莫里斯·多布,127
Dömölki, Bálint,巴林特·德默尔基,159
Donáth, Ferenc,费伦茨·多纳特,99,102,257
Dorfman, Robert,罗伯特·多尔夫曼,326
Dostoyevsky, Fyodor Mikhailovich,陀思妥耶夫斯基,11,33
Drèze, Jacques,雅克·德雷泽,329,338
Durant, Will,威尔·杜兰特,11

Econometrica,经济计量学,141,142,146,155,162,172,173,184,234,250,251,252,274,276,329,381
Econometric Society,经济计量学会,154 n.,250,273 n.,329,330
Economic policy,经济政策,～的形成,156,371,390—392;～建议,328,339,376,383,395
Economics.经济学,行为～,191;比较～,343,389,～主流,126,149,184,189—191,196,199;～中的数学方法,137—160,208,234;福利～,46,102,126,149—151,159,219,226,245,305,307,308,330,343,361,375,381—383,386,397,426
Economics of Shortage, The,短缺经济学,188,229,232,235—237,241,259,264,266,269,271,274,284,291,301,302,328,333,338,341,347,388,389,399,412
Efficiency, economic,经济效率,50,131,145,292,330
Egalitarianism,绝对平等主义,46
Eggleston, Karen,卡伦·伊格莱斯顿,325,382,图44
Einstein, Albert,阿尔伯特·爱因斯坦,299,354
Eisenhower, Dwight D.,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205
Ellman, Michael,迈克尔·埃尔曼,164
Emigration, émigrés,移民,6,27 n.,165,223;巴黎的政治移民,9,65;1956年后移民潮,114,191;～问题,135,225,317,319,335 n.
Emminger, Otmar,奥特玛·埃明格,330
Engels,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恩格斯,31,33,195,345
Equilibrium,均衡,竞争性～,194,195;总体～,128,147,181—184,194,195;市场～,183,192;价格～,128;瓦尔拉斯～,149,244,251
Erdős, Péter,彼得·埃尔德什,81,108,111,235
Ericson, Richard,理查德·埃里克松,349
Esterházy, Péter,彼得·艾什泰哈齐,1,200 n.,425,图115
Esze, Zsuzsa,茹饶·埃塞,107
Ethics,伦理学,幻灭,61,280;～基础,61,382,385;～问题,166,167,257—259,296,314,357;～条件,313—315;社会主义～,283 n.,288—292
Ethnic minorities,少数民族,400,427
Eucken, Walter,瓦尔特·倭肯,125,126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EEA),欧洲经济协会,329,330
Excess demand,过度指令,147,151,231,251
Excess supply,过度供给,147,231,251
Exchange rate,汇率,143,280,282,283,364 n.,391
Exit(Hirschman),出口(赫希曼),220,221,

273

Fairness in distribution,分配公平,239
Faluvégi, Lajos,拉约什·法卢韦纪,249, 259, 283
Family(author's),(作者的)家族,1—21, 46, 47, 86, 106, 210 n., 304 n., 317, 318, 405, 406, 410—412;～成员,39 n., 52, 95, 100, 110 n.,124, 151 n., 221—224, 241 n., 243 n.,249 n., 268 n., 311 n., 326 n., 356
Farkas, Kati,考蒂·法尔卡什,206, 328
Farkas, Mihály,米哈伊·法尔卡什,67, 68, 425, 430
Fehér, Lajos,拉约什·费赫尔,65, 66, 69, 105, 121
Fejtő, Ferenc,费伦茨·费伊特,119, 120
Fekete, Sándor,山多尔·费克特,65, 79, 80, 114, 115, 121;～与匈牙利案件,79 n., 119, 120, 130, 131, 139, 141
Feldstein, Martin,马丁·费尔德斯坦,313, 363, 382
Fellner, William(Vilmos),威廉·费尔纳(威尔默斯),165, 318
Five-year plan,五年计划,58, 61, 62, 418
Flaubert, Gustave,古斯塔夫·福楼拜,11
Fock, Jenő,耶诺·福克,112
Fónyi Gézőné(Auguszta, Duci),福尼·盖佐尼(奥古斯塔,杜琪),48, 49 n., 124
Forced substitution, 237, 245, 251—252
Foreign indebtedness,外债,281, 398
Formalization of theories,理论的形成,234, 273, 276
France, Anatole,安纳托尔·法朗士,11
Freud, Sigmund,西格蒙德·弗洛伊德,5, 372
Frey, Bruno,布鲁诺·弗雷,275, 276
Friedman, Milton,米尔顿·弗里德曼,270, 364
Friendship, friends,友谊,朋友,6, 9, 48, 120—122, 166, 224, 323—328, 405, 406
Frisch, Ragnar,拉格纳·弗里施,125, 150 n., 157, 221
Friss, István,弗里斯·伊什特万,作为经济研究所所长的～,73, 94, 105, 108, 109;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42, 48, 64;～的人格,109, 113, 131, 203—206
Full employment,充分就业,289

Gács, János,雅诺什·加齐,207, 236, 328, 407,图 100
Gaidar, Yegor,叶戈尔·盖达尔,255
Galbraith, John Kenneth,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313,图 107
Galileo Galilei,伽利略·加利莱,92, 132
Gáll, Ernő,艾尔诺·加尔,45
Game theory,博弈论,146, 198, 268, 269
Geertz, Clifford,克利福德·格尔茨,292
German occupation,德国占领,4, 7, 417, 425
Gerő, Ernő,艾尔诺·格罗,37, 42, 49, 50, 51, 64, 67, 139 n.
Gerschenkron, Alexander,亚历山大·格申克隆,406
Gimes, Miklós,米克洛什·吉迈什,9, 41, 49, 55, 62, 65, 73, 75, 77, 95, 97, 99, 100, 103—106, 114, 118, 119, 166, 356, 419,图 7;革命时期的～,55, 99, 100, 104, 105, 113, 117;～案件,106 n., 118, 419
Glasnost,公开性,157, 211, 420, 426
Gogh, Vincent van, 文森特·梵·高,323
Göncz, Árpád,阿尔帕德·根茨,119 n., 256 n.,图 112
Gorbachev, Mikhail,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255, 282 n., 355, 420
Gorky, Maxim, 马克西姆·高尔基,125
Granick, David, 戴维·格拉尼克,110,图 20
Green, Jerry, 杰里·格林,308
Gregory, Paul R.,保罗·R.格里高利,292

Griliches, Zwi,兹维·格里利谢斯,326
Grosfeld, Irina,伊丽娜·格罗斯菲尔德,233
Grossman, Herschel I.,赫歇尔·I.格罗斯曼,252;Barro-Grossman model, 巴罗—格罗斯曼模型,252
Growth,增长,和谐～,221—223,～理论,222,270;～不平衡,222
Gyorskocsi utca prison, 监狱,19, 59, 61, 65, 77, 99, 106, 114, 115, 117, 121, 122, 140, 141, 167, 205, 214, 282, 419, 430

Haberler, Gottfried von,哥特弗里德·冯·哈勃勒,125
Hahn, Frank,弗兰克·哈恩,162, 187 n., 200, 223, 329
Halda, Alíz, 阿里兹·海尔达,105, 114, 257
Hanák, Kati,考蒂·豪纳克,122, 177, 327, 图 91
Hanák, Péter,彼得·豪纳克,121, 122, 328, 405,图 91
Hankiss, Elemér,埃莱梅尔·洪基斯,290
Haraszti, Sándor,山多尔·豪劳斯蒂,59—61
Harsányi, John C. (János),约翰·C.豪尔绍尼,165
Harvard Square, Cambridge, 麻省剑桥哈佛广场,309, 324, 412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 213, 299—316, 408—412
Hašek, Jaroslav,雅罗斯拉夫·哈谢克,141
Hatvany, József,约瑟夫·豪特沃尼,140
Havel, Václav,瓦茨拉夫·哈维尔,255, 361, 363, 410, 412, 432
Háy, László,拉斯洛·哈伊,112, 213, 217
Haydn, Joseph,约瑟夫·海顿,199
Hayek, Friedrich A. von,弗里德里希·A.冯·哈耶克,126—129, 342;兰格—哈耶克争论,127—129
Health system, reform of,医疗系统改革, 376, 380—383
Hegedűs, András,安德拉什·海盖迪什,37, 77, 119
Hegedűs B., András,安德拉什·海盖迪什·B., 119
Heisenberg, Werner,维纳·海森堡,195
Heller, Farkas,法尔卡什·赫勒,77, 78
Helsinki,赫尔辛基,337—339, 375, 420
Hetényi, István,伊什特万·海泰尼,150, 384
Hicks, John R.,约翰·R.希克斯,109, 126, 253, 272
Hirschman, Albert O.,阿尔伯特·O.赫希曼,218, 220, 221, 273, 300, 302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3, 4, 8, 9, 26, 417, 425
Hoch, Róbert,罗伯特·霍赫,75, 76, 111, 113
Hoffman, David E., 戴维·E.霍夫曼,255
Holding companies,控股公司,292, 361
Hollós, Ervin,欧文·霍洛什,35—37
Holocaust,灾难,14, 20 n., 327
Horn, Gyula,居拉·霍恩,390
Horthy, Miklós,米克洛什·霍尔蒂,18, 205, 425, 426
Horváth, Márton,马顿·霍瓦特,42
Huizinga, Johan, 约翰·赫伊津哈,11
Human rights,人权,230, 258, 282, 343, 400 n.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73, 94, 110—113, 203—212, 402—405;院属其他组织, 140, 143, 152;院士的特权,218, 219;院士遴选程序,215—218
Hungarian Democratic Forum (Magyar Demokrata Fórum, MDF),匈牙利民主论坛,378, 388, 420
Hungarian Socialist Party (Magyar Szocialista Párt, MSZP), 匈牙利社会党,388
Hungary, 匈牙利, 对～的情感, 318, 319, 327, 328;～的诗、文学和音乐,134, 318,

319, 402
Hurwicz, Leonid, 莱昂尼德·赫维奇, 162, 163
Husák, Gustav, 古斯塔夫·胡萨克, 430, 432

Identity, identification, 身份, 认同, 匈牙利人, 318, 319, 327; 犹太人, 1, 4, 8, 22, 25, 29, 328, 400, 401, 417, 425
Imperial German School (Reichsdeutsche Schule), 德意志帝国学校, 8, 9
Impossibility theorem (Arrow), 不可能定理(阿罗), 150, 271 n., 287
Imprisonment, 监禁, 61, 69, 424, 345
Incentives, 激励, 分散的～, 187; 物质～, 50, 88; 道德～, 50, 88; ～的问题, 87—89, 126, 141, 142, 211; 利润～, 132, 133, 137, 261—263, 280, 281; ～计划, 88, 132, 137, 383
India, 印度, 155, 238, 239
Individual sovereignty, 个人主权, 343, 380
Inflation, 通货膨胀, 3, 281, 332, 368, 418
Information, 信息, 分散的～, 146, 147, 158, 187; ～无价, 147, 192, 231; ～不确定, 148, 183
political police, 政治的政策, ～的技术发明, 133, 195, 343
Input-output analysis, 投入—产出分析, 144, 145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rinceton,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225, 297—302, 337, 403, 405, 410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跨学科合作, 160, 406
Interest rate, 利润率, 144, 280
policy, 政策, 391
Interior Ministry, 内政部, 106 n., 150 n., 295; 三处, 150 n., 177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IEA), 国际经济学会, 161—163, 253, 41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392, 420
Interrogation, 审讯, 19, 59, 80, 106, 115—119, 123, 130, 131, 178, 206, 430
Iron Curtain, 铁幕, 110, 114, 163, 175, 190, 255, 329, 356, 418

Jasay, Anthony de (Jászay Antal), 安东尼·德·亚索伊(安托尔·亚索伊), 109
Jayawardena, Lal, 拉尔·贾亚瓦德那, 338
Jews, 犹太人, anti-Jewish laws, 反犹法律, 4, 26, 417 deportation, 放逐, 14, 16, 417, 426 elite, 精英, 12, 13 houses, 住房, 15 n. identity, 身份, 4, 27—29, 402, 403 persecution, 迫害, 4, 10, 17, 20, 21, 26, 34, 60, 61, 109, 115, 120, 168, 203, 213, 225, 246, 287, 303, 319
Jones, Leroy, 勒罗伊·琼斯, 331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经济学文献杂志》, 261, 265, 270, 282
Journals (scientific), editorial practices and criteria, 科学杂志, 编辑和评审标准, 141, 142, 269—271, 273, 274
József, Attila, 阿蒂拉·约瑟夫, 11, 138 n., 206, 294 n., 318

Kádár, János, 雅诺什·卡达尔, 57, 59, 65, 99, 107, 112, 218, 419, 420, 424, 426, 427; 政体, 107, 164, 165, 209, 380, 419
Kahneman, Daniel, 丹尼尔·卡恩曼, 191, 197
Kaldor, Nicholas, 尼古拉·卡尔多, 2, 163, 165, 223
Kalecki, Michał, 米恰尔·卡列茨基, 126, 291
Kantorovich, Leonid Vitaliyevich, 列昂尼德·康托罗维奇, 89, 151, 175, 182 n, 195, 254
Kapitány, Zsuzsa, 茹饶·卡皮塔尼, 207, 230, 231, 328, 图 14
Karagedov, Rajmond G., R. G. 卡拉乔多夫,

251
Kardelj, Edvard,爱德华·卡德尔,63, 76
Karinthy, Ferenc,费伦茨·考林蒂,9, 53, 256, 427
Karinthy, Frigyes,弗里吉斯·考林蒂,6, 86 n., 389 n., 427
Károlyi, Mihály,米哈伊·卡罗伊,320, 427
Karsai, Gábor,加博尔·考尔绍伊,346
Kass, János,雅诺什·考斯,250 n.,图 36
Katseli, Louka,卢卡·卡切利,226
Kende, Éva, 埃娃·肯德,327
Kende, Péter, 彼得·肯德,9, 32, 41, 42, 48, 65, 95, 99, 103, 114, 119, 120, 131, 328, 406,图 3
emigration,移民,114, 119, 120, 131, 132, 328 n.;与～的友谊,9, 31—33, 41, 42, 48, 76—78, 407;革命期间的～,103, 104, 114
Kende B., Hanna,汉娜·肯德·B.,328 n.,图 89
Kenedi, János,雅诺什·凯奈迪,171, 238, 257
Kesey, Ken,肯·凯西,368
Keynes, John Maynard,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26, 224, 243, 272, 273, 342 n., 379
Keynesian disequilibrium,凯恩斯学派的失衡,224, 342 n.
Khachaturov, V. R., V. R. 哈恰图洛夫,254
Khrushchev, Nikita,尼基塔·赫鲁晓夫,92, 419
Kis, János,雅诺什·基什,257, 385
Klaniczay, Gábor, 加博尔·克洛尼曹伊,256, 405
Klaus, Václav,瓦茨拉夫·克劳斯,349, 350, 365
Knapp, John(János),约翰(雅诺什)·克纳普,109
Koestler, Arthur,阿瑟·科斯特勒,256
Köllő, János,雅诺什·克勒,208, 407
Kołodko, Grzegorz,格热戈日·科洛德科,324
Koopmans, Tjalling C.,加林·C. 库普曼斯,142, 162, 163, 172, 180, 184,图 33, 99
Kornai Group(i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Budapest),科尔奈团队(布达佩斯经济学研究所),207, 403 n.
Kornai-Lipták algorithm, model,科尔奈—利普塔克算法模型,147, 153, 156, 187—190
Kornidesz, Mihály, 米哈伊·科尔尼代斯,217 n.
Kossuth, Lajos,拉约什·科苏特,319, 428, 432
Kosztolányi, Dezső,德热·科斯托拉尼,11
Kouba, Karel, 卡雷尔·库巴,333
Kovács, András,安德拉什·科瓦奇,246
Kovács, Imre,伊姆雷·科瓦奇,82 n.
Kovács, Mária(Marcsi),玛丽亚·科瓦奇,324
Kowalik, Tadeusz,泰狄什·科瓦利克,333
Krausz, Tamás,陶马什·克劳斯,350
Krüger, Carla, 卡拉·克吕格,324
Kuhn, Thomas,托马斯·库恩,196, 342
Kulaks,富农,61, 428
Kun, Béla,贝洛·库恩,26, 424
Kupa, Mihály,米哈伊·库保,384
Kuznets, Simon,西蒙·库兹涅茨,407

Lackó, Mária,玛利亚·拉茨科,207, 236, 328,图 14
Laibson, David,戴维·来博森,197
Lakatos, Imre,伊姆雷·拉卡托斯,165, 196 n.
Laki, Mihály,米哈伊·洛基,207, 285, 406,图 14
Lange, Oskar,奥斯卡·兰格,76 n., 147, 195, 292—296, 362n.
Lange-Hayek debate,兰格—哈耶克争论,127—129
Lapham, Harvey,哈维·拉潘,265
Lavigne, Marie,玛丽·拉维涅,333
Leijonhufvud, Axel,阿克塞尔·莱琼霍夫德,

300，301
Lengyel，László，拉斯洛·伦杰尔，289，290
Lenin，Vladimir I.，弗拉基米尔·I. 列宁，33，129，254 n.，343，345，354 n.
Leontief，Wassily，瓦西里·里昂惕夫，143，406；～模型，144
Lepenies，Wolf，沃尔夫·勒佩尼斯，403
Lerner，Abba，阿巴·勒纳，127
Lim，Ed(Edwin)，林重庚，331 n.
Limits of tolerance，宽容的限度，233 n.
Lindbeck，Assar，埃萨·林德贝克，227，241，329，330
Lindblom，Charles，查尔斯·林德布罗姆，301
Linear programming，线性计划，142—145，151，153，184
Lipták，Tamás，陶马什·利普塔克，137，138，142，146，159，162，207，329，图 13
Kornai-Lipták algorithm，model，科尔奈—利普塔克算法模型，148，153，157，187—190
Liska，Tibor，蒂博尔·利斯卡，76，286，297
Literature(fiction)，文学(虚构)，10，11，134，318，319 n.，369
Litván，Éva，埃娃·利特万，122，329，图 92
Litván，György，捷尔吉·利特万，115n.，116，122，328，405，406，图 90，92
Lőcsei，Pál，帕尔·勒切伊，48，61，64—66，69，79，103，117，168，328，图 54，91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62—166，173，308
Losonczy，Ágnes，阿格尼斯·洛松茨基，122，328，图 89
Losonczy，Géza，盖佐·洛松茨基，42，59，102
Loyalty(Hirschman)，忠诚(赫希曼)，224
Lukács，György(Georg)，捷尔吉·卢卡奇，33

MacKenzie，Lionel，莱昂内尔·麦肯齐，162，184
Madarász，Aladár，阿拉达·毛道拉斯，208
MADISZ（Magyar Demokratikus Ifjúsági Szövetség，Hungarian Democratic Youth Federation)，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25，26，30，32，35—39，47，59，60
Magyar Szabadság(Hungarian Freedom)，《匈牙利自由报》，103，105，117
Major，Iván，伊万·马约尔，208
Maléter，Pál，帕尔·毛莱泰尔，106，419
Malinvaud，Edmond，埃德蒙·马林沃德，141，147，162，163，338，图 19
Mándi，Péter，彼得·曼迪，91
Mann，Thomas，托马斯·曼，10 n.，33，34，40
Manne，Alan，阿兰·曼恩，228，308，图 21
Mao Zedong，毛泽东，26，164，238，239，337，345，412，420
Maoists，毛泽东主义者，237，238
Marglin，Steve，史蒂夫·马格林，312，338
Máriás，Antal，安托尔·马里亚什，76
Market buyers'，市场，买方～，195—197；消费者～，252—253；～协调，63，126，291，293，398；～均衡，184，195；投资～，254；完全～，148，278；卖方～，195—197；社会主义～，58，93，101，148，237—239，292，293
Martos，Béla，贝洛·马尔托什，159，207，223，231
Marx，Karl，卡尔·马克思，32，33，90 n.，254 n.，342，345
Marxism，Marxism-Leninism，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受～的吸引，31—34；63，64，76，77；～的修辞，91，151
Marxist theory，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的危机，79；贫困化，79，81，167；剩余价值，77，81；失业，243 n.；价值，77—81
Maskin，Eric，埃里克·马斯金，257，261，264，266，268，271，392，396，407，410，图 108；德沃特里庞—马斯金模型，268—270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麻省理工学院，92，307，309，323，365

Masters and teachers,大师和教师,3, 9, 72, 82, 126
Mathematical methods in economics,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137—160, 208, 234, 267—269, 271—275
Mathematical planning,数学计划,149, 154, 158
Matits, Ágnes,阿格尼斯·毛蒂奇,267, 328
Matolcsy, György,捷尔吉·毛托尔奇,379
McCarthy, Joseph R.,约瑟夫·R.麦卡锡,301, 327
McCloskey, Don(Deirdre), 堂·麦克洛斯基,298, 299
McHale, John,约翰·麦克黑尔,325, 381, 382,图 44
Méray, Tibor,蒂博尔·梅劳伊,65, 67, 69, 93
Michnik, Adam,亚当·米奇尼克,255, 410
Mihályi, Péter,彼得·米哈伊,208
Molnár, Endre,安德烈·莫尔纳,108, 109, 113
Monetary policy, 金融政策,390—392
Montias, John Michael,约翰·迈克尔·蒙蒂亚斯,175, 178,图 20
道德意识, 37, 45, 69, 105, 257, 382;道德基础,60, 67, 79, 104, 116, 117, 201;道德律令,8, 13, 134;道德判断,52, 169, 258, 287, 321;道德计算,54, 55, 69
Móricz, Zsigmond,日格蒙德·莫里茨,11
Morita, Tsuneo, 盛田常夫,334 n.
Motivations of the cadres,干部的动机,44—47
Mozart, Wolfgang Amadeus,沃尔夫冈·莫扎特,405
Münnich, Ferenc,费伦茨·明尼希,107, 112
Murrell, Peter,彼得·穆雷尔,245 n.
Musgrave, Richard,理查德·马斯格雷夫,364
Music,音乐,2, 7, 10, 12, 46, 84, 200, 228, 229, 310, 323, 324, 326, 334, 338, 402, 404—406, 408, 410
Myrdal, Gunnar,冈纳·缪尔达尔,361

Nagy, András,安德拉什·纳吉,76, 91, 113, 119, 122, 152, 162, 206, 328, 406
Nagy, Imre,伊姆雷·纳吉,57, 66, 68, 94, 95, 419;～派,48 n., 65, 66, 69, 99;经济计划,99—103, 356;六月计划,58, 59, 61;～葬礼,355, 420;～案件,106n., 112 n.
Nagy, Tamás,陶马什·纳吉,53, 74, 76, 80, 81, 92, 100, 102, 108, 113 n.
Naive reformer,天真的改革者,81 n., 93, 94, 205, 279—284
Nash, John F.,约翰·F.纳什,160, 208
National Bank of Hungary,匈牙利国家银行,390, 391
Natural sciences, 自然科学,196, 234, 271, 302
Nazism,纳粹主义,8, 9, 14, 17
power,权力,14, 45, 47, 57, 58, 63, 65—68, 92, 94, 186, 203, 210, 218, 230, 242, 255, 259, 265, 282, 296, 306, 321, 330, 349, 350, 353, 357, 367, 375, 376, 389, 396, 397, 400, 426, 428, 431
Nemes, György,捷尔吉·内梅什,43
Németh, László ,拉斯洛·内梅特,134, 135, 318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理论,128, 349;对～的批评,179—199;～的宏观基础,234
Népszabadság(People's Freedom),《人民自由报》,105, 108, 377, 380, 428
Nettelbeck, Joachim,约阿希姆·内特尔贝克,403
Neumann, John von, 约翰·冯·纽曼,160, 300, 318
New Course,新方针,57—59, 63, 65, 66, 69, 86, 93, 101
New Economic Mechanism, 新经济机制,91, 204, 282, 292, 420, 428

New Left,新左派,227, 350 n., 363, 398 n.
Newspaper(communist),(共产党)报纸,41—55
Nguyen Quang A,阮光亚,334,图 96
Nomenklatura, 党管干部制度,395
Nonformalized, verbal style,非正式的,口语风格的,273 n.
Nove, Alec,阿列克·诺夫,110, 162, 348
Novobáczky, Sándor,山多尔·诺沃巴茨基,65, 67, 121
Nozick, Robert,罗伯特·诺齐克,313, 363
Nyers, Rezső,雷若·涅尔什,204, 210 n., 219, 283

Obersovszky, Gyula,久洛·欧拜绍夫斯基,103
Objective function(in planning),目标函数(计划中的)148, 150, 152, 157
Occam, William of,奥卡姆的威廉,344
Operations research,运筹学,142, 155
Oppenheimer, J. Robert,罗伯特·J. 奥本海默,300
Optimism,乐观主义,322, 402, 403
Orbán, Viktor,维克托·欧尔班,373, 377
Originality,原创性,30, 83, 109, 204, 271, 272, 274, 275, 310
Örkény, István,伊什特万·厄尔凯尼,53, 428
Ortega y Gasset, José,何塞·奥尔特加-加赛特,11
Orwell, George,乔治·奥威尔,115 n., 255, 256
Overcentralization, 过分集中,86—93, 106—110, 131, 161, 172
Ownership, property,所有权,财产权,361—363, 367, 395;集体～,37, 46, 63, 65, 76, 81, 113, 185, 273, 286, 296, 371, 428;跨～,361;私有～,51, 128, 281, 291, 396;公共～,279, 290—292;国有～,50, 51, 58, 281, 366

Palme, Olof,奥洛夫·帕尔默,242 n.
Papandreou, Andreas,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226, 263
Pareto, Vilfredo,威尔弗雷多·帕累托,132
Pareto-efficient solution,帕累托效率解,130
Parliament,议会,2, 13, 35, 37, 57, 100, 101, 121, 190, 239, 304, 354, 358, 366, 367, 369, 372, 378, 385, 388, 394, 399, 401, 417, 418, 424, 427, 428, 430, 432
Party(other than Communist Party),(共产党之外的)其他政党,355, 372, 375, 384, 385, 399—400
Paternalism,家长制,263—267
Peng, Xiaomeng, 肖梦,334
Perestroika,新思维,426, 429
Pessimism,悲观主义,401, 402
Pete, Péter,彼得·佩特,208
Péter, Gábor,加博尔·彼得,115
Péter, György,捷尔吉·彼得,76—79, 83, 90, 91, 96, 100, 107, 108, 126, 127, 129, 166, 282
Péteri, György,捷尔吉·彼得里,74 n., 85
Petőfi, Sándor,山多尔·裴多菲,135, 429
Phelps, Edmund,埃德蒙·菲尔普斯,383
Phillips, Albin W.,阿尔宾·W. 菲利普斯,162
Philosophy,哲学,～史,11;政治～,341;科学哲学,165, 189—191, 352
Pigou, Arthur,阿瑟·庇古,126
Pikler, Emmi,艾米·皮克勒,75
Plan bargaining,计划谈判,87
Planning,计划,中央～,58, 83, 112, 127, 232, 233;～和经济管理,72, 82, 83;指令～,159;指示性～,159;数学～,150, 156, 165, 203;完全～,187, 188, 324
two-level,两级,144—149, 185, 186
Planning Office, 计划办公室,76, 90, 99, 110, 134, 145, 149, 150, 152, 155, 156,

158, 186, 226, 238, 249, 283, 384
Political ideology, 政治意识形态, 395
Politically correct behavior, 政治正确的行为, 314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科学, 9, 404
Political structure, 政治结构, 89, 129, 183, 263, 265, 266, 285, 301, 312, 341, 348, 395, 396
Politics and science, boundaries of, 政治和科学的边际, 133, 363—380
Portes, Richard, 理查德·波特斯, 252
Pragmatism, 实用主义, 386
Prague Spring, 布拉格之春, 58, 282, 346, 420, 430
Preference ordering, 偏好秩序, 189, 190
Press, 新闻, ～自由, 68, 230; 美国的～和电视, 230
Price, 价格, 中央控制的～, 142; ～的决定, 142, 145 n., 280; ～体系的扭曲, 266, 332; ～的平衡, 145; 均衡, 128; ～的制定, 229; 阴影, 145 n.; ～的-taker, 229; 普林斯顿, ～高等研究院, 225, 299—303, 403; ～大学, 226—228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的加速, 364, 365, 368; 渐进派的～, 364, 367, 369; ～原则, 361, 364, 365; 凭证, 286, 290 n., 364
Privileges, 特权, 学术的～, 218, 219; 党务工作者的～, 45, 46
Profit, 利润, ～的官僚化再分配, 267, 280; ～动机, 132, 133, 137, 260—262, 280, 281; ～的分享, 132, 133, 139, 140, 262
Profitability, 利润率, 231, 262
Prokop, Jane, 简·普罗科普, 325
Proust, Marcel, 马塞尔·普鲁斯特, 1
Publication, 出版, 依赖～的学术生涯, 97, 199, 200, 271, 274; 合法与非法～, 97, 247—249, 257—259, 266; 地下出版物, 250, 251, 257—259, 286 n., 287, 431, 432; 遴选程序, 141, 215, 248—250, 269—278, 307
Public choice, theory of, 公共选择理论, 349

Qian, Yingyi, 钱颖一, 270, 271, 325, 图 42, 45
Quandt, Richard, 理查德·匡特, 165, 226, 268
Queue, queuing, 排队, 225, 244; ～的长度, 231, 253

Rabár, Ferenc, 费伦茨·劳巴尔, 152, 384
Radner, Roy, 罗伊·拉德纳, 162
Raile, Jakab, 雅各布·雷利, 20, 21
Rajk, László, 拉斯洛·劳伊克, 44, 57, 59, 414, 427
Rajk László College for Advanced Studies, 拉斯洛·劳伊克大学, 20, 214, 251, 253, 324
Rákosi, Mátyás, 马加什·拉科西, 42, 48, 431; era, 时代, 44, 114, 115, 177, 327; struggling inside party, 党内斗争, 57—59, 65—69, 94, 95
Ránki, György, 捷尔吉·兰基, 289
Ratchet effect, 棘轮效应, 87
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理性选择理论, 126, 135, 190, 192
Rational decision makers, 理性决策者, 189, 234
Rationality, 合理性, 189, 192, 255, 320, 350, 351
Rationing system, 合理的制度, 239, 245
Rawls, John, 约翰·罗尔斯, 301, 362 n., 272, 363
Reagan, Ronald, 罗纳德·里根, 256, 313, 420
Referee, 审稿人, 83, 248—250, 270, 271, 274, 275, 425, 428
Reform(in socialist countries),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反改革势力, 178, 221, 277; 中国的～, 329—332; 共产党的～, 58, 209, 256,

430;经济学家的～,76 n.,91,362;社会主义的～,280,348,361
Rejtő, Jenő,耶诺·赖特,32
Rényi, Alfréd,阿尔弗雷德·雷尼,138,140
Repression,压制,51,61,62,91,152,167,169,193,232,279,346,400
Révai, József,约瑟夫·雷沃伊,35,42,108,425,430
Révész, Sándor,山多尔·雷维斯,103 n.,119 n.
Revisionism,修正主义,108,109,113,164
Revolution, Hungarian(1956),匈牙利革命(1956),99—105,213 n.,280,419,426
Ricardo, David,大卫·李嘉图,32,33
Rimler, Judit,朱迪特·里穆勒,153,206,406
Ripp, Géza,盖佐·里普,108,109
Road to a Free Economy, The,《通向经济自由之路》,339,354—373,384
Robinson, Joan,琼·罗宾逊,163,164,223
Roland, Gérard,热拉尔·罗兰,253,261
Rose-Ackerman, Susan,苏珊·罗斯-阿克曼,403,图 117
Rosovsky, Henry,亨利·罗索夫斯基,303
Rosser, J. Barkley Jr.,小 J. 巴克利·罗瑟,389
Rosser, Marina V.,玛丽娜·V. 罗瑟,389
Rush(excessive pace of growth),增长过速,77 n.,89,224,331

Sachs, Jeffrey,杰弗里·萨克斯,355,364,366,375,410,图 108
Sakharov, Andrei,安德烈·萨哈罗夫,255
Samizdat,地下出版物,251,257—259,286 n.,430
Samuelson, Paul A.,保罗·A. 萨缪尔森,270,306,364,365;～的著作,125,126,142,145
Sartre, Jean-Paul,让-保罗·萨特,134
Schama, Simon,西蒙·沙玛,347
Schelling, Thomas,托马斯·谢林,301
Schiff, András,安德罗什·希夫,318
Schmidt, Ádám,亚当·施密特,210
Schneider, Erich,埃里克·施奈德,125,140
Schubert, Franz,弗兰茨·舒伯特,410
Schumpeter, Joseph,约瑟夫·熊彼特,195,342
Scitovsky, Tibor,蒂博尔·西托夫斯基,163,165,228,229,309,图 98
Search committee(Harvard),哈佛遴选委员会,303,304,308
Searching(for goods),搜寻(商品),237,245
Secret services, political police,秘密机构,政治警察,106,115,165—171,174—177,314;改革者报告,45,166,167,171,293,294;～的记录,78,114 n.,123,152 n.,176,177
State Security Police(Államvédelmi Hatóság, ÁVH),国家秘密警察,24,35,44,60,100,423
Seleny, Anna,安娜·塞莱尼,325
Self-censorship,自我检查,246—248,257,265,266
Self-management system,自主经营体系,63,279,345,361
Sen, Amartya,阿马蒂亚·森,150 n.,189 n.,301,312,328,329,338
Shortage,短缺,长期～,90,225,235,245—248,266;～经济,195,224,225,240—246,266;～缓解,329
Show trials,公审秀,34,418
Shrinivasan, T. N.,T. N. 斯里尼瓦桑,234
Signal,信号,灾难的～,231;作为～的队列长度,231,253;非价格～,194,225,231,253
Sik, Ota,奥塔·锡克,282
Simán, Miklós,米克洛什·希曼,113
Simon, Herbert A.,赫伯特·A. 西蒙,198
Simonovits, András,安德洛什·西蒙诺维奇,160,207,230,231 n.,243 n.,328,406,

图 14
Smith, Adam,亚当·斯密,32, 33, 249, 272
Social choice, theory of,社会选择理论,150
Socialism,社会主义,古典～,49, 65, 344, 345, 395;现存的～,164, 227, 342;市场,58, 93, 101, 147, 238, 239, 292, 293;改革,282, 347, 361
refrigerator,冰箱,227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theory of,社会主义工业理论,58, 222
Socialist system,社会主义制度,～的腐蚀,255, 345, 352;～的总体模型,343—346;～的政治经济学,265, 310, 337
Socialist System, The,社会主义体制,309, 337—350, 365, 395
Social psychology,社会心理学,342
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80, 196, 271, 404
Sociology,社会学,192, 341, 404
Solidarity,团结,16, 120, 382
Solidarność,团结工会,355, 430
Solow, Robert,罗伯特·索洛,142, 165, 326, 378,图 94
Sólyom, László,拉斯洛·绍约姆,379
Solzhenitsyn, Aleksandr Isayevich,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255
Sonnenschein, Hugo,雨果·索南沙因,274
Soós, Károly Attila,卡罗伊·阿蒂拉·绍什,208
Soviet,苏维埃,～军队,20, 29, 418, 426;～集团,247, 279
intervention,阻碍,102, 112, 426
Sovietology,苏维埃研究,180, 308, 407
Spence, Michael,迈克尔·斯彭斯,302
Spengler, Oswald,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1, 30, 432
Spulber, Nicolas,尼古拉·施普尔伯,110
Stabilization,稳定,367—369, 377—379
Stalin, Joseph V.,约瑟夫·V.斯大林,24, 31, 57, 63, 127, 418, 419
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177, 181, 228, 238, 308, 309, 362 n., 363
Stanislaw, Joseph,约瑟夫·斯坦尼斯拉夫,254
State,国家,国有所有权,50, 51, 58, 279, 366;～的作用,164, 361, 376, 382;福利,226, 361, 378—382
Stockholm,斯德哥尔摩,23, 241, 243, 246, 257, 264, 268, 302, 317, 335, 361, 411
Stone, Richard,理查德·斯通,162, 223
Straub, F. Brunó, F.布鲁诺·斯特劳,342
Streeten, Paul,保罗·斯特里滕,222
Stuart, Robert C.,罗伯特·C.斯图尔特,292
Such, György,捷尔吉·舒赫,254 n., 390
Summers, Lawrence H.,罗伦斯·H.萨默斯,313
Surányi, György, 捷尔吉·舒拉尼,390
Surveillance,监视,167, 168, 177—179, 295
Svenson, Lars,拉尔斯·斯文森,265
System,体系,～的变革,247, 339, 363, 395—402, 424;多党制,102, 357, 421, 424, 426;一党制,102, 357, 418, 419, 424, 430, 431;范式,9, 30, 89, 300, 342;～的特定性质,239 n., 245, 253, 398;极权主义,47, 179, 327, 345
Szabad Nép(*Free People*),《自由人民报》,41, 42, 45—49, 52, 53, 55, 59, 61, 62, 64—70, 74, 75, 81, 82, 89, 92, 93, 104, 105, 108, 115, 121, 204, 207, 328, 418, 419, 424, 427, 428, 430;～的反抗,67—68
Szabó, István,伊什特万·绍博,16, 318
Szabó, Iván,伊万·绍博,378
Szabó, Judit,朱迪特·绍博,207,图 14
Szabó, Katalin(Kati),卡塔林·绍博,327,图 101
Szabó, Zoltán,佐尔坦·绍博,82,图 101
Széchenyi, István,伊什特万·塞切尼,135, 432

Szegő, Andrea,安德烈·塞格,290, 291
Szegvári, Iván,伊万·塞格瓦里,362
Székely, Éva,埃娃·塞凯伊,9,图 3
Szentágothai, János,雅诺什·圣阿戈陶伊, 283
Szerb, Antal,安托尔·塞尔布,11, 31, 432

Tamás, Gáspár Miklós,加斯帕·米克洛什·陶马什,359
Tardos, Márton,马顿·陶尔多什,152, 206, 292
Tardos, Tibor,蒂博尔·陶尔多什,67
Technical development,技术发展,133, 143, 232
Technical stagnation,技术停滞,245
Tenured professorship,终身教职,224, 302—304, 407
Terták, Elemér György,埃莱梅尔·捷尔吉·泰尔塔克,291
Third road, third way,第三条道路,285, 362, 363, 389
Tinbergen, Jan,扬·丁伯根,126, 140, 159, 163, 221, 361
Tito, Josip Broz,约瑟普·布罗兹·铁托,63, 418
Tobin, James,詹姆斯·托宾,182, 330
Tolerance,宽容,163, 183, 206, 209, 258, 312, 423, 425
Tolstoy, Lev,列夫·托尔斯泰,33
Tóth, István György,伊什特万·捷尔吉·托特,381
Tóth, István János,伊什特万·雅诺什·托特, 254
Transition,转轨,245, 267, 296, 311, 319, 331, 343, 364—366, 368, 370, 375, 376, 380, 382, 383, 388, 389, 391—393, 395, 404, 407—409, 414, 421, 426, 429
Tříska, Dušán,杜尚·特日斯卡,349, 365
Tversky, Amos,阿莫斯·特韦尔斯基,191, 198
Two-level planning,两级计划,137, 144—149, 152, 155, 156, 159, 186, 187, 384

Ulbricht, Walter,瓦尔特·乌尔布里希,26, 432
United Nations(UN),联合国,174 n., 227, 328, 419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Karl Marx,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112, 125, 213, 214, 250
University teaching,大学教育,160, 311, 302—304;美国的～, 227—229, 270, 324, 406—411;匈牙利的～,112, 154, 213
Utility function,效益功能,189, 190, 234;～最大化,190, 234
Utopia,乌托邦,286, 313, 343, 398, 399

Vacroux, Alexandra,亚历山德拉·瓦克鲁,325
Vági, Ferenc,费伦茨·瓦吉,74
Vahabi, Mehrdad,迈赫达德·瓦哈比,334
Vajda, Mihály,米哈伊·沃伊道,82 n.
Value judgment,价值判断,344, 396, 397;～体系, 343, 357
Varga, István,伊什特万·沃尔高,92, 111, 112
Varga, János,雅诺什·沃尔高,324
Vas, Zoltán,佐尔坦·沃什,77, 99, 100, 102
Vásárhelyi, Miklós,米克洛什·瓦沙尔海伊, 41, 42
Vassiliou, Jorgos,约尔斯·瓦西利乌,119, 120, 123, 131
Veesenmayer, Edmund,埃德蒙·费森迈尔,13
Vegetative nervous system,植物神经系统,231
Vékás, Lajos,拉约什·韦卡什,405
Veres, Péter,彼得·韦赖什,76, 429
Viability,有效性,78, 235, 349
Vietnam,越南,292, 334, 344, 348, 360, 383, 393, 419
Vietorisz, Thomas,托马斯·维托里斯,163
Voice(Hirschman),声音(赫希曼),225, 226
Voltaire(Françis-Marie Arouet),伏尔泰,11

Vörösmarty, Mihály,米哈伊·沃勒什毛尔蒂, 319 n.

Wagner, Richard,理查德·瓦格纳,2
Wahrmann, Ernő,艾尔诺·瓦尔曼,18
Waiting(in socialist economy),等待(社会主义经济中),192, 219, 237
Wałesa, Lech,莱赫·瓦文萨,355
Wallenberg, Raoul,拉乌尔·瓦伦贝格,18
Walras, Léon,莱昂·瓦尔拉斯,128, 184, 272
Walrasian equilibrium,瓦尔拉斯均衡,149, 251, 259
Waltzer, Michael,迈克尔·沃尔泽,300
Watergate affair,水门事件,230, 231, 400
Weibull, Jörgen, 约根·韦布尔,159, 243, 268
Welfare function,福利功能,149—151, 307
WIDER(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世界经济开发研究所,337, 338, 375
Williamson, Oliver,奥利弗·威廉森,301
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WIKO),柏林高等研究所,403
Work contest,工作检验,51, 432
World Bank,世界银行,226, 229, 267, 313, 330, 331, 370, 382, 392, 420
Wu Jinglian,吴敬琏,254,图 119

Xu, Chenggang,许成钢,325,图 42

Yergin, Daniel,丹尼尔·耶金,254
Ysander, Bengt-Christian,本特-克里斯蒂安·伊桑德,265, 338
Yugoslavia,南斯拉夫,13, 63, 78, 115, 127, 279, 331, 345, 361, 400, 417, 418, 4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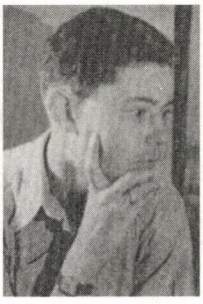
Zádor, István,伊什特万·扎多尔,109
Zaslavskaya, Tatiana,塔季扬娜·扎斯拉夫卡娅,329
Zauberman, Alfred,阿尔弗雷德·佐伯曼, 164,图 20

1

2

3

4



5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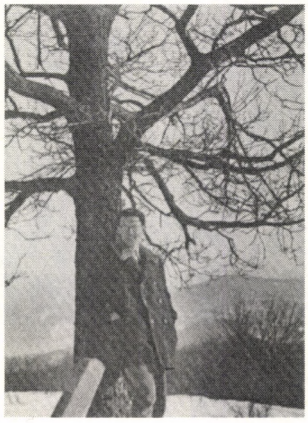
1. 我坐在哥哥邦迪的腿上，旁边是我姐姐莉莉和哥哥托米（摄于1929年）。
2. 与父母和哥哥姐姐在一起（摄于1930年）。
3. 德意志帝国学校一年级。坐在前排最靠右的那个人是我，旁边是我朋友彼得·肯德。后面那排彼得右边的那位叫爱娃·塞凯伊，她后来成为奥运游泳冠军（摄于1933年）。
4. 这是我十几岁时的一张照片。
5. 布达佩斯第五区科学院大街18号。我家的公寓和父亲的办公室就在这幢大楼的三层（欧洲人的说法是第二层）。这幢楼现在成了总理办公室。
6. 与哥哥邦迪和托米在一起（摄于1943年）。

7

8

7. 我在《自由人民报》的第一位上司米克洛什·吉迈什，他后来在1956年革命中殉难（大约摄于1950年）。
8. 满怀坚定的信念（大约摄于1948年）。
9. 寒假时摄于高亚泰托的树林中（1949年）。
10. 在维也纳为报纸报道一次会议（摄于1950年）。

9



10

11. 我儿子加博尔和安德拉什（摄于1964年）。
12. 我的第一位妻子和儿子加博尔以及安德拉什（摄于1966年）。

11

12

13

14

15

13. 与陶马什·利普塔克摄于英国剑桥。时间是我们撰写《两级计划》的30年后（1992年）。
14. 经济研究所的科尔奈团队。摄于经济研究所成立50周年纪念集会上。从左至右：米哈伊·洛基、茹饶·卡皮塔尼、安德拉什·西蒙诺维奇、玛丽亚·拉茨科以及朱迪特·茹饶。
15. 我与安德拉什·布罗迪(摄于2004年)。

16

00005 8.

VI/4. sz.utasitás "A"-tól Szigoruan titkos!

Minősítése megszűnt!

E r d e i elvtársnak!

L o n d o n.
Budapest,1964.március 26.

Tárgy: Kornai János ügye.

Szalai elvtárs korábbi javaslata alapján megvizsgáltuk tárgyban nevezett operativ felhasználhatóságát.Az ellenőr zés során azonban személyét nem tartottuk alkalmasnak arra,hogy beszervezzük.

Az elmult tiz év során tanusitott ingadozó politikai magatartása miatt kiutazása előtt nem igazitjuk el sem a KÜM,sem saját nevünkben.

Kiutazása után a viselkedésétől függően Szalai elvtárs sötéten felhasználhatja,de csak a legális követségi munkakörrel összefüggő kérdésekben.

17

Az ÁLLAMBIZTONSÁGI SZOLGÁLATOK TÖRTÉNETI LEVÉLTÁR-ában őrzött eredeti iratról készült másolat

1981

KORNAI JÁNOS
magyar körgazdász
MTA Körgazd tud. Int., utdsa
(Címzetes egyetemi tanár
(meghinsult beszervezés)

III/I-218-265/6

III/II-250 - 1/6 (1982!)

III/II-15

BRFK-46

III/II-20 {vendégprof. az USA-ban, meghiúsítás a CIA ea-ra 85

ÁBTL 271 N017

ÁLLAMBIZTONSÁGI SZOLGÁLATOK TÖRTÉNETI LEVÉLTÁRA

18

16—17. 秘密警察在1964年的一项决定：雅诺什·科尔奈“不适宜被聘为”线人。日期为1985年的索引卡片上标明了这一决定：“无法使用”。

18. 英国剑桥大学卡莱尔学院。国际经济学会1963年的圆桌会议在此召开。这里也是我第一次在国际学术论坛上发表演讲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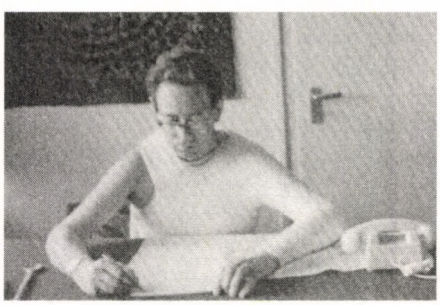
19

19. 与我的第一位导师、法国经济学家埃德蒙·马林沃德在一起。马林沃德曾任《计量经济学杂志》编辑，也是2001年剑桥会议的组织者。左边是弗朗索瓦·阿莱尔，法国驻布达佩斯使馆前文化参赞。
20. 在1965年的一次维也纳会议上，我与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第一次会面。从左至右：阿尔弗雷德·佐伯曼（伦敦经济学院）、我、戴维·格拉尼克（威斯康星大学）、约翰·迈克尔·蒙蒂亚斯（耶鲁大学）以及汉斯·劳帕赫（慕尼黑）。

20

21

22



23

21. 1968年，应阿罗·肯尼思的邀请，我访问了斯坦福大学。照片中间那位就是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阿罗·肯尼思，前排右边是阿罗的夫人塞尔玛。另一对夫妇是我们在斯坦福大学的朋友艾伦和杰姬·曼内夫妇。正中是我妻子茹饶。摄于2002年，当时我们正要结束在加州的访问离开美国。
22. 第一次肩部手术后坐到了书桌前，从肩部到腰部都打上了石膏（摄于1972年）。
23. 摄于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喷泉前。

24

25

26

27

28

29

24. 与加博尔、朱迪特和安德拉什在蒂豪尼(摄于1972年)。
25. 与母亲蒙约在一起（摄于1964年）。
26—27. 母亲蒙约的80寿诞。与她的三个孩子托米、我（我的姿势有些怪异，因为刚动了第二次肩部手术，胳膊上还打着石膏）以及莉莉（摄于1972年）。这是在蒙约80周岁生日时拍摄的。她身边是孙辈和曾孙辈。
28. 与茹饶的合影（摄于1972年）。
29. 与朱迪特摄于新泽西海滩（摄于1972年）。

30

30. 参加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的日内瓦会议（摄于1974年）。
31. 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大学举办系列讲座时与学生合影（摄于1975年）。
32. 利丁厄，我家窗外的斯德哥尔摩郊区景色。我就是在这里写出了《短缺经济学》（大约摄于1976—1977年）。
33. 摄于1978年的计量经济学会年会。离我发表主席演讲还有几分钟时间，我的导师加林·库普曼斯正向与会者介绍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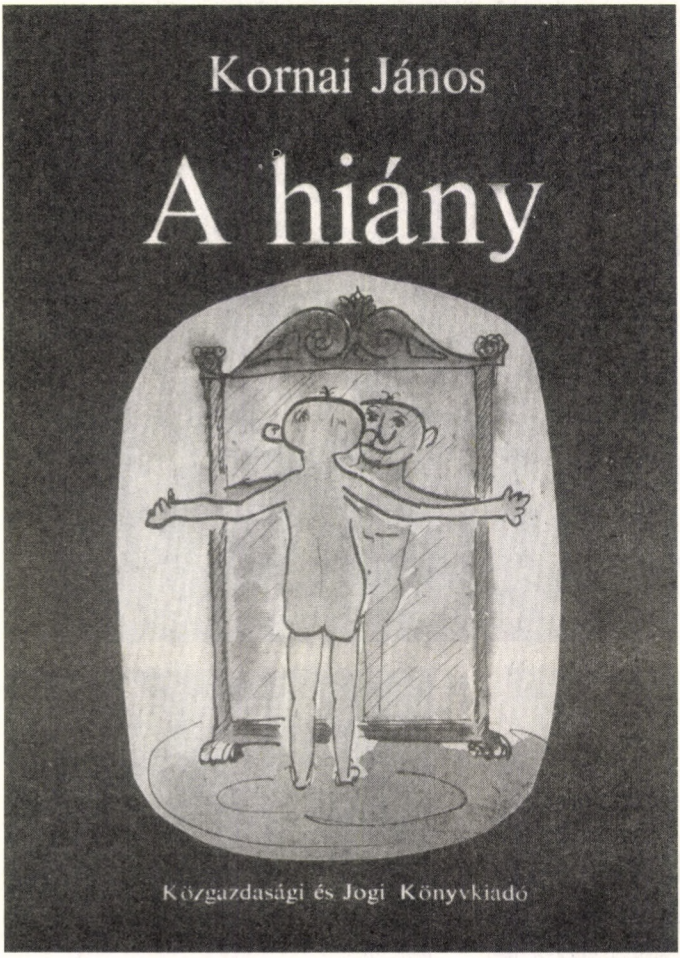
31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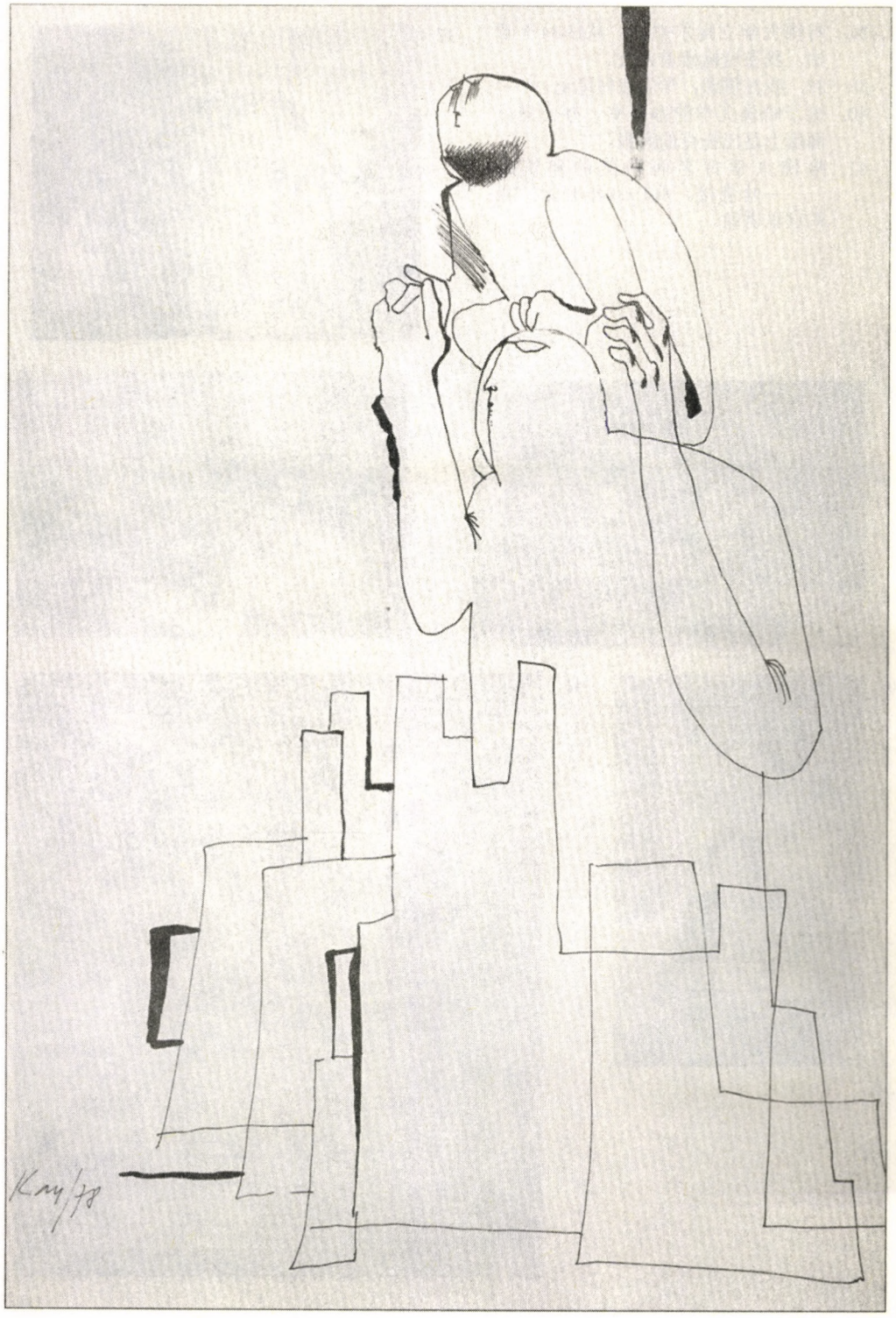
33

34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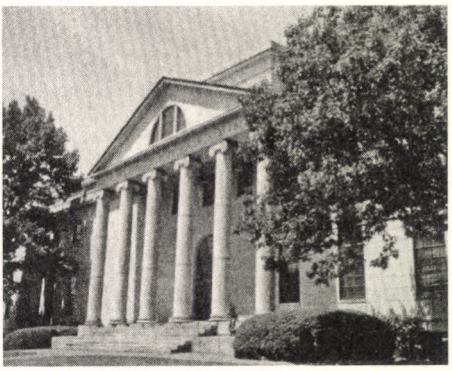


34. 巴黎索邦大学校长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摄于1978年）。
35. 《短缺经济学》匈牙利文版出版时，技术部门设计的幽默封面“皇帝的新衣”（摄于1980年）。
36. 1978年，受《短缺经济学》启发，著名艺术家雅诺什·卡斯创作了系列漫画。这幅画被命名为《父爱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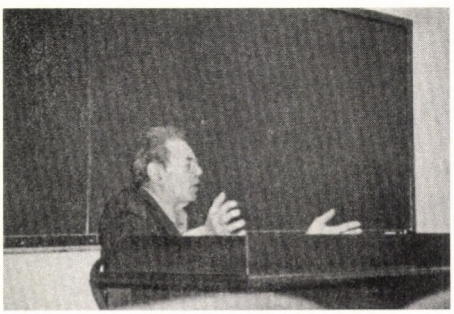


37. 哈佛大学立陶尔中心。从1984年开始，我在这幢楼里办公。
38—39. 我在讲课，学生在做笔记。
40. 摄于哈佛大学的办公室。办公桌后面墙上是巴托克的海报。
41. 哈佛大学古老而精美的建筑之一——哈佛楼。从1990年开始，我在这里讲课。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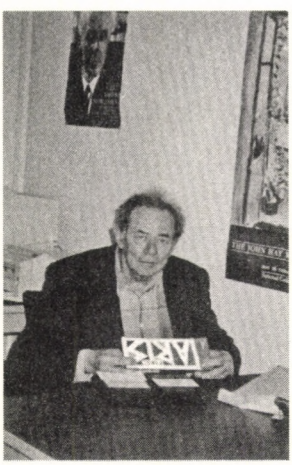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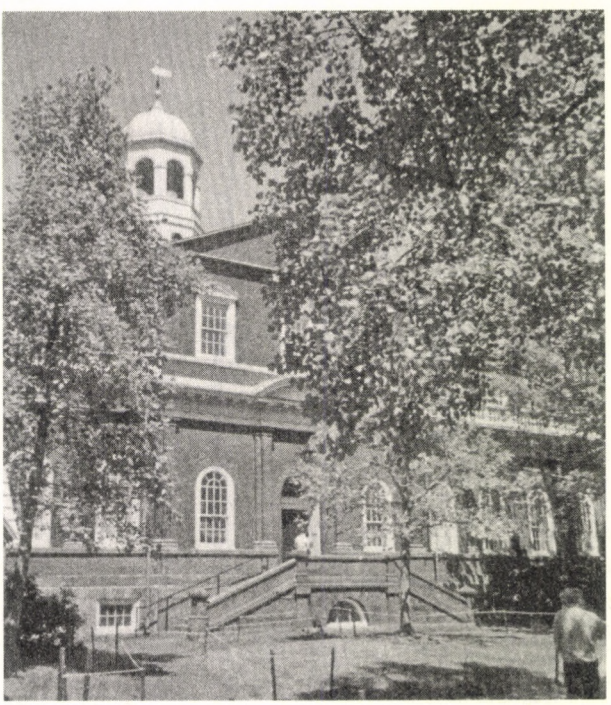


39

40



41



42. 我最优秀的中国学生。从左至右：许成钢（伦敦经济学院）、王一江（密歇根大学）、钱颖一（加州伯克利大学）、李稻葵（香港大学）。他们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我只是分别与他们见过几次面。这次我们在香港召开的国际会议上相聚。

42

43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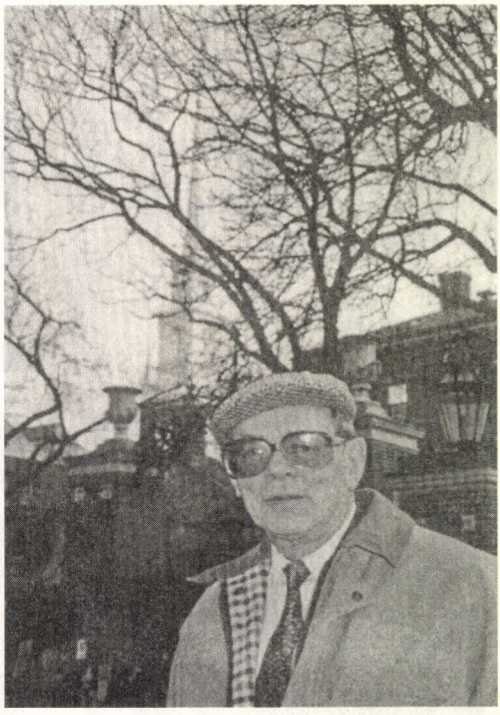
45

43. 参加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
44. 这张照片中，左边是我的学生翁笙和，后来我们合作撰写过著作。右边是约翰·麦克黑尔和他的妻子，我们也合作过论文并共同举办过研讨会。照片摄于坎布里奇我的公寓（2004年）。
45. 与钱颖一和茹饶摄于北京（1999年）。

46. 这张照片的背景是哈佛大学的标志：哈佛塔（摄于1996年）。

47—49. 刚刚抵达，正在拆行李；又为下一次旅行打包。

46



47

48

49

50

50—53. 1985年中国的“巴山轮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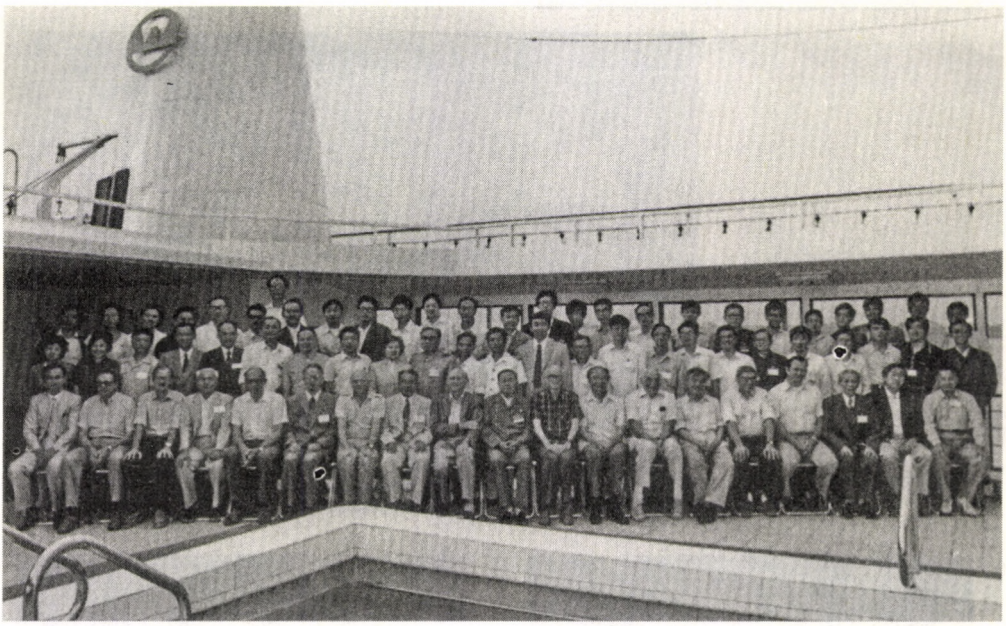
50. 正在进行讨论。

51. 全体与会人员在甲板上合影。前排是会议的中方组织人员和7名受邀参加会议的外国经济学家。

52. 片刻的放松：厨师正在展示著名的北京烤鸭如何切片。

53. 乘坐游艇游览三峡。由于长江上修筑了三峡大坝和水库，这些景致已经不复可见了。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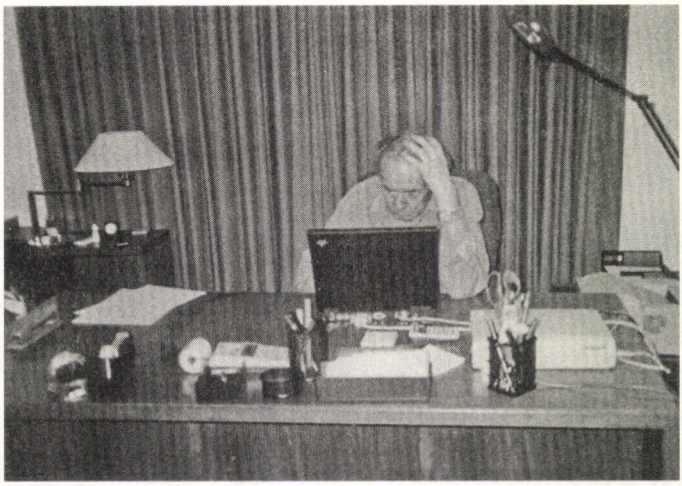
52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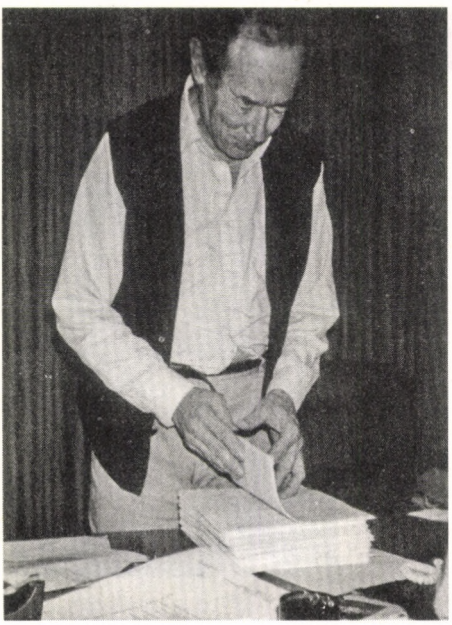
54

54. 与彼得·肯德和帕尔·勒切伊讨论我在病床上撰写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充满激情的小册子》（摄于1989年）。
55. 在坎布里奇家中的书桌旁（摄于2000年）。
56—57. 作者生活中的快乐时光。
56. 拿到《社会主义体制》英文版校样（摄于1991年）。
57. 手中是《社会主义体制》第一版赠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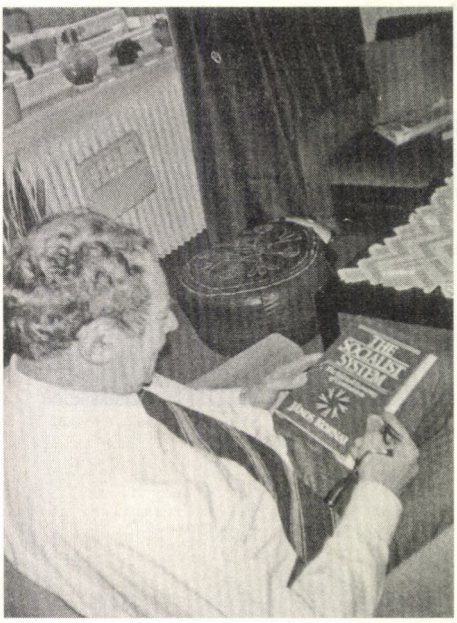
55



56



57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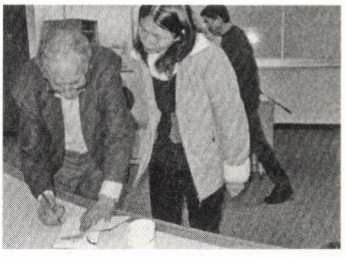
58—62. 作者获得的最大奖励：为那些对我的书感兴趣的学生签名。

58. 为越南河内的大学生签名（摄于2000年）。
59. 在哈佛大学办公室为俄罗斯经济学家叶莲娜·卡柳日诺娃签名（摄于1998年）。
60. 在中国上海为读者签名（摄于 1999年）。
61. 在中国香港为学生签名（摄于2005年）。
62. 在中国台湾为出版社职员签名（摄于1994年）。

59

60

61



62

63

64

63. 在我的作品译成斯洛伐克文出版之前，我在布拉迪斯拉法与编辑伊万·米克洛什在一起。几年后，米克洛什成为了斯洛伐克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摄于1998年）。

64. 在上海的大学发表演讲后与学生交谈（摄于1999年）。

65

65. 在莫斯科的新大学发表演讲。大学创办者兼客座教授、以色列经济学家古尔·奥弗正向听众介绍我（摄于2003年）。

66

67

66. 这张照片摄于我的作品法文版巴黎发布现场。我旁边的是该书的编辑贝尔纳·沙旺斯（摄于2001年）。

67. 摄影是我的一个爱好，近来我又喜欢上了摄像。这是我在拍摄阿克萨清真寺的哭墙（摄于1995年）。

68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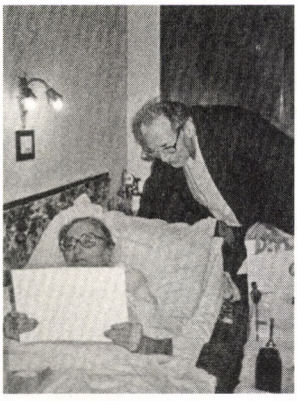
70

71

68. 德布勒森市的拉约什·科苏特科技大学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摄于2001年）。
69. 安妮公主以伦敦大学校长的身份将象征荣誉博士的绶带戴在我头上（摄于1990年）。
70. 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接受塞德曼奖（摄于1982年）。
71. 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为我颁发荣誉博士学位前，试穿正式的晚礼服（摄于2001年）。

72. 给卧病在床的姐姐莉莉展示我得到的荣誉证书（摄于2000年）。
73. 我与茹饶。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当时我刚刚获得法兰西荣誉军团奖章（摄于1997年）。
74. 在都灵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摄于1994年）。

72



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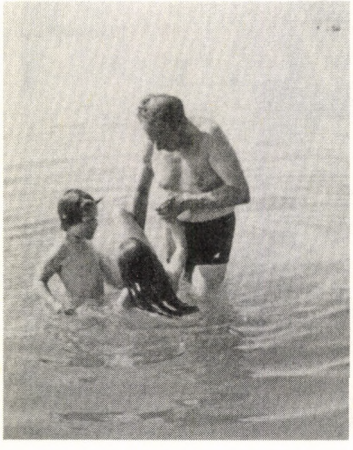
74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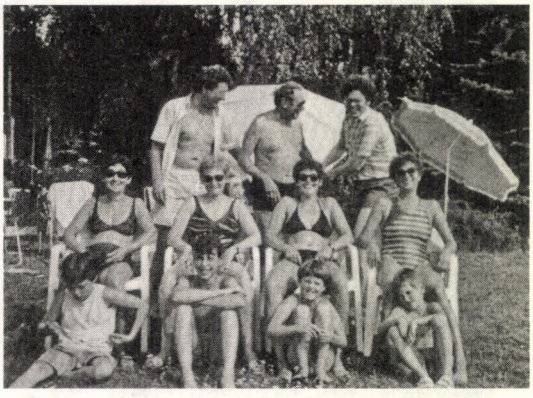
76

77

78



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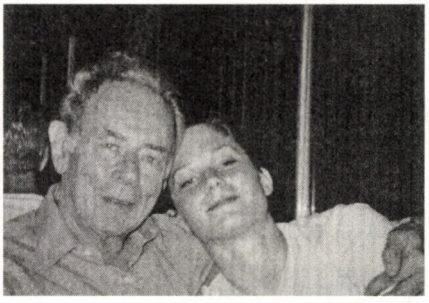


75. 与加博尔和他的妻子通德在一起（摄于1990年）。
76. 与朱迪特在公寓阳台上合影（摄于1984年）。
77. 与安德拉什摄于波士顿海滨广场（摄于1990年）。
78. 带瑞典外孙索菲和安娜游泳（摄于1990年）。
79. 科尔奈全家在匈牙利科学院巴拉顿湖度假村度假。

80

81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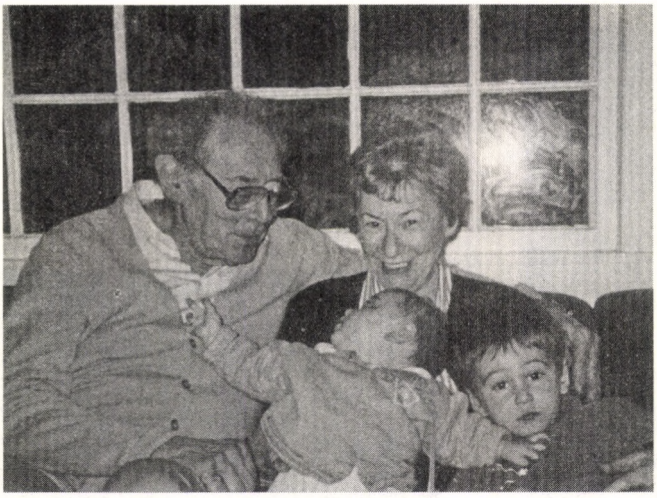
80. 我的4位身穿哈佛大学T恤衫的孙子孙女：尤尔奇、索菲、安娜和托米（摄于1994年）。
81. 在夏天过去时细数脸上的雀斑已经成为我家的传统，我们还会按时间进行统计比较，并用图表显示统计结果（摄于1999年）。照片上，安娜正让我细数她脸上的雀斑。
82. 与索菲合影（摄于2000年）。

83

83. 我和尤尔奇、托米以及加博尔一起到布达山远足（摄于2001年）。
84. 我和孙子托米坐在巴拉顿湖边专心读书（摄于1994年）。

84

85



85—86. 我们和两个美国小孙子达尼和诺里以及他们的母亲阿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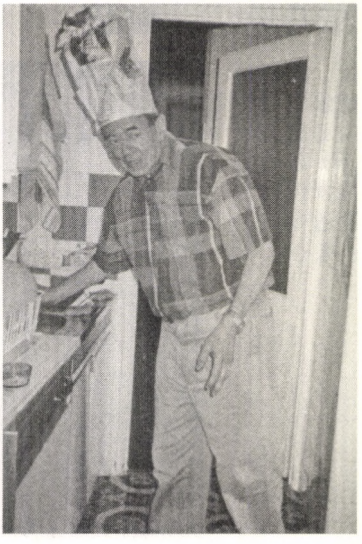
87. 年龄最大的美国孙子米什卡对茄饶做的烤薄饼非常感兴趣（摄于2000年）。

88. 特殊时刻：与孙儿们一起按照我自己的食谱制作我最喜爱的炖菜（摄于1996年）。

86

87

88



89

89—92. 与匈牙利朋友在一起。

89. 从左至右：安德拉什·纳吉、汉娜·B.肯德、阿格尼斯·洛松茨基以及彼得·肯德（摄于1992年）。

90. 彼得·肯德和捷尔吉·利特万（摄于1996年）。

91. 与勒切伊一家共进晚餐，帕里·勒切伊和茹饶以及彼得·豪纳克（摄于1992年）。

90

91

92

92. 在布达山散步：捷尔吉、埃娃·利特万夫妇以及茹饶，站在我边上的是茹饶的姐姐玛丽（摄于2003年）。

93

94

95

96

97

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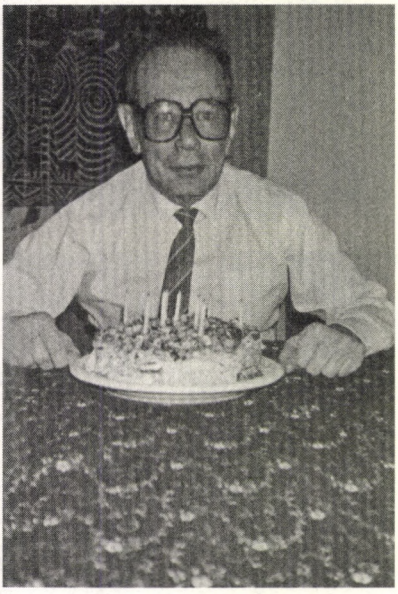
99

93—99. 海外友人。
93. 与罗伯特和博比·索洛夫妇合影。
94. 咪咪和格里·伯林夫妇。
95. 与海伦和赫伯特·莱文夫妇在一起。
96. 越南朋友兼翻译阮光亚。
97. 茹饶与加林和特鲁斯·库普曼斯在一起。
98. 与蒂博尔和伊丽莎白·西托夫斯基夫妇在一起。
99. 弗朗西斯·巴托尔与我在我家阳台上。

100

101

102



100. 在我70岁生日的时候，朋友们送我一本纪念文集作为礼物。照片中的人是经济所所长耶诺·科尔陶伊和文集的编辑雅诺什·加齐。

101. 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庆祝我的75岁生日。左边是院长伊姆雷·孔多尔，右边是我的助理考蒂·绍博。我后边那位留胡须的人是布

莱恩·麦克莱恩，过去20年中，他负责将我的著作翻译成英文（摄于2003年）。

102. 在生日家宴上，桌上放着我最喜欢的杏仁蛋糕。我正准备吹蜡烛（摄于199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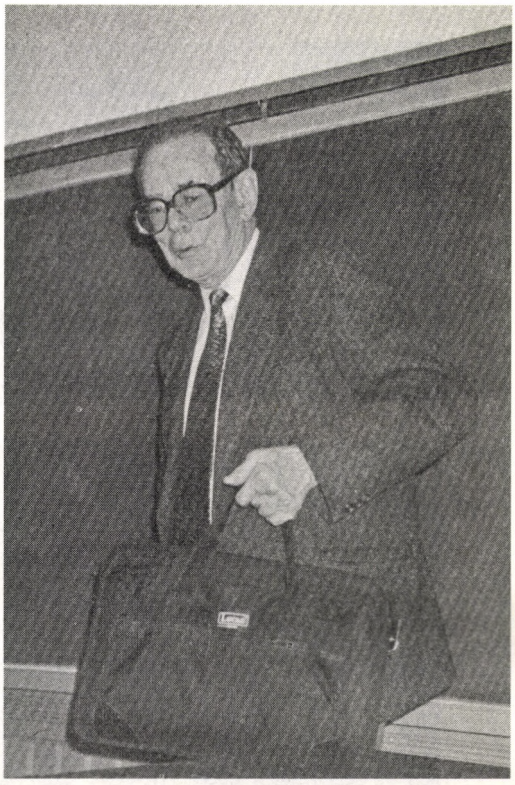
103. 与美国朋友戴尔·乔根森在我家喝渔夫汤。这时候系上围裙是个好主意。

104—106. 即将离开美国（摄于2002年）。

104. 最后一堂课结束后拿上皮包准备离开。

105. 与茹饶摄于布鲁克林桥。

104



103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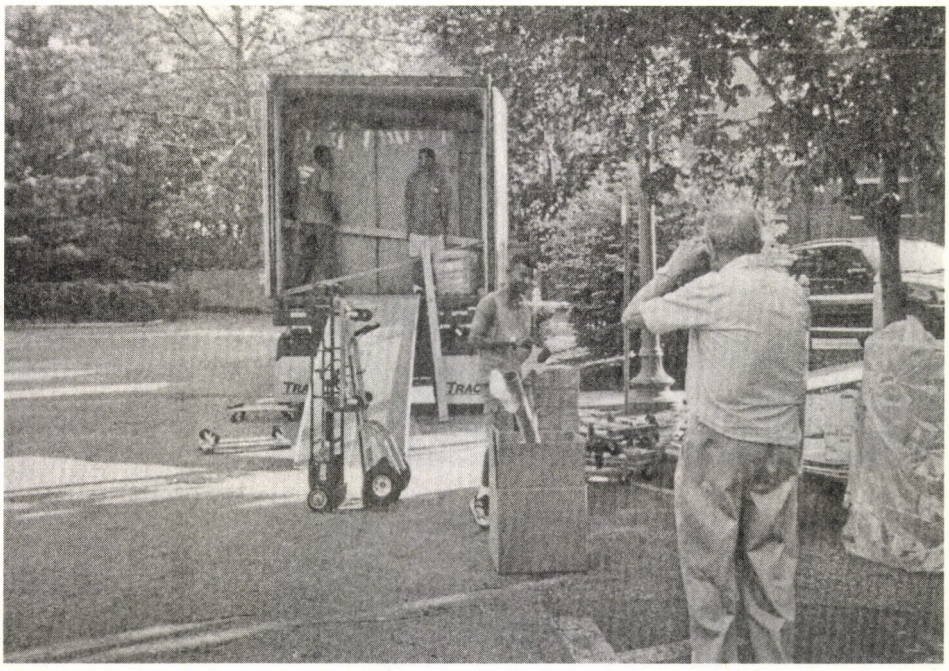
106

106. 告别波士顿港。
107—108. 摄于哈佛大学的告别晚宴。
107. 与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夫妇。
108. 后排是杰弗里·威廉姆森和杰弗里·萨克斯。照片前面是萨克斯妻子索尼亚·埃尔利赫和埃里克·马斯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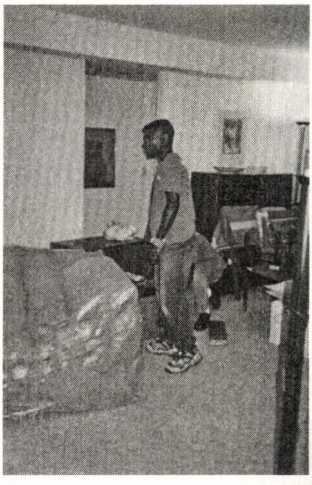
107

108

109



110



109—110. 摄于坎布里奇住宅前。我们正把家具装进集装箱准备托运。

111. 布达佩斯旧宅里几乎已经空了。我坐在临时拼凑的花园桌椅前工作，旁边堆满了箱子。每逢此时茹饶就会叫我“坚定的小锡兵”。

111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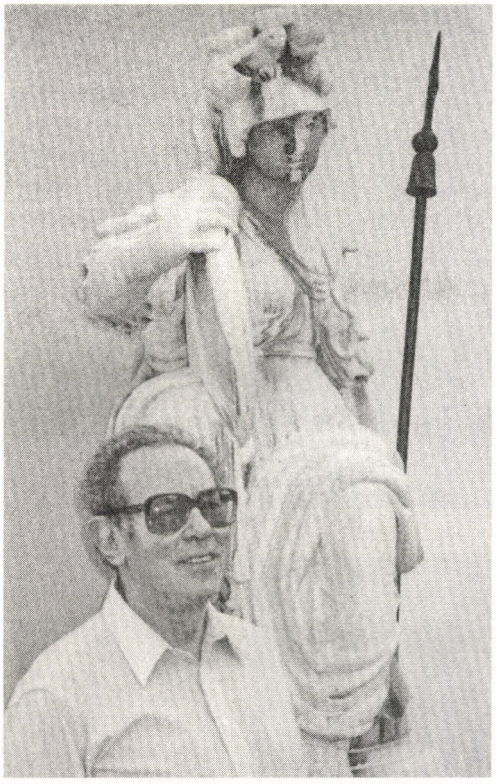
113

114

112—113. 在1993年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的开幕仪式上。我与匈牙利总统阿尔帕德·根茨以及维克多·考拉迪教授和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侧面那位）在一起。

114. 在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开幕式休息时间里。与匈牙利科学院院长多莫科什·科萨里和作家彼得·艾什泰哈齐一起交谈。

115



115. 在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著名的智慧女神雅典娜雕像前。

116. 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大楼靠近圣三位一体广场的一角。从研究院建成到2003年，我一直在楼上那间带阳台的房间办公。

117. “诚实与信任”国际研究团队撰写了两部论文集。这是团队的三位编辑。从左至右：苏珊·罗斯-阿克曼（耶鲁大学）、我、布·罗特施泰因（哥德堡大学），以及卡伦·库克（斯坦福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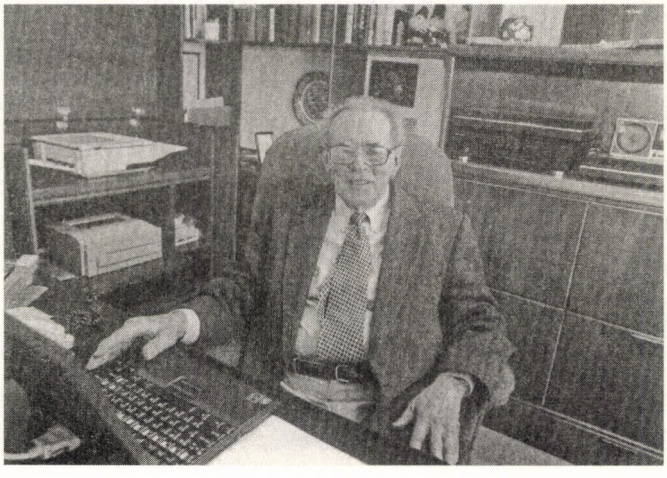
117

116

118

119

120



118. 我在北京发表演讲。我的哈佛大学的学生、现香港大学教授李稻葵正向听众介绍我。
119. 同与我相交20年的朋友、中国经济改革的学术领军人物吴敬琏教授在一起。我们两人的生日相差不过几天，会议的主办方于2005年1月为我们两人举办生日晚宴。
120. 在布达佩斯新居书桌前。

感谢下列人士为我提供照片：
第20张：乔治·格鲁斯曼。
第30张：L.碧昂科（日内瓦）。
第34张：奥洛普工作室（巴黎）。
第46和116张：伊娃·基焦希·施密特。
第69张：罗德·菲利普斯（田纳西州孟菲斯市）。
第73张：朱迪特·缪勒（布达佩斯）。
第113和114张：捷尔吉·纳吉夫人（布达佩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匈)科尔奈(Kornai, J.)著;安佳,张涵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书名原文:By Force of thought: Irregular memoirs of an intellectual journey

ISBN 978-7-208-11193-6

Ⅰ. ①思… Ⅱ. ①科… ②安… ③张… Ⅲ. ①科尔奈(F.)-自传 Ⅳ. ①K835.1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1556 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封面装帧 王小阳

思想的力量
——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
[匈]雅诺什·科尔奈 著
安 佳 张 涵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33.25 插页 4 字数 508,000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193-6/F·2154
定价 88.00 元

By force of thought: irregular memoirs of an intellectual journey
by János Kornai
Copyright © 2006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3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译者简介

安佳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专业领域：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著有专著 4 部，译著 25 部，相关学术论文一百多篇。

张涵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

科尔奈的绝大多数著作都曾翻译成中文，他的理论和观点是中国经济学人和关心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人们所熟知的，也对中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吴敬琏

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一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启迪了一代中国经济改革者。作为改革思想家和研究者，他的这本自传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和中国知识分子都极具启发。思想的力量最终可以超越利益的驱动。

——钱颖一

作为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创建者、改革者及批判者，全世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先驱，在经济思想史中独树一帜的理论家，雅诺什·科尔奈的回忆录《思想的力量》以人格化的角度、大师的高度、学者的深度揭示了经济改革、体制转轨、制度变迁的过程及规律。科尔奈是唯一在新古典、新制度，在计划、改革、转轨等方面同时做出过开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此书是集制度变迁及经济学思想史为一身的经典。

——许成钢

这本自传是“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探讨科学创造的道德标准和心理过程的专著”。

——青木昌彦

上架建议：经济思想
ISBN 978-7-208-11193-6
9 787208 111936 >
定价：88.00元
易文网：www.ewen.cc